#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第一册

國史館編印

#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第一册

國史館編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黃季陸先生遺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編輯例言

黃故館長季陸先生宏揚史學，盡瘁館務。今為其逝世週年，本館將黃先生論著講述，彙編成集，以表示追念，並嘉惠後學。

本集定名為「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凡傳記文學社出版之「黃季陸先生懷往文集」與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出版之「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書已收載之文字，以不再輯入為原則。

集內依文字之內容性質，概分為專論、講詞、函電、談話（包括發言紀錄、記者訪問稿）、憶述、序跋與書評等六大類。已印製成小冊者，則仍依其性質分編於各類之中，並於文後註記。

本集篇目編排以論述發表時間之先後為序，其時間未詳者，則列於各類之後。如時間或內容上有說明之必要者，則於文末附加按語。

承黃先生哲嗣乃興先生及秘書趙國雄先生蒐整遺作，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會提供若干資料，於此一併致謝。

本集由賴淑卿女士編輯，雖屬盡力蒐集，力求完善；生早年著述及講學等文件，搜尋至難。而在臺諸作，又因時間匆促，難期完整，滄海遺珠之憾，在所不免。日後如續有發現，當再行增訂，尚祈各界賢達賜予指正是幸。

國史館誌　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總目錄


黃季陸先生遺像

壹、專論……一

貳、講詞……七九九

叁、函電……一五四三

肆、談話……一五八五

伍、憶述……一七一五

陸、序跋與書評……一九八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第一册

## 目錄

### 黃季陸先生遺像

### 壹、專　論


對日外交問題　民國十七年八月……一
對俄外交問題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三三
新的革命觀　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七一
中國革命現階段之認識　民國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八〇
倫敦縮軍會議與中國　民國十九年二月十六日……九四
清黨紀念感言　民國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一〇一
青年參加革命的今昔　民國十九年五月一日……一〇六
如何認識　總理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日……一一五
各省設置鄉村幹部學校以建立黨政基礎意見書　民國二十七年……一三三
關於田賦徵糧與實施糧餉劃分辦法建議案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日……一三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青年勞動服務運動的意義　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二日……一四三
遠東比歐洲更重要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四八
遵奉　總理錢幣革命遺教發行實物貨幣奠立長期抗戰及建國經濟基礎案　民國三十一年……一五三
耕者有其田的理論基礎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六五
耕者有其田的理論與資料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七一
四十一年度的內政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一八一
實施耕者有其田工作報告　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九六
四十二年度的內政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一九九
會議規範草訂之遠因及經過　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二一七
附錄：會議規範內政部公布試行令……二二三
會議規範……二二五
民權主義教育的基本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二六三
從和平的氣氛看戰爭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十日……二七三
國際時局展望之一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二七九
重遊日本　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一日……二八四
對於四十八年度預算案補充意見　民國四十七年……二九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檢定考試改進方案草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一日……二九三
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三十九人委員會審查議事規則修正案提出審查報告後之感想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五日……三〇五
近年來教育文化的發展和今後努力的方向——陽明山第二次會談文教
二十六日……三一〇
國立歷史博物館創設教學研究室　民國五十年十月九日……三二六
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所提書面報告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三二八
民權的理論和實踐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三三九
辛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有關史料之處理問題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三四五
當前面對的問題和今後具體的策劃　民國五十一年……三五五
一個合於戰時與平時的教育策劃　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三六五
一個今後發展科學教育的路向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三七三
中等教育與技藝教育發展之方向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十六、七日……三七九
一個今後發展職業教育的方向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三八八
當前教育配合軍事的幾項策劃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四〇二
當前必須勇於面對的問題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四一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二九」黃花岡革命事蹟　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四二一
國父民權思想的礎石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四二八
國父以智識供給人民的遺教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四三五
教育投資及其收獲——為菲律賓中正學院擴制成立而作　民國五十四年……四四一
中韓關係與亞洲安危　民國五十四年……四四四
臺灣光復與中國革命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四五四
總理開國前夕對內政外交之決策　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一日……四六二
民主典例與民主憲政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四七五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五一二
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　民國五十八年……五七四
愛鄉與愛國　民國六十年九月……六三一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獻言——由地圖展覽所得的幾點感想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六三三
國父逝世與早期反共思想——介紹戴季陶先生宏揚　國父正統思想之偉大貢獻　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十……六三七
二日……六四八
國民革命歷史重心的重建——總裁　蔣先生對中國國民黨組織的演進
年十月三十一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獻言　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六六八
中華民國的光輝正照耀大陸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八日……六七一
孫逸仙主義與中華民國的土地改革 (Sun Yat-senism and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六七七
加速中華文化大國的建設——代發刊詞　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七一一
孫中山先生與德國　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七一三
發揚中華民國的歷史光輝——中國歷史學會第十六屆會員大會獻詞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七三四
迎民國七十年　民國七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七三六
十二全大會所應面對的問題　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七三八
國父生辰的考證　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七四三
如何做會議的主席……七八〇
空中學制之建立及其有關問題……七八九
國史館想作的是些甚麼？……七九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

## 壹、專論

### 對日外交問題

#### 一、緒言

自日本出兵山東以至最近濟南的屠殺，一面在中、日的關係上到了一個很嚴重的時期，同時在這次事件中國民族所受的恥辱和損失，要算是自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羞恥！他的影響不僅是重大的予中國革命以打擊，而其結果必定造成第二次更烈的世界大戰，把世界全部的組織再行掀動一番！中國國家的地位也許會因這次事件而變成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後將近滅亡的土耳其，但是我們確信中國民族的未來，一定有後來大敗希臘軍隊的土耳其民族的復興同樣的機會和可能。我們不用畏懼，民族的再造和復興全憑這種事例來造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們認定這次事件的重大意義不是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的中日戰爭和庚子義和團事變所能比擬。我們民族的生存和滅亡兩條大路，現在是到了由我們自行決擇的時候了！目前對日外交問題處置當否，就是卜算中國民族的存亡一個很大關頭。

國際問題的實際純全是一個力的比較的演試，衰弱的民族如果不能從根本立起來，而欲免掉一切國際不平的壓迫，簡直是一場夢想！俗話所謂的「弱國無外交」的意義，是因爲國家「弱」的關係而成立。不能變弱爲強，不能把弱的原因變爲強的力量，要想從外交的運用達到民族的危機的轉變，天下沒有此項事例。弱國自救的途徑一是自強，一是投機。前者是根本，後者是僥倖。一個民族的興盛絕不能從僥倖中獲得，歐戰時德、奧在中國的利益自然拋棄了。然而拋棄了的利益，結果不是落在中國人民的手中，而是承繼德、奧的日本，最近日本對山東的侵佔行爲，就是在昔日一時的僥倖而造成今日愈更危險的局面。因此一個民族的興盛條件，第一是自強，第二亦是自強，第三還是自強。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足，不能從民族存在的根本上建設，一旦國際的危機到臨，縱是痛哭流涕，氣憤塡膺，於民族的危亡有何補益？全國的國民！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跳樑橫暴，我們所受的恥辱總是很多了，在每次國家恥辱的發生除掉刺激起我們一時的興奮狂叫之外，不曾給了我們一種更深自強自救的教訓，現在也許是我們最末一次的教訓了，在這次的嚴重事件，我們再不能從根本覺悟起來，恐怕以後連一時興奮狂叫的排外熱狂都會消失！且看，在這次日兵濟南屠殺事件發生後，全國國民的情緒，較之於以前的事件，已覺沉寂到極點，這更足以證明自強自救才是立國的根本，一時的興奮狂叫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這種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躁不實的民氣，終局必弄到疲麻不易刺激起來的一天，那更屬危險了。

對日的外交要求得到一個很滿足的解決，第一我們必須檢閱現在自日本的政情和日本對華政策的背景，是不果的可能；第二我們必須明瞭題我們不用細說來「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可以輕易打消的。在第一個問次行動的實際，而求一應付的方略。敵情的明瞭是我們攻擊戰鬥的要素，是在從日本的本身而分析他此獻一點意思於讀者。本文的大旨就想在這一點上貢

日本此次在山東的暴行，我們可以歸納爲下列幾個原因：

一、奉魯軍閥的潰敗，足以動搖其在滿蒙、山東一帶歷年經營掠奪的基礎，故必援救奉魯軍閥的覆滅，才可以保障其侵略中國的進行。

二、日本過去現在都是藩閥統治的局面，近年以來民間思想對於現有日本全部的社會基礎，已進於改造的形勢，藩閥皇室的地位已呈露出動搖的危險。中國革命一旦成功，其影響足以促進日本的革命，藩閥皇室的地位必致不保。故日本統治階級必須阻撓中國革命的成就，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存在。

三、自最近普選議會成立後，日本的小資產階級已在政治上獲得相當的地位，民眾和統治者的鬥爭，已進到短兵相接的時期，最顯著的事實，便是最近在野各黨謀推翻軍閥內閣田中的運動。故最近山東的問題可以說是日本軍閥政府藉外交問題來緩和國內各派的一種政略。從以上的幾點，我們可以明白此次日軍在山東的屠殺，簡直是來勢兇猛，應當嚴重應付的了。在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次日本政府對華態度的主要角色，當然是承繼長洲系軍閥的田中義一，他對華問題來消滅日本上述三個的危局，一面他是代表世界最近的反革命勢力而與革命的勢力圖爲最後的搏擊。他是一個軍閥一跳爲政黨的領袖，他的行動簡直是一種變態的。歷史和事實告訴我們，人類歷史的推進，往往由變態的人和行動演出來未來世界的變化，田中義一也許就是一個點火的人吧。我們看他在作政友會的領袖時候，對他的朋友的談話，便可以知道他的爲人了。他說：「我做軍人以來，經過中日、日俄兩次大戰，這兩次大戰我都不曾死，政友會這一個黨是不利於領袖的不祥黨，從前星亨是被人刺殺了，現在的原敬又被人刺殺了，我以戰陣餘生，不能死於疆場，所以特意尋著這個不利於領袖的政黨來做領袖。」田中這段話可以見出他對於日本現狀的煩悶，他解決這種煩悶的方法是只有「一拚」。

日本此次在山東的行動，既具了不能不幹的條件，同時又有了「冒死鬼」的田中義一在那裏推動。這種來勢絕不是僥倖的應付所能抵抗的，戴季陶同志說「石頭才能和石頭的石頭來碰，而且還要準備較石頭還堅硬的鋼鐵來碰，才能應付目前的大要壞，沒有碰的決心和準備，較之不碰更要不利到萬倍的！我們要如何才了解日本一般的政情和日本侵略中國的過去現在，才能得到一個結論。

## 二、日本傳統的對華侵略政策

日本此次在山東的暴行，其動機雖由奉魯軍閥的敗潰，和企圖防止中國革命成功，以免影響於日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統治階級地位的革命發生，及借外交問題以緩和最近日本國內的政潮三合而成的事實，而不是日本對華政策的骨子。日本對華有一不可搖動的的侵略政策，所謂北進侵略是也。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是因最近濟南的事件才開端，縱沒有最近濟南問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仍是一貫的和猛烈的進行，最近濟南問題不過是一種侵略中國猛烈的爆發而已。

說起來自慚極了！日本這個小小的國家，說到他的文化，是由中國竊取去的；說到他立國的基本，最多也不過是六十年的維新歷史。他的過去文明是由中國賦予他的，他的興盛也是由中日戰爭，中國自己不爭氣打下了敗仗，助長了他的氣焰！我們把日本最近的歷史來看一看，在明治維新以前，全國完全生息於藩王的統治和封建的制度局面之下；論到他和近代國家的關係，也不過才幾十年的歷史。在一八五三年離現在僅僅八十年光景，美國的海軍總督白利 Perry 率領美國艦隊撞進了日本相州浦賀港要求通商，日本閉關鎖國的局面才漸漸打破，日本在近代世界的國家裏面才獲得一個「半野蠻」Semi-Civilized 的地位，自此以後歐美列強的勢力漸漸侵入了日本，他的國運便日卽於窮途。舉凡現在中國所受列強的一切束縛，及日本人現在所加於中國的枷鎖，前時的日本也曾一一受過。畢竟日本人十分的爭氣，不像我們中國人過去的那樣墮落。他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便把國家從根立起來，一直造成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明治維新統一國政，幕府藩閥的權力就漸漸削滅，國家的基礎，便積極的改建起來。我們讀了日本最近立國史，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知要如何的慚愧了！

德川幕府歸還大政，造成明治維新，是日本由衰弱而富強的一個大轉機。在明治初年，當時推進維新政治的人物，我們可以概括的分爲兩派：一是文官派，一是武官派。在思想和主張上，前者是足踏實地的實行家，後者是熱烈急進的向外發展者。代表穩健實行者爲巖倉具視，代表熱烈急進者爲西鄉隆盛。兩派人物在當時雖思想主張各執所見，各有異同，然而所不同者，在巖倉具視一派人則主張從內政的建設，以培養國家元氣，然後才能向外採取急進主義。而在西鄉隆盛一派人則主張急激排外的「攘夷政策」，以發揚日本的國勢。西鄉、巖倉兩派人在明治六年因征韓論一取急進，一取保守的關係，於是主張征韓論的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板垣退助、後藤象四郎、江藤新平等，便聯袂辭職，而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一般主張改革內政的人便留掌日本政權。朝鮮是中國的屏障，此時唱征韓論的西鄉一派人，自然可以說是近代日本向大陸發展侵略中國政策的提倡者，然而我們如因當時有對征韓論意見不同而招分裂之西鄉和巖倉兩派人的事實，便認爲日本過去現在對中國的侵略有贊成和反對兩派的政策，那便千錯萬錯了！我們可以武斷的說一句，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是一脈相承，絕沒有贊成和反對兩派的事實，明治六年西鄉和巖倉兩派人雖因征韓論而各走一端，然而所不同者僅是他們對於當時日本國勢的觀察各異：一主從內政修明着手來開國建國；一主從向外發展，以消納國內過多的武士以減國政的危迫。他們只是方法和緩急的不同，而不是向大陸侵略的目的有所差異，這是我們應當明白的。

在明治十年西鄉隆盛慘死，西鄉一派人，自然在日本國內招了很重大的打擊，但是日本國內政治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因這個關係益趨穩定，國勢的發展也日漸充足。所以明治二十七年的中日之戰，小小的日本竟把老大帝國的中國打敗，竟把日本文化祖國的中國外實內虛的黑幕揭穿！日本對西鄉隆盛之死而停止，反因西鄉隆盛之死而大成了！所以明治六年西鄉征韓，僅是一緩急的不同一時政治上的政略，而不是對大陸侵略政策根手於內政的建設。說他是一派所反對的，不是西鄉的主張，而是的差異，也就可以明瞭了。

甲午中日戰爭，日本的勝利是日本向大陸進取政策的成功，其後吞是他大陸進取政策的發展。在史的方面，日本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是如此；但日本何以必須侵略中國？這是我們必須略爲討論的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促進日本開國的明治維新的局面，由於外力壓迫和國內藩閥政治到了一個衰落時期的結果造成的，當時日本所受外力的壓迫，一面是海洋的歐美，一面是北方大陸的俄羅斯，所以日本在國際的存在上，至少是要從這兩個強大的勢力壓迫之下，而求一生路。在他的外交政策上，自然也便會有海洋進取政策和大陸進取政策，或南進和北進兩種政策的考慮。所謂海洋進取政策的基本，自然要靠強大的海軍，然而日本這一層是說不上的。而且英、美的強大，絕不是日本過去的國勢所能匹敵，如果日本採取海洋進取政策，第一個大困難就是英、美的力量足以防制他一切的發展。在北方的俄羅斯雖然是很強大的，然而衰弱的高麗和老大的中國，畢竟可以予日本以向大陸進取不少的機會。這便是大陸進取政策的根本和他成就的原因了。

俗話說得好，「水是往低的地方流」，日本侵略中國的動機，便是實行了這一個原則。我們知道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是一個地少人多的國家，是一個軍國主義底子的國家，他的生存是必然的要靠向外發展來維持，軍國主義便是日本維持他的發展的武器，我們不應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應當怪我們自己太不爭氣，一定要使他充分的在中國達到他侵略的企圖。假如中國的國力較歐美還要強大，至少也可防止日本的侵略，所謂日本的海洋進取政策和大陸進取政策，終必不易實現的，我們應當猛省。

我們從過去的一切，可以看出日本對華政策純全是一種傳統的侵略政策。在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立場看來，是他國勢發展上必然的趨勢，而在中國的立場看來，是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強國暴行，絕不是可以用任何取巧簡便方法可以制止，而完全是一個力的問題，我們要知道對日外交問題的骨子是一個力的問題，和整箇國家建設的問題，我們只有從這種根本上去努力，才能得到一箇實際。

現在有一部分人關於對日本外交的應付，以爲可以乘最近日本在野各黨倒閣的機會，獲得他們的同情，便可轉危爲安了。說這種話的人簡直是一種夢想，他們不但不明白日本對華傳統的侵略政策是不可變動的，同時對於日本一般的政情和日本國民在政治上的勢力，也是茫然不知的。下段將說明其錯誤。

## 三、日本對華侵略背景

前文已把日本傳統的對華侵略政策說明了，從上文裏面，至少我們應當明白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是一貫的和不可倖免的。他一面是由於地少人多，必須向外發展的整個日本國家的要求，一面是因爲日本純全是個軍國主義的國家組織，他離掉了侵略他國之外，沒有方法來維持他的存在。既然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經做了老虎，要叫他不吃人是不可能的事，除非被吃的人在死未照臨的時候，能夠把老虎打死，或若能夠自強自立起來，使老虎不敢來打他的主意才行。明白這一點，對日的外交問題，至少我們應當把北京昔日官僚的外交政策一切惡習去掉，才能得著一個光明。甚麼是北京官僚的外交政策？就是歐美常常譏刺我們的「哀請人家幫忙的外交」，和「謝謝你 Thank you 的外交」兩個北京的傳家寶。我們要曉得在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外交的代表的失敗，不是限於利益國權上的損失，而是他們見著各個強國的當局便哀請人家幫忙，不斷的把誠誠懇懇的「謝謝你」的聲浪去感動人家！外國報紙說是中國外交代表的漂亮，完全是他們的 Thank you 說得可憐！

俗話說「老馬不死舊性在」，這自然是很可靠的一句話，但是國家的危險到了這步田地，民族的存亡到了一髮千鈞的現在，能夠不蹈北京官僚的惡習，而把中國過去的外交的舊性勉強去掉，也未始不是一種成績。能夠如此，自然不一定對日外交便可勝利，然而至少可以做到不求有功，而不致爲中國民族的光榮，革命政府的地位和後代兒孫的體面，遺下百世之羞了！現在對日的外交前途如何，我們雖不敢預料，但至少我們可以代表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說一句必能做到不損害於未來民族的光榮和偉大的話。至於成敗利鈍是全國國民的事，要全國國民共同去努力負責的。

現在我們來論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背景。

最近有一部分人，以爲日本多數的國民和在野各黨，是反對田中對華侵略政策的，所以他們主張能博得日本國民和在野各黨的同情，便可以打消日本此後在中國的暴行，這種話是否是事實，我們姑且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去研究。我們現在假定這種話是正確的，那末，我們也必須檢閱日本的國情和日本政府的組織，及其對華侵略政策的背景，才能明瞭。假如日本國民果眞同情於我們，他究竟有無力量去轉移日本現在政府對華的侵略政策，是不可不研究的。因爲這是一個事實的能否問題，不是可以拿來自慰自欺的。我們要明白這個問題的實際，可從三方面去研究而求得一個答案。

一、日本政府的組織及其對華侵略政策的背景。

二、日本國民在政治上的力量。

三、日本在野各黨是反對侵略中國的嗎？

現在我們先談日本政府的組織及其對華政策的背景。人人都知道日本是一個立憲的國家，但是日本是怎樣的一個立憲的國家，便很少人研究了。爲明白日本政府的組織起見，我們可以拿日本一八八九年的帝國憲法來研究一下，便可得其大概。日本一八六七年的「王政復古」、「明治維新」，雖說是受了西方列強壓迫的結果，但明治維新只是在統一國政以禦外侮，對於近代民主政治的組織，在當時並沒有採行的意識和決心。其後因爲「鎖國政策」的不能堅持，西方的民主憲政等思想漸漸輸入了日本，日本國民才漸漸有了「歐化」、「設立民選議會」、「實行憲政」等等的企圖，然其關鍵則在於明治六年因爲「征韓論」弄到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五參議，因爲巖倉具視一派人的專橫而聯袂辭職。自此以後，日本國政便顯然的分爲在朝、在野兩派的鬥爭。板垣退助一派人，以在野的地位，於明治七年提出請設立民選議會的建白書，實爲日本憲政運動的開始。其後經過七、八年全國民眾熱烈的運動，日本當局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民意的不可過拂，乃於明治十四年頒布明治二十三年設立民選議會，實千八百八十九年憲法的起源。

在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日本帝國憲法和日本人民憲政運動的關係，有兩點我們必須注意。第一，板垣退助等在明治七年以後的民選議會運動，是比較的受了「民約論」和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的傳染，但其後在明治十五年日政府派伊籐博文等赴歐考察各國的憲政，以便草定未來的日本憲法，但伊籐博文歐以後，專注重在考察當時軍國主義的和開明專制的普魯士憲法，及至歸國以後，又因爲板垣一派人的自由運動，激起了日本藩閥政府對民權思想的恐怖，於是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公布欽定的日本帝國憲法，便完全是反乎板垣一派人的自由主義的要求，而純全成爲一種專制和偏重於特權階級的有名無實的憲法的空文。第二，板垣雖然是日本自由主義運動的先覺，但是他在明治七年關於請設民選議會的運動，不必論其後來遭了伊籐博文和藩閥政府的推殘無所成就，但其原始動機，也不一定完全具了想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的要求，不過因征韓論辭職下野，藉此對在朝的政敵予以打擊所採用的政略罷了！

日本一八八九年的帝國憲法全文共七十六條，分爲天皇、人民權利義務、帝國議會、樞密院、國務大臣、司法、財政、補充條文之七章。他的全部精神可分爲下列幾點：

一、鞏固其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地位，而賦予天皇以名義上總攬立法、司法、行政各大權。

二、爲人民的權利，而加限制於天皇的權力。

三、保留舊日封建諸侯在國政上的特權繼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人民權利雖在憲法上略得保障，但確定其性質爲天皇自動的賜予，而非由於人民的要求。

## 四、軍閥支配下的日本政治

從上述日本帝國憲法的幾個要點，便可知道日本憲政制度的實際了。在表面上，日本政府的組織，也是採的三權分立的形式。行政權，則寄託在總攬萬機的天皇，和輔佐他的國務大臣；司法權，則委諸永久不動的法官；立法權，則有冠冕堂皇帝國議會貴族院和衆議院。然而究其實際，與其說他是三權分立的政府組織，毋寧說他是皇權一貫，或藩閥專權的政府組織。因爲日本的內閣，並不是行使行政權的主體，而其性質等於天皇的屬僚。在司法權方面，人民在法律上雖略有保障，然而人民權利的獲得，是由天皇所賜予，而不是人民應享的權利。在立法權方面，議會雖可議立法律，然而其性質僅是協贊天皇立法，而沒有立法主權機關的獨立意義。更可注意的便是憲法中規定的樞密院的組織，及其在日本實政治上所行使的權力及影響。以後當逐一說明之。

日本政府的行政權可以說是由天皇、內閣各部及樞密院三個機關行使之。

天皇當然是行政部的首長，他不僅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而且是國權的本體和創造者，所有日本現在國家的權力形式，都是由他賜予而存在。他的權力可以摘要如下：

一、天皇依國會的協贊而行使立法權，法律必須經他裁可執行，才能有效。他有召集議會，宣布開會、閉會、停會及解散衆議院之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在緊急場合，而又是議會未開會期中，他得發布敕令以代法律，他更可發布執行法律維持治安必要的命令。

三、天皇有制定文官制度、官規、官俸之權。文武官吏之任免，也是在他的大權之內。

四、他是海陸軍的大元帥，全國的海陸空軍都歸他統率。

五、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屬於天皇。

六、頒布戒嚴令，賞賜爵位勳典，宣布特赦、減刑、復權等大權，也屬於天皇。

綜合起來講，日本的天皇在立法、行政、外交各方面具有獨立的大權，尤其是發布緊急命令權，及獨立決定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他在近世立憲國家元首當中，可以說罕有可與匹敵的大權獨攬者。就形式上所看得出的天皇的大權，日本簡直是一奇特的天皇一元論的專制國家。究竟天皇是否是實際的大權行使者，我們可以說完全不是那一回事。日本政府與其說是天皇支配一切，毋寧說是軍閥藩閥支配一切，日本的天皇好比是演雙簧戲的比手勢和做怪象的人，而支配他的動作的人，完全是隱在後面說話的藩閥。藩閥如何的歌唱，他便如何的動作了。

內閣的名稱，在日本的憲法尋不出這個名字。所謂內閣是憲法中規定的國務大臣。國務大臣自然是在天皇之下的職位，他們的職務是「輔弼天皇負其責任」，並不是具有近代內閣制內閣，對國會負責任的意義。照日本特殊的天皇統治上說，國務大臣是天皇的臣僕，他的性質等於天皇的屬僚，他應當對天皇負責任，而不是對國會對人民負政治上的責任。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內閣並不是一個決定國家大政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機關，也不是對人民負責任的機關。他的地位始終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假如組織內閣的人而不是代表日本實際的政治力量，他在日本政治上是毫無力量和影響可言的。不過日本政治純全是由軍閥實力所支配，所以每次內閣的後面都站得有實力。他往往成爲很有力量的執政者，不過他的這種力量是站在他的後面的軍閥的力量，而不是內閣本身在國法上所具有的。明白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內閣的更迭，並不是表示日本國家政策的變更，僅僅是一種這個人去，另一個同樣的人來的把戲罷了，於軍閥的政策是無所動搖的。要研究日本對內對外的政策，必須把這一點明白，不然要想說於日本政府的政策有所應付，而把內閣的更迭認爲是一個樞紐，那便太錯誤了！

實際決定日本政府一切政策的究竟是甚麼力量，是我們必須明白的一個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日本的內閣的本身是沒有力量的，內閣的力量是在站在內閣後面的軍閥。所謂日本的軍閥，便是藩閥和元老在日本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勢力。我們要明白這一點，可以從日本內閣的組織和樞密院的組織來研究便可明瞭。

現在先談日本內閣的實際。日本的內閣自然也和其他國家一樣分爲陸軍、海軍、大藏（卽財政）、文部等各部。照例每度的國務大臣一定能夠自行分配他的閣員，而連帶負責，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第一，因爲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底子，天皇是海陸軍的大元帥，因爲要鞏固軍權的統一集中，而不致受一般政治動搖和牽制，以完成他軍國主義使命，於是最高的軍令機關，竟以大元帥的幕僚機關而直屬於海陸軍大元帥的天皇，而不屬於內閣。第二，日本一八八九年的帝國憲法既已替舊時封建的藩閥勢力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定了保障，自此以後藩閥的勢力便繼續維持他左右日本政治的勢力。藩閥支配日本政治有兩個武器，一是樞密院對於閣內大臣任命的勢力，一是陸海軍兩部閣員人選的限制。前者是藩閥元老支配政治的形式，後者是支配內閣的實際。在一八九四年山縣內閣時代，以樞密院令規定內閣海陸軍兩部閣員的人選，必須在現役的陸軍中將、海軍中將以上的資格人中擇充。在一九一三年，此項院令雖然改爲限於預備役或退役的陸海軍軍官，以歷史和地位的關係，絕不能離掉薩長兩藩但非係軍人仍不得享有此權。所謂日本的高級海陸軍軍官，以歷史和地位的不依就薩長兩閥領袖的支配的，內閣大臣在選任陸海軍閣員時，既須受此限制，於是內閣便不得支配，他可以直接命其支配以獲得海陸軍兩部的閣員人選了。因之日本內閣成立後如不受薩長兩閥的，便是軍閥支配海軍部和陸軍部，因此又由海陸軍兩部閣員來支配內閣之下的海陸軍兩部閣員辭職，以制內閣的使命。由這個公式演繹出來的結果閣要脫離軍閥的支配，簡直的運命。這樣一種情形，日本內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例子。

從歷史的過去薩閥支配海軍，長閥支配陸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由薩長兩閥直接命人去做，但即使純以政黨或其他與他們無關係的人去做內閣大臣，但因爲陸海軍兩部閣員必須由他支配的緣故，於是任何人做國務大臣，也必須對薩長兩閥奉命惟謹了。在一九二一年陸軍大臣上原辭職的原因，是因爲當時的內閣不贊成薩長兩閥增加朝鮮兩師團政策所致，其結果當時的西園寺內閣，因找不出適當之陸軍大臣繼任者，而不得不自行辭職，這便是一個很顯明的事實。

日本的樞密院是在內閣之外另一機關，論到他憲法上的權力與內閣同爲日本天皇之輔弼。但因爲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密院的大臣們大半是由元老、藩閥、官僚和其他有力量的分子組織成，他在政治上的勢力，幾乎駕內閣而上。關於國家重要事務，樞密院爲日本天皇的諮詢機關，同時也是一個事實上代天皇決定行使大權的機關。他的全部作用幾爲日本所謂元老、藩閥、貴族的代表人所支配。元老關於內閣的人選，在事實上幾有左右之權，內閣的政策往往也受他們有力的支配。在這樣政情之下的日本內閣，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國法上的權力了。

由上面所得到支配日本政府的政策的力量，既不是內閣，又不是天皇，而是元老、樞密院、藩閥等等勢力。總括一句，便是日本的軍閥。現在很多人把此次山東日軍的屠殺，認爲是田中內閣的政策，不錯，是田中的主張，不過田中是代表日本傳統的對華侵略政策的人之一，他的後面還站有整個的日本封建殘餘勢力，和軍閥勢力呀！田中一個人算不得是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中心，打倒了他，而不能以一種力量來變更日本的政情，便是隔靴搔癢，搔不到癢處的！

## 五、輕微的日本人在政治上權力

從日本帝國憲法和日本政權的實際，便可知道除了軍閥勢力左右日本政局之外，再沒有其他力量可以影響到他根本政策的變動。如果從近代責任內閣及民權制度國家的立場來看日本的政治，便會發生幾種矛盾。第一，日本議會是一協贊天皇的機關，而不是純正的立法機關。第二，執行政務掌握大權的行政部，與議會純全是立於無甚責任的地位。換言之，就是議會不能左右政府的政策，而是軍閥元老爲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策實際的決定者。同時日本的，但在過去關於選舉權方閥、軍閥、官僚等的貴族院關，於是日本人民的選舉權直微乎其微了！

在明治二十三年，第一屆日本帝國議會成立，眾議院議員總數爲三百名。在表面上看，日本自此以後便有了民選的議會，而在實際此項民選議會至今在形式上還是依然存在。但一考其內容則殊覺令人失望。我們姑且不究日本議院的權力如何，只看他歷來關於議員選舉權的限制，便可知道日本人民在政治上的力量了。

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〇年，日本議會選舉權是限於下列各種條件的：

一、選舉人年齡須在二十五歲以上。

二、被選舉人年齡須在三十歲以上。

三、選舉與被選舉人均須年納直接稅十五元以上者。

四、在選舉區居住一年以上者。

就以上限制而論，第一是財產的限制太嚴，第二是年齡的限制太高。以當時日本人口而論，約每十二萬人才能選出議員一人。細考日本當時全國有選舉權的人數三百人而論，恰爲人口百與一之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人總數，僅僅四十五萬人左右，這樣的民選議會，那裏說得上是代表人民的機關！到了一千九百年被選人的財產限制則減爲一年前納地租十元，或兩年前納其他直接稅十元以上。自經這度改正後，日本人民選舉權數目由四十五萬增至一百五十萬人，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選舉人財產限制又改低爲納直接稅三元以上，照此，選舉人數可增至三百萬人。其後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加籐內閣時代，普通選舉法案成立，從此以後選民人數可增加到約一千萬人左右，不過普選實行後仍限於男子，佔有人口半數以上之女子依然是無選舉權的。

日本自一八八九年第一屆國會成立，一直到一千九百二十五年的普選案通過，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日本人民選舉權的享受是偏重於有產階級的，尤其是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〇〇年，十五元以上直接稅的財產限制，把選舉權僅限於四十五萬的富人去享受。現在普選法案是成立了，但是他的影響如何我們是必須研究的。

第一，我們要知道日本的議會本來就是沒有甚麼大權的，任你選舉權的限制如何寬大，日本人民的政治權如果要從議會這條路去擴大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第二，在民選的眾議院之上還有一個貴族院的設置。在權力上，貴族院事事都可牽制眾議院的行動；而在性質上貴族院是代表官僚、藩閥、政客、富人等特權階級的組織。他不能與民選的眾議院時時取一致的動作，是我們意中事。我們現在把日本貴族院的組織來大概研究便可明白了。

貴族院議員的人數在先也是三百人，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則增至四百二十人，他的構成分子是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下列各項人才能充任：

一、皇室成年男子。

二、公侯兩等爵位之貴族。

三、由天皇就各階級中對國家有勳勞者，敕令任命爲議員。

以上三項之人爲終身的貴族院議員。

四、由伯子男各爵貴族選舉之同族議員。（被選人不得過各族之五分之一）

五、府縣多額納稅人互選，經天皇任命爲貴族院議員。

以上之貴族院議員其任期七年。

六、學士院院員中互選四人。

由以上性質的人來組織貴族院，純全是一種代表特權階級的組織，沒有絲毫代表人民的氣味。他的權力既可牽制民選的衆議院的行動，而日本人民的政治權要想影響到實際的日本政治，簡直等於上天之難了。就拿民選議員的本身來說，歷屆的衆議院議員往往受藩閥和執權的人收買，要希望他在議會眞能代表選舉人的意思確實很難！這種議員不能代表選舉人的現象，自然不僅日本爲然，但日本議會議員的本身因爲受了無權和封建餘毒的影響，於是表現議會的弱點也較其他國家爲多了。

研究對日本外交的人應當明白，日本這個國家的組織是以封建的勢力爲中心，他的面貌是由於人口過剩，物質缺乏，而以侵略的軍國主義表現出來。根據於事實的要求，他必須侵略中國來維持他的國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和生存。日本的軍閥是侵略主義的火車頭，把大多數的車輛般的日本人民拖起往前跑。不論他是車頭與車輛，他向着侵略的路上走是同軌而進的。勿論日本人民的政治權力輕微而薄弱，就是有了很大足以左右政治的權力，也恐怕在這樣一種國家組織之下，也免不掉仍是要向中國進攻呵！

## 六、日本政黨與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

政黨是社會利益的反映，社會有多種不同的利益，於是便會發生各種不同的政黨。在另一種說法，人類思想和信仰是不一致的，於是一個國家裏面便會發生許多思想信仰不同的政黨組織。我們拿這種眼光來觀察歐美各國的政黨的成立，至少可以證明上面所說政黨發生的原因是不會錯誤的。但是我們如果拿以上的原則，來觀察日本的政黨，便會遇着很多矛盾和不符的事實。

日本的已成政黨，與其說他是以社會利益爲基礎，而以實現代表某種社會利益的政策爲目的，毋寧說他是爭權奪利，只求握得政權，不管政策的實施與否的私利團結。在國際的政策上，各黨除掉一種空泛的主張外，談不上有甚麼具體的外交政策。這種現象並不能專責日本這個特殊國家的組織所造成。第一、日本是以軍閥、藩閥、元老等勢力爲中心的政治情形。第二、人民參政機關的議會權力過小，不能決定國家的大政。第三、過去關於議會的選舉權是限於極少數的資產階級，而大多數的日本人民一直到最近才獲得選舉權。第四、日本的內閣完全受軍人實力的支配，不能單獨決定國家政策。有此幾項原因，於是日本的政黨除掉爭權奪利，依附實力，賣身求榮之外，便不能以實際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社會利益爲基礎，以實現起於社會各階級羣眾利益的要求的各項政策爲目的。日本過去最大的幾個已成政黨如政友會、政友本黨及憲政會，他們每個雖然都有財閥做後臺老板，但畢竟是各個大資本家利用政黨而達到他政治上的要求，而在根本上只是財閥與財閥的鬥氣，而不是起於階級利益不同的爭鬥。我們看到政友會後面是財閥三井，憲政會後面是財閥三菱，政友本黨的後面是財閥大倉，這些事實所指示的雖然各個政黨都有不同的人做後盾，但這種不同的後臺老板仍然是單純的屬於財閥一個階級。換言之，各個政黨的背景，並不是代表社會各個不同利益屬性的階級和基本政策。

日本的政黨在社會方面，既沒有實際的廣大社會利益做基礎，又乏堅決一貫的主義和政策，因此之故，除從事於政爭之外實無遠大之目的。因爲只顧政權之奪取，而不計及主義政綱之實施，於是日本政黨的分化簡直出人意表之外了。有時爲爭奪政權便利起見，以主張歷史極相背馳之各黨不僅可以聯合，而且共同解散其各個原有政黨而成一新黨之例也數見不鮮，此眞是日本政黨一個特殊怪象，而日本政黨之內容也可想像了。

在明治二十三年民選議會未成立以前，日本政黨已備雛形，如板垣退助領導之下的自由黨，大隈重信領導之下的立憲改進黨，此外尚有所謂帝制黨、進步黨等。當時各黨之發生，由於王權與民權等主張之不同而起者居多，實際則純由於明治維新，日本人民頓現一種政治的狂熱，以爲日本實行立憲，一面可以自強自救，一面人民在政治上便可獲得優越的地位。實則日本國家因當時國民對於新政的熱狂而獲得國家統一富強之機，而所謂人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至今尚是俗話所謂，倒看千里鏡還隔得遠得很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呀！自明治二十三年民選議會成立後，各黨的變遷分化異常複雜，未暇述其經過，現在暫把過去幾年中各黨情形及最近各黨的現勢略爲述明，便可推及其他了。日本最著名的政黨要算是下列五個：

一、政友會。
二、憲政會。
三、中正俱樂部。
四、革新俱樂部。
五、新業同志會。

上列五黨中以政友會與憲政會爲旗鼓相當的兩個大黨。在大正十三年初，因元老西園寺、松方兩人推薦樞密院議長清浦奎吾子爵繼山本權兵衞爲內閣總理，發生貴族院與衆議院爭奪政權的事實，於是日本政治上便發生「護憲」、「打倒特權內閣」等的呼聲，政友會也就因此分裂。原隸屬於政友會而擁護清浦內閣的山本達雄一派，便退出政友會而組織政友本黨，原有的政友會便與憲政會、革新俱樂部聯合而稱爲護憲的二派，以推翻清浦內閣。清浦倒後，繼起而組織內閣的便是憲政會的加藤高明，政友會的高橋是清，革新俱樂部的犬養毅也同時入閣而組織所謂混合內閣。但是憲政、革新、政友三黨的合作，畢竟因是同床異夢的關係，不久便也破裂。政友會的總裁高橋是清，因感覺與憲政會組織混合內閣的不當，於是便欲退出，但又恐退出後負破壞聯合內閣的責任，於是於退出之時，便同時辭去政友會總裁的職務。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高橋退出聯合內閣後，不但不曾破壞憲政會加籐高明操縱下的內閣全部，而且反因憲政會之善於迎合元老貴族的緣故，其後竟仍由加籐高明組織清一色的憲政會內閣，這不能不說是憲政會的手段高妙了。高橋辭掉了政友會的總裁後，政友會的總裁一職便由軍閥而兼政客的田中義一繼任，最近中日關係的險惡，便是這素持侵略主義的田中義一所造成。

田中當了政友會的總裁後，不久便拉攏革新俱樂部、中正俱樂部，合組「立憲政友會」，於是立憲政友會便成爲田中自此操縱活動的工具，以「立憲政友會」的政府爲唯一的侵略中國的大本營了。

憲政會的加籐內閣因病逝世，繼之而起的爲內相若槻禮次郎。若槻因救濟臺灣銀行的緊急敕令事件，被樞密院於提交審查時被否決，迫而辭職，於是憲政會的敵黨「立憲政友會」的領袖田中義一便於去年四月繼起而組織日本內閣。去年北伐軍將到濟南時，遭日本出兵山東事件，予垂死之奉魯軍閥以助力而保其殘喘，便是田中組閣後的第一個對中國侵略的實施。最近北伐軍攻克濟南後，發生日軍在濟南對我軍民的大屠殺，也是田中義一對華侵略的再度實施。我們在此可以知道田中是個甚麼樣的人，他領導之下的立憲政友會是怎樣的一個政黨了！

田中在上臺的時候，宣布了五條新閣組織方針。其中最緊要的便是對華外交政策，自謂是取積極的行動，他一面露骨的表示對華採積極侵略政策，一面他自兼外相，似乎新閣的作用全在於外交問題一點。換言之，對華一貫的外交政策，便是田中在登臺的時候已經早抱定一種橫蠻暴戾的決心了。所以去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山東出兵和最近日軍在濟南的屠殺，完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當權的政友會和田中的對華野心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日本在野各黨的情形，同時看他們對於日本侵略我國政策取何態度。

日本目前的在野黨可以分做兩種：一是以舊時憲政會、政友本黨爲基礎的已成政黨，一是自普選法案通過後而產生的無產政黨。

歷來日本的政友會和憲政會是兩個最大的政爭政黨，自政友會中份子脫離政友會而組織政友本黨後，在議會裏而幾成了鼎足而三的形勢，政友本黨畢竟因議員僅六、七十人，不能單獨從事於政權的奪取，於是純全以依附權勢，附屬他黨以自存。自田中的立憲政友會掌握政權後，從前的憲政會感覺力量的單弱，不能與政友會抗，於是便拉攏政友本黨於去年組織立憲民政黨。現在日本在野政黨的力量最厚的要算是立憲民政黨了。除掉民政黨之外，便是無產各黨。無產各黨雖爲日本社會較新分子所領導，但一面因爲歷史太淺，一面又因日本政府時取高壓手段的緣故，現在尚說不上有何力量。在言論上和行動上，無產各黨雖表示反對田中的對華政策，但其力量和影響甚難改變日本傳統的對華侵略政策。從日本在野黨的形勢而論，無產各黨已成立者，如勞働農民黨、日本農民黨、社會民眾黨等，均因力量太微，所以目前田中對華的侵略政策，希望由無產政黨予以糾正，在日本現在的國情和無產各黨的力量，是難於辦到的。

無產各黨縱有反對田中對華侵略政策的意識，但不足以改變日本對華侵略的力量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一研究在野黨中而具有較大力量的憲政會和政友本黨合組的民政黨的對華態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立憲民政黨在去年六月一號舉行結黨式，他所宣布的三大政綱是：一、外交的國際正義化，二、產業之整調，三、教育之刷新。但民政黨所謂的國際正義化，僅是一種門面語，我們且看他對於對華問題所表示的態度便可知道了。第一，在表面上民政黨雖說對中國問題抱不干涉主義，但他附帶的內容便是對於所謂中國之不法行爲則主張嚴重抗議，以所謂合理的手段達到正當的要求。第二，對於滿蒙問題則主張維持其所謂特殊地位，如權利被侵犯，雖用最後手段也在所不辭。我們看民政黨的對華政策所謂「雖用最後手段在所不辭」幾句話，便可以合理手段達到正當要求」和知其居心所在了。所以從日本在野各黨的現勢而論，無產各黨無力量，民政黨雖有力量，然而對華的侵略野心仍是換湯不換藥的。

根據以上日本政黨的情勢，日本已成各大黨對於我國侵略政策只是程度之相差，而不是根本的不同，所以對日的外交問題而要求一光明之路，是在日本以外而求辦法，或在我們本身上才能想出辦法來。因此，所謂聯合日本在野各黨，打倒田中對華侵略政策的空話，簡直是痴人說夢！

## 七、結　論

在前幾段裏已經把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骨子說了一個大概。日本的勢力的最後支配點，都是不容許他不能不對華取侵略的手段。所以最近對華侵略政策一種兇猛趨勢的爆發，本是不足奇怪的。在我國方面遇到這種嚴重的關頭，我們應當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定我們自己的堅決的立場，以一貫的方針來應付這種民族存亡的重大事件。我們要知道國家大事是繼續的永久的，我們對於國際事件雖不說要有百年大計的方針，但是我們至少也要有比較遠大的計畫，然後才不致遇事倉忙無所措施，把國家大事猶如兒戲般的玩弄！

對日外交第一個要點，我們把日本侵略行動認爲是日本整個國家的動員，只有用一種較大的力量才能把他制止，我們自己民族生存才能救出來。同時要認清能夠予日本侵略政策以打擊和制止的力量，不是在日本本身，而是在日本之外和中國自己。換句話說，就是在我們對於國際政策的善於運用和把中國民族的力量趕快堅實起來。所以我們對日外交方針的決定應當從國際的大勢和整個民族建設的觀點出發才能得到一個較善的結論。

現在就國際大勢來觀察日本的地位。

把日本與國際的歷史翻開一看，我們便知日本的強盛也不過才幾十年光景。我們固然不可以拿「大器晚成」一句話來聊以自慰，但是像日本這樣小小一個國家幾十年來的成就，在人類的文化上本算不得一會甚麼事！日本的興盛頭一個機會，便是甲午中日戰遇着了當時老大而不爭氣的中國，他竟於一躍而爲戰勝國的地位；第二個機會是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論他當時的力量與俄國比較，眞無異以卵擊石，斷無戰勝俄國的道理，但是他終於戰勝了強大的俄國。戰勝的原因是由於英俄爭霸，日本得了英國的援助的緣故，英國所以屈駕而與日本成立其所謂日英同盟的緣故，完全是藉日本以抗俄國的東侵，同時爲欲鞏固其印度南洋一帶的殖民地位，便不得不聯日本以達到他的企圖。過去日本國際的關係，純賴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附於英吉利帝國以自固，同時英國得了日英同盟的幫助，便鞏固了其在遠東的長足發展。一九〇五年日本戰勝了俄國，英日關係的確是日本勝利的最大原因。自此以後日本吞併高麗，侵略滿洲，經營內蒙、山東一帶，當然是一帆風順的了。在歐戰期內，英國賴有日英同盟的關係，其印度、南洋一帶的富源，也靠日本爲他鞏固。所以在歐戰以前的日本國際關係，是日、英狼狽相助的在遠東發展的一個局面。在歐戰期內日本雖然給了英國以莫大的幫助，但同時因爲大戰的時候，各交戰國都以全力注重在對德的戰事，不能繼續其在中國的各種掠奪，於是日本便在這時期內壟斷了侵略中國的一切勢力。英、法各國在中國勢力的消失，便促成日本對中國侵略的進展。

畢竟英、美各國是不甘心日本在遠東的優越地位的，所以歐戰以後的遠東情勢，便不得不隨之一變。這就是說從前日本所賴英吉利帝國相互爲助的國際關係，在歐戰以後呈露出一種英日關係的變遷和動搖的現象。

美、日兩國在歐戰以前，因對於太平洋沿岸和在遠東的地位是利益相衝突的。日本在歐戰期內既在中國掠奪了不少的利益，一面遭了英國之猜忌，同時復引起了美國的嫉視。歐戰後的遠東情勢，便不能走到把英、日從前友視的態度變成敵視的態度一條路上去了。同時又因日、美利益的衝突，於是美國便不能不拉攏英國，英國因爲戰時債務及對歐政策的關係，又不得不借重美國以維持他的地位。英、美這種日益接近的可能，在美國方面爲欲達到其制服日本而握得太平洋的霸權，於是便非聯英以陷日本在遠東處於孤立的地位不可。自歐戰以後我們看到遠東情勢上發現兩種特殊的事件，其一，爲日英同盟的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止和英國在星嘉坡建築強固的海軍根據地事件。其二，爲一九二一年美國所召集之華盛頓會議事件。

日英同盟的廢止而不繼續自然足以指示英、日在遠東國際關係的變遷。英國上年在星嘉坡建築海軍根據地的內幕，更足以顯示英吉利帝國的企圖，純全爲的是太平洋問題將來的爆發。在英國人眼中所認爲未來太平洋大戰的敵人，除了日本之外，再無其他的國家了。所以英、日目前的關係，不僅是在歐戰後起了變化，而且已日趨於惡化的情勢。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美國所主動召集的華盛頓會議，其表面所標示的目的：一爲裁軍問題，一爲處置戰後的遠東問題。換言之，卽是英、美聯合以處置日本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同時藉此在中國發展其「利益均沾」的企圖，以恢復其在遠東戰前的地位。我們看華盛頓會議關於海軍五五三的協定，和日本關於山東一部分權利移讓的規定，便可知道英、美的聯合以制日本在遠東發展的局勢經已成立，而日本在英、美的壓迫之下，也不得不俯首接受海軍協定，承認英、美爲五與三之比了。

由以上的敍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自歐戰以後英、美聯合以制日本的發展局勢已成，日、英的關係已從友視態度而變爲敵視的準備了。日本在這種情勢之下，他的國際關係便不能不陷於孤立的地位。同時日本爲欲免掉陷於這種國際孤立的地位，便不得不拉攏地位接近而又是英、美敵人的俄國。所以近幾年來日、俄兩國的使者相互奔走聯絡，力謀日俄關係的接近。最近更有日俄密約已經成立的傳說，其內容如何雖不易明瞭其眞象，但以理推之，不外下列兩點：

一、調解日、俄在滿蒙利益的衝突，而以協調的態度對付中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防礙英、美在遠東的發展，日、俄兩國在必要時共同對英美作戰。

如果上面的推察不致錯誤，日本國際孤立的情勢當然可以轉移，而我國此後的地位，也必愈趨於險惡。因爲日、俄的聯合成功，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必愈趨惡化，同時英、美向我國的進攻，也必愈不可抑，其結果必召英、美、日、俄的大戰，我國始終生息於國際暴力之下，非至亡國滅種不止！

因此，自濟案發生以來，國內人士關於對日外交方針已有下面兩種說法：

一、聯合英、美以制日本於國際孤立的形勢。

二、聯合俄國以陷日本最近對濟南事件的嚴重，而未計及聯合英美作戰。

在第一種說法，只鑒於日本的侵略政策，同時英、美向我國的進攻，也必愈不可抑，其結果必召英、美、日、俄的大戰，我國始終生息於國際暴力之下，非至亡國滅種不止！

因此，自濟案發生以來，國內人士關於對日外交方針已有下面兩種說法：

一、聯合英、美以制日本於國際孤立的形勢。

二、聯合俄國以陷日本最近對濟南事件的嚴重，而未計及聯合英美作戰。

在第一種說法，只鑒於日本的侵略政策，同時藉本黨聯俄以回復共產份子的朝鮮，當時有親華、親日兩派，但因純以一時利害的應付爲主，而沒有一貫的自主方針，結果弄到國亡家破！所以對日外交政策的決定，首先應當有個一貫的方針，不是因爲日軍濟南的屠殺而才聯英、聯美，甚而至於聯俄，而是中國既然是一個國家，事前就應當有個一貫的國際政策，才能有個原則來應付各種個別的外交事件。「頭痛醫頭，足痛醫足」，「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足」，常人的行動尚不能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此，何況是國家存亡的大事？所以無論聯英、聯美、聯俄都是在立國上應當自行決定一種原則，不是臨渴掘井的笨人動作，弄到迫不及待的情勢！

聯俄本來是　總理生前的一種政策，自　總理逝世，共產黨徒和本黨少數叛逆份子，以容共和聯俄混爲一談。一面把本黨的國際政策破壞無餘，一面在黨內給共產份子加上一重特別的保障，以致黨幾乎中斷，幾演成各地共匪猖獗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形。自去歲清黨以後，又因俄國野心未止，俄人復扶植各地共產份子反抗政府，爲禍我國，於是聯俄政策，不得不因清黨排共而同時毀棄。自絕俄以後，本應有一具體外交政策，但卒以忙於應付北伐清黨諸端未暇顧及，目前濟案應付極感困難之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現在我們姑且假定有聯俄的必要，因爲聯俄可以孤日本侵略中國之勢。但是我們必須研究爲甚麼我們去年要與俄國絕交？爲甚麼俄國至今仍然和我們不能處於接近的地位？在第一個問題，當然咎在俄國不應扶植共產黨爲禍中國所致，說到俄國現在尚不與我們接近的原因，這便是主張目前聯俄的一個中心問題了。我們要知道俄國是拿共產主義做幌子，以國家的地位與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鞏固俄國的地位，同時又以各國共產黨徒作武器，以擾亂世界，而得一自己休養的機會。歸根結底，便是由於國家自利的動機，而採用的鞏固俄國的策略。因此，聯俄的第一個條件便須以國際利害的聯合做基礎，才能得到眞正的聯合，第二，必須剷除他擾亂各國的工具共產黨徒，才能得到聯俄的善果。說到這一層必定有人懷疑了，因爲共產黨既是俄國擾亂世界的武器，共產黨雖不是俄國人，但卻是俄國力量的一種，天下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沒有敵視排斥人家力量而能與人家聯合的道理。但是我們必須認清，共產黨是俄國支配世界的工具。好在我們說的是聯俄，而不是附屬的和被動的依附，假如不能把俄國支配力量下的武器共產黨勢力消失，聯合的形式便不能成立，因爲支配與聯合是兩個不同意義的名詞，如果容許支配勢力的存在，絕沒有人取支配的形式而低就聯合的道理。本來聯俄和容共是兩件事，假如國民黨的清黨有澈底的成就，對俄的關係必不致於有後來破裂的事實。反過來講，因爲我們尚未能澈底的將共產黨勢力根本剷除，於是俄國便不得不希圖完成其以共產黨支配中國的野心，所以竟因扶植共產黨擾亂而至聯合的關係也破裂。我們知道土耳其、波蘭是殘殺共產黨的國家，然而土俄的外交關係，反因土耳其剷除共產黨後愈更密切。日本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可以和俄國聯合的原因，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因此，假如有人主張聯俄，必須第一步先翦除俄國支配的武器共產黨後，聯合的形式才能成立。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來聯俄，然後才不致給共產黨及叛逆份子造機會。

現在對於對日外交政策有我的主張是：

「必須自己有了一貫的外交政策的原則，然後才能應付各個特殊事件的發生。英美和日本自歐戰後利益上的衝突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我國在國際地位上絕不致於孤立無援。同時對俄問題須在澈底清黨的條件之下，然後才能得到一個較善的聯合。尤須注意的便是不澈底將共產黨勢力剷除淨盡，而欲聯俄，不但不可能，而且是給共產黨和叛逆份子造反的機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錄自「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十六年份月報合編」（上）

印行，民國十七年八月出版。

按：本文曾節錄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十二期，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對俄外交問題

## 一、導言

討論中俄外交問題之先，我們必先要明白俄國同中國在地形上有何關係，然後把現在的國際形勢來分析觀察，以推測將來我國應走那道路。

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時，中國有個舊式政治家林則徐——他曾經拒抗英國勢力，焚燒鴉片，在他臨死的時候，有句遺言說：「中國的外患，眼前只有英法；但將來眞正的外患，還是西北的俄羅斯。」在八、九十年前的人已經想到俄國問題的實在並不算稀奇，我們試把中國地圖翻開來一看，歐美各國同中國接觸的，只有空遼無際的海洋，距離很遠，在軍事及各方面講，只要有防守的力量，已經夠了。因爲海軍橫渡大洋，供給及作戰，都很感困難。但在我國西北、東北的疆界，幾乎全部與俄國銜接，在此情形下，俄國要侵掠中國，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西北方面有廣漠的蒙古、伊犂、新疆與俄國接壤，在東北方面俄領西比利亞及海參崴一帶，又與我黑龍江一帶十分接近，自西比利亞的鐵路完成後，俄國到我國東北的邊境，交通很爲便利，所以以我國國境的情形來講，俄國以爲中國家之患較任何國家爲急。但是在最近數十年來俄未爲中國的大患，又是什麼緣故呢。這裏有幾點應當說明的。本來在帝俄時代，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已集中很大的力量來侵掠中國，可是後來經過種種的變遷，終於受了阻礙，（一六八九年）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比較光榮可紀的尼布楚條約，就是給俄國南下政策一個很大的基礎，因爲清廷當時的武功正盛，是俄國侵略中國的第二個打擊。但這次事件並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夠把俄國南下的勢力阻止，而是日、俄兩國在滿蒙一帶勢力的新陳代謝。從中國自己利害上說：減輕了俄國的勢力，又增多一個日本。等於去了一個豺狼又來一個豺狼，結果還是中國吃虧。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經過長期爭戰和各國的封鎖，無力侵略，是俄國侵略中國的第三打擊。

從以上簡略的敍述看，近數十年來俄患之不如我們想像之急，並不是俄國不曾積極侵擾中國，也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可以阻止俄患，實際上則因爲國際的關係及牠本身的缺點和變遷，使牠有不得不暫時中止其侵略我國企圖的地方，現在蘇俄的國勢和牠的東方政策已經恢復其帝俄時代的舊觀了，所以最近的對俄問題的嚴重，絕不是偶然的。八、九十年前的舊式政治家林則徐的預斷，依然是沒有錯誤。我們的　總理孫先生從前主張中國都域應設在甘肅蘭州，完全是爲國防上着想。因爲中國地域遼闊，而最緊要還是在西北與俄接壤的國防問題。

以上是對俄外交問題的一個楔子。現在我們再就中俄過去外交關係作一個簡括的觀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二、中俄外交關係的史略

要明白過去中俄外交的關係，可以簡略的分爲三個時期：

一、帝俄時代的中俄關係——一六八九—一九一七。

二、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一九一七—一九二九。

三、此次哈案與中東路的接收。

在七、八世紀以前俄國尚是蠻族，說不上文明。其始原爲諾曼族由瑞典遷徙到芬蘭一帶地方，被斯拉夫族及芬蘭打散。後因乘斯拉夫人內潰的機會，乘機侵略，方才崛強起來。在我國元太宗時（一二三五年）——中國領土擴張最大的時候，命拔都征俄，結果國境的擴大，一部分達到匈牙利，一部分達到波蘭，當時全部的俄土十之七八已在元朝武力統治之下。蒙古佔領俄土後成立金漢黨國，統治垂二百餘年之久，現在看察俄國的風俗習慣與歐洲不同，就是因爲被元朝統治幾百年之故，這是很遠的事。過後中俄的外交關係，在明朝隆慶元年（一五六七）有兩個俄國的哥薩克人到北京，求交通，這是元後中俄發生關係的第一次。後來俄國以武力統一國內的散漫民族，向西伯利亞發展，同時侵略到我國黑龍江以北，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其時黑龍江尚爲荒地，中國無固定的國界，俄國勢力直到了現在的恰克圖附近一帶。當時康熙感覺到俄國侵略的危險，才向俄國交涉劃清國界，派一個很能幹的大臣索額圖到尼布楚——在黑龍江北，爲俄人所築，去和俄使費要多羅訂約。這次條約，損失的土地不少，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中國對外交涉全部看來，還是很光榮。交涉的情形：康熙一面派遣大使，一面調集一萬多大兵，迫近尼布楚城。當時俄使很恐怖，但以屈於武力之下，不得不爲城下之盟，遂締結尼布楚條約，其大要如下：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卽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達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流，盡屬中國界，其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國界。

二、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中國屬，河之北岸爲俄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略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悉行遷移北岸。

三、雅克薩，俄羅斯所治之城，盡行毀除，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用物，悉聽撤往察罕汗之地。

自此條約成立後，俄人對我國之態度，甚爲溫和。同時且派留學生至北京學習漢文。讀中國近代外交史除尼布楚條約外，幾乎無役不是喪權失地，惟此次則比較光榮可紀。自此以後尚有所謂北京通商條約及恰克圖條約，然均關係於中俄通商貿易之協定，於國家之主權尚無大礙。

自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後，我國頻經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之役，國家多事，俄遂一變從前尊敬畏懼的心理，看穿中國的弱點，看見中國的內亂及受各國壓迫，遂於一八五八年強迫中國訂立愛琿條約，將尼布楚條約的精神完全變更，把黑龍江以北，興安嶺以南二百五十餘萬方里的土地，完全割與俄國。我國一面損失黑龍江、松花江的航權。從愛琿條約後俄國侵略中國開了一個新的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面，後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事件，繼之而起，我國喪權失地條款尤不可勝紀，於是俄患也就日迫一日！

從俄國侵略中國政策成功後，列強很爲驚惶，尤以英、日兩國最爲恐怖，的發展，不得不聯日本以制俄，後來的英日同盟的發生，其目的就是在聯合打倒俄國在遠東的發展。一九〇五年日俄戰事發生，以葢爾的日本能打敗俄國。背後全靠英國幫忙，戰後俄勢大減，代之而興的不是中國，而爲日本，於是日本遂成爲東亞及滿蒙問題的中心。

現在再講中東鐵路的來源。俄自愛琿條約後，侵略我國甚急。自甲午中國敗於日本，我國遼東半島均爲日所佔領，俄國看到日本之興起與其侵略中國政策大爲不利，於是俄乃聯合德、法二國強制日本歸還遼東，當時我國朝野，見著日本的勢力天天強大，又因俄人之誘惑，乃由李鴻章赴俄，於一八九六年與俄締結中俄密約。密約的大意，雖說是中、俄兩國對日本一種攻守同盟的性質，但俄國本意完全在利此密約，以遂其侵略滿蒙之志。密約第四條有根據中俄關係，中國政府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俄國海參崴之規定。又同時規定此路建築權歸華俄道勝銀行承辦，是爲中東鐵路之原始。

自尼布楚條約後，我國經俄國種種侵略的事實，已如上述。侵略的延展，一直到歐戰發生及俄國一九一七的革命乃略爲停頓。及至一九一九年俄國因爲被歐西各國封鎖，孤立無援，國勢民生日卽窮困，於是乃轉其視線向遠東求發展，此爲最近俄患發生之原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三、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

現在再談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

歐戰以後，歐洲各國爲厭戰和平與社會主義思潮所瀰漫，改造社會的主張異常蓬勃。俄國革命後以世界革命理論，攻擊資本主義爲號召，當時頗能獲得各國勞工界與思想界一部同情。蘇俄利用各國厭戰的心理，把舊俄時代對各國締結的條約、債務宣布無效，各國也因戰後力疲，不能向俄作武力的爭鬥。又因俄國以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號召各國勞動階級，牽掣列強。列強此時對俄既不能用武力積極爭服，始出於封鎖蘇俄一途。蘇俄在各國嚴重封鎖之下，孤立掙扎無法解脫。同時惟有進行其平日所提出的兩個口號：一個是扶助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一個是援助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頭一個口號的效用，使牠在孤立的外交中，得到一些同情者，第二個口號，可以使各國勞動階級牽掣其本國對俄的封鎖。但是第二個口號的效力很弱，列強的封鎖政策，不爲少動，弄得俄國國內凶年饑饉內亂不息。列寧看見向歐西發展的困難，只有轉向東方再尋出路之一法。同時中國是地大物博，人民眾多的國家，蘇俄要從四面封鎖中，衝開一條出路，以予各資本主義國家以打擊，只有向中國方面經營的一途。一九一九蘇俄特對華發表宣言，以博我國同情，宣言大意說：邀請中國即開談判，磋商廢棄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條約，乃至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帝俄時代侵奪中國或偕日本及其他聯盟國共同侵奪中國之權利一概歸還中國，此外更宣言放棄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時中東鐵路及一切礦產森林及他種產業的權利。自此宣言發出後，我國因爲久受歐美列強的壓迫，到處都是敵人，從無朋友。列強在華利益侵佔的護身符的不平等條約，從無有如俄之甘願放棄者，故對蘇俄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當然引爲滿意喜出望外。一般民眾經此空言誘惑之後，對俄觀感爲之一變。但經過近幾年得來的教訓，才知道錯了。列強以武力經濟來侵略中國；蘇俄以小利來引誘中國，而且所謂小利，又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情，猶如引餌釣魚，見餌而食固快意，因貪餌而亡身則更覺晦氣！

一九一九蘇俄發表此項宣言，表面固然是買好中國民眾的歡心，暗地裏卻進行兩種工作：一、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自此穩植根基，徐圖發展；二、在中國造成共產黨的勢力來支配中國，更進而作爲擾亂全世界的工具。

從一九一九年後，中俄關係大變，接着又有買好中國的第二、第三兩次宣言。此項宣言都是加拉罕起草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二、三次比第一次不同，而此兩次宣言對於博取中國同情的話說得特別可聽，但對於放棄在華利益等話則迄無具體表示。一九二三年加爲大使，與我國商量恢復國交，締立中俄協定——若根據第一次宣言，則此協定內容無異一面說放棄一切權利，而一面又在保留其帝俄時代的權利。自中俄協定成立後，國人對於蘇俄之用心乃漸漸明白。

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雖在北京成立，但中東路在奉天勢力範圍，當時奉天在北京權力支配之外，彷彿另外是一個單位。加氏看清這點，一面承認北京爲合法政府，與之訂中俄協定，但因奉張不承認，又親赴奉天私與奉張訂奉俄協定。此兩協定內容雖差異甚少，但有一點我們應當留心，就是俄國既以放棄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切權利，來引誘中國訂結保持權利之中俄協定已屬滑稽，而在外交方式上說，蘇俄既承認北京政府爲訂立協定之合法政府，但同時又與地方政府訂約，實是不重信義，破壞締約國對方的外交的統一。推其用意完全爲奉天方面之不同意中俄協定，俄國所急欲根據協定以發展其在中東路之權利，不得奉天許可無從實現，故不惜有此破壞外交慣例之舉，及至奉俄協定成立後，俄國在中東路之陰謀計畫乃盡情進行。

此外更有一事，足以顯示蘇俄對我國侵略之陰謀與帝俄時代實毫無差別。當民國十二年春俄代表越飛正在與北京政府進行中俄協定時，蘇俄政府忽於是時與蒙古代表在莫斯科締結下列之密約：

一、外蒙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礦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蘇俄人民居住耕種。

二、外蒙天然富源禁止私有；一切礦區，許蘇俄實業家僱用蒙人開採。

三、全蒙礦業，歸蘇俄工團及工會承辦。

四、外蒙貴族享有之土地權，當卽廢止，而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

五、外蒙須聘蘇俄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商業。

六、外蒙須請求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完全保護工人。

七、外蒙政府須聘蘇俄之各專家爲顧問，以資指導。

八、外蒙政府一切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會議，以便制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九、蘇俄軍隊得駐紮於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

十、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而以活佛爲革命委員會委員長。

觀以上密約，蒙古已無異成爲赤俄之藩屬，其侵略滿蒙之陰謀已昭然若揭了！

蘇俄之侵略野心，及其在國際上手段之奸險狠毒，實足令人髮指。尚無聊，只要於蘇俄自身有利之事，所謂條約信義，均不惜破壞背棄。在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第四條有云：「蘇俄政府聲明對於前俄皇時代與第三者所訂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如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歸無效。」蘇俄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之對華宣言也曾聲明此點，不料蘇俄在中俄協定方成立之後，即積極進行與俄大使加納罕在北京正式簽日俄協定。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日本全權代表芳澤謙吉定日俄協定，在此協定之第二款，竟有損害我國主權之規定，其原文是：「俄允許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樸資茅斯條約依照有效。」所謂一九〇五年的樸資茅斯條約其中大部分是滿蒙一帶被帝俄所侵佔之利益，作爲俄國戰敗的犧牲。蘇俄此種侵害我國主權的舉動，直接的影響是破壞中俄協定各項的規定，間接的影響是日、俄兩國勾結，對於侵略我國的滿蒙方面取一種協調的態度，其最大的影響則是蘇俄意在降心聯日以造成世界最可怖的國際大戰，蘇俄方針在進行。近幾年來喧騰世界日俄的聯盟及日、俄各秘密的協定，都不是無因的，關於此點以後分析最近國際情勢時再談。不過我希望大家留心的是：此次對俄的問題，日本的態度極可注意，如果此次事件單純是中俄的問題是很容易應付的，但恐怕中俄問題的將來，是未來國際的大問題呀！所以我們現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應當抱定很大一個決心來求我們民族的生路。

蘇俄一九一九年宣言發表後，竭其全力以博得我國同情，我國因對外方面處於國際帝國主義環攻之下，蘇俄既聲明願棄其帝俄時代掠奪我國之一切權利，當然吾人極願推誠與之聯合；在對內方面，當時我國主權尚爲少數寄生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軍閥掌握之中，此時全國民眾的要求知道非革命無以推倒國內軍閥建立獨立自由之國家，蘇俄乘此弱點，一面既宣言放棄帝俄時代之權利，一面更進而假意同情援助我國革命。本黨　總理孫中山先生以國民革命之目的，對內在打倒軍閥，對外在打倒帝國主義，蘇俄既願放棄其帝俄時代在我國主義目的之共同，故爲革命利益計，乃以條件的而決定聯俄政策。所謂有條件的聯俄是在俄能確實履行其放棄在華一切權利宣傳之外，更須能保障其對蒙古無侵掠之野心。聯俄條件中更爲重要者，則爲蘇俄當確實保障中國無實行共產制或蘇維埃制度之可能。換言之，卽俄國在中國，絕對不許有布爾希維克主義之宣傳及活動。

自民國十四年　孫中先生逝世以後，蘇俄挾共產黨的力量以破壞國民黨內之附共份子——卽今日之改組派——作其工具，以爲掠奪權利之需。革命，篡奪國民黨黨權陰謀暴露以後，民十六年國民黨卽厲行清黨，而一俄容共口號，企圖寄生於蘇俄卵翼之下以求掙扎。雖至現在此輩猶不惜背我們爲欲證明若輩之誤謬，可將民國十二年一月　孫中山先生在聯俄之初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聯合發表之宣言引爲參考。照烏德海（Woodhead）一九二四年「中國年鑑」所載，宣言大要如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國家的統一之大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　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賴乎俄國援助也。

二、爲明瞭此等地位起見，　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宣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因此向　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路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祇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理，事實上現在祇能維持現狀，且與越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祇能由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權時改組，同時　孫逸仙博士以爲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正式向　孫博士宣稱，俄國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　孫博士因此以爲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爲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抗行爲之發生，反會釀成較現在尤爲嚴重之局面。

觀　中山先生與越飛上項宣言，其主旨在俄能保障在中國不進行其蘇維埃制度和侵佔蒙古之野心，及實踐對華放棄其一切權利之宣言。其後蘇俄勢力在中國之猖獗，共產黨在各地之殺人放火，實由於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日之附共份子，卽今日之改組派，違反　孫先生聯俄的精神所致。

當未清黨以前，凡共產黨與附共份子所在之地，卽有蘇俄侵掠擾亂中國是在廣州經共黨焚殺，國民政府對俄絕交，在南方各地俄國領署及謀亂之商方之陰謀搗亂，也頓失其根據。於是蘇俄不得不移其侵略搗亂之大本營於其謀再舉。年來中東鐵路時時發生我國與蘇俄的糾紛就是這個緣故。最近的中演成之中、俄險惡形勢，其遠因全在蘇俄破壞我國革命，勾結共匪及其工具亂之根據，而移至中東鐵路的緣故。

## 四、蘇俄最近擾亂我國陰謀暴露

蘇俄在南方一帶之陰謀機關，既因中國國民黨厲行清黨，及十六年國民大之打擊，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間，蘇俄雖欲仍繼續唆使中國共產黨徒及其謀再舉，但均經國民政府下各級政府的嚴厲鎮壓，力量全失。據一九二八年付之決議，蘇俄對華之活動已改變方針，以中東鐵路爲根據，向中國北部發活動困難，更有援助中國國民黨內小資產階級，以漸圖共產黨勢力發展之決國民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爲之號召共產黨變相的改組派。所謂改組派就是共產黨的殘餘和昔日一般附共份子，因清黨後而被擯除於國民黨之外的一種組織。我們知道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國際指導之下的各國共產黨的活動，有一不可易移之原則，就是以共產黨加入他黨，運用其黨團作用以竊據他黨的力量，作爲根據。同時更因其迎拒以定派系的宣傳而分化是黨的力量。清黨以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作用消失，蘇俄在國民黨的活動失掉一個很有力的工具。現在蘇俄改變方針來援助所謂國民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改組派，以搗亂國民黨的完整，其用意不外在想恢復清黨以後蘇俄侵略中國的舊觀而已。我們且看自中東路問題發生以後，全國反俄空氣何等緊張，而素來專以空唱高調爲能事的改組派，竟一言未發沉寂異常，且暗中挑動政潮，企圖破壞國家統一，其中不無多少蛛絲馬跡可尋了！

蘇俄的國際政策，是以蘇俄政府搖旗吶喊以威迫他國而遂其掠奪之謀，他的實際或主要工作則在以其支配下之各國共產黨，及附屬共產黨之團體或份子，從各國內部擴大力量以助成蘇俄外交的勝利。蘇俄之不得不以中東鐵路爲搗亂中國的根據，就是完全爲的是舍此之外沒有別的較好途徑，可以扶植其在中國之工具發展力量以爲他的援助的緣故。所以目前對俄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外交問題，而是對付共產黨及其工具在中國的發展的問題。我們這次收回中東鐵路，也不是單純收回國權的問題，而是斷絕蘇俄援亂中國各種陰謀的根本問題。換言之，就是中國的統一和平的問題及殺人放火的布爾扎維克主義是否要容許其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因此我們此次對於收回中東鐵路的應付，不僅要注意蘇俄侵略我國的行動，而且更應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及其變相的改組派破壞政府外交及搗亂中國的活動，而努力消滅他。

由上所述可知此次中東事件之發生，及俄人利用此鐵路爲宣傳及接濟共產黨搗亂中國之機關，實不足爲異。此外民國十六年四月北京之俄使館事件，北京當局曾搜獲蘇俄搗亂中國之文件多種，及十六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多廣州之共黨大屠殺，也以駐粵俄領署爲發動機關，均足以證明蘇俄之不利於我國之統一。此次我國遼甯當局搜查哈爾濱俄國領事署，發現蘇俄更凶更毒之陰謀計畫多種，在此情形之下，爲保持我國之統一及權利起見，對於中東路之收回實係一種國家自衞的正當手段。

遼甯當局在哈爾濱俄領事署搜出之蘇俄對我國陰謀計畫可歸納爲下列幾點：

一、本年一月十六日由哈爾濱向莫斯科發出電報云：使奉天與南京有決裂之可能，中東路中俄平均於事前增加款項，購買爆炸物。

二、本年二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向哈爾濱發出電報云：使奉天與南京有決裂之可能，中東路中俄平均用之一節，加以阻擾，儘量補充黨員。

三、一月二十三日電報又云：吾人應組織秘密強固之戰線，反抗南京與奉天協定，組織秘密破壞軍，實行破壞東省鐵路及各機關。

四、唆使馮玉祥反抗中央，破壞中國統一，而予以援助。（請參看國府所公布「蘇俄搗亂中國計畫」全文）。

根據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及奉俄協定均有：「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擔保，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機關及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之規定。又中東鐵路暫行管理協定第五項之規定云：「本鐵路各級人員，按照中俄兩國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則任用。」照此條文，則此次搜獲之蘇俄秘密文件，不僅足以證明蘇俄此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陰謀是違背中俄協定互相尊重兩國社會治安公共秩序之規定，而且於中東鐵路兩國平均用人之行政秩序也不惜破壞之；至於實行暗殺，組織秘密破壞軍，又離間中國地方當局與中央之一致，更爲情理與國際法所不容許。在此情形之下，中東鐵路之收回，一面是根據於中俄協定我國應有權力之執行，一面在國家的自衞方面實爲正當之處置，中國如果尚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當不能聽他國之陰謀破壞，危害其存在而不顧之理。所以這次我國收回中東鐵路係根據於國際條約上之權力及國家生存應有之正當的處置。而且接收後關於俄員之免職，也係根據於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第四條：「本鐵路之處長、副處長由理事會委派之」之規定，因爲理事會之一方理事已犯了危害中國國家安危之罪，當然不能容許其尚有執行權力之餘地。

自我國東省當局正當收管中東路以後，蘇俄即以最後通牒致我，爲種種無理的要求，我國爲尊重條約，維持世界和平起見，於覆文中仍盼蘇俄能一朝覺悟，派遣代表重行商訂以後中、俄兩國對於中東鐵路之處置。不料蘇俄於收到我國覆文以後，竟更進一步以斷絕國交來恐嚇，其橫暴無理開國際上絕無僅有之例。在蘇俄政府以爲中國近百年來的外交，無不屈服於各國帝國主義武力威迫之下，彼意固在襲其帝俄時代之暴力侵略的舊習以凌我，然在我國爲國家生存計，爲反抗帝國主義之橫暴計，當然不能因蘇俄斷絕國交之威迫而就舍其正當權利而不顧，我國此種態度，不僅是在國家生存上應當如此，而在國際的正義上也應當如此的。而且中國民族近百年來掙扎於各個帝國主義高壓之下，我國人民爲欲解除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壓迫，不惜以重大之犧牲，數十年苦鬥之努力，從事國民革命，現在國內軍閥雖除，正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們進行與各國商定廢除中國民族賣身契的不平等條約時候。假定以理直氣壯之對俄交涉，而竟再無端屈服於帝國主義暴力之覆轍，所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企圖，必將頓形絕望，而全部國民革命之獲得，必因此次對俄問題而損失了！

自俄國宣布對我絕交以後，更在中俄邊境增兵設防，俄軍且時時有向我軍挑釁之訊，其侮我辱我已達極點。實則以俄國之現勢，其內部問題孔多，其在國際上，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無日不在國際的封鎖與孤立之中，即以俄國之兵力與設備而言，其果能與我一戰嗎？觀其用意不外兩點：一、欲以戰爭的恐怖以威迫我屈服，二、欲利用最近國際情勢之不安定，除以外交的手腕，使中俄問題擴大成爲世界問題，以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然後俄國乃能利用此機會以困我國，以遂其擾亂世界和平的陰謀。

在上述第一點，俄國的武力威迫是不足畏的，至於第二點俄欲利用國際情勢以困我，也係蘇俄的一種空想。我們相信在現在的國際局面之中，我們一面挾着民族新興的力量以從事於國際束縛的解除，一面利用今日蘇俄在國際地位上的孤立，而努力於世界正義的建設，蘇俄的困難當較我們增多萬倍，勝利終屬於我國可爲斷言。請於下文論之。

## 五、最近國際形勢與對俄外交

從上面所述我們對於蘇俄此橫強無理自然無限悲憤，然而同時也不覺有無限痛心的地方。從蘇俄的國際地位來講，蘇俄既以打倒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之使命自負，然而假定蘇俄不能衝破資本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義的防線，而獲得新的反帝國主義的友軍，不僅是各個帝國主義的基礎不會動搖，就是蘇俄要單獨維持其現在俄國局部所行的灰色的共產主義也不可得。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至於一九二四年左右，蘇俄雖然曾盡其全力向近東及東歐、西歐進行其赤色主義的煽動，以求在帝國主義的圍攻之中衝出一條生路，但終於受了一九一八年芬蘭、奧大利、德意志，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巴佛利亞，各地無產階級革命之失敗，及一九二〇年後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和意大利法西斯蒂黨之勃興，近東與歐洲方面，已無容許蘇俄尋求出路之可能。蘇俄在此時期受資本主義國家之封鎖，情形之危急，實不堪言狀，然而在此時期足以爲蘇俄之友者，惟崛起遠東之我國國民革命運動。因爲就中國的國際地位講，中國民族近百年來受國際帝國主義之侵凌擠取，與受各個帝國主義環攻之境，正與蘇俄略同，在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上，如果蘇俄誠能認識中國革命之使命而不加以阻撓，中、俄兩國本可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上，成爲堅固不破之友軍。不幸蘇俄一九一七年之革命只能掀起其推翻帝俄時代一切暴政的形式，而帝俄時代對遠東及對世界的侵略的野心，終不能因蘇俄一度之革命而盡除。其後，因蘇俄俊使其支配下之中國共產黨徒破壞中國革命，及蘇俄在中國各項陰謀計畫之發覺，於是中國革命不得不脫離蘇俄之誤謬，而成爲與帝國主義處於單獨奮戰之境地。

本來，中國國民革命，在其最初的形態不得不是民族革命的色彩，然而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民族革命不僅足以爲世界革命之友軍，而在實際上更爲世界革命之主力。蘇俄在理論上雖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革命運動口號，而認識民族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重要，但因其在實際上僅以扶助民族革命爲招牌，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並行其階級鬥爭的理論，於是各國民族的革命運動，每每因蘇俄階級鬥爭理論與煽動的並行而減弱其力量，故土耳其於革命之後，殘殺共產黨，與中國於國民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後卽舉行清黨，全是在民族革命的自衞上一種不得已的手段，蘇俄也因此失掉弱小民族革命運動的同情。這種事件的發生，誠爲反帝國主義的進程上，一種很大的不幸，然而在民族革命的本身實爲必需。蘇俄執迷不悟，自甘爲世界革命的墮落者，既因資本主義國家之圍攻，斷絕其西進之路，同時於弱小民族的革命也不惜爲一種有力的破壞，這種蠢笨的行動只有使帝國主義在傍暗中慶賀壽命的延長，而於蘇俄自身的前途着想實類似一種自殺政策。目前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勢力，已有日趨於分散薄弱形狀，這完全是蘇俄的自誤，我們所謂引爲痛心的地方也就是此點。

蘇俄實質上既不能爲我國國民革命之助，而且是一個破壞者，在這種情勢之中，我們的境地愈更感覺困難：一面有白色帝國主義的虎視，一面又有赤色帝國主義的猛攻。在這種情勢之中，我們只有從整個的去擊破他，我們更得要認清反抗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爲的是排除帝國主義的使命前進

然後才能有所恃而無恐：一是自己有充份的武力，同時國內的力量要的政治上要有充份的援助，而不致陷於孤立。蘇俄的情形是怎麼樣？上充實，而且因爲內部的分裂與白黨等等復起運動，應付已感困難，的發展遲緩，食糧財政的不足，在在都足以爲其後顧之憂。至於後者有可以得他國充分援助的可能，而且反會予朝夕仇視赤色主義國家以部情形，我們可以不必深論，現在我們不妨把國際的形勢來分析，假否於蘇俄本身有利。自然在蘇俄不自覺悟其國際地位的危險而忘其當前的大敵，不惜繼續其陰謀爲民族的生存起見不得不起而應戰，那末，蘇俄的自誤，縱然於中國俄痛惜而已！

以上是我們對於最近國際形勢與對俄外交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概念。

## 甲、蘇俄在歐洲與近東的失敗

蘇俄雖然不是誠意實行世界革命，但因爲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爲界革命的戰略，提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扶助弱小民族的解放家的戰線，所以一直到今，蘇俄在國際上的情形，便仍是被資本主義國人。從前的蘇俄雖然被資本主義國家所仇視，陷於孤立，但尚可得一欲免掉其孤立的困難，確曾採取世運動口號，以擾亂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所嫉視，所認爲不可共存之敵部分弱小民族革命的同情，及至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竟連此同情也喪失了，所以蘇俄的境地眞有不堪其危險的樣子！

資本主義國家不惜以政治、經濟、外交、武力各種手段，以困蘇俄。其原因有二：一是維持資本主義自身的秩序問題，二是資本主義的秩序，便不得不防制蘇俄各種非資本主義的煽動；因爲資本主義暫時安定以後便要求發展。因爲要維持資本主義暫時安定的時期以後急求發展，蘇俄以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國家，而且又佔有廣大的領土，更兼又以打倒資本主義爲號召，於是在資本主義財富的銷場和原料的供應上終於橫梗在中，使各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坐臥不安，不得暢所欲爲。於反俄困俄的防線，便不得不因此而堅固的修築。我們在近代的世界史上看，有兩個重要的世界和平會議，一是一八一五年因拿破崙的覆滅而起的維也納會議，一是一九一九年德意志大敗後的凡爾賽和平大會，前者的結果是各國聯合以鎭壓當時勃興的民主主義思潮，後者的結果是各國聯合撲滅戰後新起的社會主義思潮，蘇俄因爲當時以世界革命爲號召，於是各國的注意，便集中於對俄的控制與防禦。此種形勢直到而今，在實質上依然是繼續存在。

執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牛耳的，當然是政治和經濟勢力及領土遍天下的英國。英、俄兩國不僅是在俄國革命後因國體的不同而成爲世界舞臺兩個對打的角色，就是在帝俄時代也是如此的。因爲英國的勢力包圍着俄羅斯的四圍，當帝俄時代，俄國想從波羅的海方面尋出路，終於被英國所阻，想從裏海以南出印度洋，以及想擴大其勢力於遠東，也均爲英國所阻而莫能實現。俄國革命後，因爲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圍困封鎖之中，爲了他的生存起見，不得不企圖衝出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圍。因此，便與世界資本主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國家處處發生衝突，而衝突中最爲激烈的還是英國和俄國，因爲英國的經濟勢力和領土遍天下，蘇俄的一舉一動都直接和英國發生衝突，於是英、俄在世界舞臺的對打的局面，在俄國革命以後與帝俄強盛時代依然一樣繼續存在。

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平大會的結果，我們看到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法蘭西，如意大利，在英國領導之下，成就了一個對俄防衛的偉業，就是爲欲隔斷俄國共產主義向歐洲方面煽動，和使蘇俄和德國不能接近，於是聯合國以民族自決的口號，自北冰洋波羅的海岸起，迤邐而南至黑海，扶植了六個小國的興起，以作各資本主義國家防俄的屏障，這六個國家就是芬蘭、愛沙尼亞、拉多維亞、立陶宛、波斯與羅馬尼亞，這六個小國中從前多半是帝俄時代的屬土，一旦伸起頭來，當然一面恐怖蘇俄再度的吞併，一面因爲自己的力量有限，不得不依賴反蘇俄的英、法諸國作其後盾，於是英、法各資本主義國家便利用此諸國作爲防俄西向進展的深固堡壘，果然這種計畫在過去生了不少的效力，不但蘇俄西向歐洲發展的路爲之隔絕，蘇俄想赤化德意志以震撼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受了障礙而不得進行。在蘇俄革命後之初幾年，如波斯、法的指使抗俄，幾乎把新起的俄羅斯共和國根本推翻，蘇俄因爲赤化德意志及歐洲的企圖失敗，而且又值國基未固，內亂孔多的時候，於是爲穩定自己的基礎起見，便於一九二〇年以後樂得承認諸小國的獨立，暫時作爲一個緩衝地帶，蘇俄西向歐洲發展的隔絕形勢，至今還依然是存在的。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蘇俄對於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襲擊，其主要戰略在赤化德意志以震撼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各資本主義國家對俄的戰略，也是首在隔斷俄、德的接
敗，同時芬蘭、波斯、立陶宛各小國獲得英、法有力的援助而橫斷俄、德的
家對俄防衛的戰略，可算得了一個很大的安全。

蘇俄西向歐洲發展的計畫既不能實現，我們再來看他過去對於近東方面
題幾乎成了近世紀歐洲各國競爭逐鹿的場所。在大戰前是英、法、德、奧、
局面，自大戰以後，因德、奧的潰敗，於是便爲英、法兩帝國主義獨佔的利
地，如果能夠衝破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據地固然是上策，此而不行，能
資本主義各國的戰線，也是一條進路。所以蘇俄在革命後便積極從事於近東
面著名的一個病夫的土耳其，當大戰以後已經僅存殘喘，蘇俄爲了要擾亂資
然竭力扶助土耳其的革命運動，果然土耳其於一九二〇年革命成功，希臘在
時英國在近東的勢力也因土耳其的興起而受重大的打擊。土耳其的興起固然
擊，而爲蘇俄引爲極得意的一件。不過土耳其於革命成功以後，方才把右手
即舉起他的左手來剷除蘇俄指導之下的土耳其的共產黨，並且予蘇俄赤化近
取締，蘇俄到此不得不又失望了！因爲土耳其革命完全是民族革命的成功，
國主義的實施，但同時也是不利於蘇俄破壞各民族的完整的企圖。蘇俄在近
，而且向近東尋求出路的希望反因土耳其的獨立而絕望，其後蘇俄與土耳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係，但這純全是一種兩國間的外交關係而不是主義的關係，這種情形那裏是蘇俄所願意的，俗話說啞子吃黃蓮，說不出的苦，蘇俄到此境地也惟有忍氣吞聲而已！當中國國民黨容共時期，反共的風潮方起時候，鮑羅廷曾對反共的同志說：「我們幫助中國革命；從土耳其革命所得經驗，是有條件的，土耳其是革命成功後才殺共產黨的；難道國民黨現在就要殺共產黨嗎？那卻不行！」鮑是曾經在土耳其吃過苦頭的，無怪他對於中國的革命無論如何忘不了想造主義的關係！

由上所述，蘇俄向歐洲西進的路，被英、法、意各資本主義國家截斷了；向近東的進路，被土耳其的獨立遮斷了；他在這四面圍困中終不能殺出一條生路出來，這樣展受了危害，而蘇俄本國的基礎也有不能保持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他不得不另尋出路。他的出路是甚麼？一是在國內方面不得不暫時拋棄虛僞的共產黨主義，而採取接近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以延殘喘；在國際方面，只得西方不利走東方，向中國求出路兩途。

卻是在遠東的國際情勢有利於他嗎？中國革命因爲蘇俄的虛僞陰謀暴露而拒絕他固不待說，然而在遠東的國際情勢，如果蘇俄要放下面孔來和中國下不去，他的困難當較向歐洲西進和向近東經營更爲困難。

## 乙、最近遠東的國際形勢

蘇俄高唱的世界革命的口號，雖然不夠，不澈底，和類似一種欺騙世界的東西，但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對於他攻擊資本主義的態度，是表示相對的同情的，他在歐洲近東的失敗原因，歸納起來不外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點：第一，他的工具主義的破壞戰略，使人類對於新世界建設的幻想感受一種苦悶乾燥的刺激，漸漸覺得這種猶太人傳統自私的功利主義，只有把世界弄到更壞一個迷途，不能把理想的世界弄得健全康樂。換言之，蘇俄所採世界革命的侵略是現代社會病態的一種反動，而不是從社會的病源一種根本的救治。第二，他忽略了人類歷史的演進，是依據於種族、文化、地形、語言等等的不同，而發生思想在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所以他不知道民族的意識是超越於國家和階級的意識，於是他雖一面主張消滅現代的國家，但是他把國家另外建築在階級的基礎上，造成更騷亂更不健全的國家和世界。人類有兩種烈的慾念：一是生存的慾念，一是生殖的慾念，階級的意識只能作爲人類生存慾念一部分的說明，至於生殖的慾念，則是人類延續和民族之必然的存在的解釋。列寧主義者，專事以物觀的態度來解釋，他們忽略了民族和民權的重要，所以他們的意想世界只是橫斷的階級的聯合，而不知道未來的世界是以民族、民權、民生爲條件，在組織方面不過是現代聯邦制度的擴大的一種自由民族的聯合，蘇俄因爲理論的錯誤，所以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阻礙橫生，在民族革命方面失掉了很大的同情，他在歐洲近東的失敗，不過是此種誤謬的小試而已。

在歐戰以後因爲各國民生凋殘，社會主義思潮和社會改造的聲浪瀰漫了全世界，在此時期本可將資本主義的殘喘打斷，使新社會早日實現。因爲蘇俄理論錯誤的結果，致歐洲與近東的經營全告失敗，各資本主義國家乃得漸漸恢其戰前原狀，更因各國政治的安定和生產技術等的進步改良，於是資本主義竟能達到相當時期的安定。到了現在資本主義已到了比較安定的時期了，同時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作，又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了一重的困難，而蘇俄的境地也因此更多一層的危險。

資本主義現時內在的矛盾雖多，但還不是他矛盾顯著而至被滅的時候。因爲市場和原料供給關係，在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正從事於軍備的競爭。而實際的手段，則在各竭全力於太平洋沿岸爲市場的開拓，與原料的掠奪。於是遠東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問題，便成爲今後世界問題的中心了！蘇俄因歐洲近東的失敗轉其視線從事於遠東的經營，在他的預料上以爲遠東是資本主義各國的弱點，易於進取，但在目前的情形已經不如所料，遠東已成爲帝國主義主力集中的陣地了！這在敵情計算上是蘇俄的失著，假定蘇俄不能認識保障中國民族革命的完整的重要，他至少要再嘗其在土耳其失敗的滋味，把唯一的生路的希望斷絕，以至於覆滅的。

我們且看遠東最近國際形勢究竟是怎樣？

在歐洲方面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相互的猜忌競爭，雖依然不斷的繼續，造成英、法的不調協，法、意的對抗，英國對德意志、意大利的拉攏，以孤法國之勢，美、英海軍的爭霸等等，均足以顯示各國間的一種不安定的現象，但是就各國的利害上說，對抗與競爭是由於恐怖而發生出的猜忌的行動，大家在穩定資本主義的足跟上以防制俄國非資本主義的襲擊一點，則是始終共同的。而且大家都看見歐洲這一塊土已經肉盡味窮，不幸因競爭而發生戰爭，結果只有兩敗俱傷，無所獲得，遠東既然是一塊富庶未經墾拓的廣土，大家當然不能忘情，於是大家競爭的假設地點，便移到中國來了，所謂軍備競爭及各種猜忌的發生，恐怕都是爲「到遠東去」一句話的準備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歐戰以前中國是英、俄、法、日、德、奧的競爭場，戰後俄國的勢力因革命後而削滅，德、奧則因戰敗而消失。現在所殘餘而可以對抗的國家，當然只有英國、日本、美國了。法國因爲大戰受創甚大，而且日日在防德意志的復仇，故對於遠東的侵略，也不甚急迫。

日本是遠東的一個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在侵略中國的國家中，佔了地形的便利，因此他對於中國的侵略野心，好似「近水樓臺先得月」，處處都得了優勢。在三十多年前，當他還沒有伸起頭來的時候，中國的弱點，還沒有在世界上顯露的時候，他的興起受了兩種障礙：一個是龐大的中國，一個是強大的俄國。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日本戰勝以後，中國這重障礙才去掉，而且中國也變了日本侵略的專利品了！至於俄國呢？日本被他的強大所威迫。日本雖然打得過中國，但是要與俄國一較長短，事實上是沒有把握的，所以甲午中日戰爭日本獲得的遼東半島，也不得不因俄、德、法三國之干涉而退還，可巧此時正是英、俄爭霸的時候，英國受了俄國在中國北部發展的威脅，便不得不在遠東聯合日本以阻止俄人的南下，於是乃有所謂英日同盟的發生。日本卒因英國做後盾，於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把如狼似虎的俄國打敗，於是日本興起的第二重障礙也去了。自此日本便成爲東方第一個強國，並且在世界的強國中也能勉備末位，英國是日本興起的恩人，這話是不會錯的，同時自一九〇五年歐戰完結，英國在遠東的勢力和大戰中印度、南洋一帶的安全，也得了日本的不少拔助。因此，自日俄戰爭至歐戰的結束，日、英兩國在遠東的形勢是一種協調的步驟。



卻是現在日、英兩國在遠東的關係又如何呢？我們可以說，日、英的協調，已經是一句過去的陳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了！在歐戰期內英國靠了英日同盟的關係，使日本爲他鞏固了印度、南洋一帶的後防，但同時日本乘着歐戰期內，各國無力在遠東經營，他便壟斷了侵略中國的權利，就是英國在遠東的市場，也被日本佔有了，畢竟在英國是不甘日本如此在中國獨霸的，同時在戰後資本主義的根基漸漸回復以後，便不得不再在中國謀市場與原料的供給，於是便不得不與日本發生在遠東利益的衝突，換言之，英、日戰前在遠東的互相爲助的關係，到了歐戰以後便不得不頓呈一種動搖衝突的現象。所以上年英國在星嘉坡建築了強固的海軍根據地，其用意是要在太平洋方面有所備，不言可知了！

以上是現在日、英兩國在遠東的形勢。

現在再來說美國。

美國在遠東歷來就有極大的關係，日、美在太平洋的爭霸，在過去已經是很顯著的事實了！自歐戰以後由各國的投資最大的國家，一變而爲世界債權國了。至於因生產技術的進步和改良，貨物的生產已經過度的超過國內市場的擴張，於是商品的輸出和資本輸出的需要也愈大。中國是資本主義最大的一個消場，更兼美國本來在中國有長久的經營，於是中國又成爲美國不可不爭的一個國家，來發展他的經濟利益。因爲要在中國擴大他的利益，便不得不又與獨佔中國利益的日本發生衝突。日本要說「獨佔」與「在華有特殊地位」的話，美國便也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等等意在言外的說話來應付。於是美國在遠東發展的大敵既然是日本，所以美國不得不聯合在太平洋有利益關係的英國，以孤日本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勢，英國因爲要拉攏美國以應付歐洲局面，同時對於日本在遠東的獨霸也未見得高興，而且因爲他在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地如加拿大等處，因地勢關係不得不爲美國所左右，於是關於美國在太平洋的拉攏政策，也就樂得而附和了。一九二一年美國所召集的華盛頓會議，在表面上雖然標明是裁軍和處置戰後的遠東問題，但在骨子裏純全是美國拉攏英國以制日本的一種辦法。所以華盛頓會議所得的結果：一是日本不得不俯首接受，英、美海軍爲五與五之比，而日本與英、美海軍則爲五與三之比了。原來所謂「五五三」的華盛頓海軍協定的用意，是在保持英、美海軍的優勢，同時又在限制日本海軍的高度的增加了，日本在英、美的協調壓迫之下，也只得忍氣吞聲，就是歐戰中在山東所掠得我們的，也不得不放棄一部份！

以上是日、美兩國在遠東的形勢。

照上面所說，英美兩國既然在遠東取了協調態度以制日本，那末，日本的國際地位豈不是陷於孤立嗎？日本既然陷於孤立，他將如何辦呢？聰明的俄國人，他看清了這一點，他以爲蘇俄的敵人始終是資本主義的英美，而其向中國發展，首先在滿蒙一帶要遇着日本這一個強敵。在蘇俄的想法以爲與其直接和日本在滿蒙一帶衝突而遭打擊，反不如利用日本的孤立，而予以同情以對付英美爲宜，所以這幾年日俄同盟，日俄密約，各種的傳說竟喧騰世界，就是這個緣故，而日本方面也樂得以此來威迫英美一下。

一九〇八年七月鮑羅廷曾發表一文論遠東局勢，他說：

「英國在太平洋的重要利害既與日本不同，所以太平洋若發生武力的衝突，日本是不能依賴英國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援助的。……因此之故，日本不得不注意其與隣國的關係，尤其是蘇俄，爲保全友好關係起見，日本決不敢有破壞彼此友好的行動，這是顯然的。」

觀鮑氏上項的言論，可謂極盡拉攏日本之能事了。

**丙、蘇俄果可以依靠日本嗎？**

蘇俄因爲要對付英、美，便不得不利用受英、美威迫，而陷於孤立的日本。日本在英、美威迫之下，感覺於自己的危難，也只得對蘇俄的誘惑表示接受，以威迫英、美，尤其是在威迫與蘇俄義不共存的英國，在日本的意思，似爲他在太平洋上假設的敵人是美國，以美國的富力和軍備，日本雖然自負甚大，然而也不能不自歎落後，如果美國之外更加上一個英國，日本的地位便更覺得危險了！所以在日本的地位，假定要與美國發生戰爭，便非拉攏英國不可，至少也要英國中立，或許對美戰爭才有萬分之一勝利的希望，我們要知道日、俄能否澈底的聯合，便要看英、日究竟有拉攏的可能與否，日本對於英國的拉攏如果沒有到了絕望的一天，我們可以斷定日、俄的聯合關係是絕對不能正式成立的，因爲日、俄的關係愈密切，英、美的關係必愈接近，這是日本人在時機未到以前所不敢冒昧從事的，照此看來，所謂日、俄的聯合，現在尚是搖旗吶喊的時期，還沒有到正式結合的時候，在日本方面關於日俄同盟的宣傳，不過藉此以威迫英國脫去英、美的戰線而接近日本而已。

在我們的判斷，畢竟日、英的聯合是不可能，因爲英國要應付歐洲的局面在勢不得不拉攏美國，而在遠東方面，歐戰以後日、英利益的衝突又一天天顯著絕難避免，比如從前各國在中國的利益，英國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位，但自歐戰以後，如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進走之速，實在駭人聽聞，英國在遠東的優越地位不得不爲之根本動搖，在一九二四年的各國對華貿易統計，日本竟佔百分之三十五又七三，日本這種驚人的進步，不但足以證明英國在華勢力經日本之排擠衰落，就是其他各國在華利益也受了日本之發展而落後了。

然則日、英將不免由利益的衝突而戰爭嗎？關於這個問題，在英國雖然在新嘉坡有建築軍港的準備，但仍是保守的而不是進攻的，因爲在遠東衝突最大的還是因地勢與對中國投資關係競爭更烈的日本與美國，在英國的立場，對日本實以放火有人，實無自爲戎首的必要，而在日本的立場，一旦對英戰爭，不免有美國將襲其後的危險，但是假定日、美一旦發生戰爭，我們相信英國是必定加入美國方面以對付日本的。在這種情勢之下，恐怕日本才能迫得走到蘇俄方面，而成爲日俄和英美的對抗吧！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日、俄的聯合，在日美戰爭未爆發以前，日本要低首降心以拉攏英國，目前還是一種空氣作用，而不是事實。

日、俄在一種時期的假定之下，雖可以聯合，但日本聯俄只是日本一種不得已的動作，畢竟於日本現在這樣一個國家是不利的。第一，英國因爲他的利益範圍繞着蘇俄，蘇俄的一舉一動在利害上不能不處處與英國衝突，而蘇俄的世界政策又以衝破英國的勢力爲目的，所以不論蘇俄的發展是俄國主義的，或以打倒資本主義爲目的的共產黨主義的發展，均於英國不利，英國對俄也不能絲毫放鬆。日本在利害上定不能不拉攏英國，然而聯合蘇俄，必定又是拉攏英國的一個最大的阻礙。所以日本非在必要的時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聯俄是沒有好處的。

第二，日、俄在國際地位的孤立上雖然在必要時期有聯合的可能，但在日本現在的情形，聯合蘇俄是他自己崩潰的一個途徑。更兼近年日本資本主義膨脹的結果，國內固定失業者的增多，和有產者與無產者衝突的日益顯著，舊式軍閥與新式資本家對於政權的把持，引起了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強烈的反抗，在國體與主義上，日本聯俄的結果必定引起其國內軍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崩潰，可爲預言。我想日本的軍閥與資本家尚沒有到自尋死路的日子吧！

第三，在地形上，日本侵略中國的進路是滿蒙，日本在華利益的集中點也在滿蒙一帶。日本人常常的宣言說：他在滿蒙應有特殊地位也是這個意思。我們再看中國和蘇俄的地形關係，雖然在西北甘肅、新疆各省，多半與我國接壤，但因交通不發達，鐵路未築，而且又離海岸太遠，所以蘇俄侵略中國，便不得不暫時利用西比利亞鐵路的交通和海參崴的海口來做進路，這樣的結果，蘇俄向中國發展不仍以滿蒙爲目標，於是日本向我國侵略，因地形的關係，便不得不已有的利益和未來的發展，便不能容許第二者的蘇俄再來沾染；蘇俄要向中國侵略既不得不以蒙滿爲着眼點，於是不得不侵害日本視爲命根的滿蒙。我們且看過去日俄在滿蒙的逐鹿情形：甲午中日之戰，俄國聯合德法兩國干涉日本迫其退還遼東半島於我國，爲的是俄國自己要在滿蒙發展而不利於日本的佔領，一九〇五年日俄的大戰發生，是日俄兩國在滿蒙利益衝突的爆發，日本打勝以後雖然把俄國南下的勢力阻止了一下，但這種地形上不可避免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衝突，終於是無法調劑的，日本對於滿蒙既不肯放鬆，當然對於俄國不專其染指，所以日俄的聯合非到日本走頭無路的時候，是不能正式成立，而在利害上估計，日俄假定要聯合，畢竟於日本是不利的。

根據以上拉攏英國的問題，國體的問題，侵略滿蒙的問題，日本要聯合蘇俄總是害多利少，不過在日本目前孤立的國際情形，假定受英、美壓迫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聯合蘇俄也是他沒有出路中的一條出路，然而日本也不免要多少吃點虧吧！

日本的地位既如此的困難，所以他對於蘇俄的暗送秋波，也只得假意慇懃，但他對於滿蒙的獨佔，目前是絕不容許蘇俄插足，是我們敢斷言的。日本在太平洋的大戰未爆發以前，他的企圖是在首先佔領一個堅固的陣地，一旦大難到臨才有自主的應付方法。所謂堅固的陣地，當然是以滿洲做中心，同時及於中國山東一帶，去年日兵在山東的獸行，就是軍閥內閣田中著了忙的一種佔領陣地的辦法，日本在滿蒙的地位既然在地形上有一個蘇俄時時起以爲他後顧之患，單純靠南所以近年來隨着日俄親善的呼聲，便有所謂日本的後藤新平等等人物赴俄，接洽俄國將北滿中東鐵路俄國部分的利權移讓於日本的消息，日本人這種的運動全在想把北滿俄他滿蒙的經營才可以堅實不破了！日本要想把北滿俄國人的勢力拿到手中，第一步辦法當然是用日俄親善等等的和平方法來企圖做到，但是日本向北滿發展更有利的方法，還是在乘着俄國與中國國交破裂，而坐收漁人之利的時候，聰明的猶太人傳統的狡詐的蘇俄共產黨的外交家，他何嘗不知道在歐洲與近東方面已經被資本主義國家封鎖得像鐵桶似的不能通過，假定遠東唯一的出路，也爲東方資本主義的日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拿去，那末，蘇俄的前途不言可知了。

這次俄國人慣用的「非常外交」，又到遠東來重演了，我們中國吃了帝國主義近百年的虧，難道對蘇俄有甚麼特別下不去的地方，不過爲了中國的獨立自由的問題，爲了免去種下將來更大的隱憂的問題，不能不準備以待。狡詐的蘇俄非常的外交家，此點比我們看得更要清楚，一般恐怖俄國飛機毒氣的中國同胞，對於蘇俄的虛聲也不用太被「非常」二字嚇倒了！何況對外鬥爭是民族復興運動不可推諉的一次應酬？

## 六、結論

從以上所述，蘇俄國內的本身不安定和他在國際上所處的困難情形，勿論講利害，講實力，他都沒有戰爭的決心和好處是很顯明的。自中東鐵路事件發生以後，蘇俄始以無理的最後通牒致我，繼則對我斷絕國交，最近且增兵邊境，時時以飛機大礮向我防軍威迫，在普通的國際情形來講，此種情勢兩國早已入於戰爭的狀態，不過因爲蘇俄意在威迫而我國又持之以鎮定，所以戰爭終是尚不可期的一回事。我們對於蘇俄外交運用應當另具眼光來看，如果我們以普通的國際習慣來觀察蘇俄的行動，我們不免要爲他時緩時急，時而威迫，時而誘惑的手段所迷，而失掉自己一貫的應付方針。蘇俄自革命以後，爲乘着大戰爭之後，各國創痛未復，厭戰修好的弱點，所以在他革命初年的外交已養成一種強橫威嚇的慣伎，大有「拳打關東，足踢關西」的神情，其實也不過因爲預入他國之決不會輕於一戰，而自己便以「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爭」、「絕交」、「入於戰爭狀態」等等名詞威迫他國，而自詡得意罷了！此種外交手段蘇俄說是非常Extraordinary，而在見慣不驚的各國看來，說他是「無賴」Rascal。

關於目前對俄外交的問題，我們自然不能因爲蘇俄慣用狡賴手段不利於對我戰爭，而我必以戰爭來應付，更不能因蘇俄戰爭威脅，而自願爲其威脅所屈服。主要的問題是：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應當有他自己的利害和打算，更應當因他自己立國的根本所在而具備一個一貫的外交方針。此時妄言對俄取挑戰的戰爭態度固謬，而妄言和平，不計爲蘇俄虛聲所威脅，弄到手忙足亂竟連戰爭的準備都沒有更屬危險之極！我們要曉得，自歐戰閉幕到現在已足足十一年了。這十餘年中，戰爭的痛苦已爲世人所忘去，戰後因爲資本主義一時的安定，已由安定而漸澎漲，由澎漲而生出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也愈顯著，這種矛盾的發展，便是世人所諱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且今後的遠東已成爲國際的逐鹿場所，遠東問題是世界大戰的第二幕，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所以目前的對俄問題，絕不是單純的對付蘇俄一國的問題，此問題的擴大，第一是因日本整個滿洲經營計畫的前途，而會引起的中、俄兩國的困難。第二是英美和日俄在太平洋上的對壘局勢一成，中國國家的存亡便到了很嚴重一個關頭。第三是在中國國家建設上，如果不能對於蘇俄赤化遠東的陰謀予以阻止，中國國家建設的工作勢將絕望固待不說，而世界局面的轉變，必因此促進其走到更慘酷的危險？

在這種險惡的情勢之中，可以爲中華民族生存保障的只爲中國的獨立自由，足以爲世界和平的調解者，也只有中國的獨立自由！中國的獨立自由至少包涵有兩個內容：第一，在中國方面，必須能維持他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領土主權的完整，然後中國國家建設的意義才不致落於空虛；第二，在國際方面，更須能夠制止赤白兩帝國主義以中國爲逐鹿的戰場，然後遠東和世界的和平才有希望。現今中國的地位，是處於赤白兩帝國主義之間的一個目標，中國而變作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的俘虜，一面是中國之不幸，一面是人類世界之不幸，換言之，中國處於赤白兩帝國主義勢力抵抗鬥爭之間，爲了自己的生存，必須於兩者俘虜中國之企圖嚴事制止。爲了防止世界第二次慘劇的發生，也只有靠在這赤白兩帝國主義勢力夾攻之下，能夠自己撐持其間。

因此，我們對於此問題未來的不可忽視，較之現在不能忽視目前種種的危機是一樣的重要。

第一，我們要知道中東鐵路的收回，屬於主權利益的地方畢竟是次要，而屬於制止蘇俄擾亂中國，破壞中國統一，和防止蘇俄在中國各種赤化企圖的繼續，以保障中國國家的建設者爲多。假定我們不能將蘇俄陰謀破壞我們的根據的中東鐵路收回，以斷絕他此後陰謀搗亂進行，中國絕無機會以從事於國家的建設。

第二，中國國家的建設不能完成，一面便是共亂與內亂把中國的生機一天一天的斲喪，於是中國不作赤色帝國主義的俘虜，便爲白色帝國主義籠中的囚犯，照此下去，中國已無自主能力足以保障中國不爲赤白兩帝國主義競爭逐鹿的戰場，世界的前途眞有不堪言者！

第三，中國自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以來，呻吟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者垂九十年，帝國主義掠奪中國唯一的武器便是拘束中國發展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民族由此近九十年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而促進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覺，便是由巨大的犧牲，和數十年苦鬥得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已達到相當階段。革命政府和中國未來的生機便在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廢約運動能否成功。假定此次對俄問題，我國竟爲蘇俄的橫強威脅所服，其屈影響所及必致于廢約的企圖也歸於失敗，那末，中國革命的獲得和成就均會落空了！

因此種種，我們把對俄外交的成敗歸納起來，第一是關係中國國家建設的問題，第二是關係中國免爲赤白帝國主義所俘獲的問題，第三是關係於國民革命的成敗問題。如果我們不能認清對俄外交目前的重要，而爲一種苟安畏縮的心理所支配的話，簡直是中國一種自誤和誤人的行動。所以我們對於此次事件，必須抱定一個很大的決心和一貫的外交政策，假定戰爭是不可免的話，也是在中國民族的生存上所必需，我們是不可不有戰爭的準備的！全國的國民，應當認清中國存亡的關鍵在此，和平是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然而和平是要從困難艱辛中奮鬥才能獲得。我們切不要爲一切空洞的和平聲浪所誤，更不能爲蘇俄奸狡威脅的虛聲所屈服，我們的生路只有全國民眾一致起來對俄備戰以爲政府外交的後盾！

照現在的形勢，如果戰爭之外而有方法可以達到解決的目的，當然是我們極所歡迎的，我們必須促起蘇俄當局和蘇俄人民注意的，是他們現在國際地位的險惡，在蘇俄的立場應當知道他的敵人是環繞着他的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尤其是他唯一遠東出路隣近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革命雖然不能容納蘇俄赤色的煽動，畢竟中國在排除他的敵人帝國主義的目的上，可以爲蘇俄之助的地方總較爲蘇俄之害的地方多，不過蘇俄應當認識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在蘇俄本身的利益上的關係，而不加以妨害而已，爲中俄兩國的利害計，蘇俄應當知道第三者的行動是應當特別注意的，所以假定在戰爭之外而可以得到和平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決的方法，蘇俄應當知道由第三者的日本來插足，是於蘇俄的出路和西比利亞一帶利益是有損的；由第三者根據於非戰公約的地位來插足所引起的紛擾是更爲複雜的。由第三者的國際聯盟來插足是羣盜分贓的盜窟，是資本主義的保鏢店與聚賭抽頭的第三國際是沒有多麼差別的，所以中俄兩國在戰爭之外的出路只有靠蘇俄的覺悟與我直接談判，放棄其在華一切陰謀的企圖，不容第三者插足爲最好，否則，中國爲自己的生存而採取有利的政策，不是於中國沒有相當好處的，這是要靠蘇俄的猛省！

除了蘇俄向我國直接談判之外，再有根據於去年八月二十七日簽字於法京巴黎的非戰公約來解決的一法，因爲蘇俄與中國都是非戰公約的締約國，當然對於非戰公約應當負有履行該約的責任。照非戰公約第一條規定：「反對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執，並否認各國相互關係中以戰爭作爲國家政治的工具」，又第二條規定云：「各締約國承認凡締約國際一切糾紛及爭執，不問其起因及性質若何，其處理及解決，概不得用和平方法以外的方法。」照此意義，目前中、俄的問題如果蘇俄明白其在公約內之義務，兩國以和平方法解決此問題，其途徑不外二者：一、中、俄兩國直接談判，二、根據於公約精神，以此問題交付於簽字於公約之各關係國組織某國際公判機關解決之。此兩種辦法之能否施行，全在蘇俄是否誠意遵照公約之義務，也卽此非戰公約是否可以維持國際間的和平，而不成爲廢紙的考金石！

本來，在國際利益的競爭和軍備的競爭，在世界各民族的束縛未解除而立於平等地位以前，以及一切和平障礙如帝國主義這種制度未廢除以前，所謂一切和平與非戰的理論，都不足爲弱國所可依靠，不過強者在國際政治上所玩的一種新把戲而已。我們且看當美國國務卿開洛於公約簽字以後，託法國當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轉詢蘇俄的意見，蘇俄覆文中一面表示加入，而一面且正大堂皇指責公約之不澈底，如謂軍事佔領、軍事封鎖以及無端斷絕國交等，都是一種戰爭的行動而爲公約所不禁等等。我們且看此次蘇俄之強橫無理及其對我致最後通牒斷絕國交，進兵威迫我國等，何一非此素所指責各資本主義國家不當爲而自甘爲之者？所以我們對於此次的對俄外交，我們如果誤信蘇俄的空言，或欲以國際締約的義務而拘束蘇俄，實類似一種癡人說夢。弱國外交的勝利：第一是自強，第二是不要畏怯戰爭，而要時時對敵人備戰，以備不虞！

中東鐵路是蘇俄陰謀擾亂中國的根據地，我們要使中國能夠走到國家建設一條路，非收回中東鐵路不可；爲要使中國不爲赤色帝國主義的俘虜，或白色帝國主義的死囚也非收回中東鐵路不可。爲要維持遠東世界的和平及保障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尤非收回中東鐵路不可。此次對俄外交的手段，不論是戰爭與和平，要以中東鐵路能否收回，與蘇俄對中國的陰謀能否制止爲條件！

我們反對一切屈辱的外交！

我們反對一切畏戰的空論！

至於中俄的地形上，因爲有東北、西北各地與蘇俄接壤的關係，我們相信俄患絕不是以這次爲止的。在外交上我們希望政府以後要有一貫的對俄外交政策，在國防上我們希望政府應當充實東北、西北的國防。至少應於短期內完成隴海鐵路與伊蘭鐵路（伊犁到甘肅蘭州），以利西北國防交通。

——錄自「建國月刊」第一卷第六期，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新的革命觀

民國十八年過去了，民國十九年於今日開始，在這新年開始的吉日，人們過去的歲月，在計算上總算可以告一結束，而於未來的歲月總會增進許多希望吧！

希望是寄託在未來的，也只有在未來的歲月中，才能使人們的希望不朽的名畫，題爲「希望」，在這幅畫中，他畫了一個妙齡的女郎在幽冥的Watts, 1817—1904 有一幅微光中，坐在地球上閉目抱琴的在那裏撥彈，琴絃經已一一斷了，而只剩下「最後的一絃」在那裏彈撥，一切的希望都寄在這「最後的一絃」上面：如果能夠彈撥出成功的歌調呢，那末，無限的快樂、安慰和微笑都會永遠的保留着；如果這「最後的一絃」也不幸而遭斷絕呢？那末，只有無限的悲哀、苦悶和失望，存留在人們的心坎了！

去年過去了，今年從今日方才開始，人們所寄託在今年以後的希望，以今日中國衰弱的國勢和中國革命今日殘破的情形而論，的確是一切的希望都寄存在這最後的一絃上面，如果在這最後的一絃尚彈不出和美的歌調，人們的希望也只是變作未來的失望了！我們對於過去的歲月，似乎都輕輕把她放過了，從今天開始，我們是萬萬不能把一九三〇年的希望，再輕輕的任他過去才好！

中國民族閉關自守了數千年，一到了與新的世界接觸，的確是覺得太衰老了。自鴉片戰爭一直到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今九十年歲月當中，因爲受了新的世界強大民族武力和政治侵略的刺激，才漸漸覺醒從衰弱中求振作，中國革命的發生也正是從這強大民族侵略的刺激，而發生的振奮圖存的要求。然而，中國革命到了今日的情況，不能不說是殘破到不堪的地步了。在民間，在革命黨的本身，在一切的覺悟的人們當中，我們只看見充滿着煩悶、枯燥、失望、浩歎種種的情緒，而新的希望，新的宇宙，新的人生種種實際的安慰，幾乎是曾經一度的顯示而消沉下去了。在這樣一個境地，我們對於中國民族的復興和中國革命的前路，實在免不了要存着無限的隱憂和失望！

我常常覺得：從歷史的事例，從中國民族眼前所處的時代，照理，應當是從舊的生命而向着新生命的建設了，應當是脫去了舊的時代一切的不安，而到達了新的時代的創造了。其實呢？所謂中國民族，應當，或者說是已經到了新的時代，這一句話是十萬分的名不符實的。我們只要一拿現實的一切事物來估計，我們眞會感覺到無限的失望。眼前一切殘破的制度，自然不能作爲新時代的象徵固不待說，而現在的所謂藝術、雕刻、文學、音樂以及一切人生的寫照，那一件可以算得是代表新的時代的象徵？我們的需要是一切新的制度、文物、藝術、文學、音樂等等來適應新的時代的建設，結果，我們對於新時代的各項實際的要求不但不能適應，就是連一點足以顯示新時代的象徵，如藝術、雕刻等也渺茫之極了。我們對於現社會一般煩悶失望的情況，眞是正如見着一羣沙場的戰士到了糧盡彈絕，進退疲乏的情形，只待敵人的前進，而繳械納降似的。在這種情境之下，我們眞看不見甚麼是我們的前途，甚麼是我們革命的出路，在歷史的前例，這樣的一個社會情況，如果是沒有新的努力繼續來改變現狀，社會只有走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沉淪一條路上去，所謂革命的代價只是民族的整個失敗而已！

所謂新的努力要靠新的內容，新的趨向，新的認識和新的計畫來決定就是在確定我們新的革命觀，所謂新的革命觀，不是指對中國革命的最高修正，而是指的自中國革命偉大的導師　孫中山先生十四年逝世以後，以的中國國民黨，因爲重心的動搖，因而影響到革命工作和方法的貧乏，必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中國民族的復興，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中國革命弄到如今的一種殘破情形，其主要原因一是革命理論的紊亂貧乏，此兩種情形的存在是相互爲用，而不是單獨可以存在的。我們可以和方法的貧乏，也可以說是因爲工作和方法的貧乏，才演出理論不清的事實。最顯然的便是容共一段經過，比如自　總理孫先生逝世以後，共產黨入寇的陰謀既日益暴露，全黨同志在行動上對共產黨的處置態度雖有緩急的不同，而在理論上可以說沒有一個同志（根本投誠於共產黨理論者除外）不感覺到共產黨的理論與孫文主義的革命理論乖離的。因爲自身對於工作和方法的貧乏，於是對於誤謬的共產黨的理論方法不得不表示其贊許，因爲贊許便不得不演成共產黨氣焰的猖獗，幾至於不可收拾，這是一件事。再有一種人因爲自己對於黨的理論根本來弄不清，於是因爲共產黨工作和方法運用的有效，於是一味學習採取共產黨的手段，而終於把國民黨的共產黨與之同生共死而離開了黨的固不必論，即是殘留在黨中而倡言清黨的，其思想行動與共產黨實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無差異，其結果有形的共產黨雖去，而無形的共產黨尚深植其勢力於黨內，不斷的危害黨的生存和發展，這又是一件事。

清黨事件在國民黨本身是一種大的動搖，在中國社會思想上是一種很大的刺激。照理在經過一種大的動搖和刺激之後，必須經過一番澈底的改正整理，然後視聽才能爲之一新，努力才有正鵠。自二屆四中全會以來，關於黨的理論是曾經有一段整理的經過，但是因爲對於政治軍事的應付，把各人的視線注意移到軍事政治的問題上面，關於黨的許多根本問題便不易得到適當的解決了，更兼共產黨的餘毒深入於人心鏟除不易，以及清黨以後黨的工作和方法尚無澈底的改易，於是在因循，便覺得除了開會、散傳單、貼標語等等工作之外，便無所謂工作，而黨的作用和地位便不得不隨之低落；黨的作用失去，黨的地位低落，於是革命的重心動搖，所謂一切目前各地黨部的情形，所謂一個最好的黨部，能夠做到一個較好的宣傳而在軍事政治當局方面，能夠做到口中有黨，心中無黨，按月支撥黨費，養些無用的人便算是難能可貴，其甚者，在軍事政治的當局可以任便摧殘黨部，而在一種不良黨部因爲行動幼稚，不爲反動派所利用以反對本黨的統治，便事事破壞行政，阻撓建設。這樣一種情形，黨簡直是一種無用的機關，在革命的建設上有何價值？我們認爲目前一切軍事政治問題的複雜至於不可收拾，其癥結全在黨的不健全；黨所以不健全的原因，全在工作和方法因循敷衍而不能對於舊時因襲共產黨的手段爲一澈底的改正，同時對於國民黨自身在現在所負擔的使命和活動更不能從新的估量和指示其前進。所以目前除掉從根本上把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爲一番的整理外，我們對於現狀的挽救實在更無他法。所謂新的革命觀的意義便在這種觀點上來確定。

目前最普遍的現象：一種是把黨當作贅瘤，一種是把黨當作一個宣傳機關，前者的誤謬是在根本不了解黨的作用和使命；後者的誤謬是在根本不知道黨和革命的關係，及黨在一切建設上的重要。兩種誤謬發生的總原因都是由於黨權的衰落，大家只看着一個黨部，而黨部自身應當如何？應當怎樣？便沒有人深究了！這種現象完全是由於黨的本身根本不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完成其自身在革命所負擔的任務的緣故，以致消極的便把黨視如一種贅瘤，在辦黨的本身也便認爲除了宣傳之外，便無所謂黨的工作了。同樣的一個人在黨部的時候，便浩歎黨權的低落，詆毀軍政當局摧殘黨部的不當，一旦自身從政，舉凡昔日認爲不當爲者，均一一爲之，而反歸咎於辦黨的人不是土豪，便是劣紳；不是共產黨便是改組派。這種現象絕不是單純人的問題，而是黨和政治的關係及其各自的機能不自明瞭的問題。第一，黨部因爲工作和方法上沒有正確的指示，所以不知道黨部究竟應當如何？應當怎樣？於是除掉反對縣長，爭奪地方利益外，便無所謂工作了。第二，政府只看見黨部的麻煩，而不知道黨部是革命統治的推動機，所以除掉憎惡黨部、壓迫黨部之外，便認爲無所施展其政治的設施了。

一切的一切都應當歸納到黨部的工作和方法的貧乏，只有從這一方面下手，才能得到一切問題的解決。換言之，不從新確定我們新的革命觀，是沒有方法可以醫治過去一切錯誤的。

過去我們的錯誤歸納起來不外幾點：

第一，把宣傳工作當做表現革命工作唯一的方法。換言之，把標語傳單的數量，來測驗革命工作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多少，空氣的緊張與否，來測驗革命工作的厚薄。由此演出的結果：一方面造成一種浮囂淺薄的幼稚病，使黨部爲一般人所輕視；一方面更因軍事政治問題的複雜，黨的主義政綱未遑實行，宣傳跑得太快，而事實不能跟着上來，在民眾方面便發生一種厭惡的情緒。黨所受的直接影響，便是被一般民眾認爲是「只會說不會做」。

第二，把「民眾運動」的意義看得太抽象了。因爲看得太抽象，一種是認爲沒有民眾運動便不是革命工作，一種是把民眾的集會、示威、遊行，認爲便是民眾運動。其實呢，在破壞時期的民眾運動是在組織民眾，喚起民眾，使民眾參加革命，成爲革命的主力向壓迫者進攻，爭取民眾的利益。所謂集會、示威、遊行，不過是提高民眾的情緒，民眾表示其要求的一種形式。在一個已經奪取政權以後的革命統治，只應當努力於民眾的實際訓練，實際的增進民眾的利益，所謂民眾運動的工作便應當一步一步從革命政府的「有效的行政」表示出來。民眾運動是起源於民眾的要求，一定要從「民眾的運動」來實現，的確是一個革命黨的羞辱。因爲所謂民眾運動，一面是要有民眾所要求的內容，一面是要有提出要求的對象。在革命的統治未實現以前，民眾要運動的對象是殘暴的反革命者，民眾是要從集團的運動方式來解除頸上的枷鎖，達到自己的福利。在革命的統治已經實現以後，革命政府應當把一一的民眾的痛苦解除，而民眾在反革命時期運動的對象便已經消失，所以民眾在這樣一個時期，除掉協助革命政府從事於對內對外各種鬥爭外，便無所謂在革命統治之下的民眾運動，因爲如果民眾提出要求的對方，是革命政府而必須以運動和鬥爭的方式出之，那末，革命政府的地位便根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會動搖了！

第三，受了共產黨把民眾視爲工具，而不把民眾福利的增進視爲革命的最高任務的影響，於是便把民眾認爲只是革命的犧牲者，尤其是把民眾作爲黨或者個人爭取政權利益的犧牲者。我常常覺得共產黨和國民黨間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共產黨是因爲要革命才要民眾，國民黨應當是因爲民眾才革命才對。因爲要革命才要民眾，便把民眾徒供犧牲；因爲要民眾來供犧牲，便不得不忽視民眾最終的解放，只是抓民眾來擁護黨的利益，其流弊便演成抓民眾來擁護個人的利益。共產黨的罪惡和失敗在此，改組派的罪惡和失敗也在此。抓民眾的另一方面的流弊便是抓了民眾之後，不能不有所謂「運動」，運動的結果便是把革命政府視爲民眾鬥爭的對象，而民眾便作了少數個人奪取政權的工具。我們看到革命之後，而發生若干革命的背叛者，都是由於抓民眾，和把民眾作爲工具的誤謬所造成的緣故。由此誤謬的觀念而演出更大的壞處，便是整個社會的分裂，和整個黨的分裂。民眾團體的團結分裂，學校校長教師因爲要抓民眾來擁護，便把學生當作工具，於是一個民族教育文化等等的發展便作了這樣的犧牲，後一代社會的生機便這樣的斲喪了！辦黨的人因爲要人來擁護，於是便千方設計的來抓民眾，抓黨員，因爲一人的能力不夠，便發生以私利爲結合的小組，小組的發達便只見有小組的利益，而沒有黨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於是黨的力量便不得不因而分散了！在軍事政治方面由此而發生的結果，便是軍隊變做私產，政治便作私財了！

第四，迷信鬥爭、奪取、暴動是革命的全部工作。其實呢，鬥爭、奪取、暴動只是革命進程中的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段現象。比如我們拿工人的利益來講，工人的利益不是完全要靠鬥爭暴動來奪取，在一個「不患不均而患貧」的社會，工人的眞正的利益還是在增加社會生產，然後才有所獲得的。從歷史的事實，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在革命之後，往往長期陷入於戰亂的狀態，這種現象不一定由於客觀的條件所促成，而屬於在破壞時期習染着一種鬥爭、奪取、暴動的變態心理促成的居多。此種心理的變態不糾正，革命是沒有方法可以成功的。此種觀念不根本去除，革命的建設是不能開始的。

根據過去我們一切的錯誤而得的教訓和經驗，我的大意是：

一、我們今後要拿統計、調查、圖表及一切工作進度的報告，來代替標語傳單的效力，因爲有了一件事業的成就和事實來做證明，甚麼的宣傳的力量都沒有這樣偉大了！而且宣傳跑得太快而事實跟不上來，只有令人疲倦，令人失望，令人失掉對我們的信心。

二、我們要把增進民眾的福利，是我們的工作最緊要的部分，是我們的黨和黨的政府應當負的責任，如果在我們黨的統治之下，民眾的要求一定要「運動」來獲得，這是我們黨的最大羞辱！我們要拿努力和建設一個好的行政來代替民眾的運動才是！

三、我們要認清我們的革命是爲民眾而革命的，不是因爲要革命才要民眾，民眾不是工具，不是徒供犧牲而無所享受的。眞正的民眾要靠能夠確實代表他的利益，才能得到他的擁護。如果認爲民眾的擁護可以抓得來的，我敢斷言民眾只有離開黨，離開你，離開一切公共的福利。我們要拿「爲民眾」來代替過去抓民眾的誤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鬥爭、奪取、暴動只是革命某一時期的現象，也不是實現革命的利益唯一方法。此種心理的誤謬如果不改正，革命是不能成功，革命的建設是不能開始。我們今後要拿建設和增加社會生產來增進社會福利，同時可以免掉過去鬥爭、奪取、暴動的心理而演成慘酷的戰亂和犧牲。

現在的確是我們除舊佈新的時候了，中國革命的生路和前途完全在改良而濟其貧乏，以確立新的革命觀。我們的希望雖已經到了「最後的一絃」，但我們一定要奏出成功的歌調！

——錄自「新聲」第一期，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國革命現階段之認識

自國民革命軍於民國十七年到達北平，及於十八年元旦東北易幟以後，在政治的一時現象，似乎中國革命已經到了軍事破壞的終了，而進於訓政建設的開始了。去年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也明白把訓政時期的期限，定爲六年，自民國十九年開始於民國二十四年完成。關於訓政時期的年限應當有明確的規定，我在民國十七年的國慶日發表的「中國國民黨今後的權力及其責任」一文裏曾經說明其必要，不過在我當時的意見，只認爲訓政的期限有規定的必要，尚不敢確定當時的環境已到軍事破壞結束，訓政建設的開始時代。自去年春天二中全會依照　總理遺訓決定訓政時期爲六年以後，我們很感覺到中央負責的同志決心之大，謀國之勇，而在對中國國家建設負有保姆責任的中國國民黨，此種規劃實爲必要。不過在當時那樣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此種措施，我們終有點爲時尚早的感覺。萬分的不幸，國內的殘餘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竟於十八年一年當中紛紛變亂，一時也不得不蒙其影響而錯亂，二中全會所規定於本年開始訓政建設的決定，不免要多少受此種事變的牽制，而感覺困難！這是何等痛心的一件事！

過去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革命大業絕非片段的努力所能成就，在革命建設的實施上，我們要有精確的設計和程序，因爲要有精確的設計和程序，便發生各個時期的工作和努力的不同。辛亥革命的失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由於忽略了澈底去做軍事時期破壞工作的完成，同時更忽略了訓政實行虛僞的憲政政治。最近革命環境的困難，是由於一時虛僞的統一局面，造成人們樂觀懈怠的心理，而忽略當前和此後許多根本重大的問題的解決，和艱苦奮鬥的繼續。因此爲要決定我們當前和此後的努力，我們不得不將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加以深刻的認識。

中國革命的現階段究竟是甚麼？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如果說是已是在鏟除一切足以阻碍訓政建設的障碍，以入於訓政時期的任務不是專在破壞某種特定的統治，而根本剷除，縱然是舊的統治勢力的隱藏深植於社會形的存在。所謂訓政建設從何說起？如果說是破壞統一的叛軍漸告敉平事破壞的結束，訓政的開始，封建社會的根基，宗法社會的惡習以及豪紳的勢力，官僚的氣焰，不式，尤其在革命統治的統一形式上失勢，而這種勢力的隱藏深植於社會，其爲害之大遠勝於舊的統治有形式來判斷的，在國民革命軍到達北平以後，統一的局面暫一度呈露，瞬統一的局面便頓成紛亂破裂的形勢了，這是我們最近和最痛苦的一個現階段究竟是甚麼，可以拿　總理孫先生關於軍事時期之規定來說明。「建國大綱」第六條云：「軍事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準此意義，所謂「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在今日叛亂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循，封建的統治勢力尚彌漫全國的形勢，正是軍事紊亂極點的時期，何能說到完成？而在工作和任務上，「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以確立革命政府之物質的勢力，「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以確立革命統治的精神勢力，「國家之統一」？因此我們從現狀的事實而得的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意義，正是苦鬥的時期，更何能說到完成？

部分的地方尚是統一與割據，從局部方面看，有的省區雖已免去軍事的紊亂，但從全部方面看，全國大局面中，而離整個訓政時期的實現，尚須有待了。在這樣一個現狀，我們既不能說他完全是在軍事時期，而是由軍事到訓政的過渡時期。在這過渡時期複雜的環境當中的工作，既不能以全國軍事未定，而放棄可以施行訓政地方的工作，更不能因全國未定而把已經安定之省區，長陷於不生不死之局面，所以總理在「建國大綱」第七條關於訓政時期有「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之規定。準此意義，則所謂「訓政開始之期」，消極的意義是「軍政停止」，積極的意義，則訓政的開始不一定在於全國統一之後，只要做到「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即可開始從事局部的訓政了！

由以上的意義，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的現階段，雖然離全國實現訓政時期尚屬遼遠，然而在局部方面，訓政的開始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當前和以後的努力也可知所取舍了。

總理在「建國大綱」中更予我們以關於軍政、訓政兩時期的任務一個極重要的指示。就是說在軍事時期「用兵以掃除國內之障礙」，和「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其最終任務是在「促進國家之統一」。但要如何促進國家的眞正統一，總理在「建國大綱」中雖沒有明白的說出，但在關於訓政時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規定中說「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這就是說國家的各級基礎的健全入手，各級的基礎健全以後，然後眞正的統一革命的眞正統治。從革命統治的建立上說，革命的戰術是步步爲營，而造，而不是就現狀改良；是以少數的力量造成多數的力量，而不是先有從局部的發展，以達到全部的統一，不是要有了全部的統一再求局部的，第一步是樹立革命的基礎，第二步是穩固革命的基礎和健全革命的基全部的統一和健全。所謂革命的基礎以求革命的設施，行之於力量所及的區域，而求其健全，有了健全的基礎以後，換言之，樹立了革命的精神和物質的勢力以後而得到的統一，方不是築屋於浮沙易遭崩解。革命的統治最怕的是不能統一，而最危險的也是虛僞的統一，在今日革命的實際環境，我們自然不能忽略了統一的必要，同時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不從局部的樹立訓政的基礎，以穩固革命的統治，所謂統一也只是一種空想。所以，　總理昭示我們只要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卽開始訓政的遺訓，我們是萬不能再忽視了！

一個國家的統一，是靠眞實的形勢所造成，中國的統一當然也不能例外。所謂造成一個國家統一的眞實形勢，不是專靠一種一時的政治現象的統一，也不是專靠軍事力量所及的統一，更不是以政治手腕所造成的統一，而是一個國家的實際環境已趨於可以統一的形勢。換言之，所謂統一，在精神上，必定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於國家的意識，或民族的意識已趨於統一；在物質上，必定是一個國家各部的利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已趨於融和；而在交通和產業等的發展進步上，都是造成近代國家達到統一的要素，尤其是不能忽視的。

我們要實現統一，當首先從中國現在爲甚麼不易統一的原因來研究，然後才能得到此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革命的現狀不能實現我們理想中的統一的原因：從黨的方面看是黨的武力的不足和不強，從軍事政治的現狀看是反革命勢力的殘餘，和封建勢力的統治，目前的確超過於革命的力量所能支配的形勢；因此所謂統一，只是一時的現象，而不是眞實的統一。總結一句，便是革命的武力不能絕對支配目前政治軍事的複雜環境，而在事實上倒是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支配革命的勢力。爲甚麼我們不能支配目前政治軍事複雜的環境而倒反要爲他所支配？此其原因，第一是革命的力量不集中，第二是過去革命進得太速，因爲進展的面積愈廣，而革命的勢力也愈薄弱，第三是因爲忙於進展，即在革命勢力所及的區域，也不能從革命的設施上進行革命的建設，以穩固革命的基礎，培植新的革命力量以爲補充的緣故。此外最大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革命受了國家的物質環境所決定，一時不易產生堅強統一的局面來。

近代國家的特徵：一是交通的發達，二是產業的興盛。以這兩個特徵來觀察今日中國的現狀，我們覺得中國眼前要建設一個近代的國家，實在感覺到物質的基礎尚是不夠。一個堅強偉大的革命勢力不易建立和國家眞實的統一不易實現，便是這個緣故。

現在我們先談交通。從近代交通的進步情形來觀察中國，的確中國是一個天下，而不是一個國家。比如我們說由上海到美洲，如果是坐昌興公司的皇后輪船，只要十幾天我們就可橫渡太平洋而到達，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最慢的輪船，至多也不過二十天左右就可到達美洲了。我們由上海到歐馬賽，爲時不過三十多天，如果我們經西比利亞鐵路前往，兩個禮拜時間就可到達了。由上海到歐美各國的交通情形如此，但是我們再一看中國國內的交通情形又是如何？我們由上海與世界各國的交通至多不過一月，假定我們由上海而要到達我國邊遠的省區如新疆、甘肅、西藏等地，最遠的便非兩三月以上的時間不能達到，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一個天下，或者可以說比天下還要大之下，關於文化的傳播，教育通設備不完全的情形而不是距離的遠近的問題，但是在這樣一種交通狀況的普及，地方利益的融和，國家意識的統一各種問題我們姑置不論，就是講到軍事政治一方面的需要，我們如何能夠建設出一個堅強而統一足以支配全國的力量？在近代交通發達的國家的國內情形，我們很難找出縱橫國境的交通有在一禮拜以上的，而中國幾有十幾倍於各國的困難情形，所以只就交通一項而論，我們要建設一個近代的國家，眞是感覺到條件的不夠。而一個偉大堅強足以支配全國的革命勢力，因而也不易在中國產生出來，所謂國家的眞正統一，當然更不易實現了！

其次我們再來談近代國家第二個特徵的產業興盛。我在此地所要談的與民生的關係，而是指的產業興盛，不是指的產業興盛在一個國家的統一和政治上的重要。我們知道近代產業發達的基礎是在交通設備的進步，交通進步的結果，不但增進工商業發展上許多便利，同時使一個國家內各地方免去文化的鄙塞，情意的隔膜，和民族意識的增進上，造成統一和諧的影響。產業興盛的結果，在政治上發生的最大影響，便是一個國家內所包涵的各部份利益非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顯著，使各個獨立的、偏狹的地方利益，一變而爲職業的利益。換言之，在農業的社會，因爲工商業和交通的不發達，所謂國家的各部分利益，便不得不以地方爲單位，因此在國家的統一上便發生地方主義、地方偏見等等事實的存在，以阻碍國家的健全發展。在工商業的社會，因交通發達，感情密接及一切生產手段之進步，社會各份子已由地方的區分，成爲職業的異別，而在國家的統治上，便免去種種地方主義和地方私見的存在。因爲在工商業的社會，社會利益非常顯著的結果，其在政治上的影響，便促進社會各份子對於政治的意識，以促進政治的改革，近代民主政治的興盛，便是由於工商業發達後，社會利益日益顯著而造成的一個明證。近代工商業發達的另一影響，把社會各份子利益，由地方的利益，變而爲職別的利益固不待說，從前一個工人的利益，因交通不便和其他的關係不得不限於地方工人的利益，不一定包涵在某一個地方利益當中，而是和其他各個地方同一職別的利益相關。此其在政治上的影響，甚而至於和世界同一工人階級的利益相便是社會各部分的利益，由分散而統一，由的封建統治、宗法觀念、地方偏私等等，便不得不隨之打破，在國家的統治和社會的組織上，便造成比較堅實的基礎。

由上種種，我們知道中國眼前之不易統一，和偉大堅強足以支配全國的革命力量之不易產生，第一是受了近代交通的設備不發達的影響，第二是受了產業不興盛的影響，而國家眞實的統一，便不易實現，革命的勢力，便因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的封建統治的根基不易動搖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根深蒂固而莫由堅強健全了！

根據上文的意思，然則中國國家的統一豈不是瀕於絕望嗎？偉大堅強革命勢力的樹立豈不是終結不能實現嗎？不是，正因其如此，才能給我們以促進眞正統一的正確努力的途徑，所謂統一才能名符其實，而不是一場統一的空夢，也正因其如此，才能給我們以對中國革命現階段以很明白的認識，堅定我們努力前進的信念。

所謂中國革命現階段的紊亂，反而能夠堅定我們努力前進的信念是甚麼？就是近代的革命有一個很重大而特殊的基礎，是工業革命後的發展。換言之，就是工商業社會的特殊象徵和產物。中國的革命，也是受了這種暗示和高壓而逐漸發育的，目前中國革命的困難，也正因是中國國家環境受了交通產業不發達，以及近代社會各項特殊的象徵不完備的限制而有的結果。我們要知道中國方是由封建農業的時代，進而向近代工商業時代發展，在新的時代尚未完全成熟以前，代表此新時代的革命，當然也不易澈底的成就，這是自然的道理。但是，我們敢於武斷的說一句，中國受了近代工商業國家勢力的壓迫和暗示，在她的生存和發展上，農業社會的基礎已頓現動搖而必然的向工業社會發展前進，此種趨勢和要求只是時間的問題，不達目的不能或止的，假定我們這種斷定不錯的話，中國革命必定是依然的向前發展，打破目前一切的困難，任何力量是不能妨碍他的前進是毫無疑義的。我所謂中國革命現階段的紊亂，反而能夠堅定我們努力前進信念的地方，就是這種地方。

從中國革命的背景，尚有一事足以堅定我們努力前進信念的地方，就是中國革命一面雖然是受了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業革命後，近代工商業社會的壓迫和暗示，而促進其發展，同時更因爲民族的衰弱，國家的不獨立自由，而備受異民族的武力政治的桎梏，而發生民族統一和獨立自由的急迫要求，至於民權的不振，和近代民權的虛僞，以及近代資本主義的弊害，所給予中國民族的自覺，使其在民權和在民生的發展上，得到更遠識而有利的創造。所以中國革命的發生，其內容雖極爲複雜，而其要求和任務則極爲重大，而成爲爲民族主義而鬥爭、爲民權主義而鬥爭和爲民生主義而鬥爭的最進步的革命運動。因爲內容的複雜和任務的重大，也許給予她的困難、壓迫和阻碍特別嚴重而遲緩。然因爲從嚴重遲緩而得的成就，必定會成爲「後來居上」，世界最進步的三民主義革命的實現，是我們敢於預斷的。

從我們上述對於中國革命未來發展的信念，在歷史的定律上，我們更得到一個對中國革命現狀的紊亂一個極好的說明，更堅決我們此後努力前進的信念。

中國革命的現勢，在揚子江和珠江流域，可以說是比較的有了頭緒，目前最感到困難的自然要算是黃河流域了！爲甚麼在黃河流域革命的困難要比較揚子江和珠江流域增多？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從中國革命的發生和中國舊社會的基礎加以分析。第一，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中國革命的發生，是受了工業革命後，近代工商業社會的壓迫和暗示，珠江流域和揚子江流域因爲感受這種壓迫和暗示最早而又最利害，同時在珠江流域和揚子江流域的經濟狀況，因此起了一個很大的變遷，近代新的工商業在這種地方便自然的漸漸啓發出來，而近代新的文明也因此比較發達於這種地方，於是中國革命便自然的發育於揚子江和珠江流域，而立其根據。黃河以北因爲對於近代各國工商業社會的壓迫和暗示感受遲鈍，因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代表此新的環境的革命也不覺其發育的困難了。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舊社會的基礎是農業社會的組織，農業是最先發達在黃河流域的，所以中國舊的文化和政治軍事的中心都集中在黃河流域。因爲舊的文化建築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面，所以在這種地方既未受了新興工商業社會嚴重的刺激，於是封建的統治勢力，和宗法社會的惡習，地方偏狹的觀念，便根深而不易動搖。因爲政治軍事的重心，歷來都是集中在黃河流域，自新興在揚子江和珠江流域的革命勢力，由南北進予舊的政治軍事統治勢力以衝進的壓迫以後，北方代表舊社會統治的軍事政治勢力發展過速，內部缺乏堅實，於是不得不一時頓現崩潰瓦解屈服的現象，但終因爲勃起於南方的革命勢力，以封建農業社會殘餘的力量，黃河以北的舊政治軍事統治勢力，雖一時爲形式的屈服，但終於得集合基礎，而竭力在那裏掙扎變化，以危害目前革命的發展，因此種種，我們可以拿幾件極普遍的事件，以表明封建勢力統治下，黃河以北社會的特徵。

一、在過去因爲受了帝國主義的高壓，在南方便發生很顯明的民族革命的要求，而在北方便生出「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事變。

二、因爲官吏的貪污，軍隊的橫行，在南方便發生民眾積極參加打倒軍閥刷新政治的革命要求，而在北方便生出類似白蓮教的紅槍會、白槍會等等封建社會的產物。

三、因爲受了近代社會革命思潮的刺激較深，在南方便發生了超時代、超事實的共產黨及改組派的禍變，而在北方便產生純全是封建勢力的集團的馮玉祥等等的變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中國民族對外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造成國家淪於次殖民地的境地，對內受了軍閥及一切封建統治的摧殘，淪於民權不振國家破碎，因此在南方便發生強烈的統一建國的要求，而在北方則尚有人猶拘守於「歷史上只有北方統一南方」的成見，而徘徊於革命與反革命的歧路。

以上所述，只是指出幾件極顯明的事件而說明中國革命的困難，是由仍在舊的封建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北方所給予，絕無絲毫南北地域的觀念，而只就革命的大勢立論，當然是很顯明的，上述諸事件當中，最值得我們注視的是現在一般北方的武人尚拘執於「歷史上只有北方統一南方，沒有南方統一北方」的成見，而徘徊於革命與反革命的歧路，予目前革命進展以很大阻碍一點。此種謬見在人事方面影響於革命者甚大，尤不能不有所說明。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中國舊的文明是建築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面的，因爲農業最先發達於黃河流域，所以過去軍事、政治、文化的重心均集中於北方。現在呢，情勢便大不同了，在揚子江和珠江流域開發以後，此種地方的進步和富庶，已超過於北方，而在受了近代工商業社會文明的壓迫和刺激以後，新興的工商業也發達於珠江流域和揚子江流域，新的革命運動和新的文明也發育於這種地方，而政治軍事的重心也不得不移到南方來了。因此種種所謂歷史上「只有北方統一南方」，是過去農業社會必然的事實，而「南方不能統一北方」，已是一句陳腐的舊話，不能適應於現在的情形了。我們在歷史上可以看到兩種事實，就是在農業時代，政治軍事的支配力，是由貧苦的地方發展到統治富庶的區域，而在工商業的時代，政治軍事的支配力，是由工商業地帶發展到統治農業的地帶。因爲在農業的時代，一切是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天然力的支配，故貧苦地帶的人民在氣候、地位等的關係上，在體力及刻苦和爭奪的本質上，都易造成優越的地位。中國農業雖最先發達於黃河流域，但因爲揚子江流域開發以後南方的富庶已超越於北方，而人民天賦的體力，刻苦和爭奪的本質，因爲生活的寬裕和氣候地位的關係，便不得不低弱，而爲北方強悍天賦的本質所征服。中國歷史上這種事例很多，如蒙古入主中國及滿清的入關都是一種明證。

在工商業時代，人類一切是拿人爲的力量征服天然力，如科學的效用、交通的進步、產業的啓發等，都是幫助人類征服天然力的工具，所以在農業時代貧苦地帶人民天賦本質的優越，失其超越性，而富庶地帶人民天賦本質的低弱，也可用人爲的力量來補救了。所以在工商業時代的政治軍事的重心，是從工商業的地帶發展到支配農業的地帶，而從前農業時代貧苦地帶，政治軍事力量發展到支配富庶的地帶的舊話，便不能適用了！美國一八六一年的南北戰爭，便是工商業地帶的軍事政治勢力，發展到支配南部農業地帶的明證。就是近代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他的征服下殖民地的關係，何嘗不是受的這種定律的支配呢！

根據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知道從前「只有北方統一南方，沒有南方統一北方」一句舊話，已因時代的變遷不適用於今日了，同時更依據近代歷史的定律，如美國的統一戰爭等事例，不但予我們以今日北方一種封建武人政客的謬論以否定，而且證明中國革命最後的成就，必定是由工商業新興地帶的珠江流域和揚子江流域，推進到依然是建築在舊社會封建統治的基礎上的黃河流域，直要到成功爲止。換句話說，黃河流域如果不澈底經過此新興勢力的洗滌，中國革命絕不能澈底成功。而且證之以中國革命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去的發展，雖中遭許多挫折，但他的一貫的趨勢，是由工商業新興地帶的南方，一直向封建農業的北方推進，絕未稍變的事實，更可以作爲我上文一個很好的論證。

也許會有人拿現在中國革命困難的事實來否定我的論斷。就是說：中國革命過去雖然是由南方發展到北方的趨勢，但是現在的確是呈露出由北進而向南退了。中國革命遭遇了這樣一種情勢，大有歸於失敗的形勢，至少也是一種停頓的狀態，是無可諱言的。以上的話雖然不免過於對現狀悲觀，但是這種悲觀也許就是我們對中國革命樂觀的地方，因爲惟其如此，才能證明北方封建統治基礎的根深蒂固，尚未至於完全崩潰的地步，所以他對於革命的前進，事實上不得不是一種拒絕的形勢。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只是表示北方封建社會基礎的尚未完全動搖，而不能指示中國革命不是由南向北的根本趨勢，這只能說是革命一時攻堅不破而退卻，而不能說是革命全線潰敗而不能收拾。因爲我們所謂珠江流域和揚子江流域，是新興工商業的地帶和新的文明的重心的意義，是指的與未經近代工商業社會強烈的壓迫和暗示而發達的黃河流域比較而言，而不是指近代工商業社會和新的文明在珠江和揚子江流域已經成熟。因爲近代工商業社會的各種重要條件，在這種區域還是發育時期，尚未到實際的成熟時候。因爲如此，所以由此地帶而產生代表此新興要求的革命勢力尚不十分強健，足以達到其向北方拆破封建基礎而建立眞實的革命統治的任務。此種挫折，在中國革命的過去已是有了不少的經過，然而每經一次的挫敗，不但不能使革命勢力瓦解，反而能促進革命勢力的改良和再起而愈益擴大，造成反革命勢力的抵抗，日至於低減，這種事實完全足以證明，發育於南方的革命勢力的前進趨勢，終不可阻止，封建統治的基礎，終有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完全不能維持的一日。

因此我認爲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及其困難，只是一種暫時的退卻，是新興革命勢力，由南向北摧破封建統治的預備時期，尚不能說是全線猛進，或相反的潰敗。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中國革命現狀的紊亂，第一個原因是由於現在的軍事政治環境，而反革命勢力本身的脆弱，不能絕對支配如交通產業的不發達各種的限制，致封建統治的根基得苟延殘喘，是由於中國國家因爲受了物質環境，生路惟有：

補救我們過去的弱點，以阻撓中國之統一。我們今後唯一的準備我們最後的反攻，達到革命建國的眞正統一！

——錄自「新聲」第二期，民國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倫敦縮軍會議與中國

自去年十月英首相麥克都拉赴美與美總統胡佛聯合發表宣言以後，世界形勢頓呈一種新的氣象和希望。根據於此聯合宣言而預定在倫敦討論縮軍的會議，也於去月二十一日在倫敦正式開幕了！參加此會議的除英、美兩國之外，尚有日本、法蘭西、意大利等國，此會雖然以縮軍和維持世界和平爲號召，但其實際只限於討論海軍的問題，參加此會的國家也只限於擁有強大海軍勢力的英、美，和擁有次大海軍勢力的日、法、意諸國而已。

本來，以縮軍和維持世界和平爲號召的國際會議，自歐戰以來已數見不鮮了，然其結果各強大國家之軍備競爭依然進行如故，所謂世界和平，也終於隱伏無數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危機，在俟機爆發。過去的縮軍會議的內容不過如此，我們對於現在正在倫敦開會的縮軍會議，何能遽然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使命期許他？

自歐戰以來的各次縮軍會議，要算是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對中國的關係最爲重要，除此之外，便要算此次的倫敦縮軍會議了。華盛頓會議主動的角色是美國，這次會議的主動角色是英國，此兩會議雖然開會的時間相隔將及十年之久，但其一脈相沿的作用，是在謀英、美兩國的協調，以減少兩國間自身的衝突，以支配國際的局面則完全一致。華盛頓會議的用意和結果一面是因爲歐戰之後各國創痛未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而企求一時世界的安定和休息，一面是因太平洋問題美、日兩國的衝突日益顯著，美國爲欲使日本國際地位陷於孤立，以便其發展，不得不謀英、美兩國的協調，以隔斷日本和英國間的關係。自此會議以後英、美在太平洋方面，雖說是能夠因利益的共同，採取協調的步驟，美兩國關於海洋勢力的競爭和海軍的擴大，仍然是彼此不讓的在那裏暗鬥。英國是負有傳統的「海上之王」的一個以海軍立國的國家，而其生命則全寄在她散佈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因此之故，在英國方面似又非維持其世界第一強大海軍的地位不可。但是美國因爲工商業的意外的暴富，從前世界金融的中心在英國的倫敦，在歐戰以後，便不得不漸漸移向美國紐約。換句話說，自歐戰以後美國已由債務國變爲世界各國的債權國，掌握世界經濟勢力的地位不可。但是美國因爲工商業的長足發展，和在歐戰中所得到的保的「門羅主義」，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便不得不毀棄無餘而捲入世界強弱競爭的洪濤。所以美國近年關於軍備的擴充，便自然而然的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美國在歐戰後這種發展，最受威脅的當然要算英國。以海洋的勢力而論，也只有美國才能算是英國一個旗鼓相當的大敵，假定英、美兩國關於軍備的競爭，沒有相當的相互的讓步，雖則兩國素以同一英格魯撒克遜血統相呼應，其結果終將不免於破裂一戰的危險，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英、美兩國在爭奪世界的霸權上，雖說是各不相讓的勁敵，但是英國的困難及其着眼點，是在支配歐洲的局面，尤其在應付與她感情日趨惡化隣近的法國。美國的着眼點是在太平洋沿岸及中國的利益，但是在太平洋方面有一個短小精悍橫行不可侮的日本，在在均可以予美國的發展以妨害。因此種種，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在爭奪世界的霸權上雖說是不能相讓，但爲要解決她們各自的困難起見，因利害的共同便不得不趨於協調一途，以支配世界的局面。換句話說，英國利於拉攏美國，以應付歐洲的局面，以制鄰近她的法國對她的威脅，美國是利於拉攏英國，以孤日本之勢，以解決她在太平洋利益發展上，日本所給予她的各項困難，這便是英、美必趨於協調的主要原因，從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到最近的倫敦縮軍會議，一脈相沿的作用便是如此。由此我們便可知道倫敦縮軍會議的精神和內容是如何了。此會議的結果，其對於今後太平洋問題的影響及對於中國的關係，我們也可知其梗概了！

在這樣一個內容的縮軍會議，顯然的會形成海軍最強大的英、美，對海軍次大的日、法兩個壁壘。會議的爭點和難關，當然也在這種情勢之上而成立。至於被邀出席的意大利，因爲在她的國家利害上，只有一個法國是她的死對頭，這個會議既然是英、美勾結自私自利，以對日本、法國的一套把戲，所以她的態度純全是灰色的，專以對於法國利與不利的提案而定其從違。最顯然的事實便是：她一方要求意大利的海軍，應當與法國處於絕對均等的比率，以求控制法國；一方面她看見英、美兩大強國這種的把戲，雖說是不利於她所憎惡的法國，但是將來的影響總是便宜了強大的英、美，而對於海軍次大的國家有同等的不利，所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近更電其出席代表，高唱全廢兵艦的高調，眞可謂予此次倫敦會議的主角英、美兩國以極諷刺的形容了！使其不得結果而散。以一黷武稱霸的魔王，而唱此全廢兵艦之意見，意在予會議以難題

會議的形勢既然如此，故在表面上是縮軍，在實際上便是調解英、美兩國的海軍競爭和衝突，而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其平衡，同時更是以英、美的協調和平衡，而限制法國和日本的海軍始終處於劣於英、美海軍的地位。總括一句來說，在英、美方面是求海軍勢力的平衡，以避免兩國的競爭造艦，造成未來的衝突，在對法國和日本方面，便是限制其海軍的勢力發展予英、美自身以威脅。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會議，無異是英、美的擴軍，或限制法、日的軍備會議罷了！在這樣的情勢之中，法、日當然因由利害的共同而一致與英、美爲難，以破壞其計畫了！關於此層，我們可以拿法人對倫敦會議之輿論一看便可知其大概。巴黎晨報主筆勞孫賴在該報發表一文頗堪尋味。他說：

「海軍裁縮會議開幕在卽，此會議之結果，成功歟，失敗歟，無人能預言之，然能預言者，卽從未有一種新國際會議在如此黑暗中開幕是也。……在法國方面祇有一事似覺明了者，卽至少有兩國——日與法——以極類似之意見加入會議。日本自始卽主張此次會議應傾向於眞正減縮世界之海軍軍備，而不應藉『均等』一詞爲掩飾，反多造戰艦，法國之主張亦然。……日本因其地理上地位與英國同，其生存賴於海上之自由交通，故要求彼之巡洋艦之比率須爲一種公平之比率。法國雖其理由不同而要求相同，無論如何，對日本之要求不至反對。蓋法國以爲一國對於其國防之維持，交通之安全，應若何保障，彼自己之判斷，乃爲最良者。」

觀勞氏上文意見，既極可以代表法國一般輿論對於倫敦縮軍會議之憤懣，一面更表示會議中法國與日本利害之共同，而力言法國拉攏日本在會議中以對抗英、美之必要。倫敦縮軍會議是否可以達到縮軍之目的，及其效力能否維持世界之和平，眞是沒有人敢於肯定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關於海軍縮減之原則，照目下世界情形不外兩途：一、規定各國海軍之總噸數，就各國情形而定其比率，二、限制各種艦別之製造或減少燬滅。也或進一步限制各種艦別之噸數及其使用。照前一種辦法在華盛頓會議時曾採用之，當時所決定之海軍比率，英、美對日本之對抗形勢。此中詳細利害得失，須有賴於海軍專門家之研究，非常人所能知其底細，不過就我們所知，照歐戰時之經驗，新近武器之進步及各國立國之環境及其特殊需要，只是噸數之限制，絕不能完全有利於噸數較大之海軍國家。比如在歐戰時，德國之海軍噸數遠遜於英國，但德人利用潛水艇之活動，予英國在海上以極大之損壞。照新近海戰形勢，因爲飛機潛水艇之進步輕便，遠洋艦之使用較多，而主力大艦反致運用不靈而又極不經濟，潛水艇與巡洋艦因其耗費較少而破壞力又極強，故在軍備競爭上羣趨於此途。海軍較弱國家抵制海軍較強國家的利器，便是利用潛水艇與巡洋艦之經濟與活潑一個辦法。在國家環境及其需要上來說，英、美是要靠海洋的控制來立國，尤其是英國殖民地遍佈世界各處，英國的原料和食糧都要靠殖民的供給，假定英國的海軍，在戰爭期內，受了敵國的破壞力最強的潛水艇和巡洋艦的活動，不能維持其本土對殖民地的聯絡，那末，英國眞可不戰而降了。這大概是只限制海軍次大國家的噸數的不一定有利於海軍強大國家的一個理由。此次倫敦會議英、美堅決主張爲各種艦別性質的限制，而不完全採總噸數的比率，以作限制的理由，大概也在這種地方。

自倫敦縮軍會議於一月二十一日開幕以來，會議的爭點都集中在廢棄和限制潛水艇與巡洋艦問題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面，這問題的重要和關係當然是極顯明的。英、美當然是對潛水艇與巡洋艦主張廢棄和限制，法、日當然是堅決要主張對此爲有利的保留的。關於使用潛水艇破壞海洋控制的力量的偉大，在歐戰時德國曾經給英國以很大一個教訓，我們可勿用多論。關於巡洋艦使用在海戰上的效力，美國海軍大將許士曾有一個很簡要的說明，我們可以引用他的話，來作爲我們一個指示。他說：「巡洋艦的用途有三：

第一，爲純粹和平的用途，即『培養友誼關係，及凡在吾人利益所需之處，標示吾人之旗是』。

第二，爲一國在戰爭時，或在他國戰爭中守中立時，保護商業商路焦點及海岸，以禦侵襲是。

第三，則純爲武力的用途，即無論在一艦隊行動中，或在大海洋上確實作戰中，用以掩護及贊助大艦隊是也。」

許士大將更云：「在大海上欲得秘密，只有使我艦隊不見敵人之一法，而欲敵人之不見我艦隊，只有用具有充分速力及最有攻擊力之艦，以逐走或毀壞敵人之眺望艦」。又獲勝者，將屬於有輕艦力最有效的擁護其主力艦之一方，故巡洋艦之優點則知巡洋艦之輕便經濟及其效力之偉大，不得不爲英、美之堅決主張毀棄限制，而法、日之不得不堅決出於主張保留了。照現在會議形勢而論，會議難關全在潛水艇與巡洋艦之而無適當之協調，會議必致無結果而散，是極可能的一件事。關於英、美論是主張廢棄或保留，要皆純從各自利害上着想而互爲控制，所謂縮軍與爭火併的惡因，而世界未來的危機更可不言而喻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綜結倫敦縮軍會議之作用和意義，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

英、美的協調，自華盛頓會議以來，已由萌芽時期進而至於成熟時期，其在國際方面的影響，在歐洲方面英國得到美國的協調，愈更造成英國支配歐洲國際政治一時成就；在太平洋方面，美國得到英國脫離日本的關係而加入美國一方，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發展必更迫切。這自然是日本的一種很大的不利，但是其影響所及，太平洋的角逐形勢必愈益險惡，而中國在她的生存和發展上所將感到的危難，也必日益增多。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太平洋問題爲爆發點的話，中國民族此時正應當有所覺醒，在萬難中求得她的生存。

一個國家生存的始基，一是發奮自強，一是善用形勢，自強是生存的基本，形勢是不可依靠的偶然的機會。假定不能自強，縱有很好的形勢，均不能爲我們所用的。從過去國際的形勢來講，歐戰的時候，是中國民族生存發展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因爲當時內政的腐敗和國家的紛亂，便把很好的機會都失去了。所以在歐戰之後，許多亡了的國家，如波蘭之類均能復國興起，而中國更於戰後，反更加重各個帝國主義的枷鎖而日至於困頓。現在第二次世界的大戰快到臨了，而此次大戰必以中國問題爲重心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將如何的振奮，以保障我們祖先所遺留給我們的「世界文明之母」的中國這個國家呀！我們將如何的努力，不致永淪爲帝國主義的奴隸呀！這是我們中國人當前一個極應計算的問題！

——錄自「新聲」第三、四期合刊，民國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清黨紀念感言

在中國革命史上最值得記載和評定的，要算是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的各種變遷了。所謂清黨的意義，就是國共的關係由和好而至於破裂，這種破裂是國民黨受了共產黨陰謀篡竊至於垂亡的景象一種再生的運動。本來兩個革命的組織，因爲相需相求而合，或因相拒相排而分，本不算得怎樣重要的一件事。不過國共關係的變遷，對於中國革命的進展上具有很大的一種不良影響，在中國國民黨的完整上遺下了無數的惡因，是萬不能忽視的。最明白的有兩件事：

其一，因爲國共的關係由混合而破裂，在革命勢力的本身頓呈一種分散戕賊的現象，因而在過去數年中，大家把精力用在對付革命戰線以內的共產黨，而把革命正面的敵人放鬆了。

其二，因爲國共的關係由混合而破裂，在國民黨的理論與組織上，頓呈一種混亂和破碎的現象。在清黨以後黨的理論的紛歧，組織的殘破，都是造成今日改組派倡亂，及其他一切不安現象的總因。

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三年開會於廣州的時候，很多的同志已經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理論的主張與方法的決定既各有不同，而在組織的基礎上又係各趨一端，大家早知當時國共那種混合關係是一時的，而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而不是主義的。最終的破裂，必因相需的程度減少，相拒的程度加多而發生，是毫無疑義的。爲補救這種危險，所以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有不許跨黨案的提出。其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因爲汪精衞一般人的愚昧，此案方一提出卽遭打擊，我當時因爲見到大會嚴格的不許跨黨案既通不過，於是乃提出下列的修正，以作第二步的補救：

「凡曾經取得他黨黨籍而經本黨認可加入本黨者，不屬於本案之範圍；凡已取得本黨黨籍之黨員絕對禁止其加入任何黨派。」

我此項修正案的精神，是在防止共產黨吸收本黨份子以破壞本黨組織，關於不許跨黨案防止共產黨在本黨內形成黨團作用既不能辦到，然而能夠做到不許共產黨在本黨內吸收本黨份子，未始不可以作補救。誰知其後共產黨在本黨內爲禍之烈，不僅在於黨團的作用，而反在不斷的吸收本黨份子以作其工具。

在民國十七年九月，我在「評汪精衞所謂中國國民黨的左右派」一文裏，關於此事曾有一段的追憶：

「我至今仍堅決的自信，我當時這個主張是極對的，假如共產份子不能跨黨而加入本黨努力，絕不會演出國共的火併，以消失革命的力量。卽或不然，凡本黨黨員不許其再加入其他政黨能辦到，至少也可以免掉後來共產黨吸收本黨份子及演成附共份子禍黨的事實。十五年四月整理黨務雖曾採用此案精神，然共產黨與附共份子在本黨之勢力已成，已無可挽救了。至今思之，痛悔無及！」

現在雖然是民國十九年了，但是我仍然堅持我從前這個主張是絲毫不錯的。

關於清黨的經過我們可以簡單的分爲三個時期：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一、醞釀時期——由容共到十三年秋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對共產黨的檢舉。

二、發端時期——由第一次中央監察委員檢舉共產黨案到十四年的西山會議。

三、執行時期——民國十六年四月的清黨。

在第一個時期，大家只看見共產黨留在本黨內的不利，而發生一種醞釀的時期。在第二個時期，總理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講，已經在黨員民眾中成了很普遍的信條，同時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陰謀已十分顯露，在這個時候，就是戴季陶同志著的「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書均已出版，反共的理論和方法已漸具體的確立。於是「國共不並立」的孫文主義的正統運動，便在全國各地如怒濤奔湧的發生出來。在此時期關係於國民黨的存亡，三民主義的興衰有兩件極重要的事件發生：一是當時廣東和各地的孫文主義學會運動，一是第一屆的中央執監委員於十四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　總理靈前集會，毅然決議：（一）開除共產黨黨籍，（二）解僱俄顧問鮑羅庭職，（三）停止附共禍黨的汪精衛黨籍六個月。青年，尤其是在黨軍中的幹部，一種對本黨主義很堅定的認識，對共產拒。西山會議的影響，是在的廣東，不得不暫停止其對西山會議現在雖然成了一個過去的名辭，但是我們絕不能因爲人事的變遷和少數人的墮落而把他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黨史上的重要，和三民主義革命的關係都湮沒了。我們必須知道西山會議的發生，完全是中國國民黨受了反國民黨的理論與組織的共產黨的侵害，由醞釀而至於成熟的國民黨的自救和再生的爆發。我們且看後來清黨的實行和成就，在黨的前仆者，沒有前仆，後者應當想到不幸者的苦衷，成功的時候，應當追想到過去失敗的價值呀！

說到這裏，我忽然憶起總可得他一些的諒解的，但是在特別委員會清起黨的時候，我們很覺得，他當日給反共同志那種惡名，總會洗刷一點，雖然昔日爲他詛咒，後來將快收場的時候，汪精衞對於從前反共的同志「生無面目見先烈」的態度，依然十分的強烈，我們很佩服他主見的堅決，絲毫不因清黨的共同而與他所謂萬惡的西山會議份子絕緣了，但是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汪精衞所謂「生無面目對同志，死無面目見先烈」的西山會議份子，反因爲反革命的勾當一致而吻抱了。既然前的賬目自可一筆勾消。他們這種絕滅信義，絕滅政治上人格的苟合，我們對於汪精衞等是不足怪的，因爲汪精衞本來就是一個不顧信義，不顧廉恥的小人；我們所怪的是一般少數自甘墮落，認賊作父的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朋友們，也如俗話所說「：：百事可爲了」！

西山會議在黨史上有他的光榮和墮落是不能減少他的光榮的。

因爲在清黨紀念的日子，我們想起過去許多的委屈特別心酸，想起革命不可磨滅，不可玷污的地方，少數人的變遷，不可磨滅，不可玷污的地方，少數人的變遷

筆至此，惟有含淚對昔日患難生死相共而首先爲清黨殉難的同志英靈高呼：

西山會議反共的偉績不朽！

已朽的只是少數墮落的份子！

——錄自「新聲」第八期，民國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青年參加革命的今昔

青年是社會的生機，是社會延續的繼承者。一切的文物制度和人的生命一樣，必須經過青春的繁榮，而至於衰老的暮年，人類社會不因衰老而絕滅，文物制度不因陳舊而退化，全靠一代一代的青年不斷的繼承下去，不斷的以新的人生、新的理想和新的努力，以改進文物制度的衰老陳舊。青年在人類的生存延續上和社會進化的歷程中，所負使命的重大可想而知了！

革命 Revolution 和進化 Evolution 在字義上，本來是連帶有關的名辭。每一種的革命，不論他的性質如何，其不能完全被否定其價值的地方，也就在乎他在進化的意義上是不能否定的緣故。在每一種革命的發生和他的發展，我們又可看出青年是其中的發動機，他們是革命戰鬥中最前一線的武士。這種事實，我們只要一翻開世界革命史，便可尋出許多的事例來證明，尤其是青年中的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非常顯明的。

法國革命前青年革命思想的活躍，革命後青年在新法蘭西國家所建的偉績，和當時歐洲保守勢力所遭法國革命思想的重大打擊，我們都可以看出當時這一場熱烈動人的戲劇，都是一些生氣勃勃的青年在那裏扮演主角。遠的我們姑且不談，現在我們可以拿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對照起來一看，更可以看出青年在革命進程中的重大意義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俄國革命史從他的簡單的內容看，可以說是一部農人、學生、工人以前的俄國革命運動，多半是農民受了貴族、僧侶、皇室高度的剝削擠在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的專制淫威之下，產生了新的文藝運動，經過許多有名的作家，盡情把農奴的痛苦，以同情深刻的文筆描寫出來，於是喚醒了知識份子的同情，而參加痛苦農奴的解放運動。從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八一年二十年當中，史家說是俄國大學生積極反抗俄皇統治的極盛時代。當一八六六年革命黨人加拉考索夫謀刺俄皇事件失敗後，一般大學生感覺到，在革命時期尚未成熟而單獨過激的行動，收效甚微，而且反增了俄國官憲的加緊壓迫。他們以爲與其盲動，反不如靜心修養，以待時期的成熟，再圖大舉爲有利了。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九年數年中，大學生們遂暫時停止了積極的革命的壓迫活動，而專心讀書修養以待其時機。但是俄皇的專制手段和他對於革命的壓迫取締，並不因是而停止，革命熱情最高的俄國大學生，當然而且是有加無已的在增加其嚴酷的壓迫。革命的大學生們拋開書本以後，便散佈在窮鄉僻野，到處宣傳革命的思想於痛苦的民眾，並且在各地組織了傳佈革命思想，實行革命的修養團體，這種團體到後來漸漸變成了發動革命的中堅組織。

因爲俄國政府取締的嚴重，革命黨人中重要領袖，如柴芬夫斯基、巴黎、英倫各地爲逋逃藪，關於革命思想的拉夫羅夫、巴枯寧等，都不能在國內立足，不得不以瑞士、傳播的雜誌刊物，多半是由此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方秘密的輸入俄國。在此時期許多傾慕革命的青年男女學生有的跑到外國去留學的目的，冷靜的學術是不能引動他們的興趣的，他們的最大的興趣是在到了外國，可以與一些亡命的領袖接近，受他們革命的洗禮，而籌劃俄國的革命。後來俄國政府感覺到青年男女學生在外國留學的危險，於是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於一八七三年，強制令數百留學外國的男女學生歸國。在亞歷山大二世的意思以爲此種舉動，可以防免革命的危險，那知這批大學生歸國以後，反而走到民間去深植了民眾革命的根基，燃燒著光明無隱的革命火焰了。

他們多半是貴族的子弟，或是在各種優美文明的家庭中教養出來的。其中女子的成分很不少，因爲當時俄國女子的高等教育不甚發達，所以他們很多的到外國去留學。這數百的青年男女學生回到俄國以後，因爲他們在外國的時候，受了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巴枯寧的影響，所以其中多數都是屬於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份子。他們回到俄國以後，奉了巴枯寧「到民間去」Go Among The People的信條，散佈到民眾中間去接近民眾，從事於革命的煽動。他們散佈到各地方去，藉教書、行醫、接生等職業，去幫助痛苦的人民，獲得接近他們的機會，使他們同時能夠加入革命的戰鬥。更有一類的俄國青年學生，因爲要使民眾不致懷疑他們，便只有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力求與民眾一致。他們有的學習了各種卑賤的職業，如鞋匠、木匠等，混跡到民眾中間去；有的很刻苦犧牲的到工場去作很勞苦的工作，因爲要這樣，才能眞正的接近痛苦民眾而向他們宣傳革命。這種刻苦犧牲的精神，是俄國革命深入到民眾中間，而得到民眾熱烈的擁護的偉大成績。雖然，現在俄國革命的成就，在主義上與這個時代青年思想不同，但是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命的種子是由他們在幾十年前老早佈下，後來的人不過是來收獲他們的菓實而已！

以上是俄國青年在革命的鬥爭上一些片段的事績，現在我們再來一看中國青年在中國革命的貢獻又是如何。

中國革命在興中會以前，雖說是主要力量是在下層的會黨，但是領導革命初發動的時候，他本人和他的主要同志，多半仍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自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以後，中國革命的中心基礎，完全建築在知識青年份子上面。當同盟會初初成立於東京的時候，加盟的份子幾完全是當時負笈留學的學生。自同盟會成立以至辛亥革命，國內歷次革命的發動，無不是以青年作中心。在辛亥以前，關於中國革命的發展途徑，是和俄國一八七三年留學生歸國的影響是相同的。俄國學生回俄以後，把革命的勢力散佈到民眾中間去，中國的革命青年自參加同盟會以後，逐漸的回到國內來，大半以從事教育事業和到軍隊工作，爲從事革命運動的主要事業，最顯然的：是萍鄉之役、庚戌廣東新軍起義之役、辛亥三月廿九黃花岡之役及武昌起義，都可以說是青年革命份子從軍事與教育兩方面工作而得到的發展。

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以至民國七年，此數年之間，中國革命經過袁世凱等反革命勢力之摧殘，頓現一種不振的氣象。當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這一天，北京的學生驟然藉由巴黎和會關於中國之處置問題，起而與軍閥政府抗爭。自此以後，國民的思想經受了猛烈的刺激和覺悟，於是革命的聲勢又復入於緊張的狀態了。五四運動雖然是因爲受了許多不成熟的思想和行動的影響，對後來的革命在積極方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沒有太多的貢獻，但是中國國民思想經此刺激之後，而入於革命的情況，實在是促進後來國民革命的發展的最大原因。這種功績是萬不能忽視的，尤其是知識的青年份子的活躍的價值是不能否認的。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對於青年在革命的重要更爲注視，所以在黨的方面，不僅是確定了具體的青年運動的方針，在青年的本身更從於扶植其組織與訓育的健全，使其在革命進行中所擔的使命更爲重要，十三年以後國民革命得以擴大的發展，青年的參加是一個最重要的成分。然因爲在國共合作的期內，中國國民黨青年運動的方針，過受共產黨的牽制，不能盡量進行，以致到了後來，國共分裂，青年在革命中竟受了許多痛苦的犧牲，這實在是一件極可傷感的事！

青年是革命的先驅，不僅是俄國如此，照前段所述，中國的革命也不曾是個例外，不過就中、俄兩國的革命來講，因爲兩國青年參加革命的方法和情形的不同，於是在革命的成就上，也發生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如果我的觀察不錯的話，中、俄兩國青年因爲參加革命的方法和情形的不同，在兩國革命發生的不同的影響是：

第一，中國青年在民國十三年以前，對於革命思想的傳播和發動革命的方法，多半是從軍隊和教育方面入手，以與反革命的滿清統治決鬥。俄國青年實行革命的方法，除了直接參與激烈的革命鬥爭之外，並且深入到下層民眾中間，故俄國自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以後，便能樹立偉大的民眾勢力，使革命的統治立於穩固不動基礎之上。中國青年從前實行革命的方法，因爲很少把革命的勢力深入到下層的民眾，故辛亥革命雖然把滿清推翻，但是因爲尚未樹立偉大民眾勢力對革命的擁護，所以革命的統治不久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爲衰世凱所乘，革命的政權便又落於反革命勢力之手了！

第二，民國十三年以後，中國青年參加革命，雖然也注意到向下層民眾作一種空泛的革命宣傳，而於下層民眾實際的生活和要求，總是隔離太遠，以致革命勢力並未曾十分深入到民間，像俄國青年拋棄其優越的地位，學習各種木工、鞋匠的賤業而到工場操作苦工，以求把革命勢力深植到民間。那種刻苦犧牲的工作，中國青年實在對之有愧。中國革命到了現在還呈露出許多的不安和動搖現象：也就是由於中國青年不曾把革命主義深入到民間，造成偉大的羣眾基礎的緣故！

第三，俄國近代革命鬥爭的開始，以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概括的說總有一世紀的光景。中國革命自乙未　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廣東起義失敗至辛亥革命推倒滿清，其間不過十五六年。因爲革命的鬥爭時間長，所以革命勢力一旦成就起來便異常堅實。革命鬥爭時間過短而成功過速，不是敵人脆弱，便是革命勢力發展得來不堅實，於是在每一時代的青年，對於革命的訓育也就不會怎樣充足了。我常常以一個很強的反革命的統治，他在革命的成就上，並不像他對於革命的障碍那樣可惡。因爲反革命統治的堅強，也許就是革命勢力一個很好的教師，由他的教育終於會把革命勢力教得比他還要堅強的時候來推倒他自己，俄國革命成就得偉大，青年革命訓育的充足也許就是在此吧！

由以上幾點關於中、俄革命的得失，我們對於今後青年參加革命的方法，可得到下面的結論：

一、革命如果不能造成偉大民眾勢力來擁護，偶然的成就終於是不可靠的，所以青年只有深入民眾中間去，才能眞正樹立革命偉大的民眾基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所謂「青年到民間去」，並不是青年叫一些民眾來向他們訓話，而是青年必須拋棄一切不合實際的幻想，把優越的生活地位犧牲，自己到痛苦民眾中間去親嘗他們的甘苦，體察他們實際的生活情況，而予他們以正確的革命指示。

三、革命鬥爭不可避免的長久和反革命勢力的高漲，都不是可怕的和對革命不利的事體，青年參加革命最忌的是求速效，其次是怕困難，其三是好虛名。如果不能從艱苦困難長期的鬥爭中，從下層的民眾樹立偉大的革命基礎，青年革命的意志是萬不能滿足，革命的成功更是無望的。

我在前回已經說過民國十三年以後，我國青年參加革命雖曾注意到向民眾方面工作，但因爲受了上述三項工作的缺點，所以青年在現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情況，便只見衰落和失望，最可痛心的是自經過了共產黨破壞革命的激變以後，大家的心理只在求青年的安靜無事，而在安靜以後的青年應當如何才能向上，並不曾有人負責來引導他們。如果說及青年安靜無事之後，便可努力求知，也許青年看書的成分較共產黨時代增多了，然而此時青年所看的書是甚麼樣的書，他們對於知識的嗜好的性質如何，恐怕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據我所知，現今青年男女最喜讀的書，庸弱一點的，便把張競生的性史和一切風花雪月刺激性慾的下流作品，當作手不釋卷的佳著；性情褊激一點的，便把求知慾移到一些超時代、超國家的、不成熟的思想著述上面。如果說是青年安靜以後，青年的暴亂減少了，但是青年的暴亂減少以後，他們是否仍得到一些正當的安慰，據我所知，現今青年的嗜好，多數已經從純潔簡單的生活，而以劇場妓院及其他一切不正當的娛樂，來作他們唯一的慰藉，以發洩他們好動的天性了。這個情形如果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久繼續下去，簡直是民族的危機，革命的自殺！青年的朝氣和純潔是民族國家生機所在，是革命的成功所關，如果目前青年的生活不能得著一正當的引導，而任他們長久墮落下去，中國民族的將來眞是令人不堪設想！

青年安靜之後，在消極方面的不良結果已如上述，而在政治上和社會方面對青年的誘惑，又復有增無已。這種誘惑，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其一，有的人想增大個人在政治上或社會上的權勢，便把青年當作他們的目標，拉一些青年來作自己的羣眾，以供個人的犧牲。至於在政治上、社會上負有地位的人，應當對青年負一種道德上和行爲上的領導責任，就非他們所能顧及了！其二，有種青年因爲敵不過政治金錢和社會地位的誘惑，便百計千方的向着這種目標上狂奔，於是在青年的本身便發生一部分陰謀奸險卑劣的秘密的組織和活動，以不正當的手段求得到金錢和地位的滿足，一旦他們政治和社會的地位取得了，而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處置，便完全以私見私利爲標準，把一切的正義是非都盡量打破，於是社會又復更增一層紛擾的亂源。前者把青年整個的訓育破壞無餘；後者從青年的本身更把青年社會的秩序擾亂，這種現象的發生，完全是由於青年受了共產黨重大打擊之後，安靜下來而無好的領導的結果，假如今後青年得不到正當的領導，而沉悶下去，至少要造成青年安於墮落，把後一代社會的生機，由我們的手裏斲喪，或青年因爲無人引路而自求出路的把一切超時代、超國家、不成熟的思想重演一番，造成較共產黨時代更殘酷的悲劇。

青年的天性是好動的，長期的沉悶是耐不過的，俄國的青年在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九年數年之間，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也曾經拋棄革命的實際工作而回復到一時的寧靜，但是他們革命的狂熱，終於把他們從安靜的生活中喚起，齊和沙皇決鬥，更在一八八一年把不可一世的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刺殺了。中國的青年在袁世凱時代也曾安靜了幾年，但到了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這一天，照樣的狂熱起來，和當時的軍閥政府決鬥，終於擴大風潮把軍閥推翻！

現在中國革命的生路只是：

青年快快從墮落中自拔出來，

從黑暗中去奮鬥，

刻苦深入民間去努力，

未來革命的大業只有我們青年才擔負得起，

青年應當自愛的把這偉大的責任負擔起來！

——錄自「新聲」第九期，民國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如何認識總理

## 一、總理的思想與總理的信徒

在未入本題之先，我首先要提出一個神話似的故事，這故事的意義就可以作我們如何認識總理的一個借鏡。

在一九二四年，俄國革命領袖列寧逝世了。當時在俄國的民間流行有一種傳說，說列寧之死是假死，並非眞的死了。這個傳說的鋪敍是這樣的：

有一天，列寧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想到他如果死了以後，他的同志對以後的工作情形，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他很想假死一次，以達到他所理想的目的，於是他馬上請了一位醫生來。醫生來了以後，列寧就這樣對醫生說：「你有沒有一個辦法，使我假死？」

「你爲甚麼要假死？」醫生反問列寧。

「你不明白我的痛苦。當我活着的時候，整個黨的責任，建設的責任，都完全堆在我的肩上，當然我應該盡所有的能力來貢獻給黨和國家。但是，如果一旦我死去，我的同志是否能同樣的負起這個責任來，照著我的計畫、我的思想做去？這是我很不能放心的事，所以我想假死一次，來看看死後的情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列寧很坦白的說出他的意思。

「可以的，我一定能達到你的要求。」醫生答應了列寧。

「但是你要辦得很秘密，除了你以外，祇許我的夫人知道。」列寧用很巧妙的手術使他假死了。將他的屍體裝入一具玻璃棺內，意思是要使他在棺內，依然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裝置好了以後，便將列寧的死訊宣布出來。

這一個死訊，很迅速的傳佈了全國和世界，俄國的人民和列寧的同志，都感到異常悲痛，將這一具玻璃棺從死的地方抬進陵寢。從此，列寧便很安靜的躺在陵寢之中。

但是，經過了若干時候，列寧感到煩厭起來。在某一天晚上，他忽然從棺材裏起來，帶了一張通行證，悄悄的從陵寢的後門出去，跑到克勒穆林——俄國黨政高級人員會議的地方。他拿帽子遮住了自己的面目，躲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靜聽那些委員們在那裏議事。結果他認爲很滿意，於是仍舊回到陵寢，在玻璃棺裏躺下來。

第二天晚上，他又起來，走到一間工廠裏去，有幾個工人在做夜工。他同他們談話，問他們的生活情形和意見。工人說：「革命以後，他們已經很享幸福，而且不和從前一樣，一定要做夜工。」列寧得到這樣的答復，於是又很滿意的回到陵寢躺下。

第三天晚上，他再起來，坐着火車到鄉下，去看看農村的情形。和農民談話之後，覺得農民的生活很好，而且農村的一切設施也都能如他生前的一樣去實行，於是他又滿意的回到陵寢躺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從這次以後，列寧就再沒有起來了。這一個神話似的傳說，也便這樣結束下來。不過，俄國的人民和他的同志卻絕對的這樣相信：他們的領袖終於是沒有眞的死去，他是必然的有再復活的一天。

列寧軀壳的復活，當然不可能；神話也祇是一個神話而已。但是這個神話，卻包含著一個深刻的意義。由這個神話，我們可以想到：一個革命主義在進行當中，如果不幸失掉了他們唯一賢明的領袖，它是很容易受挫折和打擊、以致於中斷的。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卻又體驗到：如果是正確的革命思想和正確的革命主義，不管遇到怎樣的艱難困苦，甚至消沉中斷，然而它終於要復活起來的。列寧的同志和信徒，堅守着這一信念，依照列寧生前所昭示的繼續努力，以獲得目前的建設成績。這個，就是顯示着列寧雖死未死，和他依然在活着一樣。

回頭來看看我們國家的情形。自從　總理逝世以後，我們黨的情況如何？　總理的思想、理論、方略，是否已經由黨和同志來身體力行？在今天，凡屬　總理的信徒，對於這些都是應該深自檢省的、深覺愧汗的。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幾十年以來，中國和俄國革命後的情形不同，卽是孫文主義的信徒與列寧主義的信徒之成就不同。　總理逝世後之一二年間，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國的革命的潮頭也曾經有一度的高漲；但是這種蓬勃的現象正如浪花一樣，經過一番激盪，湧現出不少的水紋，不久卽依然復歸平靜。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中國革命幾乎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此種狀態之發生，完全由於　總理逝世以後，　總理的思想與所昭示的方略，來負起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的責任來。如果這種狀態長久這般延續下去，那末，我們的　總理就是眞的死去了。要知道，我們要挽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革命的中斷，我們必須使　總理復活起來，而使　總理復活也絕不是如神話所想像的要　總理軀壳能復活，是祇要能恢復　總理的精神，謀　總理的主義之實現。要同列寧的信徒們一樣，對領袖的復活具一個堅決的信念。

通常的情形總是這樣的：在一個領袖活着的時候，大家都會很任意的將所有責任推到領袖一人的肩上去，正如中國俗語所說：「大樹底下好遮蔭。」於是養成了一種依賴領袖的心情，不能自己確定自己的責任。迄至領袖一旦不幸死去，革命事業與工作均停頓下來，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實，革命領袖所負的責任，是有限度的，也可以說祇是一個部分的工作，整個工作的推進，完全要靠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羣眾。我們的革命成就爲甚麼會不如俄國，爲甚麼在　總理逝世之後遭遇失敗？事實很明白的擺著，就是我們的同志不能在　總理逝世之後，如列寧的信徒一樣去腳踏實地的努力於　總理主義之實現。

現在，我們應該堅定這一個信仰：凡是正確的革命主義，沒有不復活的；除非他是荒謬的、不合客觀條件的。否則，一定復活。　總理逝世後，中國的革命遭遇到這樣大的失敗，固然是很不幸，然而也不是甚麼非尋常的現象。本來，有些革命的成功是一往直前的達到目的；有些卻經挫折，然後再復活起來，而走入它的成功之路的。如果俄國是前者，我們便是後者。即經過自然的演變、推行、中斷、再回轉頭來，三民主義仍舊成爲建設新中國之最高的原則。不過，這種情形總是很可痛心的事。中國革命的方法變成了一種非科學的方法。　總理的精神是科學精神，而　總理的信徒去推行革命工作卻是非科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自十三年本黨改組到十六年國共分家，再到目前的全面抗戰局面之展開與中國共產黨之回頭，這一段歷史中間，眞是極盡悲歡離合之能事。而這一番經過中，無味的代價也就實在償付得太大。例如，十六年清黨之後，文化、經濟等的損失不談，單說人的損失，從容共至分共，至回頭來加入抗戰建國的工作，便已經超過了二千多萬人的犧牲；江西至少八百萬，湖南四百萬，安徽、河南、四川共達千萬之巨數。我們翻遍中國的歷史，幾曾找得出支付過如此大的代價？然而，這還是從數量上講，如果從質量上計算，更值得令人痛心。這二千多萬人中，一部份是全民族最優秀的份子，就因爲對時代的觀察錯誤，思想不正確和對　總理不能深刻的認識，而造成這種惡果。我們讀歷史的，對於這一次的教訓，一方面可以明白：凡屬合於客觀條件的主義，必然有復活之理；一方面鑒於這種時間與代價兩不經濟的革命方式，也是應引爲切戒的。凡屬　總理的信徒，三民主義的信徒，從此應大澈大悟，不僅要認識主義，同時還要去努力於主義的實行。

根據以往的事實，顯然的，除了是不能認識主義的這一問題之外，便是大家不去體驗主義的實踐。這種錯誤的造成之責任，中國共產黨固然不能辭其咎，而中國國民黨尤應擔任之。我們要知道，中國的革命已不需要討論何種革命方式的問題，祇有一個如何實踐三民主義之責，亦惟三民主義之信徒乃能負之。以往因主義的不能推行，遂造成革命失敗的結果。至於主義爲何會不能推行，則由於本黨的理論與實踐不能統一，信仰三民主義是一回事，而推行三民主義又是一回事，能說不能行，於是主義變成了空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根據以往的錯誤，我們認爲要糾正它，就惟有深刻去認識　總理的主國的最高原則；同時健全黨的組織，以共謀三民主義之實現。過去黨的不健全的緣故；不能正確自己的思想，不能明白自己的責任。我們並不是與眾不同，不僅在堅決的信仰三民主義。同時，我們更不要妄自菲薄，今後領導整個的中國革命以入於三民主義之大道，亦惟有像廣西同志這樣的努力，才能勝任此艱鉅。這是我們應當共同勉勵的！如此，則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國民黨的前總理也必然會復活起來！

## 二、近代三大革命領袖—總理、列寧、甘地

現在，我們要歸結到本題上來了，即是「如何認識　總理」的這一問題。關於對　總理的如何認識，我以爲最好從事實上去瞭解，從比較上去求答案。誰也知道，在二十世紀當中，世界上產生了三大革命領袖：第一個是　總理；第二個是列寧；第三個是甘地。從他們各個在革命的實行上，看出他們各個不同的方式和主張，我們再將列寧、甘地和　總理來作一個比較，由此便可顯現出　總理的偉大來。

但是，在沒有作這個比較的說明以前，我覺得目前有一個通常的錯誤觀念和兩個治歷史者所犯的一般毛病，必先糾正，才能使我們的說明成爲有力。

所謂一個通常的錯誤觀念是甚麼？即是目前一般國人的「崇洋」觀念。這個看起來雖然是一種小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然而演變到民族自信力之消失，卻不能不承認其爲民族的一個大危機。「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並不是中國軍隊絕無對外作戰的能力，而是事實上自己的沒有把握。這個原因就是自鴉片戰爭以後，清廷一貫的外交政策——對外恐懼，所造成的必然趨勢。對外國人的觀念，是由憤恨到恐懼，由恐懼到崇奉「摩登」，卽是這種崇洋心理的表現。一般人穿洋裝，說洋話還不管他，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智識份子，更爲表現得充分。留學生回國之後，過去口頭上時時刻刻掛着的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現在便是馬克斯。而他們在外國之獲得博士等類的頭銜，卻是拚命的搬運孔子、墨子、莊子、老子的學問。據我個人二十年前在英國哥崙比亞大學圖書館裏所見的中國博士的論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這一套。因爲中國人不明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克斯，外國人不明瞭孔、墨、莊、老，於是他們拿着這些來兩面販賣，兩面欺騙。你想，自命對西洋文化瞭解的人尚且如此，這種現象是如何的可悲！又如蘇俄五年計畫，大家以爲時髦的了不得，而對於　總理的實業計畫，不過平凡；其實他又何嘗懂得實業計畫的內容？說到實業計畫的創立，誰也知道是在蘇俄第一次五年計畫以前的十多年，足見蘇俄的五年計畫是多半採取　總理的主張。從這些地方，可以證明中國人之瞭解　總理，反而遠不如外國人。這種卑劣的崇洋的錯誤觀念，如果不糾正過來，我們是沒有方法可以認識　總理的。

其次，再說到兩個治歷史的通病。這也是在想認識　總理之前，所必要改正的。這兩個毛病，中外歷史家都同樣的犯着：一個是「近視病」，一個是完全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而忽略了歷史的主觀方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忽略偉人與時代的關係。先說「近視病」罷。例如華盛頓，現在美國的人也都同樣尊敬他。但是在美國獨立運動的時候，和華盛頓任第一任總統的時候，一班的國會議員卻攻擊他非常激烈，這個從美國國會的會議紀錄中可以發見出來。爲甚麼多年以後，卻表現得如此偉大？這就是因爲近視病在作祟。在當時，因爲受人攻擊如此之激烈，而百短處。然而經過了長時期的延續，這些不相干的短處，便被人遺忘；而爲親近的關係，很容易被人發現示出來。中國人現在之不能瞭解　總理，卽由於這一「近視病」的原因。他偉大的功績，才能更有力的顯

其次便是完全運用唯物史觀來治歷史。唯物論者將歷史的變動，當作機械一樣。例如美國史學家海士，便是如此主張着。他說：從事實上證明，如果將華盛頓、拿破崙、克里蒙梭、俾斯麥、林肯一齊從歷史上扯出來，而人類依然是有歷史存在。這種話雖然在他的看法以爲很有理由；然而，請問如果抹煞這班人對歷史創造的偉績，那末，人類的歷史中還有甚麼值得紀錄的價值？所以一個偉人和一個時代的重要性，是絕對不可磨滅的，僅僅憑物質和經濟是不能全部瞭解歷史的。列寧用馬克斯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他卻忘記了：如果沒有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不是能夠成功？俄國的革命，一百條路當中，有九十九條是死路，而革命之能居然成功，便決不是僅僅一種歷史的必然演進的客觀事實，實在是由於革命幹部的健全，偉大的領袖之功績。因此，我們要認識　總理，必先除去上述的兩大毛病；同時不能僅從中國來看　總理，必須從世界來看　總理，才能充分的瞭解　總理的偉大。

現在，我們將　總理、列寧、甘地三個近代革命領袖的思想之重要部分，作一個比較。在他們三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人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很共同的原則，雖然中國、俄國、印度的文化、環境都各有不同。第一，他們都能彀將近代的精神具體的表現出來。第二，他們都不是僅僅的看着世界的一角，而是以救整個的世界爲目的，他們的革命都是具有世界性的。

現在，接着我們要將　總理、列寧、甘地三個人的主張之相異點與相同點，分別提示出來。首先說明列寧，其次再說到甘地，最後便提出　總理的主張來做一個比較。

列寧的第一個主張，是對蘇俄的建設，主張西歐化、近代化、機械化。本來，反對資本主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根本認爲機械是罪惡，基督教徒的思想是這樣的。中國老子所謂「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正同於這種思想。一種是主張接受近代的物質文明，不過改變它的生產關係。列寧便是屬於後者，如想使全俄國達到電氣化、工業化之類。

列寧的第二個主張是革命必需絕對的使用暴力。他說：「利劍在手，不殺人必受天譴」。他又說：「按著政治計畫，合羣是不能彀用的。無論甚麼人，反對武裝的叛亂，和不肯爲叛亂而籌備的，我們都要無憐憫的把他逐去革命黨行列之外，驅逐他到仇敵的營裏，叫他和叛人或儒夫同在一處。因爲時期將至，到那個時候，強迫我們用這個方法分別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切勿限制我們自己於毫無動作的地步，等候敵軍投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必要大聲喊叫，必要手持軍器，大膽的攻擊。……」「攻打仇敵，我們必要盡可能的努力。羣眾的口號應該是『攻打』，不是『自衛』。……」從這些話的當中，我們便可以看出列寧對於用暴力的克服這一點上面，是如何注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列寧的第三個主張是以暴虐制暴虐。基於他這種倫理觀，他便是以成功爲道德。於是他們的行動，首先是爲目的不擇手段，結果便以手段當作了目的。同時他還主張說謊，他將世界分爲兩個部分，一個是敵人的，一個是自己。所以他認爲對敵人的世界去說謊，這種說謊便是道德。關於這些，我們最好還是找他自己的話來作詮釋。對於道德的觀念，他說：「凡是從超越自然的許多觀念，或從階級概念外的諸多觀念，而發生的全數道德，我們都不承認。自我們看來，道德是整個受制於階級戰的利益之下的，凡是要必用以剷除舊的牟利的社會組織，和用以聯合無產階級的，都是合乎道德的。所以我們的道德，只在乎謹嚴的紀律，和有意識的同牟利家奮鬥。我似不相信道德的諸多在外的原則，我們將發露這種欺騙。共產黨的道德，卽是以鞏固勞工階級的狄克推多權力而奮鬥。」又說：「道德的概念，一經從模糊的道德語句，譯作平常日用的語句，解作凡是有利於、有用於、便利於一個定羣的人民的，都是道德。凡是害於、不利於這一羣的，都是非道德。凡是一系統的倫理，無有不是根據於有定的社會諸階級的需要的。凡是一個社會、一個階級或一羣所需要的，必常爲其所視爲合於道德。凡是有害的，必作爲無道理。」關於說謊，畢列巴拉森斯奇曾經這樣明白的說著：「凡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中，說謊是一件無利益的事，因爲這樣一來，就要社會的諸多份子，努力揭露眞情。但是在根據於階級制的社會裏，卻不是這樣。當一個被剝削的階級與仇敵奮鬥的時候，說謊和欺騙，往往是很有用的利器。諸多革命的組織的全數陰謀密計，實在都依賴於欺騙國家的官吏。勞工們的國家，被仇視的資本國所包圍，見得在外交政策裏，說謊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所以勞工階級和共產黨，對於公然承認說謊權利的態度，與西歐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會黨的態度，極其不同。這些社會黨是畏上帝的小市儈，常被資本家的代表們所騙，被代表們作傻子看待……。說謊原是個人壓制個人的後效，是階級羣戰的結果。」從這些文字當中，可以看得出列寧的倫理觀、道德觀的全部意義。在一個革命的鬥爭中，固然會不免獸性的發作，但如果將這些都當作教條來昭示同志，在我們看來，總覺得是不合理的。

列寧的第四個主張是反對資本主義。關於這一點，因爲它的涵義很明顯；而且爲大家所熟知，在這裏故不贅述。

現在，再來看看甘地的主張，甘地的主張，除了第四點——反對資本主義——和列寧相同以外，其餘的三點，恰恰和列寧站在正對立的地位。第一，他反對西歐化、近代化和機械的使用。第二，他反對用暴力，他主張戒殺、禁慾、吃素、唾面自乾的不抵抗。第三，他的倫理觀是宗教虔誠的倫理觀。

列寧和甘地，都同是近代的革命領袖，爲甚麼兩人的見地和主張會相差如此之遠？這原因就是因各個國家所處的環境與地位之不同。印度是英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是曼徹斯特原料的供給場，也是英國商品的銷貨場；除了以低廉的原料供給英國和消納英國的商品以外，絕對沒有可能來建立他自己的民族工業。因此，他祇有走消極的路，勸導他們的人民不用英國貨。根本反對西歐化、機械化、工業化，以他們自己的小手工業來維持自己的需要。

其次，他之所以不主張用暴力，也是因爲在英國強大武力的壓逼之下，沒有方法可以去反抗。過去中國歷史上所有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革命方式，那祇能運用在以前武器沒有大發明、沒有現在這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犀利的時代。印度的國家亡了，他們不容許再武裝起來，當然他們不能拿着拳頭去對付槍礮。所以甘地反對暴力，他是要用虔誠堅決的信心去打擊敵人的心，採取宗教式的感化方法。例如，以前印度的社會階級分別得非常嚴格，雖然國亡了，社會的階級和人的身份還死死不放的保留着。甘地爲著要改革它，於是用絕食的方法去感動一般特權地位的人，結果，他終於獲得成功，取消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他更進的要用這類方法去感動帝國主義者。英國近年來之對印度，在政治的許多事件上作可能的放棄，無疑的，這也是甘地努力的結果。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總理的主張，就照上面述說列寧、甘地一樣，分作四點來作一個比較。

第一，關於近代化、機械化、工業化的要求，總理和列寧是相同的。其所以會相同的原因，卽由於俄國與中國的經濟情形相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雖然當時標榜着共產主義的立場，受着馬克斯的思想所支配；但是結果卻顯然離開了馬斯克主義。馬克斯認爲：由於資本主義這一形態的發展，最後必然造成經濟制度的改變，卽社會革命。而正統派的說法，也是認定俄國是不合社會革命的條件。我們再看列寧和斯太林的政府，也祇是運用所謂五年計畫、再五年計畫去完成蘇聯的建設。這些都足以證明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情形，是不敷社會革命的條件。它會從資本主義沒有完全發達的經濟狀態下，發生出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政策來，這豈不是和馬克斯的判斷完全不符？中國的情形和俄國一樣，當然不能產生社會革命，也不必一定需要透過資本主義之完全成熟期，才能達到社會主義之建設的任務。馬克斯之經濟學研討的對象，所以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來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合一般的事實。因此，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儘管是以共產主義作中心；即是要先去造成了資本主義，再來從事社會革命，而是要在革命成功以後，依然不能不另圖補救。不能說一定要先成熟了資本主義，再來從事社會革命，而是要在革命成功以後，想醫治的方法。　總理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昭示同志，中國不需要社會革命，而是要在革命成功以後，來從事民生主義的建設。不過，建設的計畫不能違反時代的精神，必須近的國家，非先從事於生產的發展不可。

關於第二點，　總理不僅是和列寧不同，而且也和甘地不同。這個當然也是由於各個環境的差異。總理不主張全用暴力，可是也不絕對反對暴力；不主張用宗教式的感化，可是不廢棄和平。　總理的主張是：「政治的改造，須用武力，因爲需要驅除一切的障礙；經濟的改造，則運用和平。」

關於第三點，　總理和列寧、甘地也迥然不同。列寧主張以暴易暴；甘地則是一種宗教家的方式。總理的全部思想是以仁愛爲出發點，許多人誤解以爲這也是宗教的精神。固然宗教也包括仁愛，但是總理這種思想並不是出發於宗教，而是人類福利的意義。在這裏，我想以個人經歷的一個故事來作引證。

民國十三年，　總理北上以前，正是容共時代，而本黨在改組以後，也正在運用新組織的方法來改組黨部。當時，我正在擔任市黨部的工作。有一次，忽然我感覺到在工作的工人與共產黨的工人，在民眾運動中發生領導權的鬥爭，使一個民眾運動會發現兩種不同的意旨。共產黨運用黨團的作用來企圖支配全體，操縱全體，馴至兩方面的勢力相抵消，而終於無法推動民眾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動的工作。因此，我便跑去投訴　總理。其時恰好廖仲愷先生在座，去轉告共產黨和組織部長譚平山：如果C.P.份子在民眾運動當中，還便會要不擇手段的打倒他們，來開始這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

隨後，廖先生去了。　總理便很和平的問我，第一句突如其來的話說：「你以爲革命的目的是爲着甚麼？」

「革命的目的是爲着救濟社會的罪惡。」我這樣回覆　總理。

「你說的不錯，」　總理接著說下去：「不過，你剛才說，要不擇手段去對付共產黨，那末這是不是罪惡？」

「……」我沒答覆。於是　總理便回向我說了一篇很長的話，這些話是使我永不能忘的終身教訓。

總理說：「如果照你剛才所說，要使用不擇手段的方法去革命。了用罪惡去打倒罪惡之後，社會本來祇一層罪惡，經過那末，社會便成了兩重罪惡。接着再以罪惡來打倒罪惡，則不特罪惡；而且將使社會產生無數的罪惡。這個理由，許多人都不明白它的重家在改造的時候，必然經過一番大亂，這種大亂就是由於舊的之破壞要。試看歷史上的事實，每一個國手段的去幹，那末新的便無法建立起來。於是新的舊的都變成了罪惡。但是在舊的破壞當中，如果不擇打倒之後，繼之以官僚；軍閥打倒之後，繼之以軍閥。革命者如果不能從事於心理的建設，自己不久也將會變成了敵人。革命的情緒雖好，如果祇顧手段，不顧心理的建設，則這種人便是不相信他自己。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們既然有好主義、好計畫，便可運用正當的方法去做，何必一定非採用造罪惡的方法不可？篤信主義的人，不僅要認識主義，而且要有好的方法。」從這一段話裏面，我們可以看出　總理和列寧的分野來。

再有一個事實，也可以幫助我們來認識　總理和列寧的不同。當俄顧問鮑羅庭到廣州的時候，他和總理談話，提出一個問題來問　總理。他說：「先生，你以爲革命是爲的愛人，還是爲了恨人。」總理的答覆是：「革命如果不是爲的愛人，那末，就用不着革命。」鮑羅庭又說：「先生，如果像你一樣的慈悲心腸，革命是沒法成功的。」由這個對話之中，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思想體系，完全是所謂唯物的、階級的；如果階級不顯明，他們的革命便無從推進。必定先要有仇恨，才能革命。馬克斯主義之如何，我們暫且不談，但是共產黨的革命方式，卻是必然要先造出仇恨，然後再造革命的力量。在中國，勞資階級不顯著，於是中國共產黨便要從無階級的中國社會中，去造出階級來。例如海陸豐的初期共產黨暴動，使用屠殺焚燒的方法，抓住一部份人去對付一部份人，造成對立的形勢。參加革命的便是無產階級，反之，便是資產階級。這種屠殺焚燒的辦法，就是他們造無產階級的辦法。先將有飯吃的變成赤貧，然後便可以增加他們所謂無產階級的羣眾。這種方法是甚麼？即是中國小說水滸上所使用的：「逼上梁山」的方法。我記得從前在四川有一個李短辮子造反的故事，正和這種意味是相同的。

四川從前有一個盜匪首領，名叫「李短辮子」。當他準備造反的時候，首先他便要謀增加他自己的力量。有一天，正是鄉下人趕集的時候，他乘着這個機會，便命令他的黨徒，把守着集鎭的兩頭，將所有的集上的人的辮子通通剪短，當作他的羣眾。等到官軍來清剿的時候，見著短辮子的便殺，以致引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官民間的重大惡感，沒有被剪辮子的也都很憤激的跑到李短辮子之下去。於是愈殺愈多，後來幾至不可收拾。一直等到官軍方面改換了方法，聲明凡棄械投降者免死，這樣才將那次的變亂平定下來。革命的方法如果不合理，則其結果必如李短辮子，而終歸失敗。中國共產黨過去的辦法即是如此，所以也必然遭遇失敗，最後是回到本黨的領導之下來。

暴力，在革命的手段上，並非絕對不能使用，而且甚至是必要，但決不能不顧一切的使用。這是總理與列寧最大的相異點。　總理主張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乃爲必要而使用；而在經濟上，絕對不能使用一個階級反對一個階級的作法，所以　總理主張用和平來改變經濟制度。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　總理和列寧、甘地之不同，固然由於環境、文化等等之差異，而革命的出發點之不同，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至於第四點：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三個人都相同的，不過在這裏，我們又要更進的認識：反對資本主義的這一信念，雖然三人相同，而正因其各人之思想出發點不同，在方法上遂也有必然的差別。

俄國由第一次五年計畫之完成，進而至於第二次五年計畫之將要完成，這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這種成功的偉大，而且是空前的。即令在資本主義發達到極高度的國家裏，也不容易達到這種高度的成就。但是經濟建設的計畫儘管成就，可是俄國的革命問題，卻始終沒有解決。這個，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不斷，而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出發點的錯誤。實在，俄國的政治目前全陷於一個極艱困的情形之中。在一九一四年到二七年之間，他們對於世界革命的口號，雖然略略的表示退讓，但仍在修正進行。可是一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了一九二八年，俄國便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而入於外交的範疇。大家還以爲俄國是以退爲進，殊不知他已是沒有再一往直前的能力了。原因卽由於內部的不協調。這個，從去年至今年層出不窮的反革命案件，便可以證明出來。二十餘年來的元老差不多都被趕盡殺絕。這樣大的一個矛盾的爆發，無疑的使國家會蒙受絕大損傷。而這種矛盾之造成，就是由於他們思想之出發點與革命手段使用上之錯誤。過去使用的某種手段，在對付敵人的時候，固然不錯；可是等到敵人去了，以俄國的革命，雖然在物質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他們的精神上卻遭受了極大的損傷。對於俄國革命的批評，我以爲與其說他們的努力不夠，無寧說他們的思想出發點錯誤。我們從歷史上看，每次大亂之後，必定需要一班講學者來樹立一個社會信仰的中心，然後亂後的人心才能安定下去。否則，以亂止亂，打了敵人，再打自己，便沒有方法得到安寧。

依於前述之四點，我們可以看出　總理、列寧、甘地三個之不同點；而此種不同點之產生，一方面固由於各個環境、文化之差異，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思想的出發點上面。俄國革命之不能成功，卽由於此；中國革命雖陷於停頓，但如能引爲鑒戒，迎頭趕上，則成功是必可預期的。而且自　總理逝世之後，中國革命之所以陷於停頓，完全是因爲思想上受了種種駁雜的影響，遂使三民主義的信徒走入歧路，這實在是至可痛心的事！我們應該知道：列寧和甘地固然偉大，但想與方法；否則，不管你口裏如何表示你誠虔的信仰，事實上仍然不能作爲一個　總理的信徒。既是一個　總理的信徒，其所言所行的一切，都必須要歸結到三民主義的道路上。由於中國共產黨最近的回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便證實了三民主義的偉大和其對中國的適合性，我們必要正確的、努力的建立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來！

## 三、認識　總理的兩個要點

歸結上面所說的，我們對　總理的認識，我以爲應有兩個重要的原則，是值得再提出來說一下的。

第一，我們要認識　總理誕生於鴉片戰爭後二十多年，那時正是中國從閉關自守變爲與近代文化相接觸的時期。所以　總理都是要使中國迎頭趕上近代的文明，而同時要使東西文化互相溶和起來的建設中國和改造世界的計畫，在東西文化中間而擔負起這個溶和的偉大歷史任務的人。我們可以這樣說：　總理是站

第二，總理生長在中國這個產業落後的情形之中，同時受到歐美產業發達的刺激，所以他的革命主張，便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一同提出來，綜合起來作一次解決。他看到資本主義發達的危險，便希望使中國趕上資本主義的前頭，而免除社會革命的痛苦。這種見解與主張，是　總理超越於列寧、甘地所獨到的地方。我們必須首先明白這兩個重要的原則，才能更深刻的認識　總理。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日，桂林。

按：本文由民團週刊社發行，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五日初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各省設置鄉村幹部學校以建立黨政基礎意見書

竊以國步艱難，至於今日，本黨承全國國民付託之重，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大業。當前之急務，固在於培養並加強繼續抗戰之力量，以爭取最後之勝利；而建國運動，亦必兼顧並籌，同時邁進。良以此二者之間，聯繫倚持，不可偏廢。前此辛亥革命與十七年北伐，均以偏重軍事而忽於政治方面之建設，故國家基礎，未克奠立，每思前轍，彌念來軫。誠以一旦抗戰結束，百廢待舉，若非先有縝密之部署，則積弊隱患，同興並作。非特建國大業，無由完成；而抗戰之續，或亦將與俱隳矣。

然則抗戰建國之基礎與力量，果何所由寄乎？必曰：在於廣大之民眾。「建設必自民始」，總理之遺訓昭然。「抗戰進入後期，民眾重於士兵」，總裁亦嘗舉以相示。蓋知民眾之組訓，在承平固屬要圖，其在戰時，尤屬刻不容緩也。

竊嘗盱衡大局，默察現勢，以爲今日之大弊，蓋有三焉：卽民眾之組訓不得其方，親民之縣政機構之不良，與及縣以下黨政之分攜。綜茲三者，實爲當前危弊之癥結，去茲三者，則抗戰建國大業，胥在於是。今試就所見者，略爲論之：

**一曰民眾運動之方法有待於改良也。**自本黨執政，時逾十稔。對於民眾之組訓工作，匪特效施未弘，尤感諸多不逮。推厥所由，殆有二因：一於昧於本黨執政者之地位，不知應表現行政效率，以博取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眾之擁戴，及效其他在野黨之以攻擊政府爲能事。而中下層之所謂黨政糾紛，乃由是而起，初未嘗計及執政者之爲同黨也。其次爲對組訓對象認識之錯誤，原以我國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民眾，皆從事於農業。故社會中階級與職業之利益，初不顯著。今乃以工商業國家組訓民眾之方式行之，又焉能究其柄鑿不適乎？明茲二弊，故知本黨今日以言民眾運動，必須針對時弊，確定原則。因本黨居於執政者之地位，故民眾運動，應配合於行政機構之中。運用各級政府之權力與黨團作用，以發揮一般組訓之效能。尤須認清組訓之對象，力求能與其生活上發生密切之聯繫，準此以行，則虛往實歸，不難預期其成矣。

**二曰縣以下政治機構之亟待改善也。**竊以各級政治機構之職能，在中央但重決策，在地方如省區重在監督；而縣實爲行政之基本單位，負執行一切政令之任務。然而睽諸現勢，上級之政令，率多至縣而停阻。良以自縣以下之保甲人員，無行政上之地位，無固定之薪給，貪婪枉法，在所難免。且以未經訓練，品類參差，積習深固，難期改革，匪特無推行政令之能力；而揚威鄉曲，反以病民。欲挽其弊，決非局部之實驗或改良所能爲功，必須有整個推動之計畫，完善之實施方案，切中弊害，詳計力行，以期嚴密其組織，健全其機構，充實其品質，必有良好之幹部，乃能期機構之健全，必有健全之機構，而基層政治之基礎可以建立。由縣而省，集省而國，建國之大業，具在斯矣。

**三曰縣以下之黨政關係亟待調整也。**縣以下融黨於政，爲中央既定之方針，而實際之情形，則此種形態，初未實現。益以中下層黨工人員昧於執政黨應取之態度，故自縣以下，竟成黨政分離之局。卽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方之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亦乎與黨分攜，致黨無廣大深固之社會基礎完善。欲挽其弊，必須統一縣以下黨政人員之訓練，使黨政幹部合爲一幹部訓練之目標，則在使其集地方管教養衞之權於一體，融政於黨，以黨助政，凡政權之所及者，卽爲黨治。交互融會，相得益彰，深固之黨政基礎，當由是而建立矣。

綜上所述，迨知今日之弊，雖在於基層，而其影響所及，則實關係者之憂勤，亦將無補於時艱。尤以抗戰而還，社會之變動日遽，實非向役之推行，民眾之組訓，地方治安之維護，生產建設事業之開發，均非動不爲功，而此基層幹部將別無他途矣。有精幹之基層幹部以爲之執行推何所自來乎？舍設置鄉村幹部學校而外，殆以培養地方行政人才之議，固非純出愚意，亦不自今日始也。總理高瞻遠矚，先是二十年前卽當倡導此意，其在論地方自治制度之演辭中有云：「欲行此制，先定規模，首立地方自治學校，各縣皆選人入學，一二年學成後，歸爲地方任事。」（註）其言雖簡，而其意至深。蓋以新政之推行，幹部決定一切。無健全之幹部，卽有閎規碩畫，亦將無所用之，而其弊害所及，尤屬不可意計。卽如本黨執政以來，在軍政時期，因有黃埔等校作育軍事幹部之機關，故北伐得以迅速完成。至於訓政期中，則對基層幹部之訓練，迄付闕如，寖淫推演，乃成今日之危局。前轍可鑑，桑榆非晚，在今日以言幹部之訓練，誠刻不容緩也。

鄉村幹部學校之設立於今日，實具有雙重之任務，卽在目前求能適應抗戰之需要；而以後則在建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方自治基礎，以作建國進程中施行憲政之預備。言其要旨，約有五端，其他類似之黨政訓練，均廢止之。

**一曰統一訓練**　由中央通令各省，設立鄉村幹部學校，自設立之後，訓現職人員而外，各縣選人入學，畢業仍回原籍。

**二曰適應需要**　訓練以基於需要爲原則，即就各省所需要幹部之人數，以爲決定訓練名額之標準。

**三曰慎重考選**　幹部之品質，最關重要。必須廢止普泛之招考及調訓制度，學生之來源，除甄別調訓者而外，凡受訓畢業者，均照規定，至全省訓練完畢後，歸於統一。

**四曰確定待遇**　自設立幹校之日起，縣以下之保甲人員，確立其行政地位，釐定薪給。除現職未受訓者而外，凡受訓畢業者，畢業後，非經訓練畢業者，不得任用。

**五曰保障任用**　各省自設立幹校以後，縣以下行政人員之任用，以曾經受訓爲原則。在全省訓練完畢後，非經訓練畢業者，不得任用。

以上爲設立鄉村幹部學校之一般原則，至於訓練之實施及內容，則與方案爲依歸。特別注重於實際問題之探討，人格之修養，體魄之鍛鍊，蓋必增強其德智體之教育，然後能期其勝任管教養衞之職權也。

至於課程之釐訂，即依上述標準，分次五類：

**一爲基本認識教程**—本黨之歷史、政綱、策略與一般之政治常識均屬之。

**二爲政治教程**—管—社會科學之一般概念，與行政上應具之知識均屬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爲文化教程**—教—應用之學術思想，時代知識，與中小學教職員應具之知識均屬之。

**四爲經濟教程**—養—日常生活中之所需要，如農業工業之應用知識均屬之。

**五爲軍事教程**—衞—一般之軍事常識，爲中下級幹部之所需要者程度之不同，需要之各異，分爲以上爲教程之大要，課目卽據此爲之訂定。訓練之時間，因受訓半年一年兩種。各省預計其所需要之名額，逐年分批訓練，而至遲以五年終其事。在籌備期內，並先設立一幹部訓練班，訓練校中所需要之各級隊長及指導員等，以期意志行動之統一。

至於組織系統，則直屬於省政府省黨部，而承受中央訓練委員會之監督與指導。校內行政採校長制，設校長、副校長各一人，下設教育長以總攬全校事務。另由有關機關組織校務委員會，爲學校之諮詢機關。

創設鄉村幹部學校之原則大綱，已略盡於是。一切實施計畫，均據此而爲之擬定，務使其成爲造就縣以下行政人員之專門機關，不同於普通之短期訓練，以冀樹立新政在政治得健全之幹部，在黨務增決大之生力，黨政之基礎既固，效施自弘，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機，具在斯矣。

註：民國五年　總理在上海講詞，題爲「自治制度爲建設之基石」。

按：原文時間未詳，約在民國二十七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關於田賦徵糧與實施糧餉劃分辦法建議案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日

關於田賦徵糧與實施糧餉劃分辦法，茲謹就川省實際情形，臚陳意見如次：

## 甲、總綱

一、米糧爲國民生活中最主要之消費品，安定糧食市場，可因之平準物價，穩定金融。

二、爲欲穩定糧食市場，必須有大量糧食爲政府所有或掌握，乃可調劑盈虛，供應軍用，同時爲避免刺激糧食市場計，絕對不能向市場購買。糧食之來源如左：

1. 恢復田賦徵糧制。
2. 全省積穀。
3. 各縣學田公產之租穀。
4. 用累進法向地主徵收之所得。

三、田賦徵糧，原爲歷代相沿之舊制，後因存儲分配支付之不便，乃改徵現金，其所定金額，係以當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米糧市場爲標準，在戰時物價高漲，貨幣價格低落之際，相差極爲懸殊，其影響有二：

1. 地主之負擔特輕，不能與各業納稅均衡。
2. 政府收入價值減低，影響政費之支出。

「註」查本省田賦糧額，清初原案係六六九、〇七三兩，後因流濫日甚，於民國三年明令減徵，總額六六〇、五一五兩餘，又五三八石四斗，核定永爲一徵糧額，折合現金爲七、六二九、八八九元七角三分四厘六毫，其後歷年因附加軍費每徵兩倍或三倍。上年田賦收入預算數爲二二、五一三、一六八元，約當三倍。但如折合實物計算，則民國三年核定折合現金時，全省平均穀價約爲每石二元左右，共計可得穀三百八十萬石以上。但如以上年度田賦徵額折合穀石，平均穀價以每石十元計，不過二百一十萬石左右。如更以本年糧價每擔四十元計算，僅可得穀五十萬石而已。至政府支出，則因物價高漲而激增，故無形中蒙受絕大損失。

四、在前項糧食集中政府後，凡政府本身所需，如軍警團隊等所需之糧食，便於支付起見，卽以此項糧食作爲保證，發行與存糧數量相等之糧食券，統由政府計劃分配。同時爲

1. 田賦徵糧，政府可減少因貨幣價格低落所受之損失。
2. 平衡政府收支，不致因物價上升，激增預算。
3. 實施糧餉劃分辦法，可減少米糧市場之波動，並安定公務人員生活。
4. 糧食券逐漸流通市面，可形成以實物爲基準之新貨幣，穩定金融，支持長期抗戰。

## 乙、實施辦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糧食之集中**　預計總共集中糧食一千萬石，其來源分配方法如左：

1.田賦徵糧，約可得穀二百二十餘萬石。

田賦徵糧之折合，以二十八年度田賦應徵金額折合當時穀價爲標準。

「註」二十八年度田賦預算數爲二二、五一三、一六八元，全川當時平均穀價以六元計，約可得穀二百二十餘萬石。

2.全省積穀約二百二十餘萬石。

「註」據省府民政廳施政報告，截至二十八年底，全省約存積穀二百二十餘萬石。

3.全省學田公產積穀約五十萬石。

「註」據省府財政廳本年度地方預算，列學產收入二、九六四、一四九・四零元，公產收入六九一、八〇〇・〇六元，合共爲三、六五五、九四五・四六元，因預算中折合穀價甚低，預計可得五十萬石。

4.用累進法以公價徵收地主多餘糧食，約可得五百萬石。

「註」累進辦法　凡地主有租穀五十石以上者，徵百分之二，百石以上者徵百分之三，二百石以上者徵百分之四，三百石以上者徵百分之五，四百石以上者徵百分之六，五百石以上者徵百分之七，餘由此類推。

公價　公價之訂定，以較市價低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爲原則，因過低使人民蒙受損失，過高則易提高糧價。

計算方法　據糧食管理委員會統計，四川每年平均產稻一萬七千萬石左右，以徵收百分之三計，約可得五百萬石。

二、**糧食之存儲**　糧食之存儲，以省爲中心，計劃於各市縣平均分佈倉庫網，縣以下以區聯保甲爲單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責成各級行政人員存儲管理，除積穀原有倉厥，一仍其舊外，其餘糧食之存儲辦法如左：

1. 建倉　就廟宇祠堂或公共場所設法改建或新建。
2. 租倉　租用民間倉庫，給予租金。
3. 寄囤　寄囤民間，隨時由政府徵用。

**三、糧食之運用**　政府於糧食集中存儲後，其運用辦法有二：

1. 由省府估計糧食總值，向國家銀行抵押現款，以之支付政費。
2. 以所有糧食作爲保證準備，發行與存糧數量相等之糧食券，持券人可以之向糧食管理機關換取糧食，或按券面註明糧食數量所能代表之價值，作爲有價證券行使，流通市場。

**四、糧食券之分配**　查糧食市場之消費者，以公務人員軍警團隊爲主要，因多數之農民地主糧食多能自給，無須仰給於市場，但能實施糧餉劃分辦法，使市場主要消費者之食糧問題得一解決，則一方面可安定公務人員軍警團隊之生活，一方面可減少糧食市場之波動，糧價自易穩定。糧食券之分配對象如左：

1. 各級公務人員及其家屬。
2. 全省軍警團隊。
3. 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生。

**五、糧食券之流通**　發行糧食券之目的，在於使其逐漸流通，演化爲適應長期抗戰之新貨幣，預計中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程序如左：

1. 成爲有價證券　流通市場，調劑金融。
2. 穩定法幣　法幣價格之維持，主要爲外債、出口貿易、現金準備及政府收入等，在抗戰延續期中，上項維持物品，或將日形困難，能使代表實物之有價證券與法幣密切聯繫，可藉此穩定法幣價格。
3. 部分代替法幣使用　在敵人經濟進攻愈益緊急期中，將迫使游擊區內政府因支出激增所增發之數額，法幣價格愈難穩定，若能以糧食券部分代替法幣，大量流入後方，再加來敵人更進一步之進攻。

## 丙、補充辦法

爲恐上述辦法一時不能實施，茲並臚陳補充辦法如次：

一、田賦徵糧辦法，暫緩實施，本年秋收後，全省積穀學田公產等之收入，市場出售，以之作爲保證準備發行糧食券，實施糧餉劃分辦法。

二、本年秋收後，一切米糧，除留糧食所有者生活所必需之數量而外，一律由政府公價收買，禁止，須遵政府規定之公價，運銷須得政府許可憑證。

以上條陳對川省田賦徵糧與實施糧餉劃分辦法各緣由，是否有當？敬祈鑒核採擇施行，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青年勞動服務運動的意義

## 一

「勞動服務」一名詞之出現於中國，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遠在八年抗戰以前，總裁對教育界和學生演講的時候，就嘗以此工作相勗勉；惟成爲青年運動之中心任務者，卻是抗戰以後的事。尤其自三民主義青年團產生以後，總裁告全國青年書中提出：「參加社會服務」爲青年團主要任務之一；於是「勞動服務」運動始普遍於全國。

我們在抗戰建國期間來號召青年參加勞動服務，實有莫大的意義。因爲人類文化的產生，全自不斷的勞動，由原始時代的闢大荒、驅野獸，以進於二十世紀文明時代，均爲過去人類實際的勞動所鑄成。如果除去了勞動，我們實在無法想像到所謂文化，是怎樣的一種形象，現代的科學、藝術、文學……與其說是人類才智的結果，不如說是人類在實際的勞動中，不斷的創建和改進所得的成就。

可是在我們中國近十年來的歷史中，士大夫階級「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徒尚空談，不務實際，有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論調，影響所及，一般人都鄙視勞動，大家都想不勞而獲，坐享其成。馴致生產廢弛，無視于勞動正是人類生活的源泉，沒有把智識和勞動相結合，使人類生活的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能不斷的改進，而招致中國生活方法長期的停滯，成爲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中外歷史上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正與南宋同時，但南宋留給我們的只是玄虛而不切實際的理學，而歐洲的文藝復興卻包含科學的進步的色彩。我們試把同時代的朱熹和牛頓的成就相比較，我們便會瞭解爲什麼歐洲社會的進步比我們中國快了百年以上？

今天要改進社會，發展文化，必須提倡「勞動」，重實際避空談切實實的把手腦運用起來。譬如中國革命運動自辛亥革命至今已有三十年歷史，就因爲缺乏革命黨員實際奮鬥的精神，所以主義無由實現，產生了今日嚴重無比的困難。斟正過去言而不行的弊害，而指示我們著重「勞動」，遇事必須身體力行，以實際的奮鬥來克服一切困難，創造生活與發展文化。

## 二

由提倡「勞動服務」，是歷史上必然的趨勢，因爲在私有制度出現以來，地主、資本家以土地資產作爲役使勞動者的工具，而佔有大部分的「勞動」歸於國家社會，亦不歸於勞動者，而歸之於地主和資產者所享受，所以在私有制度社會中，社會上大部分人飢寒交迫，輾轉在死亡線上，同時國家社會因爲缺乏共同的強有力的支持，常呈混亂崩離的現象，不時出現革命、動亂、經濟恐慌等事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近代進步的國家對於「勞動」均有合理的處置，或加以周詳的策劃，或加以強力的統制，使「勞動」有所貢獻於社會人羣，無論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他們所標榜的「勞動制度」加以強力而較合理的處置，則無二致。

我們中國一方面缺乏有計畫的進步的「勞動」方法，一方面尤缺乏爲建設國家改造社會生活的「勞動」，一般人不僅無視實際，而且自私散漫，不肯把自己的生命才力貢獻於國家，才使國家社會如此貧弱。今日的中國正處於生死存亡的嚴重局勢中，抗戰建國的任務，既須抵抗比我們富強的日寇，同時又須發展經濟，改革政治，充實國防，提高文化，以爲國家民族永久生存獨立的基礎。所以今日的中國，必須著重「勞動」，樹立「力行」的風氣，遵奉　總裁的指示，號召全國人民，犧牲其生命才力，爲國家民族而服務。尤其對於國家中堅的青年，必須策導他們普遍一致的參加服務性的「勞動生活」。　總裁在五年前曾經指示我們：「人類生存關係和一切進步，都是由於分工合作與協力互助而來。一個人離了社會連帶關係，生活便不能繼續，生命亦無法發展，因爲孤獨的生存，在人類幾乎自始就不可能。……」我們既做了一個人，便應當對於社會有所貢獻，爲社會而勞動服務，以促成社會的進步，增進公共的福利，在這樣嚴重的時代，我們應該倍覺剴切，倡成一個普遍全國性的「青年社會勞動服務運動」，以號召全國青年，共同努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們所提倡的青年社會勞動服務運動有三個主要的特徵：（一）生活勞動化；（二）勞動社會化；（三）勞動科學化。

第一、關於生活勞動化的主旨，已在前面說過，就是要革除過去一般人萎靡虛浮自私散漫的生活，而養成合理的重實際的生活習慣，總裁多年來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就是這個作用。

第二、勞動社會化，就是要使一般人的勞動，不要太自私，要盡量爲社會人羣而服務，我們的勞動務須帶上濃厚的服務性質，在抗戰建國的今天，每一個人都要參加戰時的動員工作，盡其所能以貢獻國家，爭取抗戰的勝利。

第三、勞動科學化，在這樣戰鬥的世界，個人如無一技之長，實在難能生存，更不能不早備生存競爭的力量，所以積極從事科學的建設，實爲建國運動之基本原則。總理曾經指示中國所最缺乏者爲科學，並指示要建設富強康樂的中國，必須將歐美的進步科學建設，努力迎頭趕上，那一部偉大的實業計畫，就是科學的建設中國的方案。今天要提倡「勞動服務」，絕不能墨守古舊的方法，必須加以科學化，提高國民的科學知識，培養國民的科學技能，並號召他們參加國家建設工作，以促進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

三民主義青年團提倡的青年勞動服務運動，是在這三個原則下進行的，而且爲培養大批的具有科學技能的勞動服務幹部起見，特分區設立青年勞動服務營，以提高青年服務的精神，鍛鍊青年康健的體魄，並授以各種科學智能，如交通、衞生、教育、工業、農業等技術，造就建設國家所必需的專門人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作爲青年勞動服務運動的骨幹。所以青年勞動服務營，卽無異於培養國防幹部的中央軍校一樣。

我們希望全國優秀的青年，能夠普遍一致的響應這爲國家民族爭取生存獨立的勞動服務運動，同時更希望全國青年努力科學研究，俾養成所以貢獻於社會人羣的方法，我們應該把它作爲青年運動的中心任務，而積極地參加，迅速地展開起來。

——錄自「勞動服務月刊」創刊號，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二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遠東比歐洲更重要

在九一八事變第十一週年的那天，雜誌的主辦人向我索取本期的文稿急待付印。據說，本期應當刊載我的文章的消息早已公布，有若干關心的讀者急盼一讀我所要發表的文章的內容，現在其他的文稿都已付印，只等我的文章交去便可指日出版了。事情如是的急迫，而我個人的時間又如是的分不過來，萬分無已，只得把我去年今天寫的，而「遠東比歐洲更重要」的這篇講稿所提示的問題，所顧慮的民主國家的危險，到了今日仍是依然的存在，也許更來似乎是因了情不可卻潦草塞責以應付熱情索稿的編者，而我本人的見地卻認爲在此文內所提示的問題，如果世界民主國家還不猛省，恐怕此文拿在明年的今日或十年八年以後的今日來發表，還是一篇頂新的文章，以下便是我的全文。

今天是「九一八」十週年紀念日。今天這個日子究竟是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喜慶節日，我們在過去四年零兩個月有多的喋血抗戰已經有了一些解答。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榮辱和個人的榮辱一樣，不是任何人能夠隨便加在他的身上，更不能由任何人能夠隨便代他洗滌掉，而純全在一個民族的自身，或一個人自己才能決定。比如說十年前的今天，我們的敵人乘我國的不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夜便侵佔了我們的瀋陽，不久更侵佔了我們東北數省，在敵人這樣的順利成功，當然他們自己認爲是他們國家的無上榮譽，而在我們當然成了空前未有的國恥。如果我們從九一八以後便接受了倭寇的侵略，忍受了這樣的奇恥大辱，而沒有七七以後四年來的喋血抗戰，那今天這個日子眞是成了我們一個百世含羞，愧見世人永世難忘的羞恥。自七七發動全民族對日抗戰以後，這四年國一致的民族團結，已經用鮮血來把這個恥辱染得血一樣的鮮紅，我們最後臨，更將把十年前這個日子的污濁洗滌乾淨，來換取民族無上榮譽的光輝。過，我們已經把敵人以爲這個日子是他們成功榮譽的紀念扭轉過我們這面來，而把他們所加於我們的恥辱奉還給他自己收受了。

在從前的美國有一種少數民族叫做「紅人」，他們的種族現在已所存無在雖然還留存在原始的狀態，但是美國的社會對於紅人仍然表示十分的尊崇紅人反有充分享受的機會。美國人何以要尊崇紅人，不是由於紅人的失敗，於紅人剛強不屈戰至最後一人而仍能繼續奮鬥那種勇猛的精神不錯，十年前大辱的日子，因爲十年前的今日敵人乘了我們的不備，以卑劣無恥偷鷄摸狗而我們當時卻無法加以有力和有效的抵抗。但自七七抗戰以後，我們已經表了我們對侵略者不計犧牲的英勇反抗，表示了我們維護正義和平自救救人的天來紀念「九一八」，已經不是如敵人所想像是他們的勝利榮譽，而是我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來我們所給予侵略者的打擊，從四年多抗戰所得收穫，我們不但已經雪了一部份國恥，而且我們四年多的抗戰，在我們國家一方面已經確切奠立了建國的基礎，在國際方面我們更成了反侵略陣線中最有力的一員，成了世界和平一個最大的礎石。我們何以有今天的成就，這是由於我們全國軍民喋血犧牲，自助自救，在我們的　領袖統率之下堅苦奮鬥換取得來的。

總裁今日發表了一篇告全國國民書，其中說明我們對日抗戰的意義至爲詳盡，更說明了我們對抗戰最終的願望也至爲明確，我們綜合他全文的精義約有下列數端，希望全國國民特別加以注意和了解。

第一、九一八表面上是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開端，骨子裏卻是暴日破壞世界和平，企圖征服全世界的開始。田中奏摺早已說到「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國策，不過在執行田中所定的是項步驟而已。因此不能把暴日驅逐出中國的東北，世界和平必永難安定，中國的對於抗戰在世界和平的任務上，必失去其意義。故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應和我們共同驅逐日本離開中國，離開中國的東北，永絕破壞世界和平的禍根。

第二、我們四年多來喋血抗戰，不惜任何犧牲，現在更在準備着忍受更重大的犧牲，是因爲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不容有一絲一毫的損害，我們非完全能夠驅逐寇軍於我們國土以外，澈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收回我們東北的領土，拯救我們三千萬東北的同胞，我們的抗戰是決不會停止的。我們不能收回東北，不僅在地理上失掉了國防的屏障，而且在國防資源上說簡直也就無法生存。東北與全國同胞的生命是整個的，東北四省的土地與全國的土地是完全整個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們整個民族和整個的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土是存則俱存，亡則俱亡，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這是我們天經地義的道理。

第三、總裁在民國三年到東三省考察回來，曾上　總理一個報告說明：「東三省不是國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國民革命最後的目的地。因爲東北問題乃是一個關係整個國際局勢和東亞整個的問題，所以不是我們革命之始所可解決，而必須求之於國民革命目的之達成才能解決。」全國的同胞們，我們要認清今次對日抗戰是一個革命建國的戰爭，是國民革命第二階段工作的完成，我們要建國必須擁護　總裁這個意見，我們要完成革命，更須要澈底達到　總裁收回東北，驅逐倭寇離開中國一切國土這個主張。

我在綜合我們的　領袖今日發表的告全國國民書精義後，我特鄭重在此附說幾句話。現在世界上或者會有少數友邦人士，由於他們不明瞭我們中國抗戰的意義和我們抗戰最終的願望，以爲中國的抗戰經過了四年重大犧牲之後，或者可以暫求一時的苟安，以解決當前的困難，而不知我們中華民族深深的體驗到，苟安不是求得和平的道路，眞正的和平是要在正義眞理顯明之後，和爲害和平的種種禍根根本鏟除之後才有保障，日本的軍閥不能驅逐出中國領土之外，日本危害和平的野心是不能消滅的。假使在十年前的今日「九一八」之後，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對於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暴行，不事苟安敷衍而加以有力的制裁，人類文化與世界和平所受的一切威脅，絕不至如今日之嚴重，所以我們應當以往事爲鑑，而不應再蹈以往的覆轍。

暴日侵華數年，已經到了疲憊不堪瞬卽崩潰的形勢，現在暴日所需要的是一時的苟安，以待時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陣線各國家如不趁這個時候加強對日的制裁，以促進暴日的崩潰，而將是今日從事於反侵略戰爭的民主國家，這是我所敢斷言的。中國是反侵略戰爭的一部分，中國對於當前維護正義正從事於反侵略戰爭的力，以奠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當前的世界形勢已很明白告訴我們，各友邦，當致其最大的忠誠與努洲，民主國家不能在這個時期，趁蘇聯正在堅苦從事於抵抗德國侵略之遠東問題的重要性，已超過於歐他日必然的在戰略上遭受德、義、日等國東西相應，使民主國家陷於兩際，合其全力解決遠東的暴日，國家將來對於世界和平與自身安危所付之代價，必千萬倍於今日了！面應戰之勢，這樣的結果，民主

使日本的崩潰，遠東問題的解決，先於歐戰勝敗決定之後，不但民主國家永免去後顧之憂，免去他日東西作戰，分散主力之危險，而且於戰敗日本之後，更可利用日本之資源、人力、船舶，以爲長期大陸封鎖以困德、意之武器。在此種形勢之下，中國之復興當已完成，中國之廣大資源人力，將爲民主國家最大之堡壘，以支援反侵略國家最後的勝利，這於人類永久和平的實現，必當加速其進程。西諺有云：「救人卽所以自救」，民主國家遠識之政治家必能洞鑑及此了。

——錄自「雜說」第五號，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遵奉　總理錢幣革命遺教發行實物貨幣奠立長期抗戰及建國經濟基礎案

（甲）錢幣革命之遺教與當前之局勢

一、當前經濟之危機，及其影響於抗戰建國成敗之嚴重，事實昭然，無待贅述，挽救之方，朝野上下亦既慮之熟而籌之詳矣。竊以應非常之變，當有非常之策，故　總理於民元因外蒙問題，舉國倡言對帝俄宣戰之際，先即通電，揭示錢幣革命之主張，以奠應戰必勝之基礎，其言曰：「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無過於財政之困難」，「況值非常之變，非先解決財政問題不能言戰」，「就財政上言之，無論有戰無戰，財政問題之當解決，必不容緩也，文於謀革命首要之時，已注意於此，定爲革命首要之圖。」吾人今日讀茲遺教，盱衡現局，殆信今日之危機，　總理實已先見及此，而欲突破今日嚴重之危機，亦非澈底奉行　總理錢幣革命遺教不爲功也。

二、當前經濟之危機，物價騰貴，爲一中心問題，而論者尤多以通貨實抗戰以來，通貨雖較增發，按之吾國今日，人力猶眾，物產猶豐，國富未盡其用，民力猶可負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雖實未覺其多也。觀於錢幣革命中之言曰：「紙幣之流於市面，則錢幣因之而多，雖多亦無流弊。」抗戰五年餘來，但見政府財政之蹶，不覺社會之困，如以此爲抗戰經濟之困難，實屬僅見其表。而此種困難之形成，亦決非由於通貨之過多，其所以成此現象者，究其主因，實爲法幣漸與實物脫節，而政府之支出浩繁有加，收入不足以相平衡之所致也。

## (乙)遺教之要義

一、吾人精研錢幣革命遺教，其中昭示之要義有三：

1. 貶金銀爲貨物，禁止其流通，以紙幣爲交易之中準。
2. 就國家賦稅收入總額，發行紙幣，人民必須以紙幣納稅。
3. 供社會流通之紙幣，悉由發行局兌換而出，人民必須以金銀貨物或產業兌換之，乃生效力。

以上三義，亦爲錢幣革命實施之程序。蓋初步爲貶金銀爲貨物，以紙幣爲交易及納稅之中準，現行之法幣政策，卽本此義。其次則人民以貨物或產業向政府兌換紙幣，卽總理前謂「現兌」辦法，使紙幣之發行悉能代表貨物，故雖多而無害。

二、基於上述之理，故知今日法幣所能代表之物，或保證法幣之價值者，至今已時久而逾少也。平時法幣價格之維持，主要爲外債、出口貿易、現金準備與政府收入，時至今日，因對外交通之梗阻，出口貿易幾于完全停滯；現金準備，因發行之激增而日形減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政府收入，亦以軍事範圍日益擴大，支出浩繁，稅收數額，不足以資供應，故法幣之發，實屬無可避免，法幣之增發愈多，則價值之低落愈甚，長此因循坐誤，而非常之策以更張之，則經濟危機之愈益嚴重，亦勢所必至也。

## (丙)今後之危機

今後經濟危機之益加深重，舉其大要，約有數端：

**一、淪陷區法幣之內流：**敵僞以政治力量，迫使其佔領區域內之法幣流入內地，以加強經濟之進攻，敵勢愈固，爲害愈大。蓋當前抗戰之危機，不在軍事、政治而在於經濟，敵人今後之進攻，足以陷吾人於困境者，亦端在於經濟，此誠不可不速圖自救之方也。

**二、國家支付數量增大：**抗戰之時期愈久，則戰局之規模愈大；戰局之規模愈大，則軍備軍需之所費，日見浩繁，因軍費之浩繁，非增加法幣之發行，不足以供支應，而增加發行之結果，則幣值愈低，物價愈貴，浸淫推演，必將至不可收拾之局，此亦必須早爲之防也。

**三、國家收入之不足供應：**抗戰既屬長期，則戰區之愈益擴大，與若干地區之暫時淪陷，亦或屬不可避免，戰區既擴大，稅收區域卽愈縮小，而國用則不能因而稍減，容納法幣流通之區域既蹙，則法幣之運用，必更不易靈活也。

**四、外債不足以應緩急：**外債本亦可引爲保證法幣價值之一端，但當茲對外貿易停滯，入口困難之時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外債亦已漸失其效用，故在經濟方面，建立自力更生之基礎，實屬刻不容緩也。

## (丁)本案之根據

一、錢幣革命中釋貨幣之效用曰：「貨幣者何，不過交易之中準，而財貨之代表耳。」原夫貨幣之演進程序有四：

1.以物易物時代。

2.以布帛刀貝爲中準之時代。

3.以金銀爲中準之時代。

4.以紙幣爲中準之時代。

凡上所舉，雖作中準之事物不同，其爲貨財之代表則一。惟紙幣之用爲中準，更有金銀介乎其間，即紙幣爲金銀之代表，金銀復爲貨物之代表，而其換取貨物之功用則一。但紙幣既能兌取貨物，即應直接代表貨物，實勿須金銀爲之中介也。即就貨幣之演進觀之，紙幣之代金銀，亦猶金銀之代布帛刀貝，當金銀爲交易中準之際，金銀即直接代表貨物，未聞更以布帛刀貝介乎其間，則演進至於紙幣，亦何能獨異前例。今日紙幣，尚保留金銀之分兩單位，乃過渡期之遺留，終必歸於淘汰。今以人力速其成，亦錢幣之一革命也。至若究其實用之跡，則世界各國，無論公私銀行之發鈔，除現金之外，有價證券及產業亦可作爲保證準備，產業固屬實物，證券乃未到期之實物也，以此而可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發鈔之準備，則鈔券已能直接代表實物，故知實物貨幣之施行，固不自今日始矣。

二、自實施田賦征實與專賣制度之後，政府所能掌握與支配之物資，不實未嘗充分予以利用，即以田賦征實一項而論，去年全國征購總額爲六千三百萬市石，即以每石值洋一百五十元計，總值已達一百萬萬元，而去年國家之歲出不過一今年征購之總額，爲一萬萬石，若以四川糧價，每石二百五十元計財力，使政府無形中遭受鉅大之損失。此外如食鹽、食糖、火柴、支亦殊相近。惟以流通運用方面，未能使物盡其用，故於集中存儲，既屬民生日用所必需，且總值數額甚大，財富如是之多，而政府掌握物資，未與貨幣政策相配合爲適當之運用而已。以此益信發行不足以使貨幣物資問題同時得適當之解決也。

## (戊)實施辦法

一、集中物資　物資之來源有四：

1. 田賦徵實，與實施專賣所得之物資。
2. 人民以「現兌」辦法，以其所生產之物資，向政府兌取實物貨幣
3. 政府用實物貨幣徵購所得之物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4.擴大國營生產事業後之生產品。

二、發行　爲統一實物貨幣之發行，調節物資之運用敏活，及穩定實物貨幣之價格，應先設立物資銀行主持其事，至發行之實施，可分原則與要點兩方面分述如後：

1.發行之原則有三：

甲、兌現——發行之數額，必須與實存之數量相等，俾能確切兌現。

乙、兌換——兌換之方式有二：

A、在發行機關或銀行，照市價兌換法幣。

B、在市場照市價兌換法幣。

丙、儲蓄——政府爲吸收物資，可獎勵存儲，照規定給息，提存時仍付予實物貨幣。

2.發行過程中之要點有五：

甲、分區——券面註明地區，必須在該區公倉，方能兌取，以免抵價區域之貨幣，皆至高價區域兌取，發生擠兌之弊。

乙、成色，由政府釐定其品級註明券面，力求其標準化。

丙、單位——應用統一之量器，並以一定之單位爲起點，每券所值之價格，但以大量物資，已爲丁、價格——因各地人力工資之不同，行使時以市價爲準，不預定其量額註明券面。

政府掌握，即對市場放任，亦決不至有較大之波動，徵之於田賦實實施後，糧價穩定之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形，殆有確信無疑也。

戊、物資製造工業，爲釐定各種物資之成色，統一量器單位，由政府設置各種物資製造廠。

三、發行種類　先就國家所能掌握者發行，現田賦徵實，已具成效，專賣制度，亦已次第實施，故可依實際之情況，逐漸舉辦下列數類：

1. 糧食——全部田賦徵實之所得。
2. 食鹽
3. 食糖　就全部專賣數額發行。
4. 茶葉
5. 棉紗
6. 布疋　就統制所能掌握之數額發行。

## (己)先就糧食試辦

實物貨幣之發行，事屬初軔，推行或多困難，故應先擇其管制已著成效者試辦，然後再推而及其他，庶更可期其成效。自去年實施田賦徵實以來，糧食之管理較多成效，且爲日常生活所必需，其價格之低昂，與其他物價息息相關，先行試辦，其利有三：

1. 糧食爲生活所必需，易於推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2. 可以之搭發公教人員薪金，安定其生活。
3. 逐漸流通市面，建立信用。

糧食中米麥二種，爲生產最多需要最切之物資，故擬先就米麥徵收額發行，試舉辦法如次：

**一、基本工作** 以糧食中之米麥爲準備，發行貨幣，其應事先籌計之基本工作有三：

1. 分區——米麥雖各地均有生產，但因人力物力之高低不同，交通之遠近不同，若非先定兌換之區域，難免有低價區域競趨高價區域擠兌之虞，故必須照以前地方區域，以防擠兌，而產銷分配，亦可藉此以資調節。
2. 存儲——米麥之體積既大，運輸尤感不便，必須建立倉庫網，以供存儲之用，倉庫網之建立，應依據下列各原則：

甲、分佈區域

子、在省以省爲中心，以縣爲分佈網。

丑、在縣以城區爲中心，以鄉鎮保爲分佈網。

爲調節上項辦法之不足，更可補充下列兩項辦法：

寅、以交通線爲中心（如公路河流暢通之地），以附近之地

卯、以產銷區爲中心，以附近地區爲分佈網。

乙、倉庫建立與利用辦法有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子、建倉——建立便於保管存儲之近代倉庫。

丑、租庫——租用民間倉庫。

寅、寄囤——寄囤民間，隨時徵用。

丙、管理機構　實物之存儲兌取，均在公倉，應由發行機關，派員負責管理，並組監察機關，隨時監督其發行，檢查其存儲。

丁、數量分配　實物數量之分配，應由主管機關按照產銷情形，統籌全局，調劑盈虛，務使每公倉均能保持相當之數量，適應該區之消費。

3.運輸——管理機關應具備自有之運輸工具，建立運輸網，隨時調劑各地之盈虛。

**二、流通辦法**　抗戰以來，物價騰貴，受害最酷者，爲定額收入之公教人員、軍警團隊，政府近雖有實施日用品定量分配之擬議，但一時尚不易實行，故實物貨幣，應卽先搭發此類人員，既足救濟其生活，同時亦可藉以實驗實物貨幣之成效。發行之程序擬訂如左：

1.全國軍隊團隊。

2.各級公務人員及其家屬。

3.各級學校教職員。

**三、監察機關**　發行實物貨幣，對於實物之準備數額，及存儲支配之檢查，極爲重要，應設立各級監察機關，執行其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1.中央發行機關，應照四行準備委員會之例，由有關機關合組監察委員會，其任務如左：

甲、隨時或定期檢查實物之存儲額，與物券之發行額，並公布其結果。

乙、釐定實物之成色。

丙、審核實物貨幣相互之比率。

2.各省區之發行機關，由當地有關機關組織監察委員會，其任務如左：

甲、檢查公倉之存儲額，及流通數額。

乙、審查兌換機關之收付。

丙、審核並釐定券面代表之幣值。

丁、收受有關實物券之糾紛，並爲解決。

## (庚)實施之影響

至於實物貨幣實施後之效果言，其重且大者，殆有四事：

**一、穩定法幣價值**　可自三方面言之：

1.實物貨幣發行之後，因其可流通市場，兌換法幣，無異卽爲法幣之保證準備，而實物貨幣乃各種實物之代表，於是法幣爲實物之保證準備，法幣與實物間，乃發生密切之聯繫，使實物成爲法幣一部份之政費支出，如數百萬之代表，而法幣因保證缺乏，價格日低之弊，卽可防止。又以政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軍、警、團、隊、公、教人員之薪給，在初卽可以搭成發給，既以減少法幣之支出，亦可藉此安定此定額收入人員之生活。至於國家一切稅收，除田賦外，一律規定必須以法幣繳納，使凡持有實物貨幣者，亦必以之兌換法幣，則發行既減回籠，復可因而增加，保證愈充實，信用價格，自因而提高。

2.敵人加強經濟進攻，迫使淪陷區法幣流入內地，乃必有之現象，但實施實物貨幣之後，既可部份代替法幣之用，且以物資之準備充足，對敵人之經濟進攻，自可應付無虞。

3.實物貨幣發行之後，物資既集中於政府，此類貨幣流通於市場，則現行法幣之結果有二：

甲、逐漸成爲實物貨幣之輔幣。

乙、因稅收及與實物貨幣交易額需要之加大，現在發行額，將嫌其過少，不慮其多。

## 二、澈底管制物資

1.田賦徵實辦法實施之後，一年以來，糧價之變動，較其他任何民生必需品爲小，其原因係政府掌握部份之糧食，則糧價必變爲平抑。基於此理，若政府能掌握各種民生必需之物資，存入公倉，發行貨幣，並斟酌其產銷盈虛，統籌全局，爲之調節，則其他物資之管制，價格之平抑，自更不成問題。

2.或慮實物貨幣發行之後，人民將競囤實物貨幣，或將演成囤積之弊，但囤積在於個人，始足居奇，而抬高物價，若物資已由政府掌握，則匪特無由囤積，卽令能囤積，於國家亦有利而無害。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實物已操之政府之手，若囤積實物貨幣，則適與平時正當之儲蓄意義相若，政府方面，當從而獎勵其保存物資，實勿庸加以阻止也。

**三、奠立民生主義之基礎**　政府若就田賦徵實所得，或所有糧食，發行實物貨幣，則此項糧食，漸可由掌握而進於公有，推而至於其他物資，莫不皆然，政府能掌握之物資既多，則國家之富力日增，而此大量之物資，又復爲人民所共有，則民生主義中，共有共享之境，至不難達到，同時亦爲最簡易最和平之辦法。

**四、奠立建國基礎**　實物貨幣之基礎既立，以我廣大之人力，富饒之物產，則國家之富力，將舉世無比，將來建國途中一切建設，均可自力自足，若謂戰後，必須利用外資方可以建設者，亦將感其不需矣。

全部　總理遺教中，民生主義之建議，特爲重要，亦爲向來之所忽略。錢幣革命爲實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最重要、最基本之點，此不過略舉其輪廓，在實施之進程中，自當有若干技術之問題，有待商籌研討，而本案之實施，更有賴於物資物價之管制。最近　總裁手訂之加強管制物價方案，尤爲實施本案之基礎，故謹闡述遺教，附抒己見，製爲方案，以備實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按：原文時間未詳，約在民國三十一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耕者有其田的理論基礎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值，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得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共棄之。」——一九〇五年同盟會宣言。

我記得在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後，總理提出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及手訂之本黨政綱政策草案於大會，其中有一段爲主張「土地農有」，我當時爲宣言審查委員之一，認爲此一主張恐與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時期，俄共爲號召農人自動起來沒收地主土地策略情形相同，結果將流於殘酷與暴戾，我竟提議將此一段文字刪去。我至今最不可解的是宣言審查委員中，有本黨胡漢民、戴季陶、葉楚傖諸先生及共產份子加入本黨之李大釗、于樹德二人，對我此一提議竟無異議而予以贊同。我至今想起了這件事，眞覺得幼稚可笑，無地自容。

「耕者有其田」這句話，總理提得最明顯，闡述得最詳盡，大約是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講述民生主義第三講的時候。同年八月在農民聯歡大會及同月二十三日在農民講習所的講辭中，更把此一主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說得非常的透澈。宣言及政綱的初稿在審查會中去掉的有兩個重要的部份：一是關於反帝國主義的條款，如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外國人在中國須遵守中國法律等；一是土地農有的問題。前者後來被　總理發現之後，特命廖仲愷先生臨時動議把它補入，土地農有部份則任其刪去，未予提及。我現在追憶　總理當時不在宣言政綱中堅持此一主張的原因，或許由於「土地農有」這一名詞，易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農民自動起來沒收地主的土地的殘暴行爲相混淆，同時又因當時本黨同志還不了解此一革命政綱的眞義之所在，提出得太早，反會招致出許多革命的阻力。　總理後來特別強調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的原因，或許是在避免「土地農有」容易引起誤會的緣故。

中國革命招致失敗的原因雖多，其中最大而最嚴重者，則莫過於革命黨人對於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實踐聯繫起來所致。的了解，更不知如何將革命的理論不求深切

總理在日，我們總以爲　總理的理想過高，而不遵照去做，所以中國革命不能使成功。自　總理捨我們而長逝之後，我們又只知道高喊　總理遺教的博大精深，更不知從篤行實踐中以證實　總理革命思想主義的正確和偉大。要補救我們所犯的此一歷史的錯誤，惟有反省，惟有從現在遵照他的指示切實的從頭做起才是出路。

自民國十三年　總理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之後，本黨同志中及社會人士，對於此一主張發生了兩種懷疑：第一，以爲　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受了當時俄國革命的影響才提出的。第二，在民國十三年以前，　總理關於土地政綱的著作和講演，都偏重在平均地權原則和辦法的說明爲多，絕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提到耕者有其田這個名稱。了以上兩個不易解答的難題橫在胸中，雖明知道自己的見解是錯誤的，反證。問題的重點，便是在。不僅多數同志們是如此，我也是如此，那麼，這怎樣辦呢？俗語說得不費工夫」，我對於此一問題能夠尋出答案，眞是一件萬分僥倖的事。

不久以前，有位青年黨年前便已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了答案。

在梁士詒的年譜中，在「二十四日前臨時大總袁氏電邀請晉京，晤商要政，至是抵北京，政府及市民爲盛大之歡迎。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二時後者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經營鐵路，延長二十萬里。袁微笑曰：『辦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練精兵先生送回行館，中山要先生談，問曰：『我與項城談話，所見略同，一事，我至今尚疑，君爲我釋之！』先生問：『何也？』中山曰：『中

的確這在研究　總理土地政策的人是一個極但卻不能提出有力的資料來作一不出「耕者有其田」這一名辭來的朋友劉泗英兄來看我，說他在「梁士詒年中的一件疑難，便於無意中尋出的主張，我立卽取閱原書，於是多年橫在胸大的謎，而不容易解答。我們有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有如下一段記統職後，周歷各省，宣傳主義。留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三四次談至二時後者。每次會晤，祇孫、袁及先生三大政，中外情形，論事最爲暢洽。一夕孫語袁，請袁練成陸軍一百萬，自任百萬恐非易事耳。』某夕夜深，我之政見，彼亦多能領會，惟有國以農立國，倘不能於農民自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求徹底解決，則革新匪易，欲求解決農民自身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說及此項政見時，意以爲項城必反對。孰知彼不特不反對，且肯定以爲事所當然，此我所不解也。』先生曰：『公環遊各國，目睹大地主剝削，又生長南方親見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張耕者有其田。項城以爲耕者有其田，係當然之事理也。』中山大笑。」

從上面一段記載中，我們不僅發現「耕者有其田」此一主張，總理已遠在民國元年時即已提出，而且還發現耕者有其田主張的理論根據，是在「中國以農立國，倘不能於農民自身求徹底解決，則革新匪易。」這在研究　總理的思想上是何等的一個重要發現！由此我們對於前面所提出的　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受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影響才提出，實在可笑。民國元年爲一九一二年，遠在俄國革命之前六年，此話從何說起。如果說民國十三年以前，　總理不曾提出過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我們有了此一論證以後，便可獲得答案了。

說到這裏，我們又要會發生另外一個疑難了，就是，既然　總理在民國元年即已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爲甚麼　總理一直到民國十三年才具體提出來？而且　總理在十三年以前闡揚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時代即已提出的平均地權的主張時，都只是在說明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是：「照價收買，照價納稅，漲價歸公。」這三項辦法的提出，是針對着解決都市的土地問題，或預防由於都市的興起，社會的進步，市地必然漲價，造成一些不勞而獲的現象才提出，是很顯然的，自此以後，　總理很少或甚至於沒有特別提出過農人問題和農村土地問題的解決，那又是甚麼緣故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要解答上面的疑問，我們必須知道三民主義產生的時代，才能說得明白。　總理在一八九五年倫敦蒙難之後，留在歐洲二年有餘，專心考察當時歐洲的情形，根據他的自述，他在此時，才發現當時的歐洲正是社會革命的風潮高漲的時候，歐洲人當時雖然是對於民族、民權兩主義已有相當成就，而歐洲人所面臨的則爲勞資經濟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在此時方才對立，社會革命的危機，因此他才創立民生主義來完成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這就是說他的政治革命已完成。此一時代正是十九世紀的末期，他正是由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發展成近代資本主義成熟的一個階段。在這一時期，一面爲無數工商中心的近代城市的興起，一面爲農村人口離開鄉村集中在都市，都市地價隨着人口增加與社會繁榮而逐步激漲，平時一塊不毛之地，轉瞬卽變作寸土寸金，因此遂產生許多不勞而獲的暴發戶，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　總理針對此一社會病態，卽將發生在中國，故才提出了「照價抽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的主張以作預防。同盟會宣言中所指的「核定天下地價」與「敢有壟斷土地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共棄之」，也就是指的這些事實。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當時的中國，似乎已步入近代國家建設之路。故都市的興起，人口的集中，與社會的繁榮和地價的飛漲現象，中國卽將不可避免。實爲當時必須面對的事實。我想這是　總理在民國十三年以前專注重都市問題的解決，很少提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以解決農民和農地問題的一個原因。

第二，自民國二年第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國長期陷於軍閥割據與內亂頻仍的境地。本黨在此時期處境艱難，無所憑藉。要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需要有一穩固的革命政權來推行，這是萬分必要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黨當時既沒有具備此一條件，而當時革命同志中又缺少革命理論的素養，對此一重大革命的土地改革政策，自難爲多數人所了解與重視，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　總理也就很少提及了，我想這是二個原因。

臺灣自實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之後，現在卽將在明年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了，這是中國革命經過了長期慘痛的失敗之後，我們尋求今後成功的明智措施。我們要保證此一政策的成功，我們對耕者有其田的理論根據有所了解，是十分必要的。本黨提示平均地權爲革命的中心主張，是遠在四十七年以前同盟會的宣言中，在這一時期，俄國的革命尚在萌芽幼弱的時代，列寧這些人物，尚不見重於世。至於　總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就我們所能引證的，也遠在四十一年以前，此時也早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前六年，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重點，仍然誤以爲本黨土地政策是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才有的，固屬無知；若謂共匪在大陸也正在高談土地改革，本黨不應於此時提出此一主張，那更是笑話了！

反共抗俄是一思想與理論的鬥爭，我們與共黨的衝突，不在政治的利害，而在思想與理論的各方面的不能相容。土地問題是此一衝突的重點之一，以後我將另爲文論之。

（四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錄自「出席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報告」附錄一，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耕者有其田的理論與資料

土地問題的解決，是中國革命最大課題之一。要徹底明瞭此一問題的眞實著作談話與演講的研究是萬分重要的。中國有句俗話：「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假定這句話我們可以引用來研究國父遺教，那麼在上面所說那些直接的材料之外，其他間接有關資料的搜集、審定和處理，同樣的是十分重要的。今天在研究　國父的思想學說上往往發生若干的困擾，也許就是由於我們單是從　國父已有的著作、談話、演講中各自片斷的引用，而沒有在其他方面找尋理論與資料，以作旁證的緣故。吳稚暉先生論　國父的偉大，是在像孔子一樣集當時學說思想的大成。有人以爲　國父是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學說思想的大成。我以爲這樣還不夠說明　國父思想學說的眞實。　國父生於科學昌明的十九世紀的中葉一八六六年，死於二十世紀的一九二五年，他的思想導源於十九世紀末期，而完成於二十世紀他逝世之前。他是學習近代科學的醫學的，他的自然科學的基礎十分深厚，所以他對社會科學的素養與一般沒有自然科學根底而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大有區別。因此我們研讀他由淺入深，引證平易，對一般民眾所講的道理最易瞭解，而對他所著的物質建設與「孫文學說」中各項科學的引證，讀起來便會感覺仰之彌高。如果說　國父的學說思想是「集大成」，我以爲應當是集古今中外學術思想之大成，尤其是近代的科學是構成他的學說思想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若干年來很想從兩個方向來研究　國父的思想學說；一是設法尋求出什麼書？這些書的著者的思想與　國父究竟發生了些甚麼影響和關係？譬如說：要研究　國父對土地問題的主張，　國父時時引述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著作如「土地與土地政策」、「進步與貧乏」、「土地國有論」等書是必需參考的。要知道「照價納稅」實施的效果，從前德國在青島的總督沙美博士Schrameir於他所著「膠州土地行政」一書是值得一讀的。此書從前民智書局曾有出版，由朱和中先生翻譯。說到沙美先生我在此處應當順便一提他的爲人和　總理的關係。在民國十三四年時，沙美先生是國父的顧問，也可以說是　國父的土地顧問。他當時提出了一篇改革廣州市地的計畫，　總理命我向他請教，並代他將原計畫翻譯成中文。我對此一工作正在着手進行的時候，　總理已經北上，在民國十四年　總理逝世之後，我正想把此一工作完成的時候，忽然楊希閔、劉震寰叛變，　總裁由東江回師討伐，迄至軍事結束，我又因事離開廣州。我還記得當海軍在長堤一帶開礮轟擊叛軍的時候，我被隔斷在廣州，河南與黃埔在廣州的對岸是政府的根據地，沿河兩面都在射擊，我無法走向大本營去，我於萬分無已當中，只得走到東山沙美先生家下躲避，最後還是靠他的掩護，我裝着他的侍從，由他帶我經過沙面安全渡到河南我軍防地。他具有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他對於　總理的崇敬眞非言語所能形容。那時沙美先生已經年事很高，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是戰敗國，他對我表示將以其餘年幫助　國父完成中國革命，在　國父逝世那一年他也就與世長辭了。我至今非常懷念他，他改革廣州市市地的計畫，我身邊已經沒有了，但是計畫的內容，我至今還可回憶出一個大概，有暇當另爲文記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除了上述研究　國父的思想學說方法之外，我還想從與　國父有關的人物和記載中找尋一些資料來。不久以前我所發表的「耕者有其田的理論基礎」一文中所引述「梁士詒年譜」一段話，便是在這一方向中所獲得的資料。由於此一資料所引起的討論固然值得寶貴，比這更寶貴的還有由於此一資料所引起其他資料的發現更值得慶幸。我在前面已經講過研究　國父的思想學說單從中去片斷摘取是不夠的，當前最重要的工作還在其他方面儘量搜集資料、審定資料，和處理資料三個工作。　國父逝世距今已快三十年，距同盟會時代卽已提出的平均地權的主張已快到五十年，在這樣長久的歲月中，我們對　國父的遺教究竟了解了多少？行了多少？說起來雖然是萬分的慚愧，但是我們從現在起就不停的和足踏實地的努力下去，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關於耕者有其田有關資料，目前在我手中的除了「梁士詒年譜」之外尚有下列數種，而此數種資料均非我自己直接尋求得來，而是由朋友同志所指示或供給我的。我不敢掠人之美，特把它寫在下面，以供大家的研究探討：

（一）章太炎先生與　國父論土地問題——見章氏叢書檢討「定版籍」，此一資料係由黃建中先生抄予。

（二）日本宮崎民藏所著「土地共享，人類之大權」——一九〇六年出版。民藏係幫助中國革命日本志士宮崎寅藏之兄，也爲　總理之友。他們兄弟對中國革命極有關係，幫助　總理極多。民藏係日本明治時代一個土地改革運動者，以時代推之，他與　總理早期之土地改革思想不無關係。此書已電託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東京的友人在日徵購，此一材料之發現，則爲鄭學稼先生所面告。

（三）王船山「噩夢」一書中也曾有論及耕者有其田的部份。

除上列一些有關資料之外，我認爲未被我們所發現者尚多。比如列寧所著「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一文卽其一例。此文發表於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涅瓦明星」第十七期，係對　總理一九一二年在比利時社會黨報紙「國民報」Le Peurle 所載土地問題的論文，加以批評而寫的。列寧的論點雖然與　國父的思想不同，但他對於　國父的推崇，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尤其是研究問題而能從反對方面的資料加以分析研討，更是可以發現一個思想的眞諦和偉大。關於此一類的資料，我在此處不必多所論列，我現在要介紹的是章太炎先生「定版籍」一文中，所載與　國父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有關的部份。此一資料的發現比「梁士詒年譜」所載更爲具體，更爲重要，時間也更爲遠久。

在定版籍一文中太炎先生與　國父的談話，考其年代似應在丁未（一九〇七）年以前，因爲在丁未那一年的正月，日本政府徇滿清公使楊樞的請求驅逐　國父出境，並餽送　國父路費數千元，　國父因此離日赴南洋。　國父臨走的時候特留給民報維持費二千元，不料竟因爲日本餽送　國父旅費一事，引起了太炎先生大發脾氣，大事攻擊　國父，並將民報內所懸　國父照像撕去，後來經何天炯一般同志解釋，此事乃歸平息。自一九〇七年丁未之後，辛亥革命以前，　國父留在歐美南洋一帶的時間居多，與太炎先生晤面的機會甚少，故本文所謂「清之末章炳麟謂孫文曰」想係在丁未年之前，至少也在辛亥革命以前，故本文所述　國父對於土地問題的主張，當比我所寫「耕者有其田的理論基礎」一文引證「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士詒年譜」一段話爲早，根據更爲確實。這一段年代的考證可以幫助我們解答對「梁士詒年譜」中所發現的資料可靠性的懷疑，同時更證明了　國父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不是民國十三年以後才有的，亦不是受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以後的事。

太炎先生在定版籍一文中，所述他對於土地問題的主張是嚴定土地等則，按等則徵稅，並從減租以輕農民的負擔。因爲原文敍述太長不便盡錄，我現在特將有關　國父對土地問題的一段寫在下面以供研討：

「清之末，章炳麟謂孫文曰：『後之林丞，覩生民之版與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衰賦稅，大減則充。……』孫文曰：『兼並不塞而言定賦，則治其末矣，夫業主與傭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給全賦，不任也；故取於傭耕者，率參其二，古者有言：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貧富斗絕者，寇盜之媒，雖然，工商貧富之不可均，其爲龍蛇象馬草樹雲氣山林海材也。圬人爲人黝堊，善畫者圖其幅帛而直百錢，或一日所成而直贏於潮灌火星辰人物舟車，變眩異態，於以緣飾牆壁，一也；然或一日所成萬金；輓步鞏者與主海船者，其爲人將行一也；一以爲牛馬，一以爲宗主，是豈可同哉？彼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餘壤，而富斗絕於類醜，故法以均人，後之林丞，不躬耕者無得有露田，場圃池沼止，露田者，人二十畝而止矣。以一人擅者，畎壟溝洫，非有其壤地；池之所有，隄與其所浚水容也；宮室之所有垣墉棟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無；故買鬻者庚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其勞力而已，非能買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貢徵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

從上面所述　國父對於土地問題的主張可歸納成爲下列各點：

第一、國父認爲不能防止土地集中，單是從定等則課賦稅不是根本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這是他與太炎先生主張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兼併不塞，而言定賦則治其末矣」的大意。

第二、國父認爲地主因爲要負擔田賦，故不能不加重佃農的負擔，有時常達三分之二，以少數私人而役使多數佃農，必定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這實在是社會禍亂的源泉。

第三、國父認爲從事工業的人，因爲技術有優劣，故所得的報酬有高下的不同。從事商業的人因爲經營有巧拙的差異，故其所得盈利多寡不等，由於人之才智有高下，經人之才力沒有關係，不應該由人世襲祖宗的餘蔭，擁有多數土地，造成社會的不均，故國家對土地可以用法律使之平均。

第四、國父認爲土地的性質包括兩個部份：一是自然的部份，一是經人力改良的部份，自然的部份不應當屬於私人，即「以天成者其所無」；經過人力改良的部份應當屬於私人，即：「以力成者其所有」。在土地買賣的時候，是限於處理經過人力改良的部份，「庚償其勞力而已」，不是買賣其自然部份，「非能買其壤地也」。

國父根據以上論點所以他的結論是：「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用現在的講就是不耕田的人不能有其田，換言之，只有耕田的人才能有其田，不勞而獲，坐享他人勞益的人不應當存在，這也就是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們今日所說的「耕者有其田」的道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是在消滅不勞而獲的剝削，使耕者能享受自己勞力的成果，做到這一點，農村地權自然平均，用不着在等則與徵稅上多用功夫，所以他說：「貢徵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

我們發現了　國父對於農地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一段資料以後，至少可以幫助我們解答目前關於土地國有與耕者有其田的若干爭論，認爲　國父對土地問題的主張是土地國有的人，可以引證出許許多多的理由來維護自己的論點。如果我們從上面所述　國父的談話，我們便知土地自然的部份當然是屬於社會全體而不是屬於私人，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應當是國家。所以國家爲了公共的目的得對土地及其他與人民權益有關的事爲重大的措施，如果國家沒有這個權力，那麼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便無法抑制，如此不僅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不能透過國家的權力達到，就是其他不平的現象，也將無法抑制，社會便永久不會公平和安寧下去。研究問題單從名辭術語上爭論不是一個好辦法，我認爲　國父在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的演講一段話，是十分重要的。他說：「……人類發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必長此存留。可見土地實爲社會所有，人於其間又惡得而私之耶？或謂地主之土地本以資本購來，然試叩第一佔有土地的人，又何自購乎？」要說　國父的主張土地國有，再沒有比這段話更有力量了。但是如果我們把這段話細細的去理解，仍然是指的土地自然的部份，或土地原始的性質，也即是指的「天作者其所無」，而不是指的經人力改良的部份「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力成者其所有，便是　國父解決土地問題主張耕者有其田的基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土地國有與耕者有其田字義上辯爭，既不能否定土地國有是原始的性質，也卽「天作」之部份，而不是　國父的主張，那麼一般所謂的土地國有是說明土地法是耕者有其田。近代對於土地問題的辦法可大別分爲三類：一類是維持現存地主私有土地的封建剝削制。二類是取消封建的剝削而把不勞而獲的收益歸諸耕者，卽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三類是俄式土地國有，把中間剝削的關係廢止，國家取私有地主的利益而代之，國家做了地主，農民變作了農工或農奴，蘇俄與大陸匪共所行的制度便是。耕者有其田與俄式土地國有，有一共同的地方，就是都要廢止中間剝削，兩者不同的地方是一個把私人地主中間剝削的利益歸到國家，一個是把此項利益歸到生產的農人自己。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在俄式土地國有的辦法之下耕作者變作了僱工或農奴，在耕者有其田辦法之下，耕作者便自己做了主人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知道　國父所說土地國有是在說明土地原始的性質，而不是否定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是很顯然的。要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是很顯然的。爲了要免去把問題混雜不清，絞在一起，我們在此處可以勉強把「土地國有」與「土地國營」分開爲兩個名辭，如果「土地國有」是指土地的自然部份，那麼一般所謂的土地國有應當與土地國營不同。像蘇聯那一套奴役農人的集體農場制度，應當是土地國營，而不是我們所謂的土地國有。

本黨總裁　蔣先生關於此點有一段精闢的議論，他說：「總理對人民的土地，使之集中於政府，徹底予以控制，用作控制人民的生命的工具，亦非如共匪今日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謂『土改』『分地』的方法，作爲其階級鬥爭，控制人民的魔術。」又個原則……就是在土地國有原則之下，允許私有財產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權）的合理存在。」

由總裁上面這段話可以發現他有兩個基本論點：一是他反對蘇俄和匪共那一套土地國有的辦法，二是他說明總理土地國有主張不過是一個原則，而在這個原則之下，同時允許土地所有權的合理存在。所謂原則在此處當然應解釋爲土地原始的性質是國家的，而不是說拿地國有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不然何得謂在土地國有原則之下，尚能容許私人土地所有權的存在，應當是指的耕作土地的農人，而不是指的不勞而獲，坐享農人以勞力換取來的收益的地主。

在太炎先生與國父把土地的性質分爲自然的與經人力改良的兩個部份，自然的部份就是「天作者」，在原則上應當屬於國家，經人力改良的部份，就是以「力成者」，應當屬於私人，耕作者自己。這對於總裁前面一段話，無異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和註定。

三百年前王船山先生在他所著的「噩夢」一書中就說道：人民生在土地之上，用他們自己的勞力，靠耕種土地來維持他們的生存，土地應當屬於耕作者所有，是當然的事。我現在把他的原文寫在下面，以作本文的結論。他在「噩夢」一書寫道：

「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謂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於王者，王者臣天下之民，而效職焉，若土則非王者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用資以養焉，有其力者制其地，故改姓受命，而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

——錄自「出席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報告」附錄二，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按：本文曾刊載於「中國內政」第四卷特大號，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四十一年度的內政

四十一年這一年，由於韓戰的拖延，無法解決，已充分的暴露出共產集團征服全世界的野心；相反的，已喚醒了民主國家幻想和平的迷夢。各民主國家，在這一年的警惕與努力，從各方面已證明，反共的民主力量，業已逐漸增漲，而共產集團的瘋狂勢燄，已漸趨入下坡之路。同時在自由中國方面，亦正在艱苦奮鬥，勵精圖治，在　總統提示總動員的號召下，從事四項改造運動，以作反攻大陸之準備。本人適於其時，肩負內政部現行掌管業務，包括前內政、社會、衞生、地政四部，勞働、人口、合作事業管理各局，以及警察總署、禁煙委員會等部門工作，業務範圍，至爲廣泛，究應從何處著手，確成問題。當經本人詳密考慮，決定施政重心，則爲如何改造運動，以作反攻大陸之準備。本人詳密考慮，決定施政重心，則爲如何改造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配合工業發展，以立民生之本，如何實行地方自治，建立民主禮俗，健全地方各級議事機關，以奠民權之基，如何改進人民團體組織，強化民眾組訓，增進國民健康，以固民族之根基，此爲本人就任以後，革興內務行政的目標。至於培養民力，以充實國力，建設臺灣，以鞏固反攻基地，加強動員工作，以爲反攻大陸準備，尤懸爲當前內政切要之圖。本人凜於職責重大，任務艱鉅，所以年來聚精會神，朝夕惕勵，希勉能遵照　總統政治改造的指示，擔負起修明內政，充實國力，配合軍事，爭取反攻勝利的艱鉅任務。回顧一年來的施政，檢討工作中之得失，又深慚雖已竭盡棉薄，然對於國家復興大業的貢獻，究屬不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爰特擇其要政，平實簡述，以爲介紹。

## 一、改善地方自治

臺灣省實施縣市地方自治，迄今已逾二年，經過兩年來實施的經驗，臺省的地方自治工作，確已表現了相當的成效。例如：（1）投票率之高，超過一般水準；（2）保障縣市長，不得任意調動，已樹立了文官制度的初步基礎；（3）確實做到一人一票，及秘密投票。此僅就其成效方面言，但在制度上、選務上，亦表現有不少的缺陷。這是任何民主國家，在實行民主的初期，所不易避免的現象，只要吾人虛心研究，不斷改進，則不難達到理想的境地，茲擇其要者分述於下：

㈠**修改地方自治法規**——臺灣省政府於本年九月間，將研究修改之地方自治法規十五種，呈報中央核示，當由內政部針對過去法規的缺陷，詳愼研究，參酌學理、考試實例，予以適時適當的修改。例如：保障山地同胞的參政權，重訂公民資格，增加縣市長自治監督權，實行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任期劃分，改訂自治財政，增訂縣市議長罷免程序，及實行選舉行政與選舉監察分開等項，均屬改進法規的精神所在。該項法規，已於本年十月間，由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公布施行。

㈡**改善選舉方法**——選舉權爲人民實行政權中的一種。如果選舉方法，規定未盡妥善，則不惟選賢與能，不易達到，而且亦易演成浪費違法的選舉結果。所以此次修改地方自治法規，對於選舉方法，特別重視，例如：（1）取消複選制度，採取英、美所通行的辦法，改以得票最多數者爲當選；（2）取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競選運動員辦法，僅規定每一競選人辦事處，得用三人至五人，以節浪費；（3）統一辦理競選宣傳，限制候選人的競選活動；（4）明定競選人的違法行爲，俾資警惕，嚴切遵守。過去縣市議員選舉，分爲六期舉辦，本年爲改進計，已改訂爲二期舉行。第一期選舉議員縣份，爲臺北、臺中、基隆、臺南、高雄等五個市及臺北、臺東、高雄、澎湖等六個縣；其餘十個縣，訂爲明年二月八日舉辦選舉。內政部爲貫澈　總統所昭示的節約、守法及選賢與能之三大原則起見，特派高級官員，分往各縣市，認眞督導。預料本屆選舉因方法改進，解釋統一，準備確實，戶口校正，定可得到預期的效果。

**㈢制定會議規範**——民權初步，爲社會建設之基礎。中國倡行民主，已數十年，而始終是蛙步而行，未獲顯著進步，推其原因，國人多重視制度的改變，而忽略傳達民主的方法。卽以臺省實行地方自治爲例，過去自治法規中，對於縣市議會的議事依據，未曾明確規定，雖縣市議會議事通則，經省府擬就，分發各縣市參照分別擬定議事規則，但繁簡不一，寬嚴各殊，而且多有不合民權初步的規定，致缺乏統一適用的議事規範，可資遵守。各縣市議會，兩年以來，開會次數甚多，議員發言，亦頗踴躍，但能求得合乎民權初步的議事，實在太少，所以對於議會的議事，迄今尚未能建立完善的秩序，無怪其對於傳達民主的方法，不能夠運用靈活，發生議事之效力，遂致社會建設，未能完成，政治建設，無有基礎，這是政治建設未能進步的重要關鍵。所以內政部爲建立民主政治的宏規，對於會議規範，不能不研擬頒行，現已將民權初步，經過演習階段，擬爲會議規範，一俟正式定案卽可公布，倡導推行。且已於臺灣省自治法規中，增加「縣市議會之議事，須依民權初步及中央法令之規定」一條，俾推行會議規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了法規上的依據。

## 二、加強戰區行政

金門、大陳及滇西一帶，均爲將來反攻大陸的跳板，關係非常的重要，本年國際局勢好轉，反攻急待佈署，中央爲適應需要，配合軍事計，特有以下三項的措施：

㈠**督導雲南省政府開展控制區域**——雲南省政府於四十年度正式成立後，卽積極推行工作，本年特准在滇西一帶，設置六個行政督察區，並經分別遴派專員，先後進入轄區，建立政權，或地下政權。所有戰區行政工作，正在積極開展中。

㈡**授權浙江省主席，斟酌需要，成立沿海縣政機構**——浙江省僅有溫嶺縣政府，在大陳島辦公，現沿海島嶼，多爲我游擊軍防區，或眞空地帶，爲配合軍事進展，擴充控制區域計，特授權浙江省主席，斟酌實際需要，分別成立縣政府，俾進入轄區，實地推行工作。本年十一月間，該省主席兼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呈請行政院，准予設立經濟處，以應需要，已由經濟、國防、內政三部，會商呈復行政院，准由總司令部內，設立經濟處。俟明年省府成立後，再依照戰區統一軍政組織辦法，將經濟處併於省政府內，以符規定。

㈢**商訂福建省政府組織辦法**——福建省政府，原無組織，所有省府行政務，係由金門行政公署負責推行。金門行政公署，爲一特殊的措施，具有省政府及縣政府的兩面功效。本年爲加強戰區行政，準備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攻計，特令福建省政府胡主席，籌設省政府組織，並按照戰區統一軍政組織辦法，擬具編制，呈報行政院鑒核，現已據呈，交由內政部會商國防部，決定編制單位及員額，呈復行政院核示中。

## 三、改進民衆組訓

四十一年爲動員年，民衆組訓，便爲動員工作的一種，所以本年度對於民衆組訓的工作，根據上年度檢討的結果，作積極改進的措施：

㈠**確定原則樹立目標**——本年國民兵訓練，開始辦理，國民兵之與民衆自衞隊的關係，急待確定。再去年考核民衆組訓，指揮不一，職權不清，亦須加以調整。且民衆組訓任務過多，期望過高，而其結果，輒又不能令人滿意。凡上述種種，均須早爲改善，爰經詳細研擬，由行政院制定改進原則七項，其中揭明民衆組訓之目的，目前爲「防空防護，輔助軍事勤務，及肅奸防諜」三項，使其目標顯明，任務確定，而易於生效。

㈡**調整指揮機構**——四十年度，關於民衆組訓的執行工作，歸民政廳省反共保民動員委員會，因爲配合的不夠，致使設計考核，與行政脫節，頗有抵觸行政三聯制的精神。本年爲強化民衆組訓執行機構的效能，特准臺灣省設民防委員會，統辦民衆組訓業務。現省民防委員會，已於八月一日成立，並對縣以下的組織，亦擬有調整辦法，着手整頓。反共保民動員委員會，及防護委員會，一律裁併於該會之內。到了這個時候，才算實現了一元的領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㈢**確定任務權責**——去年實施民眾組訓，最大的缺陷，是各縣市的權責不清，演成功則相爭，過則相諉的現象，影響民眾組訓的工作甚巨。本年將防空防護及肅奸防諜等工作，劃歸警察局主辦，將輔助軍事勤務，各工程運輸擔架搶修分，各有專責。所以本年各級人員負責的精神，及工作的表現，均較去年爲優。

㈣**整編自衞隊**——臺省各縣市自衞隊隊員，原編制有一百七十餘萬，人數雖多，而不精確。本年爲求精求實計，特由臺灣省政府，擬訂整編計畫，實施澈底的整編。整編結果，計臺省二十一縣市，一管理局，受編隊員共一、〇一四、二七二人，幹部共有一六六、八七五人，合計爲一、一八二、一三〇人，每縣市各組防護、消防、義警、醫護、工務、婦女等任務大隊，另有船舶聯隊及山地青年服務隊的編組，一律劃歸警察局負責。現各縣市民眾自衞隊，一律改爲民防總隊。而民防之體制，從此建立。

㈤**改進訓練辦法**——過去訓練，缺點甚多。本年訓練，（1）訓練時間，改爲四十八小時，較去年期長；（2）正受國民兵訓練之壯丁，不參加民眾組訓，已參加民眾組訓的壯丁，仍須參加國民兵之訓練；（3）先訓練幹部，而後再訓練隊員，方法較前確實進步。現臺省民眾組訓工作，幹部訓練，已於本年十一月底完成；各任務大隊隊員之訓練，一律自十二月開始，並限於一個月內完成。

## 四、革新戶籍行政

戶政爲庶政的基礎，關係非常重要，臺灣省各縣市的戶籍工作，素有基礎，因年來戶警聯繫不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致常發生磨擦。本年爲改善戶籍行政，嚴密戶口登記，配合各種行政實施辦法草案」，函送臺灣省政府，研究辦理。臺灣省政府，於本年要草案」一種，採取基層戶警機構合署辦公辦法，調整民警轄區，普除現有戶籍登記簿卡，業經省政府，逕呈行政院會議通過，轉奉　總擬訂試驗辦法，於九月份起在基隆市仁愛區、臺北縣新莊鎮、桃園縣察鄉實驗，俟著有成效，再普及全省。這種辦法，拋棄戶籍法，打破一種制度的改革，有利亦必有弊，現省政府正以試驗研究的謹愼態度，比較新舊辦法之得失，特擬具「戡亂時期改進戶口登記地考察，此項工作，尚未結束。其他關於戶籍行政的措施，如核定臺月十五日公布實施，限於二個月內，補辦戶籍登記。六月底，復擬具「整理戶籍計畫綱者，依照取締散兵游民辦法取締後，仍應強制其補報戶籍登記。

## 五、確保地方治安

臺灣省的地方治安，由於保安人員之努力，警察人員之維持，兩國，尚爲安定。惟匪諜如水銀瀉地，無空不入，稍一疏忽，即足以影以下幾種工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㈠**改善出入境管理**——臺灣省軍民出入境暫行辦法，經於本年核准加。爲便利民眾申請，准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成立軍民出入境聯合審進申請書格式。這裏有一個問題，因爲放寬尺度，可以使港澳難胞，回胞，回國服務，但相反的一方面，卽不能不顧慮到入境人的思想問題。前，由各調查機關，多方調查，迨入境以後，責由警察機關，按址偵察以來，無論管理與便民各方面，均較去年，進步爲多。

㈡**嚴密肅奸防諜**——肅奸防諜，爲治安上一個重要工作，這一種工手方法，一方面加強行政警察查察戶口，並實施突擊檢查，以防匪諜混術，並嚴密社會情報網，以期達成有匪必破之旨。就本年上半年爲例，，有九十二件，人犯三百十六名，協助其他機關辦理者，有五十五件，匪諜七百三十四人。至刑事方面，一至五月份，發生案件，四千四百七十七件，破獲三千一百三十八件，其破案比率，已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一至四月份，實施突擊檢查六百證、不報戶口，及違警、通緝人犯、散兵游民，共一萬零八百二十九人地方治安，自有相當的貢獻。

## 六、改善勞工生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改善勞工生活，增進勞工福利，爲政府歷年來主要方針之一，所以礦安全，福利設施，工資制度，以及漁民、鹽民、礦工生活的改善，無不積極設法，力求改善，茲摘要列述於後：

㈠**續辦勞工保險**——臺灣省產職業工人保險，自辦理以來，日漸推廣。截至本年七月底止，參加保險的廠礦企業工會等，計有一八一三三個單位，投保的勞工，計有九六四人，總計傷害、殘廢、生育、死亡及老年給付，共一二、四〇三、一三一、二四〇件，給付金額，計一二、六五八・五二元。以每一勞工，連同家眷，平均五口計算，已有九三四、八二〇人，獲得了保障。

㈡**籌辦職工福利**——臺灣省民營之工廠礦場，企業組織，及工會等委員會及福利社者，有三〇三個單位。其福利設施，爲食堂、浴室、宿舍、理髮、醫療、康樂、日用品供給、補習班及子弟學校等二十一項，全部受益職工人數，計一九六、二五九人。至國營事業單位福利機構，亦正督飭於公營事業工會組成後，一律依法改組，以期劃一。

㈢**改善鹽工生活**——鹽工工資，經行政院核准，就內銷食鹽，每噸按原價增加工資十四元，連同原有每噸工資二二・二〇元，合計三六・二〇元，自本年二月份起實施。三月份大汎季，鹽工工業及副業收入，每戶平均爲八三六・八〇元，小汎季每戶平均爲二六七・四〇元，較原有收入，顯有增加，鹽工生活，稍獲安定。

㈣**配給漁民布疋奶粉**——本年內政部爲改善漁民生活，曾會同經濟部等有關機關，派員組織漁民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活督導小組，前往南部漁村考察，建議改進事項甚多。本年由農林廳漁管處代理中信局，照配給農民用布成例，辦理配售漁民用布，按月配售細布一、三〇〇疋，分別配給各縣市漁會，轉配漁民。另由社會處，經洽請聯合國國際兒童急會駐臺辦事處，在臺中縣大安鄉漁會、高雄縣頂茄萣漁會等十五個單位，分別辦理供應漁村婦嬰食用脫脂奶粉，正計劃擴大供應的範圍。

## 七、實施土地改革

土地問題，是當前反共國家一個重要的問題。臺灣省自從實施三七五減租以後，農民生活，已確實有了很大的改進。但政府爲實施土地改革的政策，絕不能因農民生活，所以在本年度更進一步措施如下：

㈠**貫澈三七五減租工作**——內政部爲貫澈三七五減租政策，切實推行減租工作，除由臺灣省政府派員七人，分全省爲七區，常川督導外；並商得中國農村聯合復興委員會，給予經費上之補助，由內政部指派高級職員四人，分爲四區，巡迴督導各縣市政府，加強減租工作之推行，並督促各縣市成立各級耕地租佃委員會，委員均由民選，計全省選出租佃委員二、八四四人。

㈡**實施公地放領**——臺灣省公有土地，約十八萬餘甲，佔全省耕地總面積五分之一強。政府隨三七五減租之後，爲求進一步土地改革，乃決定辦理公地放領，以爲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示範。四十年度，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灣省劃出公地放領面積，爲三萬六千甲（除其中七千餘甲爲河川、道路、軍事用地及收益不可靠之土地外，實際爲二萬八千餘甲），至四十年十二月底止，已辦理完成。本年度內，臺灣糖業公司劃出耕地二萬九千一百甲，移交臺灣省政府辦理公地放領，惟其中原野、池沼、水路、道路基地、河川流失地，以及撥交軍事機關等用地，約六千餘甲。此外地質過劣，收益不可靠地，約三千餘甲，所以實際可以放領的土地，約二萬甲左右，業已由各縣市政府，先後分別接收放領，現在大體業已辦竣。

㈢**制定耕者有其田實施條例**——臺灣省土地總歸戶工作，自四十年九月舉辦，至本年三月底，業已全部辦理竣事。這種工作，是實施扶植自耕農，達到耕者有其田的基礎。所以爲求進一步的措施，本年度先由臺灣省政府擬訂扶植自耕農條例初稿，復由臨時省議會提出修正意見，復經行政院指定有關機關作多次的審查，始提經行政院院會通過，現已咨送立法院審議。惟此項政策，政府早已宣布，擬自四十二年元月實施，現由立法院內政、財政、經濟、民刑商法四委員會，聯合審查中。

## 八、改進衞生行政

衞生行政，爲現代民主國家一種重要的工作，本年度內，有幾種工作值得介紹：

㈠**登記醫師人員**——內政部辦理各類醫事人員登記，截至本年九月底止，計發給醫事人員職業證書一一、二二六件（包括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劑師、助產士、鑲牙生等）。現爲配合反攻時需要，正與軍醫署，籌劃醫事人員編組與訓練，以適應人力動員的要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㈡**防疫設施**——臺灣防治霍亂、天花等急性傳染病，因係全面辦理預防接種及注射，且其工作相當澈底，近三年來，幾已絕跡。本年春季施種牛痘，據統計接種人數爲六百九十九、八九七人。一般防疫工作中，尤以防治金門鼠疫，收效最宏。民國二十年，金門一次死於鼠疫者二十九人，死者二十四人，至四十年病者四十七人，死亡二十五人，幸防治得力，未致蔓延。因此，本年度爲求根本防治計，特派員偕同專家，前往金門指導，協助藥械，大量施行ＤＤＴ噴灑，卒使金門週期性的鼠疫，在本年內未有發生。

㈢**聯繫國際衞生業務**——本年五月，日內瓦世界衞生組織第五屆大會，及本年七月國際紅十字會，在多朗多舉行第十八屆會議，我國均有代表出席。而去年中國派員參加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衞生會議，獲得補助我國預算，計一九五二年美金二〇九、九四七元，一九五三年美金一五〇、五一六元，兩共三十六萬零四百六十三元，爲該區域之補助國家中之最多者。至於聯合國兒童急救基金會，對於中國衞生工作，亦有配合。本年已核准用於兒童衞生經費，計防癆十五萬美元，營養一萬一千美元，婦嬰衞生三萬四千美元，砂眼防治一萬美元。另有花柳病防治三萬七千五百美元，防癆卡介苗四萬美元，兩項預算，尚待核准。而農復會協助臺灣省衞生事業，尤有足多者。

## 九、整頓人民團體

關於這一件工作，可以分爲兩方面列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十、救濟港澳難胞

㈠**整理全國性社會團體**——政府遷臺以來，內政部對於全國性人民團體，業經予以重新登記。年來新成立的團體，亦復不少，截至目前爲止，計全國性職業團體十五個，社會團體一一一個，其中組織健全，而有工作表現者固多，而僅存團體名義，並無實際活動者，亦屬不少。爲配合動員業務計，應健全人民團體，賦予動員業務，經規定全國性社會團體的理監事任期，依章已屆滿限期，即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檢討工作，舉行改選。如無法開會改選者，一律撤銷其立案，停止活動。至遷臺的社會團體，總數計七十四個，應加整頓者爲三十四個，其遵令召開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進行改選者，有十八個團體，連同以前自動舉行會員大會，經改選完竣者，共四十五個團體。

㈡**改進臺灣農會**——臺灣省政府曾提出報告及建議後，臺灣省各級農會的改進，自去年安德生博士提經兩部會商，擬定六項原則呈復研擬「臺灣省各級農會組織辦法」呈院，經交內政、經濟兩部核議，比參照兩部所提六項原則，重加修改，擬成「臺灣省改進各級農會暫行辦法草案」，於四月間，提經行政院政務會議討論，經決議交付審查。此事關係社會民生至鉅，各方意見紛歧，不易集中，幾經研討，始擬定方案呈院，經院會通過。其主旨在淨化農會會員，凡不合於農會法第十三條規定資格者，改爲贊助會員，不參加農會決策機關，除在不超過監事名額三分之一的範圍內，得當選爲監事外，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年來救濟大陸流亡難胞工作，仍督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把握重點，積極推展。其中最重要的救濟工作，當推港澳難胞的救濟。茲摘要簡述如下：

㈠**港、九方面**——流亡港、九難胞的入境問題，經行政院核定之「便定」之三項辦法，簡化難胞申請入境手續。截至本年七月底止，調景嶺及東華三院來臺難胞，先後共有三、六九九人。每次難胞乘輪來臺時，均由有關機關派員前往歡迎慰問，並發給每人慰問金五十元，半價火車換票證一張，以應臨時需要。

㈡**澳門方面**——流亡澳門難胞，約有三萬餘人，生活尤苦，去年特商由澳門政府，在氹仔島籌設難民收容所一處，以資收容。並飭由救災總會，於去年八月及本年四月，先後配撥新臺幣十五萬元，每月撥補港幣五千元，配合澳門政府集中救濟。

除以上救濟外，其來臺難胞，生活非常艱苦，本年曾飭由社會處舉辦類多人地生疏，求職不易，爰決定輔導難民就業原則數項，交由救災總會洽商省工礦公司，由其經營之企業內，撥租能容納多數勞力的工廠及農地，以安置來臺難胞，使其能從事生產，自力謀生。一面為解決難胞就業及增加生產計，曾研訂計畫，交由救災總會，擇定臺北縣新店鎮公舘里地方茶園熟荒四十甲，闢設實驗農場，收容難胞二十戶，共一百餘人。年餘以來，原種的花生，已經有收穫外，所有各戶餘地，均開荒種植山芋、菜蔬、玉蜀黍等，增加副產，如養豬飼鵝等，以期達到自給自足之目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綜上所述，可知四十一年度內，在內政方面的措施，論其性質，確均非常的重要，但這仍不過爲局部的事業，尚不能概括內政的全般業務。例如尚有（一）續辦內務行政人員之儲備，（二）海外難胞之救濟，（三）合作組織之整頓，（四）環境衞生的改善，（五）工礦安全的檢查，（六）出版事業的輔導與管理，（七）民間防護設施與訓練之加強，（八）警察素質之提高，（九）不良習俗之改善，（十）山地行政之改進，（十一）國籍行政之推行，以及（十二）反攻大陸計畫之準備等，亦均屬內務行政的工作範圍，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紹。當然，在上述的工作當中，有些確已表現出相當的成果；但亦不可諱言的，有些工作表現，確又不能盡如人意。細心的檢討，坦誠的反省，在這一年的努力當中，所遭遇的困難，可以說是受了客觀條件的限制，所謂客觀條件，是指財力與制度，因此尚不能使從事內政工作人員的力量，獲得充分發揮的機會，這些事實，都待於下年度的研究與改進。

——錄自「中國年報」，中國新聞出版公司發行，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實施耕者有其田工作報告

## ——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立法院報告

自從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由貴院通過公布施行之後，次一步重要工作便是擬訂施行細則。施行細則是在執行程序上、技術上及其他事務上根據條例之規定，再作更爲詳密的補充，使各級執行人員及人民更能明白遵行。關於施行細則，前由臺灣省政府依照條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擬訂。該項施行細則全文共計八十七條，內容非常詳細，對於各項工作的進行方法，規定得尚屬週密，本部審查時，除其中與條例立法原意不符，或與其他法律衝突者加以修正外，大部份均保留原條文精神，以便切合實際情形，刻該項施行細則已經行政院核定，送請貴院備查。茲再將細則中的重點摘要報告如下：

**㈠都市計畫實施範圍內出租耕地之徵收問題**　查都市計畫之擬訂，依照預期當地三十年之經濟發展及建設，故各地都市計畫之完成，有需要三十年後始能完成，亦有百年之耕地全部免予徵收，是與實施耕者有其田的精神不符。惟爲顧及都市之發展及建設，故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業經公布都市計畫實施範圍內之出租耕地」免予徵收，以都市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畫實施範圍爲標準，而不以全部都市計畫爲範圍，庶使實施耕者有其田設，此爲立法之本意。惟「都市計畫實施範圍」之定義，條例中並未確定，於是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復加以解釋謂：「都市計畫實施範圍係指都市計畫內已實施建設之地區而言。」並由臺灣省政府訂定七項標準：（一）耕地業已變更使用有案者。（二）耕地雖未變更使用，而奉准建房者。（三）擬卽實施建設之地區，已有計畫並在本年度列有預算者。（四）申請建築或臨時建築已正式提出申請書，經主管機關初審合格者。（五）已訂定分區重劃或正在辦理中者。（六）已辦理土地使用計畫（如工業、商業、住宅區等）並已開始實施者。（七）一區段內其四周已依都市計畫修建道路水地政策能與都市建設互相配合而不妨礙。

㈡**視爲未移轉耕地地價補償問題**　條例中並未明白規定，爲一漏洞，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特加明白規定，卽徵收視爲未移轉耕地之補償向耕地承受人爲之，以免被徵收而又得不到地價補償。

㈢**老弱孤寡殘廢定義之確定**　條例第八條第二項僅指明「老弱孤寡殘廢藉土地維持生活者，得照標準保留耕地」；但對老弱孤寡殘廢之定義未曾確定，難免引起爭執，細則中於第十七、十八兩條予以明確規定，以杜爭執，並使執行人員有所遵循。

㈣**確定教育團體、慈善團體、公私企業、宗教團體及農業試驗研究或指導使用機關之範圍**　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亦未曾明白指出，細則中第二十一、三、五、六、七條分別將其定義及範圍明白指出，以免紛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上爲施行細則中最重要之處，值得向各位報告者。至於耕者有其田工作之進行概況，臺灣省地政局前曾擬定工作進行程序，各項工作均能依照程序及預定進度完成，預計在本年六月一日可以開始徵收工作。關於公營事業辦理估價情形，亦在積極進行，行政院已組織公營事業估價委員會負責辦理，截至今天爲止，已完成了造紙、肥料、水泥三個公司之估價工作。依照各項情形來看，實施耕者有其田工作，本年內定可順利完成。考其原因，約有下列數項：①地政工作基礎作得好，因有「三七五」減租及地籍總歸戶的確實資料作根據，故進行容易。②地政幹部工作熟練，均能不怕勞苦，奮勉工作。③臺灣省地區小，人力財力又集中，容易顯出成效。④本省同胞富於守法精神，能夠切實遵行政府法令。⑤地主思想開明進步，協助政府貫澈政策。

其次，要向各位報告的，就是有人懷疑以爲耕者有其田的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去年政府卽已決定實行，各地農民都已知道；但據臺灣省地政局報告的數字，去年（卽四十一年）一年內買田的佃農，全省有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戶，購地面積爲一萬零九十三甲餘，比四十年（五千八百八十五甲）幾乎多出一倍，去年一至六月祇有二千四百零四甲，七至十二月則有七千五百一十九甲。又僅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四縣市，自去年十二月至本年三月，在此短短數月內，購地佃農卽有四千二百八十戶，購地面積則有二千二百零三甲。從上述的數字看來，足見傳說因爲實施耕者有其田致使佃農不願自動購地的不確。

——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第一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四十二年度的內政

四十二年這一年，是我們加緊準備反攻最重要的一年，本部主管內政，業務龐雜，應該推進的工作，比以前更爲繁重。我們本著從進步中求安定的基本原則，在賡續四十一年度工作成果及應本年度實際需要的前提之下，提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加強反攻準備及充實地方自治基礎四項爲施政重點。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方面，力求既頒條例之徹底實施；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着重改善礦工、鹽工、林工及漁民生活，並籌劃輔助人民就業，推展環境衞生及各項防治工作，增進國民健康，救助大陸流亡難胞，使能參加生產工作；在加強反攻準備方面，爲研擬各項有關之政策制度及法規，推行義務勞動，適應國防與經濟建設之需要，改進民防組訓，完成人力動員之準備，改良戶籍行政，建立完善之戶籍制度，加強沿海各省戰地政務，以配合軍事上之進展，建立新徵兵制度，充實兵源之儲備；在充實地方自治基礎方面，著重健全縣市以下鄉鎮村里基層組織，並提高其幹部素質，倡行會議規範，以建立民主禮俗，推進新社會建設運動，轉移民間風氣，加強警察業務，確保地方治安。一年來對上列各項目的實施情形，因限於篇幅，不能逐一介紹，茲僅提要，擇其效果顯著者分述於後。

## 實施耕者有其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實施耕者有其田是本年度的中心工作，自「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後，行政院乃明令指定臺灣省爲施行區域，由臺灣省政府根據該項條例擬訂「實施耕者有其田施行細則」，報經行政院核定，遂即着手積極進行，二、三兩個月份內，訓練基層領導及執行幹部三、二八五人，輔助人員如各級租佃委員三、〇三二人，村里長、幹事、地主、佃農、自耕農代表二六、一四八人。一面自三月十五日起實施耕地複查，完成佃農承租耕地，自耕耕地及地主戶地複查表四百八十六萬張，並查註地籍藍圖四七、四六四幅。複查完畢後，各縣市鄉鎮分別編造各種保留徵收放領清册。是項清册，於五月間公告，六月二十一日起辦理，補償地價發給原地主，九月二十一日起，又全面辦理兌付第一期實物土地債券，現各縣市正徵收第二期地價中。

本部爲貫徹條例的實施，曾會同中央各有關機關組織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聯合督導團，由政務次長率領，在六月及十月，兩次赴各縣市實地督導，並派高級主管人員經常赴各處視察，藉以明瞭實施情形，及地主農民與社會上一般人士的反應和心理狀態，供督導改進的參考。此外，四月初設立實施耕者有其田工作聯席會報，邀請財政、經濟、司法行政等部，主計處、農復會及臺灣省政府參加，共策各項準備工作及有關問題的通盤籌劃。六月初，復會同臺省府邀集各有關部會及省府各廳處局成立實施耕者有其田案有關問題處理委員會，繼續各項有關問題的研討及處理。此一艱鉅任務，由於政府的政策正確，法律的完善，準備的充分，以及　總統的英明領導，行政院陳院長的勇於負責，各級執行人員的努力，與業佃雙方的赤誠合作，得以順利成功。茲將實施成果的初步統計開列如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耕地徵收放領**　臺灣省原有出租耕地面積爲田二一九、七一〇公頃（甲），畑三四、二四六公頃，共計爲二五三、九五六公頃，徵收放領的田爲一二一、三八九公頃，畑二二、一七五公頃，共計爲一四三、五六四公頃，在全部出租土地面積二五三、九五六公頃中，徵收放領土地面積爲一四三、五六四公頃，徵收放領的比例爲百分之五十六，尚餘百分之四十四，約一一〇、三〇二公頃，依照條例規定仍由地主繼續出租使用中。全省徵收耕地的戶數計一〇六、六七八戶，放領耕地戶數計一九〇、九九八戶，平均每一農戶領地約爲七分七釐公頃。

**二、補償地價**　全省應補償的稻穀總數爲十二億八千三百多萬公斤，計補償實物土地債券八億九千六百多萬公斤，公營事業股票三億八千七百多萬公斤，應補償甘藷總數四億四千二百萬公斤，計補償實物土地債券三億二千多萬公斤，債券與股票爲七與三之比。

**三、徵收地價**　本年第一期應收地價，實物部份爲稻穀六八、二三九、四一六公斤，甘藷折合現金新臺幣二三、八四〇、九六七元，到九月底止，已收起稻穀六七、三五七、〇五八公斤，達百分之九八・七一；甘藷折合現金新臺幣二三、五三五、四九六元，達百分之九八・七二。至第二期地價，因各縣市於十一月一日起方次第開徵，現在尚無全盤的成果統計。

至於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各項有關工作，如部份公營事業完成其轉移民營的工作，如何導使農業資金轉向工業，出售公營事業後所得價款的處理，用以興辦農貸，使農民得以自由購買地主保留的土地，或者興辦農業工程，或用以辦理兵工水利工程，以及債券股票的流通管理問題，因爲牽涉較廣，均在分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積極研擬辦法中。

## 改進地方自治

臺灣省實施地方自治，迄今已逾三年，我們本着試辦中求成功的原則，隨時從實際經驗中謀求困難的克服與缺點的改正，本年度改進要點有三：

**一、健全基層組織**　地方自治的順利推進，首在健全基層組織，本年度臺省府爲奠定寶塔式的政治，針對各縣市鄉鎮村里組織的缺點，擬訂「健全鄉鎮村里基層組織綱要」一種，呈經行政院核定，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該項綱要可歸納爲七個重點：（1）加強鄉鎮長職權，使能對轄區內各機構如衞生所、國民學校、警察派出所（或分駐所）及各人民團體作統一的監督；（2）簡化鄉鎮市區公所組織，按人口、面積、交通、工商業、耕地及縣政府所在地等條件調整其編制員額；（3）自治人員改爲專任幹事，從寬撥支村里辦公公務員，其任用銓審均依照現行公務員有關法令之規定；（4）設置村里加強自治幹部訓練，督導進修，以提高素質；（6）村里設鄰長會議，鄰得設戶長會議，以加強村里以下的自治組織；（7）劃分鄉鎮市區公所與村里職權，以糾正權責混淆之積弊。預料此一綱要的實施，必可使臺省地方自治工作，有顯著的改進。

**二、改進地方自治選舉**　去年十月間，本部根據過去督導經驗，將臺省自治法規十五種予以適當的修改，並特別注意選舉方法的改善。本年二月，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第二屆議員選舉辦理蔵事。本年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臺灣省臨時省議員及大部份縣市長任期都告屆滿，本部復商同省政府就全部選舉法規實施後的利弊得失，再作詳密徹底之檢討，直至十一月，完成所有選舉法規的修改，此次修改要點爲：（1）規定婦女和山地同胞在臨時省議會及縣市議會議員中的保障名額；（2）確定選舉監察機構性能，擴增各級監察委員人數，並將投票所監察員改由縣市監察小組聘派，使行政與監察體系分開，互相監視，以防弊端；（3）取消候選人設置運動員辦法，採用公辦選舉制度，並將去年修改之妨害選舉取締辦法對於候選人活動限制的尺度酌予放寬；（4）臨時省議員改爲直接選舉制，達成全面普選；（5）規定縣市長候選人的積極和消極資格，切實做到選賢與能；（6）縣市長選舉取消過去過半數當選的規定，改以得票最多數者當選；（7）取消省議員出缺補選的規定，採行候補制度；（8）縣市各級自治行政首長出缺，採補足任期制；（9）簡化選舉次數，將省議員任期改爲三年，與縣市長選舉合併舉行，以節省人力物力，並符便民之旨。現在決定全省二十一縣市除苗栗、臺東兩縣因任期屆滿距離過遠，另行辦理改選外，其餘十九縣市縣市長與臨時省議會議員，訂於四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及五月二日兩次同時投票選舉。

**三、增闢自治財源**　自治財政爲開展自治事業的動力，關係極爲重大，目前臺省各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市公所財政收入已較過去增加。縣市方面，依照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三十八條的規定，有二十二項收入，其歲出預算，對於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衞生保健、社會救濟各項支出綜合百分比不得低於百分之六十，鄉鎮縣轄市依照綱要第四十條規定，有十二項收入。此外本部更督導臺省府清理地方公有財產，已使自治財政基礎大體建立，本年爲增強自治經費來源，俾能自給自足，並謀鄉鎮民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同福利起見，復督導臺省府擬訂鄉鎮公共造產實施辦法，規定各鄉鎮因時因地就（1）墾種公有荒地或公有山地，栽植各種農作物或各種林木；（2）利用或興建公有魚塘，養殖魚類；（3）經營牧場或飼養牲畜等三種事業選擇一種或數種切實經營，其所得純利，除保留百分之二十作爲充實造產資金外，其餘百分之八十，自治事業經費應佔半數，該項辦法已於十月間奉行政院核定公布施行。

## 加強閩浙兩省戰地政務

閩、浙兩省戰地行政設施，去年度已樹立初步基礎，本年爲適應戰地需要，爭取沿海民心，以強化反攻態勢，特進一步督導加強各該省區地方行政工作。

**一、福建方面**　省政府與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軍政統一編制，去年底由本部會同國防部審核蔵事，本年初呈奉行政院核定施行。計設秘書、政務、經濟、參謀、補給五處，總員額爲七十九人，三月，省政府依照是項編制正式成立，省府委員十一人，亦經院令發表。該省金門縣原設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本年二月，解除軍事管制，恢復縣政府。五月間，胡主席爲積極策劃開展敵後工作，擬將馬祖行政公署撤銷，就馬祖、白肯、西洋、四礵、岱山、浮鷹等島嶼，分別成立省府閩東北行署及連江、長樂兩縣縣政府，此項計畫，呈經行政院發交本部核議照准，至八月上述各行政機構已籌設成立。又金門縣政府及鄉鎮組織規程、鄉鎮民代表會代表選舉罷免規程，先後由本部核准施行，該縣各鄉鎮民代表會，計劃於本年內選舉成立，至設立縣級民意機構案，現正由部審核中。六月間本部爲明瞭金門地方行政實況，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由政務次長率同高級主管人員五人前往視察，對於該地各項工作的推進，均獲有良好印象。

**二、浙江方面**　中央於四十年四月發表秦東昌爲該省省政府主席兼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惟省府機構並未設置，其業務係由總指揮部兼辦。本年二月間，督導該省政府在大陳成立，並爲強化戰地政治領導，展佈敵後政權，飭由該省府擬訂浙江省各級地方行政機構重建方案一種報核實施。此項重建方案計劃分兩期進行，第一期至本年八月間已先後完成，現已成立者計有溫嶺、玉環、平陽、臨海四縣縣政府，竹嶼、漁山兩管理局，各縣局組織規程，均經報部核定，其第二期及大陸沿海各縣政權之建立，正在積極籌劃中。又該省縣各級民意機構，預定自本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分期選舉設置，至該省各項政務，均訂有詳盡計畫切實推行中。

## 整理戶籍及籌辦戶口普查

臺灣省戶籍原有良好基礎，近年因政治情況變遷甚大，人口急劇增加，曾發現空戶漏戶，年來經積極整理，去年年終戶口總校正，甚少發現漏戶漏口，第二屆縣市議員選舉，亦甚少發生空戶及其他戶籍登記不實情事。爲加強整理起見，去年六月，臺灣省政府曾擬訂臺灣省整理戶籍計畫綱要及臺灣省整理戶籍實施辦法兩草案，並於九月間擇定桃園、基隆等五縣市的一部份鄉鎮區加以實驗。本部爲明瞭實驗的利弊得失，曾於去年十一月及本年一月，兩次派主管人員赴各實驗區實地考察，就所發現的優點和缺點，詳加檢討，提出具體改進意見，經函臺灣省政府並呈行政院參考，迄七月二十四日，行政院採納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部建議，將上項綱要草案修正核定，臺省府亦根據本部改進意見，將實施辦法補充修改，於十一月初呈奉行政院修正准予備案。其修改要點爲（1）劃分戶警權責，嚴密戶口管理；（2）統一上級指導，加強戶警配合；（3）調整民警行政區域，實施基層合署辦公；（4）活用新舊簿證，節省人力物力；（5）簡化登記程序，便利人民申請；（6）加強戶口查察，嚴密動態登記；（7）換發身分證簿，配合一般行政。此項實施辦法，已由臺省府公布全省普遍實施，省府並於十一月四日成立整理戶籍會報，預定明年三月一日開始換發新國民身份證及戶口名簿，至六月底全部完成。總之綱要和辦法經過這次審愼的修改，已能符合確實、嚴密、迅速、簡便的要求，並充分發揮戶警合一的原則，而過去戶籍上空漏頂冒的弊端，相信也可以因這次徹底的整理逐漸根絕。

其次在戶籍工作方面要提到的是籌辦戶口普查，戶口普查爲國勢調查的一種，是現代國家不能缺少的一種最基本工作，其直接目的，在明瞭全國人口狀況，以測知基本國勢，爲國防與動員的基礎；間接目的則爲供行政設施、社會事業及學術團體研究之用。臺灣在日據時代，自一九〇五年起至一九四〇年止，曾舉行七次戶口普查，所得結果，一般人口學家都認爲是遠東各地區當中最可寶貴的資料。我們爲適應國家當前需要，配合人力動員，準備在臺灣先行舉辦此項要政，以求明瞭人口組成狀況，特別注重職業分配情形，普查的標準日預定爲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需要工作人力五萬六千人，經費一九、五七四、〇〇〇元。本年七月一日，由本部會同行政院主計處組織行政院戶口普查統計委員會，由本部戶政司長、統計長、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局長、臺灣省民政廳長、警務處長、主計處副處長及專家五人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任委員，負責設計各項有關計畫及方案，現已擬具臺灣省戶口普查處組織規程兩草案，呈請行政院核示中。又戶口普查法係於三十六年公布，目前頗有不盡適用之處，已由部擬具修正案，送行政院主計處徵詢意見，預計全部普查工作在四十五年八月底完成。

## 改善勞工生活

**一、續辦勞工保險舉辦漁民保險**　勞工和漁民保險的工作，是近年來實施社會政策的一部份業務，在勞工保險方面，截至十一月底止，投保單位已達一、二九二個，投保人數計二〇二、九〇九名，給付金額達二七、四九八、六四一・五五元。第一期漁民保險，自三月份開始至六月底止，投保單位共四十五個，投保人數計三九、一〇五名，給付金額達二九、〇四五・一六元，第二期自七月份起開始舉辦，截至十一月底止，投保單位共七十九個，投保人數計五七、四八六名，給付金額達五三〇、〇二一・三七元，現正繼續舉辦中。

**二、實施工礦檢查**　徹底實施保護勞工立法，必須推行工礦檢查制度，使工廠礦場勞動條件及安全衞生設施，確能達到法律標準，藉謀勞工工作之安全。臺省於四十五年五月成立工礦檢查委員會，專司工礦檢查工作，截至本年十二月八日止，計初查工廠四三〇單位，複查一五八單位，工廠特種檢查九單位，檢查礦場一三三單位。在加強廠礦安全衞生設施方面，本年督由臺省建設廳向日本洽購卡達零暖計、坑內氣壓計、測風計、回轉理研瓦斯檢定器等礦場保安儀器共二十餘只，並督導平時雇用工人一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名以上之礦場一一二單位，成立礦場安全衞生委員會，舉辦礦工體格檢查，受檢人數計一九、〇一三人。

**三、改善漁民、林工、鹽工及一般勞工生活**　本年漁民生活之改善，除前述舉辦漁民保險外，尚有若干重要措施，如督導臺灣省政府擬訂各級漁會改進辦法，改組各級漁會，督導臺省合作金庫繼續辦理漁民生產貸款。關於改善林工生活，經督導各林場加強林工福利設施，計設立幼稚園、醫務室、洗衣室、理髮室、浴室、食堂、碾米廠、圖書室、康樂室等共八十二處，並加強辦理員工生產、死亡及難工等項補助與食米津貼。鹽工方面，上半年，臺省南部因氣候失常，鹽工收入銳減，經撥款一四八萬元，專辦鹽工緊急救助貸款，並舉辦第二區雨季鹽工生活救濟貸款計五三九、九一六元。此外，如開鑿淡水井，續建鹽工宿舍，充實鹽工診療所設備，核發鹽工子女獎學金，設立鹽工託兒所，日用必需品平價配售處及其他福利設施，均有顯著成績。至一般勞工生活方面，本年由部邀請對勞工問題富有研究之專家學者及美國國外業務署中國分署勞工福利專家，成立勞工問題研究委員會，經常開會研究有關勞工問題，力謀其生活之改善。此外並督導公私營廠礦三三〇單位，改組及劃一福利機構，受益職工計二〇四、二四六人。

此外有關勞工之國際重要會議，本年度前後派員出席者，計有第三十六屆勞工大會、第二屆國際勞工組織亞洲區域會議、第二屆國際自由工聯亞洲區域會議，國勞局化學工業委員會及國勞局理事院兩次會議。在技術協助方面，本年初與國勞局簽訂技術協助基本協定及第一第二號補充協定。七月間，邀國際勞工局亞洲合作工作團團長包倫度氏來臺考察，協助合作事業的改進。又我們曾請國勞局在臺設立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局或辦事處，以便加強聯繫，經該局局長派職員亞達氏於本年十月一日到臺，作兩週之考察，將以視察勞工情況所得的印象，轉報國勞局，對設立分局或辦事處的事以便有所決定。

## 健全人民團體

**一、督導改進農會**　本年度健全人民團體最重要的工作，是督導改進臺灣各級農會，我們知道農會的組織及其業務，在臺灣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項農會的改進，可以說是繼農地改革以後爲保障農地改革成果的一種必要措施，主要在加強農民本身的組織，進而達到互助增產的目的。改進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經廣泛網羅各方面意見，縝密研議，先後於去年八月及本年六月，經行政院核定，由臺灣省政府依照規定改組各級農會，其重點有五：（1）淨化農會會員，限制其資格，且須經嚴格審查，與農業無關的人員，不得滲雜其中，使眞正農民成爲農會組織的中心，使農會眞正成爲農民自己的團體；（2）對於熱心扶助農會業務的非農民，但居住於農會區域之內的，可以加入爲贊助會員，會員與贊助會員對農會應盡的義務，彼此相同，但在權利方面，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贊助會員除在不超過農會監事三分之一限度內得當選爲監事外，其他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至於其餘應享的權利，則與會員一樣；（3）劃分農會與其他農村特產產銷合作社的業務，以期切實保障產農的利益；（4）確定理監事會爲權力機構，代表會員來決定農會的大事，而將能力完全付託由理事會遴用之總幹事，總幹事向理監事完全負責，秉承其一切決策，經常處理一般會務，使理監事有權，總幹事有能；（5）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全農會的人事制度與會計制度，加強人事的考核與財務的管理，各級農日開始辦理，至十一月底全部復審完畢，全省會員合計三九五、二〇八人，贊助會員一九四、一二九人，前者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七，後者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三，繼會員資格審查之次一步的工作，爲召開各村里農事小組會員大會，全省預定在十二月份以內召開完竣。

**二、督導改進工會**　本年度關於工會之改進，除督導全國性工會團體依照規定按期舉行會議，檢討會務，訂定中心工作，督導繼續推進臺灣省公營、民營廠礦產業工會組織，及健全臺省各級工會組織外，最重要者爲督導產業職業工人納入工會組織，以配合動員需要。截至本年十月底止，臺省新組工會計五十六單位，會員共爲一九、八四八人，總計臺省現有工會三五九單位，會員一〇八、五三四人。

其次是督導全國性人民團體，分別就其性質動員各該專家研擬復員方案，以備政府採擇；督導地方性人民團體，配合動員需要，加強有關動員業務，均有相當成效。又截至本年底止，全國性職業團體共十個，社會團體一四八個，合計一五八個，現均已納入正規，各有其工作活動。

## 加強警察及民防業務

關於這兩項工作，本年度內有四點值得介紹：

**一、公布警察法**　我國警政建設，過去時張時弛，迄未臻於健全的地步，其主要原因係法制尚未完善，缺乏警察母法，零亂無緒所致。抗日勝利復員之初，國民政府爲結束訓政，進行憲政，並以推行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治，端賴警察，曾有革新警政之指示。本部前警察總署，遵即研擬院咨送立法院審議，時經六載，迭加修正補充，於本年六月二日三讀通過，同月十五日　總統明令公布。該法全文共二十條，對於警察的官制、官規、職權、教育及經費等均有明確規定，實爲我國行憲後革新警政劃時代的新法源，爲將來警政設施與制度建立的根本依據。

**二、提高警察素質**　提高警察素質爲本部三年來加強警察業務重心之一，本年度爲進一步加強警察教育，復將臺灣省選送現任警察人員入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官訓練班實施辦法加以修正，規定被選學員除服務警察機關年資以外，尚須具有高中畢業，經銓敍合格或服務期間有特殊功績表現等資格，並將入班受訓考試科目由四門增爲六門。此外本年四月、十二月，曾兩次舉行任用特種考試，四月錄取乙級警察人員一八〇人，十二月份考試甲、乙、丙三級警察人員，報考人數計七七五名，現尚在評閱試卷中。

**三、選訓優秀義警**　爲協助地方戰時警力之不足及儲備反攻大陸之警源，由部規定臺灣省應就民防隊義警任務隊中，選拔具有初中以上程度，體格強健，非適齡役男之優秀義警特別登記，加授警察勤務課程，經由臺灣省政府訂頒選訓辦法及各縣市分配名額，分期實施。計去年度選拔兩萬人，本年度增加名額一萬人，由本部先後派員考察，登記與編組工作早已辦理完竣，現正督導臺灣省警務處加緊第二期訓練中。

**四、調整民防業務**　臺灣省民防組訓工作，去年度曾經有一次重大的改進，其要點在整頓並健全指揮機構，確定任務權責，嚴密整編自衞隊，及改進訓練辦法等項，本年度臺灣省政府爲切實增強該省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防力量，配合國家總動員之目的，對於全部民防業務，再予以適當的調整。省級方面，將原有的民防委員會改爲專責設計的機構，而將實際的業務，按性質歸劃省府各有關廳處負責辦理；縣市級方面，撤銷民防總隊，改由警察局與軍事科分別主管。又該府爲整頓全省各縣市的民防部隊，擬訂臺灣省民防任務隊整編計畫綱要及督導實施辦法，呈經行政院發交本部核議照准，於十八日由省府頒布實施。依據上項計畫綱要，全省各縣市民防部隊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止，一個月內，整編爲防護總隊、軍勤總隊、船舶總隊、醫護大隊、婦女大隊、山地青年服務隊、機動技術搶修隊等單位，幹部隊員總共爲七六一、六〇二人，凡三十一歲以上之役齡男子，應以民防徵兵及齡男子，應以作戰爲主要任務；三十歲以下至每年大隊及婦女工作隊之編組年齡，一律以十八至三十五歲爲標準，已婚而有子女者免予編組，但志願參加者仍應編組之。在整編期間，省府派遣督導人員分五區督導，完成整編後並予初步點驗。

## 改進衞生行政

本年度衞生行政工作，最重要的有左列四項：

**一、加強防癆防瘧工作** 防癆方面截至去年底止，經督導中央衞生實驗院及臺灣省各級衞生機構，完成二十歲以下學生、嬰兒及一般人民結核菌素測驗一百八十餘萬人，其中一三〇萬已經卡介疫苗接種，本年度更加強辦理。其重要點爲：（1）分期訓練防癆工作人員，計X光技術人員三十六人，醫院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療養院護理人員六十人；（2）繼續實施結核菌素測驗及卡苗接種；（3）推行集體胸部檢查；（4）增設結核病床位，成立臺南結核病防治中心。此外，並加強防癆宣傳，實施貧苦患者免費醫治。防瘧方面，本年爲四年撲瘧蚊計畫之第二年，計施行臺省中部及北部地區家屋DDT噴射，受益者八十一萬多人，訓練DDT噴射指導員二四八人，施行瘧疾檢查一〇〇、八四四人。

**二、加強藥品之供應與管理**　臺灣省藥品之管理，原由地方辦理，自四十一年度加強管理並改善辦法後，藥荒及藥價波動現象，即逐漸平穩。成藥管理辦法，經改善登記及管理審查程序後，截至本年十二月份止，總計經查驗合格許可製造之成藥，計一百餘種。本部藥品供應處現能製造藥品三十餘種，一般藥品供應單位至本年底增至一八〇單位，麻醉藥品方面，本年研究完成一種新法，將鴉片中各種主要生物鹼充分提取，生產效力增加，品質亦見提高，目前已能充分供應各醫療單位使用。此外，臺灣血清疫苗製造所對各項生物學製品之產量及標準，均已顯著提高。

**三、登記醫事人員**　本部辦理醫事人員登記，截至本年底止，核准登記之醫事人員，計醫師五、四三七人，中醫師一、七五四人，牙醫師七八〇人，藥劑師九〇六人，護士八七〇人，助產士二、三〇三人，鑲牙生三二四人，藥劑生三二六人，總計一二、六一〇人。

**四、聯繫國際衞生組織**　本年國際鴉片會議、菲律賓汛太平洋結核病會議、日本熱帶病昆蟲學會年會、世界衞生組織大會、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會議，本部均派員參加，藉以增進國際衞生業務的聯繫與合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救濟大陸災胞

一年來大陸災胞之救濟工作，有左列五項：

**一、空投食米救濟大陸災胞**　爲展開對匪政治鬥爭，獲致心理戰之效果，自三十九年五月至四十年二月間，經先後實施空投八次，共投食米三八九、七八六市斤，及總統文告數百萬份。本年雙十節前夕，復作第九次之空投，計食米六萬市斤，並有總統文告等。空投地區遍及浙、皖、贛、湘、粵、閩等省。

**二、救濟港澳難胞**　香港調景嶺難民營，爲我流亡港九難胞唯一之集中地，自本年二月起，除營內殘廢老弱及眷屬九百餘人仍由港府續供膳食外，其餘被停膳者一千五百餘人，則由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發米救濟。本年五月，曾督由救濟總會一次撥匯港幣五萬元，充作購米之用，每月購米需港幣二萬六千元，仍由救總按月撥匯。又年來對難胞之救濟，原則上已決定採用積極生產方面，已由工商業人士先行籌措生產基金港幣五萬元，另由救總加撥港幣五萬元，一俟籌集有數，即可開始生產工作。澳門方面，述仔難民收容所，本年二月由救總撥港幣五萬元，辦理冬令救濟，四月復撥港幣四萬元，匯充收容所補助費。

**三、救濟沿海各島嶼難胞**　大陳方面，曾由本部撥助藥品費及颱風災害賑款二二、六〇〇元，活動房屋兩棟，並洽商教會團體撥助救濟衣物一一二包，督由救總撥米四萬六千市斤，漁民慰問品十餘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又撥米六十三噸，救濟披山、南麂兩島居民。金門方面，因受颱風侵襲，房屋傾圮甚多，由救總撥新臺幣五十七萬元，充修建費及賑濟流亡難民之用。至馬祖、白肯等島，併經督由救總撥米四萬六千市斤及漁具、食鹽衣物等救濟物資。

**四、救濟海外同胞**　海外各地之救濟，仍督由救總辦理，計撥匯流亡印巴之新疆維哈族救濟費美金一四、七六〇元，留越國立豫衡中聯員生生活費及來臺旅費新臺幣十六萬元，旅日僑民水災賑款美金四、一九三元，留韓反共義士緊急救助費新臺幣二十萬元，旅韓僑民水災賑款美金二、二六〇元及新臺幣十萬元。又本年八月督商由救總派員攜帶慰勞品鳳梨、猪肉罐頭、方糖及汗衫等各一萬七千份，赴韓慰問反共義士。

**五、救助來臺難胞**　數年來由港、澳及越、緬等地來臺之難胞，共達九、三六七人，均經予以接待安頓，並設法予以介紹工作，最近由緬隨軍撤退來臺者，亦在分別設法安置中。

## 辦理國大代表遞補

關於國民大會代表之出缺遞補事宜，係屬本部職掌，其有死亡出缺者，均係依照規定，先予註銷名籍，再由候補人依次遞補，業經依法辦理有案者，本年截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遞補人數計達四十三名。惟自大陸淪陷，政府遷臺之後，一部份國大代表有的投匪叛國，有的行蹤不明，而候補人申請遞補者，紛至沓來，對於此類案情之處理，已非原選舉罷免法所能適應，當經審愼研議，認爲在當前的特殊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況之下，對於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的問題，必須有適當的處理。爰經擬訂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草案，呈由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公布施行。關於第一屆國大代表及候補人行蹤不明三年以上者，已由本部依照補充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先行公告，定自本年十月十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爲聲報期間，其逾期不聲報者，代表則視爲因故出缺，候補人則喪失候補資格。至附匪有據之代表或候補人，如經依法通緝有案者，均將依照規定辦理。又立法院曾於本部依照補充條例第五條規定由行政院訂定補充缺額辦法，本部亦經依據該項規定，擬具第一屆國民大會職業團體及婦女團體代表缺額補充辦法，呈請行政院核定公布施行，現代表及候補人聲報限期卽告屆滿，來年一月初旬，卽可着手辦理遞補工作。

——錄自「民國四十二年中華年報」甲編，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會議規範草訂之遠因及經過

會議規範是根據　國父「民權初步」，而把他條文化與簡單化，以便於實用時可以依據與引證而草訂的。這是兩年以來內政部同人一件最繁雜的工作，開始於四十一年五月，完成於四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公布試行。「民權初步」於民國六年出版，是　國父教國人開會議事的法則，從而固結人心糾合羣力，表達民權的一部最重要的遺教。此書的出版，距今已三十七年，在這三十七年悠久的歲月中，從中國革命奮鬥的經過來看，遺教最被忽視，而最鮮成就的要算是這一件事吧！

回憶「民權初步」於民國六年春出版時，我正是上海復旦公學中學部四年級的學生，那時王亮疇、葉楚傖諸先生和許多革命前輩正在復旦公學任教，　國父則是復旦的董事長。在當時上海的各個學校當中，復旦要算是最受革命風潮所感染的一所學校，復旦學生對於　國父的崇敬自亦是意中事。好奇好新是青年普遍的傾向，故當「民權初步」一書剛剛出版，我就很快的要到一本，馬上把他閱讀了一遍，不料閱讀的結果使我大失所望。我爲甚麼要如此失望呢？第一，是因爲此書讀起來乾燥無味，有如嚼臘。第二，開會議事是一件簡單無甚重要的小事，那值得一個革命領袖如　國父其人的把精力時間消耗在這樣無意義的事件上頭去。第三，那時我認爲　國父應當寫些足以振奮人心，宣揚革命眞理的著作，何必在他的三民主義的講演尚未完成之前，首先出版這一部味如嚼臘的著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上是我三十七年前第一次閱讀「民權初步」一書在今天所能回憶出的一些印象，當然，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一個中學生所能了解的事物當然是有限的，我卻是在這三十七年的悠久的歲月中，和我同樣情形的人，我大膽的說，總不僅僅只是我一個，不然，何以在這樣長的一個時間裏，我們對於　國父這一部份重要遺教如是其忽視，而甚少成就呢？

我中學畢業後便到日本留學，在日本住了兩年，我感覺到日本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值得我留連的地方，我於是於民國八年由日本到美國去留學。在最初幾年中，我也沒有發現美國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美國的物質文明進步，當然是我們中國所望塵莫及的，但是關於這些，我認爲在我們革命成功之後，能夠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權，迎頭趕上，努力作去，我們也會做得到的，並沒有甚麼稀奇。惟有一件我所看見的平凡事件，使我對於美國的成就發生了另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那就是在我所住的一所浸信教會辦的威瑟靈大學裏，每日上午全校師生集合在大禮堂舉行禮拜的情形。全九時半到十時的半小時短促的時間以內，全校學生，由課室走到禮堂約照例由年長的教授領導祈禱後，又約需五分鐘到十分鐘左右。假使祈禱即行散會。可是大學的學生會往往就利用這一全體集合的時間，由學生論的事件提出討論。在短短的二十分左右的時間內有條不紊的決議許多有討論，有修正，有表決，無一不表現出一種羣體活動的良好規律與秩序，不僅充分表達了民主的精神和尋求出了多數的意見，而且眞眞做到了和諧一致，羣策羣力的地步。在我幾十年親自參與我國各項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會中，不曾看見過如此的成就的。如果說要了解甚麼是美國精神，這就是我認爲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如果說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在這些地方才是他的民主制度的基礎。自此以後，我才漸漸開始了解一些國父要寫開會議事的法則那部乾燥無味，有如嚼臘的書，才漸漸醒悟爲甚麼他要把這部書取名叫「民權初步」和「社會建設」的原因。因此我才選讀了一門議事法的功課。讀了這門功課之後，所知的也不過一些開會議事的規律、程序與方法而已，至於把這門功課應用到革命建國，實現民權是如何的重要，我並未澈底了解，或加以特別重視。

以上是我三十多年前留美期間對於　國父「民權初步」一書，在認識上起了一些變化的回憶。但這只能說我了解的程度增加了，卻並不澈底。自大陸淪陷我到了臺灣，在一次偶然的場合，蔣夢麟先生談到「民權初步」這本書的問題正在美國舊金山作革命活動，那時我也在舊金山。一日，　總理和我及劉成禺同志三人會在一起，有一件事關係今後我國革命建國的成功甚爲重大，這是西洋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我們必須把握著這一套學問，我們革命建國才能成功。　總理一面說，一面在衣袋中取出一本書交給我，要我和劉成禺同志把他翻譯成中文，以便印發推行。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羅拔特Robert所寫的『議事之法則與秩序』"Parliamentary Rules and Order"一書。當時　總理的表情，十分重視此書，而我們卻因未嘗注意此一問題如是的重要，也就祇好唯唯答應。其後因爲事情的牽累，終不曾把此書譯成中文。這實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一個遺憾！」

夢麟先生繼續着又說：「大約在民國五年左右我在上海晉謁　總理，他忽然又把這一件事問我，他說：『我請你翻譯那本議事學的書，已經譯好沒有？』我對他說：『因爲沒有時間，至今尚沒有着手』。總理復又說道：『我已經編好一本在此』。他一面說，一面順手從書桌的抽屜內取出一本繕就的稿本，這便是他手著的民權初步。此書出版之後，　總理還給我一本。」夢麟先生說到此處，不勝其感慨！

從上面這段故事說明　總理重視民權初步這一工作的推行，已遠在辛亥革命以前，此一工作在革命與建立民主政治上其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民國四十一年春在一次的圓山軍官訓練團的紀念週上，曾經把　總統於民國二十八年在重慶講述的「三民主義的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書，由一學員同志向眾朗誦，其中有一段闡述社會建設的涵義說：

「社會建設，實際就是具體而微的政治建設。條目上和政治建設大同而小異，所不同者，其範圍更切近民眾，其功效更著重於基層，所以社會建設，當以　總理的『民權初步』作軌範，……『民權初步』是專講集會議事種種法則的語典，其直接的目的，在使一般國民，能夠熟諳這些法則，以習練初步民權的運用，其間接目的，則在藉此養成一般國民重秩序、守紀律、有組織的習慣，從而增強民力，造成有組織的現代化社會。」

我聽到上面這段話之後，心中頓然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這樣的自己問自己：「民權初步」既然是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基礎，爲甚麼四十多年前，　總理倡之於前，　總裁又於十幾年前聞之於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何以迄至現在我們仍未能推行盡利呢？我自此反復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所在，得到如下的結論：

第一、「民權初步」一書，正如　總理在序文中所說：「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劉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劉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嚼臘，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則將如嗽蔗，漸入佳境，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以全然領略矣！」細考「民權初步」未能順利推行的原因，的確是由於我們未能把他作爲實用演習，以盡其妙用所致。

第二、「民權初步」爲一闡明議學原理之書，而難作具體條規之引用。因爲難作具體條規之引用，故不易普遍推行盡利。正如有了母法，而沒有施行法一樣，在遭遇議事之困難時，便不易獲得一正確之準則，以解決問題。

根據以上兩種理由，我認定爲了補救這些缺點，實在有把「民權初步」各項原則具體變作條文，使其具有法規之效力的必要，這樣推行便可順利了，這便是草訂會議規範的由來。自我接長內政部以後，我認爲這是今後推行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工作，過去我們沒有把這一基礎築好，所以我們的成就便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現在我們開始來做，時間尚不能算是太晚。

兩年以前內政部同人特組織了一研究小組從事研究。第一步先把「民權初步」各項原則逐項演習，以期觀念正確，切合實用。第二步參考新近世界初行之會議章則與習慣以作補充和引證，如聯合國議事規則之類。第三步，研究我國開會議事之積習，尋求其癥結之所在，訂爲條規，以作補救。經過了約有一年的時間，然後把上述三項步驟研究所得的結果，由張良珍同志和研究小組的同人着手草成會議規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草案，然後再加以進一步的研究與整理。爲了期其完備與切合實用，特作的艱巨繁難情形，實在出乎我們想像以外。假使沒有各位學者專家，是否能順利完成，我們實在沒有這種自信。假使沒有各機關團體和我們的合作，提出了許多實際的問題見，隨時改正補充。草案先後印送以作徵求意見的使用，共有五次之多，數量則在數萬册以上。此一工，使我們在規範中能夠針對我國開會議事的積習，訂爲條文以作補救，提供意見，解決疑難，這次工我想此一工作不會具有他的特點的。

現在會議規範已於五月二十九日公布試行。內政部同人本想在五月二十日那天正當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時公布以作紀念，因爲那天放假，公布有些不便，所以提前一日公布。現在此一工作已大體告一段落，今後的推行，尤有賴於各方面人士的繼續努力與合作。我在此特別要向曾有貢獻和幫助於此一工作的同志朋友和專家學者們致謝。尤其是內政部同人，由於我期望過殷，因而督責過嚴，在工作上使大家感受繁擾，除了同樣表示謝意外，更特別深致其歉意。

——錄自「中國內政」第七卷第六期，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附錄：會議規範內政部公布試行令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內民字第五〇四四〇號

查政治建設以社會建設爲基礎，社會建設以　國父「民權初步」爲軌範。　國父民國六年二月於「民權初步」自序中昭示：

「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爲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羣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

總統復於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在峨嵋軍官訓練團講述國父遺教第五講社會建設章中訓示：

「總理關於社會建設有一部最主要的遺教，就是『民權初步』，這部書的內容，就是專講集會議事之種種法則。其直接的目的，當然是要教一般國民，能夠熟悉這些法則，以完成初步民權的訓練，而其間接的作用，尤在藉此養成一般國民重秩序、守紀律、強民力，發展民權，造成有組織之習性，從而團結人心，增繼又於二十八年在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所講「三民主義的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訓示：

「社會建設就是具體而微的政治建設，條目上和政治建設大同而小異，所不同者，其範圍更近於民眾，其功效更著重於基層，所以社會建設當以　總理民權初步作軌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查今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之對立，非僅爲利害上之不可調和，抑亦思想上之不可並立，現代社會之特徵，爲本民主、自由、尊嚴、和諧之原則，而爲羣體之活動，其與極權世界之分野，實植基於此。民主社會羣體活動之規律，即爲集會議事之法則，故　國父創爲學說，迄今已三十七年，總統爲之倡導，亦近二十年，民主之社會，發揮羣策羣力之效能。　國父手著「民權初步」，蓋欲藉此進我國於現代，宜若可以蔚爲風氣，普及民間，其所以未能奉行盡利者，厥緣「民權初步」爲一闡明議學原理之書，而難作具體條規之引用。本部有鑒及此，爰經遵照　國父原著要旨，總統指示方針，並參酌歐美議事規章，針對我國開會議事之積習，暨徵詢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團體之意見，擬訂「會議規範草案」一種。兩年以來，習練演試，疊有改進，化「民權初步」爲具體之條文，融中西學理爲通俗之範式，俾便應用，而利實施，有條徵句引之便，無旁搜遠紹之煩，先予試行，以求經驗，俟有必要，再行修正。

深望各級地方議事機關，各種人民團體，率先採行，以資倡導，如有改進意見，隨時提供本部研究，並將適用條款，解決問題情形，一一作成紀錄，以備他日參考。並期盡力宣揚，發爲廣泛之社會運動，俾能普及民間，蔚成風氣，藉奠固結人心，糾合羣力，發達民權之根基。

茲特將該項會議規範公布全國上下，習爲慣常，並自即日起試行之。此令。

部長　黃季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會議規範

四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內政部公布試行

## 壹、開會

**第一條　會議之定義**　三人以上，循一定之規則，集思廣益，研究事理，尋求多數意見，達成決議，解決問題，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者，謂之會議。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規範於左列會議均適用之：

（一）議事在尋求多數意見並以整個會議名義而爲決議者，如各級議事機關之會議，各級行政機關之會議，各種人民團體之會議，各種企業組織之股東大會及理監事會議等。

（二）議事在集思廣益提供意見而爲建議者，如各種審查會，處理付委案件之委員會，及各機關對其首長交議或提供意見之幕僚會議等。

**第三條　會議之召集**　會議之召集，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依左列規定行之：

（一）各種永久性集會之成立會，及各種臨時性集會，由發起人或籌備人召集之。

（二）永久性集會之各次常會，或其臨時會議，由其負責人（如主席、議長、會長、理事長等）召集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永久性集會每屆改選後之第一次會議，如議事機關之常設委員會，或各種企業組織及人民團體之理監事會等，由當選人中得票最多者，或前屆負責人召集之。

召集人應根據距離遠近，及交通情形，於充裕之時間前以書面通知各出席人，或公告之。

**第四條　開會額數**　各種會議，以出席人數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但各該會議之開會額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請假人數計算之，集會會額數之限制。

開會時間已至，不足開會額數者，得宣布延長之，延長兩次仍不足額時，主席應宣告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第五條　不足額問題**　因無故不出席，致未達開會額數，影響成會連續二次者，應在第二次延會前，由出席人過半數之決議，決定第三次開會日期，預先以書面加敍經過，通知全體應出席人，第三次開會時，如仍未達開會額數，但實到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對無故不出席者，爲處分之決議。

前項情形，如有候補人列席時（如候補委員、候補理監事等），得依次補足缺席人之席次，候補人遞補後，開會仍不足額繼續三次者，得由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爲改選或改組之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議。

以上各項，如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六條** **談話會** 因天災人禍，須爲緊急處理，而出席人因故未達於會後儘速通知未出席人，並須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作成決議行之，但該項決議應於下次正式會議時，提出追認之。

**第七條** **開會後缺額問題** 會議進行中，經主席或出席人提出額數者，得開談話會，依出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足額，主席應宣布散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時，主席立即按鈴，或以其問題時，會議仍照常進行。

**第八條** **會議程序** 開會應於事先編訂會議程序，其項目如左：

（一）由主席或臨時主席（發起人或籌備人）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①推選主席，及各項程序預定之時間。（已另印發議事日程者，此項從略。）

席。（由臨時主席宣布開會者，應正式推選主席，但臨時主席得當選爲主

②主席報告議程後，應徵詢出席人有無異議，如無異議，即爲認可，如有異議，應提付討論及表決。

③主席報

（二）報告事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①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如係第一次會議此項從略）。

②報告上次決議案執行情形（無此項報告者從略）。

③委員會或委員報告（無此項報告者從略）。

④其他報告（如有其他各種報告，應將報告之事項或報告人，一一列舉，無則從略）。

⑤以上各款報告完畢後，得對上次決議案之執行，或其他會務進行情形，檢討其利弊得失，及其改進之方法。

（三）選舉（如關於選舉之章則、名額、方法等，須待本次會議討論決定者，此項應移於討論事項之後）。

（四）討論事項：

①前會遺留之事項（如前會有未完之事項，或指定之事項，須於本次會議討論者，應將其一一列舉，如無此種事項者，從略）。

②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之事項（應將各預定討論事項一一列舉）。

③臨時動議。

（五）散會。

**第九條　來賓演講及介紹**　開會時來賓演講，應以事先特約者爲限，並以一人爲當，演講題目，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先行約定，並通知各出席人，或公告之。到會來賓，毋須有必要，得由主席向會眾簡要介紹，以示崇敬及謝意。

**第一〇條　致敬及慰問**　凡以會議名義，對個人或團體致敬或慰問，應經正式動議及表決，於會後以簡要文字表達之。

**第一一條　議事紀錄**　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目如左：

（一）會議名稱及會次。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出席人姓名及人數。
（五）列席人姓名。
（六）請假人姓名。
（七）主席姓名。
（八）紀錄姓名。
（九）報告事項。
（十）選舉事項，選舉方法，票數及結果。
（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二）其他重要事項。

**第一二條** 會議之紀錄　會議之紀錄，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得由主席指定，或由會議推選之。

議事紀錄應由主席及紀錄分別簽署。

**第一三條** 紀錄之發言權及表決權　會議之紀錄，如係由會員兼任者，有發言權及表決權，但非必要時，以不行使爲原則。

**第一四條** 處分之決議　會眾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經出席人之提議，過半數之通過，爲處分之決議。

（一）無故不出席會議，連續二次以上者。

（二）發言違反禮貌，損及其他會眾之人格及信譽者。

（三）違反議事規則，不服主席糾正，妨礙議場秩序者。

前項處分之決議，以左列各款爲限：

（一）將姓名及其事由，列入會議紀錄。

（二）停止出席權一次。

（三）向會眾或受損害人當面致歉。

（四）得由大會成立紀律委員會議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五條**　會議之主席，除各該會議另有規定外，應由出席人於會議開始時推選，如有必要，並得推選副主席一人或數人。

副主席之任務，在協助主席處理有關會議進行之事務，或行主席職務。

**第一六條**　主席之地位　主席應居於公正超然之地位，嚴格執行會議規則，維持會議和諧，使會議順利進行。

**第一七條**　主席之任務如左：

（一）依時宣布開會及散會，或休息，暨按照程序，主持會議進行。

（二）維持會場秩序，並確保議事規則之遵行。

（三）承認發言人地位。

（四）接述動議。

（五）依序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

（六）簽署會議紀錄。

（七）答復一切有關會議之詢問，及決定權宜問題與秩序問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其他有關大會務之重大問題或事件，得依本規範第六一條第四款之規定，設立綜合委員會處理之，以維持主席公正超然之地位。設立綜合委員會時，即免設主席團。

**第一八條　主席之發言**　主席對於討論事項，以不參與發言或討論爲原則，如必須參與討論時，應指定一人暫代主席，退就會場席次，其地位與其他出席人同，但機關之幕僚，由首長擔任主席者，不在此限。

**第一九條　主席之表決權**　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爲原則。

主席於議案表決可否同數時，得加入可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而使其否決，但有特別規定之表決人數者，從其規定。

主席於議案之表決，可否相差一票時，得參加少數方面，使成同數以否決之。

主席於議案表決，有特別規定之額數者，如相差一票，即達規定額數時，得參加一票，使其通過，或不參加，使其否決。例如：某一議案，會員出席人數爲卅人，依特別規定須三分之二人數通過，即爲廿人，經表決贊成者十九人，主席如參加一票，議案即爲通過，如不參加，即爲否決。

## 叁、出席人列席人及代表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二〇條　出席人之權利義務**　出席人有發言、動議、提案、討論、表決及選舉之權利。

出席人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之義務。

前項服從決議之義務，對應出席而未出席者亦同。

**第二一條　議場秩序**　出席人應共同維護議場秩序，於主席發言及議案付表決時，不得離開議場。

**第二二條　列席人**　列席人除不得參與表決及選舉外，有遵守會議規則，發言禮貌，及議場秩序之義務。

列席人對於他人違反前項義務事項，致影響其責任與地位時，有依照會議規則，提出權宜問題、秩序問題，及申訴之權利。

**第二三條　代表人**　出席人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派代表列席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

各種工商企業組織之股東大會，股東因故不能自行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爲其股權之代表人，代表人之權利義務，與出席人同。

## 肆、發言

**第二四條　請求發言地位**　出席人發言，須先以左列方式之一，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一）口呼

壹、專　論

主席請求發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舉手請求發言。

（三）以書面請求，遞交主席，並註明姓名或議席號數。

主席對前項各款之請求，應點首示意，予以認可，或准其發言。

名席次，依次准其發言。

**第二五條** **聲明發言性質** 出席人取得發言地位後，須首先聲明其發言性質，對在場之問題，爲贊成，爲反對，爲修正，或爲其他有關動議。

**第二六條** **發言先後之指定** 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者，由主席指定其先後次序。

主席依前項指定發言人次序時，得參酌左列情形，指定先行發言：

（一）距離主席較遠者。

（二）就討論之議案，發言最少，或尚未發言者。

（三）原提案人有所補充或解釋者。

**第二七條** **發言禮貌** 發言應有禮貌，就題論事，除以對人爲主體之言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違禮貌時，主席得警告制止，或請求主席爲之議案外，不得涉及私人私事，如範圍，或有違禮貌時，主席得警告制止，或請求主席爲之。

**第二八條** **發言次數及時間** 發言應簡單扼要，除有特別規定，或臨時由主席徵詢出席人同意，另作一議案，每人發言以不超過兩次，每次以不超過五分鐘爲宜，但經主席徵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出席人無異議予以接受者，或所有出席人均已輪流講畢之後，不受此限。

提案之說明，質疑之應答，事實資料之補充，工作或重要事項之報告，經主席許可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二九條** 書面發言 出席人得將發言要點，以書面提請主席，依序交紀錄或秘書人員宣讀之。

## 伍、動議

**第三〇條** 動議之種類 動議之種類如左：

（一）主動議 凡提出新事件於議場，經附議成立，由主席宣付討論或表決者屬之。

（二）附屬動議 一動議附屬於他動議，而以改變其內容或其處理方式爲目的者屬之，其種類如左：

①散會動議。

②擱置動議。

③停止討論動議。

④延期討論動議。

⑤付委動議。

⑥修正動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⑦無期延期動議。

(三)獨立動議　凡主動議不得以附屬動議變更其內容，或逕由主席裁定或解答者屬之，其種類如左：

①權宜問題動議。

②秩序問題動議。

③散會動議。（散會動議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者，爲獨立動議，於有其他動議在場時提出者，爲附屬動議。）

④休息動議。（休息動議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者，爲獨立動議，於有其他動議時提出者，爲附屬動議。）

⑤抽出動議。

⑥收回動議。

⑦分開動議。

⑧申訴動議。

⑨復議動議。

⑩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一部或全部之動議。

⑪預定議事程序動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⑫變更議程動議。
⑬關於討論方式動議。
⑭關於表決方式動議。
⑮一切有關會議之詢問。

**第三一條　動議之提出**　動議之提出，依左列之規定：

（一）主動議　得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之。

一主動議在場待決時，不得再提另一主動議，如經予接受。並先於其所附屬之動議，提付討論或表決。

（二）附屬動議　得於與其有關動議，進行討論中提出之。

（三）獨立動議　除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外，得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提出之。

**第三二條　動議之附議**　動議須有附議始得成立。主席對動議得自爲附議。各種會議，對附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三條　動議之程序**　動議之程序如左：

（一）動議者起立，向主席請求發言。

（二）主席承認動議者之發言地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動議者發動議而坐。

（四）附議（以舉手或口呼附議爲之）。

（五）主席接述動議，並付討論。

**第三四條　提案**　動議以書面爲之者稱提案，提案除依特別規定，得由個人或機關團體單獨提出者外，須有附署。

**第三五條　動議之收回**　動議未經附議前，得由動議人收回之。

動議經附議後，非經附議人同意，不得收回。

動議經主席接述者，原動議人如欲收回，須經主席徵詢無異議後行之，如有異議，由主席逕付表決定之。

動議經修正通過者，不得收回。

**第三六條　提案之撤回**　提案在未經主席宣付討論前，得由提案人徵求附署人同意撤回之。

提案經主席宣付討論後，原提案人如欲撤回，除須徵得附署人同意外，並須由主席徵詢全體無異議後行之。

提案經修正者，不得撤回。

**第三七條　動議之分開**　一動議具有數段性質者，得由主席或出席人動議，分開討論及表決。

動議經分開表決後，仍應以其全案提付表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動議之各部份均經否決者，該動議視爲整個被否決。

**第三八條　不得動議之時**　有左列情形之一時，除權宜問題、秩序問題外，不得提出動議：

（一）他人得發言地位時。

（二）表決或投票時。

**第三九條　附屬動議之優先順序**　附屬動議之種類及其優先順序如左：

（一）散會動議。

（二）擱置動議。

（三）停止討論動議。

（四）延期討論動議。

（五）付委動議。

（六）修正動議。

（七）無期延期動議。

必要時得爲休息動議，其順序次於散會動議。

**第四〇條　附屬動議之運用**　依前條所列附屬動議之優先順序，如有另提出順序較高之附屬動議，但有順序較高之附屬動議待決時，不得提出順序較低之附屬動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四一條　擱置動議與抽出動議**　擱置動議如經通過，應將其所指之本題，及有關之附屬動議，一併擱置之，擱置之議案，得於本會期或下會期中動議抽出之。

抽出動議之提出，得於無其他動議或事件在場時行之。

抽出動議通過後，應由原案擱置時所在之秩序，繼續進行，例如在停止討論動議提付表決，如在修正動議時擱置者，即繼續討論該修正動議。

## 陸、討　論

**第四二條　動議之討論**　動議之討論，應依優先秩序，逐一進行，在同一時間，不得討論二動議，如有違反前項情事發生，主席應予制止，或不予接述。

**第四三條　討論之程序**　內容複雜或條文式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意見，然後再分段討論，或逐條討論。

前項議案經廣泛交換意見後，如認爲無成立必要，得由出席人之提議，過半數之通過，否決之。

**第四四條　讀會**　立法機關於法令規章及預算案之討論，以三讀會之程序爲之。

（一）第一讀會：於議案列入議程後，由主席宣讀議案標題行之，如全案內容有宣讀之必要，應指定秘書或紀錄爲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議案於朗讀標題後，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或經大體討論後，決議不經審查，逕付二讀或撤銷之。

（二）第二讀會：於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大會決議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提付大會討論時行之。

第二讀會應將議案逐條朗讀，提付討論，或就原案要旨，或委員會審查意見，廣泛討論。

第二讀會，就原案要旨或委員會審查意見，廣泛討論後，得經出席人提議，過半數之決議，將全案重付審查。

第二讀會畢，得將修正之條款文句，交有關委員會或指定人員整理之。

（三）第三讀會：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由出席人提議，並經過半數之通過，得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有互相抵觸，或與憲法及其他法令規章相抵觸應修正者外，只得爲文字之修正，不得變更原意。

議案全部處理完竣後，應將全案付表決。

第四五條　不經討論之事項　左列各款均不經討論，分別由主席裁定逕付表決：

（一）權宜問題：不需附議，由主席裁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秩序問題：不需附議，由主席裁定。
（三）散會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四）擱置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五）抽出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六）停止討論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七）分開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八）休息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九）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十）收回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十一）關於表決方式動議：需要附議，由主席逕付表決。

## 柒、修正案

**第四六條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方式**　修正案之提出及處理，可分爲甲乙二式，甲式卽遵照民權初步所定之方式，乙式係參照聯合國大會所行之方式，各種會議，得採用任何一種行之，但同一次會議中，以採用同一種方式爲限。

**第四七條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甲式**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甲式，依左列各款規定行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修正之方法：

甲、加入字句。

乙、刪除字句。

丙、刪除並加入字句。

修正案得與本題相衝突，但必須與本題有關，方得提出。例如：「通電擁護節約運動」一本題，不得動議將「擁護」二字，修正爲「反對」二字是。

凡加入或刪除一「不」字之修正案，而有否決本題之效果者，不得提出。例如「響應提倡食用糙米」一本題，不得動議修正在「響應」之上，加入一「不」字是。

二、修正之範圍　修正案得對本題一部分字句，或不限於一部分字句，予以增刪補充提出之。例如：「設一圖書閱覽室供會員之用」一本題，得動議在「圖書」二字之下，加「雜誌」二字，或同時將「會員」二字刪除，而加入「員工及其家屬」六字是。

三、第一修正案及第二修正案之提出　本題進行討論中，對本題提出之修正，稱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進行討論中，修正反兩方意見未決前，對本題提修正案部分之提出　稱第二修正案。第一修正案進行討論中，修正反兩方意見未決前，針對第一第一修正案表決後，方得另提其他第一修正案，第二修正案表決後，方得另提其他第二修正案。

四、同級修正案之提出　同一時間，不得提出兩個以上同級之修正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修正案。

五、先事聲明　凡欲提修正案，而不在前款所定之秩序者，得將所欲提之案，先事聲明，以供出席人於表決時，爲贊成與否之考慮與抉擇。

前項經先事聲明之案，至合於秩序時，有優先提出之地位。

六、修正案之討論　第一修正案提出後，本題之討論即暫行中止，應將該第一修正案優先提付討論，如有第二修正案提出，第一修正案之討論即暫行中止，應將該第二修正案優先提付討論，如無第二修正案提出，即將第一修正案提付表決。

七、修正案之處理　有修正案之動議，其處理依左列順序：

甲、第二修正案。

乙、第一修正案。

丙、本題。

八、第二修正案經討論後，即提出表決，如經可決即納入第一修正案，而變爲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

對前項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如尚有修正意見提出，即爲其他第二修正案，如又經可決，即納入該項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而變爲再度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

對前項再度修正後之第一修正案，得再提其他第二修正案，其處理如前，直至再無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第二修正案提出時，即將最後修正之第一修正案，
前項表決結果，如又爲可決，即納入本題，而變爲修
對前項修正後之本題，如尚有修正意見提出，即爲其
修正案提出時，即將最後修正之本題，提付表決。
第二修正案如經否決，並無其他第二修正案提出時，
修正案如經否決，並無其他第一修正案提出時，即將
凡提出修正案以全部代替原案，而仍與原案

八、替代案

「設立幼稚園一所，需費若干，並研議款項之來源」是。

九、替代案之提出　替代案得於本題進行討論中，或於第一或第二修正案在場時提出之。

對於替代案得提修正案，其處理適用修正案處理之方式。

十、替代案之處理　替代案提出後，應予以優先處理。

替代案如獲通過，倘係於本題進行討論中提出者，本題即被打銷，倘係於第一或第二修正案在場時提出者，本題及第一或第二修正案均被打銷，替代案如被否決，仍回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至其提出時，原案所在之秩序，繼續進行。

**第四八條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乙式**　修正案提出及處理之乙式依左列各款之規定行之：

一、修正案提出　對於本題之一部分數部分或全部得同時提出修正案。較繁複之修正案，必要時應以書面方式繕成完整之提案提出之。

二、委員會之整理　對同一本題之修正案，複雜繁多時，得由大會決議交專設委員會，綜合整理爲各種性質互異，界限分明之案，送還大會，討論表決。

三、修正案之討論及表決　修正案之討論，與本題同時行之，其表決應先於本題行之。對本題有兩個以上之修正案提出時，其討論之秩序，依提出之先後行之，其表決之次序，應就其與本題旨趣距離最遠者，最先付表決，次遠者次付表決，依此類推，直至所有修正案盡付表決爲止。

多數修正案之一，如獲通過，勢須否決另一修正案者，該另一修正案不再付表決。

四、本題之表決　一項或數項修正案，如獲通過，應再將修正後之本題，提付表決。

修正案均被否決時，應將本題提付表決。

五、分部表決　修正案之各部分，得分別付表決。

修正案經分部表決後，應將通過之各部分，納入原案，提付表決。

修正案之各部分，均經否決者，該修正案視爲整個被否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四九條　修正動議之接納　修正之動議，得由原動議人自動接納，成爲原動議之一部份，應併入原動議中，提付討論及表決，毋須分別處理，出席人有反對接納者，原動議人不得接納。

第五〇條　關於人選款項時間等之提出及改擬　關於人選地點及物品種類之提出，或款項時間及其他數字之改擬，不視爲修正案，得同時提出多數意見，依左列順序一一表決：

（一）關於人選地點及物品種類者，由最先提出者依次表決。

（二）關於款項及其他數字者，由最大之數額起，依次表決。

（三）關於時間者，由最長最遠之時間起，依次表決。

第五一條　不得修正之事項　左列各款不得修正：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申訴動議。

（四）散會動議。

（五）擱置動議。

（六）抽出動議。

（七）停止討論動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八）無期延期動議。
（九）收回動議。
（十）復議動議。
（十一）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之動議。

## 捌、表決

**第五二條　表決之方式**

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
（二）起立表決。
（三）正反兩方分立表決。
（四）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五分之一以上之贊同，即應採用。
（五）投票表決。

前項第五款，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爲原則。

**第五三條　通過與無異議認可**

（一）通過。以表決之方式，獲得多數之贊同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無異議認可。例行事件，或經主席認爲毋須提付表決通過之事件，得由主席徵詢議場有無異議，如無異議，卽爲認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或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布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無異議認可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第五四條　兩面俱呈　表決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並由主席宣布表決結果。**

**第五五條　主席參與表決之時**　會議之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爲原則。但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得依本規範第十九條之規定，行使其表決權：

（一）議案表決可否同數時。

（二）議案表決可否相差一票時。

（三）議案可決有特別規定之額數者。如相差一票，卽達至第三款情事之一時，主席不得唱名表決，主席如已應名者，唱名完畢，如有前項第一款再行參與一票。

**第五六條　可決與否決**　表決除另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爲可決，可否同數時，如主席不參與表決，爲否決。

**第五七條　表決之特定額數**　左列各款，須分別達到其特定額數，方爲可決：

（一）須得出席人四分之三以上之贊同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甲、關於變更團體宗旨或目的之表決。
乙、關於團體解散之表決。
（二）須得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贊同者。
甲、關於修改團體組織或議事章則之表決。
乙、關於罷免會員之表決。
丙、關於處分團體財產之表決。
丁、關於變更議事程序之表決。
戊、關於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之表決。
己、停止討論動議之表決。
（三）須得出席人過半數之贊同者。
甲、關於經費預算之表決。
乙、關於團體財產經營保管之表決。
丙、關於一般影響權利或增加義務案件之表決。
丁、散會動議之表決。
戊、擱置動議之表決。
己、抽出動議之表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庚、延期討論動議之表決。

辛、無期延期動議之表決。

各種會議，對前項各款表決之特定額數，得於其議事規則或章程中，另作規定。

**第五八條　無異議認可之事項**　左列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如無異議，即爲認可，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

（一）宣讀會議程序。

（二）宣讀前次會議紀錄。

（三）依照預定時間宣告散會或休息。

（四）例行之報告，及其他經主席認爲不必經表決之事項。

**第五九條　重行表決**　出席人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重行表決，但以一次爲限。

## 玖、付委及委員會

**第六〇條　議案之付委**　議案全部或其一部，得經大會決議，交付委員會處理之。

付委案件，有修正案未決者，應一併付委辦理。

議案內容，包含數種不同性質者，得分交數委員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六一條　委員會之種類**　委員會之種類如左：

（一）專設委員會　各種會議，對付委案件，得成立專設委員會處理之，於該案件處理完竣後，委員會因任務終了，而當然結束。

（二）常設委員會　永久性之議事機關，得置各種常設委員會。常設委員會得依定期舉行改選。

（三）全體委員會　各種會議於審查重要案件時，爲使出席人均有暢所欲言之機會，及盡可能獲得大多數或全體一致之見解，得以出席人全體，舉行全體委員會，全體委員會於該案審查完竣，即行結束。

（四）綜合委員會　永久性之議事機關，或大規模之會議，得設綜合委員會，處理有關大會會務之重大問題或事件，建議大會採納之。

（五）特種委員會　各種會議，爲處理特種案件，得組特種委員會。

**第六二條　委員之產生**　委員會之委員，除有特別規定外，由大會推選之，或由大會授權主席指定，提經大會同意之。

**第六三條　委員會召集人及主席**　委員會之召集人，由大會推定或由大會主席指定之。委員會之主席，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成例外，得由召集人充任，或於委員會開會時，由委員互選之。全體委員會開會時，應另推選主席，原大會主席，應暫行退位，俟全體委員會結束，大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復開時，再行復位。

**第六四條　委員會之開會**　委員會開會時，非經事先請假，不得缺席。

**第六五條　委員會之議事及表決**　委員會之議事，應遵守一般會議規則，但不受發言次數之限制。委員會之表決，除有特別規定外，以獲出席人過半數者爲可決。

**第六六條　邀請列席人員**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並予列入會議紀錄。

**第六七條　付委案件之增刪修正或退還**　委員會對付委案件得予增刪修正，但委員會對全案認爲無從修正或不必修正時，得以原案送還大會，並敍明其理由。

**第六八條　對委員會之指示**　議案付委時，得由大會附加各項原則性之指示，委員會應遵照各該項指示辦理。

**第六九條　名稱不得修正**　委員會對付委案件之名稱，不得修正。議案名稱之修正，得於大會提出之，但應俟議案條文通過後，如有必要，始得提出。

**第七〇條　審查之程序**　委員會審查內容複雜之議案，得先就全案要旨，廣泛交換意見，其次分章分節，依次審查，每一章節，應逐條逐款，順序進行，俟議案全部審查完竣，最後再將全案舉行表決，作成報告提供大會。

議案之審查，已進行至在後之章節條款時，不得將業經通過在前之章節條款，重行提出討論，但如因在後之章節條款，有所變更，致在前有關之章節條款，確有變更必要者，得於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全案審查完竣時，再將該項章節條款，提出修正之。

第七一條　不得修改原件　委員會審查案件時，應另作紀錄，不得就有序文之議案，應先就其條款審查完竣後，再作序文之審查。

第七二條　委員會之報告及少數異見之報告　付委案件經辦竣後，應將結果向大會提出報告，委員會中有少數異見者，得另提少數異見之報告，以供大會參考。

第七三條　委員於大會發言之制限　委員於大會討論委員會之報告或少數異見之報告時，除預先在委員會聲明保留發言權者外，以不發言爲原則。

第七四條　報告之解釋　委員會主席或報告人，爲解釋委員會之報告，得有優先發言權。

第七五條　重行付委　大會對委員會之報告，得予採納修正或不予採納，並得將原案全部或一部交付委員會，重行審查。

第七六條　不得對外公布報告　委員會非經大會許可，不得對外公布其報告。

第七七條　付委案件之抽出　委員會對付委案件，延不處理時，得經大會出席人之提議，並獲過半數通過後，將該案抽出，由大會逕行處理之。

## 拾、復　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七八條　復議之條件　決議案之復議應具備左列條件：

（一）決議案尚未着手執行者。

（二）須提出於決議案之同次會或下次會，但提出於同次會者，須有他事相間，提出於次會者，須證明提出人係屬於原決議案之得勝方面者。

第七九條　不得再爲復議　復議案經表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得再爲復議之動議。

第八〇條　不得復議之案　左列各款，不得復議：

（一）權宜問題。

（二）秩序問題。

（三）散會之表決。

（四）擱置之表決。

（五）抽出之表決。

（六）停止討論之表決。

（七）收回動議之表決。

（八）復議之表決。

（九）休息動議之表決。

（十）申訴之表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一）選舉之表決。
（十二）投票之表決。
（十三）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之表決。

## 拾壹、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

**第八一條　定義**　對於議場偶發之緊急事件，足以影響議場全體或個人權利者，得提出權宜問題。例如：議場發生喧擾，妨礙出席人之聽覺，出席人得提請主席制止是。對於議題進行中發生之錯誤，或其他事件，足以破壞議事之秩序者，得提出秩序問題。例如：發言超出議題範圍，出席人得請求主席糾正是。

**第八二條　問題之提出**　權宜問題、秩序問題之提出，依左列之規定：

（一）勿須先取得發言地位。
（二）可間斷他人之發言。
（三）不需附議。

**第八三條　處理之順序**　權宜問題之順序，最爲優先，秩序問題次於權宜問題，而先於其他各種本題及附屬動議。

**第八四條　裁定及申訴**　權宜問題及秩序問題之當否，不經討論，由主席逕行裁定，不服主席之裁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者，得提出申訴。

申訴須有附議，始得成立。

**第八五條　申訴之表決**　申訴之表決可否同數時，維持主席之裁定。

## 拾貳、選舉

**第八六條　選舉之方式**　選舉之方式，分爲左列兩種：

（一）舉手推選。

（二）投票選舉。

**第八七條　選舉之次序**　選舉在會議程序中之次序，應列於報告事項之後，重要之選舉，得單獨舉行選舉會。方法名額或其他有關事項，須在該次會議中討論決定者，不在此限。

**第八八條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會員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除有特別規定外，一律平等。

**第八九條　選舉之程序**　選舉之程序如左：

（一）主席宣布選舉之名稱，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二）辦理候選人提名，但經主席認爲不必要時，得省略之，出席人對主席之裁定，有申訴時，應提付表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推定辦理選舉事務人員。
（四）選舉。
（五）開票並宣布選舉結果。

**第九〇條** **選舉事務人員** 選舉設發票員、唱票員、記票員及監票員各人推定之。

**第九一條** **候選人提名** 選舉得先舉行候選人提名，其辦法如左：
（一）由會眾簽署提名，每一候選人所需之簽署人數，以達會眾十分之一爲原則。
（二）由提名委員會推薦。
（三）由議場臨時提出而有附議者。

**第九二條** **提名委員會** 候選人提名委員會辦理之。其名額不得超過應選出名額之一倍。

提名委員會應擬定候選人名單，報告於大會，由大會就名單之外，自行擇定人選投票。

**第九三條** **舉手推選之當選** 舉手推選，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爲當選，如有特別規定當選額數者，從其規定。

**第九四條** **投票選舉之當選** 投票選舉，應採無記名投票法，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爲當選，如有特別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定當選額數爲過半數以上者，未達規定額數時，以得票最多數者爲當選。

**第九五條** **連記法或限制連記法之當選** 連記法及限制連記法，以得票比較多數以上者爲當選。

一次選舉之名額在二名以上者，得採限制連記法投票，先由會議表決每人連記額數。由選舉人將被選舉人姓名，按額連記之，限制連記之額數，以應選人總數之過半數以上爲原則。

**第九六條** **連記法及限制連記法之當選** 連記法及限制連記法，以得票比較多數以上者爲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第九七條** **選舉名額及候選人均爲一人之選舉** 選舉名額及候選人均爲一人時，應徵詢出席人有無異議，如無異議，卽爲當選。如有異議，仍應舉行表決或投票，按照名額連記被前項表決或投票，應就贊成與反對兩面行之，如反對者爲多數，應另提候選人，重行選舉。

舉行投票時，應以記「○」或「×」表示贊成或反對。當選額數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九八條** **開票及宣布結果** 選舉完畢，應立卽當場開票，並由主席宣布其結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拾叁、其　他

**第九九條**　另訂議事規則　各種會議得就實際需要，分別依本規範之規定，另定議事規則施行之。

**第一〇〇條**　另有規定及未規定事項　各種會議，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範之規定；本規範未規定事項，依　國父「民權初步」之規定。

附　議事表

| 議案 / 動作 | 討論 | 分開 | 擱置 | 停止討論 | 延期 | 付委 | 修正 | 無期延期 | 復議 |
|---|---|---|---|---|---|---|---|---|---|
| 權宜問題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秩序問題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申訴 | 有 | 無 | 無（一） | 有 | 無（一） | 無（一） | 無 | 無 | 無 |
| 散會 | 無（二）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擱置及抽出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停止討論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延期討論 | 有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三） | 無 | 有 |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 | | | | | | | |
|---|---|---|---|---|---|---|---|---|
| 付委 | 有 | 有 | 無 | 無 | 無 | 有 | 有 | 無 |
| 修正 | 有（四） | 有（七）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五） |
| 無期延期 | 無 | 無 | 有（九） | 無 | 無 | 無 | 有 | 無 |
| 收回動議 | 有 | 有 | 有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分開動議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表決方式動議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復議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 |
| 休息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 |
| 暫時停止實施議事規則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六） |

## 符號說明

（一）申訴問題之自身，不得付委，不得延期，不得擱置。惟可隨申訴之本題一同受此三種之動作。

（二）若在不定下會開會之期而散會等於終止者，則此議可討論。

（三）除屬於時日者外，不得修正。

（四）除附有訓令之付委外，不得分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除附有訓令之付委及委員已開始進行，不得復議。

（六）委員已開始進行，不得復議。

（七）除刪去並加入之修正案外，不得分開。

（八）修正案除其本題尚懸而未決者外，不得付委。

（九）復議已受擱置者，不能抽出，其問題作爲終結。

（十）休息之時間可以修正。

按：「會議規範」一書，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民權主義教育的基本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解釋「民」字的意義說：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這顯然是告訴我們，所謂「民」不是烏合之眾，而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一個國家裏的人民的政治生活，不過是各種團體和組織生活所表現的較高形式。如果說教育是國家的根本，那麼，國民團體生活的養成，必然是一根本之根本而不容忽視，勿論你叫他是民主的教育也好，政治教育也好，公民教育也好，團體教育也好，在本質上只是一個發動羣力的教育問題。

近代是一科學的時代，同時更是一個羣力對比的時代，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要在近代站得住，不單在組成這個國家分子個別的是如何智慧超羣，而是要看這個國家是否能發揮他偉大的羣力。教育上不能認清這一點，那仍是科舉時代的舊典型，不能擔負現在國家所付予教育的責任。猶太人是一個很優秀的民族，世界上的大科學家，大思想家，大金融家出於猶太籍者特別的多，然而猶太人畢竟不能建設起一個基礎穩固的近代國家來。中國民族在世界上，論文化的悠久，人民的優秀，智慧的超羣，我們雖不敢誇大比其他民族爲優秀，卻也不比其他民族爲拙劣。爲甚麼我們以四萬萬之眾，百餘年來尚在困苦中掙扎，不能建立起一個近代富強的中國呢？講到此地，可以歸納成爲無數的理由，概括來說，不能發揮羣力仍是一個總的因素。也就是我們雖然人口眾多，卻是我們四萬萬之眾，有如一盤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散沙一樣，不能發揮出偉大的羣力來，我們如果有方法把四萬萬的散沙變成像鋼骨水泥一樣的堅實，我們的國家便自然的會富強起來，而不爲其他的列強所輕視和壓迫。英國以一小小的島國，過去能夠掌握幾個世紀世界的霸權，原因是由於英格魯撒克遜民族富於組織的精神和自治的習慣的特性。有人曾經這樣說過：有了三個以上的英國人在一起，便能通力合作，團結一致來做一番事業。有人說，德國也是近代了不起的一個國家，他了不起的原因，是在三個以上的德國人在一起，便會組織起來像一支軍隊，步趨一致，紀律嚴明。

我常常這樣的想：假如三個以上的我們中國人在一起又是如何呢？說得可笑一點，如果祇有三個中國人在一起，便來一個三人合玩的紙牌，四個人在一起，便合玩八圈「麻將」，鈎心鬥角，損人利己，各逞陰謀，把牌場變作戰場，不是你死我活，便是大傷感情，寧可一個人優勝稱快，不管他人失意痛心！這看起來雖是一件小事，然而細細的研究起來，這種社會普遍的習尚，在我們中國社會教育上所滲透的惡影響，眞不知有多大！牠戕賊中國民族合羣團結的天性，所構成的罪惡比鴉片恐怕還要利害。中國民族正如　中山先生所說有如一盤散沙，不能發揮合羣互助的天性，這種風氣的養成，不能說是無關係的！中國有句俗話說「一個和尚擔兩桶水吃，兩個和尚抬一桶水吃，三個和尚便沒有水吃」，這好似說我們在三個人以上便沒有辦法組織起來互助合作了。中國人並不是不知合羣團結的重要，相反的，如果我們拿另外一些成語來研究，如：「二人同心，其利鍛金」，「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衆志成城」等等，都是在說明團結合作的重要，不過我們有了這一認識之後，我們的社會沒有一套好的習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慣和好的方法來表達他罷了！因爲沒有好的社會風氣和有效的表達方法，故我們社會中所存在的團體和羣力的表現，僅在於一些宗族、親故、同鄉、幫會的關係上面。最壞的是過去的朋黨門戶之見，現在的小組織與派系之爭，這些完全是在一些私利的基礎上結合起來的一羣力量，很少在公道、是非、主張和國家民族的利益上結合起來，在爭權奪利，把持操縱，傾軋與排擠的習性上發揮到了極致，一旦到了利盡的一天，則便如鳥獸散了。

有人曾把中西的民族性從音樂與遊戲作過一番比較，他說：西洋的音樂遊戲有一基本，是以合作爲原則，中國的音樂則以不合作爲原則，如西洋的交響曲和合唱，球類如足球、籃球，皆必須講求配合與合作才能表現得好，而中國的京戲以獨唱者爲多，合唱者很少見。如果以中國最普通玩麻將這一遊戲作一比方，如果四人中有二人合作起來便成笑話了。此雖小節，在社會教育上也值得深省了。

在西洋的社會中，上述那些壞的現象從前也都有過，而且現在還存在得有，不過他們在近代的社會進步方面另外培養出了一種新的，基於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基於一種公的目的，以獲致和諧的羣體力量的社會風尚與方法，我們還不曾作有效的運用罷了。換句話說，那就是近代民主主義的眞諦我們還沒有十分的了解和實用。過去我們對於近代民主主義所重視的是一些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空洞的名辭和觀念，而沒有在如何實踐民主，表達民主，在方法與程序上用過苦功夫。至少也是知道了而並沒有實際的去做。這一原因不能不說應當由清末到現在，廢科舉興學校後的一套教育制度負其責任。

民主政治，正如　總理所說是世界潮流的趨勢，順之易，而阻之難，我們革命要採取民權制度的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由也正是爲此。不過如果我們只採用民主政治的皮毛，而不在如何實踐民主的方法和習尚的培養上用功夫，我們所遭遇的，將是民主的空洞、爭吵、紛亂和困擾。因爲民主政治的基礎在社會，社會的基礎在教育，教育的根本搞不好，正如沙灘上建屋，愈建得高大，愈崩折得容易。從清末到現在一般人只知道民主政治要有一部憲法來應用，而不知道民主的國家在憲法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基礎，那就是社會的憲章，甚麼是社會的憲章呢？就是　中山先生在革命之初，三民主義的講演尚未完成之前，首先寫作的建國方略中的社會建設就是民權初步，在西洋叫作 Parliamentary Law，我叫他做「會議規範」，日本叫作議事法。人家從小學到中學便已用此來養成青年一種合羣團結，表達民主的工具，在大學中則列爲一種課程供學生的選讀，而在中國，除了外國人所辦或有關係的學校尚較著重此門課程之外，其他我便不多見了。有人曾經向我提及教會學校的學生與我們本國人所辦的學校出身的學生，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在團體的精神與活動方面，兩者之間顯示出的一種差別。前者好似活潑團結的居多，後者則不免渙散鬆懈，主要發揮在個人表現上面。他說這或許是由於教育上所產生出來的不同，不然同樣的是中國人，爲甚麼結果會是兩樣？我曾服務大學教育三十餘年，我細心的研究這一問題，我雖不敢完全承認這一看法是正確，但我也不能否認他是不正確。至少把他作爲我們教育上研究參考的資料是不會錯的了。

當我在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內時，鑑於那時民主自由的聲浪隨着政治風潮成爲一種供人利用的政治工具時，那時青年的囂張、凌亂，少數刼持多數，善良者畏縮，浮燥者抬頭的情形之下，壓抑之，則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反潮流，即勉強作去也必無善果。助長之則社會必流於大亂，國家將賴以延續其生存的後代青年，必將共毀於此一洪濤巨浪之中，我內心的徬徨與痛苦，幾至廢寢忘餐！那時我認爲唯一可以喚醒青年的良知，免於爲少數不肖份子所操縱劫持的方法，無過於教育青年如何實踐民主，尋求多數，表達民主的眞精神更爲有效了。因此我打算在川大把外國大學都有的一門功課 Parliamentary Law，會議規範，列在課程之中，供學生選習。不料事有出乎意外者，等我把教授這門功課的事遍詢全校很多的教授講師，竟無敢承認擔負這門功課的人。所謂不敢並不是說他們有甚麼別的恐怖，而是由於這些眾多的教授講師中對於這門功課都不曾研究或學習過，至於對這門功課的重要，更說不上興趣了。我這一志願因此也就不曾實現！我自得了這一次經驗之後，我纔回想起　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一書的序言中曾經這樣的說過：「自西學之東來也，玄妙如宗教、哲學；奧衍如天、算、理、化；資治如政治、經濟；實用如農、工、商、兵；博雅如歷史、文藝，無不各有專書，而獨於淺近需要之議學，則付闕如，誠爲吾國人羣社會之一大缺憾也。」他又說：「夫議事之學，西人童而習之，至中學程度則已成爲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羣團體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　中山先生當時所引以爲憂者，是淺近需要的「議學」尚付闕如，所以他在繁忙紛擾的時局中，仍分出時間來完成「民權初步」這一議學的寫作，此書之重要及其用心之苦，可以想見了。三十多年來，我們對於此一工作，作得太不夠，這究竟由於我們的不知呢？還是由於我們的不肯開起來，但是我此後凡是遇到有參加學生集會活動的機會，我必以　中山先生的遺教最忽視而又未切實推行的部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這件事來指導他們如何去尋求多數，如何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假定不是認爲我在誇張的話，以川大那樣龐大的大學，在當時政局的動盪，青年的浮囂盲動、罷課、遊行的狂濤中，尚能比較表現出一種安靜讀書的氣氛的原因，實在是得力於此一種教育的力量最大。我不是說當時發生在全國各大學的一切風潮在川大都絕了跡，而是說別的大學有的現象，川大仍然都同樣的存在，不過是在川大發生了以後，一定要被學生本身或以多數或以公意的力量，把他壓服下來。這是用民主的實踐來解決紛亂，不是用權力高壓來處理問題。我至今對於民主制度，尚存着高度的信心的原因在此，我認爲要對付共匪極權最有力的武器也只有民主這一條道路才通，因爲民主是一種基於人性所需要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共產極權世界所施行的一套奴役，迫害，和否定個人自由，則完全與此相反。當今是人類最大一次思想的鬥爭，也是人類在生活上應當在自由與奴役，人與非人之間所必須作一個最後選擇的時候。過去蘇俄的宣傳者對凡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人都被他目爲法西斯蒂，其實法西斯蒂也是極權政治的一種，他與蘇俄的極權政體是同源而異流，殊途而同歸的，凡是蘇俄所有的一套罪惡的統治，如奴工，如否定個人自由，如不講求公道與法治等，在法西斯蒂政權之下都是同樣的存在。在權力使用的個人和方法上，兩者間容或有所不同，而在哲學的根源上是同一的極權暴政則是無可置疑的。蘇聯把一切反共產主義的人都目爲法西斯蒂，眞是滑稽與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我相信對極權暴政在思想與哲學上眞能對立起來的只有民主，能打倒極權暴政的也還是只有民主世界所具有的諸多特點如：自由、尊嚴，與和諧那些寶貴的東西。

去年我在一偶然的場合，看見日本文部省頒布的一本中學及高等學校應用的「學習指導要領」，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東西，有些類似我們的「教學指導大綱」，在此書的「社會科」篇中我發現日本人在戰後教育上有一種新的改變，這一改變的特點是要以民主教育做中心以代替以往軍國主義的教育，著手方法則是從小學教育做起，以議事法的實施爲養成青年學習民主的教材，關於實施的方法與步驟，均計劃得非常週詳而有用。我自看見日本戰後教育上這一新的動向之後，眞是不禁要感慨係之了！

中山先生曾經這樣告訴過我們，他說：「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議事只是一種民主的形式，譬如我們一個人辦不了的事必須約集多數的人來先共同商量辦理一樣，而這種商量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律與程序，固然表現不出民主，民主如果不能做到人心固結，羣力發揮，那也徒是具文而已。所以說集會議事只是民主的形式，要達到羣策羣力才是民主眞正的目的。當前我們面臨着一個無比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所採用的民主形式的集會與議事太多和太浪費了！爲什麼會議太多的民主形式反成了浪費和嚴重的問題呢？其原因是我們只重於形式而沒有表現出民主來，更沒有做到民主所需達到的羣策羣力的緣故。我們今日會議之多的原因，在壞的動機上講，凡是要推卸責任的事，便假會議以免去責任，明明是自己私心要做而不敢公開負責去做的事，也利用會議的形式，劫持會眾爲之負責，會議之時發言既不容暢所欲言，處理又無規律與程序，既無討論又無正式之表決，在無可如何之中便以「無異議通過」而處理一切了！「無異議通過」在議事習慣上有「全體一致認可」（Unanimous Agreement）之意義，苟非在會眾意見已趨共同，或係例行之事上用之，甚爲不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因爲如有一人反對，則重要之事也將被阻止而不獲實行了！相反的，假使以正式表決之方式爲之，只須取得多數便可。東方人最講情面，用「有無異議」之方式徵詢會眾意見，似乎帶有「有誰反對」的意義存在，此在西洋民主習慣已經養成之會眾，在表示其異議是一種個人的責任與自尊，本一極爲尋常之事，而在東方人重情面，計利害的習慣上，一遇此種場合，往往只有在內心苦笑中表示其默然無意見之態度了！民主的運用本爲每一團體分子在共同活動上一種積極的態度的表示，以消極的態度參加近代的民主活動，是極其不相宜的，故民主制度在今日如果不能培養出國民對國事或公共事務一種積極的精神，民主制度的前途在中國是有其困難的。中國人爲甚麼對公眾事務如此消極呢？ 中山先生在論到中國以往民權不張的理由，及四億優秀文明之民族等於一盤散沙之原因時，曾慨乎言之，而歸根於過去我國專制政治所養成。他說：「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羣力發揚耶？」

中國過去專制政體在歷史上遺留下此一病根，所以到了民國時代人民自己做了主人，尚不能以主人的地位行使主人的權力，這是何等重大的一個悲劇！由於這一病根表現在一般會議，便產生了兩種極其嚴重的現象：一是不熱心參加會議，出席會議的情緒低落，二是縱然勉強出席也默然不表示意見，因顧慮太多，態度便形消極。不發言不一定是贊同的表示，相反的便易流爲一無言的反抗性質了，這是弱者另一種反抗權勢的消極態度。在民主制度之下，不論是國家或其他團體，此種現象長此存在，便將是無比的嚴重問題。民主制度最大的功能便是要把一切的事情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求眞理，求得共同，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即是要在求得多數的意見，以表達羣策羣力的效果，換句話說，就是要他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寧可他言而不當，不可任他退有後言，也就是說然成長，如果把一切放在太陽底下，使它自濕的地方，便易於腐爛了！壞事只有在黑暗壞事來的。

「民權初步」是　中山先生指示我們實行民權的方向，他的目的不一些基本的觀念和態度。簡要言之，約爲下列幾點：

一、人格的平等和個人的尊嚴應被尊重。

二、服從多數與寬容精神。

三、不同的意見或反對的意見可以共存。

四、坦白公開的爭取，退不後言。

要養成以上這些基本觀念和態度，只有今後教育上痛下功夫，否則在我們來開始做，時間尚未晚。在這一工作進行上，我認爲在大專學校應當列爲正式課程以供學生選讀，在中小學應以之作爲公民訓練的中心，所謂訓練應在實際演習方面著重，使學生從動作中練習集會議事的規律和程序，從而明白合羣團結之可貴。因此各級學校教材之編製與審定，應爲適當之配備，實屬必要。就我個人所知，此工作之推進，今日已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如何行之有效的問題，故對教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除應有適當配備之外，必須妥籌此項師資之培養。以往所以成效未著，原因。

任何社會都需要一種「維持，從前我們所講的是尊、卑、長需要的是「羣禮」，「民權初步」就是表達這種「羣禮」的具體條規，這一民主「禮俗」的養成是十分的重要，因爲這是社會建設與政治建許是萬分艱苦，也許是路途甚爲遼遠，然而只要我們有決心、有計畫，達到目的地的。

——錄自「中國一周」第二五七期，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版。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 從和平的氣氛看戰爭

記得在一九五〇年各國共產黨徒在莫斯科爲史達林慶祝七十大壽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傳說：當時各國的共產黨徒，曾以共產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不可避免一問題來問史達林。據說史氏的答語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能力來發動對共產世界的第三次大戰，要是世界眞有第三次大戰的話，發動此一戰爭的主動是在共產世界方面，而不是在資本主義那方面。」

史氏上述這番話，其詳情如何，我們不得而知。拿他說這番話的涵義來說，實在具有其重大的意義。那就是說，他把民主國家的弱點，看得十分透澈，任你民主國家如何反俄反共，如果蘇俄不向民主國家進攻，民主國家是不能主動發動對俄戰爭的。在以往杜魯門的圍堵政策也好，艾森豪的解放政策也好，杜勒斯的大量報復政策也好，其表現的成績，不外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在蘇俄要把世界局勢，變作緊張的時候，世界便跟着緊張。蘇俄一旦喊出和平的時候，民主國家雖然不一定就鬆弛下來，至少也得採取一種觀望的態度。於是進攻與退守主動之權，便完全操在蘇俄手裏了。因此，蘇俄對於民主世界的戰略，與政略，必定堅守着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原則：打得贏的時候，便打；打不過的時候，便用滲透、顚覆和高唱和平，來鬆弛民主世界，造成一個更有利的形勢，來摧毀民主世界。我們要了解今日世界局勢的緊張與鬆弛，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從這一概念來衡量一切，是不會錯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俄的遭遇，當以現在爲最困難。弱點的曝露，也再沒有比現在更爲明顯了。例如史達林的死去，貝利亞的被整肅，馬林可夫的垮臺，人民的困苦，及內部繼續未已的紛擾等等，正說明蘇俄當前，需要有一個時間，來整理內部和應付危難。恰逢這一時會，西德恢復了主權，民主國家在歐洲，取得了對俄一個很有利的形勢。此一成就，在蘇俄一方面看起來，當然是十分不利的。蘇俄對此既不能積極有所作爲，便不得不暫時放棄對民主國家的挑釁的行爲，而改取一時退卻的守勢策略。蘇俄運用守勢的手法，便是他慣用的以和平口號來愚惑和鬆弛民主國家，以獲得喘息整理的機會。我們必須知道「退卻」一辭，在蘇俄策略的意義上，叫作「再結集」和「準備更大的進攻」，這完全是一種暫時性的和策略性的，如果我們把這種退卻和守勢，而認爲是蘇俄的本意，那便是一個錯誤。我想，民主國家不會如是其天眞的。

自從蘇俄作出一連串的「和平共存」「緩和東西的緊張局面」等等和平的姿態之後，在民主國家的一方面，自不免對於和平，又呈露出若干的幻想和奢望。「和平共存」一辭，在蘇俄策略的涵義，究竟是如何，我們姑且不論。在此，我要拿歷史的事實，來對當前世界的形勢，究爲戰爭？抑爲和平？作一衡量。戰爭在未來人類的前途，是否可以避免，我們在此處不用多費唇舌。至少，戰爭在人類以往的歷史，是不曾永久避免過，而當前，人類更是面臨着戰爭的威脅，卻也是千眞萬確無可否認的事實。從過去的歷史，可以看出有兩個很顯明的事實：一是歷史上每一度的戰爭，可以帶來一段時期的和平。二是在每一度戰爭之前，必然要經過一度的和平醞釀，然後爆發戰爭。換句話講，戰爭在人類的歷史經驗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可以帶來一個時期或長或短的和平。可是在另一方面，戰前的和平運動，往往又是戰爭的前導。遠的我們不必論，就拿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勢來說，各國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的和平努力。卻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國弗蘭西斯·斐迪南大公，在奧匈帝國所屬的波斯尼亞省一個小鎮市的街上，被一個粗率的南斯拉夫青年刺殺，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卽爆發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有英相張伯倫在慕尼黑對德的屈辱協定，希圖藉此可以阻止戰爭，結果所帶來的，都是戰爭，而不是和平。使來栖赴華盛頓的和平談判斷定在今日民主與極權兩個世界尖銳對立之下的和平醞釀，不是戰爭將要到臨的前奏呢？這一些和平的說明和平將要到臨的象徵。因爲戰爭是慘酷的，可怕的。正切的面臨着戰爭的威脅，而不是恐懼戰爭，便想避免戰爭，因爲甚麼呢？因爲戰爭是慘酷可怕，人們因爲往往是和我們所想的相反。說也可笑，在人類的經驗上，唯一可以避免戰爭的途徑，便只有希望和平當一個戰爭的發生，其主動有時不是完全操在不恐懼戰爭的一方，相反的倒是屬於恐懼戰爭的一面。因爲人類不能把招致戰爭的種種因素，根本清除，便不能有眞正和平的實現。於是和平往往僅是一種弱者的幻想，或敵對雙方一時延緩戰爭，以待更有利的形勢到來，消滅敵人的策略而已。因此，愈是恐懼戰爭的一方，愈更要爭取戰爭的機先和優勢，以擊敗其敵人，而免於被其敵人擊敗的慘痛。結果，恐懼帶來的是戰爭，並不是和平。和平的幻想，往往便也成爲戰爭的前導了。

我們對於當前蘇俄發出的和平氣氛，至少也可以作如以上的看法。也許有人會以爲：就民主世界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極權世界兩者的勢力現況講，民主國家勿論在世界人心的趨向上，生產進步上，數量質量的優勢，均操在民主世界這一方面。因此勿論是和平也好，戰爭也好，認爲蘇俄是不足畏的。不錯，我們姑且假定這一切的估計都不錯，一切的優勢，都在民主世界這一面，我想不是如此似乎有幾點，應當加以考慮，來代替對民主國家的威脅，是很顯然的。我們要了解此一問題是否眞實，

民主國家的優勢，是否可以永久的保持下去？是我們應當考慮的第一個問題。假使是可能的話，隨之而來的問題，便發生了。那就是在今日戰爭武器如原子彈、氫彈，在使用上的毀滅性的可怕，是值得我們對所謂「優勢」與「劣勢」的觀念，要加以新的估計。譬如說：民主國家有最新的原子彈一萬個，蘇俄對同樣的原子彈，只有一百個，一百與一萬之比，當然優勢在一萬一方面。我們對「毀滅性」這一個問題。假使是可能的話，隨原子武器的性能，加以研究，或決定一個戰爭的成敗的話，如果有一百個原子彈，便可以毀滅一個國家，那末，優勢與劣勢的意義，便不同了。那就是說，誰能獲得「打人先下手」的機會，儘先使用那一百個原子彈把敵人摧毀，便是優勢。縱然你有一萬個原子彈，而不能搶得機先，來對付你的敵人，你便將被你的敵人所毀滅，而成爲劣勢，一萬個原子彈雖多，也變得無用了。我看來，是極權國家一個特有的優點，而民主國家，倒反是望塵莫及的。取得戰爭的主動，在任何時期，都是制勝的重要條件。我們爲民主世界最引爲隱憂的，在此。史達林所謂第三次大戰的主動，是操在蘇俄的一方面的話，是值得我們深省的。尤其是在毀滅性的原子戰爭時代，在這一情形之下，「圍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與「大量報復」政策，恐將有不能適用的危險。二次大戰時，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假定那時的日本擁有足夠的原子彈的話，我想勝利的一方，將是日本而不是美國。

第二個問題，我們應當加以考慮的。今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的對立，形成了兩個主要的戰場：一是在歐洲，一是在亞洲。蘇俄對於民主世界的策略，在沒有足以從事戰爭的實力與時機的時候，他決不會發動大戰，他唯一有利的政策，便是利用他的衞星與附庸，來消耗和疲勞民主國家，而置身事外，坐享其成。在歐洲方面，自西德恢復主權以後，蘇俄可以利用民主國家縫穴的地方，已大爲減少。在其歐洲的附庸國中，更無一足以供其驅使，以困擾民主國家的有利形勢。縱然有可供其驅使的附庸，但將冒蘇俄與民主國家間的直接戰爭的危險，這當然是蘇俄所不願爲的。因此，在歐洲今日的形勢，可能帶來若干一時的和平。但是，在亞洲方面，亞洲有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力和資源，可利用以與民主世界爲敵。一面，一旦大陸匪共與自由中國發生衝突，或與其他民主國家發生衝突，蘇俄可能仍隱藏在幕後，以打擊民主國家，而不致冒與民主國家直接戰爭的危險。何況大陸共匪，正以全力，與蘇俄趕修由甘肅經新疆以通蘇俄，由綏遠經外蒙古以聯接蘇俄本土等等鐵道幹線，蓄意是在有一極大的軍事企圖。這些交通幹線完成之後，中國本土與蘇俄便成了一個史無前例橫貫歐亞的大陸陣勢。歷史上大陸與海洋的爭霸戰，直到今日，才完成其最大的規模與最大的形勢。亞洲問題的嚴重，眞是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

世界的情勢既如上述，蘇俄今後的策略，必將在歐洲，暫時採取守勢，而在亞洲，必以其全力來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用中國大陸匪共，對民主國家爲一猛烈的攻勢，是無可置疑的。因此，今後亞洲的局面，將愈更緊張，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以美國爲首的民主陣營，如果仍視爲這是亞洲一隅的得失，而不加重視，此一戰爭的成敗，必將影響民主國家一切優勢的存在，那正是蘇俄所希望的。如果民主國家能以全力來支持此一戰場的成就，或具有「擒賊先擒王」的實力與決心，直接以一隅的戰爭，轉變爲對蘇俄的直接戰爭，我想蘇俄是不敢一戰的。蘇俄既不能對民主國家出於一戰，大陸的共匪，便將失去其對蘇俄的依恃與憑藉，而不敢與不甘作蘇俄的鷹犬，來發動亞洲的侵略戰爭。這樣，大陸的共匪內部，必將發生變化與內潰，可爲預斷。自由中國在取得這一有利形勢之後，便可以與大陸的反抗共匪暴政的人民，及一切反共力量，聯結爲一起，以收復中國大陸。如此，民主國家所犧牲致力者少，而所獲者多。世界如果要眞有和平，這是到達和平的最大捷徑。

民主國家今日是否能夠抱定決心和魄力，來應付當前的局勢？是否仍依違兩可，以坐失機先？那就要看民主國家的人民與政治家的明智抉擇了。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十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際時局展望之一

自蘇俄採取和平攻勢策略，以另一面貌從事於國際政治的活動之後，究竟在民主國家間發生了何種影響，是我們引爲關心的一件事。第十屆聯合國大會已於前日開幕，在首次的會議中，蘇俄代表提出排拒自由中國的代表權，也如往時一樣不爲大會所接受，而通過了美國代表洛奇「本屆大會不予考慮任何主張排斥中華民國代表或予中共代表一席之建議」的提案。從本案表決的結果來看，與去年九屆大會中同一問題的表決情形，只是一票之差。去年投贊成票者四十三票，反對者十一票；今年則爲四十二票對十二票，而通過了洛奇的提案。造成此一票的變動原因是因爲去年印尼棄權，今次印尼則投反對票；去年以色列投贊成票，今年則棄權；如是而已。此一結果可以顯示出民主陣營並不曾因蘇俄最近一套和平攻勢而引起了重大變動，至少也不如若干人事前所想像的那樣壞，這是值得高興的。

以上這一事實只是說明了在民主陣營當中還不曾發生重大的變化，卻不能說是排拒共匪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便已經獲得了解決。因爲在國際問題複雜到極點的今日，若干短視與自私的國家對於大陸匪共仍存着有很大的幻覺，幕後種種不利於我的陰謀與活動，至今仍是未能澄清。我們姑且舍去這些不談，就拿洛奇提案的本身來講，在議事法上這只是一種擱置，擱置也只是本屆大會對此一問題不作考慮而已，並不是不能實現於將來。未來或許的案今次不作考慮，下次仍可提出，不利於我的事不能實現於今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我們的坦途，也許我們的困難將更甚於今日，關鍵仍在我們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來面對更艱苦的奮鬥。照道理講，聯合國曾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以大會名義宣布共匪爲侵略者，在這一決議沒有撤銷以前，任何准許共匪進入聯合國的提案與決議均不能認爲合法。如果聯合國對這些重要的原則都不予以維持，那末，聯合國便等於取消了她自己。聯合國是爲促進世界和平、正義與合作而創立，假使一旦聯合國爲滿足一些自私的國家而放棄她崇高的原則，聯合國也將不值得吾人予以重視了。

當然，聯合國的成立僅僅只有十年的歷史，我們對她如果希望過奢，事實上也屬不可能的。因爲就是在民主陣營的國家之間，仍存在着個別的不同的利害、認識和打算，因此聯合國對付極權國家的步驟，也不容易統一。舉一個淺近的例來講，我們的國策是「反共抗俄」，而在民主國家的國策也許是「反俄抗共」。我們把「反共」放在第一位，把反共放在第二位，這自然顯示出了參差不同了。其實，勿論在理論與事實上，要把反俄與反共分得開，確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你要打倒共匪，如果不能打倒蘇俄，而不能打倒共匪的話；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打算。這一參差的發生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因各個國家間處境與遭遇的不同發生出來的差異。共匪佔據了我們的大陸，我們對於反共特別感到迫切；民主國家受到了蘇俄的威脅最大，所以他們對反俄感到特別的迫切。在民主國家中仍然可以對其國內共黨准其合法存在，而在我們則勿論在感覺上與行動上都是不能容許共黨存在的。民主國家與自由中國觀點的不同，無過於對大陸共匪的態度了：在我們認爲非消滅大陸共匪，我們不能重建國家，此點，絕無考慮之餘地；在民主國家則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爲只要能夠把中共與蘇俄分得開，對俄的問題便解決了一大半，所以與廢在他們不算一回事。從此一論點來說，我們不僅與民主國家發生了。這是我們今天一切問題的關鍵，儘管在理論與事實上，反共與反俄是分不開的。

大陸匪共擁有幾億人口和廣大的土地與資源，這一龐大的力量，構成對民主國家一個大大的威脅，所以在民主國家反蘇的政略與軍略上，中共便成了必須善爲處理的一個問題。爲民主國家着想，如果完全爲蘇俄所利用，這當然要量，這是民主國家所不願爲的。即使能夠單獨以武力解決匪共吧，但是必須要付出相當的犧牲和代價才有可能，而民主國家目前則尚無此勇氣，輕於一試。那末，怎麼辦呢？於是民主國家目前的對策便只好一面在軍事上嚴陣以待，一面則不得不於戰爭之外，另覓途徑來軟化中共，使其與蘇俄脫離，使蘇俄陷於孤立，如此蘇俄便不足畏了。這是若干年來民主國家對大陸匪共所存在着的「狄托幻夢」，酣夢到了今天似乎尚沒有覺醒的象徵，便是這個道理。歷屆聯合國大會對於共匪進入聯合國問題，不爲斷然的處置，未始不是另有深意存焉，這自非局外人所能知道。最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是：每次關於排拒自由中國的代表權，而以匪共來代替的案，都是由蘇俄的代表所提出。我想，如果眞的有那一天，共匪眞能夠進入聯合國的話，這究竟是否蘇俄內心所願爲的事，實在令人費解。因爲匪共要得進入聯合國，自必須以與民主國家更爲接近爲條件才能辦得到。中共與民主國家密切接近的結果，是不是於蘇俄有利，實在是一極其微妙的問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主國家一些政治家，一心一意在希望大陸共匪變做狄托，如果大陸眞有狄托出現，在民主國家反蘇的政略與軍略上當然是事半而功倍了。不過，問題的關鍵不在你希望匪共做狄托，而是在匪共是否有做狄托的可能。假定有可能的話，大可不必待至今日，而今天則的確是爲時已晚了！在韓戰的初期，如果聯合國的軍隊把轟炸與戰爭擴展到中國的東北，把共匪與蘇俄的地形隔斷，在這一假定之下，共匪不是投降，便只有做狄托的一途，現在時過境遷，此一希望似已在幻滅中了！

在一九五零年，正當韓戰爆發後幾天，本報曾經舉行過一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我在座談會中曾經指出匪共不能變狄托的理由。我的理由很簡單：第一、亞洲已經成了民主與極權兩個世界的決勝點，在歐洲已經有了一個狄托，蘇俄決不容許亞洲再有一個狄托產生，蘇俄必以全力來防止中共變成狄托。這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我當時並沒有料到歐洲那個與俄絕裂的狄托是帶有幾分假的，照今日許多的跡像看起來，狄托與蘇俄的關係又已重建起來了，過去的反俄是否是一種僞裝，還待以後的事實來證明。我當時所持的第二個有力的理由是：我認爲韓戰的發生是蘇俄加強控制共匪的手法，這是中國的兵家所謂「攻其所必救」，在蘇俄的策略，叫做「投入鬥爭」。共黨爲要掌握某些勢力，不論是團體或個人，便往往用「投入鬥爭」這一策略來達到他的目的。韓戰的結果，勝利雖然沒有完全屬於蘇俄那一面，可是蘇俄把共匪投入韓戰，因而伸展其勢力到中國大陸，加強了對大陸匪幫的控制，使其不能自主，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了，到了今日，我仍確信當時我這一看法是十分正確的。

綜上所述，我們不是完全否定共匪無變狄托的可能，而是說在蘇俄嚴密控制之下，狄托勢力在大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無法抬頭，縱然偶或發生，也不過如饒漱石、高崗等事件，隨起而隨被消滅罷了。這於整個世界反俄的推進並無多大的好處的。我想民主國家並不是有愛於狄托主義產生在中國一起，成爲一個很大的力量來威脅民主世界。假定民主世界的「狄托幻夢」的作用僅在於此，那末，最經濟而最有效的辦法，無過於支援自由中國反攻大陸了。因爲要引發大陸共匪內部的變化，不能一味的坐觀其來，而是要有外在的壓力去引發，才能規模宏大，制敵死命。此種對大陸加強禁運與封鎖，一面更需要自由中國向大陸反攻。一旦自由中國的力量進入到大陸，所有大陸的反共勢力和共黨內部存在著的民族主義的力量，必與自由祖國的勢力匯合在一起，共匪的崩潰瓦解，可說是將迅速到不可想像。現在大陸的情形是：共匪正在整肅內部，經濟困迫，民生凋敝和人民反共武力一天一天的成長強大之中。這正是造成共匪崩潰瓦解最好的機會。我想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們應當考慮及此。假如民主國家不急切掌握此一最好機會，而把希望寄託在與共匪和談協議，這只能增加共匪對內的威望，使大陸上一切反共的人民和力量趨於消沉，共匪藉此機會來喘息整理，民主世界的困難將百倍於今日，可爲斷言。我們這一意見不單是爲自己打算，更是在爲整個反共反蘇的民主世界的利益打算！

自蘇俄與共匪以另一溫和面貌出現於最近國際政治之後，國際局勢陷於十分的混沌，人們悲觀的氣氛似乎在增長之中，在我的看法，這也許是黎明之前的黑暗，解決問題的距離也許是更爲接近了，我們自也用不着洩氣和焦慮。耶穌有句名言：「你們不要擔心明天，因爲明天會擔心它自己。」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重遊日本

最近因出席國際文教組織亞洲區域會議歸來，友朋中不少以日本近況見詢。大家尤以日本戰後之復興及今後日本在民主與極權兩大陣營間之態度如何，殷殷垂詢，希望就我個人的觀察所得有所闡述。我這次赴日，先後僅兩週。大部時間與精神，都集中在出席會議。時間如此短促，問題又復如此重大而龐雜，既未能專心考察過，又何能便有所得以告朋友？假若一定要問我此次赴日所得的是些甚麼？那就只有從若干表面的接觸，所引起的一些回憶與感慨而已。

我曾在日本留學兩年。我離開日本，是在民國八年，距離現在已三十六年了，當我民國十二年冬，由美乘船返國，路經橫濱，正是日本大地震之後不久，橫濱、東京，滿目荒涼，有如一片廢墟，但是不久便重建起來。我此次重到東京、橫濱之前，滿以爲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期內，遭遇了那樣重大的戰時轟炸，必定瘡痍未復，至少仍可看見若干戰時被毀的痕跡，以供憑吊。但是今日的東京與橫濱，又已第二次重建起來了！而且重建後的這些地區，比以往的，還要規模宏大，華麗與繁盛，勝過了當年不知有多少倍！東京的人口，據說已超過了八百萬人。照理，日本是一個戰敗國，而我們總算是第二次大戰後一個戰勝國，日本戰敗後的復興，如是其迅速驚人！而我們於戰勝之後，卻遭遇着共黨的猖獗，把整個的大陸，淪陷在共黨的手裏，致數億的同胞，正生活在奴役與迫害之中，這一對比，使人眞不知涕泗之何從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這一種沉痛的心情，並不是在妒嫉日本的成就。相反的，日本的復興，正值得我們之借鏡與反省。

在我未至日本之前，曾經遇到過兩件事，使我於重遊之後而證實了。有一個可愛的孩子，於年前赴美留學，道經日本。他看見了日本的進步，感到自己國家遭遇的苦難而悲痛，他來信說竟至痛哭了一場，因此更堅定他立志要求得高深的學問，準備爲國家，盡他最大的服務。另有一位從事實業的青年，於考察日本歸來，他對於他的事業與工作，忽然較前振奮而努力。人問其何以如此？他的答覆是：「日本的進步如此，我們還不急起直追嗎？日本的進步，是從刻苦與努力而來，並不稀奇。日本做得到，我們也該做得到，假使我們能同樣努力的話。」如果要問我遊日的印象如何？我的結論與這兩位青年的感想，是一致的。今日自由中國，並不乏振奮有爲的人。這兩位青年，不過是我們所知其中的一二而已。要使這些振奮有爲的成人或青年，能夠把他們的心思才智，專一用到國家的建設與復興上，我認爲培養他們活潑向上，自由創造的精神，和解除他們身心上蒙受的麻煩與束縛，是其一端。而如何擴展他們的識見與觀摩，以吸收他人的長處，更爲必要。因此，我認爲獎勵出國考察與留學，在目前並不是一種浪費，而是一種迫切的需要。我們當前最大的任務，是在復興與建國。而日本，便是我們最近最好的一個借鏡。近來每一談到留學的問題，大家都注意到赴美深造，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其他的國家，可資學習借鏡的，如像英國、法國，如像戰後的西德，我們竟少有人談及，一說到赴日本留學，便更沒有人注意了。在我看來，今日的日本，值得我們觀摩借鑑的地方太多：第一、是距我們最近，費用雖比臺灣高，卻比其他國家爲廉。第二、是日本的實業發展的過程，和我們相似的地方不少，學起來，較爲實用而不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空。第三、是日本不久以前的處境，比我們現在的情形，更爲艱苦。日本的復興，正可以作爲我們的借鏡。因此，我願在此一談留學日本的問題。

從清末到第二次大戰以前，留日學生的人數，占我國留學生之首位。惟以漫無政策與計畫，以致失之量多而濫。我們今日要談赴日留學問題，當然不是漫無限制，不加考慮的。譬如說：日本戰後大學林立，合乎水準的大學，與限制選讀適用的學科，是應當予以注意的。甚至有人顧慮到日本的知識界思想左傾的危險，好似便可成爲日本非青年深造的地方，作爲理由。我想這更是不足一顧的。爲甚麼呢？譬如：美國是大家最欣賞的一個可以留學深造的國家，據我所知，美國大學中，對於近代學術思想，如今日大家認爲是洪水猛獸的馬克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且設有專門講座，任人選擇。也許正因其如此，美國今日不僅沒有爲共產黨所化，而且成了自由世界反共的中心。相反的，帝俄時代，是著名的思想不自由，學術不自由的國家。而列寧所領導的暴力革命，竟於一九一七年，首先發生在俄國。假定我們認定日本今日，已走上戰後復興的大道，是不錯的話；同時，又認爲所謂日本左傾思想，是一件可怕的事。那麼，日本復興，應當絕對無望了。相反的，正因日本對於各種學術思想的態度，是自由的，和適度的放任。而這些思想，在經過考驗之後，好的，便日在成長之中；壞的便逐漸失去其存在，這顯然是日本走向復興的好現象。據我所知，左傾思想在過去幾年，日本的情形，是相當的可怕。到了今日，則已日在消失之中了。中國有句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凡事只要不以過分人爲的力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加以限制，自然便會產生出眞理來。普通的事物如此，思想的問題，更是如此。今日談青年問題的人，如果對於自己的信守，沒有一種眞理的自信。同時，對於青年一代的人，沒有一種其能選擇眞理的信賴，我想思想問題，或教育問題，終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決，以消除共黨的橫流的。

如果說，我此次遊日，尚有一些對於日本的了解。我想有兩件事，是值得在此一提的：一是日本於戰後，在政治上已開拓了一條民主政治的大道。二是在經濟上，日本的工業復興，已接近先進工業國家技術的水準。說到民主政治，在日本已經開拓了一條大道，當然，日本自明治維新數十年來，所樹立的憲政與法治的基礎，未因戰敗而摧毀，是其一因。或許正因戰敗的結果，把日本軍閥破壞憲政與法治的危險消除而獲得了保全。在戰前，日本有兩大勢力，決定了日本對內對外一切的傾向和政策：一是舊的藩閥權勢的遺留，所造成的後期軍閥的勢力；一是明治維新以後，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所造成政治社會上的財閥勢力的擴強。日本人民，在這兩種影響之下，在過去是很難自拔，有所作爲。由於戰敗的結果，此兩項足以阻礙日本民主自由發展的障礙，顯然的已自然而然的被消失，至少也是減弱了。因此，今日民主自由，在日本便有了前途。推行起來，便減少了困難。從這一角度看，戰爭給日本帶來的，也許不完全是一種災禍與不幸。

說到日本戰後工業的復興，一般人的看法，以爲日本在盟軍佔領期內，一面在國防上減少了大量支出，有美國爲他負責安全。佔領軍在日本的大量消費，倒使日本增加了不少收入。韓戰的發生，和美國的援助，當然更是日本經濟復興的一個有力的支撐。在我看來，這些都是若干原因的一種，而不是唯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原因。我認爲日本工業復興最基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日本人民勤勞刻苦的精神，始終尚能保持。在戰前，日本關於企業的組織與管理，本早有了很好的基礎。而大批工業的技術人員，與優良的科學工作者，在戰前卽已有了很高的水準，並未因戰爭而歸於消滅。這正好似戰爭所毀器，一旦重建的機會到來，所建設的工業，便是最新的和最經濟的，比以往的，在質的方面，更爲進步。我想西德戰後的復興，與日本是同樣的情形。由此便可知道，科學與技術，企業的組織與管理的基礎，在一個國家的復興，是何等的重要了。關於科學的獎助，與人才的培養，是今日一切問題的基本。我們的復興，應當以日本與西德爲借鏡。我認爲今日甚麼都可以節省，惟獨關於科學研究與專門技術人才的培養，所應作的努力，與所要用的錢，則是不可忽視愛惜的。這是一種最有利的投資，也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所在。

東京號稱有八百多萬人口，在我未去之先的想像中，東京的情形，不知紊亂與煩擾，到了東京以後，所見到的，卻是意外的有條不紊，市容整齊而又清潔。拿交通一項來講，以一八百餘萬人口的都市，卽以每日市民的移動而論，至少當在數十萬人以上；而此數十萬人移動的交通工具的供應與管理，當是一件困難而不易的事。因此，一次我特別由橫濱搭乘火車至東京車站，轉高架電車，再乘市街電車返回東京寓所，眞是人如潮湧，勢如賽跑，各項車輛開行到達均準時確實，啣接不亂，實一驚人之事。假使稍一錯亂，必至全般陷於癱瘓。市民之反感，將可想而知了。西哲有言，其大意是說「一個有行政效率的政府，才是一個眞正的好政府。君主和民主的政體，讓那些傻瓜去爭辯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想任何政府，如果不在公共的管理上，發揮出最大的效率，使人民在舒適，使其無憂無阻，遂其所願與所事，是不會爲人民所愛戴的。要人民面努力求之，當更爲切實有效。

驟然到了日本，生活的高昂，是一件可驚的事情。在我看來，遊客造成了東京各地的繁華享受，與生活的高昂，在日本人的本身，而是由於日對此似乎並不盡然。我想，這不盡是由於日本多數人，仍是在過其勤樸刻苦的生活所致。由東京到西京的火車上，我高級人員。當到了用餐的時候，外來的客人，都走入車中餐廳，大吃其貴員，則在火車停站時，匆匆下車去買一些簡單的麵食或便當充饑。這種刻習的，何況我們國家的遭遇，當前比他們更爲艱難呀！

最後，大家最關心復興後的日本，在民主與極權兩個世界當中，今後是我們應當解答的一個問題。的確，在過去和現在，日本政府，在某些場論與姿態，是容易使人莫測高深，發生誤解的。這究竟是否就是日本政府，除非日本要走向自殺的道路，別的理由，不容許日本以此做去，我不願在此多講。我要說的，是復興後的日本高度工業化的未來。毫無疑義，日本在戰前和戰後，及在亞洲，日匪共在大陸所蠻橫從事的，都是一個工業的先進國，而今也是要走向高度工業化的道路。勿論共匪所工業，或一般工業，在我看來，是在國防，在不久的將來，都將是日本的致命傷，或日本的一個勁敵。拿匪共國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工業的發展來講，所給予日本共存。拿給予日本的，是安全的威脅，而不是與日本的出路，在如此情勢之下，便要窒息了。日本的政治家，豈能慮不及此？至於與匪共合作吧，假若日本品的推銷市場，則匪共在大陸所倡言的工業化，便會被夭折。如果要以生這當爲匪共的主子蘇俄萬萬所不容許。有此種種，從遠者大者看，日本除可通的。這是我對於此一問題粗淺的看法。

——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一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對於四十八年度預算案補充意見

謹就七月二十二日常會通過之四十八年度預算中，遵奉　總裁指示，撙節籌撥四百萬元「列爲專款」，以作：㈠補助清寒黨員大專學生五十至一百名獎學金，㈡選拔優秀黨員出國深造五名至十名，㈢年老同志退休金十名至二十名之用一項，提出補充說明，如何採納，敬希列入紀錄，並交主管同志計劃實施。

一、所謂「列爲專款」，應指不得移作其他用途之意。若加以引伸此一專款之運用方式，當以「基金」方式最能樹立制度，垂諸久遠，意卽將此四百萬元作爲「獎學及退休基金」專戶存儲，以其息金分作上述三種用途。

二、本基金設置後，可吸引海外同志對本基金之捐贈，尤以海外捐贈之外匯部分，可充作留學獎學金。

三、接受本黨同志遺產、喜慶、喪葬各項節約之移贈。

四、本黨各項經費之節餘，酌量撥充於本基金。

照上項辦法，則基金數額必然日積月累，年有增加，不僅嘉惠同志，培養人才，且可積累成一本黨巨大之財產，覩情況之發展，使用之於其他獎助學術研究、推進文化各項工作，良法美制，定可垂諸久遠也。

茲就四百萬元基金之使用分配，概計如後：

壹、專　論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此四百萬元基金之利息，以月息二分計，年得息金九十六萬元，以半數（四十八萬元）充作留學獎學金，以四分之一（二十四萬元）作退休金。

二、留學獎學基金二百萬元之息金四十八萬元，照目前官價結匯，可結購美金一萬二千元。若規定每名獎金額爲每年二千四百美金，可敷五名獎學金之用。若每名獎學金額減少，則可設置之名額增多，如以留學三年爲期，則於明年後年各再增撥基金二百萬元，即可週而復始，永遠保持此一留學獎金名額。

三、大專獎學基金一百萬元之息金二十四萬元，如規定每名獎金額爲每年二千四百元（即每月獎金二百元），則可設置五十名。以四年畢業計，則今後三年內，每年須再增撥本基金一百萬元，四年之後，即可週而復始，永遠維持此一獎學金名額。

四、退休基金一百萬元之息金二十四萬元，如採一次給付方式，平均按每名一次給付四萬元計，則每年可退休六人。

以上僅就四百萬元基金子息之使用分配作一概計，若能吸引海內外同志之捐贈，提倡遺產、喜慶、喪葬各項節約之移贈，以及按年以黨費節餘、黨營事業之盈餘，酌量增撥，充作基金，其數額日積月累，必大有可觀。基金愈多，則獎助之範圍必愈大，此誠本黨培養人才、獎勵科學發展之百年大計矣。

按：原文時間未詳，約在民國四十七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檢定考試改進方案草案

## 一、現況概述

檢定考試係爲不具備法定學經歷應考資格而有志應高普考者而設，乃現行考試制度特色之一。經普通或高等檢定考試及格，分別取得普通或高等考試應考資格。凡具有高級中等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同等學力者，得分應普通或高等檢定考試。現每年舉行檢定考試一次，其基本法規爲考試法及檢定考試規則。

檢定考試類科，係配合高普考試類科，自四十一年以來迭有增加，至四十八年二月，普檢已增至三十七類科，高檢增至五十類科，合共八十七類科。考試科目亦大都與高普考試相同，普檢爲六至七科，高檢爲六至八科，部份類科含有實地考試。

依現行檢定考試規則之規定，各科目成績以均滿六十分爲及格，及格者發給及格證書，部份科目及格者，就其及格科目發給科別及格證明書，於五年內續應各類科檢考時，得免再考其及格科目，即連續於五年內將各科目檢定及格者，取得報應高普考資格。

自民國二十年辦理檢考以來，除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及三十八等四年停辦外，每年均舉行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次，至四十七年止共已舉行二十四次，經檢考及格者，計普檢二、七〇九名，高檢三、二六三名，合計五、九七二名。科別及格者之資料不全，自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七年止，計普檢九、九〇六名，高檢一一、七六二名，合計二一、六六八名。至及格人數與到考人數之比例，茲以四十七年檢定考試爲例，高檢部份到考三、三二八人，一次全部及格者十五人，佔到考人數百分之〇・四，累計五年及格者二二八人，佔到考人數百分之五三・一八。普檢部份，到考二、五四六人，一次全部及格者二六人，佔到考人數百分之一・〇二，累計五年及格者二三八人，佔到考人數百分之九・三五，科別及格者一、一〇七人，佔到考人數百分之四三・四八。由此實例，可知檢定考試之一次全部及格者甚少，高檢不過二百五十分之一，普檢不過百分之一，即累計五年及格者亦不足百分之十。

再就檢定考試及格人員參加高普考試之情形，以四十七年高考爲例，各種應試資格之報名人數與其錄取人數之比例，檢定考試及格者爲百分之十七，普考及格者爲百分之十三，大學及獨立學院畢業者爲百分之十，專科學校畢業者爲百分之六，高中畢業服務三年者爲百分之三。此一比例數字，固足顯示檢考及格參加高考成功之機會最高，但由於檢考科目與高普考科目大致相同，形成重複之考試，故易於錄取。

關於檢定考試之用費，以四十六、七兩年檢考爲例，計四十六年檢考共用四五八、五八一・三二元（新臺幣），報考者七、四八四人，一次全部及格者三一人，累積五年全部及格者四九八人，是則每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取一個一次全部及格者之平均費用爲一四、七九二・九四元。四十七年檢考共用四六二、八四九・七一元，報考者六、九六一人，一次全部及格者四六六人，每考取一個一次全部及格者之平均費用爲一一、二八九・〇二元。其他間接費用尚未計算在內。以超過一萬元之成本考取一個一次全部及格者，以近千元之成本考取一個五年累積及格者，就行政觀點言，有欠經濟。

## 二、問題分析

㈠檢定考試之應考資格，漫無限制。現行規定，有中等學校畢業之同等學力者得應普通檢定考試，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之同等學力者得應高等檢定考試。而應考人是否眞正具有中等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之同等學力，正爲檢定考試之證件足供繳驗。結果，使不具任何學歷經歷者，均可隨意報應普檢或高檢，不免在試務上多所浪費。此點雖爲檢定考試之特色，亦正因漫無限制，使應考者易啓躐等僥倖之念。

㈡檢定考試之應考年齡，現無限制，本部在另一方案內將建議規定高檢應考年齡同宜有所限制。

㈢檢考類科過於繁多。現行檢考係配合高普考試，已增至八十七類科。而檢考及格報應高普考試之類科範圍，則相對減少，例如普檢人事行政人員及格，僅能報應普考人事行政人員，較之高中畢業可應普考行政人員任何類科者，轉而失之過嚴，對應考人洵屬不利。且類科既多，試務增繁，費用亦由而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多。

㈣檢定考試科目多與高普考試重複，既未盡配合學校課程，亦未以實用爲其重點。例如普通檢定考試科目，並未將高中所授主要課程定其考試科目。故現行制度之檢定考試，列爲共同考試科目，亦未照大學有關科系之課程之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英語等科，列爲共同考試科目。高檢彌補應考者學歷之不足，實不足認定其確已具有高中或大學畢業之同等學力。以學力並非眞正相等者同被列爲高普考之應考資格，並非立足點之平等，自欠合理，故檢考科目亟須以經驗學識之測驗及實用技能之培養爲改進之目標。卽高普考試學科內容，亦應以實用爲主，以期符合考用合一之原則。

㈤檢考類科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部份，有若干類科所考之知識技能，似非經正式學校教育，絕難自修有成者，例如醫師、工礦技師等，除書本知識外，尚須有實習、實驗、實作等經驗，以鍛鍊其技能，增進其知識，在學校以外極難獲有此等機會，故歷年檢考內「實地考試」一科之及格比率極低，例如四十七年高檢法醫師、醫師、牙醫師、及普檢鑲牙生四類，參加實地考試者二〇三人，及格者僅有八人。而辦理此一實地考試所需之人員，計有醫師四一人，助理醫師一〇〇人，監場人員七人，護士五人，醫院行政人員一〇人，事務人員二人，工友七人，共八二人。其直接間接費用，當在萬元以上。以如許人力財力，爲鑑別八個及格人員，似屬浪費。苟非就難以自修有成之學科，予以培養之道，亦失檢定考試之本意。

㈥科別及格辦法應加改善，以配合時代進步。按現行辦法檢考科別及格之有效期間爲五年，在五年內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各該類科考試時，得免再考該科目。此種辦法雖於有志苦學之士不無鼓勵，但科學進步，一日千里，五年前科別及格之水準，五年後可能已不足配合時代需要。以五年分大體一致之最新知識水準，從而增加選拔難使高普考應考人皆能具有眞才之困難。

爲齊一參加高普考試人員之素質，提高水準，選拔實用人才，使未具正式學歷之應考人，皆能本其自修與實踐所獲之知識以彌補其學歷之不足，配合考用合一之目標，並符合「檢定考試院會議決議「檢定考試視同學力檢定」之主旨起見，現行檢考辦法有予通盤研究改進之必要。

## 三、改進辦法

基於上述分析，提出改進檢定考試之基本認定如下：

㈠檢定考試之作用，在予失學青年一自修進取之機會。任何教育發達之國家，其普及程度以國民教育爲主，能完成中學、大學畢業之人數，必然逐層減少。就我國目前在臺情形論，據四十五學年度統計，學齡兒童就學率爲百分之九三・八二，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爲百分之四九・二二，（見行政院主計處四十六年十一月編印統計手冊），各級升學比率雖云不低，但因故不克升學深造完成學業者，究佔最大多數，此中必有不少遺才。若再善加改進，必更能鼓勵廣大失學之青年自勉力學，循序晉升，此對我國現行考試制度一大特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社會之裨益至鉅。

㈡作育人才之道，原非僅學校之一途，無論在工廠、在醫院、在機關、在軍隊，以及各行各業之在職青年，皆可因工作之需要，環境之誘導，興趣之發展，而自修力學，並以其經驗彌補學歷之不足。此等由工作實踐獲得知識之青年，實爲最佳之工作人員，以檢定考試之晉升途徑，鼓勵甚多青年由自修而進步，實可促進國家工業化及加速社會各部門職業技能之進步。

㈢高等及普通考試所選拔者，一爲公務人員，一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選此兩類人員，皆在實用，並非拔取學術研究人才。故高普考之應考資格，不限於學校畢業之一種，但低於規定之學歷者，倘欲報應高普考試，原則上均應先經檢定考試。例如高等考試之應考資格，本部將另案建議規定以大學及獨立學院畢業爲準，則專科學校畢業者，既不夠大學畢業水準，欲應高考應先亦經高等檢定考試。同理，普通考試之報考資格既爲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則普考及格者欲應高考，應先經高等檢定考試。因此，高等檢定考試之作用加強，爲免漫無限制之應考，徒然增加檢定之困難，故應規定高等檢定考試之應考資格，至普通檢定考試，則仍不限資格，俾奮勉力學者有其上進之途徑，躐等僥倖者得以限制。

㈣爲便利眾多失學青年參加檢定考試，應擇若干難於自修有成之學科，洽請學校或學術機構或業務機構開設講座，增加補習機會，俾能培養有道，擴大檢定考試之功用。

㈤檢定考試應本檢定其學識能力之主旨，舉行考試，故考試科目固應配合學校課程，尤應在考試內容上側重實用之知識，爲使有一標準，應編定各科目之考試範圍，俾自修者有所準據，命題者有一範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諸上述五點基本認定，擬定改進辦法如次：

㈠**應考資格**

關於高等及普通考試之應考資格，將另案建議，規定高等考試之應考資格限於大學畢業或高等檢定考試及格兩項，普考之應考資格限於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兩項，以糾正應考資格參差不齊之缺點。凡非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欲取得普考應考資格者，皆須經過普通檢定考試同應規定考試，藉檢定考試測驗其學力，因而檢定考試規定應考資格，分擬如左：

1.普檢：仍照現行辦法，凡自認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同等學力者，均可應考，使自修有成之士，有其進取之途徑。

2.高檢：應考資格如左：

①專科學校畢業者。

②普通考試及格者。

③修滿大學二年學科業已離校一年以上者。

④修滿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之全部課程達三分之二學分以上者。

⑤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曾在公私機關服務三年以上者。

⑥曾在公私工場、醫院、軍隊擔任技術工作六年以上者。

㈡**應考年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應考人之以檢考及格資格將來報應高普考之公務人員考試者，規定普檢之應考年齡爲年滿十八歲至三十歲，高檢之應考年齡爲年滿二十歲至三十五歲。其將來報應高普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者，不限制高普檢定考試之應考年齡。

**㈢考試類科**

普通及高等檢定考試類科，分依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學分院分系情形，各分爲若干類，類以下再分爲若干組，凡政府機關需要而學校未設之系科，如兵役、人事等，以及學校雖有設置而爲政府機關所不甚需要之系科，如音樂、體育、考古、哲學等，檢考時不予列組，其分類分組辦法，舉例如下：

1.普檢：甲類不分組，經本類考試及格者，確定相當於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報應普考。乙類分爲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及醫事（護理、助產）等五組，經各該組考試及格者，即分別確定相當於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及醫事等職業學校畢業程度，報應普考。

2.高檢：如以法學爲甲類，類下分爲法律、政治、經濟……等組。如以農學爲乙類，類下分爲農藝、園藝、森林……等組，經上列各組考試及格者，即分別確定相當於大學法律、政治、經濟、農藝、園藝、森林等系畢業程度，報應高考。（詳細分組表另訂）

**㈣考試科目**

1.考試科目定爲，普檢六至七科，高檢七至八科。

2.普檢參照現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高檢參照現行大學課程，就考試及格人員未來各項職務上實用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必需，擇其基本而需要之科目分別擬定標準考試範圍。例如：普檢「甲類」考試科目，似可定爲國文、公民、中外史地、英語、數學、理化、生物等科目。高檢「甲類」「法律組」考試科目，似可定爲國文、憲法、民法、刑法、商事法、民刑訴訟法、法理學等科目（各組詳細考試科目表另訂）。

3.廢除檢定考試內「實地考試」科目，改於高普考試內對檢考及格報應各類需要實地考試之類科者，增加實地考試一科。

### ㈤成績計算辦法

變更現行科別及格辦法，改爲各科成績平均計算，滿六十分者爲及格，但有一科成績不滿四十分者，不予及格，如平均成績不及格，而有科別成績優異者，爲示鼓勵，特按成績之高低，分定其保留期間，在有效期間內，續應檢定考試者，應考人得聲請免試該科目。

1.成績在七十分以上之科目，於一年內，應同類組檢定考試時，得免除該科目之檢定。

2.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之科目，於二年內，應同類組檢定考試時，得免除該科目之檢定。

上述關於考試類組之劃分，及考試科目之擬訂等，於此僅係作原則性之說明，以表明其方針。至於詳細分類分組表及考試科目表等，容俟方案核定後，再邀請專家詳爲研訂，以期完善。

## 四、本方案改進辦法與現行辦法之比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㈠照改進辦法之規定，自修有成之士欲參加考試，除具有報應高檢資格者外，須先參加普檢，普檢及格後參加高檢，高檢及格後再參加高考，仍有進取之機會，保存現制之優點，但須循序遞進，而不得躐等驟應高等檢定考試。

㈡改進辦法將檢考科目一面配合學校課程，一面重視應考人實踐所獲之知識經驗，以彌補其學歷之不足，以符合院會決議「檢定考試視同學力檢定」之意旨起見，故將高檢應考資格予以限制，現行檢考辦法，既失寬濫，科目又多與高普考重複，難於測定及格人員是否具有廣博實用之知識基礎，自亦無從斷定其學力。

㈢改進辦法使及格人員報應高普考試之類科較爲廣泛，凡高中畢業生所能報應普考之類科，普檢甲類及格者亦得報考。大學某系畢業生所能報應高考之類科，高檢相當類組及格者亦可報考，此爲「檢定考試視同學力檢定」之進一步的實施，符合「博而後精」「通而後專」的精神。在應考人方面亦可專心準備考試科目。縱然中途變更所欲參加之高普考類科者，亦無須先變更檢考類科。

㈣改善現行科別及格辦法，使應考人之知識水準，能隨時代而進步。其成績特別優異者，仍予保留一年至二年，不失現行辦法之鼓勵作用。至將成績改爲平均計算在重視應考人之個性發展，使能以長補短，但有一科成績過低者仍不予及格，俾各科知識皆具相當水準，於重視特殊中兼顧及平衡。

㈤廢除檢考「實地考試」科目，改於高普考時對少數類科之以檢考及格報考者實施之，使實地考試人數減少，可簡化試務，節省人力財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五、附帶應有之措施

㈠修改考試法及檢定考試規則等有關法規，並擬定新的檢考類科與科目。

㈡搜集中等以上學校各科教材，就檢定考試各科目，研究擬定考試範圍命題標準。參考材料，關於普通檢定考試部份，並分科編擬基本及參考之書籍。

㈢擇就難於自修之科目，洽請有關學院，或學術機構，或業務機構，開設若干講座，以便利檢考應考人補習。

㈣訂定部分學科及格人員補修學科之獎助辦法。

㈤過渡辦法

1. 在新檢定考試辦法實施前已取得普通或高等檢定考試及格之資格者，仍承認其資格，得照原規定報應普通或高等考試之有關類科。

2. 在新檢定考試辦法實施前科別及格人員，除自願放棄經及格科目之權利，另行參加新檢定辦法之考試外，其尚未及格之科目，再予一次參加檢定考試機會。於考試前一年先行公布，聲明此次檢考係照舊辦法最後舉行之一次，其報考者限於前已科別及格仍然有效之人員，檢考科目及成績計算均照舊辦法辦理。其全部科目及格者，取得檢考及格資格，其仍未能全部科目及格者，改依新辦法重新參加新的檢定考試，其前已科別及格之資格，不再繼續採認。使舊辦法之檢定考試合理結束，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後再依新辦法辦理新的檢定考試，以免新舊混淆。

——錄自「考銓月刊」第一〇〇期，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一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三十九人委員會審查議事規則修正案提出審查報告後之感想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五日

在國民大會的預備會議中卽發現了幾項關於議事規則的重要提案，如高心一、唐君武、賈永祥、楊揚、富聖廉各代表等所提，關於重要的議案表決須採秘密投票方式之提案。在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一次大會中激起了爭辯紛擾的，便是關於修改議事規則的討論。經過了兩次大會的熱烈爭辯，然後才由大會把這一大案交給三十九人組成的委員會加以審查。審查委員會中包涵了正反兩面各原提案人，各黨派的重要代表。審查會經過兩次冗長的辯論，一次是由一日晚上八時起至翌晨的二時止，二次是自三日晚八時起至四日晨一時止，全案方在審查會和諧一致的氣氛中獲得結論。

## 協議未到絕望絕不輕言表決

我在兩次審查會議中，見到參加會議的各代表，各人爲了忠實於自己主張堅持的精神，一面使我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分佩仰，一面使我對本案要獲致結論，深感困難，而隱憂重重！在會議中，有慷慨陳辭的女代表裴鳴宇先生等，大家都感覺到今日國家的處境困難與國民大會今次會議所負歷史任務的重大，由於殷切希望早日達成協議，以利國家，故不覺熱情之奔放了。

在開會之始，彼此事前有一約定，即關於本案之討論，非萬分必要，不採表決方法，而須以和諧協議之途徑以求得到結論，故在辯論中，雖數次瀕於破裂，終因出席委員都抱定忍讓寬容的精神，幾經週折，故終能獲得結論。事後出席各人相互研究此一問題能獲如此結果，大家都覺得這將歸功於彼此抱定：「協議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表決」的決心所致。議事規則審查會好似一個小型的政治協議會議，此種協議的精神，如能爲大會所採納，這次的大會一定會獲得圓滿成功的。

在社會上不免有人對此次大會開會以來，由於爭辯激烈，不免躭誤時間太多，而引爲是這次大會的一項遺憾。實則民主政治本來就是英國人所謂的「以議爲政的政治」；有議便不能避免爭辯，爭辯與其說是一項不好的現象，毋寧說是民主政治一項特色。大會在投票採秘密或記名一點的爭辯上，情況激烈，在實質方面有其重大意義，因爲民主政治有一基本原則「多數決制」。要尋求出多數當然表決是不可少的一項手段，而投票表決的方式爲記名，或爲無記名，當然應爲爭論的焦點。所以表決方式的熱烈爭辯，不能不說是這次大會的一項進步。

## 國父民權初步應加切實推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自光緒三十四年開始成立近代的議事機關「資政院」以來，爲時已經五十多年，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機關，爲了討論議事規則而如是激烈認眞，不能不說是僅有的一次。從民主政治演進的角度來看，這實在是一項重大的進步。國家亂，需要有法來治理他；議事要能順利進行，以表達民主，沒有一部完整的議事程序與法則，又何能做到圓滿成功呢？所以我說這是五十多年以來，民主政治在中國的一項進步。　中山先生在寫「民權初步」序言中對此曾有以下極精闢的議論：

「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爲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羣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也。……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民權初步」一書，本來就是西方所謂的議事法。　中山先生何以要以西方之議事法而以「民權初步」名之，很少有人加以注意。　中山先生在此書序言中曾言：「此書所取材者不過數種，尤以沙德氏之書爲最多，以其顯淺易明，便於初學，而適於吾國人也。」所謂「沙德之書」，據曹文彥先生最近的考證，「沙德」之名，英文爲 **Lucy Shattuck**，其所寫之書原名爲 **Wome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出版於一八九一年，意譯出來便是「婦女參政的議事手冊」。沙德爲一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婦女參政運動者，那時美國婦女還沒有參政權，她之所以寫這本書的動機，很顯然的是爲了告訴美國婦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如果沒有具備表達民主的知識和經驗，婦女雖然有了參政權，也是等於無用的。由此可知　中山先生命其書名爲「民權初步」，其意卽在告訴我們素無表達民主的方法和修養的中國人民，如果要實行民權主義，便非學習表達民主的程序與法則不可，所以他命其書名爲「民權初步」。

「民權初步」出版於民國六年，距今已四十四年，我們到了今天才加以注意，不能不說是一項最遺憾的事，然而能從今天起，切實加以推行，也不算得太晚吧！因爲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我們終須向着這一方向前進，與其「空言」，毋寧「起行」。能夠「起行」便可達成我們的目標，所以我說今日才加以重視，並不算得太晚。

## 議會典例影響常較憲法為大

各國的議會都有一套條規和成例，猶如司法機關之判案，不但要有法律的條文可以引用，而判例的引用亦爲必要。國民大會在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時曾通過了一項會議規則，因爲第二次大會時，呆板的引用了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十三條：「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由主席團擬訂，提請大會決定之」。於是向第二次大會提出了國民大會第二次大會議事規則案，提請大會予以通過，而一切問題便發生於此。尤其是一部份代表的意見，認爲在新的議事規則未通過前，不能適用舊議事規則，因而耽誤了大會許多討論的時間。這一次審查會最重大一項修正，便是將原案標題「第一屆」和「第三次」的文字都予以取消，成爲「國民大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議事規則」，以後大會代表雖然隨時對其中某項條款可以提出修正案，以期其完善，但不必在每次大會中提出議事規則的新案，致發生不必要之爭執，影響大會之進行的毛病了。現大會對這一建議業經予以採納，這確實是值得稱道的一項改正和進步。名政治學家畢爾有言：「議事典例，對於國家政治行爲之影響，常較憲法所發生者爲大。」這次國民大會議事規則通過之後，以後可以補充更多之修正與累積處理各項議事之習慣與成例，使其更趨於完善，正如美國國會議事所依據的哲斐孫手册一樣，百餘年來雖每次的修改案未通過前，舊的之適用，不能因而阻撓議事之進行。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近年來教育文化的發展和今後努力的方向

——陽明山第二次會談文教報告

## 壹、前言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五八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這是我們教育文化一切設施的基本方針。

當前國家正遭遇到空前的厄運，民族文化也受到赤色毒梟強烈的摧殘，我們一切努力的總目標，是「反共建國」、「重建大陸」，因此現階段教育文化工作的使命，不僅是爲了建設臺灣，更是爲了重建大陸而作準備，樹立基礎。

我們對匪的鬥爭，不能從有形條件上作量的對比，是要在質的比賽上搶先，在此科學突飛猛進的時代，所謂質的比賽：一是發展高深科學，對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一是發揚固有文化，把中華民族從根救起來。

## 貳、教育文化發展概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一、各級教育的發展

近十餘年來，臺灣各級教育，在有計畫的推進下，發展甚速，由於實施土地改革和發展工業建設的結果，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更加上人口的急劇增加，遂使學生人數逐年激增，到四十九學年度，臺灣各級學校在校學生，已達二、三四八、七五一人，與人口總數一〇、七九二、七五一人比較，平均不滿五個人中卽有一個是學生。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達百分之九五・五九；國民學校畢業生的升學率達到百分之七九・五六，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達到百分之五一・二四，初中畢業生的升學率達到百分之七六・三七。教育發達的程度，比歐美各國並無遜色。

地方教育經費在預算上所佔的比例，早已超過憲法所定的成數，三十五年度臺灣省教育經費僅佔歲出的百分之八・四一，四十九年度已達到百分之二八・六六。縣市教育經費，三十五年度平均僅佔歲出的百分之四・〇四，四十九年度已達到百分之三六・八〇，其尤爲突出的例子，如桃園縣四十九年度竟高至百分之四二・一一，臺南縣五十年度高至百分之四二・四，可見地方政府重視教育事業的一斑。五十年度中央與地方的教育經費共爲十四億七千餘萬元，也可見財政負擔的沉重。

如將各級教育三十八學年度的情形，和現在作一比較，更可對近年來教育發展的迅速，獲得明晰的印象。

㈠**國民教育**：國民學校三十八學年度爲一、一九九校，學生八九二、七五八人，四十九學年度增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八四三校，學生一、八八八、七八三人，學生人數增加一倍多。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三十八學年度爲百分之七九・〇七，四十九學年度已提高至百分之九五・五九。

㈡**中等教育**：三十八學年度中等學校計有二〇六校（普通中學一二一校，職業學校七十七校，師範學校八校），四十九學年度增至三六一校（普通中學二四二校，職業學校一〇九校，師範學校十校）。三十八學年度中等學生共有一一四、六一八人（中學七六、三八〇人，職校三三、一五五人，師範五、〇八三人），四十九學年度增至三五五、二七四人（中學二六三、三六五人，職校八四、三三七人，師範七、五七二人）。學生人數增加兩倍以上。

㈢**高等教育**：臺灣境內專科以上學校，三十八學年度僅有六校（光復之初僅有四校），全係公立，四十九學年度已增至二十七校，其中私立的有十三校。三十八學年度共有學生五、九〇六人，現在增至三五、〇六〇人，幾乎增加五倍，平均每一萬人中卽有三十二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此項比率低於美國，高於英國。至於大學研究所，三十八年度招收研究生的僅有四所，共有研究生七人，現在已增至三十七所，共有研究生四三七人。

㈣**社會教育**：補習校班三十八學年度爲七十六所，四十九學年度已增至六八六所。學生數由六、五九四人，增至五八、八五一人。至掃除文盲人數，據民國四十年統計，臺灣全省計有文盲一、四一三、五六九人，約佔全省人口百分之一七・九六，經過歷年努力掃除以後，截至四十九年，已減爲百分之七・二四，至福建金馬地區文盲，預計本年度可以全部掃除。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二、重要的教育設施

㈠**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爲發揚民族精神，增強反共抗俄意識，經修訂各級學校課程，在中小學加強國文、公民、歷史、地理的教學，在高中及專科以上學校恢復講授三民主義，出版反共抗俄的書刊，設置三民主義獎金，加強學校訓導工作，指導學生深切體認四維八德，篤實踐履，培養成健全的人格。

㈡**提高師資素質**：臺灣在日據時期，各級學校的教員，幾全由日人充任，光復後，一面積極的培養新師資，一面就現有的人才加以檢定，解決了當時的需要。近幾年新養成的教師增多，逐漸代替了原有的代用教員，師資素質已見提高，更對在職的中小學教師每年舉辦各項講習會、研習會，使有研習進修的機會，並選送優良教師出國深造，現爲更提高國校教師的水準，正將師範學校陸續改爲師範專科。關於專科以上學校的師資，一面恢復資格審查，一面擴充研究院所招收攻讀博士、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並辦理公自費留學生考試，使優秀青年可在國內外繼續深造，以培養新的師資。對在職教員，則予以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的便利。

㈢**改進學校課程**：現行的中小學課程標準，都已難適合現時的需要，爲求改進，經邀請專家分別予以修訂，修訂的主要精神，在加強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和生活教育。國民學校部份，力求減輕兒童課業負擔，實施六年一貫制；初中部份，於初三設普通就業知識的科目；高中部份，注重分化，在選修科目上或同一科目的教學時數上有所區別。現正將修正案廣徵各方意見，俟再參酌整理後，即可公布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施。師範學校的課程標準，亦正隨同進行修訂。

職業學校的課程，劃分爲農業、工業、商業、醫事、海事、家事六項。其訓練重心，初職的課程，側重實際技能的訓練，高級的課程，則兼顧基本理論的講述，但均注重實習，初職的專業科目，佔百分之三十，實習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又爲使工業職業學校的科目，更能適合專精的需要，已多按單位行業科目再加細分。

大學文、理、法、商、師範、農、工、醫學院各系科的課程，均已修正實施，修正的主要精神，是儘量減少各系科的必修科目，俾各校可以多列選修科目，增加課程的彈性，易於適應各校的需要。

㈣**舉辦教學實驗**：研究和實驗，是改進教學的張本，近年來所做的實驗工作，有學制與課程改革的實驗，有四二制中學實驗，四年制中學實驗，生活中心教育實驗，示範農職的實驗，國民學校教學法的實驗，教材的實驗，以及若干調查、研究、測驗等等，都是爲尋求更合理更有效的途徑，以增進教育的效果。

㈤**發展初級中學**：爲增加國校畢業學生的升學機會，並爲延長義務教育預作準備，於四十四年訂頒「發展初級中等教育方案」，四十五年三月復參照實際情形增訂本方案，頒訂「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初級中等學校實施方案」，劃分初中學區，增加初中容量，使志願升學的國校畢業生，可以免試升學。四十五年指定新竹縣先行試辦，四十六年又推廣到高雄市，中因地方財政籌措困難，四十八年度起停止試辦。不過初中入學考試競爭的激烈，仍是個嚴重的問題，臺灣省乃又於五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指定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北市及臺南市試行「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的辦法，劃分省縣兩級努力的重點，使縣市集中力量辦好初中，減緩因競爭少數省立中學而引起的惡性補習現象。

㈥**實施文武合一教育**：實施文武合一教育的目的，在配合軍事需要，訓練國防幹部，建立教育與國防合一的基礎，和恢復我國固有的文武合一教育制度。四十年九月，先在師範學校恢復軍訓，四十一年夏季起，實施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預備軍官訓練，四十二年起，高中實施在校軍訓，並舉辦高中畢業生預備士官訓練，四十三年起，專科以上學校也普遍實施了在校軍訓，作爲預備軍官訓練的一個階段。至於初中部份，自民國二十三年起，即普遍實施童子軍教育，根據學校教育的需要，採用童子軍活動的方式與內容，力求與高中軍訓相配合，相啣接。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爲配合文武合一教育的實施，自四十二年起每年舉辦大規模的暑期青年訓練，分爲戰鬥技能、學術研究、社會服務、育樂活動四大類，頗能適合青年的興趣與國家的需要，總計九年來參加暑期訓練的大專及高中學生已達七二、一九四人。救國團歷年來鼓勵優秀青年投考軍事學校，輔導海外華僑青年回國到軍中服務，並自四十七年起每年利用假期舉辦青年學術年會，使學術研究與國防需要相結合。

㈦**發展科學教育**：發展科學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學生的科學精神，和講求科學方法。在國民學校方面，已分在十四所學校從事科學教育實驗，編有實驗教材，設有活動示教車，並以展覽廣播等方式，啓發兒童對科學的興趣。在中等學校方面，也指定十四所高中（本年下半年續選十八所）從事實驗，另補助四十所初中興建科學實驗室及充實科學設備，辦理科學教育師資的研習與進修，並編印科學刊物，舉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科學展覽，佈置完善的科學教育環境，以激發學生學習科學的志趣。在大專學校，則儘量充實圖書儀器等設備，並設置獎學金，獎勵科學研究。

㈧**推行勞動生產教育**：在各級學校儘量培養學生手腦並用的習慣，並爲配合經濟建設的需要，培養技藝人才，加強發展職業學校。另在三十所職業學校及中學成立技藝訓練中心，共分四十八科，利用各校師資設備，招收青年及婦女，於晚間或課餘實施技藝訓練，養成實用的專業技能，學成後輔導就業，以增加實際生產的人力，三年來的結業學生，共達一萬三千餘人。

㈨**輔導僑生回國升學**：僑生回國升學的人數，每年都有增加，四十九學年度在臺僑生已達八、二一八人。因爲僑生來自海外各地，生活習慣和學業程度，各有不同，對國語文的素養，一般較差，因而先後設立兩所中學收容僑生，針對其特殊的需要，實施教育。對分在各校的僑生，也特別加以照顧，由各校專設機構或指定專人負責輔導，並利用晚間或寒暑假設班補習，幫助僑生完成學業，累計大專畢業已返回僑居地的僑生，已達三、四五三人。

## 三、發展科學研究

我國科學落後，必須急謀發展，迎頭趕上，近年來對此項工作的努力，頗爲顯著，已辦的重要事項如下：

㈠**培養科學人材**：爲培養科學研究人才，首先擴充了大學研究所，特別注重國防科學，培養核子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學與電子科學人才，並推進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一兆瓦之游泳池式核子反應器，已於五十年四月間裝置完成，發生核能作用，此項設備歷時二年四個月，全部費用合美金一百十餘萬元，這一科學的成就證明了我國科學家的智慧與才能。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亦在繼續擴建實驗室，充實儀器設備，正在裝置電腦，並籌劃設置電訊與電子訓練研究中心，以加強電子科學的研究發展，培養電子科學人才。此外，發展原子能在農、工、醫藥各方面的應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經常與臺大理學院、農學院、醫學院、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臺北醫院等機構聯繫合作，並洽商國際原子能總署，除協助儀器設備，贈予研究獎學金派遣青年科學家，赴國外著名大學及研究所，從事理論及應用核子科學研究外，並派遣核子科學及核子工程專家，短期來臺講學，計前後來此者，已有保健物理專家一人，原子反應器專家三人，核子物理專家二人。本年度內，尚有放射性同位素製造專家一人及輻射保障專家一人來此，擔任視導工作。其他正在籌設中，有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專門從事國防科學研究的有兵工研究院、航空研究院等，在高深科學的研究上，已具有相當基礎，亦正有不少的傑出人才，主持研究。

㈡**實施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發展科學，賴有長期的發展計畫，教育部與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於四十八年二月聯合組織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根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綱領」，委員會之經費，分五年籌齊，經費的來源，計有：1.政府原定的長期發展科學專款，每年由國庫撥付臺幣五百萬元；2.政府從五十年度起在公營事業淨盈餘中提充的「長期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第一年爲百分之三，第二年爲百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之四，自第三年起每年平均爲百分之五；3.美援經費；4.各種教育文化基金的補助。

三年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所收到的經費，計有：

1.長期發展科學專款（國庫撥付）臺幣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元。

2.長期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公營事業盈餘）臺幣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3.美援經費臺幣五五、四六八、四四七元，美金七九三、〇〇〇元。

4.中華文化教育基金美金三〇、〇〇〇元。

5.亞洲協會美金一五、〇〇〇元。

以上共計新臺幣七九、九六八、四四七元，美金八三八、〇〇〇元。

近年來運用這些款項，作了下列的各項工作：1.充實各研究機構及大學的科學研究設備；2.設置國家研究講座教授；3.設置國家客座教授；4.設置「研究補助費」；5.逐年添建「學人宿舍」；6.補助出版學術研究刊物。自實施以來，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師範大學、中興大學（即前省立農學院及法商學院）各曾接受實驗館室建築費臺幣自數十萬元至千萬元以上。實驗儀器設備，美金自數千元至數十萬元。中央研究院、清華、交大、政大、臺大、成大、師大等院校並曾接受美援補助，興建學人住宅二十四所，以備國外學者來臺講學時居住。四十八年度，曾選定研究補助費領受教師計二百五十一人，四十九年計四百二十四人，五十年度正在核定中。四十九年度遴選科學技術人員出國進修二並聘定國家研究講座教授計二十九人，五十年度亦在核聘中。四十九年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三人，五十年度仍繼續選聘中。

## 四、文化事業的推進

共匪要摧毀我國固有的文化，我們對固有的文化，要維護與發揚，近年來文化事業的開展，甚爲蓬勃，具體的事項，有以下各端：

㈠**出版事業**：1.重要文獻的出版。教育部自四十五年起，編印中華叢書，有計畫的輯印重要文獻，現仍在繼續出書。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已輯印「故宮書畫錄」、「故宮銅器圖錄」、「故宮名畫三百種」等，國立編譯館編印的有世界名著、大學用書等，他如國民基本知識叢書、二十五史、清史等等，都是近年出版的重要典籍。2.新聞紙。據五十年六月底的統計，在臺發行的報紙有二十九家，每日發行約計七十二萬份，平均每十五人有報紙一份，在遠東及東南亞各國間，讀報人口比例僅次於日本。政府保障新聞自由，對來臺的外國記者，也同樣享有充分的新聞自由。現有的通訊社，共四十二家，通訊網線遍及國內外，新聞的採訪傳佈，極爲靈通。3.雜誌。截至五十年七月底止，經內政部登記的雜誌有六八七種，其中學術性與專門性的期刊，遠較綜合性與消閒性的期刊爲多。

㈡**廣播事業**：廣播是推廣社會教育的有效工具。四十五年起，教育部開辦空中大學科目，實施廣播教學。四十九年三月成立教育廣播電臺，廣播節目包括大學、高中、初中課程以及有關音樂、藝術、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計、幼稚教育等科目，聽眾遍及社會各階層人士，增加了學習新知的機會。公民營廣播電臺現在共有六十四座，節目相當充實，收音機的使用，亦極爲普遍，目前臺省已登記的共有六七九、二九七架，平均每十六人卽有一架。

㈢**電影事業**：政府對於國產影片，向採獎勵輔導的政策，每年評選一次，獎勵優良的影片及影人，以鼓勵國產製片事業，提高攝製水準。外國影片的輸入，每年約四百部左右，美國最多，歐洲次之，日本又次之，其他與我國訂有文化專約的國家，均有交換放映的影片。一般影片的放映，須經檢查，如有：1.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2.破壞公共秩序；3.妨害善良風俗；4.提倡迷信邪說的，便予禁演，或予適當的修剪。

㈣**文物展覽**：歷史文物，是民族文化的遺產，近年不斷舉辦大規模的展覽，如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及重要文物展覽，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的故宮文物及其他古物文獻展覽，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歷史文物展覽等，最近並將部份文物運美展覽，以增進國內外人士對我優美文化的認識。此外，並經常辦理若干推廣工作，以培養研究並欣賞中國文化的興趣，加強民族的自信心。

㈤**文化團體的活動**：文化團體的範圍很廣，其中以戲劇、音樂、美術三種，最具感人力量，目前已登記的劇團，約有四百個，以歌仔戲、掌中戲爲數較多。音樂團隊，如臺灣省交響樂團、中華國樂會、各軍樂隊等均經常演奏。美術團體，如中國文藝協會美術委員會、中國攝影學會、臺灣美術協會等，均經常舉行展覽，每年美術節的展覽會，規模尤大。其他如教員的、學生的、公私團體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個人的畫展影展等，爲數更多，藝術氣氛，極爲濃厚，水準也在不斷提高。年起，設置中華文藝獎金，以最榮譽的中華文藝獎章及獎金頒給最優秀的文

**㈥國際文化的交流**：爲加強國際文化的合作，展開國際文化的交流，我設文化參事，負責處理與所在國家文化合作的事宜，並已與巴西、西班牙、土耳其、哥斯達利加、厄瓜多爾等國，先後簽訂文化專約，正就具體事項洽商實施。其他已簽訂專約尚待互換批准書的，有烏拉圭、巴拿馬與伊朗等國。我國學生在國外留學者，現有六、二二八人，其中留美者五、〇〇三人，留歐者四一七人，留日者七九九人，留韓者九人，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者現有一七六人，近年來兩者都在逐年增加。

年來派員參加的國際文教會議頗多，重要者如「聯教組織大會」、「太平洋科學會議」等，即以四十九年來說，曾接獲邀請參加的國際會議計六十三種，經由國內派代表或就近派我旅居國外的學人參加者計五十八種，至文化團體與學人的交互訪問講學，暨體育藝術團體的競賽表演等，更是日趨頻繁。

## 參、教育發展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根據當前現況的說明，可以看出近年教育文化的發展，非常迅速，正因如此，也帶來了以下幾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一）從教育經費的數字上看，目前在地方財政上已是一項很重的負擔，平均不滿四個人就要負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個學生的費用，而且臺灣人口每年要增加三十多萬人，各級教育勢須增校增班，來適應人口增加的需要，因此對教育經費的負擔，祇有一年年的加重，長此以往，如果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必然在財政上形成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其結果，不是教育拖累住其他事業的正常發展，就會是由於經費的短絀，而迫使教育的素質降低。至於中央教育經費，雖已逐年遞增，但以目前國家情況，必須特別注重國防支出，致教育經費尚未達憲法所定成數，宜如何鼓勵私人興學及爭取更多外來援助，自須特加重視。

（二）臺灣各級學校畢業生的人數，逐年增加，自是教育上的成果，但對此累積增加的成果，如何消化，卻是一項值得重視的問題。例如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少年，共約一百三十餘萬人，其中在學的不過三十五萬餘人，不在學的將近百萬人，此百萬青少年，雖受過國民教育或中等教育，但多數尚不具備就業能力，不免游離閒散，既易滋生社會問題，也是人力的消耗。所以，在教育上對於已經離開學校而缺乏就業能力的青少年，應迅謀給予職業技能補充教育，俾能有助於國家建設。

（三）我國現正加速邁向工業化的途徑，將來工業飛躍進步，所需各種技術與專業人才，必定很多，我們在教育上必須預謀配合，早爲策劃，以免將來遭遇人才缺乏的困難，對目前偏重升學的教育，如何加以改進，自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四）不良少年問題，近年日趨嚴重，使家庭及社會感受到顯著的不安，在加速轉入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更感到此一問題的迫切，在教育上，應如何善爲誘導，並根本消除產生不良少年的原因，急待研究有效的辦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肆、今後努力的方向

針對上述的問題認爲今後的文教設施，應作以下的各項努力：

### ㈠配合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

1. 爲配合第三期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的實施，教育方面應摒棄升學主義的觀念，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積極培養高深的科學技術人才和專業人才，並加強職業教育及技藝訓練。
2. 發展羣育，推行民主實踐教育，養成合羣、守法、自治的民主生活習慣。
3. 充分利用現有的學校設備和師資，在暑假期間，講授專業課程，給予學分，並邀請海外學人回國擔任講座。
4. 設立夜間大學，招收高中畢業程度的在職公教人員及已經就業的青年，給予新的技能，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並給曾服兵役期滿具有高中畢業程度的青年以優先入學的機會。
5. 獎勵私人興辦學校，並扶助其發展，結合社會人力財力，共謀教育的推廣。
6. 加強學校、家庭、社會各方面的合作，輔導學生身心的正常發展，提倡正當娛樂與活動，以糾正青少年不良的傾向。

### ㈡發展科學宏揚學術

1. 加強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寬籌經費，充實研究設備，獎助研究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發明。

2. 加強本國文化研究，整理典籍及歷史文獻，設置講座及研究獎助金，倡導研究風氣。

3. 充實各大學研究所，增加研究設備，提高研究精神，並加強對海內外學人科學家的聯繫，邀請回國講學，以促進海內外學術研究的結合。對於現行法令有礙研究所發展的各項規定，應加以修正。

4. 改進留學政策，注重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基本科學人員的選送，留學國別應並重美國與歐洲。留學期滿願在國外繼續研究者，給予充分的便利。

### ㈢改進僑民教育

1. 華僑散居海外各地，回國升學的僑生，各有其特殊的情況及需要，應針對其特殊需要，施以適當的教育，使於學成返回僑居地以後，能夠切合當地的情況。

2. 海外學制及回國僑生的學業程度暨生活習慣，與國內均有差異。爲增進教育的效果，宜籌設華僑大學，專收僑生，以便施教。

### ㈣增進國際學術合作

1. 善用教育美援，擬定長期計畫，作有效的使用，並隨時檢查，注意其效果。

2. 歡迎外國大學在華設立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及科學研究機構，使文化與學術合作能兩獲其利。

3. 洽請美國各基金會在華設置客座教授，延請學者專家來華講學，指導專門研究工作。

4. 爭取外國各項基金來華興學，以協助我國的科學研究與發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5. 積極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鼓勵參加人員提出論文，以提高我國學術地位。
6. 編譯世界名著及最新外國教材，以供學術研究的參考。

**㈤發展文化活動培養國民身心健康**

1. 提倡社會善良事跡的報導，敦厚風俗，振奮人心。
2. 推廣大眾傳播，利用廣播、電影、電視，增進國民的知識與道德，轉移社會風氣。
3. 加強體育活動，充實各項體育設備，鍛鍊國民體格。
4. 倡導音樂、戲劇、舞蹈等藝術活動，獎勵文藝創作與出版，美化國民生活。

教育是國家百年樹人的大計，文化是民族昌盛的根基，在反共建國的現階段，更有其重大的時代使命。在大陸上我數千年先人創建之優美文化傳統，正被共匪暴政橫加摧殘，社會結構連根翻改，我數以億萬計之同胞，在生活和生存上正受共匪史無前例之煎熬，思想被桎梏，身心被奴役，含垢忍辱，涕泣呻吟，正急待於吾人之解救，每念及此，肝膽如焚。今當海內外科學家、學人、文教界領袖集會一堂，如何使海內外同胞在各方面之卓越成就以與國家進步結合爲一體，以增厚反共抗俄的力量，爲解救大陸同胞，重建大陸而努力，正有待於各位先生明智的決定，凡有決定，必當全力以赴。謹略述當前教育文化概況及今後努力方向與目標如上，敬請指教。

——民國五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第十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立歷史博物館創設教學研究室

近代各國博物館發展之趨勢，已充分表明，其基本要素，已不僅此於蒐集、維護有關人文及自然之資料，並以之廣泛應用於社會教育活動。他同時當從事高深之研究工作，易辭言之，他不僅蒐集、維護人類文化之陳蹟，祇供世人發思古之幽情，重要的是他要彙集人類之知識、文化，求更新的發展，更大的創造。因此，博物館當與圖書館、大學，共建社會之研究中心。

國立歷史博物館七年以來，曾不斷從事專門問題之調查、鑑定、實驗及研究報告，甚具成績。現在循此目標，在研究工作上更進一步完成了一項新的建設。

如吾人所知，博物館經常廣泛之陳列，僅能供一般人之參觀，對專門學者，從事特殊研究，往往須有特設研究室，附具顯影、攝影、化驗、測量儀器等，供其調取藏品，從事觀察研究。

同時，我國現時學校課程，大多仍屬「紙上談兵」，限於書本。一新興之大學，認圖書館之設備爲首要，於博物館則否。數年前，我一著名考古學者曾慨乎言之：「在外國，學生所受的教育，博物館的教育是骨幹，書本教育是輔助。」四十四年，我另一歷史學者亦指出：「美國大的博物館，往往藏有精品，這是爲教授及學生實際研究之用，例如中國六朝及唐代塑像所用的顏料，哈佛的佛格博物院，就曾經做過分析的工作，……此外，大學博物院，也有時做有關部門功課的教室。因爲特殊的設備，用來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課，也格外方便，佛格博物院就常供考古及美術功課授課之用。」此外像賓州大學博物館等亦有同樣情形。

基此認識，歷史博物館與建一「歷史教學研究室」，並將購置必需之電化器材，供學校考古、歷史及美術諸科授課之用，在教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其次，我想略述一下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性質，和它在當前應作的工作。今日國家正遭際歷史的浩劫，歷史博物館之任務，與一般博物館學術分工的趨向，一般都主張各國國立歷史博物館能致力於民族傳統文化業績之維護與整理，於戰亂中，保衞民族悠久的文化遺產於不墜。因之，其應作之事甚多，略舉一、二例來說：㈠由於工業及機械生產之推進，及外力之侵略，我們整個社會制度業已解體，國民生活環境迅速改觀，以致民間營造法式、傳統之美術工藝，乃至陶器、織造、雕塑等家傳，隨手工藝的沒落而式微。應由國立歷史博物館及時調查、鑑定、試驗，務期與復絕學，發揚而光大之。㈡中華民族爲一歷史悠久的民族，有關我民族發展的史前遺址、歷史古蹟，乃至古戰場、紀念建築、帝王陵寢、歷代衙署，均當邀約專家從事考古發掘、調查、維護。以臺灣來講，如明代鄭成功在臺登陸處所、清光緒十一年劉銘傳在臺北所建撫臺衙門之遺蹟，都是我先民治臺的光榮史蹟。現在竟淹沒不彰，或荒蕪窳朽，後者就在我們植物園中，基於民族大義與文化責任，我們實應從速調查，並作學術上之研究，釐定計畫，採取步驟，予以修復、維護，庶使我們先人的復國志節與遺愛在民的治績，永垂不朽。

——錄自「中國一周」第五九八期，民國五十年十月九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所提書面報告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 一、發展高深科學研究問題

在此科學突飛猛進的時代，非發展高深科學研究，不足以立國。但發展高深科學研究，並不單靠設備的完善，更重要的是有利用設備的人才。關於高深科學人才的培植，不外國內造就和國外造就二途，在國內培養，應先自充實各大學研究所著手。本部正擬修正「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規程」，使研究所能有獨立的人員編制和預算，俟設備充實辦理完善時，可改爲獨立設置。已具有獨立完善之研究所若干所大學，可以設立研究院，並善用國際學術合作與建教合作之便利，使與國外學術機關或其他事業研究機構切取聯繫，俾國內外學術研究工作，得以溝通配合。

大學研究所的充實，並可有助於大學師資問題的解決，現在已感大學師資的缺乏，除設法約請我國旅外學人回國，或設置客座教授，以延請外國專家來華講學之外，增加研究所研究生名額並提高其素質，亦爲培養大學師資之一途。

現在國內最具規模的研究所，要算清華和交大。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已於五十年四月間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將一兆瓦游泳池式核子反應器裝置完成，發生核能作用，此項設備是個很大的成就，也證明了我國科學家的智慧與才能，爲我國科學特別感謝梅貽琦博士和參加此項工作的各位先生。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亦有繼續擴建實驗室，充實儀器設備，裝置電腦，並籌劃設置電訊與電子訓練研究中心，以加強電子科學人才。今日開幕的電視廣播，就是該所師生的共同貢獻。此外，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並擬籌劃先行派遣人員出國進修有關於地球物理的研究，正在積極籌建事海內外研究太空專家人才之調查與聯繫，洽商美國太空機構協助關學科，關於太空科學之研究，正從究中心，以主其事，甚願不久卽可展開正式活動。

發展科學，賴有長期的發展計畫，本部與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展科學委員會，根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綱領」進行工作。發展科學經費分五年籌齊。經費的來源計有①政府原定的長期發展科學教育文化基金的補助。近年來運用這些基金；③美援經費；④各種事業淨盈餘中提充的長期科學技術發展各研究機構及大學的科學研究設備；②設置國家研究講座教授；③款項，作了下列的各項工作：①充實費；⑤逐年添建學人宿舍；⑥補助出版學術研究刊物。實施以來，已漸收績效，今後當續求其發展。

在國內研究所數量未大增加，內容尚未十分充實以前，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進修，自仍有其必要。已完成大專教育的優秀青年，欲作高深研究，志願前往國外留學，政府應滿足其深造的願望，給予便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去年舉行的留學考試，雖已儘量放寬，但仍不免遺珠之憾。故已改進有關留學的規定，凡曾在國內大專學校畢業，成績優良，獲有國外授予碩士、博士學位之著名大學獎學金者，得申請出國進修。此外，㈠在國內研究院所畢業，獲有碩士學位者，㈡大專學校畢業，曾任助教或中學教員若干年，服務成績優良者，㈢對音樂、美術等科有特殊成績者，均得申請出國進修。惟出國前，仍須經留學考試及格。同時，爲解決留學生具備前述資格或條件的人員，男性應服行兵役期滿。其未審資格困難，似可建議考試院，將留學考試列爲特種考試之一種，考試及格者，即授予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其在國外留學的學歷，可作爲提高敍級的依據。

政府對在國外學業已告一段落的留學生，訂有優待辦法，歡迎其返國服務，負責安排工作。如尚須繼續在國外研究或已就正當職業足以展其所長者，當予以護照延期及改變身份等等簽證的便利，藉以儲才國外，以備國家來日之需。

## 二、教育配合經濟發展問題

教育在近代社會與經濟發展中，有其樞紐的作用。教育的功能，在提高人力資源，不但要供應當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要爲未來預作籌劃。

近年教育的進步，在數量上已達到很高的標準，各級學校畢業生的人數，逐年增加，這是教育上一項很大的成果。不過，這些畢業的學生，除了繼續升學深造以外，很難以其所學直接貢獻於國家社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例如從四十四到四十九學年度的六年中，大專學校的畢業生共有二九、五三人，普通中學的畢業生共有二一、一六二人，這些人的就業情形，雖缺乏詳細的調查和統計，但除了職業學校的畢業學生以外，多數都缺乏就業的知能。再如目前臺灣全省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少年，共約一百三十餘萬人，不在學的將近一百萬人，此一百萬青少年所受的國民教育或中等教育，偏重在升學的預備，如不能升學也無足夠的就業能力，不免形成人力的虛耗。今後不但要加強培養學生的就業知能，就是對於已經離開學校的青少年，也當補授專業的技藝，使他們能成爲技術性或半技術性的工作人員。換言之，消化已有的教育成果，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次，再就經濟發展的遠景，現在臺灣發電容量九二四、〇〇〇瓩，到民國五十六年預計可以增至一、七四〇、〇〇〇瓩，也就是今後五年電力將增加一倍。目前工業用電約佔發電容量百分之八十一，將來電力增加量，如仍照此比例推算，則工業的飛躍進展，是可以預期的。工業加倍的發展，自然需要大量的技術與專業人才。因此，把已經教育出來的人，再加以技術的專業的訓練，使能消化在不斷發展的經濟事業之中，塡補這項人力的需要，也正是當前應做的。在教育上有計劃的培養各種專業人才，以支助經濟發展，由經濟發展更促進教育的發展，相輔相成，便可不斷進步。

現在配合第三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的實施，已擬定教育部份的實施計畫，擬在三年之內訓練專門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術人員四、二〇〇人，技術工一六、八〇〇人，共計二一、〇〇〇人。在大專院校增設工礦、交通、農林、漁牧、商業各科訓練班，招收失學失業之高中畢業青年，訓練期間按類科需要分別規定。在農工商水產高級職業學校增設實用技藝訓練班，招收失學之初中畢業青年，視技藝精粗，酌定訓練期間。在高中初中設工藝課程，使願意於畢業後就業之學生，養成就業之技能。在大專學校設夜間部訓練班，使日間有工作之人員，晚間亦可進修。總期儘量利用已有的校舍師資和設備，用最經濟的辦法，來進行此項工作。

更長期性的配合經建需要，無論大專學校的新設科系、增加班級，皆當以適合此一目標者爲優先。就是在學制與課程上，也應有妥善的安排，特別是有關職業教育的學制，應完全脫離開升學的軌轍，使其修業年限、入學資格，均能具有彈性，並能互相啣接，於就業之中仍有深造的途徑。在國民學校與初中均應增加技藝課程或附設職業訓練之班級，在高中則可設置職業科，在職業學校及職業專科學校，均可設置推廣部，夜間授課，招收在職或失學失業青年，予以進修機會。利用上述各種途徑引導學生摒棄升學主義，修習職業技術。

## 三、改進高等教育問題

近年來高等教育在量的方面，已有顯著的進展，大專院校三十九學年度僅七校，五十年度已增至二十七校，學生人數亦由三十九年之五、九三九人而於五十年增至三八、四〇三人。但在質的方面，則尚有待充實。今後亟應精簡課程，充實師資設備，加強考核，以提高學生程度，基本課程改在高中階段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予以加強訓練，俾保持大學教育的水準，並應隨同科學的進步，增設為補救師資之不足，各大專學校可在暑假期間開設若干專業課程，彌補某一課程在師資或設備上的困難，並邀請海外學人回國擔任講座，導專門研究工作，以吸收最新的知識，保持最高的水準。更應推廣大學，在各大學及獨立學院酌設推廣部，招收下列人員：㈠高中或高職畢業中畢業資格之在職各公教人員；㈡具有大學程度之服務公私營企業人員欲完成大學教育之人員；㈢具有大學程度之退役或退休軍職人員；㈣曾於晚間或空閑時間利用各大專及職業學校現有校舍及設備，充分給予學之學分考試及格，准予畢業，並授予學位。科系課程之設置，側重實用給為原則。此種構想乃為已服兵役之在職青年；㈤具備高使能補充其知能，以應社會發展之需要。

此外，大專及研究所學生現行獎助金研究補助金辦法，對清寒學生無此需要，似可改為貸金制度，由受貸人於畢業後分期償還，使有限的以增加清寒學生受益的機會，並養成學生的權利義務觀念，加強自立自

## 四、學制與課程問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由於國家情況的急劇變更，和科學的飛速進步，以及義務教育的普及與農工商業的發達，國民經濟水準的提高等等原因，已深感民國十一年所定的學制系，和三十七年修訂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都已不能完全切合當前的需要，並且助長了升學主義的流弊，使學校僅注重知識的傳授，忽略了人格的培養與生活的技能，也輕忽了體魄的鍛鍊與羣體活動的素養，所以均需要研究改進。

關於學制的改進，在本次會議中已收到二十個提案，都是各位專家的精心傑構，其中第一案是田培林先生等共同提出的，更是全盤的設計，值得特別重視。希望新定的學制，能夠富有彈性，能夠配合經濟的發展，能夠適合當前的實況，分按學校性質，使其系統分明，不但顧到上下的啣接，也能顧到橫的連繫。對於資賦優異和特殊的兒童，也能在特殊的安排，免去強求一律的拘束。

關於課程的改進，除大專的課程應另研究如何增刪精簡以外，在中小學部份，自四十八年九月起，教育部即已聘請了幾十位專家，組織了「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委員會」進行修訂工作，該會下設中學及國校兩個委員會，兩委員會又各按科別分設若干組，分別研究起草，草案初稿完成後，又普遍徵求各方意見，然後再彙總整理，先後開會百餘次，至本年一月間，草案始告完成。這是一件深值重視的大事，對於中小學教育，具有實質上的改進作用，其詳細情形已另有專題報告。於此願再特加說明者，現在一般對於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太重的批評，無寧說是由於升學競爭所產生的不良現象，實則課程內容的程度，和教學時間，多低於其他教育發達的國家，就是新訂的標準草案，也未能完全達到其他國家的標準，特別是有關自然科學的科目，仍感不及。我們要提高教育水準，要發展科學，不能不加重教學的分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過在教學方法上、教材編製上，就應該努力改進，減少學生不必要的負擔，加深學習的效果。

## 五、大衆傳播事業問題

大衆傳播事業，包括報刊、電影、廣播、電視四項，在科學昌明的國家，早已成爲國民日常生活和教學設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因其接觸面甚廣，影響於社會善良風俗與人心傾向者甚大，其中廣播與電視二種，更是近代科學進步工業發展的產物。就其效用而言，其對於工業高度發達國家的貢獻，遠不如在師資缺乏、設備簡陋、實驗不足、校舍不敷地區的需要之迫切，因爲這些缺乏的條件，均可藉廣播與電視予以補救。政府今日在臺灣，教育雖稱發達，但由於人口之不斷增加，科學之日新月異，於師資、設備、教具以及新的科學實驗等方面均感不足，對於在學與失學青年學業之充實，以及在職人員智識技能之補充，實賴於應用最新的工具，藉教育廣播與教育電視，以求解決。臺灣的教育廣播，自民國四十九年本部設立教育廣播電台以來，雖已粗具規模，但因設備關係，播送能力僅能及於本省北部地區，今後應當加以充實，作面的推廣，建立全省廣播網，加強社會教育節目，並辦理學校廣播，籌設空中學校，承認學生學籍，用以解決失學青年進修問題，而補正規學校教育之不足。至於教育電視，本部現成立教育電視實驗電臺，定於本年起開始對臺北市十二公里內，作爲期六個月之實驗播送，每天播送二小時，藉此實驗以開通電視教育之風氣，並奠立電視人才培養之基礎。電視實驗播送期滿之後，擬建立正式教育電視電臺，逐漸擴充，完成全省電視網。在各學校試辦電視教學，以補學校師資設備之不足。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擬籌設電視學校，登記受教學生，辦理各種科目的選讀，編發教材，定期舉行考試，及格者給予學分，學分修滿，給予證書或學位，以使失學青年及在職人員均獲有深造的機會。

## 六、華僑學生回國升學問題

政府爲使海外華僑子弟有接受祖國教育的機會，並打擊共匪在海外誘騙華僑青年之伎倆，自四十年起，號召華僑學生回國升學，其人數年有增加，至五十學年在臺僑生已達八、〇六二人。累計過去大專畢業已返回僑居地的僑生已達三、四五三人。這些僑生來自海外各地，其中尤以東南亞地區爲最多，由於各地區的學制不同，學業程度不一，與國內學校課程不易啣接，尤其是國語文基礎較差，影響學習能力，生活習慣又與國內學生不同，因此，返國入學之後，僑生與學校往往都感困擾。爲謀求此一問題之改善，宜先在一個學校分置若干班級，開設若干科目課程，配合各個不同的程度，施以適當的補習教育，並融化其不同的生活習慣。俟學力達到相當程度，再按志願分發各校就讀，使能順利完成高等教育，返回僑居地後，亦能適合當地情況，展其所長，以發揮僑教之功能。

## 七、教育經費問題

近年教育事業急速發展，教育經費亦漸形成一項大的支出，平均不滿四個人就要負擔一個學生的費用。本年度各級政府教育經費總額，在中央爲二億五千八百六十餘萬元，在臺灣省爲五億三千三百六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餘萬元，在臺灣省各縣市爲一十一億二百五十餘萬元，與歲出總額比較，中央爲百分之二・八一，臺灣省爲百分二九・五四，臺灣省各縣市平均百分之三七・四〇，省及縣市教育經費支出的內容看，大部份均爲經常費（包括用人費），其能作爲充實設備建築校舍之用者，爲數無多。而臺灣人口，每年增加三十多萬人，教育經費祇可年年加多，長此以往，終將由於經費的短絀而迫使教育的素質降低，所以如何寬籌經費，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除了各級政府再儘量的寬列教育經費預算以外，應籌劃可靠財源，設置教育基金，充分加以運用，貸與公私立學校供增建校舍與增加設備之需。

鑑於政府財政的困難，對於已有的教育經費，如何更經濟更有效的使用，例如學校員額編制的精簡，免費範圍之考慮，學生獎助金改爲貸金辦法之研究，增建校舍添購設備之標準，以及現有設備如何充分利用，與學校間交互借用等，實均待詳細規劃，以撙節可省的各項開支。

爲彌補政府財力之不足，應特別鼓勵私人或企業興辦學校，政府當扶助其發展，並儘量予以便利。例如：①修訂捐資興學褒獎條例，對私人捐資興學從優獎勵，並修改私立大專院校立案之建築設備標準，放寬私立學校徵收學雜費之限制。②輔導私立學校籌措固定基金，准許以合法方式公開籌募及接受贈與，專戶存儲支用孳息等，均當研究實施，以爭取民間資金，共謀教育事業之發展。

此外，爭取友邦及外國宗教學術團體之援助，例如美國各種民間的基金會，財力雄厚，應爭取其來華興學或設置客座教授，外國大學或研究機構，應爭取其在華設立研究機構，以及與我國大學的合作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畫等，均當予以充分的便利。

## 八、光復大陸教育工作重建問題

大陸光復的時機，已迫在眼前，如何利用現在的這段時間籌劃好光復後的教育重建工作，實爲一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共匪是蘇俄的附庸，自稱其文化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其教育目標、學制系統以及課程內容等等，都是俄國的翻版，剝奪了人民自由學習的權利，否定了「受教育機會平等」「有教無類」的傳統觀念，並用種種卑劣伎倆來變更字體，篡改古籍，僞造歷史，以毀滅固有的道德和文化，所謂「教育和勞動結合」也只是奴役迫害和掠奪的掩飾。

針對共匪在教育上這許多的乖謬措施，對光復大陸的教育重建工作，必須確立正確的觀念和目標。我們都知道，大陸上的教育人士、知識份子，乃至各級學校的學生，都是遭受共匪迫害最深的鬥士，正是最反共的先鋒隊。我們要親密的結合起來，共同肩負光復後重建國家的責任。我們要根據憲法的精神，建立三民主義的教育制度，消除附庸性、階級性、奴役性的俄化教育思想與體制。我們要重視人格尊嚴，尊重思想和學術研究自由，解除共匪汨滅人性的一切壓制與桎梏。我們相信大陸知識青年，會認清眞理，絕對擯棄共匪違反人性的思想和謬說。同時相信我國固有優良文化，經過此番劫難，更將露出燦爛無比的光芒。至於重建工作的項目，各方面提有許多具體意見，希望決定一個完善的方案，以備政府採納施行。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青年戰士報」第三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民權的理論和實踐

## 一、國父主張民權的理由和應付民權的方法

研究　國父的思想有一不可忽視的地方，是他重事實而不單重學理。他認爲解決社會問題要以事實爲基礎，世界上各色各樣的學術很多，而能付諸有效實行者不過十之一二。他的這一觀點特別可在民權主義的主張中見之。他申述他在中國主張民權的理由：一是順應世界潮流的趨勢，二是奠定和平的基礎。一些主張民權的人，往往只知民權爲一不可抑制的世界趨勢而利用之，以造成紛歧與紊亂，而不知民權的功能是在奠定和平的基礎與秩序。舉一現實的例證加以說明，則莫如今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所暴露出的一項顯著的事實。譬如：俄國的共產黨，和在議會政治之下的英國工黨，和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思想理論的出發上，看不出他們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但在俄國初期實行起來便是殺人放火，清算鬥爭，而在英、美一些國家則是循法律的途徑，和平的爭取，以實現其主張，其最大的差別惟在：一是沒有民主的制度，一是民主的制度已經建立起來。

國父對於應付民權發展的辦法，也非常現實；他說世界上應付民權發展最好的辦法，第一是英國，英國所採的辦法是隨機順應，消患於無形。第二是從前的德國俾斯麥首相，俾氏所採的辦法是先事防止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從進步的措施中，以防止問題的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期，社會主義的風潮在德國風起雲湧，岌岌不可終日。當時正值俾斯麥首相當權，他首先採用了一種國家社會政策和若干關於勞工福利的重大措施，當時德國的社會風潮，便消滅於無形了。

國父雖然堅決主張民權主義，但在實行起來是不能希望一蹴而就的，所以他特別注意於實行民權的程序和步驟。在他的革命方略中特別規定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程序。也即是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訓政時期最重要一項工作，便是訓練人民如何行使民權，民權訓練最有效的是地方自治單位；沒有這一項基本工作的準備，民權所帶來的將是困擾和紊亂；而不是國家的和平與秩序，進步和繁榮。關於這一點，　國父時時引用美國的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兩者的成敗得失作爲借鑑。美國在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之後，經過了七年戰爭，脫離了英國的統治，自一七八七年在費城召開憲法會議，迄至憲法完成實施，美國國家的基礎，便日益鞏固起來。在法國則不然，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發之後，革命所帶來的是殘酷、恐怖、紊亂、戰爭和人民流亡的痛苦，以至經過幾次帝制，幾次共和，一直到了普法戰爭之後，第三共和的恢復，民權的基礎，才建立起來。

美國和法國兩大革命的成敗得失，何以會相差如是之遠呢？此中原因，當然不止一端，但其最主要的原因當爲：美國獨立之前的人民，大半是由英國移殖而來的，他們把英國人自治的習慣和自治的制度，也一併帶到了美洲這一新天地，因此在獨立之前的十三個獨立殖民地，早已有了英國的地方自治基礎和自治的習慣，革命的結果只是擺脫了英國的統治，在實質上，只是把殖民地的招牌取掉，換上一個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共和的名義而已。至於法國，在革命之前爲一專制集權的政治，人民缺少優良自治的習慣，又沒有好的地方自治做基礎，一到推翻君權實行民權的時候，便手忙足亂，不知所措，其結果革命便帶來了長期的紊亂和恐怖，不像美國民主政治進行得那樣順利。

如我們從革命思想的蓬勃活躍及其對於近代民主運動的重大影響來說，法國大革命固遠比美國爲大，但就其自身的成就來說，法國則不如美國遠甚。從這一歷史的事例，可以看出近代民主政治的建設，不單是一項空泛的學說的鼓吹和宣傳的問題，更需要的是一項實踐民主的努力，尤其是要有實踐民主的具體程序和方法，國父最偉大的地方便在能掌握實踐民主的這些實際的環節。

## 二、民權建設的根基和借鑑

國父於民權建設的具體實施，指示我們有兩項基本的工作：一是地方自治的建設，一是他主張的社會建設，亦即是「民權初步」一書所示的範疇。地方自治的重要知道的人很多，而社會建設的重要，往往被人忽視，實則二者有最密切的關係，不可或缺。甚至我們可以說地方自治只是自治的外貌，自治眞正的根基，則是社會建設。

國父從地方自治的有無基礎來評斷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得失，在前面已經說到了。現在我要引用另一史實，以說明地方自治只是地面的上層，而不是在地下深築其基的基層。更由此說明美國獨立後民主建設成功之快，法國革命後成功之慢的原因所在。根據艾伯特所著「英國議會」一書，他指出美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開國之初，因爲採用了英國議會的議事陳例、程序和法則而成功，法國國民大會因忽視英國的議事陳例、程序、法則而如何紊亂失敗。這些陳例法則就是　國父手著「民權初步」所闡述的道理。艾氏說：一個到過美國的旅客，看到美國國會的各種議事程序、法則和習慣，會使他想起倫敦西敏寺英國議院的情形。這當然是不足奇怪的，因爲美國開國之初，傑佛遜在一七九七年當選爲副總統，依美國憲法之規定，副總統要兼任參議院的議長，那時的美國參議院成立不久，議事尚無完備的規範作依據，情形的散漫紊亂，使他傷透了腦筋，於是他纔根據英國國會的習慣規制與陳例，彙編爲一「參議院議事手册」作爲議事的準則。不僅聯邦政府國會要以此爲準則，就是各地方民意機構和人民團體議事，也無不以此爲依據。研究美國民主政治的人，如果單注意美國的憲法是不夠的，傑佛遜手册的影響，在實質上對於美國民主政治的貢獻，實不亞於美國的憲法。

法國革命時期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艾氏說過：當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的國民大會，起初毫無議事規則可言，完全是一烏合之眾的組織。後來有名的國民大會代表米拉波先生，從一個叫杜蒙的人那裏，得到一册英國下議院議事規則的節本，這一節本是英人羅米里所編而爲法人杜蒙譯成法文，以後杜蒙且因此乃至與英國的邊沁齊名。米拉波先生將此一法文譯本，放在國民大會的議事桌上，以便採用爲進行議事的法則。但是國民大會並不接受它，他們並且說，我們不是英國人，我們不需要英國的任何東西，於是此一文件乃被棄置。

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知道，談地方自治而不學習民主的法則陳例，必然會是沒有根基，有如法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革命初期國民大會是一烏合之眾的情形。　國父解釋民權二字的「民」的眾人，而不是烏合之眾，便是這個道理。有名的政治學家畢爾先生曾經說過，議會的典例，對於國家政治行爲之影響，憲法所發生者爲大。中國的古人也同樣說過：「爭辯聚訟，非禮莫決」，這裏所謂的「禮」，便是今日實行民主所必需的一些規律。

有了上述民主的程序與規則，纔是有了民主的規律，有了規律的民主，纔不致陷於法國大革命初期的紊亂與困擾，纔可以循此規律以團結人心，糾合羣力，奠定和平與秩序，團結與統一的基礎。這應是國父主張民權的本意所在。

## 三、對於民權主義教育的感想

今日的教育有兩大課題：一是教育配合經濟建設的發展；一是民主實踐教育的實施。關於前者，我自接長教育部以後，曾費了不少時間去研討策劃，到今天已具有端倪。關於後者，我雖於數年以前在內政部的時候，就曾在這方面加以努力，可是到了今天仍感覺此一教育的重要。我們的民主實踐教育究竟實施了多少？民主替我們國家帶來的究竟是進步多於困擾，抑或是困擾多於進步？我們都還難於判斷。幾天前我從電視中看到省師附小的小學生們演習的市長選舉，條理井然，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想，今天的民權主義教育恐怕還須從小學教育上腳踏實地的做起來，把希望寄託於新生的一代也許更爲可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錄自「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年刊」第十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出版。

按：另有「爲民主實踐教育而奮鬥——以紀念　國父誕辰」及「民主政治與民主規律」二文內容相近，不再重複收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辛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有關史料之處理問題

## 一

辛亥武昌起義一舉而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專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巨大的轉變。這一成功的革命運動，是滿清末年歷次革命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就辛亥年的情勢而言決非偶然。

武昌起義有兩個極其重要的發端：一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西曆四月二十七日）黃興率領革命黨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的廣州起義。一是同年七月十五日（西曆九月七日）成都市民向總督衙門請願，由保路運動而導發的遍及四川全省的民眾革命運動。此一革命運動發生於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後約五個月，早於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一個月又四天。

關於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起義，因史料多、著述富，在中國革命史及中國近代史上已佔有了應有的地位而爲人所熟知。同年七月十五日爆發的四川全省的民眾革命運動卻因其發生之地點僻處西陲和史料著述的缺少致易爲人所忽視。四川保路運動實導源於辛亥年四月十一日滿清政府收回鐵路國有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上諭」。此一「上諭」在日期上與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相距僅有十二天。中經五月二十一日之千餘羣眾參加的保路大會，七月初一日開始的罷市、罷工、罷課、抗糧、抗捐。七月十三日的「川人自保」的主張，以至七月十五日因趙爾豐誘捕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嶸、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而爆發的遍及四川全省的武裝抗爭，由武裝抗爭演變而爲羣眾武裝革命，以迄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由和平爭取始，以武裝革命終，其間演變之經過固極微妙而繁複。但它是由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的激盪所致是很顯明的。正如　國父孫先生文所說：「是役也（指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見手著「心理建設」有志竟成章）

要知道辛亥四川保路運動對武昌起義的重要，我們從兩位革命先知的話，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評價，一是黃克強先生、一是　國父孫先生文。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的領導人黃克強先生，於辛亥八月十二日（武昌起義前七日）由香港寫給上海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同志（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爲當時籌劃武漢起義之總機關）的一封信中曾說：「邇者蜀中風雲激變，人心益憤，得公等規劃一切，長江上下游可聯貫一氣，更能力爭武漢。」又說：「自蜀事起，回念蜀中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復燃，是以有電公等，求商響應之舉。」後來　孫先生更確切的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這已經對四川保路運動有了很中肯的評價。可是這只說出了四川保路運動的影響和結果，而沒有說明爲什麼有如此的影響和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果；說出了這一歷史事件的靜態，而沒有表明其動態。人類的歷史，正如長江大河奔流不息，湖泊、海洋固然令我們駐足歎賞，而溪流、百川的紆迴曲折，激盪洄漩原更使人驚心動魄。　孫先生和克強先生都是革命的領導人而不是史家，他們所說的是這段歷史的影響和結果，而沒有道出這段歷史如何的經過。以治史的人而言，如果由親歷其事的人，很客觀地來記述歷史經過的眞象，當是如何的難得和珍貴。只可惜歷史都是後人寫的，後人寫歷史根據的大都是若干已往的官文書，這些史料自然是很可貴，可是它們正像一堆斷了線的珍珠，如非親歷其事的人，就很難把它們恰如其分的貫串起來。

我是親身參與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的人之一，那時我雖然才十二歲，我卻是當時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的會長，所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這一小小的團體是發生過不大不小作用的。在過去數十年的歲月中，我很想把我當時親歷的經過寫出來，可是每一執筆，便發生了如下的兩個感想，而未能動筆。

多年以前，我遇見鄒海濱先生，他問我讀過他所編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後有何意見，我當時除了對他搜羅的豐富加以讚揚外，我說：「我另外有一個感覺，那就是說，照你書中所記，如果沒有你海濱先生，也許就沒有中國革命了。」我當時年事尚輕，不知道著述之難，很輕率的說出了我的感想，誰知直到今天，海濱先生所著的那部黨史稿，仍然具有歷史重大價值的一部巨著。這一故事旨在說明親歷其事的人所記述的歷史，難免不以自我爲中心，而減弱了其他部分的重要性。這是我不敢執筆的第一個理由。

朱執信先生在世的時候，有不少朋友曾鼓勵他寫自傳，認爲從他的自傳中必可獲知許多革命的秘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頗不以爲然的說：「寫自傳是志業無望的人所爲，他們在志業無望時，想把嘉言懿行傳諸後世，以求得補償；至於我，我覺得我的志業還前途無量，所以現在不願寫自傳，我還須鼓足勇氣爲志業繼續奮鬥。」執信先生所說的話，自然亦有其道理在。這是我未敢執筆的第二個理由。

由親歷其事的人撰寫史稿，欲求其不以自我爲中心固屬困難。至於自傳，主觀強烈，更是意料中事。那末，當從事於有一既定範圍之著述時，照理似應緊守其範疇作客觀的論斷才對，而在事實上要做到此點亦復不易。如像近代學人梁啓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當其論述其師康有爲所著「大同書」之後，亦在有意無意間說：「有爲當中日戰役後，糾合青年學子數千人上書言時事，所謂公車上書者是也。中國之有羣眾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實際上康氏乙未年領導的「公車上書」，只能算是一次臨時性的請願運動，若要勉強算作一次羣眾政治運動的話，亦不能說它是「實自此始」。試想東漢末年的桓、靈帝時代，太學生三萬餘人「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見後漢書黨錮傳序）的史實，時間上較之「公車上書」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又如宋朝靖康年間，太學生爲了主戰的李綱被罷職，竟號召軍民數十萬人詣闕上書，且曾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終於迫使宋欽宗恢復了李綱尚書右丞之職。規模之大小且不論，在時間上較之「公車上書」也早了七百餘年。革命黨採取行動的甲午年　孫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團體檀香山興中會的成立，亦早於「公車上書」一年。革命運動亦與「公車上書」同在一年。

博識如梁啓超先生，於其從事著述時，尚不免因曾親預其事，或因與康氏師生之誼而情不自禁地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如像「清代學術概論」這類著作中，把「公車上書」列爲中國羣衆的政治運動之始，臨文之難於不偏，概可想見。

## 二

遠在三十年以前，我就有志蒐集四川保路運動的史料，記得在抗戰初期，我回到了四川，其後擔任四川大學校長，曾多方徵集各方資料，彙存於四川大學。並託由圖書館的主持人，特別將該館及四川歷史博物館現存資料編製索引，逐漸加以整理以備印行。那時的四川歷史博物館是在四川大學之內的，所有資料圖書都存於四川大學圖書館內，故利用起來很方便。不料在此一工作尚未就緒之時，大陸情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我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初旬，成都局勢已十分危急之時匆匆離開，圖書館及博物館的資料固然不便攜出，即個人所搜集的一部分，也來不及取回，多年心血竟隨時局的變化而廢於一旦。每一思念及此，不禁爲之悵然。到臺以後，在民國四十四、五年間，又曾作過一番努力，擬從中央圖書館及其他研究機構中，把有關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作一調查，然後再擇其重要者託人抄寫，以便着手重新整理，作爲研究與寫作的參考。當抄錄工作進行中，友人倪君寶坤告我，大陸共黨出版有「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一書，我特從倪君處借來一看，眞使我高興萬分，凡我所熟習的一些重要資料，此書俱大體具備，其中更有若干資料爲我欲得而未得者。我雖然費了很大功夫於重新調查與抄錄工作，自從獲得此書之後，在我資料搜集工作方面，可謂節省了不少的麻煩。古人有「因糧於敵」的說法，假如我能因獲有此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書而順利完成我所預計的工作，也可算是「因糧於敵」的又一例證了。

我在審閱此書時得到幾項可喜的消息，一是在該書序言中說：

「編者竭數年之力，所得史料已至六十餘萬字，其中除部分錄自我校（四川大學）圖書、歷史博物兩館外，更從四川省圖書館、西南民族學院圖書館、四川省博物館輯得大部史料。」

這裏所說的從四川大學圖書、歷史博物兩館所錄出的資料，當然包括我當日自己所有的和在我鼓勵之下所搜集的而言；這正如亡子歸宗，珠還合浦一樣，怎不令人興奮，怎不令人欣喜。

在此書的後記裏又說：

「本篇承李劼人……舒君實先生供給一些史料，並校閱了部分稿件。在整理當中，徐中舒先生對體例多所指正。蒙文通、李培甫、林冰骨、楊嘯谷先生對甄訂工作教益亦多。」

上面所舉的這些人名，不是我多年的老友，便是我在四川大學時的舊同事。尤其是徐中舒、蒙文通、李培甫諸先生，在歷史學和中國文學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他們之淪落在大陸並不是他們所願。在共黨暴政之下，他們的處境是困難的，內心是痛苦的。這一些學人未能逃出鐵幕，他們的命運固然可悲，在我國文化學術方面又何嘗不是可悲的損失！自從大陸淪陷以後，音書久隔，夢寢懷思，我能在此書中得知他們一些消息，心中不無慰安，至少使我知道，他們在此書出版時，還是活着的。

此書出版於一九五九年，即民國四十八年，編者名戴執禮君，我至今依稀記得戴君好似前四川大學畢業留校服務的一位同學。此書完全把原始資料一一錄出，除在序言中有一段文字帶有共黨的習用口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外，異常的客觀而忠實。大約這正是後記裏所說：「在整理當中，徐中舒先生對體例多所指正」使然。

大陸的學人本來不能有言論和批判的自由，徐先生在體例上要以純資料性來刊印此書，可能用心良苦。

若然，我們可以推想他的風格在隱約中仍能保持而不屈於共黨的暴力，我們異地而處，不難想像其內心的痛苦了。

我爲了想自有一册「四川保路運動史料」，曾託友人分在香港、日本等書肆購買，想不到竟沒有搜求到手。爲什麼在短短的一年當中，像史料這一類冷門書籍就會售罄呢？實在令人有些不解。

## 三

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一書中所蒐集的資料，幾乎全部是與此一運動有關的文電，即所謂官文書。官文書自爲史料的重要來源，可是官文書中不足信賴者亦多。例如川路事變時的四川總督趙爾豐，在辛亥年七月十五日督署槍殺請願的民眾血案發生之當日，向清廷報告其經過的奏摺中，就曾有許多不實的報告。他說：「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卽兇撲督署。當卽派出馬步各兵隊，先在街中堵截。無奈來勢異常兇猛，堵截不住，直迫轅門，值門部隊亦被撲退，並斫傷哨弁鄭杲等數人，進衝二門，直至大堂前排。匪徒均帶火具，並撲兩廊官房。爾豐見事勢已急，當卽飭令兵隊開槍抵拒，傷斃前鋒十數人，始行敗退。」（見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趙爾豐致內閣請代奏電）我是當時請願羣眾之一人，據我所親見的事實，當日請願羣眾中絕對沒有一人是帶火具的，也沒有請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羣眾先在督署附近放火的事。其他的錯誤更不必說了。

官文書之不可靠已如此，那末，我們轉而求之於正史是否可以得到可信的資料呢？

曾著有「辛亥爭路親歷記」的周善培在該書序言的附記中曾說：「偶檢『清史稿』光緒列傳中有趙爾豐傳，內中有幾點都與事實不合：

㈠『川亂起，爾豐還省』，路事起後三個月，趙督才到任，那時川並無亂事，亂事是在他七月十五日誘拘諸人之後才起來的。

㈡『爾豐捕蒲殿俊等拘之』，對蒲殿俊等並未用逮捕的方式，乃係藩臺尹良趁藩署每日會議的時候，僞稱郵傳部有電來，誘諸紳到署看電報而拘捕的。

㈢『軍民環請獨立，爾豐遽讓政權』，並無軍民環請的事，只是趙督爲大勢所迫自己不得已才把政權交出來的。我所記的移交政權一段才是事實。

又，『標統尹昌衡率部入城』。兵變之日，尹昌衡並未當標統。」

周善培於指正了「清史稿」趙爾豐傳中的錯誤之後，又慨歎地說：

「只看這幾節，就知道整個趙爾豐傳，不免還有不確實之處，一個趙爾豐傳如此，其他許多列傳可想而知。不到五十年的近代史（按周著此文時爲一九五七年），錯誤尚如此其多，五十年前的歷史就可想而知了。讀史眞難，搜求史料眞不可不愼。」

周善培在四川保路運動時，先後擔任四川勸業道和提法司，他是在官紳之間周旋運用的重要人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諸如七月十五日趙爾豐誘捕紳士及督署槍殺民眾血案等，他均曾目擊。他所著的「四川爭路親歷記」照理應是眞確的，在該書的自序中他亦自負地說：「事雖過去了四十六年，而所記的件件事，句句話，當時既淡淡地印在我的眼睛裏耳朵裏，幾十年來又時時使我回憶起，並且曾經無數次對人談論過。談論中我從來也沒有錯記過一字，一事。我主要的戒條是：對事必求件件確實，對人必求『死者有知，生者無愧。』」他雖然如此說，我讀了他的「四川爭路親歷記」以後，亦發現了其中有不少的錯誤。舉例來說：

㈠該書正文前面列有兩個人物表：一是官方人物表，一是紳方人物表。在紳方人物表中，有一位川路事變中的重要份子，四川鐵路公司的董事長，或稱董事會主席彭蘭芬（卽彭芬）被誤爲實業學堂的代表。

㈡記述七月十五日督署血案時說：「人散之後，留下打死的七個人，五個人是請願的人民，兩個是督署的文案委員的轎班。受傷的多少不知道，實在打死的有七個人。」他說的打死的人數比命令開槍的趙爾豐所說還要少！那麼，究竟七月十五日那天在督署內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據一份七月十五日被戕人民調查表來看，死亡人數確不止此數。在這個表中詳列了死者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死所、傷死情形等欄。所記死亡的人數是二十六人，死於督署內大堂下、二門、二門側、大門內、按察司牆足、二門內的總共是十五人，死在轅門和轅門外的尚不計在內。這比周善培所說的多了八人。在這張表的後面有一項說明：「前表係就各慈善機關及商會中郵金册內抄出姓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名，並調查死傷情形，死者殆不止此數，因多人親族避禍不敢出頭，周、趙兩說均不盡可靠了，但這仍不能貶損它具有史料的價值。矣。」我們讀此就不難看出史料之蒐集不易，史料之整理尤難，至於史料之處理更非竭盡心智，多方求證不克有所成就。

本文爲我所撰「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的楔子，我預備把我所親歷的事實和我所蒐集的史料作一比較和研究，然後予以適當的處理。可是，是否能免於錯誤，免於蹈前人的覆轍，眞不敢預期。我只感覺到這一段歷史有重要性，而我又是親與其役的一人，把有關四川保路運動的經過歷史忠實的記述出來，是我的義務和責任。

——錄自「新時代」第二卷第一〇期，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當前面對的問題和今後具體的策劃

## 甲、一項重要的指標

教育是國家百年樹人的大計，更具體的說，它是達成國家目標的一項重要的投資和策劃。總統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的致詞中，對今後教育發展的途徑，有非常深刻透闢的指示，他說：「大陸失敗，因素固然很多，而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教育的失敗。」總統更特別指出：「所謂教育的失敗，不只是學校教育的失敗，更確切的說，是失敗在我們缺乏健全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針上面。因此，今天我們反攻大陸拯救同胞的工作，同樣不是靠純軍事力量可以做到的，文化教育才是反攻大陸最重要的主力，軍事的、武力的勝利，不是最後的勝利，只有文化的、教育的勝利才是澈底的勝利。」總統這一愷切的指示，更是我們今後有關教育策劃的重要指標。

如何才能使教育政策健全、教育方針正確呢？

如何才能補救教育政策的缺失、端正教育方針的偏差呢？

## 乙、當前教育策劃的重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由於時代飛躍的進步和我們國家非常的處境，今日教育之內涵已大異於昔日，教育之使命亦重大於從前。在一項健全的政策和方針制訂之前，自須對以往的缺失加以檢討，以便謀求補救和匡正，但尤須瞭然於當前的需要，庶使經過補救匡正以後的教育，成爲進步的教育，而不致重蹈以往的舊轍。故在檢討以往的缺失之先，將當前教育的重點列述如左，作爲我們策劃教育的歸趨和張本。

**一、加強高深研究**：由於時代的進步、科學的發達，今天的大學教育，已不能滿足高深研究的要求，高深研究的責任勢須由研究所，目前尚難於擔負起這一重大任務，故必須借助於外國大學的研究所。而我們國內現有的研究所，尤其是美國各著名大學的研究所。不過這只能作爲暫時的打算，而不能長遠地倚賴他人。在此一現勢下，我們應如何適當地加強高深研究，使學術水準提高、師資水準提高，進而使國民文化水準提高，是今日教育策劃的重點之一。

**二、在職人員的進修教育**：由於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在已納入各項建設的工作人員中，一部份顯然已經落後而面臨淘汰與失業，一部份正接受嚴厲的考驗而在日趨落後中。原因是他們原有的知識與技能已不能適應這個進步的時代。如不予他們以再教育，不是他們阻碍了各項建設的進步，就是他們被進步的建設工作所遺棄。須知足以阻礙進步的不是那些新進人員，往往是那些年資較深的人，他們雖然無心阻礙進步，卻又無力趕上進步。

這一現象在進步愈速的國家似乎愈更嚴重，不久以前美國前任總統艾森豪曾說：「不管國家如何繁榮，我們還有數百萬人民不能找到工作，不能維持生活。其原因之一是由於近年來我們技藝的突飛猛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致許多有能力賺工資的人被甩下，他們的工作已經趕不上時代，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阻擋這種技術改進的浪潮，尤其是那些增加成果的新機器的介入。……然而，技術的改進帶給我們一個日趨嚴重的重新訓練失業人員的問題。」這是一個先進國家領導者極爲正確的看法。近數年來我們各方面的建設都有長足的進步，這一現象在我們的國家亦日趨嚴重。所以如何予在職人員以再教育，增進其適合時代需要的知識與技能是當前教育策劃的重點之二。

**三、教育配合經濟的發展：**近年來我國教育方面的進步，在數量上已經達到很高的標準。各級學校畢業人數逐年增多，可說是教育上一項很大的成果。例如從四十四學年度到四十九學年度的六年中，大專學校的畢業生共有二九、八五三人，普通中學的畢業生共有二一一、三〇三人，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共有一一一、一六二人。這些人的就業情形，雖缺乏詳細的調查，但是除了職業學校的畢業學生以外，多數尚未能在經濟建設上有所貢獻。再如目前全省，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少年，共約一百三十餘萬人，其中在學的不過四十萬人，不在學的將近百萬人，此百萬青少年雖曾受國民教育或中等教育，卻因爲未具備專業能力，不能獲得適當的職業。另一方面，在新興的經濟事業，也正感到技術人才的缺乏，這便是當前教育上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教育上一方面要將已經教育出來的人，再加以技術與專業的訓練，使之消化在正發展中的工商事業中。一方面是根據工業發展的尺度早爲籌劃，有計畫的培養所需的技術與專業人才，以免因人才缺乏而阻滯了經濟的發展，這是當前教育策劃的重點之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教育配合國防的需要**：教育是達成國家目標的主要手段，今日我們國家的目標是建設臺灣、反攻大陸。所以在國防上我們不但要具有充分的自衞力量，我們還須積極作反攻大陸的準備。在此一大前提之下我們教育上的措施，在消極方面，應維護政府兵役制度、鼓勵青學生完成兵役義務；在積極方面，應普遍實施大專學生及高中學生軍訓，俾使我們在常備的武裝部隊以外，有堅強廣大的後備軍爲其後盾。同時軍訓對青年學生身心的健全、品德的陶冶都有實際的裨益，這是當前教育策劃的重點之四。

## 丙、當前教育所面對的問題

**一、正規教育的困擾**：例如以往的大學夜間部教育，本應負起推廣教育的責任，但因未能發揮其應有的精神，把握其應有的目標，使其變質爲一般高中畢業生升入日間大學的中途站，爲正規教育帶來許多困擾。

**二、深造教育與職業教育在功能上混淆不清**：普通中學、大學原本爲深造教育，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原本爲職業教育。但近十年來，往往大專並論，卽以入學考試爲例，亦採大專統一聯考辦法，忽視了二者之間不同的教育功能和目標，使爲就業而設之職業教育亦漸漸變質爲一種深造教育。不獨造成大學入學考試之擁擠現象，更重要的是在國家的各項建設上，因之而缺乏新銳的人材、新生的力量。

**三、兵役與升學在觀念上混淆不清**：由於投考大專院校之男生，極大多數爲役齡青年，因在大專院校修業期中可獲准緩役，故基於升學之志願而升學者固不在少數，而爲了獲准緩役而升學者亦復不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此爲大專院校入學考試擁擠原因之一，亦爲職業教育變質爲升學教育之主要原因。

**四、「優待」與「程度」間的矛盾現象**：例如回國升學的僑生，因所僑居地區之中學學制多與國內不同，其程度自必參差不一，而僑生回國升學，依規定不經大專入學聯考，其所入之科系又偏向理、工、醫三學院，以致規定須在四年內修完之學分，僑生往往費時五年，甚至七年之久，造成淤塞的現象。以上四端爲今日大專教育主要之負擔，亦爲今日大專教育重要癥結之所在。

**五、如何充分利用現有設備**：發展高深教育，自不能不顧慮到相關的設備問題，就其實，今日各校所遭逢的不完全是設備不足的問題，而是如何充分利用現有設備的問題。據初步的統計，現有設備利用的程度，尚未超過百分之二十。

**六、美援資助逐漸減少**：前數年由於海外僑生回國升學，獲有美援的資助，其數額每一僑生約爲新臺幣二萬元，因之臺大、政大、師大等校由於容納僑生較多，學校設備由於此項資助而增添不少。此一階段已漸成過去，自今年起，每年須遞減約百分之二十的美援資助。

**七、教育經費已步入低潮**：今年是教育經費比較緊縮的一年，在以往數年中，四十九年度較四十八年度增加額爲百分之二六・〇五，五十年度較四十九年度增加額爲百分之二四・一九，五十一年度較五十年度增加額爲百分之二八・二二，五十二年度較五十一年度增加額僅達百分之六・三，是最低的一年。現在五十二會計年度業經開始，教育經費顯已步入一個低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丁、今後具體的策劃

**一、設立僑生先修班**：在國立道南中學設立僑生先修班，對返國升學僑生之各科程度予以甄別及補修，使其合乎國內中等學校畢業生程度水準，再行分發大專校院就讀。

**二、提高大專教育的素質**：減輕各校院的負擔以外，其素質尤應予以提高，惟以人力財力所限，目前勢難作普遍的策劃。計劃對已具規模的校院予以充實，使其能在一定之期限以內，逐步達到世界著名大學之水準，爲我國大學教育樹立良好的楷模，奠立堅固的基礎。

**三、改進大學夜間部**：各校院夜間部除了以增多高中畢業青年升學機會爲目標外，應以逐漸增多在職青年的進修機會爲主，所修讀的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不必與日校完全相同，夜間部辦理的方針，今後應依照下列三個原則：

1. 注意實用，以增加因社會進步而需要的知識和技能。
2. 適應需求，以充實青年在擔任新的工作或更重要的職位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3. 不影響役政而能推廣教育，對於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服兵役的學生予以優待，未服兵役者不予緩征。

先從大專校院開始辦理，將來逐漸推廣及於各科職業學校，同時使各校現有之設備亦得以充分的應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推廣空中教學**：各校院夜間部之改進，以及將來逐漸推廣及於各科職業學校，固大有助於教育之量的擴展，然亦僅限於設有校院及職校之地區。如何能使眾多的失學青年及在職人員，以及家庭婦女等均能普遍地享有增進知能的機會，就不得不推廣空中教學。空中教學是利用大眾傳播的工具廣播和電視以發揮教育的功能。廣播和電視的教育，雖不如教室施教的便利，但它能達到無遠弗屆、有教無類的目標，則爲其他教育方式所不及，尤適合於師資缺乏、設備不足的國家。

**五、充實現有研究所**：現有研究所的充實，除有利於高深研究外，更有助於大專師資的培養與提高。自教職員退休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實施之期已在不遠，在各大專校院任教的老師宿儒，多數已屆退休年齡，故對今後大專師資之培養尤須加強，以便接替退休教師所遺留的職位。

研究所充實劃一既定的階段後，仰求於國外研究所的機會當逐漸減少，留學政策自將因之而酌予變更。

充實現有研究所之辦法如左：

1. 研究所應有其獨立性：以往的各大學研究所大多數由相關學系兼辦，無專任員額及經費，以致不易發展。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於討論改進高等教育方案時，曾提出此一問題，經報請行政院核准在政府預算內編列專任教員的名額和經費，使研究所具有獨立性，以利其發展。

2. 講座教授的設立：在每一研究所中，至少保留講座教授名額一個，邀請國外學人或外籍教授來臺擔任。其待遇將比照一般外國大學標準支給，由美援教育經費項下撥付。此項講座教授名額，暫以三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名爲原則。

3.繼續維持研究獎助金：除了邀請海外學人及外籍教授來臺任教或講學外，如何使現任的教師能安定的工作而不再離臺他往尤爲重要。年來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所設的六百個研究獎助金名額，使在各大專校院的部分教師可得臺幣一千六百元或八百元的研究補助費，此一措施對教師們的生活有很大的調劑作用。今後仍當繼續辦理，並在國家財力負擔限度以內予以擴展。

他如清華大學增設數學研究所、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創設，於高深科學的研究又邁進了一程。

**六、留學政策的改訂**：由於大學教育已不能滿足高深研究的需求，由於國內研究所的若干學科尚待充實及容納量的限制，自以多予有志出國深造之青年以機會爲原則。然漫無節制的留學政策必將導致不良的後果。今日之留學辦法自應以配合國家政策與適應當前需要爲前提，故除了保持原有的每年一次的留學生考試外，並在留學規程第八條中特別爲自費或獎學金留學生申請免試出國留學而訂定了一項辦法。

第八條一、二兩款規定：「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學生須獲有攻讀博士或碩士學位之國外大學助教獎學金或研究所全部獎學金，或獲得授予博士或碩士學位研究所之國外大學獎學金，其金額足敷全年學費者。」雖可獲准免試出國留學，但若非在校時成績優異，則此類獎學金實不易獲得。因此，原試行辦法中在國內成績須在七十五分以上之規定自無其必要。

高考及格人員及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本以納入國家各種建設工作爲正途，故有先行在國內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三年或五年以上成績優良之節制。完成此一義務後，只須取得國外大學之入學許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亦可申請免試出國留學。

專科學校原屬職業教育之範疇，乃爲國家造就實用建設人才而設立，故學，除了多加留學考試以外，不得不重視其在國內服務之年資及成績，以維除了上述以外，第八條中包括爲鼓勵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成績優良之青學校崗位服務之第三、四款，以及爲鼓勵大專畢業青年於服完預備軍官役後何配合經濟發展」此一課題予以切實之調查與研究，已得史丹佛大學的援助來臺作實地的調查。預計在本年十月卽可提出具體的報告，以供政府的參考。

**七、國際合作事項之爭取：**

1. 教育配合經濟發展的計畫：在第三期四年經建計畫中，已列有人才培養的一章。爲了就「教育如

2. 中國文化暑期研究會的召集：這一研究會是由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主辦，已於七月一日在臺中開幕，參加者均爲中美兩國學人，期能在相互的研討中增進美國學人對中國文化正確的了解。

3. 史丹佛大學在臺設立中國文化研習所：這所中國文化研習所是史丹佛大學在國外的第五個校區，另外四個在西德的斯圖加特、法國的都爾、義大利的佛羅稜斯和日本的東京。十一位美國學生將於九月從美國來到臺北，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作一年的研究，他們將是史丹佛大學的正式學生。這個研習所設立的目的，是在使學生們在我國得到直接的資料和經驗。

4. 農業教育的長遠策劃：由美國農業專家與中興大學農學院合作，成立一農業教育策劃委員會。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根據本省的實際情況與我們的目標，研討農業教育的諸多問題，對今後我國農業教育的發展，訂一周密的計畫。他們認識中共匪黨的農業政策是壓榨農業以發展工業，而我們則是培養農業以發展工業，由於此一極不相同的出發點，故大陸是災荒連年而臺灣卻衣豐食足，足見妥善的策劃是如何的重要。

5.他如政大、成大等校均與國外大學有教學上的合作。

我們深知教育所負的使命至爲重大，社會各方面對教育十分關切，然而談到教育改革固然需要人才與錢財，但時間的條件亦非常重要。在目前國家的處境，我們只有拿努力和勇氣來衝破一切困難，從已有的基礎上、縝密的研討中，先求建立一明確的教育體系和方針，作切合國家需要、適應時代進步的策劃。

目前諸如上述各端，雖說是已端倪初具，但應做的事仍然很多，期能從不斷的研討改進中，規劃出條理來，繼之以踐履篤實的精神，以擴大教育的功能，達成教育的使命。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英國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舉行植樹典禮，邱吉爾曾親臨發表演說，這位使英國安然渡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家的話，值得我們引爲他山之石，他說：「英國必須依賴其人民的進取心與他們經過訓練的創造能力……由於我們既沒有眾多的人口，也沒有原料，乃至足夠的農地，供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安逸地生活，我們的生存必須依靠我們的頭腦和最高的智慧，且至少要與美國和蘇聯人民的頭腦與智慧相等。」

我們今天對匪的抗爭，同樣地，不是量的比賽，而是質的對抗，這正是我們應當絞腦汁的時候，爲了反攻復國，爲了復國後的諸多建設，實在不容我們懈怠！

按：原文時間未詳，約在民國五十一年間。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一個合於戰時與平時的教育策劃

近代國家之繁榮進步與國民生活水準之提高，繫於國民知識技術之普遍增進；因此，教育乃爲達成國家各項目標之重要手段。行政院第三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曾將科學技術及專業人才培養計畫列爲第十一章，卽本此方針而製定，此爲三期經建計畫之一特點，亦爲近年教育措施上遵循之一項方針。

教育部爲吸取先進國家來華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經過將及一年之經驗，以有助於教育與國家經濟建設之配合推行，特於年前與美國司丹佛研究所合作，由該所派遣專家之努力，現已由該所製成報告，提供我政府採納實施。

教育應配合國家經濟、政治、文化之發展，爲當前教育之一項重要方針。除此之外，在教育措施上，我們面對着兩項更爲迫切而嚴重的問題，亟須予以愼重考慮。如不求得解答，則將不能適應我戰時與平時之需要。謹說明如左：

第一、檢討當前國內外情勢，我們反攻大陸光復河山的時機愈益成熟。當戰爭一旦爆發，如何纔能使現在小學、中學和大專院校，近二百五十萬在學的青年學生，（包括小學生：一、九九七、〇一六，中等學校學生：四一一、五七二，大專學生：三八、四〇三，計爲：七八、二六一尚不在內）不致弦歌中輟？這是今日教育面臨的第一個嚴重問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二、就人口增加的趨勢分析，過去十年來，全省人口增加了三百多萬，依照美援會「臺灣二十年人口之發展」研究報告，未來十年人口將增加約四百五十萬人，再照史丹佛研究所專家的分析，民國五十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將達三百五十萬。再從教育經費上看，十年前全部教育經費僅爲三億，（民國四十一年中央教育預算爲八五〇萬，省教育預算爲一一二、五〇〇、〇〇〇，縣市教育預算爲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總計爲三億元）本年已將增達十九億，約增加六倍有多。其中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經費自一億二千萬增至七億八千多萬，如照此數字作比例的推算，到民國六十一年，教育經費將達一百二十億。拋開無法節省的國民義務教育不計，即以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增班經費而言，也達四十億之鉅。

這是一個具有威力的數字，如果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必然將形成財政上極其嚴重的問題。將來政府縱能勉強因應，然而以有限的資源和財力，追逐無限因人口增加而必須的設校增班，其結果，不是教育拖累住其他重要事業的正常發展，就是由於經費的短絀，迫使教育日漸趨於萎縮。即使能夠勉強因應，亦只能保持現有的升學率，而不能增進國民知識與技術水準的提高。更不能使國民就學機會增多，以達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國民教育機會一律平等之旨。

爲了使戰時教育無弦歌中輟之虞，爲了減低未來政府財政負擔，今後教育發展的途徑有二：

一、是就國家財政負擔力量所及，充實現有傳統的學校教育。

二、是發展推廣教育與大眾傳播教育從速建立空中學制，使不能進入學校之青年能一面就業一面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修，增進知識技能，達成升學的願望。

空中學制，乃利用現代大眾傳播工具廣播、電視，以傳授一般學校的課程，辦理各科學分之選讀，編發各科教材，並定期舉行考試，及格者給予學分，在研擬中的「空中學制」，在原則上，不是把它來代替現有學校制度，而是對現在不能升入現有各級學校的青年，予以深造及取得同等學歷的一項補救。它亦不是義務教育的延長，因爲義務教育是強迫的，並免費供應教科書。依照我國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之實施爲六年，限於六至十二歲的學齡兒童。而空中學制則以國民學校畢業生不能考入初中，願完成初中學程者；以及初中畢業不能考入高中，願意完成高中學程者；暨高中畢業生不能考入大專，而願意完成大學課程者爲對象。

在施行技術上，凡不能利用空中傳播的課程，則在各地區指定同級學校及適當教師，利用星期日或夜間予以補習，並予以體育與德育上的輔導，以期能具備同級學校的各項條件。空中學校學生學歷的檢定，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及格，決不粗製濫造使之低於同級學校的水準。空中學校既不是強迫的，故凡自願深造完成學歷的合格學生，必須註册入學，修滿課程後，方得參加考試，得酌收少數學費及考試費。因它不是義務教育的延長，

爲什麼要建立空中學制呢？

因爲空中教育有下述的優點，能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又爲我們國家財力所能擔負。

一、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在非常時期亦能繼續施教：像一九三七年美國支加哥各學校，因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兒麻痺症流行，學生不能到學校上課，即利用廣播授課，學生在家中收聽，又如一九五二年的冬天，美國費城各學校之職員，因故罷工學校停課，於是學校當局即利用電視授課，學生們在家中聽講。

有一次明尼亞波里司城各小學校因故聯合大罷工，六萬三千個小學生均告失學，於是該城的電視臺便抓住這一個難得的機會，開設臨時的電視班，用生動的木偶來示範教授公民衞生課，用蘋果和桔子等來教算術，小學生們大感興趣，十分歡迎。說也奇怪，等到罷工風潮結束後，居然還有三萬多個小學生不肯再上學校，寧願繼續做「視聽學生」。

一旦戰爭爆發，空中教育必能補救一般學校因戰爭影響而停課的缺憾，在戰爭狀態下繼續施教。

二、解決師資缺乏，設備不足的難題：據美國哪格斯城之電視實驗教學指出，美國學校的傳統組織而言，通常每三十個學生平均一定要有一個教師來教課，但是使用了電視教學以後，這個傳統的比率已大爲變更，一九五七年哪格斯城致福特基金會報告中說明：如果全美推行電視教學，可以減少十萬名教師，每年可以節省國庫開支五億美元。再就減少設備來說，在電試化學班裏的一根試驗管，本來只供一班使用，如今可在無數個教室裏出現。教室的缺少，在無形中全部解決。

三、具有現場施教的功能：透過廣播的教育，特別是電視教育，可以將人類的生活和發生的眞實事物，搬入播送室內，向學生們直接解說，使學生們從眞實的事物中，去體驗教育的意義。特別是技術示範方面，尤爲一般學校教育所望塵莫及。舉個實例來說：在外科手術室中是不准擁進去很多人觀摩手術實施的，如果利用電視教育方法，此一問題便可解決。有一次，波士頓城有六位權威外科醫生，在實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心臟手術，要想觀摩見習的學生和醫師很多。據事後統計，單是在紐約市某八百位學生和醫生在屏息靜氣目不轉睛地從電視幕上，仔細觀察手術時的每各處，至少有一萬八千名學生和醫師在各自的家中接受這一次外科手術教育電視，無論如何不能收到如此大的教育效果。

四、發揮同級學校教育的功能：據美國西方保留地大學，所辦理的「電而在家中上課的學生，他們考試成績居然比一般正式學生好。爲對空中教育比較，芝加哥電視大學曾作過一次實驗，第一學期的實驗計畫，爲設立三種課程，②在教室中接受電視課程外並受教師的指導，③在教室中只受教師指導。入學前的測驗，是在家庭中接受電視課程學生得分最高，其次是在教室中接受電視學生的成績，在教室中只受教師指導者最差。第一學期兩次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其成績之等第亦然。

五、減少人力的浪費：教育雖是一項遠大的投資，但升學中的人口是不是一項巨大的人力浪費。空中教育可使在職的人同樣得到受教育的機會，而女、農工青年及成年亦可一面工作一面進修。經由空中教育獲得學歷之人數識技術水準一點上，其功能尤不可估量。

空中教育雖然早已具備了上述的優點，確能發揮傳統教育的功能，同時切需要，而我們卻一直把它看作輔助教育或社會教育，沒有善爲利用，以利又爲我們國家目前處境所迫教育事業的發展，實在是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個缺憾！所以我們要從速建立空中學制，把它的功能擴大，把它納入一般教育的範疇。我們這樣作法，不是一項嘗試，更不是創舉，這一個制度，除了美國普遍實施以外，他如意大利、加拿大、澳洲、日本等或已實施或正積極計劃實施中。實施空中教育成效的例子很多：

例如波士頓城一家呼號爲WGBH的電臺，便已得到哈佛大學、麻省教師都是各科的權威或專家。更進一步，已有若干著名大學，如密歇根大學、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華盛頓大學、俄瑪哈大學等都已先後設立電視班，以適應各地學生的需要。

最有規模的要算芝加哥電視大學。凡在該校讀學分的學生必需辦理入學手續，並符合修讀課程的條件，且須註册，經過測驗，編入班級。該校成立之初，第一學年僅設英文、社會科學、生物三科，另有選修科目兩種，一爲政治學，另一爲數學。其後範圍逐漸擴大，除增列新課程外，並加入新的選修科目，選修科目之設，其目的有二：

一、爲經由電視大學以取得學位之階梯。

二、讀學分與不讀學分的學生，爲增強其專門技能而選修一、二種課程。

以上這些，實已具備了一般大學的性能，學生人數在一九五七年已達七千二百三十九人。（其中讀學分者一、五一一人，不讀學分者五、七二八人。）

爲辦理一所設有教室之大學以容納如許學生，則非有大批專用教員及一中等規模的學校建築設施不能辦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國其他大學設有電視課程，容納修讀學分學生的學校，至今已達二百餘所之多，其發展之速就可以想見了。

如果我們冷靜地作一觀察，近年來，在家庭、在農村、在軍中，從各青年、婦女正不知有多少。而作有系統的分科傳播的，如像教育廣播電臺，他們對初、高中的規定課程，早已有計畫地按日聘請專家優良教師講授，且對大學課程也作部份傳播的收聽人數達六千八百二十九人，未知的人數自然不止此數。

本省的廣播事業，這幾年來正在突飛猛晉中。當光復之初，僅有臺灣廣播電臺所屬之臺北、臺中、嘉義、臺南、高雄、臺東等六所，至於收音機方面，在民國三十四年僅有九萬七千五百四十一架，到民國五十年年底，經登記領有執照之收音機已達五十一萬七千六百七十四架，其未登記領照之收音機尚不在少數。

電視設備方面，教育電視實驗臺，已作近一年的教育節目試播，規模初立，現已準備安裝二瓩的新發射機，一俟裝設完成，必更能發揮其功能。再如新近成立的臺灣電視公司，發展情形甚爲良好，民間電視接收機之裝設日多一日，對未來空中教育之推行裨益甚多。就此一現有的廣播、電視的基礎予以發展利用，乃一迫切而迅捷之圖。

空中學制在我國也並非新構想，與民國二十年前後我國倡行的電化教育，以及後此的視聽教育，實在沒有什麼大的區分。遠在二十年以前，提倡電化教育甚力的陳果夫先生曾說：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電化教育，是利用電氣工具輔助教育的實施；使之以很少的人力，收到最大的教育效果。這是教育設施上一條新的途徑。現在電氣事業發達的國家，其教育的實施，已經知道這個方向。中國未來的教育，需要大規模的發展，而中國的人力物力，比較外國更爲短絀。所以必須把握這個途徑，纔可以解決許多當前的困難，纔可以使中國的教育，有飛黃騰達之一日。」

果夫先生二十年前說的話，我們今日讀來尤覺其意義深長，目光遠大。可惜由於共匪叛亂竊據大陸，以致遲誤至今，否則，我深信必定早已發展得很可觀了。

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空中學制是今日發展教育的根本之圖。時間進展得非常快速，常令我們有稍縱卽逝之感，我們不能再蹉跎歲月了。凡是有利於國家的事，今日立卽去做，比明日再開始做好。我們是經歷過成功亦遭逢過失敗的教育工作者，過往的教訓，我們必須記取！

——錄自「教育文摘」第八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一個今後發展科學教育的路向

處今日之時代，一個有志氣、有擔當的中國青年，我認爲有兩條道路供我們選擇：一是獻身於解救大陸苦難同胞的戰爭。

一是精研科學，發揚我民族優秀稟賦，盡我們對國家對人類應盡的責任。

沒有前者，無以完成現代青年的歷史使命，使億萬同胞免於奴役，使國家得到新的生機！

沒有後者，對未來國家建設的重任無力肩負，對人類的幸福無由貢獻，將使我們在世界上永無揚眉吐氣之一日。

最近，我看到幾位來華留學的韓國青年，健壯的身體，充滿信心和希望的眼神，那種氣概，一望而知是有抱負的青年，使我感到，大韓民國雖在動盪以後，而他們的國家是非常有前途的！同樣，我們回頭來看現代的中國青年，從他們在海外科學領域中的進展情形來看，他們確確實實地不落人後。我常想：如果中國在海外的學人在科學上的卓越成就，能與國家的進步發展結爲一體，我深信，我們國家的前途，定有無限的光明。在美國普渡大學任教的數學家徐賢修先生曾和我談起，如果把留美的中國學人集中起來辦一所大學，一定可以與美國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媲美，足見中國學人陣容的堅強。我們在國內正爲師資缺乏所苦，沒有邀請到更多的學人回國服務，能不感到遺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年以前，世界上有句流行語，人們說：「一九五七年我們生存的世界上有四顆星出現，其中有兩顆是俄國人放出的人造衞星，使居於自由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人大爲吃驚，他們渴求了解俄國科學發展的根源，乃於一九五八年八月派出一個訪問團到俄國去考察他們的教育措施，考察的結果，才發現俄國的小學到中學階段，對數理方面的課程非常重視，普通學校的每個學生，從五年級到十年級的六年中（相當於我國的小學五年級到初中畢業），要讀七、一九六小時的功課，其中只有二、四九九小時的人文課程，而科學與數學卻佔了三、〇〇九小時，農業與工業實習亦佔了五七八小時。尤其是物理方面，他們六年級的學生便開始熟識機械以及熱力電力現象的原理，構成一種基礎，使學生進一步能學習高深而有系統的物理學。如果與美國的學生程度作一比較，俄國高中畢業學生的理科知識水準，就相當於美國的大學二年級。

美國雖遠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着手中學物理課程的提高與改進，但在當時尚未表現出成績來，實際上已較之俄國落後了一步。所以這一項考察俄國教育實況的報告更普遍引起美國朝野的注意，迅速地對科學教育的改進採取了積極的措施。考其途徑不外下述兩端：一是科學教材的繼續提高與修訂，一是利用大眾傳播工具電視、廣播、電影等以擴大科學教育的功能。關於教材修訂方面，物理科是由物理科學研究委員會主持，化學科是由化學教育資料研究組主持，業已完成了非常完美的新教材，對數學教材的改進更不遺餘力，一九五八年由耶魯大學作初步的修訂，一九五九年由密歇根大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重行修訂，一九六〇年又經司丹福大學再爲修訂，他們都是以第一流的學者專家從事此一工作。經費的大部份來源爲國家科學基金撥款協助，他如福特基金，對物理教材的改進曾捐助美金七百萬元。

關於利用大眾傳播工具施教的措施，亦積極展開，除了各大學及出版機構紛紛攝製科學影片以供電視教學外，如像「大英百科全書教育電影公司」攝製的科學影片亦很完美。其化學教材計有一六〇節（每節放映三十分鐘），由加州大學物理系副主任 Harvey E. White編製，由美國國會通過之國防教育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撥款攝製。此一物理科教材，一九五八年起，在四十九個中學作實驗試映，其後又在支加哥一一七所中學放映施教，科學界認爲其施教成果較之一般課室講授良好。例如有若干物理實驗，在一般教室中須二十——三十小時始能完成，所費時間多半消耗於儀器的裝設，及不重要過程的等待中，而在影片中只需十數分鐘即可將其重要之點和該一實驗的主旨解說表現清楚。其他適合大專及高深科學研究的教材，聞亦由幾個著名的文化機關，約請各科權威教授編訂教材攝成影片。

由於美國科學教育水準的不斷提高，近年來我國赴美深造的同學們，在科學研究方面，已感到吃力和遭遇到困難，原因是有一部份科學上的新知識，在我們現有的課本中還沒有容納進去，相反的，不少應予剔除的舊材料，我們卻仍在孜孜研習，二次大戰以後科學進步發出的光芒，使不少的國家睜不開眼睛，而我們不幸正是其中之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們爲中小學課程的改進，不得不從根本上尋求解決之道，所以有訂工作，是依照五年以前王雲五先生主持的行政改革委員會的建議而擬貽琦先生任教育部長的時候，歷時三年，召開大小會議四百餘次，集專家學者四百餘人之經驗與智慧，經過不斷的研討爭辯而製訂。可是課程標準的修訂，只是課程改進的初步工作，是否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尚有待於新教材的編印和教學方法的配合。但尤爲迫切的是大學課程的修訂，大學課程的修訂工作不知又比中小學課程修訂繁難多少，也許還須經過三五年的辛勤工作始能完成。等到我們課程修訂好，新教材編訂齊備時，不知世界科學的進展又到什麼地步了！長此跟着別人的尾巴追趕，我們的科學教育還會有輝煌的一日嗎？這是久久縈緬我心中的，使我感到心情沉重的一件事。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俄國的科學發展不如美國，當美國教育考察團赴俄時，曾看見他們處處都揭示著「趕上美國，超越美國」的標語，不久他們眞的趕上美國了。美國人從一九五七年警覺後，全力加強科學教育，到了今天似乎又把俄國遠拋在後面去了。不久以前美國甘廼廸總統對古巴情勢的斷然強硬處置，使俄國人不得不屈服，就是美國科學的進步超過了俄國的一個良好例證。假如那時核子武器和洲際飛彈的優勢，掌握在蘇俄方面，情形便就會兩樣了。俄國與美國在科學競爭上的消長，是近幾年的事情，它不是古老的傳說，而是活生生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這是「迎頭趕上」的道理的最現實的說明。迎頭趕上的道理無他，簡言之，就是把人家進步的成果，作爲我們自己進步的開端！因此我們對自己的落後不必恐懼，只要我們善用別人科學進步最新的成果，有迎頭趕上的決心和勇氣，這是有志於研究科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青年人必須記取的。

多年以前，　國父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曾說：最初的火車是由人拖馬拉着走的，當時大家聽了還不十分相信，其實今天我們在臺灣所見的「臺車」不就是由人拖馬拉着走的嗎？據說火車的發明是由於煤礦工人而起，工人們挖煤時，以至坑先從平地挖掘，繼之向地下挖掘，以重的運輸問題，最先把煤束在一起放在人的背上爬出坑道，以後用木箱在木箱下面加上輪軸，在木軌上釘上鐵皮，再進而爲鐵軌，造成今日我們在臺灣尚能見到的「臺車」，然後逐漸演進爲火鐵路，我們一定不是以臺車來作榜樣，甚至今日臺灣鋪設的窄軌亦不合築合乎國際標準的寬軌，也不再用燃燒煙煤的車頭，而要用柴用電甚至更進步的動力，所以我說，我們雖然落後，但不必恐懼，只須有迎頭趕上的決心與勇氣，唯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把個人的成就，與國家的進步發展結爲一體」，我們所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才有其嚴正的意義。爲了提高科學教育，我們準備把國外已有的優良教材，儘先利用近代傳播工具，播送介紹出來，不必待至課程改訂之後。如像大英百科全書教育電影中的物理、化學教材等，便可很快加以利用，使大學中學同學們在課本以外，接觸更多的新知識，使教師們在教學方法上有所觀摩和借鑑。這是我目前的工作之一，我已決定如此去做。一位關心教育的朋友曾聽到過我這一主張，他說這樣做確是迎頭趕上的好辦法，中國今後的科學恐怕會因之而提前進步一百年，我說提前進步一百年未免誇大，提前數十年或許是可能的。至於在科學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育進展的這一點上，我們這樣做，雖不能一蹴而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但我相信今後與他們在科學教育上的距離，可能只是年月之差而不是數十年之隔了。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中華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等教育與技藝教育發展之方向

目前有關改革教育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中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完成是學生在學校的學習中心。學校教育的目標能否達到，教學功能能否充分視課程之是否配合教學目標，適合社會需要。課程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應教育進步的趨勢，適時加以修訂。茲先就中學課程標準之修訂方面說明如左：

## 修訂中學課程的意義

此次修訂中學課程標準之意義，計有下述八點：

一、確定初高中教育目標及教學重點。二、順應世界潮流，奠定延長科目及選修科目，適應學生升學就業的需要。四、適應個別需要，發揮分育。六、刪減初高中重複教材，力求各級學校課程之啣接。七、重視技藝輕學生課業負擔。八、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培養有用人才。

這八點意義雖各有其重要性，但其中第三、第七、第八三點，尤其值策上的一次改革，是這次修訂課程標準的一項特點，在此有加以解說的必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現行中學課程標準，因囿於中學教育目標的單純化，整個課程設計乃以升學爲目的，對於不能升學青年，並未作周全顧慮，但初高中畢業學生，並不能達到完全升學的目的，根據統計，臺灣省初中畢業學生每年達四萬五千人，其升學率爲百分之七十；高中畢業生每年爲一萬五千人，其升學率約爲百分之六十，尚有百分之三十的初中畢業生（約一萬三千人）及百分之四十的高中畢業生（約六千人）既無升學之所，又乏就業技能，成爲社會遊蕩份子，造成青年失業問題。此次修訂之中學課程標準，乃加強職業科目及選修科目，以適應學生升學及就業之需要。初中除增加工藝科（女生家事）教學時數外，並於初三加選修科目，分升學及就業兩類；升學科目酌列國文、英語、數學等科，就業科目按地方需要酌列農業、工業、商業、家事等科。高級中學自二年級開始選修，每週二至八小時。升學科目包括國文、英文、自然、社會、數學等科；就業科目包括商業、地方自治、鄉村建設、技藝等科，以適應升學或就業之需要。

第二、國家教育青年之目的，在培養所需人才，成爲國家建設的骨幹。優良的教育計畫，尤應與國家建設計畫密切配合，以改進社會、造福人羣。所以此次中學課程之修訂，乃加強科學知能與職業知能，培養手腦並用的建設人才，以期貢獻於國家建設事業，以消除過去只偏重知識教育，忽視技藝學科之弊。

## 科學與技藝同等重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緊接着中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完成之後，教育上的另一重要工作，便是正在積極推進中的職業學校課程標準的改訂，這自然更須發揮實用教學的功能，方克有濟了。

要檢討我國的技藝教育，不能不遠溯到滿清咸豐末年同治初年那一段時期。那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在外侮頻仍中，爲外人的堅船利礮所驚懾，一方面又正利用西人軍器與太平軍對抗而收效頗大，不得不承認外人在軍器製造上比我們進步。而初期的吸收西方文化，亦以製造軍器的技藝爲主。例如當李鴻章坐鎭上海的時候，曾寫信給曾國藩道：「鴻章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同治三年，他又寫信給恭親王奕訢和文祥說：「……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日本君臣發憤爲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礮。……」這是中國最初學習西方技藝的動機和目標。到了光緒初年郭嵩燾出使英、法，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現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制度和一般文化亦有其長處。而且發現當時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除了學習機械技藝以外，還學習他們其他方面的學問。西方的科學文明，日本人在那時就有成套學習的趨向了。經過了李鴻章、郭嵩燾等人的奮鬥，從學習西人軍器技藝，發展而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階段，中國的社會就在這「體」與「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爭論中徘徊，「體」與「用」的矛盾中踟躕不進，就誤了千金一刻的好時光。一直到了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才瞭解到西方的文明是有其整體性的，才瞭解到科學是技藝的根本學問。於是乃糾正以往只重技藝不重科學的誤失，而勉勵有志的青年人向研究科學的路向去謀發展。由於中國青年人優良的稟賦和他們的努力奮鬥，到了今天，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科學發展的領域中已有了相當可觀的成就，這是值得我們欣慰的。欣慰雖然欣慰，在欣慰中我們亦有隱憂。我恐怕在這科學與技藝同時突飛猛進的時代中，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縱然勉強追上了科學進步的潮流，在技藝方面我們又被拋落老遠了。正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顧到了本又疏忽了末，我們數十年辛勤努力所得來的成績，又將爲這一新的誤失而減弱而抵消，能不令人爲之浩歎惋惜嗎？

技藝是科學服務人羣的表現，不研究科學而只學習技藝，技藝在我們的國家固然無法成長起來，可是，只知研究科學而忽視了技藝，不但科學無以致其用，我們國家目前發展經濟建設的計畫亦難於圓滿完成。

檢討我們現行的留學政策，我們今天到國外留學生中，絕大多數是大學畢業以後，到國外去入研究所，從事高深科學研究的，至於專科職業學生到國外去學習專門技能，以及技術人員到國外工廠去實習實用技藝的卻非常之少。我們到今天亦還沒有訂出可行的辦法來予以輔導和鼓勵，這是當前教育政策上的一項缺陷，應該從速把它補救起來。

我們今日在經濟建設發展期中所需要的技藝人材的情況，很值得我們注意，在史丹福研究所調查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告中已預爲統計，可作我們的參考。

## 史丹福專家們的報告

在史丹福研究所調查報告中，預計在民國五十四年，所需各類專門職業之人員重要缺少類別如左：

（所稱專門職業人員係指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人員而言）

| | |
|---|---|
| 機械工程師 | 缺少一、四〇〇人 |
| 中等學校教師 | 缺少一、二〇〇人 |
| 會計人員及財務分析人員 | 缺少一、二〇〇人 |
| 高等學校教員 | 缺少一〇〇人 |

至於左列各類專門職業人員，則預料頗多過剩：

| | |
|---|---|
| 經濟人員 | 過剩七一〇人 |
| 化學人員 | 過剩五四〇人 |
| 農化人員 | 過剩四三〇人 |
| 化工人員 | 過剩四〇〇人 |
| 森林專業人員 | 過剩三九〇人 |
| 農業經濟人員 | 過剩三七〇人 |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電力工程人員　過剩　三〇人
土木工程人員　過剩　三〇人

由於以上的統計所示，除了機械工程師、中等學校教師、會計及財務分析人員、高等學校教員，須加強培養外，其他類別的專門職業人員，我們到民國五十四年都有過剩。而我們所大量缺乏的是必須由職業學校培養或訓練的技術員與半技術員。民國五十一年，我們約有二十五萬技術員就業，其中三分之二在電力、礦業與製造工業內獲得工作。五分之一弱爲手工業，如受僱於各種工業內之泥水工、木工、電器工與鉗工等。運輸與交通部門爲技術員與半技術員之第三位大僱主。其餘人力則受僱於農業和森林、漁業、銀行與財務等方面。

至民國五十四年時，經濟方面所需僱用之技術員與半技術員總數約爲二八六、〇〇〇人，較五十一年時所僱用同類技術員約增加三六、〇〇〇人。在電力、鑛業與製造工業方面之擴充人數，約占增加總額的百分之八十。運輸與交通部門約佔增加總額的百分之十二，其他工業所需各類手工業者約佔百分之十。其中僅精細機械技術員一項就缺少一三、一〇〇人，紡織設備技術員缺少六、四〇〇人，普通機械技術員缺少六、八〇〇人，電機技術員缺少四、一〇〇人，他如土木方面的技術員缺少計約四千餘人。

這些缺乏的人員，亟待加速作有計劃的培養和訓練。

尤其重要的，是間於工程師與技術員之間的技師階級，有兩個問題值得格外予以注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是多數工業和農業方面工作的技師，僅受普通職業學校教育。其所得後複雜工業和農業技術。

二是按照我們正常發展中的工業經濟，目前技師與工程師之比率太低，各經濟先進國家中，此一比率爲一比一到二。五比一。

技師這一階級，在各經濟部門中有其樞紐的作用，我們今日面臨的問題以及在任用的量上予以適當的調整。

現在各經濟部門中服務的技師人數約爲二三、〇〇〇人，至民國五十四、〇〇〇人，比現在就業者多四千人。以我們目前的供應能力而言，除了航海技師、鑛業技師等少數項目須加以擴充訓練以外，尚勉能勝任。問題端在如何提高現職人員的素質，使之能充分發揮其中堅份子的任務。

## 為光復大陸儲備人才

從上面所列舉出來的，對技術員、半技術員、技師的需要（包括質的需要和量的需要），我們不難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有一個深刻的體認。那就是：

一、鼓勵更多的優秀青年進入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去深造，鼓勵更多的在職青年進入大專夜間部、職校的技藝中心去進修。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訂立妥善的辦法，選擇優秀的職校、專校的專業教師到國外技藝學校去研習專門技能；選擇優秀的職校學生到國外工廠去實習技藝。

我深信這樣做，對於我們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和未來新國家的建設，都具有其深遠的意義和必要。

最後我要特別說明的是：

第一、史丹福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誠然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發展的重要參考，可是這一報告只是以建設今日之臺灣爲對象，而不是爲我們大陸光復後建設新國家作預籌。所以在我們來說，建設臺灣是「過程」，建設光復後大陸的新國家才是我們的目的。所以在史丹福報告中，雖然預計到民國五十四年時，有若干部門的技術工作人員有過剩的數字，以我們建設未來的新國家而言，決無過剩之虞，恐怕只有不足之憂。

第二、史丹福研究所的調查報告，雖然已經對我們今後如何開發人力資源提供了不少意見，可是，他們所見到的只是人力資源的全體。他只以一般學校教育爲調查設計對象，而忽略了各種軍事學校、各特種部隊，以及留存在社會各階層的可資利用的潛在的人力資源。

且舉例言之。例如近十數年來的臺灣建設，其所以能有今日的成績，大半是由於我們從大陸上來臺的具有學識經驗的優良技術工作者參與各項建設工作，加之以日本統制時代的基礎，再益以少數就地培養出來的技術人員共同努力，而不是以臺灣現有的學校教育來供應其全部需要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軍中青年是重要資源

又例如，四十九年發生的八七水災，其對各部門建設事業之破壞可以說空前的嚴重，而我們卻能在短短的幾個月中使之完全恢復技術人員，而是軍中的技術人員，我們所憑藉的不是完全學校培養訓練的，和廣大的軍中青年，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再如橫貫公路的修築，亦是軍中人力的一項優良的表現。

所以我認爲各軍事學校培養訓練的人材，以及軍中廣大數量的青年，是我們今後建設國家人力資源中重要的一環。軍中教育是兼有職業技能訓練，和良好公民訓練的教育。這是我們談到開發人力資源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福音，一個喜訊！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十六、七日「青年戰士報」第三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一個今後發展職業教育的方向

在國家經濟建設急速發展的現階段，教育必須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目標，在這一目標之下，職業教育所負的使命，較其他方面爲大。所以如何改進與發展職業教育以適應當前的需要，是一個極爲迫切而重要的課題。

## 甲、職業教育的改進與發展

### 第一、觀念上的轉變

㈠過去封建社會遺留下來不勞働、不生產，以坐食爲榮的「士大夫」觀念必須改正。唐朝的韓退之先生，專向社會發掘問題，他深深感到一個社會中不事生產的人愈多，則社會的危機愈大。所以在一篇文章裏他歎息道：「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爲民者六（加上釋與道）……，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之不窮且盜也」。可見與生產事業息息相關的職業教育是如何的重要。中國古諺亦說：「家有良田萬頃，不如薄技在身」，這也與我們職業教育的用意相符合。

㈡「升學主義」的觀念必須澄清。現在一般人批評「升學主義」，實際上是忽略了它不同的兩個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涵：

一種是盲目的爲升學而升學。

另一種則是爲了深造而升學。

前者的目的在升學而不在求學，更不是深造，這是國家人力的浪費，是青年的一種自誤，當然是應該反對的。

後者則不然，它旨在增益知能，對社會有更大的作爲和貢獻，在變動進步的社會中，是永不會落後的，這是青年人人格的擴大。如像初職畢業生升入同性質的高職；高職畢業生升入同性質的專科；專科畢業生轉入同性質的大學科系，如果出於自願而其知能亦能勝任，我們不僅不應予以反對，而且應該予以鼓勵。在大學夜間部改進要點第六條曾作下述的規定：「設有夜間部之學系於辦理至第三年時，得招收同性質專科或專修科畢業已服兵役之學生爲轉學生，視其過去修業年限、各科成績，核定其免予重修科目及學分，並核定其爲攻讀學士學位而須補修之科目及學分。」此一規定，即爲鼓勵職業專校學生繼續深造而訂。

㈢大學教育與專科職業教育，雖然同樣的重要，卻具有不同的功能。前者旨在傳授高深學術，偏重於研究和創造。其質必須求精，而量則不必求其廣。後者旨在養成切合實用的人材，養成的方法重在實習和訓練。在質上固須求其精，在量上尤須求其廣，否則便不能適應國家經濟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

㈣社會要尊重有技藝能力的人。例如工職畢業的學生到工廠去服務，一般人叫他做「技工」，這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來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名稱，表明了他是一個有技能的工作者，應該受社會的尊重。而在我們不重視技能和缺乏勞働觀念的社會上，對這一名稱所起的反應卻不是這樣，多數人仍沉醉在「治人」爲上「治物」爲下的腐敗觀念中，沒有隨時代的進步覺醒過來。致令青年的自尊心受了無辜的損傷，甚至使一些職校畢業的學生，寧肯去做一個所學非所用或捨其所長用其所短的機關臨時人員，這實在是我們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的一大障礙。

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就沒有這種怪現象；前年我到美國參加一項教育會議，回來的時候在飛機上認識一位美國中學生，他是隨他的家人到阿拉斯加渡假釣魚的，我問他對讀書的感想如何？他說：「出於不得已，我正在替國家唸高中」，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的意義何在，他解釋說：「在初中的階段，就已學好了一種職業技能，並已獲得一個良好的工作機會，如果不是爲了被迫的積蓄可以成家立業了。」說話時還帶着十分惋惜的神情。美國青年所感到他們太過現實，但仔細一想，也許這正是他們工商業進步，國家富強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訂立獎勵的辦法**，改稱技術員或技士，工程員或工程士均可。

㈠改用適當的名稱，對職校畢業服務工場的學生，不要稱他爲技工

㈡熟練技能工作者如有優良成就，社會應予以表彰。

㈢職校優秀畢業生，應享有免試保送入較高一級同性質系科學校的權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㈣職校畢業生參加升學考試，其普通科成績往往不如一般中學畢業生，應考慮一項特殊的辦法，例如加考主科或術科課程，而免考一項普通課程，以示與普通中學有別而合乎公平。

㈤促使新興的公私營企業或工廠，予職校畢業生優先錄用的機會，並優給其待遇。

㈥各級職校優秀畢業生，應予以出國實習及增進技能的機會，以提高我國技術的水準。

## 第三、教學上的改進

㈠職業教育應以「寓學於作」爲基本原則，從實際的工作中去灌輸其必需的知識。傅斯年先生遠在民國二十一年，有感於我國只說不作的教育，曾經憤慨的說：「若想中國成一個近代國家，非以職工階級代替士人階級不可。若想中國教育近代化，非以動手動腳爲訓練，焚書坑儒爲政綱不可！」雖然是憤激之言，但卻切中時弊，意義深遠，值得我們警惕。

記得四十年前，我在美國求學，在校中選修了名教授柯克的政治哲學。一天柯克教授對我說：他所教的政治哲學，每次都有中國學生選修，照人數比例來說比美國學生爲大，而且成績亦很好，他感到很高興。我還以爲他在誇獎中國留學生比美國人有眼光，所以選修他的課。誰知他繼續發表感想道：「是不是你們中國人比較喜歡用腦而不喜歡動手的關係？或許是你們中國人的體力不如人，不適於勞動？」我當時對柯克教授的談話十分不快。我深自反省，我們的同胞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人，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飲、耕田而食，中華民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能刻苦耐勞的民族之一，爲什麼會給外人「不喜動手」的印象呢？這一過失應歸咎於我們知識份子尚存著封建時代「士大夫」以游手好閑爲榮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腐敗觀念。中國「士大夫」爲什麼會養成這一錯誤的觀念呢？自然亦是由於以往教育的不健全。今後我們建立青年人重勞動職業的觀念，我們的國家才可以得救。

㈡課程標準的修訂。應確立職業學校的特定目標，調整非職業性的課程，加強實用的職業課程。

**第四、職校師資的培養和進修**

㈠修改現行職校教員任用辦法，應以技術經驗爲標準，不必盡以學歷爲依據。

㈡專業技術師資，應以其技能本身之價值定其待遇的高低，而不全以其學歷作待遇的決定。

㈢訂立職校教員深造的優待辦法，優良的專業師資，應予以出國實習及進修之機會，以提高其素質。

**第五、職業教育的發展**

㈠一般的公私立大學，以暫不增設爲原則，但對適合國家經濟建設需要的專科學校，可由私人興辦；對於專科學校，尤鼓勵私人興辦。

㈡增籌貸款基金，以扶植私人興辦之職業學校，現已撥付之五千萬貸款基金，應以輔助私立專科及職校爲主。

㈢對現有之公私立職業學校，應力求設備之充實及充分的利用。在中學過於密集的地區，應擇少數學校作爲職校的考慮。

㈣急速辦理職業推廣教育。包括夜間部教育、大眾傳播教育以及技藝中心教育。使在職青年得以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進其因社會進步而需要的知識與技能，以充實其擔任新的工作或更重要的職位所需之知識與技能。

教育雖然是達成國家目標的一項有利的投資，但就目前的急需而言，則有緩不濟急之虞，在職人員知識技能的增進，對吸收新知、改變觀念、加速經濟發展及國家之進步，尤具有重大之意義。

㈤加強中學的職業課程及修訂職校課程標準。

爲了配合職業教育的發展，我們已先注意到普通中學教育的改革。最近修訂中學課程標準，除了確定初高中教育目標及教學重點；順應世界潮流，奠立延長義務教育基礎；適應個別需要，發揮分化功能；刪減初高中重複教材，力求各中學校課程之銜接；及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推進科學教育外，我們並注意下列各點：1.加強職業科目及選修科目，適應學生升學就業的需要。2.重視技藝學科，注重生活有關知能，減輕學生課程負擔。3.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培育有用人才。這是教育政策上的一次改革，是這次修訂課程標準的一項特點，在此有加以解說的必要。

(1)現行中學課程標準，因囿於中學教育目標的單純化，整個課程設計乃以升學爲目的，對於不能升學青年，並未作周全顧慮，事實上，初高中畢業學生並不能完全升學。根據統計，五十學年度，臺灣省初中畢業生五四、九五一人，其升學率爲百分之八一・八，高中畢業生一七、九六五人，其升學率爲百分之七六・八；尚約有一萬初中畢業生及四千多高中畢業生未能升學，而前年度未能升學學生所佔之比例尤高，計初中畢業生四萬五千人，升學率爲百分之七十，高中畢業生一萬五千人，升學率約爲百分之六十，尚有百分之三十的初中畢業生（約一萬三千人），及百分之四十的高中畢業生（約六千人），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無升學之所，又乏就業技能，成爲社會遊蕩份子，造成青年失業問題。此次修訂中學課程標準，乃加強職業科目及選修科目，以適應學生升學及就業之需要。

初中除增加工藝科（女生家事）教學時數外，並於初三加選修科目，分升學及就業兩類：升學科目，酌列國文、英語、數學等科。就業科目，按地方需要，酌列農業、工業、商業、家事等科。高中自二年級開始選修，每週二小時，三年級選習時數每週二至八小時，升學科目包括國文、英文、自然、數學等科。就業科目包括商業、地方自治、鄉村建設、技藝等科。此爲中學增設職業科目及選修科目之大致情形。

(2)國家教育之目的，在培養所需人才，以爲國家建設的骨幹。教育計畫自須與國家建設計畫密切配合，以免人才與社會脫節。所以此次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注重加強科學訓練與職業知能，以期培養手腦並用的技術人才，俾有貢獻於國家建設事業，而消除過去只偏重知識教育，忽視技藝學科之弊。

這一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開始於四十八年梅前部長任內，係遵照王副院長雲五主持的行政改革委員會的建議而擬定進行計畫，分別成立委員會及各科修訂小組，歷時三年，召開大會、小組會議等四百餘次，集專家、學者、校長、教師、教育行政主管四百餘人之經驗、學識與智慧，參酌各進步國家的教育資料和我國當前的需要而製訂，已定於本年八月起付諸實施。

緊接着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完成之後，教育上的另一重要工作，便是正在積極推進中的職業學校課程標準的改訂，這自然更須發揮實用教學的功能，方克有濟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乙、技藝教育的重要性

要檢討我國的技藝教育，不能不遠溯到滿清咸豐末年同治初年那一段時期。那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在外侮頻仍中，爲外人的堅船利礮所驚懾，一方面又正利用西人軍器與太平軍對抗而收效頗大，不得不承認外人在軍器上比我們進步。而初期的吸收西方文化，亦以製造軍器的技藝爲主。例如當李鴻章坐鎭上海的時候，曾寫信給曾國藩道：「鴻章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同治三年，他又寫信給恭親王奕訢和文祥說：「……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不知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日本君臣發憤爲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礮。……」這是中國最初學習西方技藝的動機和目標。到了光緒初年郭嵩燾出使英、法，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現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制度和一般文化亦有其長處。而且發現當時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除了學習機械技藝以外，還學習他們其他方面的學問。西方的科學文明，日本人在那時就有成套學習的趨向了。經過了李鴻章、郭嵩燾等人的奮鬥，從學習西人軍器技藝，發展而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階段，中國的社會就在這「體」與「用」的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論中徘徊，「體」與「用」的矛盾中趑趄不前，躭誤了千金一刻的大好時光。一直到了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才瞭解到西方的文明是其整體性的，才瞭解到科學是技藝的根本學問。於是乃糾正以往只重技藝不重科學的誤失，而勉勵有志的青年人向研究科學的路向去謀發展。由於中國青年人優良的稟賦和他們的努力奮鬥，到了相當可觀的成就，這是值得我們欣慰的。欣慰雖然欣慰，在欣慰中我們亦有隱憂。我恐怕在這科學與技藝同時突飛猛進的時代中，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縱然勉強追上了科學進步的潮流，在技藝方面我們又被拋落老遠了。正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顧到了本又疏忽了末，我們數十年辛勤努力所得來的弱而抵消，能不令人爲之浩歎惋惜嗎？

技藝是科學服務人羣的表現，不研究科學而只學習技藝，技藝在我們的國家固然無法成長起來。可是，只知研究科學而忽視了技藝，不但科學無以致其用，我們國家目前發展經濟建設的計畫亦難於圓滿完成。

檢討我們現行的留學政策，我們今天到國外留學生中，絕大多數是大學畢業以後，到國外去入研究所，從事高深科學研究的，至於專科職業學生到國外去學習專門技能，以及技術人員到國外工廠去實習實用技藝的卻非常之少。我們到今天亦還沒有訂出可行的辦法來予以輔導和鼓勵，這是當前教育政策上的一項缺陷，應該從速把它補救起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丙、一項發展職業教育的重要參考——史丹福研究所調查報告

我們今日在經濟建設發展期中所需要的技藝人材的情況，很值得我們注意，在史丹福研究所調查報告中已預爲統計，可作我們的參考。

在史丹福研究所調查報告中，預計在民國五十四年，所需各類專門職業人員之重要缺少類別如左：

（所稱專門職業人員係指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人員而言）

| | | | |
|---|---|---|---|
| 機械工程師 | 缺少一、四〇〇人 | 中等學校教師 | 缺少一、二〇〇人 |
| 會計人員及財務分析人員 | 缺少一、二〇〇人 | 高等學校教員 | 缺少　一〇〇人 |

至於左列各類專門職業人員，則預料頗多過剩：

| | | | |
|---|---|---|---|
| 經濟人員 | 過剩　七一〇人 | 化學人員 | 過剩　五四〇人 |
| 農化人員 | 過剩　四三〇人 | 化工人員 | 過剩　四〇〇人 |
| 森林專業人員 | 過剩　三九〇人 | 農業經濟人員 | 過剩　三七〇人 |
| 電力工程人員 | 過剩　三〇〇人 | 土木工程人員 | 過剩　三〇〇人 |

由於以上的統計所示，除了機械工程師、中等學校教師、會計及財務分析人員、高等學校教員，須加強培養以外，其他類別的專門職業人員，我們到民國五十四年都有過剩。而我們所大量缺乏的是必須由職業學校培養或訓練的技術員與半技術員。民國五十一年，我們約有二十五萬技術員就業，其中三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之二在電力、礦業與製造工業內獲得工作。五分之一弱爲手工業，如受僱於各種工業內之泥水工、木工、電器工與鉗工等。運輸與交通部門爲技術員與半技術員之第三位大僱主。其餘人力則受僱於農業與森林、漁業、銀行與財務方面。

至民國五十四年時，經濟方面所需僱用之技術員與半技術員總數約爲二八六、〇〇〇人。較五十一年時所僱用同類技術員約增加三六、〇〇〇人。在電力、礦業與製造工業方面之擴充人數，約佔增加總額的百分之八十。運輸與交通部門約佔增加總額的百分之十二，其他工業所需各類手工業者約佔百分之十。其中僅精細機械技術員一項就缺少一三、一〇〇人，紡織設備技術員缺少六、四〇〇人，普通機械技術員缺少六、八〇〇人，電機技術員缺少四、一〇〇人，他如土木方面的技術員缺少計約四千餘人。

這些缺乏的人員，亟待加速作有計劃的培養與訓練。

尤其重要的，是間於工程師與技術員之間的技師階級，關於這一階級，有兩個問題值得格外予以注意：

一是多數工業和農業方面工作的技師，僅受普通職業學校教育。其所得技術學識，勢已無法應付今後複雜工業和農業技術。

一是按照我們正常發展中的工業經濟，目前技師與工程師之比率太低，約爲〇・四與一之比。而在各經濟先進國家中，此一比率爲一比一到二・五比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技師這一階級，在各經濟部門中有其樞紐的作用，我們今日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素質上予以提高，以及在任用的量上予以適當的調整。

現在各經濟部門中服務的技師人數約爲二三、〇〇〇人，至民國五十四年，預計至少須增到二七、〇〇〇人，比現在就業者多四千人，以我們目前的供應能力而言，除了航海技師、礦業技師等少數項目須加以擴充訓練以外，尚勉能勝任。問題端在如何提高現職人員的素質，使之能充分發揮其中堅份子的任務。

從上面所列舉出來的，對技術員、半技術員、技師的需要（包括質的需要和量的需要），我們不難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有一個深刻的體認。那就是：

一、鼓勵更多的優秀青年進入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去深造，鼓勵更多的在職青年進入大專夜間部、職校的技藝中心去進修。

二、訂立妥善的辦法，選擇優秀的職校、專校的專業教師到國外技藝學校去研習專門技能，選擇優秀的職校學生到國外工廠去實習技藝。

我深信這樣做，對於我們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和未來新國家的建設，都具有其深遠的意義和必要。

## 丁、人力資源的巨大潛力—軍中的技能教育

第一、史丹福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誠然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發展的重要參考。可是這一報告只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臺灣現有教育爲範圍，以建設今日之臺灣爲對象；而沒有計入我們軍中教育對人力資源的潛力，亦不是爲我們大陸光復後建設新國家作預籌。在我們來說，建設臺灣是「過程」，建設光復大陸後的新國家才是我們的目的。所以在史丹福報告中，雖然預計到五十四年時，有若干部門的技術工作人員有過剩的數字。以我們建設未來的新國家而言，則決無過剩之虞，恐怕只有不足之憂。

第二、史丹福研究所的調查報告，雖然已經對我們今後如何開發人力資源提供了不少意見，可是，他們所見到的只是人力資源的全體。他只以一般學校教育爲調查設計對象，而忽略了各種軍事學校、各特種部隊，以及留存在社會各階層的可資利用的潛在的人力資源。

且舉例言之：例如近十數年來的臺灣建設，其所以能有今日的成績，大半是由於我們從大陸上來臺的具有學識經驗的優良技術工作者，參與各項建設工作，加之日本統制時代的基礎，再益以少數就地培養出來的技術人員，和廣大的軍中青年，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再如橫貫公路的修築，亦是軍中人力的一項優良的表現。

又例如：四十九年發生的八七水災，其對各部門建設事業之破壞可以說空前的嚴重，而我們卻能在短短的幾個月中使之完全恢復，我們所憑藉的不完全是學校培養訓練出來的技術人員，而是軍中的技術人員，和廣大數量的青年，是我們今後建設國家人力資源中重要的一環。軍中教育是兼有職業技能訓練，和良好公民訓練的教育，這是我們今後開發人力資源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廣大而堅強的後盾。

## 結　語

以上所述，是我對今後發展職業教育的意見，其中有的已在實施當中，有的尚待周密策劃。因爲這件事對目前經濟發展固屬重要，同時它更是我們反攻復國、建設未來新國家的重要準備工作之一。英諺有云：「沒有今天，便不會有明天。」在我看來：「沒有明天的遠景，今天的一切都將失去其方向。」這是我們國家興廢的關鍵，我們必須早作決定與預籌。

——錄自「教育文摘月刊」第八卷第四期，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當前教育配合軍事的幾項策劃措施

## 一、前言

甲、當前教育措施之最高目標應是：不僅爲了建設臺灣，更是爲了重建大陸而努力。因此，在人才培育方面，不單是只求在知識和技術上致力，更應在才能和領導方面，培育卓越的幹部，以供重建大陸之需要。

乙、依據今日國內外情勢及政府在臺十餘年來之努力，已至「整備完成，待機反攻大陸」之時機，亦即是處於平時與戰時交織邊緣之形勢；因此，在教育方面之策劃，必須平時與戰時並重。關於此點在上次總動員會報中提出之「一個合於戰時與平時的教育策劃」已大體提到，不再另作說明。

根據以上基本認定，當前教育迫切之措施有二：

一是教育配合經濟、政治、社會之發展，以充實國力與人民之富力。

二是教育配合軍事之發展，以增進反攻大陸之戰力。

## 二、教育配合軍事的幾項措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甲、分離兵役與升學，以維役政之完整，並使教育體系復於正常。

近年因教育發達，加以人口激增，從而要求升入大專院校之人數亦隨之企求免服常備兵役，更爲刺激升學之一大原因。大專院校畢業後雖仍須服預役者不盡相同。如此相沿，日積月累，預備軍官人數眾多，而士兵則感兵源多之預備軍官，在財力上言，是一種浪費；在教育體系上言，亦欠正常。而缺少，國家固不需要如此眾更屬有損。故兵役與升學兩者關係不予明確分離，不但教育只是爲升學而有有其重要，流弊所及，教育與役政兩者，均將蒙其不利。

爲達上述目的，使兵役與升學分開，第一步驟則爲改進大學夜間部，茲分述其經過及改進辦法如左：

**一、舊制夜間部設立經過及其流弊：**

公立大學試辦夜間部事宜，係行政院於民國四十八年依立法院決議令教育部擬具「公立大學及獨立學院試辦夜間部辦法」，並核准試辦一年，再決定是否繼續或擴大辦理。乃於四十九年學年度起於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等校設置夜間部。試辦結果，不如理想。蓋大學生雖不願進夜間部，只爲入學者，只因參加聯考按成績予以分發，遂與日間部同樣取得緩役，故不少緩役之故而進夜間部，但其錄取標準較日間部學生爲低，入學後又不能專心向學，多數均於次年重考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間部。同時對學生身心健康，殊有不良影響。以成大爲例，夜間部第一年招收新生一五一名，次年升入二年級時，已驟減至五十六名。各校夜間部經費，係由政府籌撥，一方面增加政府財政負荷，同時又因預算經費有限，致各校均感不敷應用。又夜間部學生大部份因非在職青年，日間無所事事，不免閑散游蕩，易染不良習慣，影響學習。

## 二、新制夜間部之優點：

教育部鑒於國立臺灣大學等三校，兩年來試辦夜間部結果，由於各該校情形不同，發生困難及缺點頗多，自應謀求改進。爰經審愼研究，擬具「各校院夜間部改進要點」一種（附後）。其要點在注重實用，適應需求及不影響役政之原則下，以增加青年之就學機會。各大學現有夜間部如照此改進，其主要優點如次：

1. 不能緩役——依照夜間部改進要點之精神，並非將現有各大學夜間部予以停辦，而係針對目前所發生之流弊缺點，謀求改進。例如大學夜間部不能緩役，使升學動機純正，同時優待已服役者以深造之機會，俾可配合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完成兵役義務之青年、在職青年，及免役青年之進修機會，以適應國家當前之需要，達成大學推廣教育之目的。

2. 不參加聯考——夜間部招生如參加聯考，其就學機會卽全爲高中應屆畢業生所佔，而以較低成績者分發至夜間部，考生亦以不得已之心情進入夜間部，其缺點已如前述。今若不參加聯考，此項就學機會卽可歸與在職人員，使一面就業，一面生產，不必參加聯考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競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3.緩和升學競爭——高中應屆畢業生因有夜間部之設立，可疏導其一面就業，一面進修，不致集中參加聯考，從事激烈之升學競爭。從歷年高中畢業生參加大專聯考之報名人數，可以看出其結果。往年均是直線上升，每年約增加三、四千人，今年大專聯考報名三萬三千四百四五五名，中國文化學院計七五〇名，兩校新增學額一千一百九十五名，本年度開始招收新生，輔仁計學校，如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學院等校，故本年錄取總名額較去年已顯然增加，而報名人數增加有限，已開始收到緩和升學競爭之效果。

4.促進經濟發展——改進後之夜間部，爲在職教育，於提高知識技術水準，以促進經濟之發展更爲迫切有效。因在職者，從事實際工作之後，更能不斷吸收新的知識與技能，當可發揮其更大之工作效率。

5.增加生產成員——夜間部學生一面投入生產，一面仍能深造，不因入學而影響其生產能力，使人力不致過度浪費。

6.著重實用知識與技能——改進後之夜間部，着重實用方面之科系，並開設與實際工商業及經濟發展有關之課程，增加其因社會進步而需要之知識與技能。

7.經費自給自足——各校院夜間部，可向學生收費，其數額以能收支相抵自給自足爲準。惟對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完成兵役義務之青年，應各斟酌實情，在夜間部學則內明訂條款，予以優待。使其能勇於先行完成兵役義務，以應國防需要，且可藉以減免大專入學考試時之擁擠現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8. 充分利用現有設備——改進後之夜間部爲高等教育之推廣教育，一面以不影響役政爲原則，將學生分正式生與選讀生兩種。正式生招收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服兵役義務之學生，比照一般大學生辦理。一面放寬尺度，凡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具有相當程度者均可申請登記，經審查合格後註册爲選讀生。選修學分，學分修滿，成績優良者酌予承認，如此鼓勵青年向學，充分利用大專院校已有設備，俾一校可作兩校之用。

**三、新制夜間部辦理情形：**

1. 大學推廣教育，原已實施有年，惟依照改進辦法辦理之新制夜間部，更能切合實際需要，因此報考各校院夜間部學生人數甚爲踴躍。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私立淡江文理學院、私立逢甲學院、私立大同工業專科學校、私立靜宜女子專科學校、私立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等七所夜間部，共招收正式生一、二八〇名。此外選讀生人數亦甚爲可觀（因無學籍，未據報部）。正式生中，據估計約八〇%以上爲有職業者，其中也有在職之有軍職者，其入學同職者可能更多，年齡可能比一般正式生爲高，工作忙，只能選讀幾時取得國防部核准升學。至選讀生有時間（夜間）上課。可見讀大學夜間部學生之成分，爲在職者多。門有興趣或有實用之科目，不能全部

2. 夜間部學生既不能緩役又須繳納學費，故入學者均能眞心向學，力求上進，好學不倦。夜間部學生在學業上，入學之初，程度容或參差不齊，但社會經驗較多，加以自知努力，不難補救。據本部督學視導報告，夜間部學生程度雖然不齊，而學風則甚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3.各校夜間部設立後，在職青年獲有進修之機會，可再進學校求學，自將減少許多不良嗜好，對社會風氣之改善，當有裨益。

**四、結論：**

夜間部之改進，以確能達到大學推廣教育目的，其辦理方針係依據注重實用，適應需求，及不影響役政三項原則，故與立法院爲搶救失學青年，增加青年就學機會之原決議案之精神，完全相符。大學夜間部教育既屬於推廣教育，其性質與大學正規教育有別，其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自不能與日間部盡同，故必須使正常教育與推廣教育分別處理，以利發展。今後正規教育應從質的提高入手，以奠定高深研究之基礎。夜間部應明定其性質，爲一種推廣教育，以應在職及就業青年知識技能之需求，且因逐年高級中學畢業生人數增多，除有兵役義務者外，均可獲得較多就學機會。目前政府各項施政，以充實力量早日光復大陸爲中心目標。際茲反攻前夕，配合國防尤爲急務。大學夜間部改進後，以招收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完成兵役義務之青年爲優先對象，足可鼓勵青年先行踴躍服役。俟服役期滿再入夜間部進修，既可免除心理上具有之升學顧慮，一心一意完成服役，復使青年接受大學教育與服役二者顯然劃分，糾正現存之不正確觀念。

所以，不能緩役，不參加聯考，注重在職教育，注重實用，爲新制之關鍵，必須貫澈，若能遂行，當前教育必可改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乙、文武教育設備教學專長學歷之溝通

### 一、軍隊退役技術及專長人員對目前國家建設之貢獻：

1. 在各項職業方面服務及在技術與專業方面的成就實屬驚人。如工程師、技術人員、保養、修理、駕駛等，其專長均可溝通。根據史丹福研究所調查報告，六一三名畢業生中，於服役時曾用其所學者，有三四一名（或五六%），表中列舉大學或學院畢業生所擔任之軍職類別，運用其所學最多者爲工程類。其他亦能運用其所學者爲政治、教育與訓練、會計、財務、統計與補給。又該報告中對大專院校畢業生分派之軍事工作，據調查有二八八名畢業生（四八%），認爲服役時所獲之知識或技能，對於退伍後，頗有幫助。表列中有三十五種類專長被提到一次以上，其中五個主要門類爲政治、管理、法律、公文處理與英語。

2. 考取各項公費留學、研究所，及獲得國外獎學金之人數不少，且其成績甚佳。

3. 軍事學校與大專學校合作：海軍專科學院委託成功大學代訓土木、建築、數學、化學、礦冶五學系學員，其代訓辦法協議書，已由教育部及國防部批准實施。在土木建築系代訓的學員，必須持有海軍官校一、二年級所修課程以及海軍專科學院工學部補授一年課程學分成績的證明文件，並參加成大相當學系三年級轉學生考試及格；在數學、化學及礦冶三學系代訓的學員，必須持有海軍官校一年級所修課程，以及海軍專科學院工學部補授一年課程學分成績的證明文件，並參加成大相當學系二年級轉學生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試及格。代訓人員入校後其生活管理及繳費與普通一般學生相同，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將由成大呈教育部核備，授予學士學位。

**二、教育上重大意義：**

1. 軍營應視爲最優良之公民教育與訓練實施之學校。
2. 近代軍隊在技術、專長、管理及設備各方面均有其優點，往往爲一般學校教育實施之另一源泉，俾戰時發揮爲戰力，退役後能投入各項職業，有助於效用，應以軍隊爲技術專長教育實施之另一源泉，俾戰時發揮爲戰力，退役後能投入各項職業，有助於國家生產之推進。

**三、推進辦法：**

1. 目前陸軍官校、海軍官校、空軍官校、陸軍理工學院、國防醫學院、政工幹校等，已與一般大學無殊，畢業時給予各科學位。其他與專科同等之軍事學校亦照樣比敍。
2. 國防、教育兩部現正共同調查研究各軍事士官學校與職業學校之比敍辦法，學科相同者，比敍爲職業學校畢業，不盡相同者予以甄試及補修機會，使文武轉任獲得溝通。此項比敍研究構想，爲鼓勵在營士官能長期留營服務，及爲常備士官退伍之日預爲安排就業就學之出路，以資相互策進，而收鼓勵之功，達到軍隊新陳代謝暢行無阻之目的。文武學校技術專長之溝通與學資之比敍自屬必要。關於國防部負責主持推行文武轉任比敍，溝通文武人才交流之研究規劃，本部正與協商妥善進行中。
3. 軍事人員之專長調查較一般者爲嚴密，正計劃分別加以審定，其具有某項技術，堪以從事專業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給予憑證，俾於退役後就業時獲得其專長之資歷。願深造者，如合於規定，可承認其學分。

4.服預備軍官役之大專畢業生，在軍隊中應特別注重其科系與專長，分別予以發揮其專長之作用分發服務，並應注意其進修與深造方面之輔導，以收文武教育合一之效。

## 丙、加強高深科學研究

高深科學研究，不僅爲提高科學技術水準所需，更爲配合國防需要所必採途徑。故充實研究之外應利用現有設備從事展高深研究，爲目前極爲迫切之措施。茲已採步驟如次：

一、國立清華大學核子研究所，應專致力於核子科學之發展。除一般研究之外應利用現有設備從事生產，培養基本科學師資與人才。關於生產方面該所已能生產同位素，以供醫藥農業各方面之使用。在國防方面亦正謀求配合。該校自本年春季增設數學研究所，本年暑期並辦理數學講習會，已於本月四日開始，到八月二十八日結束，爲期八週。這項講習會舉辦目的，在於使國內各學術機構中從事數理工作的人員，能利用暑期獲得進修機會。在講習會中任課的教師係邀請旅美學人葉玄、楊忠道、樊墉三位博士回國講學。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舉辦暑期講習會，原先計劃是招收二十名學員，但各學術機構申請參加的人數很多，參加人員有大學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中學教師達百餘人，開國內科學研究未有之研究風氣，實出乎意外。

二、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現已設備有計算機、微波實驗、高眞空研究及雷射（Laser）研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實驗、電視發射機之製造。除上年度已完成四十瓦之電視發射機供教育電視臺之實驗外，近已完成一千瓦特之發射機一架，已在新竹試播，成績極爲良好。在本月二十二日，即將移運臺北安裝，正式開始教育節目廣播。該所曾舉辦電子計算機在職講習班二次，每次參加人數均在四十人以上，都是經濟、交通、國防各部及各事業機構服務人員。該所今後研究方面之發展，將在電晶體、高眞空微波管及雷射等，均與國防需要有關之科學。

三、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雖成立未久，設備與師資亟待充實，但在地質研究方面正與石油公司謀求合作，先從事石油地質方面之研究，以加速石油工業之發展，其有助於工業與國防之需要，固不待言。據悉石油公司已委託該所專題研究：「臺灣各地各種地層實際密度與現測重力結果相互之關係及解釋之研究」，進行簽訂委託研究契約中。

四、策劃充實研究所之人事與經費，俾能進行研究。依據大學法研究所附設於各系，不設編制人員及經費。但現代大學高深研究事宜已置重心於研究所，而大學本科只是普通的基礎訓練，所以大學中研究所之充實與加強，已甚爲迫切，故其正規之編制與經費預算應謀解決。今後當更謀健全人事與增列預算，以利研究發展。自去年起各研究所得設一專任教授，但尚未達理想。

五、凡已設有三個研究所之大學應使其獨立設立研究部或研究院，俾能在經費與人事方面能專責進行研究。

六、獎助研究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1.設立接受私人捐助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先自獎勵研究生入手，再及其他，俾有助於科學研究之獎勵，以補政府財力之不足。

2.成績優良之研究生，可獲獎學金每月六百元，加上政府四百元之補助，合計月可得一千元，勉可專心從事研究。

3.獎助辦法以研究有關國防科學者爲優先。

4.獎學金之分配完全照捐助人指定之意願，惟須暫以獎勵研究生與公立研究所者爲先，再及其他。

七、策劃太空科學研究：

1.已與美太空總署接洽從事合作。

2.去年八月已考送講師級公費留學生四名，赴美研究太空科學，已蒙美太空總署予以學習研究之便利。

3.教育部已籌備成立太空航空學會，本人兼任主任委員外，並已聘請孫方鐸先生爲執行秘書，在孫先生未回國前，請秦大鈞先生爲代理執行秘書，積極進行籌備工作。

丁、關於大陸教育重建者

一、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雖曾通過大陸教育重建方案，但僅係一大的輪廓，嗣經擬具光復大陸教育重建委員會組織規程呈奉核定，五十三年度並已列有施政計畫及分配預算。關於工作人員之調派，光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區，專業幹部之甄儲，教科書之編審，與各項重建方案之擬訂，尚待加強。目前部內先由敵情資料研究小組從事中外有關資料之搜集，俾能在一般研究方面有所進展。

二、關於配合反攻軍事之光復初期教育方案，暫集中於會同國防會議戰地政務委員會籌備處，及行政院經濟動員計畫委員會對教育方面之籌劃，以應急需。

三、關於活的方面之大陸教育研究資料，約有兩事足供參考。

1.從大陸來臺青年輔導工作中，尋得若干活的資料。

2.從大陸來臺學人中，吸取實際資料，如延致大陸來臺人士何文海、陳乃超參加本部工作等。

## 戊、其他配合軍事事項

一、規定暫不准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之籌設與立案，避免藉免役爲興學之手段。

二、私人興學限於籌設技術與專業之五年制專科，以配合經濟之發展，其學生來源係以初中畢業生爲主，不與兵役直接發生關係。

三、修改後之留學規程第八條第七項規定：國內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畢業，服役期滿，繼續留營服役二年以上者，得免試出國留學，以鼓勵留營服務。

四、關於駐戍金門、馬祖外島之預備軍官，其已辦妥本年度大專自費留學考試報名手續，在考試舉行期間如因駐在地發生戰事，爲執行任務不便返臺者，可按照國防部六月二十四日（五二）律徹字第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〇號令造册送部，准免參加自費留學考試，免試出國留學。

五、高中畢業生如服士官役屆滿留營服務二年以上者，似可考慮其免試出國留學。

六、服滿兵役義務人員，得依其學歷酌予優待，進入各級職業學校及大專夜間部，合於左列事項者，予以免繳學費、雜費、圖書費及醫藥衞生費之優待：

1. 持有國防部恤傷給與令之榮譽軍人。
2. 國軍在臺退除役軍官及停除役士兵。（軍官應繳驗　總統所頒之退除役證，士官士兵應繳驗陸海空勤各總司令部停除役證。）

七、自本年暑期起，大專暑期集訓已確定爲一大專學校必修之課程，僑生亦應參加集訓，不得例外，以配合國家教育之遠大目的。本屆參加集訓人數爲一六三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附件）各校院夜間部改進要點

關於各校院夜間部，除專案呈准試辦者仍視試辦成績另行專案處理外，其依「公立大學及獨立學院試辦夜間部辦法」辦理者，因情形各有不同，試辦發生困難，應訂較有彈性之辦法以資適應與改進。

一、各校院夜間部，原爲大學推廣教育性質，應以逐漸增多在職青年之進修機會爲主，其修讀之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不必與日校盡同，其辦理方針應依下列原則：

1. 以注重實用爲原則，增加其因社會進步而需要之知識與技能。
2. 以適應需求爲原則，充實其擔任新的工作或重要的職位所需之知識與技能。
3. 以不影響役政而能推廣教育爲原則，對於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服兵役之學生予以優待，未服兵役者不予緩征。

二、各校院夜間部可向學生收費，其數額以能收支相抵自給自足爲準，惟對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已完成兵役義務之青年，應各斟酌實情，在夜間部學則內明訂條款，予以優待。使其能勇於先行完成兵役義務，以應國防需要，且可藉以減免大專入學考試時之擁擠現象。

三、夜間部招收學生，以甄試方法，擇優錄取。學生對於所開課程，得自由選修，但如選修某一科目之人數超過教室容量時，得以甄試方式擇優核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夜間部學生按時上課，完成教師指定之作業，並經考試及格者，學校就其考試及格之科目，發給學分證明書。

五、有志攻讀學位之夜間部學生，得於修滿二十個學分後，檢同學歷及服兵役證件，向設有夜間部之學系提出申請，經審查合格者，由系指導選課，俟其修滿規定學分時授予學士學位。

六、設有夜間部之學系於辦理至第三年時，得招收同性質專科或專修科畢業已服兵役之學生爲轉學生，視其過去修業年限，各科成績，核定其免予重修之科目及學分，並核定其爲攻讀學士學位而須補修之科目及學分。

——錄自「教育與文化」第三〇九期，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當前必須勇於面對的問題

最近清華大學研究所的第三次遠東及東南亞地區核子反應器利用會議返國，召開的葉錫溶、林嘉熙兩先生，出席在印度孟買市員經費之多，成績之顯著，他們在印度時曾參觀印度的原子科學研究機構，其規模之大，設備之全，人達雲主席返國後發表的：「一切計畫目標必須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值得我們參考，值得我們將目前教育上必須勇於面對的兩項重大問題，提出來探討。建設要勇敢冒險」；「一切計畫目標必須遠大」的談話，我更深有所感，爰

第一、是發展新興科學和高深學術研究，以適應劇變中的世界進步趨勢，而免於長期的落後。

第二、是如何提高國民基本教育的水準，以配合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以增進國民追求幸福的更大機會。

談到發展新興科學和高深學術研究，自然會牽涉到兩個有關的基本問題，一是人、一是錢。在人才方面，我們確實已有不在少數的優秀科學家，儘管在目前大多數人屬於「楚材晉用」。在金錢方面，無可諱言的是我們十分困難，要籌集一筆可觀的數字來從事新興科學的研究和發展的確不易。可是，我們不必爲這一現實處境而洩氣和苦惱，在這個科學進步的世界，正有不少貧窮而落後的國家在困難中奮鬥，他們怎樣突破了困難以及已得到怎樣的成果，就是我們一面良好的鏡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前說到戰後的勃興，我們常常引西德、日本爲例。很自然的，我們就忽略了其他的國家，至於印度更不在話下，因爲「印度」在世人的心裏，始終是貧困與饑餓的同義語。我們現在且來看看印度，她在發展新興科學方面所作的努力，會令我們大吃一驚。

印度現有原子反應器三座，其最大一座爲40MW，約爲我清華之設備的四十倍，此一反應器遠在一九六〇年七月開始運轉，其使用效率之高，幾爲世界各國反應器之冠。每年可產生鈽十二公斤以上，三年多來，其已產生鈽的儲藏量可能有三十五至四十公斤。易言之，印度每年具有原子試爆二個以上的能力。經費年耗二千餘萬美金，工作人員及專家約七千人。

我國核子科學家葉、林二先生會議歸來提出的報告中有如下的結語：

「在目前印度經濟環境下，提出如是龐大之預算爲原子能發展之用是否妥當？換句話說，在目前印度是不是還有更必須花錢的地方？他們的回答卻是肯定的，一致的。印度科學家說：若將每年用於發展原子科學的二千萬美金，分給尚陷於貧困的印度人，每人每年只能得到美金五分，而百年之後，印度將還是窮困的，但是我們現在如此做，誰敢說印度永遠是窮困？而且印度的人才，總算是在自己的國家裏，找到他們可以發揮他們才幹的地方，而不必『楚材晉用』。」

我國近年來經濟有長足的發展，國民的所得年有增加，目前情形當不與印度相同。但是我們如不急起直追，對新興科學作較大的投資與發展，我們今後豈能免於不永遠落在人後，而能自拔於將來？我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對於科學的研究與發展，此時不能創造一優良的工作環境與生活環境，又豈能免於目前爲大家歎息不已的人才外流現象的長久繼續？

衡量一個國家國力的強弱和大小，從前的人是以下列各項條件來決定：①軍備的龐大與否？②資源的豐富與否？③工業化程度的高低，④人口的多少。最近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教授哈比生（Harbison）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耶斯（Meyers），共同研究的結果，認爲以上的說法不完全正確。他們認爲衡量一個近代國家國力的大、小、強、弱，是決定於這一國家的知識、科學和技術程度的總和，亦即是他們所用的一個特有名詞「教育綜合指數」來決定。

甚麼是「教育綜合指數」呢？他們提出了一項簡單的計算公式。即是一個國家的十五歲到十九歲的人口中的在學人數，（中學到大學一、二年級生的在學人數）加上其二十歲到二十四歲人口中的在學人數（大學到研究所的在學人數）乘五所得之總和。

舉個例來說，他們利用了我國前幾年的資料，認爲我國十五到十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是百分之三十點九，二十到二十四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是百分之三點五，綜合指數如下式：

$$30.9+3.5\times5=48.4$$

乘五之原因，意指大學畢業者之能力，相當於未受大學教育者之五倍。

照哈、梅兩氏的計算，我國的教育綜合指數爲四八・四，列世界的第六位。美國爲二六一・三，比利時爲一二三・六，日本爲一一一・四，蘇俄爲九二・九。我們的教育綜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但哈、梅二氏所指係以十五到十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爲起點，並沒有計及我國之義務教育僅爲六歲到十二歲的兒童，這很顯然的沒有計及我國義務教育尚差三年之時間，乃能有如是之高了。因此，標準，如果以十三歲到十九歲人口之在學人數起算，我們的教育綜合指數便目前我國六年的國民基本教育，實不足以適應世界之趨勢，增進至九年的初中教育至爲必要。否則，以一十二歲方完成國民教育之兒童，如欲做童工則須至十四歲；如欲作學徒則須至十五歲；如以之作一技工則年齡與程度均更感不足之兒童充塞之，不僅都摧殘了兒童的身心，且亦將摧殘我們未來的工業發展！這亦就是目前正研擬推行之國民學校畢業生自願就學方案之重要所在。

世界在進步的劇變中，我們在經濟各方面的建設誠然有長足的進步，或在印度之上，但若要適應目前世界進步的趨勢，我們非勇於面對這兩項教育上的重要問題，速卽尋求答案不可，因爲它是建設近代國家的根本所在，是預卜我們國家未來的興、衰、成、敗，和進步與落後的關鍵所在。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三二九」黃花岡革命事蹟

## ●背景●

滿清入主中國以後，便開始各種方法來收攬民心。首先，他們爲明朝崇禎皇帝安葬、祭祀，使一般百姓認爲滿人同樣知道「愼終追遠」；其次，清廷廣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全國知識份子從事著述典籍；然後，採用科舉制度，擢用讀書人爲官吏，名義是取士爲國家做事，實際上含有「以漢治漢」的用義。

在這些懷柔和籠絡政策之下，原爲國民中堅的知識份子，民族意識逐漸喪失，思想也在無形中受到統治。中山先生有鑒於此，由創建興中會起，便以恢復民族精神爲號召。在當時，僅國內外各地的幫會組織，仍然保有民族意識和固有的漢室觀念，所以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是從各地社會的低層組織——幫會——開始發展的。

總理由立志革命起，到民國十四年逝世，四十年中，一直對革命事業保持樂觀，很少悲觀和嘆氣，但有一段時間例外，戊戌政變之後，康有爲、梁啓超等逃亡海外，大事鼓吹帝制和君權的重要，不但國內百姓感到言之成理，就是在海外各地，尤其是日本的革命黨同志，有很多人開始動搖，中山先生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此曾經再三嘆息！這是革命思潮的黑暗時期。

直到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清廷的弱點完全暴露，中國人民對康、梁保皇思想開始唾棄，認爲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國。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活動，從此才展開一個新局面；海外各地的華僑和留學生，也在醞釀一次大結合。至一九〇五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　總理看到全國精英集於一爐，感到事情大有可爲，才有「我可躋身而踐革命事業之途」的豪語。

## ●意義●

黃花岡之役，是同盟會成立之後的最大一次革命行動。參與這次壯舉的絕大多數是青年留學生，他們雖明知必死，卻敢於慷慨赴義。黃花岡之役的意義，在於昭告全國上下，革命事業不是少數狂妄份子或幫會之眾的冒險，而是關係全國人民命運與幸福的盛舉。

三二九廣州起義的偉大之點，不在乎犧牲的慘烈，而是那種「明知其必敗而願冒此失敗去求成功」的精神，也就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勇氣。烈士中如林覺民者，視死如歸，當初他就抱定了必死之心，不顧家中上有老父，下有幼兒，他爲的不過是：「吾輩誓死之日，就是因爲在黃花岡上死難的，都是林覺民這種不怕死、不畏難的優秀青年，才激起了全國各地的澎湃怒潮，革命情緒在一夜之間，幾乎鼓動了全國人民。同年十月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一舉成功，石破天驚，實在是由於黃花岡之役的失敗，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之役中，有許多巧合的因素存在，這次革命的失敗和影響，可以說就是這些因素造成的。

依照原來的計畫，革命同志準備集中力量，選三千名敢死隊，破釜沉舟的一舉攻下廣州。但經過幾個月的部署，才有一千多同志自福建、安徽、四川和上海來到廣州和香港，而其中留學生佔了大多數。黃克強、趙伯先和胡漢民等人，負責籌劃全盤軍事行動。

起事的日期，原定在辛亥年四月一日，但是三月十日一樁暗殺事件，影響了整個計畫。當時兩廣總督張鳴岐和廣州水師提督李準，對革命黨防範甚嚴，尤其李準以奸詐聞名，爲革命黨的眼中釘。溫生才烈士欲乘三月十日清廷官吏前往廣州郊外觀看飛機起飛的機會，刺殺李準。可是溫烈士卻誤殺了廣州將軍孚琦，因此引起了清廷當局的警戒。

當時清廷已經風聞革命黨份子在廣州有所行動，於是計劃實施全市逐戶搜查「叛黨」。革命策動主要人物之一的趙伯先，所帶領的安徽籍同志，因語言關係，不便在廣州活動。據胡漢民事後的記敍，趙聲等退往香港觀看風聲，並等待軍火來到，而黃興與一些閩粵同志，則繼續負責在廣州城內籌劃舉事的步驟。

三月二十六日，廣州的風聲更緊，同志們幾乎完全無法行動。黃興拍電報到香港，電文說：「母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甚危。」暗示欲退往香港暫避風險，而取消四月一日的起義計畫。但是同志們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希望孤注一擲。這種精神感動了黃興，黃興反而在情勢最緊張時，欲單人赴死。革命同志的激昂情緒，到此可說達到了最高潮，所以到三月二十八日，克強同志再拍發電報到香港說：「母病稍痊，速購通草來。」希望香港方面立即接濟軍火，準備提前起義。

不料負責運送軍火的同志，由日本門司把軍械彈藥南運的途中，聽到廣州方面情況惡劣，恐怕到香港後會事敗被捕，乃將全部軍火悉數投入海中。所以當時廣州方面的革命同志，所持有的槍枝和彈藥，都是利用偷運、挾帶、暗藏，甚至利用女同志辦假喜事而零星得到的。

起事那天，廣州城內緊張萬分，總督府門禁森嚴，水師部隊也在城外戒備，還有三營從順德調回來的三營新兵，則駐紮在觀音山前後。同志們集合在統籌部，商討進攻的路線，人員分配則是採單線指揮，分成數路向總督府合進，以號聲爲記，而各人在手臂上纏白布和毛巾以爲辨認。當時每個人的心中彷彿都有一腔沸騰的熱血，恨不能一舉奪下廣州，殺除滿虜以謝天下。

在同志中，有一位湘籍的譚人鳳老先生銀鬚飄然，大概是這次戰役中，年齡最長者，他本是一個讀書人，雖也參加了革命行列，但是對放槍殺敵一竅不通，不得已臨陣磨槍，怎料意外走火，雖未傷人，卻引起了敵我雙方的注意和緊張。最後，在一種視死如歸的力量推動下，黨人在預定時間未到前，就分頭展開廝殺。革命史上英勇而感人至深的一次壯舉，就此爆發了。

行動開始之後，志士們戰志高昂已極，由廣州城內各地集中猛攻兩廣總督衙門，無奈清兵早有準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革命同志們撲空之後，預先埋伏的清兵已堵住各處去路。黃克強同志率眾據隅頑抗，堅持了半天一夜，自己被打斷了右手中、食二指，其他同志則死的死，逃的逃，還有受傷被俘的也不在少數。

在激戰中，有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偏巧不遲不早發生。由順德調回廣州的三營部隊中，有不少是革命黨的同志，其中有一位溫岱雄烈士，早已聯絡好策動新兵反正，內外夾擊清兵。當戰事膠着時，溫的部隊奉命進城增援，正是成事大好良機，卻不料由於另一位烈士方聲洞倉促間的一槍，使整個事件澈底改觀。

原來溫同志等已得到通知三二九下午五時半起事，並按約定每人臂繫白巾一條作爲標記，誰知當他們隊伍開進城來時，時間緊迫，同志們尚未將白巾繫起，已遇到殺得正起勁的方聲洞烈士等人迎面而來，方烈士不知就裏，舉槍首先擊倒了溫岱雄，防營同志也開槍回射，雙方開始自相殘殺，方烈士也當場陣亡，一幕歷史性的悲劇，就在陰錯陽差中產生。

在革命同志中有「聖人」之稱的朱執信，也曾參加這次戰役，他在出發前剪斷長衫的故事，早爲大家所熟悉。另一位成仁的同志（姓名已忘），在上船趕往廣州時，突然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這位烈士毅然決然先赴廣州參加革命，而不回家奔喪。當時他曾激動地說：「革命如果失敗，我固難逃一死；就是成功，我也要一死以謝先父。」盡忠全孝，確是千古男兒榜樣。

當克強同志看到大勢已去，才從藏身的洋貨店中，改裝逃往河南，遇到女同志徐宗漢，爲他裹傷服侍，才保全性命。至於留在香港的趙聲和胡漢民，知道二十九日廣州已經起義，急忙率領黨員二百多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趕往增援，三十日到達廣州城外時，才知已經事敗。漢民折回香港，趙聲半路迷途，靠著一點模糊印象找到黃克強，兩人當街相抱大哭。當夜他們幾人同到香港雅麗醫院，黃克強治傷割指須家屬簽字，徐宗漢女士用妻子名義爲他擔保，黃徐姻緣，由此而定。

黨員中除方聲洞、林文、林尹民、杜鳳書、劉元棟等四十餘人當場殉難；被俘而遇害的有林覺民、喻培倫、程良、饒輔廷等三十多人。烈士們的身份，有留學生、教員、軍人、記者、工人、農人和僑胞等，由此可見革命黨的救國救民工作，已得到全國知識份子和農、工、商以及武裝同志的普遍支持，也證明了革命事業已在國內每個角落，奠定了有力基礎。

## ●結論●

黃花岡起義的失敗，對　孫總理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打擊，他在「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中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三月底到四月初一段時間，　中山先生正在芝加哥城，當他在途中獲知廣州起義失敗，心情沉重。在四月五日對芝加哥中國城僑胞們的一次演講中，許多華僑聽到一半就紛紛離去，事後方知僑胞們久聞　孫先生善演講，誰知那次一聽之下，竟然大失所望，其實他們並不瞭解　中山先生當時的心情。

然而就在　總理離開會場回到旅社，接到香港方面的回電，說黃興、趙聲、胡漢民和朱執信等人均安然脫險，抵達香港。　孫先生聞訊之下，心中鬱悶一掃而空。認爲這些黨中的重要幹部能倖免於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天下事，尚有可爲也。」於是他又精神勃勃，充滿希望地又開始到各源。

黃花岡的革命雖然失敗了，卻爲日後的武昌起義奠下了堅固基礎。十日的成功，也才有中華民國的誕生。這可以用　總理的兩句話來說明有黃花岡之役的失敗，才有十月：

「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聯合報」第十版。

按：本文係由黃季陸先生講述，陳鐵輝先生筆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父民權思想的礎石

國父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開始便說：「民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而不是秩序與進步，因此，他認爲民權主義的一是地方自治的建設，一是他所主張的社會建設，亦就是「民權初步」努力推行的結果，地方自治一事已爲國人所重視，而社會建設的重要卻往往被人所忽視，實則二者有其最密切而不可或缺的關係，甚至我們還可以說，地方自治祇是民主的外貌，民主眞正的根基，則是社會建設。　國父民國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演講「自治制度爲建國之礎石」，曾以中西建屋舉行典禮時之重大差別爲例，說明今昔建國之不同，國人築屋先上樑，西人築屋先立礎，上樑是注目於最高之處，立礎是注目於在下的根基，國家的根基是人民，也就是古語所說的「民爲邦本」，我國古時建國，先朝廷而後百官，人民則初非所計，猶如建屋的重視上樑。今天要建設一個永不傾仆的現代國家，猶之建築百多層的高樓，仍照先上樑的老辦法，實非可能，必須先建根基於人民，然後再從地面上一層層的築起，建樓愈高，則必須築基愈深。據我的看法，此地所說的自地面築起應是地方自治；在地下深築根基，則是社會建設，也卽是「民權初步」的工作了。



　國父時時引用美國的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兩者的成敗得失作爲借鑒。美、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兩國在民主政治的成就上是懸殊的，其懸殊的原因是美國在革命之前，美洲原有的十三州已經有了很好的地方自治做基礎，所以革命的結果祇是把殖民地的招牌去掉，換上一個民主共和的名義罷了。但是法國卻沒有這種基礎，所以造成了狄更斯的小說中那樣黑暗的社會。現在我要引用另一史實，以說明地方自治只是地面的上層，而不是在地下深築其基的礎石，更由此說明美國獨立後民主建設成功之快與法國革命後成功之慢的原因所在。根據艾爾伯特（Sir Courtenay Ilbert）氏所著「英國議會」一書，他指出美國開國之初，因爲採用了英國議會的議事陳例、程序和法則而成功，法國國民會議因忽視英國的議事陳例、程序法則而如何紊亂失敗。而這些陳例、程序和法則就是　國父手著「民權初步」所闡述的道理。艾爾伯特氏曾說：一個到過美國的旅客，看到美國國會的各種議事程序、法則和習慣，會使他想到倫敦西敏寺英國巴力門的情形。這當然是不足奇怪的，因爲美國開國之初，參議院因無完備的議事規則，所以顯得十分散漫與紊亂，於是當時爲此傷透腦筋的議長傑佛遜氏，乃根據英國巴力門的習慣、規則與陳例彙編爲一「參議員手冊」（Jefferson's Manual）作爲議事準則，美國兩院一直以此爲依據，沿用至今。美國民主能進行順利，傑氏手冊的重要是不可忽視的。不僅聯邦政府的國會要以此爲準則，就是各邦和人民團體的議事，也無不因有此手冊而收事半功倍之實效，所以研究美國民主政治的人，除了知道美國有一部偉大的憲法之外，更要留意到這本小冊子對美國民主政治影響之深厚。那麼法國革命時期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艾氏說：當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的國民會議，起初毫無議事規則可言，完全是一烏合之眾的組織。後來有名的國民會議代表米拉波先生（Mirabeau）從一個杜蒙 Dumont 的人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裏，得到一册英國下議院議事規則的節本，請求予以採用，但被國民會議的先生們認爲法國已是民主共和，英國尚是帝制，不屑予以採用，因而法國的議會的紊亂也就因此而不可收拾。革命後期的恐怖時代的造成，和帝制的重演，可以說與這種紊亂無秩序的情形不無關係。

從這段史實的教訓，我們可以知道單單剽竊一些自由、平等、民主憲政等的名詞和觀念，而不在如何實踐民主表達民主的程序與方法上用功夫，那祇算採用了民主政治的皮毛，其結果將使民主流於空洞與雜亂無章，所以　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的序言裏告訴我們說：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爲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受集會之禁，數百年於茲，合羣之天性盡失，是以，集會之原則、條理、習慣、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一般人往往以爲「民權初步」不過是教我們如何集會議事的一些法則與程序，而不知集會議事祇是民主的形式，要能達到羣策羣力，兼容並包，表達民主，解決問題，才是民主眞正的目的。當前我們面臨着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便是民主形式的集會太多，而收到民主實質的會議太少。今日會議繁多的原因在壞的動機上來說，凡是要推卸責任的事便假會議以免去責任，明明是自己私心要做的事，但因不敢公開負責，便利用會議的形式，挾持會眾爲之負責。會議之時發言既不容暢所欲言，處理又無規律與程序，既無討論又無正式之表決，在無可如何之中，便以「無異議通過」而處理一切了！無異議通過在議事習慣上有「全體一致認可」之意，苟非在眾人意見已趨於共同或係例行之事用之，則甚爲不當。東方人最講情面，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無異議」之方式徵詢會眾，似乎帶有「有誰反對？」之意，於是有意見的人也只有在內心的苦笑中表示其默然無意見之態度了。民主的運用，本爲每一團體分子在公共活動上一種積極的態度而參加近代的民主活動是極其不相宜的，故民主制度在今天如果還不能培養出國民對國事種消極的態度而參加近代的民主活動是極其不相宜的，故民主制度在今天如果還不能培養出國民對國事和公共事務一種積極的興趣，民主政治的前途在中國是有其困難的。

國父在論到中國民權不張之理由，及四萬萬人優秀之民族何以似一盤散沙之原因時，曾慨乎言之而歸根於過去我國專制政治所養成。他說：「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羣力發揚耶？」因是中國的社會被種下病根，以致到了民國時代，人民還不會行使其主人之權力，這是何等大的一個悲劇！由於此一病根，表現在一般會議，便產生了兩種可怕的現象：一是不熱心參與會議，也就是出席會議的情緒低落，二是縱然勉強出席，也默然不表示意見。不發言不一定是贊同的表示，相反的更易流爲一無言的反抗性質，這是弱者另一種反抗權勢的消極形式。在民主制度之下，不論是國家或其他團體，此種現象長此存在，便不得不謂之危機。民主政治最大的功能是要把一切的事情，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求得一個眞理，一個共同，也就是要在求得多數的意見，以達到羣策羣力的效果。換句話說，就是要用公開的方式，使每一個人表示出他對「眾人之事」的意見，寧可他言而不當，不可任他退而後言。也就是說把一切都放在太陽底下使他自然成長，如果把一切放在陰濕的地方，便易於腐爛了。民主政治不怕「明爭」，而怕暗鬥；不怕堂堂正大的爭取，而怕陰險下流的暗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權初步」是　中山先生指示我們實行民權政治的方法程序，他的目的不僅是叫我們學習民主政治的規律與程序，用來表達民主的和諧一致羣策羣力的功能，同時更教我們在這些規律和規則中，養成民主社會中每個人皆應具有雅量和態度。簡要言之約有下列幾點：

一、人格平等和個人尊嚴應被尊重：在民主社會中，不因性別、膚色、知識、職業之不同而渺視其言論之價值，因爲人之最大目的，在人格的擴大與自我的表現，既然承認人皆需求自我表現，因而亦須承認他人有自我表現之機會，這樣各人始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調和其差異，通力合作，以增進全體社會之幸福。

二、不同的意見或反對的意見可以共存：承認差異而容納差異是民主政治社會的另一特色，也是民主與專制最大不同之處，專制政權之下，往往出現一種「權勢」，這種「權勢」不但自是其是，且要強人所是勉求劃一，這種過份的要求齊一之結果，自然就會產生那種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爲馬與暴力壓迫的笑話了。可惜歷史的教訓，對於兩千多年後的共產黨的黨徒們，並未發生前車之鑑的作用，所以在鐵幕之後仍然是專制暴戾，絕對不許絲毫的異己思想的存在了。相反地在民主政治的國家，執政黨不但容納反對黨不同的意見與批評，是保持一個政權不腐化的最佳途徑。而且政府每年還要支付若干費用給反對黨的領袖們，好使得反對者能對政府提供繼續不斷的批評，因爲接受不同的意見與批評，是保持一個政權不腐化的最佳途徑。

三、服從多數與寬容精神：這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多數決制」Rule of Majority，依照盧梭的理論，國家的政事應取決於國民的全意志祇是想像上的東西，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個無拘無束的自由天地裏，思想上、意見上之分歧是免不了的。爲了使民主政治不陷入一事無成的僵局，所以祇好採用了「多數人之判斷較爲正確」的假設，這就是今天民主政治所採用的多數決制 Rule of Majority 的道理。然而多數決制的意義不是強凌弱，眾暴寡的多數，而是必須顧及少數人的意見和利益的多數。強凌弱，眾暴寡的多數比之以少役眾的專制政治還不人道，還要殘忍。中世紀時代，義大利北部的鄉村據說已採用了多數決制的原則，就是因爲往往疏忽了少數人的利益，因而常常逼使少數人爲了反抗此一形勢，乃不得不用一種武裝的力量，脅迫大眾，其結果使原爲統治者的多數，反而一下變成了少數人的奴隸。這眞是民主政治一大警惕，稍微不愼，馬上就又要變回以槍彈 Bullet代替選票Ballet的局面了。

四、坦白公開的爭取，退不後言：這是民主政治之另一精神，因爲民主政治既用討論和多數決制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那麼參與者就必須抱一種坦白摯誠的態度來提出意見求得協議。在民主政治之下，社會應是開放性的，除了有關國防機密之外，一切都可在國人注視之下，公開地討論，坦白地發言。這一方面說明民主政治嫌惡陰謀暗鬥的本質，它一方面也可表現出民主社會裏人人負責的態度。

要養成以上這些基本觀念和態度，只有今後從教育上痛下功夫，否則民主政治在中國將永無前途。現在我們來開始做，時間尚未爲晚。在這一工作進行上，我認爲在大專學校「議學」 Parliamentary Law一門應當列爲正式課程，以供學生選讀，在中小學應以之作爲公民訓練的中心，所謂訓練應在實際演習方面着重，使學生從動作中習練集會議事的規律和程序，從而明白合羣團結之可貴。因此各級學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教材之編製與審定，應爲適應之配備乃屬必要。就我個人所知，此一工作之推進今日已不是理論的問題，故對教材應有配備之外，必須妥籌師資之培養，以往所以成效未著，適當師資之缺乏，恐係原因之一。

任何社會都需要一種「禮」來維持，從前我們所講的是尊、卑、長、幼之禮，在民主的社會，我們所需要的是「羣體」，國父的「民權初步」就是表達這種羣體的具體條規，我們要建立一個近代的民主國家，這一民主禮俗的養成是刻不容緩的，因爲這是社會與政治建設的基本。此一工作進行起來，也許是萬分的艱難，也許是路途甚爲遙遠，然而只要我們有決心，有計畫，不停地往前走，終有一天是可以達到目的地的。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徵信新聞報」第十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父以智識供給人民的遺教

「印刷工業為以智識供給人民，是為近世社會一種需要，人類非此無由進步。一切人類大事，皆以印刷記述之，一切人類智識，皆以印刷蓄積之，故此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諸民族文明之進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

今年為　國父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國父思想的博大精深已廣泛地為舉世所共知。卻是，他的博大精深的遺教究竟何在，要具體的提出意見來，可就比較難了。由於各人的興趣與觀點不同，凡我們所知與所闡揚他的思想遺教的地方，不免都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體的。談主義的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三民主義的學術思想，而忽略了他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方略——建國方略和建國大綱。談哲學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知難行易的學說，而忽略了他所提證出的各項促進擴大人民知識範圍，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那些重大規劃。中國革命之延遲躭誤而未竟全功，可能便是我們過去忽略了他所提出各項實行的規劃與方略所致。這一意見，我們在今日似乎是值得反省的。

我現在要提出實現民生主義的物質建設中，一項發展工業的計畫，那便是　中山先生「實業計畫」的第五計畫中的第五部分的印刷工業。關於印刷工業的重要，在一般人的看法可能是易於忽略的，至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能與其他民生工業等量齊觀。而在　中山先生的看法則不是這樣，他說：

「此項工業爲以智識供給人民，是爲近世社會一種需要，人類非此無由進步。一切人類大事，皆以印刷記述之，一切人類智識，以印刷蓄積之。故此爲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諸民族文明之進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可見　中山先生對印刷工業的重視。但他對我國印刷工業發展的情形卻表示憂慮，他說：「中國民族雖爲發明印刷術者，而印刷之工業發達，反甚遲緩。」因之他熱切地希望國人遵照他所提示的辦法去圖謀發展，他說：「吾所定國際發展計畫，亦須兼及印刷工業，若中國依予實業計畫發達，則四萬萬人所需印刷物必甚多，須於一切大城鄉中設立大印刷所，印刷一切，自報紙以至百科全書。各國所出新書，以中文翻譯，廉價售出，以應中國公眾之所需。一切書市，由一公設機關管理，結果乃廉。」

中山先生爲什麼如此重視印刷工業呢？乃導源於他重視人民知識水準的一貫主張。遠在民國紀元前十七年的乙未年，他在廣州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中曾說：「我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追求積弱之故，不得盡歸咎於廊廟之上，即學國士、農、工、商，亦當自認其過焉。蓋觀泰西士庶，忠君愛國，好義急公，無論一技之能，皆獻於朝而公於眾，以立民生富強之基。故民間講求學問之會，無地不有，智者出其才能，愚者遵其指授，羣策羣力，精益求精，物產於以豐盛，國脈因之鞏固。說者徒羨其國多善政，吾則謂其國多士人。蓋中華以士爲四民之首，此外則不列於儒林矣。而泰西諸國則不然，以士類而貫四民，農夫也，有講求耕植之會；工匠也，有講求製藝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皆能闡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新法，著書立說，各擅專門，則稱之曰農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詞。以視我國之農僅爲農，工僅爲工，商僅爲商，相去奚啻霄壤哉？」因之，　國父提出一項「無民非士、無士非民」的教育文化主張。用今日的話來說，近代的國家有兩個目的：一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一是增進人民追求幸福更大的機會，而要達到這兩項目標，便非普遍提高國民的知識、科學、技術水準不可，要提高國民的知識、科學、技術水準，便非普遍發展國家的教育文化不可。因此，教育在一個國家的重要，已成爲實現國家各項目標的工具。不讀書的人要強迫他讀書，所以有強迫教育或稱義務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可是促進教育文化的工具又是甚麼呢？無疑的是印刷與出版事業。由於近代科學的進步，廣播與電視及其他大眾傳播事業的發達，使教學與傳播的媒介更爲便利，範圍更爲廣大。可惜在　中山先生逝世時，廣播與電視這些新興的傳播工具尚未及見，否則他既然把印刷列爲實行民生主義建設的一項工業，便又得把這些新興文化傳播工具，列爲與民生工業等量齊觀而予以提倡利用了。

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是實現民生主義的方略，而在這一偉大的計畫之中，他把印刷工業與民生工業並重，是在說明不僅要增進國家財富，給予人民以較高的生活享受，而且還要給予人民以更高的知識，以創造更大的福利。這是　中山先生最偉大的地方，亦是我們對於他的遺教最忽略的一部分。

　國父在前文中說：「世界諸民族文明之進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民國元年他又曾說：「凡一國之強弱，以其國學生之程度爲準。」演繹　國父這兩段話的精神，毋寧說是要衡量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否，應以其國出版物之多少與國民之知識程度高低爲標準，亦即是要以一國的教育發展與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爲衡量。我在教育部長任內時，爲了要提高國民知識技術水準，以促進國家的進步，堅決主張要把目前六年的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爲九年，由六年的國民小學教育延展到初中畢業。爲了適應當前政府財政支付的困難，乃改訂爲「國民小學畢業學生志願就學方案」，使自願就讀初中的學生酌納學費，以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俾能期其實現。爲了促進社會的瞭解，我曾根據　國父此一遺教的精神及近代教育發展的趨勢，提出了下列意見：

衡量一個國家國力的強弱大小，從前的人是以下列各項條件來決定：①軍備的龐大與否？②資源的豐富與否？③工業化程度的高低，④人口的多少。不久以前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教授哈比生（Harbison）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耶斯（Meyers），共同研究的結果，認爲以上的說法不完全正確。他們認爲衡量一個近代國家國力的大小強弱，是決定於這一國家的知識、科學和技術程度的總和，亦即是他們取用的一個特有名詞「教育綜合指數」來決定。

甚麼是「教育綜合指數」呢？他們提出一項簡單的計算公式，即是一個國家的十五歲到十九歲的人口中的在學人數（中學到大學一、二年級生的在學人數）加上其二十歲到二十四歲人口中的在學人數（大學到研究所的在學人數）乘五所得之總和。

學個例來說，他們利用了我國前幾年的資料，認爲我國十五到十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是百分之三十點九，二十到二十四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是百分之三點五，綜合指數如下式：

$$30.9+3.5\times5=48.4$$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乘五之原因，意指大學畢業者之能力，相當於未受大學教育者之五倍。照哈、梅兩氏的計算，我國的教育綜合指數爲 48.4，列世界的第六位低，但哈、梅二氏所指係123.6，日本爲111.4，蘇俄爲92.9。我們的教育綜合指數名列第六，雖然不以十五歲到十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爲起點，並沒有計及我國之義務教育僅由六歲到十二歲的兒童，這很顯然的沒有計及我國義務教育尚差三年之時間乃能及於十五歲初中程度之九歲人口中之在學人數起算，我們的教育綜合指數的名次便不能有如是之高了。因此，我國目前六年的國民基本教育，實不足以適應世界進步之趨勢，增進至九年的初中教育至爲必要。否則，以一十二歲方完成國校教育之兒童，如欲作學徒則須十五歲，如以之作一技工則年歲與程度均更感不足了。工業社會之基礎在技工階層，以一年歲學識都不足之兒童充塞之，不僅摧殘了兒童身心，且亦將摧殘我們未來的工業發展！這亦就是我主張推行「國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的意義所在。

國父重視印刷、出版事業者之能力，相當於未受大學教育者之五倍。的印刷機關，就是一個例證。他說：「本黨向有愛國儲金一項，原爲備本黨以充最有實效之用途，方不負我黨同志拳摯之意。蓋現在屬於本黨之軍隊，建、廣東等處不下十餘萬人，如在四川、陝西、湖南、福一部，則受歧視之誚。……故月餉動須百萬以外，謂儲金一項而能供其浩大，誠莫如設立一大印刷機關。苟以吾黨同志熱心所集之儲金，擇一最爲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事而舉辦之其理由如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唱，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盡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僞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致輿論大放異彩。……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畫之雛形者，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歡迎，然而尚自慊於力有未逮者，則印刷機關之缺乏是也。夫印刷機關，實出版物之一大工具。」我們知道當時本黨的，本是為了應救國之急需而儲愛國儲金，的確是來之不易的，家的事，他這種高超遠大的見解，中山先生認為把這筆儲金用來辦一大印刷廠，是最為有裨益於黨和國得我們效法。這種重視提高國民智識水準的精神，在今日我們所處的時代，尤其值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臺灣新生報」第十、十一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教育投資及其收穫

——為菲律賓中正學院擴制成立而作

教育對社會來說，它所負的任務是十分重大的。因爲一個進步的社會，其目標必爲「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由於文化與經濟的成就所組成。文化與經濟的成就，不是一蹴可至的，它必須經過不斷的進展，不斷的蛻變，導致整個體系中各階段的相輔相成的循環發展。這一個循環發展是由於三種方式的投資：一是教育的投資，一是研究發展的投資，一是創造生產能力的投資。在教育一項內，是以可受教育的人民和教育預算作原料，經過教育而蛻變成受過教育的人力。可受教育的人民應包括含有潛在能力的老弱在內，至於教育預算乃是社會上以其收入之一部份用於教育事業，教育預算的大小，直接影響到教育的品質，和受教育人數的多寡。

在受教育中的人力，往往無生產，而是消費的，可是受過教育的人力足以更生和創造社會文化，因而變更了他們對整個社會的價值概念。這些受過教育的人民，用於經濟發展中，可以促進新技術的研究發展，可以創造生產能力，進而產生物質和勞務，以達成社會的文明，供構成社會的人，獲得進一步的美好生活。由於教育短暫的看起來是消費，而從其長遠的收穫而論，則是一種社會進步必需的投資。一般來說，凡是國民所得比較高的國家，在教育上所作的努力亦比較大，例如美國的平均國民所得，約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千餘美元，他們每千人中約有一八〇人正在接受小學教育，約有二五我中華民國平均國民所得約爲一百五十餘美元，每千人中約有一百九十十餘人正由小學升至大學過程中，（以上是民國四十三年的統計）以國看，我國在教育上所作努力並不比美國爲低，所以教育投資是我們今天

我們之所以願意承受這樣重大的負擔，就因爲教育是一種極有價值他們子女將來的經濟安全起見，已經發現投資於他子女的教育，是比其個社會的將來亦復如是，一個國家的將來亦復如此。

教育同時亦是擴展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下列各方面的必要工具：

（一）由於專門知識的效率之獲得，而提高生活水準。

（二）由於高深的素養，而變化了智慧和精神上的氣質。

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是傳統的觀點，認爲生產力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本代替勞力的觀念，但根據美國休示茲教授調查結果，美國生產力的物質方面的改良，而有五分之四是由於方法、管理以及人民素質的改進，纔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投資。

專家們認爲：受了高深的教育，就業的機會都比較好，他們如果不獻其知能，亦可繼續不斷地增加收益，直至他們退休爲止。現在我們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收益估計作爲參考，假定接受了研究所教育的現有價值爲一〇〇，則其他的教育階層現有價值如下：大學院校爲八五，職業學校及中學爲六五，小學爲四〇，未受教育爲二五，可見所受教育愈高，則其收益亦愈大。

還有一個更顯明的例子，就美國而論，社會與個人因爲美國衞生教育福利部推行「職業復原計畫」，而得到很顯著的收穫，他們在職業復原計畫推行之前，五萬六千個缺乏經驗的工人，每年收入共計一千五百萬美元，當推行職業復原計畫，予以再教育以後，他們每年收入竟增加到一億另二百萬美元，幾乎增加了七倍的收入，眞是驚人，更可見適當的教育投資是如何的重要了。

——錄自「菲律賓中正學院擴升成立紀念刊」，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韓關係與亞洲安危

亞細亞學術研究會會長霞城李瑄根博士，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學人，獻尤多，我們對他十分崇敬。茲值李瑄根博士六秩壽慶，亞細亞學術研賀之忱，這一決定對於一位學人來說，是一項最有意義的舉措。作者忝爲李博士友好之一，謹以「中韓關係與亞洲安危」問題，作者於一九六四年多訪韓時抒拙見，以就正於韓國學術界人士。此一題目，當時因時間所限，言有未盡，今特補充成文，以實李博士壽慶紀念論文集會在慶熙大學作過一次演講。

中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於中、韓、日三國國民之休戚關係的遺教，凡　孫先生之所期望者，雖畢生致力於中國與亞洲民族之自由獨立運動，爲韓國最具熱忱之友人，本文立論大部份爲闡述　孫先生在過去未獲實現，致演成今日亞洲禍亂與世界和平之威脅，然鑑往知來，亟圖補救猶未爲晚也。

一、孫先生生於西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照西方的算法，今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他誕生九十九足歲的紀念，而不是誕生一百足歲的紀念，照西方 Centennial 這個字的使用，應當是明年（一九六六）的十一月十二日，才是　孫先生的一百足歲紀念。但依照中國民間祝壽的習慣，是所謂「祝九不祝十」的，所以今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中國習慣的　孫先生誕生百年紀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兩年前，亞洲歷史家會在臺舉行，我在閉幕那天的致詞中，曾
九六六年十一月　孫先生誕生一百足歲的時候，舉行一次世界性的學
界的權威學者在臺北集會來紀念他的誕生，邀請全世
討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議題便是：共同慶祝。我當時的構想，要在這一國際
會議中，提出幾項中心問題來

「孫中山先生與亞洲民主主義的影響與發展」

我當時想像這一問題的提出，必定能引起各國的歷史學家們的興
把佔世界人口幾達四分之一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把具有幾
千年悠久文化的中國民族，從過去的時代中結束，走向近代國家的創
中國，亦屬於亞洲與整個世界的中國，由幾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改變爲
立的一位偉人，這一偉人不僅屬於
二、要知道　中山先生對亞洲和世界的影響，自他逝世四十年來
，因爲舉世皆知　孫中山先生是
到很多證明。卽是在四十年前當他逝世的消息傳播之時，舉世對他哀
悼，爲之震驚的情形，便已作如是
的論斷了。我在此且先舉出一些四十年前外國友人的哀辭和評論，以
代說明。

(1)日本國民新聞，稱中山先生爲亞洲和世界演變進化的事實，人們不難找
該報說：　孫中山先生爲一近代傑
出之革命思想家，其革命主義，不僅是法蘭西式之政治革命，更進一
步有達到經濟的社會革命之路。……
反抗帝國主義，高唱大亞細亞主義，茲欲
今後亞洲民族之和平運動從此失一領導者，吾人對此，不禁衷心痛惜
覓如孫氏第二人，恐不可再得矣！
者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2)日本宮崎龍介氏：予父（按卽宮崎寅藏）曾與　孫先生共革命患難甚久，予從幼卽常追隨　中山先生，故於其人格，其主義，其事知之甚稔。　先生之志，不但從事中國革命，實欲實行全世界革命之計畫，目前世界正變動，忽失此革命偉人，殊爲人類惜。蓋　先生之三民主義更進一層，其民族主義，主張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民權主義，主張人類皆得有參政之權；民生主義，主張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民權主義，主張人類皆得有參政之權；民生主義，主張節制資本，發展實業，脫離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先生思想與主義，匪獨爲中國一國之偉人，實爲全世界之偉人！

(3)印度報界領袖蘭斯密氏：如這樣的大偉人的死亡，不但中國力爭主權的人們失了一個主將，卽亞洲全部，亦失了一個最偉大的公僕，與最足頂禮的靈魂，亞洲偉人爲數不多，今忽去其最偉大的一人，嗚呼，我們不痛惜公共的損失嗎？

(4)安南路亨利氏：中國與安南毗連，脣齒相依，可惜彼此都殖民地化了！　孫先生生於殖民地化之中國，忍不住帝國主義之侵略壓迫，聯合東方民族做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處實開東方民族解放之一條生路。

(5)朝鮮李晶夔氏：我們高麗久受日本壓迫，想呼吸都不得，與中國被列強壓迫無異，所以彼此同病相憐，正冀　孫先生率遠東民族脫離奴隸地位，何圖大星忽隕……。

(6)愛爾蘭某氏：　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與愛爾蘭情形相同。惟愛爾蘭缺少一位　孫中山先生，今　中山先生逝世，使吾人表同情之哀悼云。

(7)德國國會議員盧森堡氏（Rosen　Berg）：中國民眾之仇敵與德人相同，卽帝國主義是也，歐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兩洲反帝國主義之運動，與夫中、德兩國反對帝國主義之運動，亦異地相同。德國人永遠不忘　孫中山偉大之工作，並永不忘其目的，卽是使全世界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而得自由。

(8)美國各報的綜合評論：　中山先生爲現代五傑之先知先覺者。五傑者，印度的甘地、土耳其的凱穆爾、俄國的列寧、美國的威爾遜與中國的　孫中山也。　中山先生所以被推爲先知先覺者，乃以五傑始得國際聲望之年代爲準。甘地成名在一九一九年，後　中山先生二十三年；凱穆爾成名在一九二〇年，後　中山先生二十四年；列寧成名在一九一七年，後　中山先生二十一年；威爾遜成名在一九一二年，後　中山先生十六年。　中山先生成名，早在一八九六年倫敦遇難之時。三十年來，　孫逸仙博士的聲名，一經報章不斷的顯揚，再經華僑狂熱的崇拜，世界留心時事的人，幾已無不認　孫先生爲近代民族自決運動史上獨一無二的突出人物。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等國，尤以彼等較理想化的孫逸仙爲喚起國民革命的口號。甘地、凱穆爾卽爲此一口號之產物云。

三、右所列擧雖僅爲四十年前　中山先生逝世時，國際友人之哀辭及重要輿論評論之一斑，然就此一斑已可見出當時擧世哀悼情形的眞切。在世俗社會中於親友去世以後，往往多有溢美之詞，而一位偉大人物的云亡，卻正爲天空中隕落一顆巨大的星辰一樣，世界將同感陰暗，此際他們所發出的言辭，乃出於心靈的深處，自非世俗的溢美之詞可比。其中尤以韓國友人李晶燮先生所作的哀呼和日本友人宮崎龍介以及日本國民新聞爲亞洲民族和平運動痛失領導的惋歎值得注意。因爲近四十年來，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演變，不獨爲亞洲問題的重心所在，亦爲世界問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樞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近代中國的處境，在地理上遭逢兩大鄰近國家的威脅，一是廣大土地接壤的俄國，一是海上的日本，這兩個國家的野心和擴張不戢止，中國固然是要受到威脅，韓國亦是同樣不能倖免。

在十九世紀的時期，中國遭受了兩次失敗的戰爭，一是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的閉關局面。一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這次戰爭由於中國失敗的結果，大陸上來了新起的日本勢力，首先遭受不利的是韓國；其次是日本以韓國爲跳板加速其北進政策向中國侵略。日本這一侵略勢力，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的無條件投降，才獲消失。這是中國經過了八年長期抗戰的犧牲所獲得的結果。不久中國大陸便爲蘇俄所培養的中國共產黨所竊據，而引起了陸上接壤的北方的敵人蘇俄的勢力，在這一情勢之下，韓國並沒有獲得完全的統一，而被分爲南韓與北韓。一九五〇年，中國大陸共產黨又乘勢與蘇俄結合起來對韓國發動侵略，這足以說明，凡是中國所遭受的不幸，勿論是來自俄國或是日本，韓國都同樣要遭受到不幸的牽連。

在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倖而獲勝，在中國，日本取俄國所經營侵略的南滿洲而代替之；在韓國，則因日本之勝利，瞬卽爲日本所吞併，於是日本對中國之侵略則更越發其猖獗而不能抑止了！

這是亞洲民族的悲劇，亦是近代歷史的錯誤的軌跡！是　中山先生深爲惋歎而早爲之謀的。

中山先生於一九一三年訪問日本，其時正值日本政壇強人桂太郎第三次組閣（日本自有內閣以來，沒有他做內閣總理那樣久的，伊藤博文組閣三次，總共不過六年十個月，他也組閣三次，卻有了七年十個月之久，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此期中，他所幹的兩件大事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日英同盟與日俄戰爭），中山先生與桂氏曾作數次密談，他指責日本的第一件事，便是關於韓國的問題。中山先生說：

「就大亞細亞的精神而言，應以平等友善爲原則，日俄戰爭之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爭之後，中國反而不表同情於日本，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而日本之侵略朝鮮，影響於今後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爲明智者所不爲！」

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府，其時中國的環境非常惡劣，他於是年十一月十六日致書日本內閣的文部大臣犬養毅先生，犬養毅是中山先生的老友，與中國革命的淵源甚久。在信中，他認爲只有中國、日本、韓國的相互提攜合作，才是亞洲安全的樞紐，他指責日本：「於戰勝俄國之後，無遠大之志，高尚之謀，只知步伍歐洲的侵略手段，竟有侵佔朝鮮之舉，致失亞洲全體之人心，殊爲可惜！」

當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俄國時，中山先生寄望日本能作亞洲民族的干城，以抵禦來自西方列強的侵略，而日本卻乘戰勝俄國之勢，做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夥伴，這是亞洲禍亂的根源，是中山先生深爲惋惜的。

以上所引述的中山先生對中、日、韓三國相互提攜合作的主張，乃見於他逝世後若干年始發現的秘密資料中，這當比見之於其生前公開言論者更爲深刻！

中山先生爲何要指責日本侵略韓國爲失策而主張中、日、韓三國的提攜合作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日本侵略韓國，是日本踏足到大陸，是日本大陸政策以韓國爲侵略中國的跳板的開端。

第二，有一獨立統一的韓國，可以屏障向中國的發展，亦可以中、日、韓的相互提攜合作，來應付雄跨歐亞兩洲大陸的俄國勢力向東方發展。過去是如此，現在亦是如此。

中山先生的遠見，時至今日都不幸而言中了！中、日、韓三國的提攜是日本謀，爲韓國謀，爲亞洲民族謀的基本政策。

日本最大的錯誤，是在日俄戰後舍亞洲民族的干城而不爲，竟誤以效法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爲得計。因之，在第二次大戰初期，雖曾得到一時的勝利，但最後卻遭受了極其慘痛的失敗，日本戰敗固然可悲，而亞洲紅禍的高張，自此難有寧日。世事如棋局，一著之錯，滿盤皆輸，日本軍閥是要負其責任的。

今日，中國、韓國固已不幸而嘗到此一歷史錯誤的惡果，而日本今日在赤潮翻滾中所受到的考驗亦是十分嚴酷的。「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今日紀念　中山先生的百歲誕辰，能不深自反省爲亞洲民族的光明的未來策勵嗎？

四、本文第二節，引述　中山先生逝世後，國外友人的哀辭中，日本友人宮崎龍介對　中山先生所倡之三民主義曾作概括的描述。他曾說：「先生之三民主義，實較風靡一時之馬克斯主義更進一層，其民族主義，主張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民權主義，主張人類皆得有參政之權；民生主義，主張節制資本，發展實業，脫離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他認爲：「中山先生思想與主義，匪獨爲中國一國之偉人，實爲全世界之偉人！」見地確是透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山先生創立革命的一項使命便是民權主義，亦卽是近代的民主主義，其最中國來實行。西方人士對中山先生的思想主義最不瞭解的是他的三民主義或者稱爲「孫文主義」（Sun Yatsenism），因爲所謂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三項原則的三民主義是西方所熟知的Nationalism，民權主義約同於西方的Democracy，民生主義約同於西方的Socialism，這三項原則或主義，都是西方所共有的，何以能合之而成爲一整個的思想系統，統稱之爲三民主義或孫文主義？爲了要瞭解這一問題的內容，我們應從三項原則的不可孤立性上去加以認識。

在排列上，三民主義是民族爲首，民權次之，民生又次之；在中山先生手訂的「建國大綱」第一條的規定又說，「建國之首要在民生，其次爲民權，再其次爲民族。」就好似在他思想體系上有不調和不一致的地方，卻是，這正是中山先生思想的精微處，亦卽是中國革命有其特殊性與一貫性的所在。舉世皆知，中國自一八四〇年，被英國人的大炮在廣州把中國閉關局面打破，門戶洞開之後，中國人第一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威脅，便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武力和經濟的侵略，國家瀕於危亡與殖民地的處境，民族的自由與獨立遭遇了侵害。中國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便是要從帝國主義的勢力下解救出來，恢復中國民族的自由與獨立，建立一個近代的國家，所以三民主義的排列次序以民族主義爲首。因爲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中國民族不能獲得自由與獨立，新中國的建設是沒有道路可循的，這是　中山先生把民族主義的實行列在第一的理由。有了民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義的實行才能成爲可能。

爲什麼　中山先生手訂的「建國大綱」要倒轉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呢？這很顯然是說，建國之首要是實行民族主義，亦卽是要從國際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之壓迫下解救出來，這是建國的基本首要工作，至於在國家已獲得立腳點之後，則又是以民生主義成爲對內建設的首要工作了。因爲人民獲得了國家的自由後而沒有經濟生活的自由，則國家的利益不爲他們所共享，人民對國家不會感到寶愛的。有了民族的自由，使國家爲他們所有，有了經濟的自由使國家利益爲他們所共享之後，如果國家不是由人民所共治，仍是不完備的，所以　中山先生便更要主張民權主義，沒有民權主義的實行，共有與共享都會落空的。　中山先生引用林肯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來解釋三民主義，便是這個道理。胡漢民先生闡揚三民主義的精神有幾句極爲重要的話，他大約說，沒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便是帝國主義；沒有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便是虛僞的民主主義；沒有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便是極權的共產主義，這是三民主義的連環性，是　中山先生思想的一個完整的體系，亦卽是中國革命所要完成的一項最崇高的目標。三者互爲條件，缺一不可。所以三民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而不是三個主義，這是瞭解　中山先生思想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有人問到三民主義的中心是什麼？我說是民權主義，因爲沒有民權主義的民族主義是專制獨裁主義；沒有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在安排次序上，民權主義正居於民族與民生主義的中心，這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是一項偶然的巧合！

中山先生逝世迄今的四十年歲月中，世界各項的思想和主義，如像馬克斯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不是陷於殘破，便被修正補充，改換其內容以致面目全非，惟獨　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卻隨世界情勢之演變而愈益證明其完整進步。舉例言之，亞洲國家如越南、韓國、泰國、印度；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敍利亞、伊朗；歐洲國家如南斯拉夫以及南美各國，他們一面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一面反共產主義，爲的是要實行民族主義。南斯拉夫爲蘇俄一手培育的共產國家，他們不惜以反蘇爲手段以脫離蘇俄之羈絆，爲的是要求國家的獨立，以實行民族主義。這四十年來世界之進步演變，不僅爲中國所需，更爲世界之所需要了。因此　中山先生的思想，在過去、現在及將來，對於人類的影響將與日月同光，所以他不僅是亞洲的偉人，更是世界的偉人！　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實已成爲全人類在智慧上共有的一項財富，是　中山先生爲亞洲謀，爲世界謀的寶典，它的光輝將永遠朗照世界！

——錄自「亞細亞學報」第一輯，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按：另有「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一文前段內容相同，不再重複收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臺灣光復與中國革命

歷史的演變及其進程，一般說來是有其脈絡可尋的，然其演進之紆迴曲折，又往往非研究歷史的人意料所能及。在我國近代歷史中，臺灣與中國革命的深切關係，就是一個具有不平凡的歷史意義的例證。回溯過去，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謀政治之改革，是在甲午年（一八九四）五月，而是年六月二十三日便爆發了中日戰爭。中山先生在獲知謀政治改革無望後，在是年十月創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檀香山，時正值清軍不敵，日軍陷旅順之時，兩者之間似不無相互交織的因緣關係。次年乙未，正月二十七日，與中會總機關成立於香港，時值日軍陷威海衞，滿清海軍被日軍殲滅。乙未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割臺灣予日本。中山先生領導的第一次革命行動亦正發生於乙未這一年。由於馬關條約，割據臺澎的簽訂，引起了臺灣同胞的反抗，奮起而拒絕日本依據條約來接收，於是便不得不訴諸於對日慘烈的戰爭。是年九月日軍陷臺灣，而第一次廣州起義亦適於九月九日發動。由於上述史實的演進，可知臺灣的割據予日本，一面激起了民族主義在臺灣的狂潮，暴露了滿清政府的積弱與腐敗。同時對中國革命勢力的成長不無具有催生的作用。據可信的史料，中山先生曾蒞止臺灣多次：一、庚子年惠州起義時期，二、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三、民國七年護法失敗之後。總之，都是在革命最艱難的階段，又多半是中山先生不容於國內外其他地方之時。這在研究歷史的人看來，的確是值得注視的一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環節，今日之臺灣，更成爲反共的堡壘，中國數億同胞希望之所寄的來，是有其歷史的脈絡可尋的。

中山先生庚子年（一九〇〇）所以選定臺灣來做革命事業的前進自然是對日人兒玉總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抱有獲得援助的希望，且隔，接濟和內渡均很方便。除此之外，興中會的革命組織，遠在丁酉被難後，經由美、加重抵日本之後，就已由陳少白先生打了一個基礎，也是原因之一。陳先生在其所著「興中會革命史要」中曾有詳細的記先生到臺早已作了舖路的工作。因爲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原是陳山先生聯絡和協助的亦是此人。此外，庚子年爲　中山先生效馳驅的中山先生第二次到臺灣，是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那時他以窘滬方面軍事無望，乘德國輪船離滬南下，本想由香港轉粵，繼續指揮討袁軍事。船抵福州，日本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往謁，言廣東方面軍事失敗，陳炯明逃往南洋，岑春煊又被香港政府扣留等等傳說，如果他到香港，必定十分危險。　中山先生初尚不信，多賀以所得電報證實，乃搭乘日輪信濃丸秘密到臺灣，然後再轉赴日本。他這次到臺已是十一月杪，由臺灣總督派員接待，行館爲臺北御成町梅蹟紀念館。由於日人警衞森嚴，知者不多，除在臺黨員翁俊明曾親謁請示和遊覽赤嵌樓、吳鳳廟、日月潭等名勝外，似乎沒有什麼活動。但據臺灣志士蔣渭水傳，在袁世凱稱帝後，曾密派同志數人組暗殺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赴北京謀袁，則是一個事實，不能說他們和興中會早期在臺灣的活動沒有關係。據謝東閔先生最近告訴我一段翁俊明先生對他面告一段故事說：翁先生是一位醫生，他激於義憤，特培養了幾瓶殺人的細菌，預備用以赴北京毒殺袁世凱。他以此意請示於　中山先生，先生問以將以何法而達到此一目的？翁先生說：預備以此毒置於北京的自來水水源內便可。　中山先生說：如此豈不害了北京無數的人民嗎？此法是萬不可行的。翁先生說：北京城裏，能飲自來水的人都是些達官貴人和革命的對象，把這些人毒死，並不值得顧慮。據說，翁先生本人曾親赴北京照他自己的計畫進行，但在他把毒菌施放之後，在北京停了一段時間，但袁世凱和他認爲那些達官貴人，並無一人被毒死消息，使他感覺非常失望！他於回到臺灣之後，曾把他培養殺人的細菌自己服下作一試驗，但並未發生若何的效果。他的毒菌既沒有毒殺敵人，亦沒有毒害他自己，可能他培養的毒菌並不高明，故未能發生作用。這一故事是否與蔣渭水傳中所說派人赴北京暗殺袁世凱事有關？其可靠性如何？則又有待考證了。

中山先生這次在臺灣勾留的時間很短，是年十二月初仍乘信濃丸離臺到日本神戶，在途中曾電日本友人犬養毅、頭山滿、萱野長知等請他們照料。當時袁世凱已通牒日本，請拒絕　中山先生上岸。日本內閣總理山本，本想討好袁氏，當信濃丸剛泊神戶，警察紛紛上船檢查，幸得船長善爲庇護，才沒有被警察發現。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日本友人爲援助　中山先生的義行。據日人古島一雄的記述：

「山本內閣對北京政府，不敢得罪，乃拒絕孫之亡命，神戶官憲奉命制止孫等登陸。犬養事後談及此事，曾謂：當時余以爲窮鳥入懷，獵者尤不忍殺之，孫於第一次革命成功後來日之際，到處歡迎若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今則竟拒其亡命，覆掌之間，冷暖如此，豈非卑鄙？正欲與政府交涉，勸其改善態度之際，不料頭山怒容滿面，排闥而入，見余卽高聲曰：『余覓死所不得，今始覓得！』余當詢其爲何遽作此言。渠謂：『余正欲前往神戶，與警察作殊死戰！』余始知原委，當告知切勿妄動，卽令玄洋社正氣動人，然人數實不及警察之多，縱令戰勝，孫文之能否上陸，亦未可知……。當時犬養卽召余前往，欲余往邀孫文。頭山在旁謂余『必須捨命爲人，後事余可全部負責！』頭山之意，蓋欲余萬一失敗，應與孫先生相抱投海，以示日人氣節。……」後來幾經犬養等人奔走，始獲山本內閣諒解，　中山先生得以上岸居留。

中山先生第三次到臺灣，是在民國七年六月辭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以後，由粵赴汕頭，由汕經臺北東渡日本。　中山先生由廣州到汕頭，曾至閩粵邊境的三河埧視察，其時總統　蔣先生亦正在軍中，特到江干迎接，見　中山先生形容憔悴，不覺悽感流淚，當時革命環境之惡劣可以想見。　中山先生這次到臺的原因似乎很少人提到過，近見戴季陶先生民國十六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灣青年的講詞，曾說到中山先生民國七年臺北之行的用意，戴先生說：

「民國七年我們的　總理孫中山先生因爲在廣東革命失敗，離開了廣州，第一步先到汕頭，然後經由臺灣轉赴日本。這時我們的　總理有一個計畫，就是到臺灣，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我們的　總理抵達臺灣的時候，臺灣同胞非常高興，很想要表示熱烈的歡迎，可是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拒絕　總理和臺灣同胞接近，所以　總理計劃在臺北和我們親愛的同胞見面，不但受了阻礙，　總理一抵達臺灣，臺灣總督府不許我們的　總理逗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用盡種種方法，要阻止　總理上陸和臺灣同胞見面的機會，臺灣同胞雖然十二分誠意要歡迎　總理，但受了日本政府阻撓，終於未能達成目的。臺灣的日本官憲派人到船中招待，並幫助我們隨時可以去日本的民眾和　總理會見，結果我們雖然上陸到了臺北，但日本官憲發表『總理，他們的意見是要阻止臺灣因急欲赴神戶，將乘明日開往神戶的輪船只逗留一天』的消息，催促我們離臺。由此我們可見日本如何急要離間我們的革命同志。」

讀了上面這段話，可知中山先生之所以要經由臺北到日本，除了順道之外，是有其重要的計畫與意義的。戴季陶先生在這篇演講中，還提到日人板垣退助在臺灣活動的經過。板垣先生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的始祖，他在晚年看見日本政府對臺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待遇，認爲是人道所不許，於是發起臺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制臺灣的法律，給臺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但板垣先生的努力沒有收到什麼成果，最後是被臺灣的日本政府趕走了。戴季陶先生說：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不僅不准臺灣的民眾和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接觸，並且對同情臺灣的日人，也不許他們留在臺灣。」

戴季陶先生在其所著「日本論」中，有一節論到板垣先生，他對板垣可說是推崇備至，他說：

「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指板垣）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志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復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的勢力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志士們，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只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夠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夠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爲民眾的幸福著力，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他拿起當時剛翻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地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段。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志，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卓也還是奉着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族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眾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那裏有這樣文明，這樣發達，眞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

板垣先生的晚年是十分令人同情的，戴季陶先生說：

「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裏去一回，感傷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原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會潦倒到如此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主主義的毛病，同時也出現了。在這時候，他還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着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作，第二件他不願作。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面，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個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隨政治生命以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

就一個社會革命的導師而言，進步後的社會對他的報償何其殘酷，但他最初本不爲社會的報償而行事，還有什麼報償能比一個進步的社會更具體更有價值呢？如果我們要在東方民族中找尋美國傑佛遜那樣的民權自由的先導，除了　中山先生以外，日本的板垣退助也可算得是那一類的偉人了。

民國七年，我曾在日本慶應大學就讀了一段時期，課餘常到慶大附近的芝公園遊覽，在芝公園裏立有一座板垣先生的銅像，每次去到公園我總愛在板垣先生的像前徘徊，緬懷他倡導日本民主自由運動的往蹟，不禁爲之唏噓感慨。經過五十年歲月遷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因代表國家出席亞洲區聯教組織的會議重到日本，在會議結束後，我特別找出時間去慶應大學一遊，同時也到慶大附近的芝公園遊賞，但徘尋不到昔日我常徘徊留戀的板垣先生銅像。初以爲也許是年代久了，我忘記了以前樹立銅像的地方，但總覺得我還不致如此健忘，我心想，我如果再有機會到日本去，一定要到芝公園去追尋出一個究竟。在兩年前，我因出席第九屆國際原子能大會再到日本，找遍了慶大附近的芝公園的每一角落，都尋不到板垣先生的銅像，我存著懷疑不解的心情詢問園裏的日本遊人，他們告訴我說，這園裏的確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個板垣的銅像，但他不清楚在什麼時候拆除了，也許是在戰爭時期，被軍閥們搬去熔鑄炮彈了，也說不定呢。我聽到他們這樣的解答，愈益感到悵然，如果眞如他們所說，那是如何的可悲呀！

在戴季陶先生這篇講詞中，亦曾說到　中山先生民國十四年逝世前對臺灣問題的意見，他說：「總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　總理談及了日本有關的二三重要事項，　總理說：我們對日本應該主張的問題，最少限度有二項，一是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使臺灣和高麗最低限度獲得自治。……」這是　中山先生逝世前對臺灣的遺言，他是臨死都不曾或忘被壓迫統制的臺灣同胞的。

中山先生逝世前所主張的廢除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今日臺灣經過八年的對日抗戰而重回祖國懷抱，　中山先生死而有知，當是如何的欣慰呢？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是臺灣光復的因，臺灣光復是中國革命的果。不幸的是，臺灣雖已光復，而中國大陸卻被共匪竊據，今日之臺灣，又成爲復國建國、完成革命的基地，以今日情勢來衡量，臺灣的光復和建設的進步，已爲復國建國種下了因，未來復國建國的完成，才是臺灣建設、進步的果。這一艱巨重大任務的完成，要由臺灣的不斷的建設，不斷的進步來完成！亦是我們當前應有的一項重大而堅定的認識和努力的方向！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新生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總理開國前夕對內政外交之決策

近代中國革命的發生，具有一項外交和內政交織而不可分解的背景和特質。由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的失敗，外患的日益加深，使中國陷於面臨著瓜分亡國的危險，於是迫使有識之士不得不奮起而作禦侮救亡圖存的運動；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不足以擔負此一救亡圖存的大任，便由自強和維新的改良運動，演變而成後期的推翻滿清專制，創建民國的國民革命運動。這一外交內政交織而成的複雜情勢，最顯著的表現在辛亥武昌起義後的國內外情勢上面。因此，爲了要應付當時的這一內外交熾的情勢以促進革命的成功，明智的決策與輕重緩急的因應，在當時是極爲微妙而困難的一項問題。

就外交方面而言：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時　總理正由美國的舊金山前往美國的東部，適於此日之次夕到達丹佛城。在他的自傳中曾有下列的記載：「武昌起義之次夕，予適行抵美國柯羅拉多省典華城（卽丹佛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香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後經仔細查證，當時到香港報告新軍必動的是居先生的代表呂天民先生。）時予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覆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覺飢，先至飯店用膳，道經迴廊報鋪，便購一報攜入飯堂閱看，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云：『武昌爲革命黨佔領』。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已爲之冰釋矣。乃擬電致克強，申說覆電延遲之由，及予以後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

照常理於得悉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總理本可停止東行，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回。爲何當革命黨人在國內拋頭顱、洒熱血之際，而他卻仍在國外稽延時日呢？其所以捨立卽返國而不爲者，實因其衡量全局，擇其最急而有更大貢獻於革命者而爲決定，個人利害毫未計及。革命軍既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衝國際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所以他先從外交入手，俟此問題解決，然後返國。

爲什麼要有這一決定呢？而此一決定在當時爲甚麼是十分重要呢？我們要明白此點的重要，必須先了解當時中國的處境。辛亥年正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之後十一年，在庚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國能倖免於瓜分已屬萬幸。自此之後，民族的自信心已漸趨喪失，每遇外交問題發生，無不談虎色變。因此，在革命初起的時候，最應顧慮者厥爲外交問題：誤解革命爲另一義和團事件，造成國內外對革命之恐怖，其可慮者一；召致列強之干涉，其可慮者二；迫使列強陰助滿清以對付革命，其可慮者三。凡此種種，在當時不僅有發生的可能，且在後來發現的若干事實，皆足以證明此種顧慮之必要。舉例言之，當革命軍佔領武昌之後，兩湖總督瑞澂，本擬逃往漢口租界，求援於各國領事，指革命軍爲義和團。當時俄、德兩國駐漢口領事，一聞拳匪之亂再作，竟有援助瑞澂以對付革命軍的主張。幸而當時駐漢口的法國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事羅氏，爲　總理的舊友，正任領事團首席領事，當各國領事召集會議商議共同行動時，羅氏力持正義云：「革命軍乃奉孫逸仙博士之命行動，孫氏所領導之革命，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拳匪可比。」於是各國乃宣告中立。瑞澂因不得外力之援助，遂逃往上海，革命軍遂得確實佔領武漢。此一事例雖然不是當日　總理在丹佛城途中事先所策劃，卻是由此可知當日發動革命，在外交上之利害，不能不以審愼之態度出之了。

武昌於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首義，二十一日克復漢口。三鎭底定之日，革命軍迅卽以中華民國政府湖北督署名義，採用同盟會革命方略所訂立的對外宣言七條，照會各國領事，承認各國在華利益，以安定各國之態度。照會中有下列七條之宣示：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二、賠償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三、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四、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五、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六、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七、各國如有救濟清政府，以可爲戰爭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上七條亦旨在通告各友邦，革命軍師以義動，絕不能與義和團並論。當時革命軍政府之不得不因應列強勢力，亦於此七條文字中見其端倪。

總理當日第二個決定是：他認爲在中國利益最大的有英、日、美、德、俄六個國家。在他分析這六個國家的利害關係所得的結論是：美、法兩國政府與人民對革命均有好感，不致妨害我們的革命；德、俄兩國當日之趨勢，多向於滿清政府；英國則因日英同盟關係，其民間同情革命，而政府之方針，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日本與中國關係最密，日本軍閥對中國侵略之野心尤爲可怕，其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且有爲革命而犧牲者，但是日本政府之方針，則爲反對革命者。欲轉移對我革命有切身成敗關係之日本政府對華方針，英國的爭取，便十分的重要，若英國同情革命，則日本也不足慮了。於是　總理便決定了暫不返國，直赴紐約乘船赴英，以英國爲其第一目標，作其外交活動。

關於日本政府與民間志士對辛亥革命之態度，據日人古島一雄事後的追述，當武昌起義之後，素來同情中國革命的犬養毅先生，便急切準備來華，當其動程以前，曾往訪日本外相內田康哉，探詢日本政府對華方針。犬養謂：「政府何以不欲中國實行共和政治？」內田的答覆是：「中國實行共和政體，日本勢將感覺萬分困難，故表反對。在日本立場，即施用武力，亦將維持中國之君主政體，此項方針，希轉告華南革命領袖。」日本政府當時竟有不惜施用武力以干涉中國革命主張，其理由究屬何在，可以從另一事例予以說明。古島一雄當時亦是隨犬養毅來華贊助革命之一人，在其動程之前，有一日本要人名叫都築馨六者告之：「目下世界已有美國爲共和國，如再聽任中國亦爲共和國，則被夾制在中間之日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帝國，其前途究將如何？希等善爲考慮。」原來日本政府當日此一對侵略中國，一在深恐中國共和政體建立以後，與共和政體之美國遙相呼府此一思想之根深蒂固，卒至造成後來之侵華戰爭與珍珠港事件，弄到法估計的。可是有一事實足以說明的，則是日本在辛亥時以武力干涉中田外相因迫於民間輿論之攻擊，與英國之對華政策舉棋未定，不得不在外交上所獲之成就，對於後來日本對華方針之改變究發生多大的影響，是無中國維持帝制之企圖，則反國革命之舉並未實現，而後來內日本議會聲明其並無以武力強迫

總理當日英國之行，在

總理在英國的另一重要奮鬥，關係辛亥革命成功的效果更大。即是當時滿清政府與英國爲首的四國銀行團，已有兩筆大借款，正接近交付與籌募的時候。一是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爲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軍的戰費，那將是對革命無比的重大打擊。　總理向英國政府交涉的結果，獲得了三項重大成就：「一是停止支付滿清一切借款；二是制止日本援助滿清；三是取銷英屬各地政府對　中山先生的放逐令。」辛亥革命之能迅速成功，　總理此一努力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事對革命軍作大規模的戰爭，同時更鼓勵了強財務與政治的支撐，來從大批同情滿清，醉心外援的人趨向於革命，更進而崇敬　總理在國際間的勢力。這一停止列強支付借款的成就，雖然予國內革命勢力的聲援極爲重大，但　總理深知這只是暫時的、消極的、不可靠的收穫。因爲在辛亥年以前，各個在中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重大利益的國家，對於中國的看法並不如何的重視。他們認爲中國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專制政體，以少數書生組成的革命黨，取得他們在中國最多利益的好機會，侵略別人的國家最有效的方法「分而治之」，便可發揮其妙用了。總理英國之行能有所成就，是由於當時列強正審愼觀望，方針未定時，偶然獲得的結果。過此，則情形便可能大不相同了。

武昌起義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大的轉變的造成：一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一是同年七月十五日(陽曆九月七日)成都市民向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請求總督趙爾豐釋放被他非法逮捕的保路同志會主要人物蒲英伯、羅綸、張瀾等，因而由和平的爭取鐵路商辦，被趙的衞隊開槍擊斃請願民眾數十人，導發爲遍及全川的民眾武裝革命運動。此一武裝革命運動發生在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後約五個月，早於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一個月又四天。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四川民眾武裝革命運動是辛亥武昌起義，建立中華民國的前奏，更是這一劃時代的歷史一項重大的成因。關於四川保路之役的歷史評價，黃克強先生和　總理曾有很正確的言論。黃克強先生在辛亥八月十二日(陽曆十月三日)，距武昌起義之前七日，由香港寫給上海中部同盟會的一封信中曾這樣說道：「邇者蜀中風雲激變，人心益憤，得公等一氣，更能力爭武漢。」又說：「自蜀事起，回念蜀中同志死事之烈，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已灰之心復燃，是以有電公等，求商響應之舉。」這說明四川民眾武裝革命運動是刺激武昌起義的一項力量，亦是武昌起義的前奏。後來　總理更確切的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緩一年半載。」這無疑的已經對四川保路運動有了很中肯的評價。在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其時的革命軍政府有一封致漢口各國領事館的照會，有云：「我軍政府自廣東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主權、人民而無土地故耳。今我既取得四川省之土地，國家之三要素於是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清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於武昌，共圖討賊，推倒專制政府，建立民國」云云。由這一照會可以看出四川辛亥的民眾武裝革命運動所給予武昌起義之鼓勵，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在此有一足以爲我們今日引爲警惕的事。當　總理在國外從事外交活動之際，他本人雖然不在國內從事革命的奮鬥，卻是他所予國內革命勢力的聲援則極爲浩大，這一種聲援與其說是實質的，毋寧說是形式的，或心理的。　總理在當時似乎業已看出了一個隱伏的重大危機，那就是一般人把革命的成敗都寄托在外國金錢與武器的援助，而沒有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建立在自身的奮鬥上面。當他初抵上海的時候，勿論是黨內黨外，沒有不以他此次回國帶有大批外國借款與金錢爲問，而他的答覆則乾脆而忠實：「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不達目的，誓不中止。」

關於內政方面：　總理在倫敦的外交活動獲得了成就以後，於是他便集中其注意力於國內的問題，迅卽由歐起程返回國內。辛亥年十月一日（陽曆十一月二十一日），　總理由歐洲啓程回國前，在他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軍政府電中說：「文已循途東歸，自美徂歐，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約甚固，惟彼邦人士，半未深悉內情，各省次第獨立，略致疑怪。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日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爲競點，爲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爲要領。」

從上面這一電文，可以看出有幾項重要問題在當時已經存在着，可知　總理後來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早已成竹在胸，並不是由於返國之後才倉猝決定的。

一、各國中立暫可無慮。

二、會商組織臨時政府之地點等問題，在國內有爭執。

三、對於組織政府人選有異見。

四、對於利用袁世凱以結束滿清統治已有成算。

五、總理願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已於電文中微示此意。

第一項關於外交方面，已見前文，關於第二、第三兩項，電文中雖未明顯指出，但以當時國內所發生的顯著事實，如：各省代表本擬在武漢集會籌商組織臨時政府，後來幾經周折乃改在上海舉行。當總理拍發此電文時，各省代表在上海會議之議似已決定。又如：南京攻下之後，在先各省代表推黃克強先生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因爲黃之堅辭乃改爲黎正黃副，並由黎通電由黃在南京以副元帥代理大元帥職權。黃之堅辭大元帥之原因，當然是因爲武漢方面發生了異議所致。凡此種種，在任何政治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況之下都難避免。然而這些事實，如不能爲適當之處置，皆足以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這是當日　總理在外交問題之外所面對的現實問題之一。

在此所當注意的是，此電拍發之時日，僅距武昌起義四十天，而在這一短促的時日中，由於各省的紛紛響應，大家已共同感覺到非迅卽成立臨時政府，不能適應外交內政的需要，而臨時政府組織之後，第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則爲臨時大總統的人選問題。在這一電文中，很顯然的可以看出國內舉黎元洪爲總統的呼聲甚高，故　總理乃有「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之語，同時國內已有以總統之位誘致袁世凱，以推翻滿清組織之醞釀，故　總理電文中已提及之。當然在這一時期內主張選舉　總理爲臨時大總統者更不乏人，故電文中有「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之語，這是　總理當日面對現實問題之二。

在當時革命本身的複雜情形，在電文中雖未提及，可是事實上已普遍存在。如章太炎先生，在同盟會時代受人利用，對　總理發生誤解，在此時期又造爲「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口號，同時對於臨時大總統人選，又倡爲「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衞」等說，暗中抵制　總理。因爲他學問頗負時望，其一言一動均可發生影響。而當時聲名洋溢，爲黨內外倚重之黃克強先生，因爲生性純厚，多集中精力於行動方面，故對於近代之學識素養不深，因之缺乏遠大之識見。當其在辛亥革命初期，各方人才奔競活躍之際，使他對外頓呈一種學識上的自卑感，每晤黨外略負時望之人，自以爲不如，對於黨內同志的看法，認爲只能破壞，不能建設，於是一些所謂社會賢達之流，及原爲君憲派素與革命爲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楊度、湯化龍、林長民輩，也以克強先生爲庇護，而頓成爲當時之風雲人物。凡此種種，皆足以說明那時革命黨本身的複雜與脆弱情形。組織未夠堅強，基本武力尚未建立，社會的基礎及人才的配備，因成功太速事前均未妥善籌劃，所以一至政治軍事局面驟然展開，大有手忙足亂，張皇失措之勢，所以總理才有「此後社會當以工商業爲競點，爲新中國開一新局面」之動機。他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結束滿清統治，以奠立民國之始基，再爲深久之打算，以適應當時內外情勢迫切的需要，此爲　總理面對現實問題之三。

爲了更深一層了解上述的現實問題之外，　總理在由歐返國路經香港時與胡漢民先生的一段談話，言之更爲懇切動人，足資引證，由於　總理當日明智與堅定的態度，他雖未返抵上海與各位同志接觸，而解決當日時局的政治決策，實早已成竹在胸。方其時廣東已光復，胡漢民先生被選爲廣東都督，特與廖仲愷先生由廣州至香港迎接。胡先生於晤見　總理之後，屏人熟議，由晨至晚，爭議始決。胡先生力勸　總理放棄上海之行，以廣東爲根據，先鞏固基礎，再謀發展。據胡漢先生自述：　總理立指此說之不當，反要胡先生與之相偕赴滬寧勸贊大計。結果胡先生爲其遠大之識見所折服，未及一返廣州結束都督職務，即隨同　總理同船赴上海。

胡先生力主鞏固基礎，再謀發展的理由是：「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但所恃亦祇數萬兵力。此種勢力不掃除，即革命無由徹底，此其一；革命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則破壞建設兩無可言，此其二；先生一至滬寧，眾情所屬，必被擁戴，幕府當在南京，而兵無可用，何以直搗黃龍？此其三；且以選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之事觀之，則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虛設，此其四。」因此胡先生的結論是：「何如留粵，就粵中各軍整理，可立得精兵數萬，鼓行而前，始有勝算。盡北洋數鎮兵力，未能摧毀東南，而吾事已濟，以實力廓清強敵，乃成南北統一之局。滬寧相較，事正相反，若務虛聲，且貽後悔。」

總理說：「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衝而退就粵中，以修備戰，此爲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這是　總理不主張留粵的第一個理由。

「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這是　總理的第二個理由。

「鄂既稍萌歧趨，寧復有內部之糾紛，以之委敵，所謂趙擧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擧兵以圖恢復，豈云得計？」這是　總理的第三個理由。

「朱明末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這是　總理的第四個理由。

關於袁世凱，　總理更有如下之看法：「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然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這是　總理的第五個理由。

假如袁世凱將來不可靠又如何呢？　總理認爲這是不足畏的，所以他接著說：「縱其欲繼滿清以爲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及昔，覆之自易。」

袁世凱既不可信賴，爲何　總理要如此借重他呢？這豈不是有意造成辛亥革命之不徹底局面嗎？

總理的目的究竟安在呢？我想這是他對當日政治環境而爲決策的一個重點，那就是說，他唯一目的是在迅卽結束滿清二百六十餘年的統治，先行奠立民國的始基再及其他。先行結束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制政府，縱使有其他的專制勢力繼起爲害民國，然以其基礎已不存在，皆不難予以摧毀。　總理這一政略的用意正如要拔去一株大樹一樣，必先用力搖鬆他，然後才可一推而倒，不如此要拔去一株大樹是不可能的。因此，先謀滿清二百多年專制政體之結束，是當時　總理最重要急切的目標。

總理與胡先生這一場爭論，最後的結論是：「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勝任。」胡先生被　總理這一宏論遠識所折服，最後乃犧牲己見，服從　總理主張，欣然同船赴滬。廖仲愷先生後來回到廣州，同志中多有責難，說他既不能留　總理在粵，同時又不能阻止漢民先生隨行赴滬，使廣東一時幾陷於主持無人，不得已乃以副都督陳炯明代理都督職務勉維現狀。廖先生於事後追述在香港爭論時情形，曾說：「當爭論時，不能贊一詞，及既已決定如此，惟有奉命而返。」由此可見　總理當時持論之堅定，與推斷之明智，及其使人折服的情形了。

辛亥革命在內政方面是一次不徹底的結局，造成此一結局的主要因素則不是內政而是外交，這是往往被人忽視的一點。　總理在過香港時與胡漢民先生的爭辯，有一特別值得注意的重點，即爲當時他對於外交上所存的隱憂與考慮。我想胡先生之被　總理所折服，亦當以外交之情勢爲最大的關鍵。因爲胡先生所觀察者不可謂不謹嚴而深刻，然其出發點僅就國內之情勢而爲決斷。　總理則不然，他以國際之情勢與國內之環境爲全盤之衡量，結果基於對國際環境之隱憂與顧慮，便不得不在國內作一圓滿段落之結束，能如此，便是革命之一進步了。　總理當時曾以其時國際情勢的看法密語胡先生說：「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爲計，故祇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而當時國內情勢，漢口、漢陽已被清兵佔領，幸同時有上海之光復與南京之穩定，然而革命初起之時，隨時可能有召致頓挫之虞，因此列強對我之態度，也隨時有捨中立而助滿清之危險，此一事實最足借鑑。何以呢？因爲辛亥之時國因外人之助滿清而失敗，此總理所慮者全在於此。太平天勢猖狂之時，未有以殖民主義之侵略觀點，而可以聽任中國革命之順利成功，尚是以英國爲首的殖民主義得逞，以與殖民主義爲敵之理！

上面這些陳述，是在說明　總理對於當時各項問題之處理，早已成竹在胸，並非回國之後受了外界壓迫才有的舉措。卽如大家認爲辛亥革命最大的失敗，在於他放棄大總統而不爲，願退而在野從事全國交通的發展，乃於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之後，立卽向參議院推薦其爲總統候選人等等，都是在回國之前早有考慮的。至於　總理何以事先有這些考慮？這些考慮的重點和背景究竟何在？在他與胡漢民先生的爭辯中，已經辨別得十分深透。總括一句話，乃爲了適應當時外交、內政及革命黨本身等諸多問題而作的全盤衡量所得出的結論和決策。

——錄自「中央半月刊」第三六一期，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按：另有「辛亥時國際環境與今日」、「總理辛亥時之政治決策」「勢之比較」、「國父在辛亥革命時的外交決策」及「偉大的的外交與內政決策」等文，內容相近，不再重複收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民主典例與民主憲政

## （一）

有名的政治學家畢爾德教授 Charles A. Beard 曾有這樣的幾句名言：「議會的典例，對於國家政治行爲的影響，常較憲法所發生的效力爲大。」在粗枝大葉研究近代西方民主社會的人們往往聽了這句話時並不覺得其重要，而在眞正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眞諦的人，從他們的經驗體認上，才知道畢爾德教授這一名言之不虛。爲甚麼呢？所謂近代國家的憲法，很少不是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民主的涵義，是指國民爲國家統治權之所由出，勿論其實行的方法爲直接的民權，或間接的民權，都不能離開此一根本原則的，反之，便無民主憲政之可言了。人民要如何才能充分做到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使無背於人民主權的原則，不是單靠制定的成文的若干憲法條款，所能爲力的；而是要靠一個國家的國民有一民主生活習慣和表達民主的規律與程序的養成。畢爾德教授所說的議會的典例，常較憲法所發生的效力爲大，其所指的內容，便是在此。

民國四十九年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在臺召開，修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條款第六條規定：動員戡亂時期，國民大會得制定辦法，創制中央法律原則與複決中央法律，不受憲法第二十七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二項之限制。當時我想，國民大會既已不受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限制，則今日之國民大會實已具有制定辦法，創制中央法律原則之權。而此一創制中央法律原則之權，究應如何行使方與立法院之立法權在範圍上有所區別，則是值得重視的一項問題。最近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第一委員會諸先生，正從事「議事法」的研討和創制，並擬以民國四十三年內政部公布試行的「會議規範」爲基礎，予以修訂與補充。在我看來，國民大會要行使創制中央法律原則之權，再也找不出比制定「議事法」更爲適當而迫切了。因爲「議事法」不僅是政治建設的根本大法，更是推行民主憲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

## （二）

「議事法」這一名辭西方社會稱之爲 Parliamentary Law，亦卽畢爾德所說的議會典例。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手著的實行民權，表達民主的「民權初步」一書的涵義，其立意亦在乎此。議事法或議學在實行民權上的重要，裏曾經說道：

「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羣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登彼於民國主人之地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也。……夫議事之學，西人童而習之，至中學程度，則已成爲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羣團體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

政治學家李樸Francis Lieber與　中山先生所持的意見正同，他在「自由與自治」一書上曾說：

「英、美兩國的人民，自幼以至成人，就習知議會規程與習慣，且在學校中就開始實行。他們大部份時間受議會規程與習慣的陶冶，許多事在他們看來極爲自然或不值得加以思慮的，實際上是經過數百年的積染才能達到這個地步。凡關於演說辯論的規程與習慣，都是自由本身的重要原素，此規定與習慣，吾人認爲是自由的保障之一種，所以吾人較前人爲進步就在於此。」

從上面　中山先生和李樸先生的話，可以得出他們二人有一共同的意見，那便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實施有賴於一套「童而習之已成爲第二天性」的表達民主的法則、成例和習慣。李樸先生更認此爲是「自由的保障之一種」，由此可知議事法的創制，和　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首先寫著「民權初步」一書，在建設民權，實行憲政意義的重要了。在前面所引　中山先生「民權初步」的序文有一特別應加以注意之點，則是他認爲發達民權，必須自「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如何才能使人心固結，羣力結合，那便是「民權初步」所要發揮的功能。爲甚麼呢？因爲他認爲「烏合之眾」是不能實現民權的。所以他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解釋民權的涵義說：「民」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權」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在有團體，有組織的反面，便是烏合之眾，烏合之眾，是不能發揮人民政治的力量的，因此，「民權初步」一書的功能，第一是由此而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結人心，糾合羣力，成爲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第二是由此而發達民權，建立人民的政治力量。我們細察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兩點成就上面，所以便能行之有效。

中山先生在同一敍言中曾說：「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一盤散沙便是烏合之眾的意義，所以我們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幾千來的專制政權，卻不能於專制推翻之後，建立眞正人民的力量，實行民權，便是這個道理。爲甚麼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呢？ 中山先生在同一序言中又說：「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用現在的話來說，一個沒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思想自由的社會，焉得不成爲一盤散沙之理，民權自無由發達了！要打破這些束縛人民自由的枷鎖，便非建立人民的政治力量不可，要有效建立人民的政治力量，便非充分實踐熟練「民權初步」一套表達民權的方法不可。我想， 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所著的第一部書便是「民權初步」，其目的在此。他在同一序言中又說：「凡欲負國民之責任者，不可不習此書；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於國民，使成爲一普通之常識。家族也，社會也，學堂也，農團也，工黨也，商會也，公司也，國會也，省會也，縣會也，國務會議也，軍事會議也，皆當以此爲法則。」

「民權初步」是國父遺教中最被忽略的部分，亦是民主憲政在中國不易建立基礎，而召致困難的最大原因之一。古人有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因此我認爲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擬議中要創制議事法，爲民主憲政樹立鞏固之基礎的努力，是一項追求本源，改正以往闕失，最值得敬佩的一件事！

民國四十三年內政部公布的「會議規範」，是根據 國父「民權初步」，而把他條文化和簡單化，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便於實用時可以作爲依據與引證而已。當會議規範草訂之時，我正服務內政部，此一工作是我當時重要的施政方針之一，我是親身參與此一工作的主持人，我對於此案的研究、草訂和公布試行，皆始終其事。因此我對於草訂的經過，所歷的艱辛，所遭遇的問題都有深切的體驗，對「民權初步」一書名的由來，亦曾加過一番精密的考證，雖事隔多年，至今仍記憶猶新。我在此願就我所知的，坦率提出若干我的經驗，以供憲政研討委員會第一委員會諸先生於研究創制「議事法」這一偉大努力的一項參考。

## （三）

在我敍述草訂會議規範的經過及所歷的艱辛之前，我首先要把我到內政部後，爲何要以草訂會議規範列爲主要工作之一，鋘而不捨地要去完成這一工作的原因加以說明。其遠因發生在我幼年的學生時代，容後再說。其近因由於下述兩事：

一是民國四十一年春，在一次圓山軍官訓練團的紀念週上，曾經聽到總統　蔣先生民國二十八年在重慶講述的「三民主義的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書，由一學員向眾朗誦，其中有一段闡述社會建設的涵義說：

「社會建設，實際就是具體而微的政治建設。條目上和政治建設大同而小異，而所不同者，其範圍更切近民眾，功效更着重於基層，所以社會建設，當以　總理的『民權初步』作軌範，……『民權初步』是專講集會議事種種法則的典範，其直接的目的，在使一般國民，能夠熟諳這些法則，以習練初步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權的運用，其間接目的，則在藉此養成一般國民重秩序、守紀律、有組織的習慣，從而增強民力，造成有組織的現代化社會。」

我聽到上面這段話之後，心中頓然起了一種感覺。我這樣自己問自己：「民權初步」既然是政治的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基礎，爲什麼四十多年前，總理倡之於前，蔣先生又於十幾年前闡之於後，何以迄至現在我們仍未能推行盡利呢？

一是在一次偶然的場合和蔣夢麟先生談到「民權初步」這本書的問題，夢麟先生告訴我一件關於中山先生與此書有關的一件故事。他說：「大約在辛亥年武昌起義前不久，總理正在美國舊金山從事革命活動，那時我也在舊金山。一日，總理和我及劉成禺同志三人在一起，總理忽然對我兩人說：『有一件事關係今後我國革命建國的成敗甚爲重大，這是西洋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我們必須把握著這一套學問經驗，我們革命建國才能成功。』總理一面說，一面在他衣袋中取出一本書交給我，要我和劉成禺同志把他翻譯成中文，以便印發推行。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羅伯特 Robert所寫的『議事之法則與秩序』(Parliamentary Rules and Order) 一書。當時總理的表情，十分重視此書，而我們卻因未嘗注意此一問題如是的重要，總理既然要我們翻譯此書，也就只好唯唯答應。其後因爲事情的牽累，終不曾把此書譯成中文，這實在是一個遺憾！」

夢麟先生繼續着又說：「大約在民國六年左右我在上海晉謁總理，他忽然又把這件事問我，他說：『我請你翻譯那本議學的書，已經譯好沒有？』我對他說：『因爲沒有時間，而又非當前之急，所以至

今尚沒有着手。』　總理忽又說道：『我早知你們不會太重視此事，我已經編好一本在此。』他一面說，一面順手從書桌的抽屜內取出一本繕就的稿本，這便是他手著的『民權初步』。此書出版之後，　總理還給我一本。」夢麟先生說到此處，不勝其感慨。

夢麟先生所說的故事，可以看出　總理是怎樣的重視「民權初步」一書，正如　總理在序文中所說：「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瀏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瀏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嚼臘，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以全然領略矣！」細考「民權初步」未能順利推行的原因，的確是由於我們未能把他作爲實用演習，以盡其妙用。因爲難作具體條規之引用，故不易普遍推行盡利。正如有闡明議學原理之書，而難作具體條規之引用，而沒有施行法一樣，在遭遇議事之困難時，便不易獲得一正確之準則以解決問題。

根據以上兩種理由，我認定爲了補救這些以往的缺點，實在有把「民權初步」各項原則具體變作條文、使其具有法規之效力的必要。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我奉命接長內政部，我認爲這是我實現上述主張的最好機會，於是我把草訂會議規範列爲我內政建設重要方針之一，這便是關於此事的由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四）

我在此打算把會議規範從研究、起草和公布試行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之多先爲一提。天下事如果你不理睬他，便無問題，如果要理睬他，便處處都是困難重重，問題像連鎖反應似的不斷發生，使得從事工作的人們有時心灰意冷，欲罷不能，有時又柳暗花明，使人興奮，我曾參加過不少次數的國家重要法案研究和起草的工作，再沒有比研討會議規範時所遭遇的困難之多，麻煩之大了！原因是：說起來人人都懂，人人都是專家，而在具體付之決定時又覺得處處都是漏洞，必須從頭加以探討解決。後來總算歷盡艱辛，纔完成初稿，定案公布試行。當問題當前，不能解決，工作朋友們興趣索然，意態消沉，預備放棄時，只得把中、西名人勉勵人事的話：「不要灰心，如果灰心的話，請你仍繼續工作」，「天無絕人之路，有志者事竟成」來勉勵大家。到了萬分不能前進時，有時亦只得暫停一段時間，待至興趣恢復，大家又聚在一塊重整旗鼓，工作起來。這種情形，經過了不知有多少次數，現在回憶起來，眞是又辛酸，又甜蜜！

中山先生曾言：自西學之東來也，玄妙如宗教、哲學；奧衍如天、算、理、化；資治如政治、經濟；實用如農、工、商、兵；博雅如歷史、文藝，無不各有專書；而獨於淺近需要之議學，則尚闕如，誠爲吾國人羣社會之一大缺憾也。當大家面對困難，興趣索然之時，我常又引此段話以勉勵大家，以說明此一工作之重要。如果我們因困難而中止，那麼，　中山先生於寫著此書時，其困難又豈能計量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所以特別重視寫作「民權初步」這一部書，其用意基礎不奠立，正所謂「不求其本而求其末也」。總結一切困難之所在，半皆由於吾人不習慣此一套西方民主常規所致。由於不習慣與不知，於中山先生發達民權，建設民主，一項最重要的遺教，便被忽視，及今不圖，尚有何內政建設之可言？且要尋求困難加以解決，以行有效。因此，我們決定下面兩項原則在起草條規時，對「民權初步」的原意，而立爲各項實施條款。乙案是採用聯合國及其他把他分爲甲、乙兩案，甲案是照「民權初步」國際會議目前通行的條規和成例，以期其更能適合當前的需要。因爲在此時期距「民權初步」出版已快四十年，世界各國對於議事的法則已有不少的變遷和發展，新的成例可資參考者甚多。

第一，我們在修正案內加以補充。

第二，調查和研究現在我國各項開會議事不良積習，尋求其癥結所在，研究其改正辦法，訂爲條規以作補救。

關於採用聯合國處理修正案各條款，我在此不擬加以提出，我現在時弊積習所增列的各條款，而爲「民權初步」所未涉及的部分。屬於此類條款，在會議規範中最值得尋味的有下列三條：

壹、專　論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九條　來賓演講及介紹。開會時來賓演講應以事先特約者爲限，並以一人爲當，演講題目，得先行約定，並通知各出席人，或公告之，毋須一一演講，以免浪費時間，但如有必要，得由主席向會眾對來賓作簡要介紹，以示崇敬及謝意。

爲甚麼要有這條規定呢？說來話長，亦很輕鬆有趣，雖則看起來很簡單，實則是我國集會議事中積習最深，最使羣體活動中，令人索然寡味，使人們感覺參加會議是一項負擔而頭痛的原因之所在。在民國四十一、二年之間，我曾因參加過不少次的集會，我把我所得的此項經驗作了一項統計，而制訂了這一條規。在當時每一較大的集會中，免不了有來賓演講及長官訓話這一項目，而所謂來賓或長官都是較有地位的人，主席請了一位來賓或長官致辭之後，其他同地位身份的人，如果主席不請他致辭，將視爲是一種侮辱和不敬。因此，無形中開會成了聆聽要人們「聯合公演」的大會，由於時間浪費得過多，往往到了討論重要議題時，既沒有充分時間從事，不是把重要的議事草草了事，便是使會場的出席人紛紛離去，即使尚有勉強留在會場的，人數亦寥寥無幾，氣悶苦坐，十分無聊，於是把開會議事視爲畏途，因此開會議事之意義盡失，羣體活動便成了具文。名政治家白芝浩先生論英國的民主政治是「以議爲政的政治」那句話，中國人似乎並不感覺到興趣！在中國只有官式聽訓的集會，以此，固結人心，糾合羣力，發達民權諸端，便無從呈露出一種朝氣蓬勃之象！我曾幾次看到貴賓中因久不輪到他致辭，憤而匆匆離開會場，使主席感覺到十分的困擾。因此才有這一「來賓演講，應以事先約定爲限，並以一人爲當」的規定。此條制定以後，近年來，似乎已漸爲社會所採用，時間的浪費已不若以前之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過，連環式和疲勞轟炸式的要人演講，雖然已不多見，但是特約專家作專題講演，以增會眾的知識和興趣，似乎尚未普遍推行。至於對出席眾多之要人貴賓，由主席向會眾簡單介紹，由會眾報之以掌聲，以示崇敬一節，推行的時候，大爲此類貴賓所歡迎，當會議主席的人，困擾亦因之減輕了不少。

第十條　致敬及慰問。凡以會議名義，對個人或團體致敬及慰問，應經動議及表決，於會議後以簡要文字表達之。

致敬及慰問一項節目，已成爲自由中國集會不可或少的大會事件之一，其辦法是由主持會務的人，預先準備一份致敬式或慰問式的文稿，在大會時宣讀，交付討論，由大會通過發出。由於已成爲照例的形式，其莊嚴肅穆的意義，積久已漸失去。更加以電文是一長篇大論的文章。其中偶有文字欠斟酌的部分，在宣讀交付討論時，會眾雖明知其不當，亦不便提議改正。原因是人數眾多，不是討論文字的場合，更加以所致敬及慰問的對象，不是功勳卓著的人物，便是萬流景仰，地位崇高的領袖，如果要加以文字的修正，往往又怕誤會是反對與不敬了。因此，這類事只得敷衍從事，任其通過，致敬的原義，反而爲之失去其尊嚴了。假使照此條的規定，由大會嚴正的提議說：「某某先生功在國家，應請由大會決議致電致敬」，經大會以全體起立之表示通過，於會後用大會名義，以簡單文字表達發出，豈不更爲莊嚴鄭重而熱烈嗎？如此，既熱烈，又簡單，可以避免討論致敬電文有不敬之誤會，便可使會眾不致覺得其個人尊嚴有被損傷之感！

第二十五條　聲明發言性質。出席人取得發言地位後，須首先聲明其發言性質，對在場之問題，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贊成，爲反對，或爲其他之有關動議。

我們在草訂這一條文時，是基於發現一般會眾發言，往往是先從反面或示他自己對於某一問題之態度，爲贊成或反對。譬如：一般發言習慣，本是要成贊某一提案，因爲要表示自己的公正，往往先把別人的主張加以批評，然後才指出此案的優點和重是要反對某一提案，或某一意見，因爲要使對方不起反感，必先來一番稱贊恭維，然後才表示出他不得不反對的態度和苦心。這種無味、閃爍、面面都圓的發言，既耽誤時間，又易使人不得其發言的要領。最感覺困擾的是會議主席，因爲主席在同時有兩人以上請求取得發言地位的場合，如果在此以前發言的是反對的一方發言表示主張，那麼，主席便應當承認反對一方有優先取得發言地位的機會；如果是贊成的一方，照習慣主席應當優先承認贊成的一方，取得發言的機會了。因此出先聲明其發言的性質，對在場之有關的動議，主席便不易裁決，誰應當取得優先發言的地位了。這是此條立案的精神之所在。

我在此要轉述戴季陶先生生前告訴我一個「革命在後頭」的故事，以說明發言不先聲明發言性質，而遭受了一場毒打的經過。戴先生說：

「清末革命同盟會在東京舉行一次大會，到會的有一千左右的革命黨人，正當羣情激昂，革命情緒發展到了高潮的時候，有一位學問很好的革命同志受了羣眾熱情的暗示，隨即登臺發言。他的本意是要闡揚革命的眞理來博取會眾的共鳴，而他在說話時的安排則是從反面文章做起，打算最後才把革命的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理襯托出來。所以他講話的一段便先指出如何不該革命的一套假設。不料當時與會熱血沸騰的會眾，聽了他的話感覺得刺耳，頓時忍耐不住，鼓躁起來，起初滿場報之以『噓』聲，他尚不知停止，繼續說下去，繼則報之以『打』聲，他依然往下說，最後會場中忽然跳出幾個好漢，往講臺衝去，抓住他的衣領，拉着他的髮辮，拳打，腳踢，邊打，邊罵，叫他滾下去，罵他是反革命，是漢奸。……此時。他才知道會眾誤會了他的眞意，自己受了寃枉，在無可奈何中只得大聲呼喊道：

『革命在後頭！革命在後頭！』

他這樣大聲的嘶叫，頓起了滿場的轟笑，才知道這是出於一種誤會！然而由於他的革命眞理尚未說出，卻已先飽受一頓毒打了！」

## （五）

上面所提出的三條，完全是爲了針對中國開會議事最顯著而普遍的積弊而訂定，可以說在民主較有經驗的社會很少會見到這種現象，如果說這些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並不爲太過。看起來，好像是些細微末節，不值得重視，卻是在民主與羣體的活動上這些積習不知帶來了多大的陰影和損傷！

會議規範的條款共一百條，其中除了第四十八條採用聯合國修正案之「乙式」，和增列上述的第九條、第十條和第二十五條外，其他都是根據民權初步所涉及的部分，而把它訂定爲具體的條文。不過，在訂定爲條文之前，仍特別注重在民權初步所闡述的原理法則，在中國施行的情形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何，更尋求何以不能行之有效的諸多癥結之所在，而在條文的內容和安排上，加以補救，以期適用。困擾麻煩的工作當以這一部分爲最吃力。邱昌渭先生曾根據民權初步的觀點指出：中國現在的一切會議，包括最高民意機關的會議在內，沒有一次是合乎集會的原則與習慣的。

一、動議不按其性質的優先地位，而以其提出的先後爲討論的次序。

二、發言者不就「討論之秩序」發表意見，而主席不予糾正制止。

三、主席不按照「討論之秩序」付表決，而自作「歸納」與「結論」。

四、何項動議須經辯論，才付表決；何項動議，不須辯論即作決定，主席從不分別處理，以致發言者爭先恐後。本來三數分鐘即可處理的問題，往往三幾個鐘頭尚無結果。

五、表決時，主席不「兩面俱呈」，把正反兩面的意見顯示出來，而另有所謂反表決的辦法。

邱昌渭先生所提的上述五種意見，只是把浮在表面的幾種現象作進一步的探討。他還沒有發現尚有若干現存的積習，已經把民主的基本原則否定，不但未加改正，反而正在滋蔓發展之中！就效率來講，民主不一定便是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世界的潮流所趨，小之如一個普通的社團，大之如國家的議會，人是構成一個團體和國家的主人，是國家和團體的主體，是構成此一團體和國家一切權力的源泉，否定了這一原則，便一切無從說起了。我把「民權初步」所闡述的原理法則，稱之爲民主的常規，所謂民主的常規，便是表達實踐人民是團體和國家的主人這一前題的工具和運用。從民主政治的演進來說，民主的制度和運用民主的常規，雖然人們經過了無限的努力和改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進，甚至在於某一時期或某一情況之下，表示失望，但迄至今日民主的原則是人們不斷追求中之一理想，運用民主的常規，亦隨此目標，反益顯出其重要了。兩者是相互依存爲用，缺了一項便不能推行盡利。

在議事的程序中，從提案、討論、修正到表決，主要目的是在：（一）集思廣益，化異爲同，融個體於羣體，使各方不同的見解，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之上，相互尊重，交換意見，增進了解，貢獻智慧，以達成和諧合作的境地，亦卽　中山先生所謂固結人心，糾合羣力的目標。（二）民主政治是「多數爲決定的政治」（Rule of the Majority），如何才能尋求出多數？那麼表決便是實現此一目標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項程序了。選舉官吏，以執行國家職務，選舉議員，以代表人民參與政事，凡此都是屬於表決的一項形式，不如此，便不能尋出多數，而爲決定。因此，表決是民主實施上一項最重要的環節，行之不具誠意，運用有欠週到，表決便成爲一套虛僞的民主了。在我看來，我國開會議事不良的積習，除了討論、發言、修正諸端之外，其積弊最深，再沒有比表決之運用更爲可怕，更不合於民主常規的了。

民主的「多數決制」這一基本原則，所謂的「多數」，不是機械式湊人羣暴寡的多數，而是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經過充分的辯論、修正和表決而得出的多數，所以沒有完備的表決的程序，便沒有正確的多數。更進一步的講，民主多數決制的基本精神，是經過了少數或不同意見者所同意而得出的多數。更進一程序而得出的多數，於是才產生另一「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重要原則。換言之，少數應當服從多數，是基於少數曾被尊重而建立是「服從多數」的條件，亦無不可。爲甚麼呢？因爲近代民主國家，關項重大的法案，有一重大的精神，這一精神便是保障少數，或尊重少數在主張的一方，固然有充分的權利，爲維護他自己的主張而發言，同時示其主張的權利，甚至在贊成與反對兩方同時要求取得發言的地位時，發言時，持反對意見的一方，往往優先取得發言的機會。在議學上所謂一之和，或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而言，在某些性質重大的法案且特別說某一法案通過規定爲必須在三分之二以上，那麼，只要反對方面有三可以把這一法案的通過擱置起來，使其無法達到目的。照此來說，所謂數決制」了。爲甚麼要如此呢？便是民主社會「尊重少數」、「保障少情形之下，雖然主張的一方取得了數量的多數，如果他對持反意見的少讓步與合作，只憑多數亦不能暢所欲爲的了。所以說：民主多數決制的的多數，而不是強凌弱，眾暴寡的多數，更不是機械式數字上計算的多個人於羣體的多數」，一經決議，便成爲團體整體的意見，可以達到「所謂民權的發達和會議的功能，是在固結人心，糾合羣力，便是指的這W. Willoughby）曾有這樣的話：「任何一個團體之合法決議，便須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爲贊成，何人原爲反對。」依議事法則所達成之決議，實已融化贊成與反對而爲一體，所謂「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到了此一境界便成爲無可非議的守則了。

## （六）

從上面一些民主的基本原則，使我們可以了解，或看出，這些在中國通行的一些會議積習，已把它湮沒起來，使之不能發揮民主的力量和民主的團結的功能。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可以歸納爲四點：第一，表決不依議事常規，只就贊成的一面而爲顯示，違反「民權初步」表決必須贊成與反對兩面俱呈的原則。第二，錯用「無異議通過」。第三，以主席的結論作決定。第四，忽視議事秩序和民主的紀律。

現在讓我就上述第一款說明，何以表決必須正、反兩面俱呈的道理。

表決的目的是在發現多數與少數、贊成與反對，因此，表決必須要「兩面俱呈」。甚麼是兩面俱呈呢？就是在表決上不僅要知道贊成的多與少，而且要知道反對的多與少。在使用唱名的表決方法時，棄權的多與少也必須要知道，因爲棄權也是一個權，故必須要尋求出來。在表決時只是徵詢贊成者的意見，而不徵詢反對者的意見，是違反民主常規的。會議的主席必須要「贊成的請舉手」，然後再說「反對者請舉手」，在這樣的表示之後，然後才能知道贊成的若干、反對的若干、棄權的若干，而以多數爲決定。這叫做兩面俱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關於兩面俱呈在民主常規上的重要，我們可以引用　國父在「民權初步」第六十九節所說，然後再分別說明其理由。六十九節說：「表決必兩面俱呈，而主席又宣布其結果，乃云決定。若祇呈可決，而未呈否決，或兩面皆已呈，而主席不宣布結果，不得謂之完妥，不能產生合法之效力也。其無經驗之主席，常忽略之而呈表決如下：諸君之贊成者請曰『可』，諸君之反對者請曰『否』而已，隨而忽略於宣布其結果，此皆謂之不合法也。其合法之表決如下：一、主席呈問可決者，二、可決者應之，三、主席呈問否決者，四、否決者應之，五、主席宣布其結果。」

我們在前面說過，民主常規是要「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如果在表決時只問贊成者的意見，而不問反對者的意見，如何能確實知道甚麼是多數？甚麼是少數呢？如此表決的方法其內容必陷於含糊，民主政治多數決制的基本原則便弄到不清不楚，豈能發生出眞正的效力？舉一個例來說明：假定一個會議出席人數爲一百人，如果在表決一項問題時，主席僅說「贊成者請舉手」，而不繼續說「反對者請舉手」，如果舉手贊成的三十人，主席便宣布是少數，沒有通過。在這一情形之下，凡是不舉手的都是反對的了。在事實上這完全是錯誤的。假如主席在此情形之下，用兩面俱呈的表決說：「反對者請舉手」，而舉手的僅有十五人，那麼，三十個人便不能算是少數了。在表決人數沒有特別規定必須要在過半數的場合，三十人亦可算是多數，可以認爲通過。在表決的人數的計算上，本來有兩個標準：一是以比較多數通過的人數Plurality，一個是特定的過半數以上爲通過的人數 Majority，在沒有特別規定過半數爲通過的人數時，比較多數的原則便可應用，這是表決必要兩面俱呈的理由之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ça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要承認差異，允許反對者表示意見。因爲表決乃是給贊成與反對者以表示意見的一種行爲，未經過表示意見，絕不能斷定其盡屬反對分子。因爲贊成與反對者之間，尚有一種不表示意見的棄權分子存在，而棄權也是一個權。凡是不表示意見的人，我們可以推測不外由於兩種態度，而不表示意見：一是根本沒有意見，二是以多數的意見爲意見。這類的人應當作如何的計算呢？自然應以加入比較多數的一方爲合理。因爲民主的成員，不但要有積極對事的態度，而且還要表示公開負責的精神，沒有這積極和負責的態度和精神，便只有被人牽着鼻子走。照前述的情形：出席人數爲一百人，贊成者三十人，反對者十五人，不表示意見者佔五十五人，我們既不能承認這五十五人爲多數，以爲決定問題的標準，那末只有以之加入在三十人的一方成爲八十五人，則又合於民主多數決制的原則了。這是表決必須兩面俱呈的第二個理由。

承認差異、包括反對意見，是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極權政治的國家不承認反對者的存在，他們認定不贊成便是反對，反對者固是有罪，中立緘默者也是有罪的。在民主的國家不僅允許反對意見的存在，而且承認個人可以採折衷中立和緘默的自由，所以在極權國家如蘇俄，他們對於議案只有贊成通過的紀錄，而沒有反對者的及棄權者的紀錄。民主國家對一項重要議案的表決法，贊成與反對者的姓名皆須記入紀錄，並可公諸報端，以表示其負責的精神，這正是說明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的明證，這是表決必須要兩面俱呈的第三個理由。

根據上述的理由，所以在會議規範中，特把世界通行的各項表決辦法列出於第五十二條中，其原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如左：

第五十二條　表決之方式　表決應由主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

（二）起立表決。

（三）正反兩方分別表決。

（四）唱名表決。唱名表決之方式，如經出席人提議，並得五分之一以上之贊同，卽應採用。

（五）投票表決。

前項第（五）款，除對人之表決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負責爲原則。

上列條文之第三、四、五款很自然的表示出表決必須兩面俱呈。關於表決的另一積習，最可笑的無過於以「拍掌」以爲表決的方式了，故　國父在「民權初步」第九章第六十八節中，特別把他提出來加以說明。其文如左：

「六十八節　拍掌不宜用以表決。我國集會，向有厲禁，故人民無會議之經驗之習慣。近年西化東漸，吾人始有集會之舉，然行之不久，習未成風，訛誤多所不免，則如以拍掌爲表決，是其一端也。拍掌爲讚揚稱道之謂，中西習尚皆同也。乃吾國集會，多用之以表決，此則西俗所無也。夫既用之爲讚揚，而又用之以表決，則每易混亂耳目，使會眾無所適從，故稍有經驗之議會，洵不宜用拍掌以表決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拍掌之不能爲表決之方式，其最大的理由是：拍掌乃一無秩序之羣眾行爲，既聽不到反對者的表示，亦看不到反對者的表示，其不能兩面俱呈至爲明顯。

除上述第一款關於表決謬誤以外，第二款「無異議通過」，亦爲一習見之現象，此一習見之現象，使民主政治變質爲一種含糊的、概括的、敷衍的制度。「無異議通過」如果要用，只能用於兩種情形之下：一是普通不成問題的事件，爲了省掉表決的麻煩，主席乃諮詢會眾有無異議，如果有一人表示反對，便當作罷；二是在主席諮詢贊成與否之後，都無人表示異議時，乃得算是通過。

無異議本來是一種全體一致的協議，其效力與全體一致的通過相同。在一般的習慣，大凡每一議案的提出後，如果已經有一起或數起的反對意見發生，用無異議的方法諮詢大會便不恰當，而且是危險的。因此如果有了一人表示「異議」，等於就被否決，必須再循表決的途徑而爲決定方合秩序。民主是一種生活態度和習慣，往往看見有許多人對於一個案件，在先表示非常反對的意見，到了主席徵詢有無異議之時，竟一聲不響，以致主席得以宣告爲無異議通過。及至已經宣布通過之後，又復大肆責備主席之違法，這是不合議事秩序的。這些現象都是由於沒有養成一種民主生活習慣所致。爲了要阻止無異議表決方法的濫用，最有效的辦法是在主席諮詢有無異議時，便大聲表示其反對的意見，那就是說：「我有異議」，或說：「我反對」，雖是反對的只有一人，這案便也就不能「無異議通過」了。

嚴格說來，「無異議」應視爲全體一致的認可，不能算是通過。因爲通過要經過表決的程序，無異議僅是一項諮詢意見求得簡便之認可而已。因此在草訂會議規範時，特別在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出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異議認可的範圍。

第五十三條第二款：

「無異議認可　例行事件，或經主席認爲毋須提付表決通過之事件，如無異議，卽爲認可，如有異議，仍須提付討論或表決，但經主席徵詢無異議，並已宣布認可後，不得再行提出異議。無異議通過之效力，與表決通過同。」

其次談到第三款以主席作結論之不當。會議之主席，應居於公正超然的地位，嚴格執行會議規則，使會議和諧進行，達成決議。其地位與法院依據法律裁決訟案之法官相似。照一般民主常規，主席對於發言、討論、表決，都受了若干規定的限制，俾得不致介入會眾之爭議中，以維持其公正超然之地位。在會議規範中，對於主席的發言、表決，亦特別訂立下列條文爲限制：

第十八條　主席之發言　主席對於討論事項，不參與發言或討論爲原則，如必須參與發言或討論時，應指定一人暫代主席，退離開主席地位行之。主席如必須參與討論時，應指定一人暫代主席，退就會場席次，其地位與其他出席人同，但機關之幕僚會議，由首長擔任主席者，可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主席之表決權　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爲原則。主席對於議案表決可否同數時，得加入可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而使其否決，但有特別規定之表決人數者，從其規定。（下略）

照以上條款的精神，會議之主席實不宜以結論代替會眾之表決而爲決議。在有經驗有素養之主席，尚大體能歸納會眾意見，能將多數的意見表達出來，已屬十分難得。而在缺乏經驗與素養，甚或欲利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席之職權而妄爲結論者，則更違背了「民權初步」之精神。遇到此類情形，在無議事秩序素養之會眾，雖有反感，亦不知如何表達。會議之目的，本在於團結人心，只得陷於無可如何，啼笑皆非之境地。會議之目的，本在於團結人心，糾合羣力，似此情形，反招致人心渙散退有後言的結果，能不令人興歎！

在民國四十五年，我曾經作過一項關於各議事機關議案處理的調查。在五百六十六次會議之中，計有議案一千三百八十九件，關於議案之處理方法，未據塡明者有三百六十六件，如將其剔除共爲一千零二十三件，其表決方法如左：

| | | |
|---|---|---|
| 無異議通過 | 五〇一案 | 占百分之四八・九七 |
| 主席結論 | 四四九案 | 占百分之四三・八九 |
| 兩面俱呈 | 一六案 | 占百分之 一・五六 |
| 非兩面俱呈 | 五六案 | 占百分之 五・四七 |
| 未獲決議 | 一案 | 占百分之 〇・一 |

就上面的統計以觀，以往對於議案表決之情形，可以說是十分的違反了民權初步和民主常規。在各種樣式會議一千零二十三案中，僅有十六案是用兩面俱呈的方式來處理，僅佔百分之一・五六，絕大多數議案皆是用「無異議通過」或「主席結論」來決定。無異議通過達五〇一案，占百分之四八・九七，主席結論四四九案，占百分之四三・八九。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但看不出差異，看不出多數與少數，更看不出責任的表現在那裏。因爲表決的隨便，議案的執行便減低了意義，民主的勢力更無從表達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來，會議的權威便也不能發生若何效力了。以上所舉的統計數字雖然是得自十年以前，但這一情形至今究竟改善了多少，依然是今天值得重視與關切的問題。

## （七）

最後讓我來談一談上述第四款所指一般會議之不能表達民主，發揮團結的功能，是由於忽視議事秩序和民主的紀律問題。

會議的目的在集思廣益，從異中求同，融個體於羣體，亦即是古人所謂「往返爭辯，以求至當」的意思，如何才能獲致「至當」，古人亦有類似的名言如「爭辯聚訟，非禮莫決」。這裏所謂的禮，便是我所指的議事秩序和民主的紀律，亦即是表達民主的一些重要的民主常規。禮是由人與人間的分際而建立的秩序與規律，在過去我們只注意到人與人間的禮，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尊卑之禮。今天我們已進入到羣體時代，所謂會議的秩序和紀律便是個人在羣體活動中的禮，沒有這些，便不能凝結個人而爲一團體了。所以表達民主的常規我們可以名之爲民主的禮則。舉例言之，約有如下的涵義：

一、會議發言，必須經主席許可，取得發言地位，禮也。

二、討論必須依照議事秩序，禮也。

三、同一時間不議二事，禮也。

四、發言要有禮貌，禮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發言不能逾越範圍，禮也。
六、未取得優先地位，不得間斷他人發言，禮也。
七、動議必須成立後，始可付之討論，禮也。
八、尊重公意，退無後言，禮也。
九、多數尊重少數，少數服從多數，禮也。
十、服從主席裁決，禮也。

以上僅舉出議事秩序大端十項，不遵守這些秩序，便不能和諧團結，這些會議的秩序，則有賴於會議的紀律，執行這一紀律的責任，則爲會議的主席。因此，在「民權初步」，和各國會議的成例，都明白規定會議主席的權力和維持紀律的懲戒條款，中國一般集會最大的積弊，則爲忽視以上的會議秩序和紀律。因此，在會議規範中特別加重這一方面條規的訂定。如：

第十四條　處分之決議　會眾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經出席人之提議，過半數之通過，爲處分之決議：

一、無故不出席會議，連續二次以上者。
二、發言違反禮貌，損及其他會眾之人格及信譽者。
三、違反議事規則，不服主席糾正，妨礙議場秩序者。

前項處分之決議，以左列各款爲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將姓名及其事由，列入會議紀錄。
二、停止出席權一次。
三、向會眾或當事人當面致歉。
四、得由大會成立紀律委員會議處。

第二十七條　發言禮貌　發言應有禮貌，就題論事，除以對人爲主體之議案外，不得涉及私人私事，如言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違禮貌時，主席得警告制止，或中止其發言，其他出席人，亦得請求主席爲之。

會議之所以陷於凌亂，不能表達眾意，解決問題，大都由於不遵守議事規則與議事秩序，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則應歸結爲空有民主會議的形式，而沒有嚴格執行的民主紀律。英、美、日本各國在憲法中，雖規定議員在開會時，所爲之言論與表決對外不負責任等諸多之保障，但對於不遵守議事秩序，或違反紀律的議員，均訂有嚴厲之懲戒辦法。除警告，停止其發言，或停止其出席權利外，並得經會議之決議予以開除之處分。我國憲法對於議員之地位有各種保障之條款，但對於議員之懲戒與開除則未爲規定。在各級的民意機關的議事規則是由議會自行訂定通過，甚至偶有一些議會的會議規則竟連懲戒條款都不予規定在內，即有，亦懲戒很輕而成爲具文。至於對違反公共利益，有損全體信譽之議員，既不能開除其議員資格，就只得待至案情重大，受司法機關之判決而受刑事與剝奪公權之處分，乃失去其議員資格！這對於一個民意機關與代表人民的議員的尊嚴和信譽的損害，是何等的不幸！美國眾議院在一七九八年，對參議員佈勞恩（W. Blount）提出彈劾案，參議院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被彈劾人不是政府官員而拒絕受理，乃改以參議院決議開除佈勞恩的參議員資格，以了此案。日本憲法（一九四五年）第五十八條及國會法第一百二十二條，對於違紀之議員，均有極嚴之懲罰規定，在其第四款內更明訂有開除資格之條款，此足見議會的自律，在議會政治上之重要。

內政部在討論起草會議規範時，曾發現在我國目前的憲法及民意機關的會議規則中，均無民意機關可以開除其本身代表資格的規定，這不能不引爲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後來，我查考滿清時代宣統元年所公布，資政院院章及民國二年公布之參議院法，卻皆有議員除名之明白規定。這一先後不同之事例，究是由於民主政治在中國的進步而把除名這項規定不予採用呢？還是出於一種對民主紀律的忽視和曲解而出此呢？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宣統元年公布的資政院院章有如下的規定：

第四十七條　資政院議員有屢違院章，或語言行止謬妄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四十八條　資政院議員無故不應召集，或赴召集後無故不到會延至十日以上者「均除名」。

第四十九條　資政院議員有以本院之名譽干預他事者，停止到會，其情節重者「除名」。

第五十條　「除名」以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民國二年參議院法：

## 第十五章　懲罰

第九十條　參議院對於參議員有懲罰之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九十一條　凡懲罰事件必交懲罰委員會審查，經院議決定始得宣告。

第九十二條　懲戒之種類如左：

一、於公開議場謝罪。

二、一定之期內停止發言。

三、一定之期間內停止出席。

四、「除名」。

我之不憚煩而把上述一些舊條規錄出的原因，是在說明民主的紀律與民主政治時亦曾特別注意及此，說明「地無中外，人無古今」，對於民主的實踐皆不能離開這些常規。一個會議要能和諧團結，達成決議，解決問題，必須要議事秩序的遵守，而維持議事秩序的武器則在有賴於嚴格的會議紀律的執行，無此，未有不凌亂失序，成爲烏合之眾的。中國各種的會議之不能團結人心，糾合羣力，反而淪於人心渙散、民力不申，是不是由於我們對於議事秩序與民主紀律之忽視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天下沒有既無法，又無禮，而可以實行民主的道理！在討論起草會議規範時，我曾主張在懲戒條款中列入一項開除會籍的處分，由於大家在觀念上認爲在高級的民意機關中均無是項成規，執行起來反而會窒礙難行，影響實施，所以只得勉強在規範五十七條表決特定之額數第二款甲項中，列有關於會員之罷免應有出席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的規定，則均沒有把開除會籍一項列入。現在想起來眞是莫大的遺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在此預祝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創制「議事法」順利完成，以補救的民主常規，以供芻蕘之採。

## （八）

回憶在民國六年的時候，我正是上海復旦公學舊制中學四年級的學生，由於我童年便被捲入於辛亥革命的大潮流當中，我對於政治自亦較一般中學生具有更多的興趣，我的交遊和師友亦無不與革命黨人有關。那時在復旦任教的如王寵惠、葉楚傖、蔣梅生、薛仙舟、林天木，或是同情於革命的人物，校長李登輝先生是一位海外出生的華僑，爲人又極開明，所以當時的復旦學生，所受的革命薰染特別的深厚，因此後來走入政治界的人，亦特別多。要說當時的復旦是一所革命的學府，並不過當。在我的記憶中，中山先生似乎曾一度擔任復旦公學董事會的董事長，我曾以此事詢問過幾位復旦的老同學，都無法證實。勿論他是否曾任復旦的董事長，而任董事長的時間是不是在民國六年，在此都不必深究，而中山先生是當時青年人最崇拜的偉大人物，則是無可置疑的。正因爲如此，現在追憶起來，我當時卻爲了閱讀　中山先生一部著作，曾感覺到一度的失望，這部著作便是他手著的「民權初步」一書。我記得此書在先的名稱是「會議通則」，而不是叫「民權初步」，書中還有楊滄白、鄧家彥先生爲他寫有序言，至於何時改名爲「民權初步」，則尚須加以考證了。此書當時是用大字刊印的，有類中國的線裝書模樣，大約是最早出版的樣本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爲什麼當時閱讀了此書而感覺到失望呢？回憶起來自己眞覺得其時：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如像　中山先生這樣的人，應當高瞻遠矚，號召羣倫，以促進革命的成功，爲何尚有閑暇從事此一無關重要的寫作？

第二，開會議事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我認爲　中山先生要著書便應作一更爲完美的闡發，會議通則與三民主義和革命大業並無太大的關係。

第三，此書讀起來枯燥無味，有如嚼臘，我費了許多心思時間去讀，我在此必須補述一句，當時此書的名稱，究竟叫「會議通則」，還是「議事規則」，現在不敢加以妄斷，尚須容後加以考證。不過，不是屬前者，便是屬於後者，是可以確定的。

以上是我五十年前第一次閱讀最早出版的「民權初步」原版的一段回憶和印象。當然，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中學生，不知天高地厚，而妄發議論。卻是，在這過去五十年悠久的歲月中，即解的人豈能說是已經沒有？煩之中呢？「民權初步」一書山先生逝世後，他的遺教最被忽視的地方，「民權初步」的工作未能完全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我於中學畢業之後，曾到日本留學一年多，我就讀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主主義的思想瀰漫了當時的日本社會，吉野作造先生是當時主張民主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治的一位最叫座的風雲人物，其時青年學生對於民主的嚮往，眞是不可一世。我時時看到慶應大學的日本學生在校區內站立在高處大聲疾呼，作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講，許多人圍繞着看熱鬧，有時聽眾對演講人發出無數的噓聲、笑聲、鬧聲和罵聲，更粗的則有「馬鹿」的尖叫，有如中國罵人爲「混蛋」一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很不順眼，我認爲民主是如此的表演，豈不會天下大亂！在他們的說法這是在學習民主，預備將來參加政治活動，爭取選舉。如果不經過這樣的學習，將來遇到政敵攻擊時，便會怯陣，會弄到手忙足亂，抬不起頭來。我當時沒有到過英國，據說倫敦的海德公園裏，時時亦有市民在那裏向羣眾大聲疾呼，慷慨激昂，發表政治主張，或是攻擊政府的措施，初到英國的人見到此種情形不免要爲之驚異，憂慮到治安等等問題的發生。最特別的是還是在附近的警察對於演講人不但不加干涉，而且還要對有礙此類演講人的事件加以防止和注意。有人說，這便是英國民主自由的一個特徵。在英國此種情形視爲是一種很尋常的事，並不如外邦初到英國的人所感覺得那樣的嚴重可慮。而這些作政治演講，發表主張和攻擊政府的人，在把自己的情感發洩之後，反而會心安理得，心氣和平，形若無事，並不發生何種激烈的行動，他們的目的亦只是在一洩其個人的政治見解和態度，回到家後可以安心睡覺便了。日本人最能夠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民主政治的建設，可能不少是從英國學習來的。

學習一種技藝或活動的途徑很多，最普遍的有兩種：一是知識上的吸取，一是從實際的事物求經驗。譬如：學習游泳，先從基本動作中如：呼吸調整，浮起身體的道理和手足如何推動的知識吸取，是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種學習的方法；另一種有效的方法，便是把初學游泳的人拋在不深不淺的水裏，迫使他自己掙扎學習游泳，到了必要時再加以援手，使其不致喝得太多的水而受苦，或被溺斃。這樣的學習游泳也許會有驚人的成就，較按步就班的學習還要快些。我初習游泳便是被人如此捉弄而學會的，雖則在初吃了不少的水，受了若干的苦頭，但是結果則非常圓滿。我看見的日本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九一八年，學習民主的情形，在初雖則覺得令人感覺可笑，但久而久之便亦覺得會自然地建立起民主的秩序來。學習民主有如開墾荒地一樣，初初長出的或許是些野草、雜樹，決不會馬上生出五穀稻米的，也不會忽然長出牡丹、芍藥和美麗的花朵的。因此，忍耐與長期不斷的努力是十分必要。我當時年齡僅在十八、九歲左右，我對於民主雖然十分嚮往，但我那時有一異樣的感覺，即是，民主政治是眾人的政治，而許多的眾人如何才能把政治弄好，必定需要一種有規律的民主秩序，才不會亂糟糟的發生許多困擾與紛亂。自此，我胸中便一直縈繞着一個如何實行民主和建立民主秩序的問題。

到了民國八年秋我由日本轉到美國去留學，在最初幾年中，我並沒有發現美國這個國家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美國當時的物質文明進步，當然是我們中國所望塵莫及的。但是關於這些，我認爲只要在我們革命成功之後能夠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權，迎頭趕上，努力作去，我們一定亦能做得到，並沒有什麼稀罕！惟有一件我所親自經歷的平凡事件，使我對美國的文明進步發生了另一種異乎尋常的讚美。那時我所讀的學校是一所浸信會所辦的俄亥俄威瑟靈大學，這所大學人數約三千餘人，照學校的習慣，每日上午九時半至十時，全校的師生都要集合在大學的禮堂裏舉行祈禱。全校的師生由課室走到禮堂約需五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鐘的時間，大家坐定之後，照例由校長或資深的教授領導祈禱，如是又有須得向學生宣布的事，亦便在此時提出報告或講話。最堪注意的事是短短約二十分鐘的時間，向集合在一起的同學，把應須提出報告，或須交付討論的事件提出討論，學生會的會長當然便是此會的主席，教職員們則坐着一如會眾。我見到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竟能有條不紊，有發言，有動議，有討論，有修正，有表決，處理了許多重大的事件，表現出一種條理分明、秩序井然的羣體活動的民主精神。這種有規律有秩序的活動，不僅表達和尋求出多數的意向，而且眞正做到了和諧一致，羣策羣力的地步，使我歎爲觀止！如果說了解什麼是美國的精神，這應當是在計算之內的一件事。如果說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先進國家，在這些表現中，才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礎。自此以後我才漸漸領悟一點：中山先生爲什麼要寫會議的法則那部乾燥無味，有如嚼臘的書，和把這部書後來命名爲「民權初步」和在建國方略中列爲社會建設的用意。因此，我才選讀了一門後，所知的亦不過一些開會議事法的功課，讀了這門功課之的規律和程序而已。至於把這種知識應用到實行民主政治的重要，當時的感受尚並不太深。

## （九）

以上所說已經是將近五十年前的一些回憶。回想當時我曾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我費了許多精力和時間都不曾得到結果，一直到了四十多年以後，民國四十九年，第三次國民大會在臺開會前不久才得到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案。這件事發生是由於　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一書的序言中一段提示所引起，序言裏說：「此書所取材者不過數種，尤以『沙德』之書爲最多，以其淺顯易明，便於初學，而適於吾國人也。」我爲了想找出「沙德」原書作參考，於是在圖書館的目錄裏遍查與「沙德」二字的英文發音相近之字彙，以便找出此書的原本。由於　中山先生沒有將英文明白說出，所以我當時認爲「沙德」二字的「」，可能是音意都能相關。誰知用 Sand 這個姓字寫作的書很不少，不過英文Sand一字的譯音，因爲Sand 這個字在英文的原意便是「沙」的名辭，　中山先生較爲簡便？第一、是怕以此麻煩他姓字的人寫得有關於議事學這種書，眞使我萬分失望！我的假設固然錯了，集千辛萬苦的求證，亦沒有發生偶合與奇蹟！當時亦曾想到何不直接寫信回國問一問　中山先生；第二、這大約是在民國九年、十年之間，其時正是討平莫榮新軍事初初結束之後，　中山先生正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的時代，恐怕他無暇作答；第三、年輕人普遍都有不服輸的變脾氣，總自信能夠終有一朝由自己尋求出來。在美國住了幾年之後，我又去到加拿大，我對於此事不斷的留心，仍然是一無結果！我於民國十三年回到廣州本有機會親自問一問　中山先生，而我竟未及此。到了民國十四年　中山先生又不幸去世，更無從問起了！一直到了約四十多年以後，民國四十九年，第三次國民大會在臺灣召開之前不久，才由我國駐美文化參事曹文彥先生，在偶然一個機會中考證出來。他將經過情形函告張其昀先生，再由張先生轉告於我。正如俗話有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曹文彥先生考證出來的結果「沙德」二字顯係英文 Shattuck 的譯音，因爲有一個女作家名露西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德克Lucy Shattuck曾寫了一部有關於議事學的書，名叫「婦女參政的議事手册」Wome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出版於一八九一年，照普通話的音譯 Shattuck似乎以譯爲春德克爲宜，可是　中山先生誕生在廣東香山縣，照廣東話的發音譯作「沙德」二字，原亦與英文原音是相符的，我因爲沒有注意到廣東話的發音，無怪自己招致了許多麻煩，說來亦眞可笑！細細考證在七十多年前沙德女士爲甚麼要出版這一部「婦女參政的議事手册」的原因，亦很值得在此一提。在十九世紀末期，一八九一年的時候，美國的婦女尚沒有參政權，她們爲了要爭取參政權，於是便組織了一個婦女爭取參政權的團體，沙德女士便是此一團體的秘書。很顯然的，他之寫這部書的主要動機，便是爲了告訴當時女權運動的婦女們，如果婦女不知道實踐民主，表達民主和作國家主人翁的一套法則、程序和例規，縱然婦女獲得了政治權，取得了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亦等於是一羣烏合之眾，不會發生何種的力量。所以婦女在爭取政治權的同時，便必須具備運用民主政治的法則和例規一套的知識和方法，所以她這部書命名「婦女參政的議事手册」，亦正如　中山先生提倡民權主義，而把西方實踐民主的議事法命名爲「民權初步」有同樣的用意。從曹文彥先生這一發現，使我們不但知道「民權初步」這部書所依據的沙德女士原著「婦女參政手册」的來源，而且由此可以推想到　中山先生在寫他有關議事法一書，所以要以「民權初步」爲書名的道理，這眞可說得上是一項重大的發現，同時亦是考證「民權初步」命名的一個奇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白崇禧將軍在世時，他於擔任了一次會議的主席之後，悻悻的歎息道：運用一個民主會議來解決問題，這種滋味眞令人難受啊！我直率的對他說：主持一個不及千人的會議，比指揮百萬大軍作戰還要困難，這是大異其趣的兩回事，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人類在原始社會時代解決問題，本來就與用戰爭來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用武力、強權和戰爭；在初靠腕力、石頭、棍棒來制服等鐵器來作武器，到了近代則用槍、礮、戰車、毒氣、原子彈等爲解決衝突。後來人類因鑑於用武力、強權和戰爭來解決問題，終不是一項根而不可收拾，於是人類才發現在使用武力之外另一解決問題的辦法，那便是和平的協商（Negotiation）。和平協商便免不了有關各造坐在一起來會議以謀求解決。會議要如何才能有結果呢？於是便不能不產生一套相互間的禮貌與尊重，程序與法則，以達成協議，解決問題。這些原理法則應用到政治上便是民主政治。所以　中山先生主張民權主義便特別要注重「民權初步」一書，先教導人民以學習作國家主人翁的方法，這書有如軍事學方面的操典，學習不好，便不會成爲有節制，有戰力的軍隊。民主的實踐如果沒有這一套基本的知識和學習作基礎，便只有紛亂困擾，而不能解決問題。有名的政治學家畢爾德教授有言：「議會的典例，對於國家政治行爲的影響，常較憲法所發生的效力爲大。」我們主張民權而不注重這些基本工作的學習，將不會有太大的成就的。　中山先生在三苦來完成「民權初步」一書，作實行民權的初步教材，其用意當然在此。

我自民國六年，在中學生時代，第一次得閱「民權初步」一書最早出版的原本，到現在已足足有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餘年之久，自會議規範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公布試行至今，則定　中山先生「民權初步」一書所闡發的民主常規，是他遺教中最被忽國至今尚未建立穩固基礎的最大原因。「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因此，第一委員會諸先生，最近擬創制議事法以爲推進民權建設的努力，衷心家一項根本大計，至盼其能早日實現！

——錄自「革命思想」第二十五卷第二期至第五期，民國五十五日出版。

按：本文於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月由國史館印行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 一、荷馬李將軍夫婦與中國革命

今年元旦，我接到駐美大使周書楷先生的一封信，述說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最近獲得有一批私人贈予有關中國革命的重要而珍貴的史料。從周大使的信中我才得知馬大任先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有一封信給我，大約是由於聖誕節的郵件擁擠而失去，我竟未獲讀馬先生的來信。周大使於接到我的覆信後，才將我不曾接到馬先生來信的消息告訴他，因此馬先生乃於本年一月九日再用掛號信將前信及一部份有關　國父中山先生的重要史料寄給我，這部份寄到的史料共有十件，是　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寫給一位早年獻身中國革命的天才卓越的軍事家荷馬李將軍（Homer Lea）的親筆英文信和電報。我把這些資料閱讀了之後，眞有如獲至寶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感覺。

從這僅僅十件的文件中，我發現：一、了解一位天才卓越的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荷馬李將軍和　中山先生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二、了解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　中山先生籌劃中國革命的苦心孤詣，博大遠識和艱苦備嘗的經歷；三、關於辛亥黃花岡之役及武昌起義事前的佈置與籌劃的一段經過，而爲我們所從未獲知的；四、關於革命時期革命與保皇的鬥爭，　中山先生與康有爲、梁啓超間的微妙關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由這少數的文件參證其他有關資料，有不少重要的發現。

上面所述有關中國革命而未經刊佈的珍貴資料，原爲已故荷馬李將軍夫人包爾斯女士所有。查李將軍於民國元年任　中山先生軍事顧問，在伴隨　中山先生祭明太祖陵後得病，隨卽返美治療，於是年多天在美逝世（一九一二年），李夫人則於一九三四年在美去世。李夫人逝世後，此項文件一直保留在其繼子包爾斯（Joshua B. Powers）先生之手，最近才由包先生贈予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胡佛研究所於接獲此項文件後，根據包先生的囑託及查證各方有關資料，得悉李將軍生前有將其骨灰埋葬在中國國土的遺願，而李將軍生前所指之中國國土，自係指中國大陸而言，因當時臺灣尚割讓於日本，尚未光復。因此胡佛研究所諸先生乃建議將李將軍及其夫人靈骨葬於金門，或將其骨灰撒置金門上空，以了李將軍及其夫人生前之夙願。在該所之意，認金門乃係福建省之一部分，與李將軍遺志之中國國土仍相符合。周書楷大使、馬大任館長及胡佛研究所副所長史華若考斯基（Witold S. Sworakowski）先生先後給我來信，都希望我方能予協助，以完成這一有關中美關係具有歷史意義的盛舉。胡佛研究所並希望此一希望如能實現，該所將派前美國駐華代辦，現在該所擔任研究工作之鍾華德先生偕同李將軍繼子包爾斯先生攜同李氏夫婦遺骸前來參加葬禮，情深誼重，令人欽感無已！

我於接到周、馬諸先生來信後至感興奮，唯一足資考慮的地方，便是他們似乎太強調將李將軍遺骸安葬金門，或將骨灰撒散在金門上空一點。我以爲金門固然是中國的領土，今之臺灣不獨爲我國國土，更是我們光復大陸的基地，我們終有光復大陸之一日，因此，把李將軍夫婦遺骸葬在金門與葬在臺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意義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一封信，他告訴我總統　蔣公正遲疑於這一問題的決定以作答覆時，忽奉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的有一項明智的批示。批示中說：「荷馬李將軍爲我建造民國　總理所聘國國土之上，則我政府應當贊成，並可先爲其在我國土臺灣基地予以優外國的第一顧問，彼既願葬在中遷移於南京紫金山　總理陵墓之附近安葬可也。」張秘書長岳軍遵奉國周大使書楷與胡佛研究所方面接洽辦理。

最近我接到周書楷先生二月十四日來信說：胡佛研究所對於　總統且經洽獲荷馬李將軍繼子包爾斯先生的同意，願於本年四月親護荷馬李禮。胡佛研究所所長肯貝博士（Dr. W. Glenn Campbell）、研究員鍾來華參加。包爾斯先生並表示其多年以來，常以未能實踐荷馬李將軍夫土爲憾，茲獲我　總統賜予優禮卜葬我國國土臺灣，歿存均感。且云：人格及深遠見識之感召，乃投效中國革命運動。由於荷馬李將軍與我國，特擬於來華時將李將軍生前佩劍一把呈獻　總統，以表其崇敬之意。

寫到這裏，似乎有先把荷馬李夫人和她的兒子包爾斯先生作一說明，大家可能會懷疑到：荷馬李夫人的遺骸爲何要與荷馬李將軍合葬在中國土呢？包爾斯先生的名字何以不姓李將軍的姓呢？要解答這兩個疑問，最好先從李將軍和他的夫人說起。原來李將軍夫人在未與李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軍結合之前，曾經有一段家庭不幸的經過。她是一位離婚的女子，原叫做包爾斯太太 Mrs. Ethel Bryant Powers。她與前夫共生了三個孩子，兩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這次把荷馬李將軍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送給胡佛圖書館收藏，而要遵照李將軍遺囑把李氏夫婦的靈骨埋葬在中國國土的 Joshua 包爾斯先生，便是李將軍夫人與前夫所生之子，周書楷大使說他是李將軍的繼子，便是由此而來的。不管包爾斯先生是李夫人前夫所生的亦好，李將軍的繼子亦好，而包爾斯先生對於荷馬李將軍夫婦永恆不忘的孝思，就東方文化的觀點看，可說得上是「孝思不匱」的了。這種至情的流露，至孝的表現，眞值得我們敬仰！

荷馬李夫人原來是荷馬李將軍的女秘書，因爲她賞識荷馬李將軍的天才橫溢，識見卓越，於是由理想志趣的共同而互相由敬仰而發生愛情，由愛情而結爲神聖的夫婦，他倆的婚姻是一崇高而偉大的愛情的結合，說起來眞不平凡。中國人指一個賢慧的太太爲「賢內助」，那就是說：一個男人的成就的基礎在家庭，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的成功，沒有不是從此而來的。我們所謂「賢內助」，西方人則稱爲「最好的一半」 Better Half，亦全是同一的道理。

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後，美國人才知道在一九〇九年荷馬李將軍預斷太平洋戰爭一旦發生，日本將爲美國國家帶來無比的災難。他那本「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的名著所預料的一切情況，在美日戰爭爆發一一實現後，才發現荷馬李將軍是一先知，是一卓越而偉大的戰略家！不幸此時已在一九〇九年此書的出版三十三年之後了！在當時，美國一般社會對於此書作者的評價，認爲荷馬李將軍是一個天才卓越的人很少，指爲「狂人」的反居多數，而鼓勵「無知之勇」一書的寫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人，便是後來的荷馬李將軍夫人。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有一位寫作者名叫蘇里萬先生（Robert Sullivan）嘆息於荷馬李將軍數十年前對太平洋戰爭之預言未被人重視，構成了當時美國一時的災難，他特寫了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用大標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美國星期新聞（Sunday News）發表，題目爲「無人肯聽的預言者！」此文所提供有關荷馬李將軍的珍貴史料很多，我留到以後再講，現在我暫把有關荷馬李將軍與他的夫人的關係一段譯在下面，以代說明：

「荷馬李遇到了一位年輕而離過婚的包爾斯女士，帶着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包爾斯女士對於荷馬李的思想發生了興趣，而荷馬李的個性亦深深地迷惑了她。她在聽過他的一些最卓越而踏實的言論後，她就催促他把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寫出來。她幫助他寫作，實際她幫助他做最難做的工作，這樣，她就成爲荷馬李的文筆寫作秘書……。他們合作的第一部著作便是『無知之勇』，於一九〇九年由哈潑斯公司出版。」

有一位克奈爾布斯先生（Clare Boothe）在他所著「勇敢的荷馬李將軍」一文中，描述他倆戀愛的經過，引了古人的兩句名言來形容，這兩句名言是：

「她爲我所經的危難而愛我，我則爲她之對這些危難的同情而愛她。」（She loved me for the dangers I had passed, and I loved her that she did pity them.）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駝背而殘缺的人，他的健康是不正常的，他的視力亦日就衰弱，包爾斯女士不僅要幫助寫作，而且每日下午還要大聲朗誦歷史、遊記、拿破崙傳和政治的回憶錄給荷馬李將軍聽。後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李將軍因爲久病纏綿病榻，看護的職責，朝夕都落在荷馬李夫人的身上了！他倆這樣地互憐、互愛、互助，情投意合的恩愛夫妻，可說得上是偉大，亦可以說是世間所罕有的神聖而恩愛的一對！白居易的長恨歌有兩句沉痛的句子：「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可能是包爾斯先生要把荷馬李夫婦的骸骨合葬在中國國土以了他倆的夙願的動機吧！亦可說：這是荷馬李夫人生前的一項遺囑，或爲我們所不知，而包爾斯先生要爲她而完成吧！在我看來，當荷馬李將軍及夫人的遺骸，本年四月在中國國土的臺灣舉行合葬時，我預想不知要爲中國和全世界的青年男女們，對於他倆崇高偉大的愛情，及包爾斯先生對於他倆永矢不渝的孝思，激起多少同情與熱淚，帶來萬眾對這兩位　國父中山先生的友人，中國革命的獻身者，無盡的崇敬與仰慕！

這兩位崇高偉大的夫婦的合葬，將是人間今後的美談，亦將是中美兩國的友誼上的一項最值得懷念的往事！

就我目前手中所有的資料看來，我不僅發現荷馬李將軍是熱愛中國，獻身中國革命，爲　國父孫先生最親摯的友人，而荷馬李夫人在這一抱負上同樣是荷馬李將軍志同道合的同志，中國革命和　中山先生最誠摯的友人。在　中山先生寫給荷馬李將軍的信中，都提到荷馬李夫人。在他倆結婚以前稱她「包爾斯小姐」，結婚以後，就稱「荷馬李夫人」。在此我暫且先引用三件史料，以作本段文字的結束。一是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荷馬李將軍因病返美後　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夫人的信。二是　中山先生於得悉荷馬李將軍於是年多在美逝世的消息後，致荷馬李夫人沉痛的弔唁的信。三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年，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覆荷馬李夫人的原信。這三項資料原件都是英文，我把它譯在下面：

(一)

親愛的荷馬李夫人：

我非常高興聽到你和將軍在回國的旅途中至爲愉快，更高興的是將軍的身體日益復元，以及醫生所說的他不久以後就可以走路了。在你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你應該已在海灘上了，無疑的，空氣和陽光的轉變更會加快將軍身體的復元。

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明天將乘新陽丸"Shinyo Maru"輪赴美攻讀。孫科將入加州大學，要唸那一些課程現在還沒有決定。我相信在他留學期間，一定有機會接近貴國的人民。

在中國的事情已漸漸粗具規模，由於內閣總理被迫引退後的北京政黨的爭執，並不嚴重。我相信並且希望在不久之後，每一件事情會再次順利發展下去。

我想盡可能避開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要盡我的力量來發展本國的自然資源，特別是鐵路的建設。我希望我能夠完成這些事情。

孫逸仙　一九一二、六、二十七、上海

(二)

親愛的荷馬李夫人：

從報上得悉荷馬李將軍去世的消息，我極爲哀傷。我本想致電給妳，以表達我深深的同情與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唁，但是，事實上，直到今天，我都不相信，報紙上的報導是眞實的。

失去李將軍，我覺得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和眞正的朋友。

宋小姐希望轉致她對於妳喪夫之痛的深摯的同情。

孫逸仙　一九二二、十一、十四、上海

㈢

一九一五、十一、二十、東京發

敬愛的荷馬李夫人：

收到妳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二十四日的兩封來信，我都遲遲未覆，敬請原諒。我的工作極爲忙碌，許多事情都要我親自處理，因此，休息的時間幾乎都沒有了。在這種情形下，默不回信並非就是不在乎的表示。每日我都記着妳的信，並盼望着有時間來給妳回信，告訴妳我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終於我提起筆來了。

我相信以妳的深切的個人的興趣，你一定會高興於聽到所有我的計畫都按照預期和情況開展得很好。

因此，革命的行動可以隨時開始，我的所有的同志們都準備好爲爭取自由作壓倒之一擊，不成功便成仁。（中略）。

當我在這裏推動着我的工作，而這工作又是我們所有活動的中心時，我已經完全放棄了去美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作一次旅行演講的想法。因爲我相信我留在這裏會比現在就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去，都有好處。所以，此刻，請不用在這一方面催促我。假使時機到了，我會致電給妳的。

因此，來信請寫到上述的地點給我。希望能常常收到妳的來信。敬祝

安好

孫逸仙

從上面這三封　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夫人的信，我們可以發現　中山先生對於李將軍夫人的一種深厚的友誼，並不因荷馬李將軍之逝世而消失，李夫人在荷馬李將軍逝世後，仍然繼續在爲幫助　中山先生的中國革命運動而策劃。

由第三封信中，　中山先生的語氣，可以看出荷馬李夫人當時在美國有一安排，要　中山先生赴美作一次旅行演說，以獲取美國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援助。當時中山先生因爲國內正是要發動反對民四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所以未能照李將軍夫人的安排而前赴美國。這一安排當時如能照李夫人的計畫做，其後果如何雖不可知，但　中山先生果能前去美國一行，我想中國革命與美國人民間的關係必會有所增進是毫無疑義的。由這些片段資料的推斷，我們至少可以看出荷馬李夫人對於中國革命是如何的關懷，對於　孫先生間的友誼是如何的眞摯了。她對中國的熱愛是與荷馬李將軍生死一致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記得在過去和年長一輩的同志談起當辛亥武昌起義後　中山先生由美赴英，由英經香港返抵上海時的情形，其同行有一位駝背、殘缺，長不滿五尺，像貌不揚的外國將軍，有人問這一位將軍爲何許人時，　中山先生對人介紹，便說這是一位世界最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美人荷馬李將軍。其後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訪問　中山先生時亦曾以：「荷馬李將軍爲怎樣的人？」爲問，他毫不遲疑的答道：「荷馬李將軍爲天下最偉大的陸軍專門家，歐美的軍事家都很尊重他的爲人。」

從具體的記載上說，大前關於　中山先生稱贊荷馬李將軍最珍貴的一項資料了。他當時雖如是地以世界偉大的軍事家推重荷馬李將軍；但是在聽的人的感覺，總以爲是一種普通應酬恭維的話。一是由於以貌取人的心理，看到李將軍那樣駝背殘缺的形態而不能見信；二是以爲　中山先生在利用一般人崇拜外國人的心理，而引偕行的李將軍來壯自己的政治聲勢。其實呢，當時　中山先生的話，是眞話，而一般人卻有以不實視之的。

荷馬李將軍是一位太平洋戰爭的預言家，他的名著「無知之勇」一書出版於一九〇九年，他預料新興的日本將爲後來的美國國家帶來災難。當時他的美國同胞並不相信，一直到了三十三年之後，日本襲擊珍珠港，侵佔菲律賓，一切都如他所預料而實現，他才見重於他的本國社會。　中山先生遠在數十年前，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便推許李將軍爲世界卓越的軍事天才家，當然是不易爲我們當時的中國人所見信的！

同時另有一段故事，中山先生當時講的是眞話，大家亦把它當作假話看，不料卻發生了一種好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影響。當　中山先生偕荷馬李將軍由歐洲返抵上海時，那時全國上下都猜想他由海外歸來，必定攜有大批外國借款與海外華僑的捐助。有了這筆大款必可充實財用、提高士氣、振奮人心，擴大革命的聲威。不料大家以此問他時，　中山先生很直率的答道：

「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這的確是句老實話，而大家又把他當作是假話看。於是便產生兩種不同的心理。一是老成一點的人的看法，以　中山先生不應如此天眞，即使是眞的「一文不名」亦不可說出，使大家聽了灰心，民心士氣將因此而受到影響。另一種人的看法，也許是大多數的看法，正因大家把眞話當作假話看，在當時反認爲這是一項政治機密，　中山先生是不易隨便將秘密洩露公開的。因此，反而增加了大眾莫測高深的看法，覺他的回國必定暗中擁有大量的外援、金錢和武器，來加強革命的勢力，促使革命提早成功！事實上，當時這種看法和臆測的確壯大了革命的聲勢不少，實非他的本意所在！然則他所說：「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惟革命之精神耳。」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在我看來，這是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一種警告！因爲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當時似乎隱伏了一項危機，那便是一部分人把革命的成敗，完全寄託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而沒有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建立在自身的奮鬥上面。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所以　中山先生特地提出來以警告國人！

上述　中山先生警告國人，不要把革命大業的成敗完全建立在外國的金錢和武器的援助上，並不是說外交運用的不重要。他所指的是革命奮鬥不懈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獨立自主的努力，才是革命成功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好的保障。當　中山先生在美國丹佛城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本可折回舊金山，由太平洋返國，參加國內革命戰爭。他所以仍繼續東行，迅卽經由紐約赴英倫的原因，亦正因爲外交的重要，故乃立爲決策。其時他認爲：革命軍旣已佔領武昌，革命的成敗，已不單純在於決勝疆場之上，而是在折衝國際樽俎之間，其所得的效力更爲重大。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和他給予　中山先生的幫助，當以在英國協助　中山先生辦理外交，使英國政府暫持中立態度，並停止兩筆大借款，逼使當時的滿清政府陷於外援的絕望，財政的枯窘，因而不得不宣布退位。這兩筆大借款：一是川漢鐵路大借款一萬萬元，業已募集存儲待付；一是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已簽約而正擬發行債券募集之中。假使這兩筆大借款爲滿清政府所有，以作對付革命的戰費，那麼辛亥革命的形勢便又將不同了！

中山先生此次英國之行，除了斷絕了列強對滿清財政支撐之外，更使得滿清政治聲威亦隨之墮失。其他尚有一項重大的成就，那便是由於英國對中國革命暫持觀望的態度，因而影響了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亦不得不隨之而暫時持審愼的態度。日本是最鄰近中國而最具野心的國家，日本的態度影響於中國革命者至大且巨。日本的民間志士雖多同情中國革命，但是其時的日本政府則爲反對中國革命者。在日本的軍人與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持的觀點，認爲中國一旦改帝制而爲共和，必將影響及於日本所謂的天皇制度的保存。當武昌起義爆發，日本政府及軍人保守派間卽已有直接干涉中國革命與維持滿清帝制政權之動向。由於日本與英國同盟的關係，英國對於中國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如能轉變英國的對華政策則亦可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之轉變。　中山先生之急於赴英作外交活動的原因，首在掌握這一契機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獲得成功。否則當時日英兩國如果聯合以阻撓中國革命之發展，則辛亥革命便不會成功若是其迅速了！

英國之行是順利而美滿的。當時予以莫大之助力的人，當推荷馬李將軍。　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所說：「到英國時，由美人同志咸馬里，代約四國銀行團主任開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該主任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請，而停止借款之事……。予乃再與銀行團主任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吾人借款與中國，只有與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乃能開議也。本團今擬派某行長與君同行歸國，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與之磋商可也。』」

文中提及的「咸馬里」其人，即我本文所稱的荷馬李將軍的名字在中國有各種不同的稱呼，有如郝門李、霍馬李、堪馬李等，我爲了方便及符合李將軍自己的原始意義起見，乃統稱之爲荷馬李將軍。因爲李將軍曾經對他自己的名字，有一引爲驕傲的解釋。由於他對世界戰略和軍事哲學的偏好，他有時描繪他自己爲維基尼亞李族之一員（The Leas of Virginia），以表示他和美國林肯總統在一八六一到一八六四年，黑奴解放戰爭時的南方大將李將軍是同一家系。這是否確實則有待於考證了。他曾經對他的老同學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有兩種情感，詩的和戰爭的。我對於我的名字，含有一個崇高的詩人和偉大的戰爭感到驕傲，縱使有些不明事理的人把一個正正當當名字加以輕視。」「荷馬」Homer是一位西方古代偉大的詩人，「李」Lea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的一位偉大的將軍，他常常形容他自己和名字是「詩人而兼戰士的一種揉合」，儘管有人嘲笑他，而他仍是引以爲驕傲的。他這種說法，有人說他是誇大；在我看來一位天才卓越的人物，往往是有不同凡響的一種自負的情操，荷馬李將

軍大概是屬於這一典型氣質的人吧！由於中國通稱詩人 Homer 爲「荷馬」，所以我把他的名字稱爲荷馬李，既簡單而又符合他的原意。

我在前面曾經說過，荷馬李將軍對於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是他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對　中山先生英國之行的外交活動給予了很大的助力。在　中山先生自傳當中雖然概略地提到曾由他代約四國銀行團的主任商談，把兩筆正準備貸予了滿清政府的大借款停付，給予了滿清政府以致命的打擊；但是李將軍個人如何能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能夠幫助此事的成功，則是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在此我不得不參證各項有關的資料加以說明。

第一、荷馬李將軍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那部名著「無知之勇」，雖然未曾見重於他自己的國家美國，但卻使當時歐洲的兩個巨人爲之傾倒：一是德皇威廉第二，一是英國的羅貝爾元帥Marshal Roberts。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九一〇年，德皇威廉第二曾邀請他去參加校閱德國的軍事演習。羅貝爾元帥於讀到他那本書後，曾禮聘他到英國去爲大英帝國籌商太平洋的防務。

第二、當他正在英國作羅貝爾元帥的貴賓時，我國適爆發辛亥革命，於是他即電　中山先生由歐返國參加中國的革命。

就以上的情形推測，他那時正是在英國具有影響力的一位人物。他之能在對英外交上大有助於　中山先生的活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我手中現有的資料來講，李將軍那本「無知之勇」一書出版後之見重於英國羅貝爾元帥，有如下的一封信是羅氏寫給李將軍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當我讀到此書時，我無法停下來，一直要到我都把它讀完爲止。我是如此之感動於你所描繪的疏於防備的美國人民以及我本國的人民……因此，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使你的著作能夠廣泛地爲此地的讀者所閱讀……我發現哈勃兄弟公司只有半打的版本……我通通把它拿走，並要求他們打電報再寄一點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年，羅貝爾元帥曾努力於警告英國人民，如同在第二次大戰前夕，慕尼黑會議前後的邱吉爾一樣。羅氏被稱爲是英國的第一號「戰爭販子」。羅氏的軍事思想可能是受李將軍「無知之勇」一書的影響。李將軍之見重於羅貝爾元帥，可說是既深且厚；李將軍其時在英國之具有影響力，藉此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他之能有助於其時　中山先生在英的外交活動是不無關係的。

關於　中山先生辛亥年自紐約赴倫敦之行，一般記載往往誤認是與荷馬李將軍同行的。實則荷馬李將軍其時已在倫敦作客，　中山先生與他相約在英倫見面。在新獲得的國外史料中，發現了兩封電報，都是　中山先生將離美國時，自紐約拍發給荷馬李將軍的。

第一封電報拍發的時間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十月三十一日，舊曆九月初十日，由紐約大西洋無線電公司發至倫敦。電文的內容是敍述當時國內的情形，急待　中山先生回國組織中央政府，並託荷馬李將軍在英洽商貸款。

第二封電報發於同年十一月一日，前電發出之次日，內容敍述黃克強先生抵達漢口，國內情勢好轉。

中山先生定十一月二日乘茅里塔尼亞（Mauritania）　輪赴英。兩電所載荷馬李將軍的收信地址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為倫敦佛里街之薩福伊旅社(Savoy Hotel)。　中山先生抵英後亦下榻於此。

這兩封電報，一則足以說明荷馬李時在英倫與　中山先生約晤；一則足以補「國父年譜」敍述之不足，是　中山先生英倫之行這一史實的極其珍貴的史料。

就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找出，當　中山先生辛亥年在英國作外交活動獲得了成就之後，經由法國、新加坡、香港，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達上海，各方有關的記載都有荷馬李將軍隨行的消息。在這一段時間，他和　中山先生的關係有似如影隨形，朝夕不離左右。　孫海乘火車赴南京就職，他也隨行。在舉行總統就職典禮時，他是參加典禮的唯一的外籍軍事顧問。

在此時期，有一段有關荷馬李將軍參加中國革命轟動一時的新聞，是當時美國在華官員對於李將軍參加中國革命的問題，視爲違背了美國起義，各省紛紛獨立，其時當時對中國的政策。因爲自武昌鎭守中立的國家在表面上是應付滿清政府的國家的對華政策是採取中立的立場，爲了要不許可他的公民參加別國的軍事行動的。其時更有一些反對革命偏向滿清政府的各國在華人士，更因此而指責荷馬李將軍參加革命政府的軍事行爲。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特爲此事訪問美國駐上海的一位官員，而這位美國官員的答覆態度是非常嚴肅的。這位官員說：「自民軍起義後，美國的態度是嚴守中立，嚴禁本國公民干預其事，在事前嚴加防止，以免事後惹起國際糾紛，是法律所嚴禁的，違者則罪在不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荷馬李將軍於聞悉美國駐上海官員的是項宣布後，感到非常的憤怒，於是他乃立卽向上海大陸報發表義正辭嚴的宣言。他大意說：

「我來中國參加中國革命是我個人的行動，與美國政府毫無關係。外間稱我爲大將，不過因我曾爲中國的康有爲、梁啓超等改良派人物組織過保皇軍，並不是美國的現役軍官，自無受美國軍律限制的必要。我參加中國革命政府的行爲是以個人資格參加，是以實行人道主義爲宗旨。今日中國數萬萬人民正受虐於專制暴政之下，我豈能坐視不救，袖手旁觀之理？我應中國的革命的人民之邀，前來中國是在解脫他們於暴政之下而免沉淪。我是一個世界正義的擁護者。當墨西哥革命，我也參加策劃。美國軍官之參加墨西哥革命的人爲數很多，美國政府從來未加干涉。我今次來華參加革命，豈有可以干涉之理？」

由他這一段義正辭嚴的宣告，我們可以看出他一種特立獨行的氣度的表露。他熱愛中國的一種表情，並不因當時美國在華官員的態度而有所改變。在荷馬李將軍的宣言中，他曾聲明，他並不是美國的大將，大家以將軍稱呼他，是由於他曾一度爲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會策劃成立保皇軍。這支保皇軍是戊戌政變以後，康、梁逃至海外，由李將軍在美國爲他們籌辦一個軍事學校，先把在美華僑子弟集中起來，給予一種軍事訓練，他的將軍頭銜是康有爲假冒光緒皇帝的宰相的名義封給他的，並不是一個正規的將軍頭銜。他何以會後來捨棄康、梁的保皇運動而獻身　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其間的經過非常的曲折而帶傳奇性，在此不作贅敘。我們一直稱他爲將軍的原因，倒不是繼承保皇會封給他的將軍頭銜而

如此。他是　中山先生辛亥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所聘的軍事顧問，所以稱他爲將軍，是名正言順的一位中國革命政府的將軍。此次美國司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爲了要遵照李將軍的遺志把他的遺骸葬在中國的國土，執政黨的負責人特爲了遵照總統　蔣先生的指示召集有關機關，組織一祭葬籌備委員會，推定張秘書長寶樹爲該籌備會的主任委員，當時爲了籌備會的名稱而頗費考慮。最後乃決定採用：「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夫婦祭葬籌備委員會」的名義，這樣，既堂皇而又正式，甚合於李將軍生前對軍事學的愛好而要作一「詩人而兼將軍」的夙願。他九泉有知，當引以爲慰了！

檢閱辛亥革命時期的報紙，我們可以看出由於大家都稱呼他爲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或郝門里將軍，因而才引起了美國駐華官員的聲明，和荷馬李將軍義正辭嚴的宣告，表示他個人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嚮往。在我們保存的史料中有一原始文件，是其時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屬下的一個單位名叫「北伐先鋒隊」，其司令官劉基炎曾有一張布告。就這一布告中可以看出李將軍在這一時期都在陪同　中山先生檢閱軍隊，而且是在正式官文書中被稱爲美國陸軍大將。文中有謂：「本司令奉都督面諭，不日偕同美國陸軍大將郝門李君暨　孫中山先生來觀本隊操法，等因；奉此，仰警衛長勤加訓練，務使紀律嚴肅，步伐整齊，以壯觀瞻，而保本隊名譽，切勿視同兒戲，致貽外人笑柄，並負都督之盛意」云。最近在臺以八十八高齡逝世的，曾經於民國十三年出席執政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張善與先生，此時正任北伐先鋒隊司令官的參謀長呢。

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革命政府的機關報，上海的民立報，同時載有兩件英文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題字，一是　中山先生所題的，題辭的內容都在喚起團結的重要，一是荷馬李將軍所題的，題辭的內容都初期所面臨的紛歧複雜的情形，而團結的問題在當日是何等的重要。墨跡因爲年久及當時印刷條件不甚完備的關係，看起來甚爲模糊，但仍可看出其大意。

「團結則生，分裂則滅。」豈僅在革命初期重要，在任何的一種情況之下，團結都是重要的。荷馬李將軍當時向我們提出的警語，至今還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據布斯所著「荷馬李的勇敢」一文中所載，荷馬李將軍在一次　孫大總統的歡迎會中，他直率的本着他自己的信念，對於中、美兩國所將面臨的問題，而提出驚人的警告。他根據他的「無知之勇」一書的論點，預言未來的太平洋戰爭，日本將爲中、美兩國帶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他說：

「中國現在是一個共和國，你們的共和國和日本三者。我們有着這三個共她的美景和自由……中國的敵人是她歷史性的和平主義，政治上的腐化同的敵人，如果不能預防和打擊它，我對於這個國家都無能效力了。我曾警告過美國。我現在要用口頭來警告你們，除非從你們心底有另外一）的戰鬥精神升起，（按『戰鬥和尚』或係指中國歷史上領導平民革命會衰亡的。假如這個『戰鬥和尚』沒有來，有共和國，或沒有共和國都到臨，將是不可避免的啊！」

他在數十年前，爲他自己的祖國疏於在太平洋方面未能重視日本這一興起的敵人的入侵設防而擔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同樣的他亦爲新興的中華民國，如果忽視日本，忽視尚武精神的建立而憂慮。在我看來，李將軍固然是一位熱忱而獻身於中國革命的友人，但他更是一個具有遠識的熱愛他自己祖國的偉人。在他的觀點，他預料自己的國家美國，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之下，將難免與日本一戰。爲此，美國在亞洲勢必需要一個共同作戰的盟國，自非中國莫屬了。我想，這也許就是荷馬李將軍所以要獻身以助　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業，所以要熱忱的獻身於救亡圖存的中國革命的動機了。在李將軍的預言與希望數十年之後，中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時期曾並肩作戰，以對付當日共同的敵人日本，而深植了兩國間深厚的友誼，這一段珍貴的史實的演成，他雖然不及見到，而他的願望確已終於實現了，這是他應當引以爲安慰的。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他由上海陪同　中山先生赴南京，他是唯一的美籍友人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被聘爲　孫大總統的軍事顧問，這些經過，在我們的史料中都有詳細的記載。但是關於他因何而離開中國，因何而得病死亡，則尚難獲得其眞相。在若干年前有位美國作家彌納德 Joseph Millard 發表了一篇「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人」的文章，內中有一段對於李將軍有如下的記載：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孫大總統在南京宣誓就任新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而荷馬李將軍全付武裝隨侍在側。二月十二日清廷告終，十五日　孫大總統率領文武百官往祭明太祖的陵墓，以告中華的光復。在典禮中，唯一允許參加的白人是統領榮譽衞隊的荷馬李。回城後，　孫博士低聲說：『我的好友，沒有你偉大而不自私的幫助，中國還不會有今日。』

「可是，沒有聽見答覆。孫博士轉身看見荷馬李將軍已癱瘓地坐在一張椅上。　孫博士是個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生，立刻知道他是中風的跡象，才爲之一驚。

「荷馬李清醒過來後，覺得左邊半身不遂，但是他鼓起力氣說：『我常常說我要埋身中國國土，可是我現在要暫時回美國家鄉養病了！』

「荷馬李和他的夫人，搭日本郵船新月號由上海出發，於是年五月到達他從來不被推崇他偉大的國度。他悲慟的對他的親密的助手奧白郎說：

『好了，我的工作完了！』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荷馬李在他的故鄉洛杉磯去世！其時他才三十六歲。」

在我們的史料中，與上面同樣的記載一時還尋不到，但從文中所指的孫大總統二月十五日祭明太祖陵的這一事實和日期，則完全相符。

## 三、荷馬李將軍的生平及其著作

荷馬李將軍，究爲何如人，我們畢竟還是陌生。在國內，除了有關黨史的少數資料之外，我們找不出更多的依據來加深對他的了解。就對荷馬李將軍缺乏了解這件事而言，不獨在我國如此，在其自己的國家亦何獨不然？如果不是荷馬李將軍在其所著「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一書中，對太平洋戰爭情勢的分析預測，不幸而言中，恐怕荷馬李將軍之名，至今仍是默默不彰呢！通才特識之士，往往不見重於當世，及至他所預見的事不幸而言中時，始被人譽爲「天才」或「先知」。這在歷史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屢見不鮮的事。正如蘇子瞻所說：「言之於無事之時，可以爲名，而不以見信，又苦於無及。」這是如何令人唏噓感嘆呢！

我們要想知道荷馬李將軍爲何如人，與其去了解他的生平，不如先去獲知關於「無知之勇」一書的故事。

「無知之勇」這本書，是荷馬李將軍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著作。在書中，他警告美國不應恃其豐饒的土地，忙碌的工廠，以及眾多的城市的生產力而自大。他特別指出日本是一個處心積慮的侵略者，而美國則是一個最容易被打倒的敵人。他說：「我們的勇氣，乃來自無能和不願對於我們的弱點的承認。」論及美國對於軍事效能的觀念，他說是一種在勝利上的英雄式的最後的累積。「這種夢幻式的英雄主義，並非建基於歷史，乃是建基於幻想；並且得大大依賴於自己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寄託着這樣的希望，那就是當我們一日遭受外侮時，所有的美國人都會挺身而起，握槍而戰」。當時的美國讀者，對於這本書的反應頗爲冷淡，有人認爲作者是危言聳聽，有人甚至視作者爲一狂人。此固不足爲怪，因爲在這個世界上，天才與狂人的距離本來相去不遠，只有少數具有卓識的人，才能把這一微細的分際認清。那麼，對於荷馬李將軍這樣的偉大的軍事天才，在當時曾被些什麼人重視呢？他的確很快地就引起別人的重視，他們是英國的羅伯爾元帥、德皇威廉二世、中國革命領袖中山先生。至於美國人，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開始注意荷馬李這一姓名，以及其三十多年以前出版的「無知之勇」這本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美國人注意「無知之勇」一書，不是在平時的圖書館或研究室中開始的，認眞地說是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初，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菲律賓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總部。這的確是一段頗饒興味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總部內，幾位參謀人員正談論着日軍進犯菲律賓的可能性及其首先要攻擊的是什麼地方。這是當時菲律賓每一個人及聯軍的每一份子所十分關切的問題。

後來曾做麥克阿瑟將軍參謀長的魏略比上校（Colonel Charles Willoughby）攤開一張呂宋島的軍用地圖，他的手指停留在這裏，在林家洋灣（Lingayen Gulf）。一個地方說：「主要的攻擊可能在這裏，然後是普利陸小灣（Polilo Dight）。這是鉗形的攻勢。」他在地圖上畫了一個箭頭。

看魏略比上校如此其胸有成竹，軍官們都笑了，這笑聲似乎是說「你爲何知道得如此確切？」

原來魏略比上校只是依照荷馬李「無知之勇」一書中所預料的戰爭情形來作一次解說罷了。然而那天與會的人中，竟無人知道荷馬李是誰，魏略比上校不得不對這事的來由加以解釋：

原來魏略比上校在一九四〇年初到菲律賓時，軍事情報機構緝獲一名有間諜嫌疑的菲律賓大學生。附有一張地圖，分析着日軍進犯呂宋島的計畫，這一分析和菲律賓當局所預測的十分相似。經查訊後，始知他是從圖書館借來的舊書「無知之勇」中抄錄下來的，只得將這個青年釋放，於是荷馬李其人及其所著「無知之勇」一書頓時引起了軍方的重視。因爲誠如魏略比上校所說：「荷馬李既非一個神秘主義者，也不是一個預言家，他是一個科學工作者。」他研究戰爭的科學，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科學的基本法則的不變性與其他任何科學無異。這就是荷馬李所稱的「無知之勇」的美國人，重視這一軍事天才家的開始。

「無知之勇」一書的前半部，乃對戰爭及其起因的探討。他的看法是：「戰爭乃由於爭生存的自然律所引起，幾乎沒有任何人爲的工作或法律能夠防止它。他認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路向從來不是平行的，當達到了會聚的那一點，戰爭便發生了。他指出當國家變得強大時，就會漸漸臃腫，漸漸衰弱，而易於被一個更年青和好戰的國家所打倒。這一點和後來軸心國家所喊的「有」與「無」的舊理論很相似。

荷馬李在書中針對美國當時的情勢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平時無準備，當其受外來武力的侵略時，會因舉國一致的敵愾同仇而獲救。」因爲在這書出版的一九〇九年，美國的海軍頗爲脆弱，陸軍雖號稱百萬，但實際並未達到這一數字。而給予美國重大威脅的則是日本，日本自然是屬於「無」的國家，一百多年前才從黑暗的孤立中脫穎而出，一躍而爲世界的一等強國。日本之所以強大，乃由於他具有獨霸太平洋的野心，舉國上下又都一致爲此一目標而效力。荷馬李認爲日本乃處於可以擊敗逐漸衰弱的美國的有利的形勢之上。

在「無知之勇」一書的第二部份，荷馬李用文字和圖表來清楚地表示出日本將如何攻打美國。且看他是如何地在爲美日雙方預作軍事上的公算：

「美國的海上防衛力量當首遭摧毀。」

「日本當已佔領了菲律賓，該島正如同現在（一九〇九）一樣，是通往東太平洋的關鍵」。（荷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李還畫了一張日軍攻打呂宋的地圖，和二次大戰時所使用的計畫十分的相似。

「在軍事行動上說來，日本征服菲律賓，比美國攫取古巴還容易。因爲美國也許要宣戰三年後，古巴的聖地牙哥才會陷落；馬尼拉卻將不到三週，就會被迫投降。」

「下一個目標就輪到夏威夷，那些島嶼正好屏障日本，那時並未準備作戰，是通往中太平洋的關鍵。」

（以下缺。）

「其次則是俄國認爲是一匹死馬，而賣給美國的阿拉斯加。假如掌握了這塊荒涼的土地，就會增強了侵入者的力量，因爲阿拉斯加是美國大陸西海岸的一塊產煤地，煤是那時海軍唯一的燃料。」

荷馬李將軍預測的情勢，在二次大戰中幾乎完全應驗了。他在書中又指出在美日戰爭中，美國西北區會被攻陷，而無須繞道築有礮臺之地。並把洛杉磯列爲易攻之地，再次是舊金山。他說：「日軍只要在豐饒的美國海岸取得一立足之點，就可以在那裏防守經年。因爲有山脈爲之屏障，只要守住幾條通路就可以了。在山脈之東，美國人則必須穿過荒原僻地以及許多山頭才可以發動一個攻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五年，在日本侵入中國之前二十九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三十三年，荷馬李寫這本書時說：如同軍事的公算一樣，所有這些可怕的事情，包括對夏威夷的突擊，都將照預定的時地發生，不可能避免。荷馬李將軍沒有預測到的是石油和飛機對戰爭的貢獻之大。否則太平洋戰爭的發展，恐怕要依照他所預測的情勢繼續演變下去也說不定呢。

儘管在一九〇九年「無知之勇」一書出版後，美國讀者反應冷淡，而在東方的日本對它卻極具興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這本書幾乎是立卽就被譯成日文，很快速地就再版了二十四次之多。每一個日本的陸海軍軍人，似乎都把這本書帶在身邊以代替日本人的「戰鬥訓」。這本書也譯成了德文（相信希特拉對這本書也很熟識），另外在世界各地亦都有發行。

我們曾說過這書出版後，在作者自己的國家美國，反應似乎冷淡。因爲在當時的美國，除非是對於賽馬，美國人不會對任何預測關心的。如像當時美國的陸軍集團，從這本書中也許看出一個機會，那就是可以從漠然不關心的國會中取得更多的經費。他如海軍集團亦然。但是，對於一般人，「無知之勇」一書，只不過是聳人聽聞而已。總之，這本書的影響很小，它並未爲美國的防衞上帶來任何的行動。

不管人們對荷馬李其人及其著作看法如何，「無知之勇」一書確已替他建立起軍事顧問的地位。在一九一〇年，他被德皇威廉第二邀請赴德國校閱軍隊，被英國的羅伯爾元帥（Marshal Lord Roberts）邀請赴英，爲他的國家作一些關於防衞上的設計。當時的英國，如同其以往一樣，依然自大自滿，只有少數的軍人，對於來自德皇威廉二世方面的敵意感到憂慮。荷馬李將軍的歐洲之行，對他很有助益，在這次旅行中，他寫下了第二部著作「撒克遜的時日」（The day of Saxon），書中顯示出大英帝國將遭遇到些什麼。他相信這個老大帝國是在崩解中，但是他看出這個國家從俄國來的危險要遠比從德國來者爲大。在書中，對於英國，荷馬李將軍有一個卓越的見解，他認爲假使英國在戰爭中失利，世界將獲致一個和平的機會。如果英國在戰爭中得勝，他警告說：則有另一場更大的戰爭，而這一戰爭，非僅爲了政治，主要是爲了種族問題。他的看法是何等的深刻而透徹。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撒克遜的時日」一書於一九一二年問世，與「無知之勇」一樣，同樣具有預言的性質，亦同樣的沉鬱。這本書的主旨簡明而有力。他說：大英帝國有着軍事上的弱點，使德國有機可乘。荷馬李將軍預測，假使英國仍然全靠其重商主義與海上的力量，不能夠立即和一個友善的陸權國家結盟，那就註定了要受德國重整起來的軍隊的攻擊。他說：在這貧婪的地球上，除非是在西半球，美國是所有的陸權國家中唯一既無所懼於英國，又無所求於英國的。捨美國而外，到那裏去爲大英帝國找一個「強大的陸權國家」來與之結盟呢？令人失望的是美國一直把英國的海軍視作美國的眞正保護者，而非門羅主義。荷馬李將軍預測說：「撒克遜的時日」已經無多了，而在各地的戰役中，在比利時，在法國、荷蘭、俄國和埃及，條頓民族的日子來臨了。他最嚴酷的預測是：最後英國在對德作戰的可能的「勝利」中精疲力盡，其固有的帝國聲威將讓渡給日本和俄國。

荷馬李這一次的應邀赴德與赴英之行，就荷馬李將軍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他在赴歐之前，和包爾斯女士結婚，二是他們在歐陸遊歷途中，應邀前往參觀德軍的大演習。這種邀請自然是一項幸遇，因爲德皇威廉二世對於邀請來參觀軍事演習一事至爲重視，荷馬李將軍之被邀請，相信是經德皇認可的。三是此行對　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發生了很大的助力。

上文對荷馬李將軍的重要著作的故事，已經有所介紹，而他的身世卻也頗富傳奇性。

他的名字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美國名人錄中，只是很簡略的記載：

「荷馬李，作家，戰士，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典華城Denver……」。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當然，現在我們對他的身世是比較當時清楚得多了。

荷馬李將軍的父親的名字是亞勒佛特 Alfred Erskine Lea。他的祖父則是一個醫生，原來住在田納西州。後來他的父親到科羅拉多開礦，漸漸富裕，於是成家立業，生下荷馬李將軍及兩個姊妹。一八九二年，他們遷居洛杉磯。那時荷馬李將軍已是十六歲的少年，在那裏老師的印象中，他進入公立中學讀了兩年。在一個「聰明而古怪」的學生；可是從學校的記錄中，他的成績卻並不古怪，拉丁文、希臘文、法文、歷史和數學，兩學年來平均都在九十分以上。他的「古怪」在於他從那時開始，就立志要成爲一個軍人。而在一般人看來，他可能會成就其他的任何事業，卻不能成爲一個軍人。因爲他是一個駝背的孩子，當十二歲身高不到五尺之後，就不再長高。進入少年期後，駝背的缺陷更形明顯，使他在學校中獲得一個令他不快而又恰如其人的綽號——「小駝子」。但這「小駝子」毫不沮喪，他少年時代最喜歡玩操練、打仗之類的遊戲。在遊戲中，他是很有權威的指揮官，被指揮的孩子們都十分服從他的命令。他之所以能指揮若定，自然不是由於他具有威武的儀容，或是洪亮的嗓音。他究以何者來懾服那些孩子們呢？他自己固然不知道，那些同他玩耍的孩子們更莫名其妙。實則他所倚仗的是一付炯炯有光的眼睛。一位曾和他在一起操演過戰爭的中國友人說：「他的目光可以把你埋入地下九尺之深，如果你不服從他的命令的話。」

一八九四年，荷馬李將軍進入西方學院，繼續在古典文學和歷史學方面求深造，但是他對軍事方面的熱中卻從未稍減。可是，他的少年同伴都已長大，不再對「打仗」的遊戲發生興趣，這是荷馬李將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感到很苦惱的事。於是他轉而大談其關於愷撒、漢尼拔、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戰爭故事。他又加上另一新的嗜好，對當時動亂中的中國特別的關心。

他在唸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問題。他強烈地反對美國對中國加以隔離和排斥。這一問題，那時在西海岸正引起相當大的紛擾。接近他的朋友們說：後來他告訴他們一個他一再地做着的夢。在這個夢中，他的命運似乎和中國聯結在一起。可見他在少年時代，就對遠在東方的中國有着濃烈的興趣。

一八九五年，荷馬李將軍入史丹佛大學攻讀法學，他的主要興趣仍是「軍事」及「中國」。但在同學們的眼中，他仍然是位「怪物」。在他的室內，張掛着大幅的地圖，他用各色的扣針標示着一次世界戰爭。一邊是德國和日本，一邊是美國和中國。有時是俄國同英國作戰，印度則成爲戰爭的代價。「看吧！」他說：「印度，這塊大英帝國的基石，如何被俄國所刼掠！」當英國與美國領先的時候，他十分得意，正如他的同學所說：「興奮得很，他儼然就是拿破崙本人。」但是，大部份時間，青年的荷馬李是沮喪的。他說：「事情對於人民、政治家、和平主義者……就是他們所見的那個樣子，美國和大英帝國就要沒落了！」

自然，青年的荷馬李拙於一般的運動項目，但他卻熱心地練習擊劍，一直到這一運動使他頭暈目眩爲止。他的劍術不惡，他自然不敵校中最好的高手，對其餘的人則可與之相抗衡。他的手臂特長，使他易於把劍擊到那些高個子的身上。在史丹佛，他的好友中不乏年青的中國留學生。從此，他開始與一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留學生到舊金山的中國城中去玩。荷馬李將軍與海外的保皇黨人也許就在這一時期有了接觸。

在史丹佛大學時期，他給兩位教授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威爾貝 Ray Lyman Wilbur非常欽佩他的腦筋。威爾貝說：「他是常常向教授責難的那些學生之一。他總是要問爲什麼?爲什麼?」另外一方面，當時的史大校長約丹博士（David Stan Jordan）卻一點都不欣賞荷馬李的腦筋。這是不足爲怪的，從一八九〇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約丹博士是美國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之一，對國際仲裁機構之能消弭戰爭，深信不疑。在荷馬李唸大一的那年，他和約丹博士可能在某幾點上發生過口頭的爭執。無疑的，荷馬李熟讀歷史，他曾向約丹博士振振有詞地說：「從耶穌之前約第十五世紀到現在爲止，這三千四百年間，地球上太平的歲月不超過二百三十四年……國與國之間的爭執，即使不是戰爭的起因，也是行將戰爭的徵象……以仲裁的方式來加以消弭，最多不過拖延一點時間而已！」荷馬李可能還加上他最喜歡的告誡：「所有偉大國家，都仗劍而生。所有的國家不管多偉大，如不自爲之守，也將在劍下喪生！」

荷馬李與約丹博士對於戰爭的辯論，如果不被美國和西班牙之戰所切斷，可能會繼續下去，直到荷馬李畢業爲止。

大學二年級末了時，荷馬李因眼疾發作進入醫院治療。在治療期中，又感染上天花，當他復原時，所幸臉上還沒留下疤痕，美西戰爭卻過去了。他不能再忍受大學的教育，對童年時的好友卡恩（Harry Can）說：「所有的偉大事業都是由劍刻出來的，我的事業亦是一樣，我要用劍刻出我的事業。」而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卡恩婉轉地提醒他，不要忽略身體的畸形時，他卻引詩人拜倫援助希臘爲例，慷慨地說：「中國將是我的希臘。」

從此時以後，荷馬李將軍與中國的關係就漸漸從想象轉變成爲行動，因爲他深信創造一個強大的自由民主的中國，比防衞大英帝國還來得重要。一種不可思議的幻象，一種近乎神化的戰略眼光，荷馬李將軍知道他自己的國家美國，在不可避免的對日作戰中，須要一個亞洲的盟國，他之與　中山先生不平常的關係之建立，遂植根於此。

## 四、荷馬李將軍結識　中山先生的經過

關於荷馬李將軍和　中山先生相識而結爲知交，究竟發生在那一年？就已有的各種資料，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很難遽下結論。可是他是一位對中國改革運動極具熱忱的美國志士，從贊助戊戌政變以後的康有爲、梁啓超在海外的保皇運動，後來忠誠地獻身於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排滿運動，則是一不可磨滅的事實。他於一八九九年，中國的己亥年，曾初次來到中國，並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隨着八國聯軍中的美國司令官賈飛將軍一同打進北京，也是一項確切的事實，他和康有爲、梁啓超發生關係遠較和　中山先生認識爲早，也是一項不可移易的事實。然則，荷馬李將軍與　國父中山先生究在何時結識呢？

據美國方面的記載，說他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之後，由北京到了香港，他有一位昔日司丹佛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學的中國同學接待了他，並給予照顧。這位中國同學並告訴他，渠過去曾參加過康、梁的保皇運動，此時決予放棄。有一天，這位中國同學告訴李將軍一定要會見一個人，這個人認爲要改革滿清朝廷，用由上而下的改革已經太遲而不可能了，他的主張是：中國要得救，必須從下面開始改革——由人民來加以拯救。這個人，是一個接受外國教育的基督徒，一個學醫的學生，只比荷馬李大十歲，他領導一個比保皇會還要大的組織，有多少熱誠會員日夜都在爲中國革命而努力。這個偉大的人物，就是　孫逸仙，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國的華盛頓！

在布斯先生「荷馬李的勇敢」一文中，還記了一段　中山先生初次看見荷馬李將軍的情形。這一材料從何而來，不得而知，而他所說則是得自　中山先生自傳中所記，無論如何，這一段描繪是生動的，也是很近乎情理的，我現在把它錄在下面。他說，　中山先生說：

「這對我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我正對一羣同志在演說，當我的目光落在一個有點畸形的年青人身上時，看見他的臉色蒼白，……我說話完了之後，他走過來見我說：『我願以我的命運交給你，我相信你的想法會成功。』他伸出他的手，我和他握手並謝謝他，奇怪着他是什麼一個人。我想他是一個學生。在他走後，我就問：這個小小的駝背是什麼人？帶他來見我的那個人就說：『他名叫荷馬李，目前最優秀的軍事天才之一。他對現代戰爭完全內行！』我驚愕得幾乎透不過氣來。『他要拜訪荷馬李，我告訴他：假使我成功而我的同胞們也給予這樣的權力，我要使他成爲我的首席軍事顧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現在就任命我吧！那你就會成功的。」荷馬李向　孫先生如此說也變成了一位中國革命的民主鬥士。

布斯文中說，荷馬李自此變成了　孫博士的參謀長，他在那天同時

如果就上面這段記載，荷馬李和　中山先生初次見面是在這樣的一個演說會中，那末，地點當然指的是在美國的華僑社會，不是舊金山，便是荷馬李的家鄉洛杉磯的中國城。於是關於他們二人初次認識的時間便可推算得出了。

前面所說他兩人的結交是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則是不可信的，其理由如後。

第一、據「國父年譜」所載，一九〇〇年，庚子年，　中山先生爲策應廣東惠州起義由日本橫濱偕楊衢雲、日人宮崎寅藏於是年六月十七日抵香港，未得登岸乃轉赴西貢。同年七月十七日由新嘉坡經香港都未得登岸，原因是：自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香港政府頒布五年放逐令，不許　中山先生居留香港。故此兩次到香港都留在船中未得上岸，僅在船上指示同志方針後，旋卽離去。因此，荷馬李於庚子年，一九〇〇年與　中山先生在港初次晤談之說，似屬不可能。一說晤面地點是在日本，也無足夠資料可以考證。

第二、如果晤見地點是在美國，那末，荷馬李由中國返回美國已在一九〇一年之後，一九〇〇年晤見之說，在時間上也不符合。

那麼，他們二人是何時在美國晤見呢？在我看來應當是在一九〇四年，甲辰年較爲正確。查　中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先生赴美共有四次，約計如下：

第一次赴美是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先至日本，即由美赴英，而有倫敦蒙難被禁在駐英國滿清公使館內之事。脫險後，於一八九七年，丁酉年，由英經加拿大逕赴日本，此次似未赴美。其一八九六年第一次到美國，其時華僑社會民智未開，而留美時間亦很短，故不能有太大活動，而此時的荷馬李才二十歲，他生於一八七六年，其時他尚未進入史丹佛大學，故見面機會極不可能。

第二次赴美是在一九〇四年，甲辰年，二月十一日由檀赴美，於是年十二月才又離美赴英。

第三次赴美是在一九〇九年，己酉年，九月由英轉美。

第四次是一九一一年一月由歐洲再到美國，直到得悉武昌起義消息後，才由美赴英，從事外交活動，以助革命的成功。此後，雖有多次赴美的安排，都因國內時局的影響未曾重至美國。

我爲甚麼要確定荷馬李將軍和　中山先生第一次的晤見是在一九〇四年，他第二次赴美的時候呢？第一、他自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脫險之後，他的名字已轟動全世界，舉世公認爲是中國革命的領袖。第二、他這次到美，他已經與在美的洪門致公堂的贊助革命，革命的聲勢已在華僑社會中建立起基礎。而荷馬李此時則在美正爲康有爲、梁啓超的保皇運動效力，爲他們召集華僑子弟辦理軍事學校，培養軍事幹部，以便策動在國內有所作爲。而他被康有爲封爲大將，或將軍，便是在這一時期以前。荷馬李有一穿着滿清將軍的軍服的照像，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得出他在未歸向　中山先生以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和康有爲保皇會的關係。第三、 中山先生於此時把革命勢力已經在華僑社會中建立了基礎之後，便已開始作國際的宣傳活動，以增厚革命的聲勢了。 中山先生於是年發布了一重要的英文文件，題名爲「中國問題之眞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於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眞像，便更激起了美國朝野和其他各國人士之認識，革命聲勢爲之大振。

荷馬李將軍於是年舍棄康、梁的保皇運動而結識了 中山先生，爲中國革命貢獻其忠誠與智慧，與上述的各種情形自不無影響的。

一九〇五年六月，荷馬李將軍曾陪同時在紐約的康有爲及其女公子康同璧等校閱訓練的維新軍，是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紐約時報亦曾報導此事。對于這件事，羅正邦先生在其所著「康有爲」一書中曾加以註釋說：「荷馬李於一九〇四年參加中國革命運動，隨卽爲 中山先生之重要軍事顧問。他於一九〇五年，這一次陪同康有爲校閱維新軍，不少人都懷疑他是 中山先生隱伏在保皇會中的革命工作者呢。」

其實，直到一九一〇年 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的關係，仍在極端保密階段，何以見得呢？在一九一〇年秋天， 中山先生在檳榔嶼時，在一封致荷馬李將軍的信中說：「小心你在美國所接觸的任何中國人，並且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讓任何人知道我與你之間的關係。」在另一信中，又告訴荷馬李將軍的友人布斯先生：「康有爲目前正在新加坡。在我抵達以前，他已經在此兩日了。」

據高凡Hebert H. Gowan與霍爾Joseph Wathington Holl 所著「中國史綱」載有荷馬李夫人復霍爾的信中說：「 孫先生與荷馬李將軍深切的會談，在光緒帝去世前幾年訪美之時。在此以前，荷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李並未參加　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光緒帝去世在一九〇八年，　中山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至十二月間。復據孫哲生先生最近的談話，亦認爲　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相識，是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可爲參證。

中山先生與荷馬李的關係不只是在革命上的同志，就是在學術上，兩人也是經常相互切磋研究的。荷馬李的名著「無知之勇」一出版，就寄贈一本給　中山先生。　孫先生在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自檳榔嶼給荷馬李的信中就這樣說過：「請將你的近著『無知之勇』再送一兩本來，因爲以前我有的那一本被我的朋友拿走了。」至於對這本書內容的批評，　中山先生在同年的另一封信中這樣表示他的意見：「至於你對飛機的看法，我拜讀了好幾遍，欣賞之至。你的所有的論點都完全正確，對於你書中的第一部，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但是第二部『把飛機當作偵察之用』中，你卻疏漏了一點，那就是可以用飛機來照相，這可以幫助指揮官來判斷敵情。」接着　中山先生還舉出日俄在遼陽之役中，俄軍只用輕汽球來觀察，而未能用飛機來照相，所以不能判斷出兵力只有俄軍三分之一的，而且陣線綿延達一百里，反而認爲日軍人多勢衆，卒爲日軍所敗的經過說給荷馬李聽。從　中山先生在六十年前就已看出飛機在軍事上的用途這一點，我們幾乎可以認爲這與他後來主張航空救國，及在革命時期即已着手培養空軍幹部爲我國現代空軍奠定基礎，不無關係。同信中　中山先生還詳細談到翻譯這本名著的事。　中山先生那時或者認爲中國懂英文的人少，懂日文的人多，所以告訴荷馬李說要他日本的朋友先行把該書翻成日文，再從日文翻成中文較爲容易。這樣看來，中山先生如此不厭其詳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和荷馬李作率直之批評和討論，兩人自不只是在革命上志同道合，就是在學術上也是可以認眞討論的好友。

## 五、有關重要資料初步的探討

荷馬李將軍早期與康有爲、梁啓超的交往，及其後期與　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有其微妙而深切的關係。此一關係自非片言隻語所能概括，只得留待獲有更多資料時，再作分析與補充。

茲就已有的兩項資料：一、新近從美國學術機構蒐集到的，包括七封　中山先生致荷馬李將軍的信函和一次會議的一項紀錄。二、黨史會保存的「布斯文件」，這一文件是民國五十四年，孫哲生先生獲自布斯先生之子 Lawrence Boothe 的。據悉全數有百餘件，孫先生所獲者爲其中之十二件，包括十一封　中山先生的信函（兩封給荷馬李將軍，九封給布斯先生）。另一件是　中山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的名義給布斯先生的委任書，委任布斯（Charles B. Boothe）爲同盟會的海外財務代辦，進行一項貸款的計畫。

先行依據上述資料，作一初步的探討，藉以明瞭　中山先生與荷馬李將軍及布斯先生之間所計議的是些什麼事，以及由於這些事所顯示出來的這一時期的革命史實。

在下面我把這些資料依時間先後爲序，摘錄其內容要點，與同一時期國內革命勢力進展的情形對照的予以排列，以明白其時其事的背景，然後再分條申述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發信日期及內容摘要**

一、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自加州舊金山函荷馬李。略云：俟在此城事務安頓妥貼，即行前來與你及布斯晤聚。

二、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中山先生以同盟會總理名義，自洛杉磯給布斯先生以正式的海外財務代辦委任書。

三、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自舊金山函布斯。略云：今晨抵舊金山，將於明日搭乘高麗丸赴檀香山，並告知在檀地址，希望很快得到佳訊。

四、一九一〇年四月五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布斯。略云：剪報及容閎的信均悉。並告知容閎可獲知他們所商議的事。

五、一九一〇年五月九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

**國內革命情勢略述**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中山先生由英經紐約抵舊金山。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廣州新軍起義，事敗，倪映典殉難。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六日，汪兆銘、黃復生等謀炸清攝王，事敗，被捕監禁。

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黃克強先生上書　中山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荷馬李。略云：據國內來訊，廣州新軍第一協的餘眾約七千人，已回到他們的家鄉，靠近廣州灣的法國租界，並展開宣傳，且增加了萬餘響應者。其餘的人，則散歸海豐、陸豐，此二處是惠州的海岸地帶，人數日增，正待命再起。未被滿清政府解散的兩協新軍，將回廣州駐防，到防地之地，即可獲得彈藥裝備，我們將可加以運用。

胡、黃等先生已到新加坡。汪兆銘在北京被捕。

六、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荷馬李。略云：將於月底乘蒙古丸赴日。據悉，同志們在未悉我們所擬定的計畫之前，正設法獲取法國當局的許可，准許會眾在其地開墾。武器已有方法由香港某商行供應。如在美借款有着，望你來港看看這一商行，以後再考慮和其他商行接洽。可把此政一商行作我方生詳陳革命計畫四點：

1. 運動革命之方略。
2. 連絡他省軍隊及會黨。
3. 擬聘武官及技師以充組織及訓練之用。
4. 從各省同志中，多求組織總機關之人才，以作將來調和省界之用。

一九一〇年五月三十日，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赴日本，六月十日抵橫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之供應站或轉運站。因該船隻和倉庫，獲有將武器運至任何地方貯存的許可，並告以在日本之通訊處。

七、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函布斯。略云：本月三十日將乘蒙古丸赴日本，在日將作短暫停留，以候回音，並爲將來的活動力爲準備。

八、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山先生自日本東京函布斯。略云：抵日已兩週，北京清政府用盡方法逐我離日，日政府頗困擾。幸獲軍部支持，得以暫住。我告知我的同志，你們主張時機未熟，暫緩全面起義。他們均表同意，並允轉告各省立即停止舉義。我認起義可等到本年冬季爲之，俾我們有數月時間活動。

我將準備離此，若在我行止未定之前，你的工作有成，即請電告香港某地。各省代表簽署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文件已備妥，將儘快寄上。

九、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中山先生自新加坡函布斯。略云：六月底離日，兩天前抵此，在留日期間以及此行道經上海與香港，均曾將你的主張告知同志。現有稍候時機成熟再行起義同志一人已由艦長升任艦隊司令，若時機到來，確信他會與我們合作。事情進展如何？紐約之行結果如何？急切等待你的確訊。擬往馬尼拉，請代介紹那裏的朋友，並請貴友前任菲律賓將軍，爲我介紹那裏的官員。康有爲刻在新加坡。

十、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　中山先生自檳城致函荷馬李。略云：進行在一年之內，練成新兵兩師。在廣州革命的力量比以往更爲壯大。在海豐、陸豐地區，人數日增。而潮州、嘉應州兩地也準備加入。又在香港、虎門和惠州三角

---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日，　中山先生自日本抵新加坡，欲重新整頓革命團體。七月十九日自新加坡赴檳城，整頓檳城同盟會。七月二十日致函吳稚暉先生，請設法營救汪兆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區會黨，至少擁有三萬枝的威力，將給我以支援，但必須供給他們彈藥。

長江流域的起義，於抵日時即已加以阻止，他們起初只應允保持安靜至今年多天，現在可使他們再等些時，直到我們籌款的計畫成功。你可繼續按照原定計畫行事。

十一、一九一〇年九月四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布斯。略云：六月二十五來福槍的威力，將你東部之行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在日本時，已告知你及荷馬李將軍，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的起義已適時制止，以待我們在美國的計畫成功。我答應取得之簽名書，已自橫濱掛號寄上，想早已收到。

現在結果如何？成或敗，均請速告，以便將來採取獨立措施。

如你以爲籌款計畫定能成功，最後之決定僅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問問題，亟盼你能在你自己的帳下先付五萬美元，以便進行準備工作。計畫成功，當雙倍奉還。今冬在長江流域與華南地區將無行動。今後兩三月內，我仍在檳城，在此期中，除非上述五萬元能先行寄來，否則，即使我們的計畫告成，我也不能與你會晤。自前次失敗之後，我們在廣東軍中的地位已恢復，且在短期內必更形加強，國內其他軍隊的態度亦復如是，均急切期待普遍起義的信號。

匯票請用中山之名。

十二、一九一〇年九月五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荷馬李。略云：已函布斯，請先墊付五萬美元，如現在有此款項，能做之事超過幾月之後同樣數額所能做的十倍。在廣東沿海地區，頗易獲得合作，我們能夠發動一次起義，較之我們在「長堤」所商談者容易而快速，且費用甚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確認首取廣州，將能解決準備支援攻擊之困難，同時裏應外合，必能攻取該城。該城攻下，至少可獲千萬枝現代化步槍及大量軍火，以及數百尊大礮、兵工廠，且有豐富之現金及大量物資供應。用於此役之款項，較之我們在美所擬定的另一計畫失敗，尚須請你另外設法，如布斯之紐約計畫所費爲少。

爲廣州之事籌五十萬元，能否在短期內籌足此款？如果不能，亦請盡力而爲，無論如何，設法先寄五萬元以作準備工作之用。

自我停止今夏在長江流域與華南的起義後，即遵從你的勸告，我們全部的希望均集中於美國計畫。如你與布斯的計畫均告失敗，切盼立即告知，以便即行採取獨立措施。

在發動廣東起義之前，獲取英國政府之完全諒解，至爲重要，對此，你與我務須同赴倫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合力而爲。如果在美籌款計畫告成，及時寄來五萬元，我立卽使其他人員進行工作，而我本人則卽赴倫敦與你會合。諸事亦可在該城商討。如你的計畫全部失敗，請立卽告知，並請盡可能地寫很多致馬尼拉方面的介紹信，立刻寄給我，切盼之至。

十三、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山先生自檳城函荷馬李。略云：八月七日寄港之函已收到，此後請逕寄檳城。如布斯計畫失敗，則其財務代辦名義卽行撤銷，並歸還我簽名之文件。望續進行我們所商之另一計畫，並儘快籌款。目前預計有二十五萬美金卽可應付，卽使不足此數，亦可完成非凡的工作。東返後，已如約停止準備未周的起義，條件是我將在今冬籌到經費。如屆時做不到，我的信譽將會遭受打擊。望促布斯將發信所索之款寄來，以維我的信譽。

一九一〇年九月十八日，湖北羣治學社改組爲「振武學社」（辛亥武昌起義前重要革命團體之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四、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中山先生自檳城函布斯。略云：如今十月已過，財團商議之結果如何？迄今未得確訊。我擔心紐約計畫或已全敗。是否尚有其他途徑籌款，現刻因準備工作多已完成，已不需曩日所計議數目之巨大。原數的十分之一即足夠達成目的。目前我們所需之數，五十萬即可。此一數目，籌措必較容易迅速。你若能在三個月內籌足此數，適可及時用於我們的計畫。如逾此期，我們將不等待，而須採獨立之措施，以我們所能的任何方法爲之。如我們在你們借款之前獲得一永久立足地，則借款條件必須全部修改。假若我方無所作爲，或是企圖失敗，則仍繼續履行在洛杉磯議定的借款條件。

十五、一九一〇年×月×日，　中山先生自檳城致函荷馬李。（此函未註明月日，據推測當爲前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山先生在檳城召開會議，黃克強、趙聲、胡漢民、孫德彰、鄧澤如等與會，決定籌款，謀在廣州大舉。「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　中山先生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眾志成城，則財用一途，予當力任設法。」趙聲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救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按廣東新軍失敗，多數同志無所歸宿，特在九龍關一地，使之暫事耕種，以維生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文件同日或後此之一月初會見，今十月已過函云，財團方面要在十分之一款項就夠了。

，消息沉沉，故對布斯前你照你自己的方法，儘速爲我們籌款，我雖不坐待機會來臨，但無經濟上之支援亦難展開工作。目前我們只須少數額嗎？的成功。我想原計畫的款項，卽可獲致確定你能在短期內籌集這一



）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卽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以上見　中山先生：「有志竟成」章）籌商者再，遂於是日在檳城召開秘密會議。與議者除黃克強、趙聲等外，尚有檳城黨員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　中山先生認現在時機既迫，吾人當爲破釜沉舟之謀，款項多一分，則籌備足一分。吾黨不乏熱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事先爲備，每有臨渴掘井之患；今舉全力以經營；鑒於前車，故爲充分款項之籌集。事濟與否，實全繫之。於是各同志分赴各埠，數日間已得五六萬元，而遠地更不可計。此次所謀廣州之大舉，仍以新軍爲主幹，並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爲選鋒，任發難之責，以領導軍民，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計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六、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中山先生在赴歐途中致布斯函。略云：十月二十一日與十一月一日兩函，在離檳城前數日收悉。此後未獲來電，我認爲或已無法在彼處完成我們所決定之問題。今我正採獨立措施，於未來數日發動大規模的義舉。可是，目前亟需援助。你自己是否可爲我們設法？若再有幾十萬，就諸事可行。無論如何，不論我們獲得此筆款項與否，我確信下次起義必獲成功！

我在十二月六日自檳城赴歐，明日將進入紅海，在歐事畢，我將赴美，然後返國。至美海岸，當即與你連絡。如你能給我們支援，就逕來洛杉磯見你。

十七、一九一一年三月六日，　中山先生致布斯函

壹、專　論

廣州得手，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黃興自星加坡返抵香港，與趙聲等組織統籌部，策劃廣州起義。

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譚人鳳奉統籌部令至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略云：近以行止不定，未克握管，現將離此約一週，前往 Kamloope 等地，然後去紐約，預計一個月內可到。由於你們未及時籌到所需之款，我們必須以自己的辦法發動起義。如今我正向自己的同胞們籌募，已得所需之半數，餘款則望能在東行途中獲得。一俟籌足，即行開始行動。你計劃如何獲取款項，籌集較小數額仍有希望嗎？如我再到紐約之前，你依然無所作爲，我必須請你寄還我的同志簽名書，因我曾許諾同志，若借款不成，即原件退還也。

十八、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中山先生自舊金山函荷馬李。略云：得自華府來函，欣悉你在政府人員和參議員中，獲如此大的成就，立即囑國內同志配合工作。信甫寄出，已悉革命黨在北方新軍中活動有成，吳祿貞任第六標標統。以前任職各省之河北籍軍官現已紛紛回北京任

口，赴長江流域聯絡軍人，設立機關，以備響應革命。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舊曆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先生率同志在廣州起義，進攻兩廣總督衙門。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四川發生鐵路風潮，成都成立保路同志會，革命黨人乘機激揚民氣，分途活動，部署羣眾。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三日，林冠慈、陳敬岳炸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未中，死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職，以便發難時和其他各標呼應。你可知他們在未悉我方計畫之前，已有所作爲。目前唯一急務，乃爲籌款以應起義之需。最近英、日聯盟告成，對我革命不致有不利影響。顯示日本仍欲在遠東獨行其是，以遂其私圖。目前日本人民正在重稅下透不過氣來，其政府尚須十年時日，經營高麗和滿洲，他們仍需金錢與和平，故在日本下手之先，我尚有餘裕來改造中國，望你速把握對英的工作。我不久將離此東行，望十月底能到紐約。

十九、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山先生自愛達荷（Idaho）　函荷馬李。略云：如有途徑，仍擬在巴黎或倫敦建立總部。黃將軍因國內事繁，尚未赴歐。最近在四川政府和人民之間發生鐵路風潮，我們在南方總部大感困擾。謠傳在四川的軍隊已加入這一紛爭。如此事屬實，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保路同志會擴大爲民眾大會，決議全川罷市罷課。革命黨人謀據重慶獨立。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武昌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會議，決定總動員計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同志們建議先發動滇軍，採取行動，再發動廣東的軍隊響應。但我不相信這是眞的，因我們從未有先在四川發難的計畫，故無此準備。據官方報告，川省新軍不服從總督的攻擊令，也不參加到人民的一邊。新軍採中立態度，是乃實情。

至於如何，何時，並在何處獲得所需之款，我實不能有所決定，只希望儘快獲得。在我紐約之行結束時，擬赴歐一行，看看在英、法方面還能做些甚麼工作，並問候賢伉儷。

以上十九文件中，第五、六、十、十三、十五、十八、十九等七件，故合併爲一初步之探討如左：

一、回溯　中山先生於一九〇七年冬鎭南關之役，一九〇八年春欽廉、河口等役失敗之後，卽有作歐美之行，以擴大革命影響和聲勢的打算。他的目的不外三點：一是藉宣傳以發展組織；二是籌鉅款圖謀大舉；三是重外交以增長聲威。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九日自新加坡起程，作第四次的環球旅行，經巴黎、倫敦等地，而於是年冬十一月八日抵紐約。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抵舊金山。而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倪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映典殉難，則爲是年二月十二日。文件一致荷馬李函卽在廣州新軍失敗之後。此函內容，顯係一次重要的會談已醞釀成熟，行將約期舉行。按此一會談，卽文件二所指的「長堤」會議。從文件二看來，三月十四日正式委布斯爲財務代辦，則此一會議之時間應卽在此日及此日之前數日內。會議在洛杉磯長堤城荷馬李住所內秘密舉行。參加會議的究有幾人，雖尚待考，不過主要的是　中山先生、荷馬李將軍、布斯先生三人則可斷言。

此一會議之結論，據有關資料推之，大致如左：

1. 中國革命黨暫行中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的起義，改行厚蓄實力、充分準備、集中人力財力、發動大規模起義的策略。按此一決定的來由，不外(1)鑑於歷次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的革命起義，犧牲人才，耗費金錢，而收效不大。而月前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尤爲一新的創痛。(2)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多爲外人利益所在地，由於此等地區發生頻繁的革命事件，社會因之不安，影響外人利益不小。若仍在此種情形下向外人貸款，勢將增加貸款困難。

2. 由　中山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名義，委任布斯先生爲海外財務代辦，由布斯出面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以應大規模革命起義之需。並由　中山先生辦理一國內各省革命代表簽署之文件，以爲貸款之一項證據。

3. 運送在美訓練之軍官若干，以充實革命武力。

4. 貸款之總額，總計爲三百五十萬美圓，計分四次支付。詳見左列長堤會議之一項紀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紀錄

## 第一項支付款項

第一：整理各種團體

（a）華中　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b）華北　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會長的需要，支付一百名工作人員的用費。

第二：沿東京灣Tonking邊界組織軍隊，並設置軍火調配站……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某種土地的特許權，在特許權之下，使用土地，建立一千人的駐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掌管該種特許權的總經理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四：廣東代辦處……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東京代辦處……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五：一萬枝毛瑟步槍，二、五〇〇、〇〇〇顆子彈，三十六尊大砲及一四、四〇〇枚砲彈，以匯票支付三分之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六：獲取北京附近的五鎮（Divisions）的控制權……五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七：獲取組成中國海軍的四艘巡洋艦的控制權……四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八：軍事總部的費用……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九：會長總部的費用……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十：準備金（Contingent Fund）……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二項支付款項**

第一：支付動員與支援五千人的六個月費用……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二：支付六個月的美國軍官的運送費與維持費……七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發給美國軍官六個月的薪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三：支付中國翻譯人員的運送費與維持費……一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四：作戰軍火的最後付款……三五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五：五千人與軍官等的全副裝備……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工程人員、藥品與運輸給養……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七：馬匹、參謀人員與總部的裝備……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八：軍火與給養的運輸……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九：準備金……五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一、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三項支付款項**

第一：額外的五千人的動員與裝備……一五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二：擔任運輸的五千名苦力的動員與裝備……五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三：一萬五千人的三個月維持費……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原文缺第四。）

第五：準備金……一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外交用途……一五〇、〇〇〇美元。
依會長的需要，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七：付給美國軍官三個月的薪水……五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八：步槍彈藥七、七五〇、〇〇〇發……一七五、〇〇〇美元。
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合計……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四項支付款項**

戰役基金……七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一次支付……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二次支付……一、一〇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次支付……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四次支付……七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總計……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二、由於「長堤會議」之決議，　中山先生於「籌款」這一要項已胸有成算，故於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抵檀香山，並於五月九日自檀函荷馬李告知廣州附近革命武力的蓄集情形。（文件五及六）並函告布斯此後行止。（文件七）五月末離檀香山乘蒙古丸赴日本。六月十日抵橫濱。船抵橫濱，為日水上警察認識，又被清偵探察覺，清使用電話詢日本外務省，外務省答以不知。不意橫濱警長已行公事報告內務大臣，遂開閣議，由於陸軍大臣對　中山先生頗表同情，得暫留日本。此事，日本友人犬養毅、頭山滿、宮崎寅藏等奔走甚力。）據文件八，獲知　中山先生此次日本之行，要在與黃興、趙聲、宋教仁、譚人鳳等革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黨人聚議，實踐長堤會議之兩項承諾：1.暫停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之起義，厚蓄實力，再謀大舉。2.簽署各省革命代表文件，寄布斯以爲貸款之一項證據。據「國父年譜」記載：「宋教仁、譚人鳳與先生論會務改進，爭持頗多，然亦隨歸愜洽。」「長堤會議」之結論料亦在爭持項內。

三、中山先生在日本迫於情勢，不能久居，或亦由於在日本與諸同志之會商，已共決在廣州大舉之謀，遂於是年六月底離日，七月十一日抵新加坡。文件八、九，自日本及新加坡分函布斯催詢貸款進行情形若何。七月十九日自新加坡赴檳城。在檳城連函布斯及荷馬李，（文件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文件十一乃非常急切地請布斯先行墊借五萬元應準備工作之需。文件十二於致荷馬李函中，明白表示了攻取廣州以爲革命根據地之計畫。此一函件並決定，如借款告成並能及時寄來五萬元，中山先生將立卽偕荷馬李赴英倫，在廣州起義之前，獲取英國之完全諒解。他之重視外交由此可見。而辛亥武昌起義後，他之在丹佛聞訊後不立卽返國，與時在英倫的荷馬李相約在英晤面，從事外交活動這件事，亦由此可見不是出於臨時的決定，而是早有成算的。再則從此一文件中，我們獲知，如果布斯在紐約的借款成功，則一九一一年的廣州起義，就　中山先生的預計，可能此役已足使革命克底於成。

又，此一文件中，　中山先生對首取廣州之念已決，已有如果布斯紐約方面的貸款失敗，卽行採取獨立措施之意。

四、文件十三，　中山先生告知荷馬李，恐布斯之計畫已經失敗，望速進行他們二人所商之另一籌款計畫，並謂只須二十五萬元卽可完成非凡的工作。足見後此的一九一一年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此時已有佈署，而爲不久之後召開的「檳城會議」之所由。

「檳城會議」在　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次聚會。一方面由於是年二月二十日廣州新軍起義雖告失敗，而革命的影響在廣州地區卻更形伸張，由新軍而擴及會黨；由廣州一城而擴及四周鄉鎮；由少數革命成員而擴及青年志士。故廣州再舉之謀決定甚速而成熟亦快，正如箭已在弦，不得不發。另一方面，　中山先生所恃以爲後盾之布斯紐約借款，仍在成功與失敗之間，而失敗之成份似較成功爲大。在此情況之下，　中山先生處境之艱難，恐尤十倍於往昔。「檳城會議」的中心任務，厥爲廣州起義經費之籌集。籌集之道，當然最好是對外借款有成，然而卻已顯露不足信賴。其次是所謂採取獨立的行動，反而求諸己，即向華僑社會募集，卻由於以往各次起義，募集已一而再再而三，加之其時康、梁在海外之活動仍發生部分抵銷的力量，故亦非易事。然而在必要時，又舍此之外，尋不出更好的途徑。

五、文件十四，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中山先生函布斯有云：「如今十月已過，財團商議之結果如何？迄未得確訊，我擔心紐約計畫或已全敗。」但仍寄予莫大之希望，囑布斯籌集原數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並謂能於三個月內籌足，就可及時用於預定的計畫。此文件之時間爲「檳城會議」之前五日。故　中山先生於十一月十三日，檳城會議中對同志仍有：「財用一途，余當力任設法」之語。（文件十五，　中山先生函荷馬李，對布斯已不存希望，轉請荷馬李照自己的辦法籌款，或亦爲　中山先生希望所寄之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六、觀「檳城會議」的結果，是未全仰賴布斯之紐約借款。而由同志分赴各埠募捐，數日間已得五、六萬元，而遠地更不可計。此一款項，應卽爲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準備金之一部份。

七、文件十六，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中山先生已在赴歐途中，函告布斯大規模的起義行將發動，並請仍代爲設法籌款。

八、文件十七，一九一一年三月六日，　中山先生在雲高華（Vancouver）　顯然已突破了前此阮陞的現狀，親赴國外籌款以哺育革命的武力，並云已得所需之半，餘款亦似已有把握。按其時爲四月二十七日（舊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前五十日，需款之孔急自不難想像。故　中山先生仍迫切地向布斯呼籲，連較小數額之款亦竭力爭取。並向布斯先生「攤牌」，要索回以前寄給布斯的各省革命代表簽署之文件。

九、綜括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文件，　中山先生自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中旬在檳城及其起程赴歐這一期間內，由於國內革命武力加速地成長，促使革命黨在廣州之大舉已有迫不及待之勢。而國外則布斯之借款周折頗多，其希望繫於毫髮之間，　中山先生日在此一情勢之煎迫中。在中國革命史上則尤爲極具意義之一頁。

十、文件十八，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　中山先生在舊金山，已是廣州黃花岡之役的百日之後。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斯紐約之貸款未獲結果，自然直接影響到是役之失敗。此時　中山先生不得不放棄布斯的紐約計畫，而與荷馬李另謀一「華府計畫」，此一計畫之內容，雖未能詳知，但其目的在貸款則一。　中山先生在此函中說：欣悉荷馬李在華府進行順利，立卽囑國內同志配合，而信甫寄出，就接到國內北方革命情勢急轉的好消息。並論及英日同盟對中國革命不致有不利之影響，語極透闢。

十一、文件十九，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山先生在愛達荷，告知荷馬李擬在巴黎、倫敦建立總部。此時正值四川發生鐵路風潮，　中山先生在致荷馬李函中曾有分析和策劃，對川路風潮眞象瞭如指掌，可補革命史之不足。　由中山先生在此函中，告荷馬李已有歐行之意。據函中口氣推知，其時荷馬李或已在赴英途中或已至倫敦。藉知武昌起義後　中山先生歐洲之行，乃既定之行程。武昌革命爆發，更增他赴英的必要。

十二、從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長堤會議之一項紀錄中，我們不但獲知了布斯紐約貸款的數額，更可寶貴的是這項紀錄，提供了當時的全面革命計畫。故這一紙表面上看來僅爲一「賬單」之類的文件，卻是一極具價值的革命史料。舉凡華中、華北會黨的改組，廣州沿海根據地的經營，武器的購運，北京附近五鎭的控制，海軍四艘巡洋艦的運用。（參見文件九）美國軍官的運送維持以及翻譯人員的費用等，均逐項列有預算、支付方法、支付地點，可供研究革命史者的重要參考。

總之，從這十九文件及一件紀錄中，我們對左列各項史實加深了瞭解：

一、辛亥年廣州起義的另一重要背景——「長堤會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中山先生奔走國外各地史實的另一重要環節。

三、中山先生重視外交的卓見。

四、當時革命運動全面佈署的情形。

因之，這些文件，對中國近代史是有其貢獻的。

按：本文於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二十日，由國史館印行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

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臺舉行開幕典禮，自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大會在廣州集會，到現在已是第十次大會的召開。從第一次到第十次我都是出席人員之一，就個人而言可以說得上是一件幸運而值得回憶的事。

### 一、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我於民國十二年的冬天，當選國民黨加拿大總支部的代表，回國參加民國十三年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我尚是二十餘歲的青年，轉瞬間我已是七十歲的人了，時間過得多麼快呀！

從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算起，到民國五十八年的今天，恰好是四十五個年頭又兩個月零九天，當時出席第一次大會的代表今日尚留在臺灣的僅有張知本、孫科、李宗黃、白雲梯、李肖庭、苗培成、延國符諸先生和我八人，年齡最長的有九十初度的張知本先生，八十初度的李宗黃先生，其中最小的要算是我和延國符先生，然已是坐七十望八十之年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從民國十三年參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五十二年參加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間、地點自然變易，參加的人亦年有不同。但在每一次的大會期中，每當會前會後我坐在大會場裏，向主席臺注目凝視，總理的笑貌聲音卻仍時時重現在我眼前耳際，彷彿我又重回到民國十三年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彷彿我又回到我二十餘歲的青年時代。可惜，這景像不是夢境，因它不如夢境般長，而只是一時的幻象，是那麼短暫，待我稍一清醒，我所仰望的仍是主席臺上高懸着的總理莊肅的遺容。最使我百感交集的是在主席恭讀　總理遺囑時，聽到「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段，這是　中山先生臨終所交給我們的任務，其中我們還有若干至今尚未完成的，而我又是一次大會時的宣言審查委員之一，怎能不引起無限的慚感與追思！

總理中山先生是民國十四年離我們而去的，到今天亦快四十四年了。此次十全大會召開的使命是什麼？是大家最關懷的一件事。在我看來，此次十全大會的使命，雖然由於時勢的推移，今昔有所不同，而在革命的總目標上則仍是第一次大會總理交給我們的使命的繼續。

## 二、令人難忘的　中山先生開幕詞

在我的記憶中，總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的訓詞，就是第一次對我們最剴切而難忘的革命使命的指示。他說：「這次大會是本黨民國以來的第一次，是我們幾十年來革命黨人流了許多熱血和心血，犧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換來的日子。」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大會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開幕，所以他說：

「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湖北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陽曆十月十日，是一個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二十日，又是一個巧合的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與武昌起義的日期有同樣的歷史意義。」

大會代表聽了這段話之後，頓覺心情開朗而愉快，說到此地，他的語音忽又轉得很沉重的說道：

「過去革命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外面見到外國的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受到滿清的專制，做人奴隸，幾幾乎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革命黨人發於天良，要想救國救種，便非革命不可，但革命何時成功？成功以後究用何項具體計畫去建設國家，大家都不加注意，只憑各人良心的驅使，不計成敗，不惜犧牲去奮鬥，所以造成各自爲戰，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的局面。辛亥雖推翻了滿清專制政體，然到今日民國成立了十三年，革命仍無結果，仍然是失敗！所幸我們現在還有廣州一片乾淨土，有機會來集合海內外同志聚集一堂，共商今後革命的大計。我們從前沒有想到召開這種全國代表大會來研討革命和黨務進行的重要，是因爲我們受了滿清官僚餘孽的欺騙。辛亥武昌起義因爲革命成功得太快，從前反革命的官僚，也僞裝成革命黨，滲透到我們黨裏來，一部分同志受了官僚的包圍，中了官僚的毒素，便種下了我們革命失敗的總因！」

總理說到此時，態度顯露出十分嚴正。他一再的反覆重述：

「這是我們過去失敗的總因！這是我們過去失敗的總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總理的聲調頓然宏大起來。然後他又從容的繼續說道：

「官僚拿什麼來欺騙我們呢？他們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既然革命黨消，便只有官僚和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黨人的立足點了！到了今天我們才覺悟了，我們才知道這句話的危險，所以我們今天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來恢復我們革命黨的精神，來挽救從前的失敗。我們要改造國家：第一要有一個堅強的革命黨；第二要有很正確的共同目標。從前我主張以黨治國，現在想起來實行這句話爲時尚早。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紛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我們國民黨今天的責任還是要先以黨建國，才能說得上以黨治國，國都建不起來，何能求治？現在中華民國的國基尚未鞏固，我們必須要另下一番功夫，把國家再造一次。這個把國家再造一次，使國基鞏固起來，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他又說：

「我們這次的大會不是尋常的懇親大會來聯絡感情，不是尋常的討論來議決例行事件，而是把我們幾十年來所得的經驗和發明的種種方法，在此國內外情勢大有可爲的時候集海內外同志代表，把這些經驗和方法提出來供大家採納。我們在大會之前已經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做了一番準備的工作，自今天起要把籌備的各項方案計畫，逐日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研究。要大家贊成這些方案帶回去實行，那麼，本黨一定發展，革命一定可預卜成功！」

總理說到這裏，以很重的語調，總結此次大會改組的意義：

「第一是把本黨改組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有力量的革命黨；第二要用本黨的力量去改建中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除了上述兩件事以外，另有一件大事要大家特別加以警惕，那就是本黨從前不能成功的原因，不是敵人有什麼大力量來打破我們，而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我們此後要團結一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爲黨爲國，爲同一目標爲同一步驟而奮鬥！革命成功最要緊的條件是全黨同志精誠團結，團結的要義是：第一要犧牲個人自由；第二是要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能有能力，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改造國家，實現國家的自由。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個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個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我們今日改組便要先除去這個毛病。我們應當反省，應當補過，爲今後的革命成功而奮鬥！」

聽眾以感慨奮勉的心情，聆聽　總理的講話。

這時整個會場如嚴冬深夜那樣靜寂，而每個人內心，則燃燒得像火一般的熱烈，最後爆發了如雷的掌聲，經久不歇。

這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對大會使命的剴切訓示，在四十五年後的今日，我們重溫上述訓示，雖然今昔情勢有所不同，而十全大會的使命與努力，在革命的總目標上，仍將是繼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以完成　總理未竟之志業的。

## 三、大會宣言審查委員的提名

——一個不被重視的年輕人——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以後，當日下午繼續舉行大會，由　中山先生提名胡漢民、汪精衞、林森、謝持、李大釗等五人爲大會主席團主席，經大會通過後，旋卽提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人選案交由大會討論。　中山先生主張宣言審查委員會人數爲九人，由大會選舉。經過討論之後多數代表均不贊成由選舉方式產生，主張授權　總理，請他指定。很顯然的當時會場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心理，由於代表中有一部份是新近加入的共黨份子，在他們來說，如果選舉，恐怕他們是不易當選的。在老一輩的代表中，也許顧慮青年人不會選舉他們，而又自許追隨　總理多年，黨齡悠久，如果由　總理指派，他們當然希望很大。由於這兩種心理，不期然而然的，都共同主張由大會授權　總理指派。

中山先生在考慮審查委員九人的人選時，自然必須考慮到老同志和本黨青年與共黨加入本黨的份子，以適應當時的事實。因此他提出了以下九人爲宣言審查委員：

胡漢民、戴季陶、葉楚傖、茅祖權、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恆、黃季陸、于樹德。

胡、戴、葉、茅、王五人爲本黨老同志，李大釗、于樹德爲著名的共黨分子，恩克巴圖爲蒙古代表，似乎被認爲是與共黨份子較爲接近。我本人的被提名，可能要我代表青年，或者因爲我是加拿大選出的代表，要我代表海外的黨部參加。可笑的是當　總理把九人的姓名唸出時，對其他的人，大家都無異議，惟獨唸到我的名字黃季陸時，會場中竟有「不知道」或「不認識」之聲數起，我細看這些說話的人當中，有年歲較長，且有與我相識的同志，使我感到有些驚異和不安。我那時雖然年紀輕，但我的黨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卻不後人，不知道的人似乎很少。這一反應大約是他們原都自以爲有被　總理指派的可能，而卻沒料到總理會指派出這樣年輕的我。初出茅廬，便受到這樣的一項挫折，當時是很感有些困擾的。最可感的是　中山先生，他馬上叫我站立起來，特地把我向大會介紹一番，大家才默然無言。

大會宣言的初稿，是由　總理事先準備，經由大會前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大會討論的。在起初的一般問題上，還不覺得九個審查委員之間有什麼特別不同的主張，分不出國民黨和跨黨份子之間，劃有什麼鴻溝，卻是到了後來討論到宣言和政綱的重要問題上情形就兩樣了，我們與跨黨份子之間便頓然發生理論與政策上壁壘森嚴的現象。爭論爆發點表面上是在民生主義的觀點的差異，而實質的問題則完全在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方面，國民黨員和跨黨份子間有根本不同的觀點和立場的存在。

## 四、宣言審查委員會的陣容

李大釗、于樹德二人在宣言審查會中發言不算多，但是態度卻一致而堅定，討論問題的時候，很少有自發積極的主張，但卻時時利用國民黨同志間對某一問題正反兩種意見尖銳化的時候，他們總是倒在一方，壓倒另一方，這樣常常使我們自己同志之間留下不快之感，而跨黨份子反而常爭取到了友軍。此種情形屢試不爽，這原是共黨滲透分化別人，瓦解別人的一套法寶，他們並不在乎一定要馬上拿出他自己的主張來，使別人注意和防範。因爲他們的目的先只是在滲透，擾亂你而已，到了你已經分解了，陣容混亂到沒有力量的時候，他的眞手段才全套拿出來，使你防備不及也後悔莫及。畢竟李大釗、于樹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人還有一些書生和人情味，這與我後來遇到的共黨份子那種兇惡詭詐的情形有些不同。這也許是共黨當時初立不久，參加的人還不曾受到蘇聯那種特殊的教育和訓練的緣故。

我在九人的審查委員中，也許因爲年紀太輕的關係，有時不免過於天眞，每遇爭論的發生，總是肆無忌憚一馬當先，和李大釗、于樹德二人弄到難分難解。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可笑！應當爭的地方固然不可輕易放過，不應當爭的地方又何必予人難堪，自討麻煩呢？不過這類的事，只有天眞無邪的青年人才做得出，而青年人的可愛處也許就在這些地方吧！

宣言分三章，第一章爲分析中國之現狀，第二章爲闡述國民黨之主義，第三章爲國民黨之政綱分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兩部份。對外政策共七條，對內政策共十五條，合爲二十二條。宣言中把主義和政綱分得太顯明，實則在宣言所附的政綱，即對外與對內兩項政策，在原則上此處所指之政綱即是政策。幾十年來在國內外有一極模糊的觀念，即爲主義、政綱、政策三者，往往弄不清楚，其原因第一是因爲宣言中的政綱實際就是政策，第二是宣言中所舉本黨的主義實質上就是政綱。但在一般的政黨很少有拿主義來標榜以作號召的。我之所以說宣言中的本黨的主義就是政綱是有依據的，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中，首言：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爲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特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如左：

## 第一章　黨　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條　中國國民黨，不分性別，凡志願接受本黨之黨綱，實行本黨決議，加入本黨所轄之黨部，依時繳納黨費者均得爲本黨黨員。」

很明顯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誠然是國民黨之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創立爲國民黨之黨綱，亦卽是政綱，各時期所宣布和所實行的對外對內的主張，便是我們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政策。由於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沒有把主義卽是政綱，而政綱實際卽是政策的話說明白，難怪後來不免產生出若干的爭論了。

## 五、反帝國主義綱領的爭辯

在宣言審查會中爭執最大的是民生主義和對外政策。民生主義所發生的爭議屬於主觀的組織的排他性而產生的居多，屬於理論上的爭辯並不如我們想像之大。換句話說，當時很自然的發生一種感情作用和成見，那便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政黨，因此民生主義不是共黨所信奉的那套共產主義。這一爭議和成見，隨卽影響到大會的空氣，我們和共產黨之間的鴻溝頓然清清楚楚地劃分出來。等到二十一日那天下午，第一次宣言審查報告提到大會之後，總理爲平息會場中此一爭議，特別對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說作一說明。

經過　總理一番警闢的解釋之後，大家的情緒和會場的空氣才從陰霾四佈中趨向明朗。本來可以卽刻把宣言審查報告提付表決順利通過的，但　總理爲增加眾人的理解起見，特又指定宣言審查委員會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員，大會前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把全案重付審查，再提請大會通過。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　總理處置大事的愼重和對於羣眾的領導，重在眞理的尋求和理性的發揮，並不以急於獲得羣眾一時感情的衝動和盲目的附和擁護爲滿足。

宣言經過第二次擴大審查之後，在二十三日的下午，便提交大會通過。

在宣言審查會中爭辯最烈的是：

一、關於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取銷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的反帝國主義綱領部份。

二、是關於民生主義中土地農有的部份。

這兩項問題在宣言的原稿中都有明確的規定，都被我一一力爭予以改變或刪除，弄得面目全非。這件事至今想起來眞是幼稚得可笑。當時參加審查委員會的九個人，當中只有我一個人還健在，其餘的人除了于樹德不知所終以外，餘皆作了古人。這一段經過如果不由我忠實地把它敍述出來，以供研究近代史的一項參考，在我而言，是會感到歉疚於心的。我時時鼓勵青年人要天眞、坦率和勇敢，我現在雖然已不復是當年那種青年人的精神，我仍然覺得十分可貴。自己的錯誤可笑，由自己傾吐出來，作爲後人的一個借鑑，總不能說它是一件無意義的事吧！

現在先談我反對把反帝國主義綱領容納在宣言和政綱中的理由和經過。關於收回租界與外人租借地，收回海關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我反對的理由不是因爲我沒有膽量，而是由於我立論的出發點是從常態的政治情況，而忽略那時是一個革命大時代的創始。在這一點上不僅我的認識不夠，就是胡、戴諸先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和專門以搗亂爲目的的跨黨份子李、于二人也看不清楚，不然他們不會那樣輕易的被我的道理所壓倒，一致同意把那些反帝國主義政綱的原意在審查會中沖淡或刪除。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

一、西洋的政治家有一個信條，就是寧可失敗，而不可以失信。一個健全的政黨也應遵守此一原則，如果一個政黨把做不到的事作爲對國民的一種諾言，來爭取他們的同情，問題不發生在說話的時候，而是在不能實踐諾言的場合，必定失去國民的信心，永久都不易收復回來。今天革命環境的艱苦和我們力量的薄弱，對於明明做不到的事情，又何必把它作爲眼前的主張，招致後來失信的後果呢？所以我認爲凡是做不到的事，最好不說，要說的我們必定要做到，這樣我們才能建立起國民對我們的信賴。全國代表大會既然決定每年開會一次，把這一類的問題留到力量充實，必可做得到的時候再行提示出來，豈不更爲妥當？

二、假定我們現在一點憑藉都沒有，毫無責任地把這些主張提示出來爲難反革命的北洋政府，倒不失爲一種想法。問題在我們現在治理的區域內，近在咫尺間的有沙面的租界和粵海關，再如香港、九龍和廣州灣，這些地方不是英國的租借地，便是法國的勢力所在。對這些現實的問題，難道我們可以不採取有效的行動，我們能夠使國民相信我們所說的不是謊言嗎？

三、我們必須認識，政治問題離開了現實，而僅是空言便將招致後患，我們不得不在此加以考慮。我們檢討一下今日的革命環境，除了廣州一地微弱的力量之外，華僑所在的地方，便是帝國主義的根據地。我們把反帝國主義綱領提出之後，首先受到摧殘的必定是海外的黨部，我們將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聰明人豈是如此的作法？我是代表加拿大總支部來出席大會的，這樣有關海外黨務和同志利害的大事，我不能不嚴重的提請各位同志注意。假定各位不採納我的意見，本席保留在大會的發言權。」

我上面的話理直氣壯，好似把大家說動了，卻是李大釗很生氣的說：

「你既然要在大會去發言，我們何必要有這一個審查委員會？你應當有服從多數的精神。」

因爲李大釗說話的態度不好，我很氣憤的反擊他道：

「審查會的決定不是最後的決定，他的性質是因爲大會的人數過多，不易作精細的考慮，所以才成立審查會，由人數較少的審查委員作一精細的研究之後提供大會參考。爲達到此一要求，所以在民主國家的議會對於審查報告採取兩種辦法：一是多數的報告（Majority Report），也就是審查委員會多數決定的意見；二是少數的報告（Minority Report），也卽是在審查會中反對者的異見。爲什麼要如此呢？這就是說：大會要知道審查會中正反兩方的意見，來作詳密的討論和決議的參考，你知道這是民主國家的一種良好的制度嗎？」

我說話的時候似乎顯得十分得意。李大釗回答說：

「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我們不屑於採取！」

我用很重的語氣對他說道：

「你所說服從多數也是資本主義國家表達民主的方法，那末你又何必要我服從？」

話說到這裏，彼此的情緒已經很壞，而我的詞鋒仍然很尖銳的繼續下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資本論是共產主義的聖經，馬克斯寫這書的時候，最早是用德文、英文出版，研究共產主義的人是否因爲德國、英國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就連資本主義的文字都不讀了嗎？這樣的人還配得上稱爲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嗎？無怪一些讀了幾本東抄西竊，一知半解的中文小册子的人，也要冒充共產主義的專家！」

李大釗不甘示弱的說：

「你這種言論和一些外國崇拜教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的可笑，這些人的意見以爲不懂洋文，就不能做一個學者，哼！哼！哼！」我跟卽答道：

「這是五四運動初期的北大校風，與我無關。」

李大釗此時的神情很難看，會議大有繼續不下去的模樣。我現在回想起這段事，何以李大釗對我所說的話那樣感到憤怒，其原因是李是當時一般人所稱頌的共產主義學者，同時他又曾任過北大圖書館的職務，我前面所說的一些話，在他自以爲好似都在諷刺他。

最後胡漢民先生以主席地位發言，他說：

「你們的話說到題外去了，就此停止吧！我們仍然回到本題的討論上。」跟着他提出了一個折衷意見，他認爲大會海外黨部的代表人數很多，海外黨部自有他的困難，如果我們此時把收回租界、收回海關等反帝國主義的綱領太明顯具體的拿出來，的確影響很大，而在目前本黨的地位也不無顧慮之處，所以他主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把關於反帝國主義的政綱條款說得籠統抽象一點，不必太顯明的提出。

二、大會代表意見很多，「少數報告」雖然是很好的辦法，但是因爲大家現在還沒有這個習慣和了解，此時還是以暫不採用爲佳，以免反而引起大會許多問題來。

大家一致贊成了胡先生的主張，於是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反帝國主義的政綱，便被抽出而代以籠統抽象的詞句。宣言審查報告於一月二十三日提到大會，沒有經過多少討論便由大會予以通過。

戴季陶先生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一天談到共產黨猖獗的情形，忽然問我，說道：「你當年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問他此話何所指，他說：「我想起你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對跨黨份子那樣的有成見，現在看起來，你當時是沒有錯的。當時你那種蠻橫的態度，正好似俗語所說的初生之犢不畏虎，不僅李大釗、于樹德兩個跨黨份子受不了，就是展堂先生（指胡漢民先生）也把你無可如何。轉瞬又是幾十年，現在你都兒女成羣了！」言下似乎不勝其感慨。

勿論如何，我至今對李大釗、于樹德兩位先生的學養，仍表示其懷念，因爲我後來所見到的共黨份子，多半是粗線條的土匪作風，不似他二人那樣的溫雅！

## 六、限制跨黨案的提出與爭辯

在　總裁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第二十六頁第八節中曾有如下的記載：「在大會中（指民國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我是當日當事人之一，特檢出舊時日記加以整理，敍述此事之經過，以供治近代史的人作一參考。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激起了很大的爭辯，而又爲我所親自參與者，有三個大問題：一是關於大會宣言審查之爭辯，因爲我是宣言審查委員之一，共黨委員李大釗、于樹德便成了我們爭辯的對象；二是本書中所言之不許跨黨案；三是我所提的「採用比例選舉制爲本黨政綱之一案」，爭辯的對方則爲共黨份子毛澤東、韓麟符等，回憶起來已不覺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四十五年的時光在歷史的過程中是小乎其小的一回事，而在一個人生的歷程中則不算得不是一段很長的歷程了，當日所爭辯的問題，在這四十餘年以來，幾乎已演成一不知底止的世界洪流，此一洪流終將被人類的智慧所遏止，以奠定人類和平幸福的基礎，當屬必然的。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不許跨黨案的爭辯，是容共問題呈露出裂痕的一個開端，今日盤據大陸的共黨頭子毛澤東在這一次爭辯中便已初次露面，我現在把當日經過的實際情形加以敍述，或可以爲　總裁書中所示此一事件之重要性作一說明與參考。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在一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大會的議程是「總章審查委員會的報告」，主席胡漢民先生宣布開會之後，卽由汪精衞以審查委員會主席的資格提出報告。本來在大會開幕之前，有一部份老同志如林森、鄧澤如、謝持、方瑞麟諸先生和海外代表們，卽已對滲透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黨內的共黨份子有所懷疑，曾在廣州太平沙一個住宅裏舉行過好幾次談話會，預備對於共黨份子加入後有所取締防止。大會開幕之後，本來預備好了一個提案，因爲要推出一個資深望重的同志做提案人，而資深望重的人，又因顧慮多，遇事審愼，一要他自己當先，卻又謙虛遜謝了。要由年輕的同志出馬吧，又怕資格太淺不孚眾望，所以到了大會開幕之後第九天還不曾將此案提出。我當時是竭力想促成這一提案的人之一，幾次三番我都自告奮勇，把提案的責任擔起來，卻不爲一般同志所重視，無已，只有忍在心頭待機而發。

當汪精衞作了黨章審查報告之後，大會代表方瑞麟卽請求發言。他的理由是一個資深望重的同志做提案人，而，增加一項條文爲「本黨黨員只應有一個黨籍，如果有了一個以上黨籍的人便須脫離一個不得加入其他政黨。」他的理由是一個，因爲那時的共黨份子才是兩重黨籍，他們加入了國民黨之後，而仍然維持了共產黨的黨籍，我們那時指這般人爲跨黨份子，跨黨份子在此一提案通過之後，必須在下列兩條路當中選擇一個：一是脫離共產黨的黨籍，二是脫離國民黨黨籍。那天的大會主席胡漢民先生，他以主席的地位諮詢大會有無附議？於是附議之聲四起，本案便獲成立，由主席交付討論，辯論便自此開始。

好似共黨事先早有準備似的，共黨首領李大釗便以黨章審查委員和共產份子的代表地位要求發言。於取得發言地位之後略謂：

「本人原爲第三國際共產黨黨員，此次偕中國共產黨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加入國民黨，是爲了要遵守國民黨的主義和黨章，來參加國民革命事業，絕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爲共產黨，乃是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革命事業……」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立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

他說話非常動聽，同時並散發書面說明，他在事前早有準備是很顯然的一件事。由此可以知道在大會開會前與開會中，對於共黨排拒的暗流是如何的早已在醞釀着。不許跨黨案的提出僅僅是揭開此一問題的序幕，而李大釗的聲明正是在針對此一事實，企圖用共黨笑臉來緩和當時的局勢而已。他繼續着說：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爲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革命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　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話委婉動聽，好似聲淚俱下的神情，爲使大會一部分代表爲之動容，會場情形幾乎頓之逆轉。我是支持方瑞麟提案的一人，當我正要請求發言企圖把會場空氣扭轉的時候，葉楚傖先生已先取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發言地位。由於當時容納共黨份子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已爲既成事實，加以李大釗的笑臉陳辭，楚傖先生的發言雖然沒有明顯反對限制跨黨份子的主張，卻也未曾對於主張限制跨黨的人有所聲援，因此他的影響大會的地方並不甚大。

## 七、第一次看見毛澤東的面孔

最可惱的是汪精衞再以黨章審查委員會主席地位，繼楚傖先生之後，取得第二次發言的機會了。他說話儀態萬千，語言清晰而富感情，辯駁中少有刺激，眞得了「態度誠懇，措詞委婉，罵人不傷心」幾句善說辭的人的眞傳了。

當汪精衞二次登壇發言時，他首先聲明他不是以個人資格發言，而是以黨章審查委員會主席的地位，應向大會作一眞實的報告。他的態度謙和，使得聽他說話的代表，先已感覺到他對於此問題非常客觀，話未聽完已受了他的影響了。他根據本黨的歷史引古證今，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的大意說：

「從前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諸先生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已承認他們爲本黨的黨員，而且承認他們是德高望重的本黨的骨幹。爲什麼我們今日要不許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來爲革命而奮鬥呢？這不是我們前後的主張不能一致嗎？我記得有一位同志有一句很警惕的話，他說：或許有民族主義者不贊成民生主義，豈有主張民生主義者不贊成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理，也未有贊成民生主義者不贊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理。依兄弟的意見，我們的黨章上既有專條規定本黨的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律，我們只應拿紀律來量度黨員的行動，合於本黨的紀律與否。任何黨員如果犯了本黨的紀律，我們便可拿紀律來制裁他。有了這一武器，跨黨不跨黨的問題，便可不必過於重視了，而且我們對於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既經過一番愼重的考慮，在這一時間，又要起一變動，似乎是不該的。

再加以共產黨係一國際的組織，中國革命不能與世界分得開，我們容納國際共產黨的份子加入本黨來共同奮鬥，不惟不應反對，而且應當熱誠表示歡迎才對。謹將審查委員會和兄弟個人的意見說明一下，以供各位同志的參考，當否還希望各位同志指教。」

汪精衞上面這番話說完之後，會場的情形更加惡化，儘管他的話從嚴格的邏輯講來是不正確的，但在當時他此種似是而非的論調，的確影響了全個會場。這怎麼辦？難道這一件重大的問題就此結束了嗎？我當時心中很不安的在如此自己問自己。

我當時明知大勢已去，無可爲力，然而因爲我曾對方瑞麟同志有諾言支持他的提案在先，我就此默然而息，對同志是一種失信，對自己的主張爲不忠。更加以我自己在想，我是一個初出茅廬自海外歸來的青年，這是我接觸革命大問題的第一戰，如果我就臨陣不前，此後還配得上在革命陣營中奮鬥嗎？於是我不甘示弱的繼汪精衞之後取得發言地位，我發言的大意是：

「共黨份子既是爲維護三民主義而加入本黨，爲什麼還要保持他們原有的組織？一個黨中有了雙重黨籍的存在，不是黨內有黨是什麼？他們雖然本心無他，假定將來共黨的紀律利害和決議與本黨相衝突時，在本黨中的共黨份子，究竟服從他們自己的決議，遵守他們自己黨的紀律呢？還是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護他們共黨自己的利益呢？還是維護本黨的利益呢？這很顯然是二者不得而兼。他們忠於本黨則違背了共黨的意志，忠於共黨則違反了本黨的意志，這情形不加防止，定必造成未來革命陣營中的大混亂。他們爲求有所貢獻於本黨而加入，將因此種情形而無所貢獻。

退一萬步言，即使共產份子加入本黨得維持其原有黨籍，本黨原有的黨員不得加入其他的政黨嗎？因動，難道我們不能限制本此我主張修正方瑞麟同志提議，作爲禁止本黨原有黨員只能有一個黨籍，不得加入其他政黨。李大本黨爲的是有所貢獻於本黨，我相信我此一主張既不影響他們加入黨原有同志，不得再加入其他政黨跨兩重的黨籍，他們應當諒解的我的話剛才說完，廖仲愷先生便起來說出一番事實和理論來不贊成轉變，而反對跨黨者竟無繼起發言的人。不料廖先生發言之後，主席胡林子超先生暫代主席，發言反對我的主張。大勢如此，實已無可挽救了意則以爲容共是當日　總理迫於革命需要的一項既定政策，深恐爲我這理當日又不在會場，故他們不得不力加制止。其實在事前我曾將上項意沒有表示接納我的意見，卻並沒有明顯表示我不應作如是的主張。我在的意見，卻是事實經過的確如此，我不能更有所增添。大約在民國二十先生談及此事，胡先生說當時因爲　總理不在會場，我事先又沒有把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得不離開主席地位說幾句話來反對我了。否則不許跨黨案若被通過，而　總了。

關於向　總理陳述我此一意見的詳情，我另有一文詳述經過，在此不必細講了。當胡先生把話說完之後回到主席的地位時，忽然在我的左後面有一湖南口音的人在報號發言。他大聲的在叫：

「主席！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本案停止討論，即刻付表決。」

我聞聲向後端詳此爲何人。見得此人穿一件薄棉袍，身材不算高，面色白中帶青，態度倔強，一股蠻勁，有似從鄉下初進城的人，看不出有多少君子風度。後來查明此人姓名，即今日盤據大陸的共黨頭子毛澤東，那時他還不甚出名，這是我聽見他發言的第一次。

最後由主席胡漢民先生將本案提付表決。主席說：

「贊成本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不必用明文規定，僅照黨章申明紀律者請舉手！」

結果：大多數舉手贊成通過。

自限制跨黨案被否決之後，於是共產黨份子的笑臉便第一次得以出售。自此以後本黨和共黨的衝突由醞釀而趨於行動，在海內外黨務的工作上，在各項民眾運動方面，在軍隊裏，共黨份子均利用其參加本黨的便利，而遂行各項奪取中國革命的陰謀。因此當　總理在世時，乃有十三年六月一日廣州特別市黨部檢舉共黨份子案的提出，同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鄧澤如諸先生又有彈劾共黨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子案的提出。自　總理逝世以後，復發生西山會議分共的運動，十五年中央在廣州整理黨務案處理共黨份子的行動。當十五年秋，革命勢力擴展到長江流域，共黨更隨軍事的發展，更形猖獗，於是發生了寧漢分裂及十六年四月的全面清除共黨運動。最後更以蘇俄暗中策動中國共黨在各地的暴動，於是國民政府斷然對俄絕交，關閉蘇俄在國民政府領域內的外交商務機構，俄共第一次在中國的笑臉乃暫告一段落。

## 八、比例選舉制案的爭辯與毛澤東二次的面孔

本節要記述的是民國十三年一月，我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採用比例選舉制爲本黨政綱之一案」，從提出到被擱置的經過。就個人來說，它是給我深刻教訓的一次失敗。而究其實質則是民主思想、極權思想相撞擊而發生的一個巨浪，亦可說是民主、極權思想早期的分野。從這一提案的爭辯之中，我們就已看到毛澤東之流當時的一副蠻橫、狡黠的面目，這是與他們後來的諸多悖謬的行徑有其因果關係的。

一月二十九日那天的大會主席是林森先生。宣布開會之後，卽由我以原提案人的資格到發言臺上作說明。

我那時對於羣眾心理一點也不瞭解，我等於是作一專題演講或在對學生上課，整整的說了一個多鐘頭。大會主席林森先生幾次催我把話說得簡短點，我都置之不顧，代表們以奇異的表情來聆聽我的講話，究竟他們接受了多少，我一點也沒有考慮。我把世界現行選舉制度的弊害列舉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許多，把比例選舉制的歷史演進、派別以及其各自的優劣批評等等說了許多，最後才把我所主張的黑爾投票制（Hare System）的理由說出。我看會場沒有良好的反應，雖然還有很多話要說，一是因爲我說話的時間太久，二是我自己的興趣似乎受了會眾冷淡表情的影響，要說也說不下去了。最後只得終止我的說明，沒精打彩的走下臺來。主席隨即以本案宣付討論，於是在場代表紛紛報名發言，一場激烈的討論隨之開始。

發言代表約有十人，王恆、劉蘆隱是贊成本案的，戴季陶、劉伯倫是主張保留愼重考慮的，其他便是毛澤東、宣中華一些共產份子堅決的對本案表示反對，而本黨同志中如王樂平、胡謙一些人，則均站在反對的一面。

爲了保存歷史的眞實性，我特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上所載毛澤東、宣中華等的發言抄寫在下面：

「三十九號毛澤東說：『現時比例選舉制係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爲革命黨，凡利於革命的可採用，有害於革命的，卽應擯棄。比例選舉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卽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採用比例選舉制卽是予少數派以破壞革命的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討論，更不能付表決！』」

毛澤東發言的態度是如此的橫蠻無理，好似在和我吵架一樣。最可笑的是本案已經由主席宣付討論，在他發言之前已有王恆、劉蘆隱等幾位代表發言贊成，本案已經在討論進行中，而他卻說本案根本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能討論。按照會議的常例，一個提案既然已經在討論中，無論你贊成與否，究竟是贊成的多而把它通過呢？或是反對的多而把它否決呢？除了最後用表決的方式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處決一個提案了。但毛澤東說本案不能討論，已經是荒唐之極，而他更說本案不能付表決，豈不更是可笑、更是無知嗎？共產黨有一套祖傳的法寶，那就是武斷與無知，民主社會所習慣的一套表達民主的方式，共黨是從來不會尊重的。繼毛澤東之後站起來發言的是他同黨的宣中華，他說：

「比例選舉制乃資產階級騙人之物，本席反對黃君提案。」

毛、宣二人交替爭着發言反對，我看情形不利便搶先取得一發言機會。我說：

「比例選舉制是實現全民政治的一種新的制度，你們可以不贊成，卻不可以歪曲事實，說它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它的作用之來團結革命力量，打倒共同的敵人，是無堅不摧，無敵不破的。因此比例選舉制的採用是有利於我們革命黨的。如果你們一定要認爲他有害於革命，那麼你們不是有意的胡說，便是一種可笑的無知。我要爲比例選舉制呼冤！」

話說到這裏，我的情緒表現得非常的緊張，我對毛澤東、宣中華二人似乎是存了很輕視的態度。我方把話說明，還沒有坐下來，宣中華緊接着站起來，又咆哮了一番，無可理喻的表示反對本案。宣中華還沒有坐下，毛澤東又緊接着起立發言，他們好似事先有了安排，用一種循環式的發言戰術把時間佔據，不讓其他的人有發言的機會，使得一個會場似乎只有反對的人，而沒有贊成者。共黨這一戰術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在以後的若干情形下，成了萬變不離其宗的用來佔據會場拟持眾議的手段。在北伐前後，民眾運動方在萌芽時代，一般的講，民眾既無組織，又缺少經驗，共黨的確能善用這種有組織的技巧，以極少數的人，弄得對方頭昏眼花，無法對付，終於受其拟持。

毛澤東大聲急迫的說：

「比例選舉制雖然爲各國社會黨所採用，但只限於在沒有當權時是如此。若在取得政權後，便擯置不用，因此一制度實有害於革命之本身。如以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

他這一番話，說得眞眞可笑，他的座位離我不遠，我正擬向他質問究竟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比例選舉制是爲各國社會黨所採用？有那一個社會黨在當權以後便把比例選舉制擯棄不用？可惜沒有適時取得發言機會。

毛澤東發言之後，會場情形頓趨緊張，正反兩方的代表都紛紛要求發言。最後由主席予戴季陶先生一發言機會，戴先生說：

「本席曾有見於本案之不能倉卒表決，故主張保留作爲本黨明年第二次大會時必須提出之案，因爲本案爲一新的政治主張，牽涉理論與事實極廣，大家對本案都沒有經過仔細的研究，我們以一年爲研究的時間，在下次大會時再提出討論較爲適當，請大家注意。」

繼戴先生而後發言的有劉蘆隱、王樂平、胡謙、劉伯倫等數人，除劉蘆隱之外仍屬懷疑本案者居多。最後由主席宣布討論終結，提付表決結果，以大多數贊成戴先生主張，保留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須提出之案，本案便如此結束。

我時時向同志提及此事，深以爲是一種遺憾。不過採用比例選舉制案，雖然在歷次大會中未曾提出覆議，卻是自民國十七年以後，本黨採行之單一投票制及限制聯記投票制，實際上已帶有比例選舉制的精神了。

其實當時正是一九二四年英國工黨第一次選舉勝利，由麥克都納（Mcdonald）起來組織內閣，而英國工黨在野時既不曾有過比例選舉制之主張，組閣之後的工黨當然也不會有摒棄比例選舉制而不用的事實。毛澤東的話實在是閉起眼睛瞎說，這顯示那時他的知識，實在對這一問題是一無所知。由他的話可以看出一點，那倒是千眞萬確，就是「如以自由給予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這就是極權主義的一個不可移易的教條。反對黨固然不應有自由、反對的意見，甚至凡是不相同的意見，在共黨政權之下，是不容許存在的。換言之，反對者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該死。他當日如此說，現在統治了整個大陸便是如此做。這是極權國家從蘇俄起便是如此一套的作法。今日民主世界與極權世界兩大思想的分野，便是在這一重要的基礎上發生其衝突。在民主的世界唯一可寶貴的原則是：反對的意見和不同的意見，不僅不會該死而且可以並存。反對黨的存在，更爲民主政治能敏活運用的一個重要關鍵所在。老子有一句名言：「萬物相生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倒是對今日民主政治眞諦的了解的說法。中國的哲人，在幾千年前便已體會到今日世界民主政治的眞諦，可見民主畢竟是人類所需要的眞理，合於人性要求的良好制度。極權國家的謬誤，是把反對的意見和敵對的意見等量齊觀。所謂反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與敵對的意見主張的不同，在公平、對立之中可以獲致和諧、協調，後者則是以武力暴行抹殺對方，有我無人的專斷行爲。所以極權便是一種暴政，既不容許不同意見的存在，更不容許反對的政黨的並存。毛澤東當時的發言眞是一語道破極權政治的眞諦了。日他所發出的那句極權政治以後的種種行爲便是在演繹當的老話。四十多年來，本黨和共產黨的鬥爭豈僅是一政治的因素嗎？這實在是一種帶有世界性的思想戰爭。這一戰爭的開端，遠在四十多年前，此一事例便已發其端了。

## 九、恭記中山先生一次寶貴的教訓

比例選舉制案未獲通過，我心中十分的過意不去。那一天又適逢總理沒有到會，究竟　總理對於本案被保留後的意見如何，我是極想知道的。在我提出本案之先，雖然曾經請示過　總理，又經過他點頭說「好」。但是我在大會發言一點也不曾把　總理對本案的態度說出來。知道這事經過的同志，事後曾經責備我，說我如果當時把　總理點頭說好的經過向大家提一提，本案的通過是不成問題的。我爲什麼不把　總理點頭說好的經過向大家說出呢？其原因是：

第一、我生性不習慣假借比我更有權力、更有威望者的地位，來便利我自己的主張而獲得人家的贊同。我以爲一個眞正的道理，能夠訴諸於大眾的理智與判斷所獲得的支持，當更爲寶貴。我這一見解是否正確我不敢說，因爲我生性如此，我也就如此罷了！我一生受了這一習性所召致的困難，不止此一次爲然，此後所面臨同樣不快的事還多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二、我始終認定一個好的主張，要經得起大家的批判和考驗才算數，一個問題經過許多意見討論後而獲得的結論，他可以使此一問題被人更了解，更能使此一問題的解決趨於完整。古人所謂：「集眾思，廣眾益」便是這個道理。俗話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也就是說羣體的力量勝過任何強者，所以我不習慣假借別人的權威來蒙蔽眾人，使眾人不能自由運用他的理智結成一個「眾智成城」的力量。尤其是我對敬佩的　總理，我不願意以他的名義，使大眾對本案不是出於衷心的贊成，而是近於盲目的接受，損及羣眾對他的威望。本案雖沒有通過，而我內心卻無絲毫愧怍的存在。

採用比例選舉制爲本黨政綱之一的提案被擱置以後，我很氣憤的去報告　總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　總理便說：

「事情的經過我已經知道了，這完全是由於你太沒有經驗，不了解會場的心理所召致的失敗，好在只是擱置一年，在下次大會仍須提出討論，還沒有完全被否決。當前這一主張的採用並不十分要緊。」

總理說完後，很慈祥的帶着微笑望着我。我跟着卽請問　總理，何以本案是由於我自己召致的失敗呢？他說：

「會場的人數那樣的多，知識、年齡和興趣都不同，聽說你在大會說明案由的時候，從古到今說了一個多鐘頭，既不是講課，又不是說教，何必費掉如此冗長的時間使人感覺厭倦？」

我說：「如此複雜的一個問題，不詳細的加以說明，如何能使人了解？既不能使人瞭解，又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能使人家衷心贊成？時間雖未免冗長，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總理笑了一笑，跟着說道：

「大會代表知識水準很不齊一，你必須抓着大家的興趣，使人感覺到你所主張的是無可反對，才容易使大家贊成你的主張。」

「那麼，有什麼訣竅呢？」我迫不及待的問。

「依我的意見，只要說幾句話，就可使大家無可反對。」總理深具信心的說。

「要用幾句什麼話，才可以使人家贊成呢？」我又問　總理。

「你第一句話應當說：本黨信奉的是三民主義。我想不會有人反對這句話。」

「你第二句話應當說：三民主義當中，有民權主義，是不是呢？我想也不會有人否認這句話。」

「你第三句話應當說：要實行民權主義，必定要舉行選舉，是不是呢？我想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

「最後你再向大家說：比例選舉制是最新、最進步和最能表達民權的制度，我想大家聽了這番話之後，便不會堅決反對了，你說是不是呢？」

「因爲你把話說得冗長嚕囌，使得大家厭煩，本沒有問題的倒反而發生問題了。」

我聽了　總理這番教訓，不禁頓足失悔，才知何以我在大會說明本案時的用力不討好。如果照他這一指示作簡要的說明，我想比例選舉制被大會通過是不成問題的。這眞是一個最足寶貴的教訓。我時時以　總理這一教訓來規律自己，有時尚可勉強做到，有時仍然脫不了書生習氣，而在面對羣眾的講話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往往把話說得十分冗長，難道說這眞是俗話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嗎？

## 十、反帝國主義綱領的再提出

—廖仲愷先生在大會的臨時提案—

在一月三十日的早晨，大會還未正式開會，我因爲有事須向大會秘書處接洽，秘書處地址在大會會場後面的樓上，當我正跳跳蹦蹦的走上樓梯中間時，廖仲愷先生正由樓上抱着一大包油印品由上而下走來，當他在樓梯上看見我的時候，他帶着幾分神秘的神情，很快的把那些油印品用手掩着，深恐被我看見似的。我爲一時的好奇心所驅使，我問仲愷先生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做得如此神秘？他說：

「這件東西此時不給你看，你也用不着看。」

他一面回答我一面向下走，我很玩皮似的用手把他攔住，我說：

「既然如此神秘，我就非看不可！」於是我從他的懷中順手取過一張油印品，此時他的表情雖然不甚願意，也未十分拒絕，但轉變語氣很和善的說：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秘密，橫豎等一陣你也會知道的，先看看也無妨。」

我把那張油印品張開一看，原來是一份臨時提案，內容是要在已通過的政綱中加入下列三項：

一、收回租界。

二、在中國領土內之外人應服從中國法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庚子賠款當完全撥作教育經費之用。

我對這一內容，很覺得奇怪，對廖先生說：

「這有什麼秘密，何必做得如此神秘？收回租界和廢除領事裁判權，我們在宣言審查會時業經詳細討論把它取銷，爲什麼剛剛通過的案，又要把它推翻？你眞太不民主了！」我此時不得不把在宣言審查會中反對本案的理由重復向廖先生提出：

「反帝國主義綱領，不屬於膽量的問題，而是我們說出了這些諾言，如果不能立卽拿行動來表現，我們將失去國民對黨的信賴，信賴失去後，此後再有什麼新的號召就不會爲國民所相信了。此次大會惟一的任務，是在建立國民對革命對本黨的信賴。假定我們此時有決心有魄力，眞把收回租界當做一回事，我們便得先從近在眼前的沙面下手，把英國人驅逐出去。如果這樣做，我願爲前鋒，作一個爲收回租界而犧牲的英雄！」

仲愷先生對我所說的話，仍然沒有一點理由來駁倒我，他在無可如何中只得說道：

「不管他的，我們把它通過了再說。」

我最後向廖先生說：

「你如果不提收回租界和廢除領事裁判權的主張，專把第三項將庚子賠款全部移作教育經費，我倒非常贊成，此一主張拿出來之後，本黨在青年和教育界，一定可以爭取很大的同情，宣言政綱的原稿沒有把這一主張提出來，倒是應當作一補救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廖先生對我的話不置可否，匆匆的走往樓下。我很堅定的告訴他，如果我的主張不被採納，在大會裏我一定要提出反對。大會中的海外代表最多，由於他們在國語的運用上，頗難自如，我無形中作了他們的發言人，因之我很有把握使他的案不能通過。廖先生聽了我的話之後，似乎增加了他對此一問題的顧慮。

大會在十時開會，由總理主席，宣布開會後當卽向大會報告道：「本日有一臨時動議，係廖仲愷代表所提，業經依法取得連署，依照會議規則應爲議程之變更，贊成變更議事日程者請舉手。」

當卽多數通過，於是總理乃請原提案人登臺說明。

廖先生把提案中所列的：收回租界、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內應服從中國法律，及庚子賠款應全部撥作教育基金等三事一一加以說明之後，可能是由於我的談話增加了他的顧慮，他的說明因此不夠有勁，於是會場的反應顯得很平淡。當時有代表劉詠閎、沈定一、李希蓮、張秋白、李國瑞等人發言，起初僅在程序上對本案應否加入政綱或別爲決議上的討論，還不曾對本案作實質上的贊成或反對的表示。到了後來，會場的情形急遽的轉到對本案的反對論調，形勢頓形緊張。恰在此時我看到仲愷先生遞了一個字條向會眾聲明離開主席的地位對本案有所說明。事後由當時在主席臺上的謝慧生先生告訴我，仲愷先生遞給　總理的字條寫的是：「會場情勢不佳，本案請　總理自行說明。」當我正要求發言的時候，　總理說：「已經離開主席的地位發言了，　總理說：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總理贊成把本案加入在政綱中，當宣言政綱起草之時，本總理卽主張在對外政策中應把收回外人在中國的租界租借地、廢除不平等條約、外人在中國領土內應服從中國法律三事，明明白白地列舉出來。在前次通過的宣言審查報告，竟把這三件大事沖淡漏掉，實在是一件憾事。這件大事的補救是今後革命成敗的重大關鍵所在。在通過的政綱中對此雖然有一種概括的規定，但是不夠明顯，不夠具體，更不足以作我們今後革命的號召，一新海內外的耳目。本總理主張應當把這三件大事大書特書，然後本黨此次的改組才有意義。本黨革命的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國的自由獨立以實現民族主義，我們籠統的說，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自由獨立，大家尚不感覺有什麼顧慮。一說到要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約，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國主義，便戰慄恐慌起來了。大家想想，中國民族不能自由，是由於什麼原因？不能獨立又是什麼原因？難道說，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民族的束縛不解除，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可以自由？可以獨立？外人在中國的租界不過是一件家喻戶曉的事實，所以我們特別要把它提出來。……」

總理說到這裏情緒顯得很激昂，態度異常的嚴肅，語調也異常的沉重。他繼續說道：

「我在辛亥革命以前，便提出了收回租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由於我們同志的認識不夠、膽量太小，都不敢贊成我。大家企圖在因應帝國主義的情況下，可以完成我們的革命，從民國建立以來，我們所得的教訓，帝國主義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愚蠢，可以放心我們革命的成功，對他們是漠不相關的。結果他們用一切的方法來阻撓我們革命的成功，他們幫助中國的軍閥來摧殘我們的革命，他們利用買辦商人來把持榨取中國的錢財，把中國造成今日次殖民地悲慘的境地！我們既不能討好他們，而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時又失掉民眾對於革命的敵人！現在因應帝國主義來謀革命的成功的時代已經成爲過去了，現在是拿出鮮明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來喚起民眾爲中國的自由獨立而奮鬥的時代了！不如此，是一個無目的無意義的革命，將永久不會成功！」

總理繼續說：「在民國初年，就曾經兩次公開主張收回租界：一次是在民國元年解職大總統職務以後到了上海，租界上的外國人和各國外交界的人士，在尚賢堂開會歡迎我，我便向他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主張。當時在場人士爲之一驚，引起外國報紙的攻擊和批評。一次是我曾經發表過中國革命成功後，必須收回租界的文章。」總理說：「當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主張以後，外國人表示驚異批評不足爲怪，而我們的同志和當時的中國上層人士且皆瞠目吐舌，認爲將惹起無窮的後患。大家要認清，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中國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租界便不應當存在。外國人把中國的土地，當作他們的殖民地是反客爲主，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總理最後總結說：

「因此，我們應趁大會將要閉幕的時候，趕緊把這一主張加入在政綱當中，本總理對此提案願爲附議。」

此時會場的空氣甚爲嚴肅，有一、二代表提出總理對本案是否應爲附議的問題，經彭素民、沈定一兩代表發言說明總理不僅有對本案之附議權，更有提議之權，不僅可以把此一提案內容加入在政綱之內，且可以提議不加入政綱之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總理在回復主席的地位之後，徵求大會意見是否可以授權他修正文字，將本案主張加入在政綱之內，會場頓卽發生一片請付表決聲浪，於是　總理以主席地位向會眾說：

「本案現付表決，贊成本案由本總理修正文字、加入政綱者請舉手！」全體舉手一致通過。

經　總理修正後加入政綱內的文字，卽爲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對外政策項下的條文：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

二、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爲最惠國。

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訂，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爲原則。

四、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

六、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僭竊之北京政府，其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爲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不負償還之責任。

七、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我現在回想當時會場的情形，如在迷夢中一般。我原始是堅決反對提出本案的，在討論之初，我數次想發言，都無機會。迄至聆聽　總理一番議論之後，我胸中一切的疑慮，好似春天的白雪融化在陽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裏，從此使我對於中國革命有了一個新的了解和新的認識，我在宣言審查會所持的理由，自此煙消雲散，自覺對革命的理解不夠，深自懺悔。回想我青是幼稚得可笑。當聽到　總理把本案提付表決時所說「贊成者請舉手」時，一種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動的、輕輕的、高高的舉起來，衷心的表示的確，當時此一重大的決策，是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所造成中國革命的新代，走向了與帝國主義鬥爭，抓住了眞正革命的敵人的時代的開始！據我事後，　總理發現收回租界等明顯的革命綱領被刪除之後，　總理曾很憤慨的「本黨此次改組，如果我們還不能把反帝國主義的綱領提出來，中國革功，可歎！」

廖仲愷先生的臨時提案，也是由於上述　總理的指示而爲之的。好在事獲得補救，否則中國革命所遭受的影響不知是如何的重大！

這一段回憶是我的懺悔，也是我的自白。

## 十一、事後的追憶

當大會聆聽了　中山先生一篇訴諸理智與衷忱的說明之後，大家一致舉言中有關對外政策的各款，就是經他整理後的文字。到了散會之後，多數人似乎又漸漸把理智消失，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復到我在宣言審查委員會中所呈的心情。這心情不是恐懼，而是惶惑。

夠深透，於是缺乏決心與勇氣，當時想到的問題如像：

一、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國民黨本部，今後的活動恐怕

二、海外的黨務工作，或將因居留地的政府之敵視而不便活動。

三、截留廣東海關餘款以充財政的來源，將因此而無望。

四、近在眼前的香港，英帝國主義恐將不與我甘休。

五、一個多月前的列強二十多艘兵船在廣州白鵝潭的示威，恐怕又

上述這些顧慮，在大會之後一直存在於不少人的內心，雖然沒有人

隨時都流露出一種不安和徬徨的情緒。這一情形，在現在說起來似乎覺得可笑，但在當時的一般人因爲公開的提出，但在私人交談時，生息在列強的高壓之下已久，民族的自信心便不知不覺的陷於消失或麻痺。治歷史的人，必須要明白一項重要的事實，那便是不能拿今人所處的環境來衡量歷史事實發生時的情形，亦猶如不能拿前人的往事來衡量今人的一切行爲一樣。因爲古今歷史固有其共通之點，同時亦有其不同的背景，與支配那個時代的不同的力量。我們知道中國民族的自信心是自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事變之後而愈益萎頓，而辛亥革命發生在距庚子之後僅僅十一年，民國十三年爲西曆一九二四年，距庚子年也僅是二十四年。而這二十四年的歲月中，一面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中國人民的壓迫日益加重，使中國民族透不過氣來；一面又是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深恐人民與洋人發生衝突或是教案的重演。在這內外交迫的情勢之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懼外病便成了一種普遍的心理。改良派反對革命的大理由，便是恐懼重蹈庚子義和團事變的覆轍，在一部份革命黨人的心理又何嘗不是存有這一顧慮。所以辛亥武昌起義和各次的革命運動最所顧慮的便是外交，要免於外人的干涉，便不得不首先容忍各帝國主義在滿清或民國時代的軍閥政府所獲得的既得權利，來安撫帝國主義的國家。當民國十三年反帝國主義政綱在大會中斷然通過以後，一部份人在心理上要感到惶惑，自屬意料中事。我在此必須舉出事實來加以說明：

趙鐵橋兄是大會出席代表之一，也是當時的四川實力派熊克武的對外代表，他對革命忠誠而勇敢，遠在丁未年就參加四川江安、瀘州和成都的革命活動，那時他還只有十六、七歲。到了辛亥年他已是京津同盟會的主幹人員之一，在天津發行的革命黨機關報民意日報便是由他主持。大會後他見到我就問我道：

「聽說你在宣言審查會中，曾很激烈地反對把反帝國主義的條款明顯列出來，爲什麼你在大會中不繼續表示反對？而且，我分明看見你在表決時高舉起手來表示贊成？」

「你有沒有舉手贊成呢？」我反問鐵橋。

「我亦是舉手贊成的。」他說。

「那末，你舉手贊成又爲的是甚麼理由呢？」

「由於當時聽了　總理一番大道理，確實使我折服，更加上老頭子那種誠懇堅決的態度，使我十分感動，便不知不覺的把手舉起來表示贊成了！哈、哈……」鐵橋說這話時既坦率而又熱情。我回答他說：

「我又何嘗不是和你一樣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更進一步問他道：

「難道說你恐懼帝國主義的威風，而要表示後悔嗎？」

「那樣還配做一個革命黨人嗎？事到如今，只有跟着他老人家的後面拚命了！」

鐵橋兄眞不愧爲一個有風格的革命黨人，一個革命黨人中的勇士。他民國十八、十九年時擔任招商局的總辦，因爲要本著革命黨人拚命的精神，不避嫌怨、不惜犧牲去整理垂死的招商局的業務，因而得罪了從前把持招商局務的集團，僱人把他刺殺在上海招商局的大門外。他眞是爲了要整理國營的招商局，來對帝國主義壟斷的航業作一競爭，以挽回國家的利益而犧牲了。至今招商局還有一隻海船名叫「鐵橋」便是紀念他的。

上面所說與趙鐵橋兄的對話，是反帝國主義政綱通過以後，代表一部份人的徬徨不安的心理狀態。現在我更要提出一項資料，來說明　總理要廖仲愷先生向大會作臨時動議，把收回租界等反帝國主義政綱重列在大會政綱之中，當時　總理對本案是如何的愼重和具有決心。

在鄒海濱先生的回顧錄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每日開會前後（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總理照例到校長室（當時的廣東大學校長室）休息。有一天，　總理問我：『現在準備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你有什麼意見？』我答道：『這是合乎本黨的主旨，很應該的。』　總理又問：『固然如此，但你不怕各國壓迫嗎？』我答道：『世界上一切事情，得其平然後才能安定。不平等條約固然不利於我，但有了這種不平等的事，大家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沒有好處。所以目光遠大的，不但不至於壓迫，或者會有贊成的可能。膽量！』我反問：『難道有人不贊成嗎？』總理說：『他們有點看不到，因此不免有些顧慮。』

這案在大會通過的時候，總理很鄭重地說：『假使不通過這點，那末大會就毫無意義。』」

從海濱先生這一段回憶中，總理雖沒有指出沒有膽量、看不到、有顧慮的是些什麼人，但就我的感覺而言，至少我是其中的一個。

當大會閉幕以後，在各種集會的場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喊得日益激烈，這樣的標語亦隨處可見。最初以冷靜的頭腦面對此一問題的人，也在轉變中。羣眾的意識和情緒，似乎都在奔赴這一目標而日益熱烘烘地激昂起來。的確象徵着一個新的革命時代的開始——因應帝國主義的時代在結束中，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新時代已經到來！我個人當時不知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心中好似有一塊大石頭懸掛着放不下來似的，我不知道我這種心理狀態，是由於對帝國主義的膽怯，還是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的了解不夠？我現在回想起來，可能這兩種成份都有。爲了要更深一層的了解這一問題，於是時時向當時對　中山先生思想主張都十分了解的幾位先生請教，如像胡漢民先生、廖仲愷先生、戴季陶先生等，我所急切要想知道的，便是　中山先生在大會說明反帝國主義政綱時曾經說過：「我在辛亥革命以前，便提出了收回租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由於我們同志的認識不夠，膽量太小，都不敢贊成我。」又說：「在民國初年，就曾經兩次公開主張收回租界：一次是在民國元年解職大總統職務以後到了上海，租界上的外國人和各國外交界的人士，在尚賢堂開會歡迎我，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便向他們提出了收回租界的主張。……一次是我曾經發表過中國革命成功後，必須收回租界的文章。」我問這些先生們　總理在尚賢堂的講話他們是否在場？說話的詳細情形怎樣？他發表過的文章原文是否可以找得出來？他們的答覆不是說記不大清楚，便是要我去翻查民國元年的舊報紙。天呀！那時的廣州情形可不那麼方便，圖書館雖然有，那家能存有十幾年前的整套舊報呀！最奇特的是：那時竟無一部完整的　中山先生文集。可是在十幾年之後的民國三十年左右，在抗戰最艱苦的時代，我在四川居然編了一部較爲完整的總理全集出版，其中許多材料都是從舊報刊上抄寫下來的。　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後有關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的資料實在不少，但他在尚賢堂的講詞和那篇收回租界的文章卻付闕如。不僅我所編的總理全集沒有，就是在我以後出版的總理全集中也找不到，這實在是文獻上的一大遺憾。

我要追尋出　中山先生辛亥以前收回租界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的文件的主要原因，是要糾正當時一般人對他反帝國主義主張的提出，認爲是由於當時採取聯俄政策所致的錯誤觀念。我現在仍然要在此不厭其繁地敍述這一問題的原因，是由於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人存有這一錯誤的看法，如果不予以較爲詳細的說明，這一種錯誤的觀念，將會使研究近代史的人們難於見到歷史的眞象，而錯認了歷史的進程。

有一次我隨胡漢民、陳協之等幾位先生到廣州白雲山的能仁寺去遊玩，我又提出這一問題來請教胡先生，他馬上給我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碰。他說：

「你對這件事提出來問我已經無數次了，我能答覆的都告訴你了；你爲什麼一定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強迫着牡牛生仔？現在要知道的和要做的事情很多，又何必單在這件事上動腦筋？　總理把人類的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化分爲三類人：一是不知而行，二是行而後知，三是知而後行。你就做一個不知而行的革命黨人好了。」

胡先生的本意是在和我開開玩笑，但我卻有點不能忍受。於是我很直率的回答他道：

「不知而行的第一流人物讓你做好了，我實在只願意做『知而後行』的第三流人物。因爲現在是科學時代，是知而後行的時代，我不能不求知而盲從。」此時，我頓覺到胡先生白皙的書生面孔上好似吃多了酒似的紅起來，額角的青筋亦鼓漲起來了。他好像正想嚴厲地「回敬」我一句，但話到嘴邊又止住了。我趁着這一瞬間又溫和地向他說：

「現在一般人都誤會了我們新近通過的反帝國主義的條款是赤化原原本本的找出來是　中山先生遠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有的主張，如何能使人了解呢？革命的宣傳靠標語口號，而不從研究眞理、啓發人們的理智入手，又有何效果呢？我是受了蘇俄的影響，我們不把他剛剛離開學校的年青『毛子』，我願代替你們多做點此類愚笨的工作。」胡先生最容易生氣紅臉，事情過了，也就算了，從不把不快的事記在心頭。我看他此時的臉色，又回復白面書生的本來面目了。

## 十二、中山先生反帝國主義主張的淵源與論證

爲了要尋求原始資料來印證　中山先生在大會的說明，經過了不少的努力，碰了不少的釘子，都無着落，最後只有直接去麻煩中山先生來求得解答之一途。事情很湊巧，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三月的一個早晨，我陪同由四川遠道經由雲南而到廣州的石青陽兄的代表何德方君，及四川軍人劉成勳的代表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鏡臺君二人謁　中山先生，報告四川的軍事情形。這位何君滿口的四川土話，言辭思想都凌亂無條理，而他的使命又不重要。至於那位劉成勳的代表林鏡臺卻不失爲「劉水公」好聽而不兌現的人稱爲「水功到家，劉成勳就以此得名。）他對　總理回答他說，那倒不必了，在各省爲革命而奮鬥的同志都很艱苦，我現在無總理作爲北伐的經費。　總力幫助他們已經感到不安，那能接受他們的幫助呢？你替我打電報謝謝他們便先行離去。我趁這機會請示　總理，我是否可以利用此一時間，請教幾個疑難的問題。他說：他勉勵他努力。

「今天早上正好沒有別的事情，你就坐下來講吧！」於是我得有較充裕的時間向　總理請教，我發問道：

「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先生曾說關於收回租界的主張，民元在上海的歡迎會上曾經講過，並且曾引起外國報紙的嚴厲批評，不知先生的講詞原文是否有存稿或其他的記載？先生又說曾經發表過文章，不知這一文章現在尚能尋得出否？」

中山先生回答說：

「這些材料手邊現在都沒有，大約在當時舊報中可以尋得出。我對於此項主張不只發表過一次，當時外國人固然覺得不安，就是我們的同志，也頗以我的言論易引起外人的反感爲慮。」

我聽了　中山先生的話後，心中又冷了半截，如果當時廣州的圖書館存有此項舊報，我也不敢再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煩他了。在一個研究設備欠缺的社會，研究問題尋找材料眞是不易。而備的圖書館供人利用，所以易於培養出專家學者，在國內卻是難乎其難，而其所登載的文章幾乎很少有值得一讀的，不是「思而不學」，便是原始資料在　中山先生處也未能獲得，於是我不得不請問他關於是項談話及文章的內容了。於是我說：

「先生當日所持收回租界的理由和內容能不能告訴我一點？」他微笑着說：

「說起來很可笑，當日我曾經把日本、暹羅的前例告訴國內的人士，說明這在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很平常的事，因爲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就曾有過外國的租界，由於政治的進步，後來租界亦由和平的交涉而取銷了。可能是因爲中國在庚子年八國聯軍之役受創過深，中國人對於外人的恐懼也特別利害。民國元年距庚子義和團事變爲時僅僅十一年，一提到易引起外國人誤會的事便談虎色變，這亦是無足怪的事。辛亥以前一般從事革命的同志，雖然熱誠勇敢不惜生命的犧牲，但是最忌諱的事，便是怕被人把我們的革命誤會爲排外的義和團，引起國內同胞的恐懼和外人的干涉。當日康有爲、梁啓超那班君憲派，所持的反對革命的理由，便是認爲『革命要召致瓜分』，我們駁斥他們的言論，亦只能從善意方面分析帝國主義的情勢，說明革命是絕不會召致瓜分的。其實在我內心的籌劃，列強終將不會輕易聽任我們革命的成功，甚至要予中國革命以阻撓與干涉，亦是我意料中的事。外交關係我們的成敗很大，要免於這些困難，勢不得不因應他們，不能不在他們之間利用其矛盾以求得友軍，更不能不把革命被人誤會爲盲目排外的義和團那種觀念洗滌乾淨。但是現在的情勢與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所以我們要謀國家的自由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立，便不得不把眞正妨礙中國自由獨立的帝國主義作爲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

我聽　中山先生說到這裏，就迫不及待地發問道：

「照先生的說法，當年在尚賢堂，聽你講演的那些外國人豈能甘休？這豈不是與虎謀皮、自討麻煩嗎？」

中山先生笑了一笑然後說：

「我當然在和他們講話的時候，亦注意到這一點。我是和他們講大道理的目的是改革政治建立文明革命成功，他們的利益才得有保障。從前滿清的排外是由於政治腐敗，我們的政府。如果滿清的腐敗政府，繼續存在，野蠻的、排外的、義和團事變一類的事，是不會終止的。第二、是因爲鴉片戰爭以前滿清採取閉關政策，不與外國通商交往，你們外國要到中國來做生意，便不得不用武力來打破中國關閉的門戶，滿清政府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戰敗之後，才被迫開放廣州、厦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准許你們做生意，才劃定地方給你們居住，這是租界的起源。當日的意思是：你們做生意只能限定在這租界以內的地方。現在中國革命已經成功，中國已成爲世界文明國家之一，你們放棄了租界，全中國各地都可以給你們通商貿易，這不是你們的損失，相反的是你們外國在中國貿易範圍的擴大。你們只要守中國的法律，全中國各地和各地的人民都會歡迎你們的。如此你們所失者小，而所得的卻更大。第三、租界的存在，好似國中有國，侵害了中國的主權，你們在租界享受的種種特權，對中國是一種不平等，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中國人民對你們不會有好感的。你們不能得中國人民的

好感，你們在中國的貿易是不會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的。」

我問　總理：「先生的話，在場的外國人聽後作何感想？他們有無反應？」

總理繼續說：

「明理的外國人是贊同的，多數的人當然感到不快，其後外國人在上海等地所辦的報紙，對此都加以攻擊，黨內外的人聽到外國人都反對這一主張，於是更瞻前顧後不敢有所作爲了。不然的話，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回租界等等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至少早在十幾年以前便大聲疾呼的提出來了，何至於遲延到今天才明白標舉出來作爲宣言與政綱。這一不幸的延宕是十分可惜的事。當然，從此下定決心勇敢的向這一方向走還不爲遲。今日國民的知識和國際的情形已比辛亥年時大大不同，進步得多了，做起來雖不無困難，但比以前不知容易了多少。十幾年前之所以沒有把反帝國主義的主張高喊出來，就是因爲辛亥革命後同志們的心已經渙散，信仰也已動搖。現在本黨改組，我們強化組織、堅定信仰，所以今後行之必易。」

我趁這一機會，把兩個悶在心中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向　總理提出：

第一、辛亥革命南北統一之後，各國都紛紛承認我們，尤其美國是一個很早就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爲什麼到了民國二年（癸丑）列強便幫助袁世凱來對付我們革命黨，使我們二次革命竟很快的就失敗了？

第二、這是不是由於當日　先生主張收回租界等等不利於列強的主張，所引起他們的反感而對我們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利呢？

中山先生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我，略爲停了一下，好像說起來非片言所能說得明白，而又不能不趁此機會曉諭我一番。我此時亦感覺我的問話太坦率，修詞也不甚妥當，然而話既已說出口，又無從加以收回，只得靜候他老人家發落了。

中山先生說：

「你第一個問題是千眞萬確的。如果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列強不袒袁世凱而抑制我們，二次革命不會失敗，卽使失敗，也不會那樣摧枯拉朽般的失敗。列強幫助袁世凱二千五百萬金鎊的大借款，這一筆大款給了袁世凱，不僅是一項有力的物質援助，而且更是一項精神的援助。在『懼外病』患得很深的當時中國社會，那時大家把我們國家的成敗休戚都寄托在外國人的喜怒與取舍之上，袁世凱一俟大借款到手之後，不僅財源有了依賴，士氣也隨之大爲旺盛，這的確是袁世凱之膽敢反革命和我們之所以失敗的主因。銀行團起初爲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後來美國政府宣言退出，便成了五國銀行團了。」

中山先生說到此地，又略爲停了一下，心情很沉重而又委婉的說道：

「至於說到帝國主義對我態度的轉變，是由於我主張收回租界的主張所引起的反應，在當時很多人都如是說，這是很遺憾很可笑的。我當時，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前，不僅主張收回租界，而且主張改善外人在中國海關的特權，以及收回領事裁判權，也卽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反帝國主義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張。今日的時代是進步了，你看我們現在在南方高喊廢除不平等條約，北方政府中也有人在進行想循外交途徑來修改不平等條約了。在辛亥年的時候，我們何嘗不想在因應帝國主義的原則之下，用和平的方法來和列強打交涉去修改不平等條約，但是如果做得到的話，就不用等到今天了。如果我們今天不高喊廢除不平等條約，恐怕北方政府中人到現在還不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由於他們這一表示，可見大勢所趨，廢除帝國主義加於束縛的不平等條約，只要我們努力，必然是水到渠成，最後一定成功。」

我說：

「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對外政策第一條說：『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應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北方政府用『修改』二字，如果在實質上能夠把那些不平等的部分去掉，這與我們所主張的『取消』與『重訂』又有什麼分別？」

中山先生笑了笑，好似覺得我這一問得過於瑣碎似的，不過他依然很有耐心的說下去：

「從前我們本是希望由雙方談判協議而達到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因爲列強根本不贊成這一主張，不願放棄他們在中國束縛我國家發展的特權。同時中央政權一直由北方的舊勢力所把持，列強又不把我們當作交涉的對象，所以我們只得大聲叫喊，喚起國人的覺悟與了解，待我們統一全國之後再來實行。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和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我們都曾發動輿論，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使北京政府在這兩次有關中國的國際會議中，把修訂不平等條約的事提出來。無奈北京政府缺乏勇氣，雖然曾經以很溫和的口氣提出，但由於不敢在會議中堅決的爭取，以致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的結果。當然列強不願放棄其既得的權利亦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距今一年多以前，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本黨發表的宣言中，曾提出一項主張云：『力圖修改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根據這一條款，我們的態度仍是十分溫和，仍然是主張修改，但是在民國十二年十二月裏，我們爲了要截留廣州的關餘，不要使在廣東徵收的關稅，由外人的稅務司交給北京政府，用來作打擊我們的軍費，不料列強竟派了兵艦二十餘艘到廣州珠江的白鵝潭示威，把礮口對着我們的大元帥府，要迫使我屈服。這二十餘艘兵艦中，竟有對我們革命較爲友好的美國和法國在內，他們都各出了兵艦二艘，參加帝國主義的行列。這是我所最引爲遺憾的，但我並不因此而屈服。

因爲修改不平等條約是要得到對方列強的同意的，我們既不被他們認爲對手，而他們又根本不願放棄他們在中國的既得權利，所以我們只好單獨叫出取消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等到他們感覺到有必要時，再來重訂雙方互尊主權的條約了。我們在南方高叫取消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怕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威脅了。」

中山先生此時的神情十分嚴肅，我聽了他最後一段話，因而想起李曉生對我說過的與此相彷彿的一段話來。李先生說：

「在辛亥革命以前，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諸先生在巴黎出版一種革命的刊物名叫『新世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鼓吹無政府主義，言論非常激烈，要我爲他們在各地多多推銷，我以此事請示　中山先生的意見，他說：『你儘管盡力爲他們推銷好了』。什麼理由呢？　中山先生說：『我們張革命，大多數人說我們是激烈派，聞之恐怕得要掩耳而走，『新世紀』的主張比我們更激烈，讓多數人知道了，會感覺到我們是很溫和而不掩耳而走了。』」

由這一事例我們不難知道　中山先生的器度和胸懷是如何的恢宏！

中山先生最後很鄭重地答覆我前面所提的，由於他在民國元年提出反帝國主義的主張，而引起列強對我不利的第二個問題。他說：

「處理問題應當把握住問題的關鍵，亦卽是問題的根本的癥結所在，然在某一時期內或多或少可以減少若干阻力，但到了盡頭，問題的根本癥結仍然是存在而無可避免的。我們的革命是在謀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自鴉片戰爭以還便爲帝國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所以掌握，而日益加深。我們既不能希望腐敗的滿清政府，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救出來，建設一我們才決心要革命推翻滿清是我們革命的第一步，從帝國主義的壓迫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當時誠然有不少人認爲列強幫助袁世凱來對付我們，是由於我發表收回租界的主張所致。但是，這只是一種淺薄的看法，其實就是我在民國元年不如此主張，帝國主義亦不會輕輕放過我們。除非我們放棄革命的主義，依託在他們的卵翼之下，犧牲我們國家的獨立自由，幫助他們加深中國的殖民主義化，也許他們才會在袁世凱和我們之間作一個選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要明白這一道理，我們對列強過去的對華政策，必須有以下的幾項認識：

一、列強對華的基本方針，永不願中國的強大而造成他們自己的威脅，資源豐富，一旦強大起來必將會無敵於天下，所以我們在滿清腐敗政府的統制下，中國不能振作的時候，他們猶說中國是一隻睡覺的獅子，他們叫我們是『睡獅』，一旦這一睡獅醒過來，便會吃掉他們了！而革命正是喚醒睡獅的激烈行爲。

二、他們企望於既得權利的保持，而不能寄望於一新興的謀求國家自由獨立的革命政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中山先生爲我舉出兩個歷史的事例，他說：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是最早接受西洋的宗教思想，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的列強並不切實援助他，反而去援助相反的滿清腐敗政權。宗教上的接近策。英國的戈登將軍一班人並且組織常勝軍來打擊太平天國，造成他們的覆亡，這是一個明證。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及因此役而訂立的北京條約，是在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後，迫使滿清政府作城下之盟，又何嘗不是英、法兩國威迫滿清政府如不屈服便要幫助太平天國而締結的呢？滿清政府這一次的屈服所要贏得的便是幫助他來對付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雖多，這應當是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個。爲甚麼當日英、法兩國要如此呢？一是不願中國的強大而威脅他們；二是要保持他們的既得權利於不墜。在新興的太平天國與腐敗的滿清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就不足怪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其次，是庚子義和團事變之後，列強並不追究懲辦慈禧太后那位禍首，反而不惜多予保全使其回鑾北京重掌政權，這說明一個國家的腐敗政府的存在，在侵略國家看來是最有利的。更何況當時的一班大臣們，亦不願朝廷有一個更生的局面出現，革命固然是他們所痛絕的，就是改良派的康、梁之徒在利害上亦與他們相違背。

所以，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不是因爲我把收回租界的主張提出得太早，以致引起列強的反感而不利於我們，而是那時我們革命組織鬆懈，人心渙散，信仰不夠堅強，否則我們不會延誤到今天還沒有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

中山先生很感慨地說到辛亥革命時的情形：

「辛亥年滿清既倒之後，我看到革命黨人組織鬆懈，信仰不堅，誤以爲革命已經成功，憧憬於民主憲政的實施時期已經到臨，一切都不照革命方略來進行建設。軍事時期還未完全結束，便想一躍而實行憲政了。我當時感覺到同志們的心已渙散不足與有爲，所以決心暫時先結束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體，而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以暫謀南北的統一，一面專心修築二十萬里的鐵路以解決交通問題，以謀經濟之開發，實業之振興；一面從事教育文化的發展以增進人民的知識水準，待時機成熟再及其他。

我這一企圖，在袁世凱方面表面表示贊成，內心則認爲是一項空想不予重視。而在列強方面則已暗中蒙上一層陰影，覺得中國的進步和革命的成功終歸是與他們不利的，而進行其『扶袁倒孫』的大借款陰謀。自民國二年春天袁世凱僱人刺殺宋教仁於滬寧車站案發生，同志們感情極爲衝動，主張再舉革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討伐袁世凱，我在初對此頗爲躊躇，然以袁世凱背叛民國之罪行已顯露其端，再舉革命已勢不可止，不得不對同志們的義憤予以同情。我當時的看法，如果要再舉革命討袁，必須在他大借款未成之前舉事，乃可操持勝算，不意我們行動遲緩，迄至袁世凱大借款成功之後，贛、寧、粵各地才紛紛被迫起義，以致不旋踵而被袁世凱個個擊破，二次革命便因未能掌握時機而遭致慘痛失敗！這一次本黨的改組，便是要力矯過去革命之慘痛失敗，重整我們革命的旗鼓！」

我前面所述說民國十三年的一些回憶，是在說明當日　中山先生強調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關的主權及反帝國主義的種種主張，是遠在辛亥革命時便已經提出，並不是因爲民國十三年聯俄的關係才有是項決策的。這是治近代史的人難於了解亦是易於錯誤的問題。這是近四十年代國民革命歷史的轉捩點，忽略了這一背景，便不易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了。

民國十三年時的聯俄政策，是由於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暫時脫離了列強侵華的行列，此時的蘇俄正是被資本主義的列強加緊圍攻中。蘇俄爲了要解除他自身的危機，突破列強的包圍，於是不得不採取援助弱小民族解放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策略，來困擾資本主義各國，以獲得其政權的穩固。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是帝國主義角逐最強烈最迂迴而最脆弱的地區。因此蘇俄要以「聲東擊西」的策略來對付包圍他的敵人時，無疑的，中國是掀起反帝國主義高潮的最好的地帶，因爲這正是中國革命尋求已久的一項基本問題的解決。

蘇俄爲了要討得中國人民的歡心，於是首先聲明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所獲取的一切權利。蘇俄的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表越飛於民國十二年與　中山先生的聯合聲明並更進一步的強調：

一、蘇維埃制度不適合於中國。

二、中國需要的是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

三、蘇俄對於中國革命寄予同情。

從這一聲明的要點可以看出蘇俄是如何的在迎合中國革命當時的需要。中國在此一時期當然以聯合一項表示。反帝國主義以求中國的自由與獨立，這當然是於我最有利的機運，焉能輕輕放過？

這說明當時蘇俄的對華政策，在反帝國主義這一目標上與中國國民革命的利害有了共同之點而一時結合起來，假使到了利害不同甚至發生了國家利益的基本衝突的時候，自然也會斷然分解的。我們試檢查一下自辛亥以至民國十三年這一時期的列強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可以大體說都是維護中國的舊勢力而反對我們的革命。美國的政府和民間對中國雖然態度較好，除了民國元年首先承認中華民國與民國二年的不參加英、法、德、日、俄對袁世凱的大借款來打擊中國革命，以及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會議中，對於山東問題之解決予中國以同情之外，也一直仍未能擺脫英國和其他列強侵華的牽累而自拔。到了民國十二年多，爲了　中山先生截留廣東關餘的問題，各國派了二十餘艘兵艦到達廣州白鵝潭，以礮口對着距離不及千米的　中山先生駐節的大元帥府示威的時候，美國亦竟派了兩艘兵艦參加了侵略的帝國主義的行列。　中山先生素來盼望美國對中國革命作一個援助當初美國獨立的英雄，法國的拉法葉（Lafayett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但是到來的不是拉法葉，而是兩艘示威的兵船，這在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關係上，構成了莫大的遺憾。

中山先生素來認爲可以爲中國革命之友的一是美國，一是日本。美國是一個經過革命而建立近代民主政體的先進國家，在民主的基本的原則上與中國革命的目的正相同，而兩國並無利害衝突之處，日本則是文化歷史與中國最密切而利害亦至接近，沒有日本的友善與同情，我們遭遇的困難當更大。事實上，美國在民國十二年對中國革命的態度既如上述，而日本方面除了民間志士同情我們，並曾有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志士，但是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則始終與英國爲首的列強侵華政策完全一致。在這一情形之下，在此一時間之內，可以爲中國革命之友的便只有蘇俄了。這是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重振革命旗鼓，對蘇俄一時採取友好態度的一項重要的背景。亦是蘇俄那時的對華的政策符合了中國要在帝國主義的羈絆之下擺脫，才能獲得國家自由獨立的要求，而偶然結合起來的因素。是先有了中國國民革命不能與帝國主義並存的因素，乃有蘇俄乘機而助長之事實。中山先生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在前，與蘇俄的合作是在後。

現在我很有必要，把遠在辛亥前後　中山先生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利權，取消領事裁判權的重要談話寫在下面，作爲一項具體的歷史論證。

民國前一年十二月在巴黎，與政治星期報記者談話：

「……新政府於各國通商一層，更當注意。當廢除與外人種種不便之障礙物，將海關稅則重行編訂，務使於中國有益，不能聽西商獨受其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前一年冬在滬與外報記者談話：

「記者問：關於治外法權如何？

先生答：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卽取消領事裁判權。」

民國元年五月與土蔑西報記者談話：

「……言次，又謂：中國政府將取消各口岸之租界。

記者問：如此則沙面亦歸中國政府管轄之內矣。

先生答：吾儕將擴張沙面，與共和國全境無異。

記者問：英人在中國之權限，將與中國人之在英國者同乎？

先生答：必然！此是數年後之問題，吾人將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國人，皆受日本管轄，而吾人之政見，又欲極力保存國體。」

民國元年五月，在香港與南清早報訪員威路臣談話：

「記者問：先生言通商口岸之租界，定必裁去，此何故也？

先生答：此乃華人之意志，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然吾人將必開放中國各地，以爲酬償。目下洋人，祇可囿於通商口岸，若果裁去各口岸，則洋人將可到通國各地，由太平洋以至西陲，果爾，吾料歐洲諸國必甚歡迎，因洋人所得利益甚大也。雖然，此事非欲卽行，吾人將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歐洲諸國滿意，然後請其裁去口岸之租界，時機一到，料各國無有抗拒者。因各國對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於日本、暹羅，既不相拒，豈獨拒於中國乎？洋人欲拓大上海租界，如別國今居中國地位，豈不亦如中國之所爲乎？足下爲英人，則必不欲有德人租界於倫敦也明甚。」

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與各報記者談話：

「記者問：聞先生主張遷都，確否？

先生答：余極主張遷都，其地點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開封均可。北京乃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礮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辱……。」

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談話：

「予不至北京已二十年，此次重來，未改舊觀。惟國都有外兵駐紮，城頭安置各國巨礮爲可慨耳！試思舉一國之首都，委之他國人代爲守護，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余有遷都之建議也。」

——原載民國五十八年十全大會「每日快報」。

按：黃先生曾於民國四十六年作「俄共早期之笑臉」一文，後收入本文六、七兩節。本文於民國六十二年作「總理的音容—首次全代會開幕的回憶」、「從第一到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回憶」及「劃時代的腳步——我的感憶」等文，內容相近，不再重複收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愛鄉與愛國

近年以來，各省市整理地方文獻的工作，先後繼起，蔚爲風氣。除其法定的文獻機構以外，大陸旅臺各省市人士，亦先後組成文獻社團，斐然。國史館以地方文獻對於國史是不可缺乏的資料，特於五十八年五月九日在國史館約請各省市文獻社團的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聽取各地方文獻社團辦理的情形，並說明國史館的期望。這一次的座談會，確定了大家要集思廣益，共策進行的基礎；幾經籌備，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終於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在學會發起人會議和成立大會中，我都承應邀致詞，提出我個人對於這種工作的認識和願望。

在學會成立後的一年中，一切工作，都有很好的推動。照學會成立大會宣言的指陳，其工作重點，一爲地方文獻的蒐輯與整理，一爲愛鄉愛國精神之發揚，一爲作重建鄉邦的準備。這一年來，各省市的文獻社團組織更加普遍了，所出書刊，在數量上內容上都有增進。地方志書的影印，各出版機構亦在繼續努力。至於從本年一月起至五月止，在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和高雄市所舉辦的中國地方文獻展覽，內容豐富，觀眾踴躍，對於激勵大家懷鄉愛國的精神，認識臺灣與中原文化血肉同親的密切關係，尤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這是學會成立後的成就，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學會年刊徵文，要我說幾句話，我願以一個主持國史館的人之立場，提供以下幾點意見，和學會的各位先生共勉：

第一、據學會的統計，全國各省市文獻社團的組織，已遍及全國四分之三的省市區域，就是還有四分之一的省市區域沒有組織起來。我們希望學會能夠繼續推動，使這些沒有文獻社團的地區，也有同樣的組織，大家共同來致力於地方文獻的蒐輯和整理的工作。

第二、地方文獻爲國史所取資，我曾再三向學會各位先生提及。自中華民國成立以還，戰亂迭經，文獻遺失。國史館正從事於中華民國大事記的編著，即多少感到資料上的困難。各省市文獻社團的負責人，多身歷國民革命各役，各省來臺人士，各有所經、所見、所聞；及今不予蒐輯整理，將有「後將誰繼」的憂慮。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就各地方所見所聞，儘量記錄保存，以充實國史的資材。至於記錄必須求眞求實，然後才可以成爲信史，這自然是不待說的。

第三、地方志書爲我國地方文獻中的寶藏，其豐富舉世無匹。年來臺灣省、臺北市之編印方志，和文獻社團之影印方志，成績卓著。學會各位先生，曾一再提及向各藏書機構借出方志的困難，希望國史館協助解決。在這一點上，我們已直接間接向有關方面說明，獲得同情，今後借印方志，自可較爲便利。關於我國歷年所編方志暨在全世界各圖書機構保藏現狀，我們有作一個全盤調查統計的計畫，今後願與學會諸先生共同努力，來完成這一項工作。

謹以這幾點意見，表示我對於中國地方文獻學會一年來工作成就的祝賀和期望。

——錄自「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民國六十年九月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獻言

## ——由地圖展覽所得的幾點感想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自民國五十九年成立以來，於六十年曾刊行民國以來各地文獻之蒐集與過去方志之整理，各抒所見，發爲專論，頗受學界的重視。今年又將刊行年刊，適在學會發起舉行中國地圖展覽之後。此次展覽的重要意義我在揭幕時已有道及。茲再就感想所及提供參考。

**第一、歷史與地理的教育爲激發民族意識與愛國觀念之重要因素**：兩者有如一體的兩面，互爲關聯，不可或缺。關於歷史文化的重要，近年以來已漸爲國人所重視，惟關於地理與輿圖教育，由於大陸淪陷，資料散佚，集中不易，致在研究與了解上，困難重重，進行不易。本年十一月，地方文獻學會爲恭祝總統　蔣先生八秩晉七的壽辰，曾聯合有關史地學術機構，分別展出全國疆域圖、歷代沿革圖、抗戰史蹟圖、各地方輿圖、東北及西北邊界圖以及元明以來刊行的方志等，凡是參觀過展覽的人士，對於我國河山之壯麗，歷代之經營，文物之燦爛，莫不同聲贊歎，並對於我先民先烈之拋頭顱、灑熱血來開闢及維護此疆宇者，更致其由衷的崇敬。尤其對於離鄉背井的人們，覩物興懷，熱淚有不禁奪眶而出者。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從這些啓示看來，輿圖作爲教育工作，藉以激發民族意識，其效果自屬顯而易見。

**第二、輿圖可作爲通籌全國設施的指標：**原來，我國對於輿圖的重視，可說至少可以遠溯周代。周禮地官說：「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又說：「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更接着說：「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又說：「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據此以觀，周代的輿圖，不但有周知地域廣輪的全國疆域圖，並有辨邦國都鄙之數的分區圖，更有辨地形高下物產所宜的地形產物圖，至爲明備，眞出吾人所想像。求其所以重視輿圖的原故，卽在據圖以爲政教設施的佈署。今日固然時異勢殊，政府的任務，不比古代那麼單純。可是有關國計民生等如交通、食貨、水利、邊防等，藉輿圖予以通盤考慮開發或建設，則其緩急先後輕重之序，不難綱擧目張，次第實現，並且由輿圖以表現其業蹟，更可一目了然，於此可見輿圖在通籌設施方面居於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第三、從輿圖與歷史來考察歷代的設施，以供今後借鏡：**我國土地廣大，歷史久遠。時有治亂，地有變遷。或者過去已有設施而經時代推移已湮沒不見，或者過去已着手設施而未竟全功，或者已完成設施而利弊參半，甚或有弊無利的。這是非從歷史的記述無以溯其原，非從輿圖的考察無以擧其要。擧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來說，關中之地，古稱沃壤，其時灞滻諸水，映帶縈迴，以是地盡其力，人得其利。到後來水道湮塞，一遇災旱，卽民不聊生。如果追溯其盛衰的原故，以恢復舊跡，其有推而至於其他有關民生國計之事業，莫不皆然。用輿圖以爲指標，借重於歷史以作嚮導，則一切設施，自然費力少而成功多了。我國有一句「左圖右史」的成語，其作用就在這裏。可是古今來用世之士，多忽焉不講。所以吳興祚序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有一段說：「士人閉戶讀史，記憶其文，謂之淹洽。嘗試叩之以九州之內，所謂道里阨塞者幾何？戶口殷耗幾何？謠俗嗜好之甚者幾何？與夫上之人體國經野設險制防者何在？緯繣變化以導民善俗者何途之從？則有口皆瘖而不能指其崖略，此無他，由學者以史爲史，而不能按之輿圖，以輿圖爲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是以紀事雖多，猶拾瀋也，車轍雖廣，猶望遠也。因是以著之辨論，數因革之宜，較得失之勢，猶捫燊也，而於經濟之學奚補焉。」不禁慨乎言之。從這段話也可得到體國經野的崖略。

**第四、今後整理方志之途徑**：我國典籍，求其紀事與輿圖差備者，莫如方志。清初學者如顧炎武、顧祖禹二氏，嘗於此下極大的工夫。炎武纂輯「天下郡國利病書」，其內容包括輿地之記及利病之書兩大部份，卽就輿地與記載而求各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之利病所在，據其自序：歷覽二十一史之外，得見之書，惟明一統志，寰宇名勝諸志及十三司通志，但此書終炎武之身，迄未完成。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明歷代攻守之勢，並附輿圖，自序謂出入二十一史之外，得見之書，惟明一統志，寰宇名勝諸志及十三司通志，其天下郡縣志，得見者十未六七。兩氏著書之當時，關於資料之蒐集，有欲得而僅乃得之，有欲求而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力不足以得之，亦有求之而竟不得者，其困難可以想見。目前公私所藏之各地方志，數以千計，而各地文獻會所影印者，計不下數百千種，近年以來，國史館亦力事搜藏。資料既如是之多，欲求以個人或少數人之力而竟讀之，即累日窮年，已難辦到，遑論撰述。值此復國建國之際，倘由文獻會同人分別就有關國計民生者如二顧氏之加以整理，不難完成此一鉅大工作，以爲復國建國之藍圖。各位先生博覽多聞，且向有志於此，國史館甚願提供所藏，以資協助。我當拭目以樂觀厥成，爰記所感，藉供貢獻。

——錄自「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父逝世與早期反共思想

## ——介紹戴季陶先生宏揚　國父正統思想之貢獻

今年的三月十二日是　國父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在過去的歲月中，把這一天定爲植樹節，以紀念偉大的革命導師的逝世，今年的三月十二日又到了，而今年又恰逢是　國父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足了五十週年。在這整整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當日是幼年的人，已變作了中年；當日是青年的人，已變作了老年；經不起磨折考驗，或是已經爲革命犧牲而貢獻出他們寶貴的生命的仁人志士，更不知凡幾？

回憶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的今天，　國父在北京逝世後的情景：一面是革命失掉領導的重心，舉世徬徨，不知所措；一面是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和叛逆，乘機聯合以進攻廣東四面受敵之革命基地。其更爲嚴重之問題則爲受制於第三國際，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之共產份子，企圖破壞革命與篡竊國民革命領導權之陰謀，已日益暴露，而危機四伏。在此時期，革命陣營所面對之危機，在軍事與政治方面之力求穩定，以保持廣東革命基地之鞏固，以防止反革命份子之猖獗，固屬刻不容緩之圖，而更爲重要，影響深遠，關係革命全局者，則莫如共產份子在組織方面之滲透與在思想信仰上製造之紛亂，所召致革命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營分裂危機之大。

在當時能面對此一思想與主義的危機而感覺銳敏，急起直追，從事於此一目標之著述與活動。他謀，以謀補救者，當首推戴季陶先生。季陶先生於　國父逝世之後即首先提出「共信不力，則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則團結不固」數語，奔走呼號，以喚起黨內外人士之注意。

季陶先生在著述方面的重大貢獻：一爲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在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時，提出的「民生哲學系統表」一文，二爲是年六月間所完成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三爲七月間完成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這三項著作確立了三民主義的基礎是在民生哲學，劃分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更以「誠」字統攝智、仁、勇三者爲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動力，使三民主義的理論穩固的建立在中國正統思想之上。共產份子指戴先生思想爲戴季陶主義，即戴先生所歸納　國父的思想是完全建立在中國正統思想之上，亦即是自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道統，以及　國父所主張的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全民革命，而非共產黨所主張的階級的鬥爭。季陶先生關於　國父思想這兩項提綱的闡述，正擊中了共產份子所主張，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與進行慘酷的階級鬥爭的要害。自大陸淪陷以迄今日，共黨之不能安定大陸，穩定政權，爲人民所憎惡抗拒，以及由於最近批孔揚秦，造成內部之不斷鬥爭殘殺，莫不都是基於這兩種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季陶先生五十年前在思想上對共黨此一論斷與攻擊，到了今日更得到了有力的證明。季陶先生當時所作的此一努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力，不僅是反共思想上的先知，而且亦是一位勇敢的鬥士。當時國際共產黨及其附庸，把他當作他們的最大敵人，竭盡全力，予以無情的攻擊，自亦在意料中。

我在民國四十八年，季陶先生逝世十週年時曾發表過一篇「戴季陶先生與早期反共運動」的文章，對於季陶先生的反共思想，曾作了扼要的評述。在　國父逝世五十週年紀念的今日，我重溫這一舊作，重把季陶先生的原作加以審閱，我更覺得他當日的苦心和遠見，迄至今日仍不失爲反共理論之最大權威，值得我們視爲一種指針，而發揚光大，予以完成。

民國十四年　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在廣州發現一項共產黨內部傳播的秘密文件，文件中有一項蘇俄顧問鮑羅廷對共黨黨員分析時事的報告。鮑羅廷認爲當日共產黨的敵人有五個，他名之爲五個魔鬼。第一個鬼是帝國主義，第二個是軍閥，第三個是買辦資本家，第四個是國民黨右派，第五個則是戴季陶鬼。甚麼是戴季陶鬼呢？鮑羅廷說：自殺是懷疑的結果，而戴季陶這個人連自殺都懷疑。所以他是一個最大的魔鬼，也是共產黨最大敵人之一。我曾經把這件事告訴季陶先生，他不但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認爲是知人之言，往往向人提起而引以自豪。有一次我曾問季陶先生：「共產黨對你的咒罵，爲什麼你還感到得意呢？」他說：「共產黨的唯一法寶是教條，教條最怕人懷疑，也就是最怕人有思想，我們能夠從思想上鞏固我們自己，共產黨的教條便不會發生多大作用，他們之所以深惡痛絕於我的原因，一定是由於我最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有了效果，使他們感到頭痛，這是一件可喜而不用厭惡的事。」

同時季陶先生還斷定共黨份子在　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必然要更形猖獗，以全力來破壞中國革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中國國民黨手中竊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他對此一認定所採取的步驟：第一是如何團結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在思想信仰方面，以　中山先生思想爲中心，而不爲共黨的邪說與曲解所煽惑和動搖。在行動方面，能步趨一致，而不爲共黨的陰謀所分化。他對於這項工作的進行，在先並不採取攻勢以對付共黨，他的目的僅在力求鞏固自己而已。民國十四年五月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在廣州舉行，季陶先生預先草定了一項「接受　總理遺囑」的宣言提請大會討論，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經過了激烈的辯論與修正之後，纔勉獲得通過。當時不僅共黨份子及所謂左派以全力來反對他，就是國民黨的老同志中對他不十分諒解的也大有其人，使他事後不勝其浩歎！他在這一運動中最引爲安慰的一件事，便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當時也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委員的沈定一先生，能夠倒向他的一面，脫離了共黨份子的陣營，皈依到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而與他衷誠合作。共產黨對戴先生最傷腦筋的也是這件事。後來的西山會議反共運動，及民國十六年的清黨運動，沈氏都是始終其事的一人。

季陶先生對付共黨的第二步驟，便是在闡揚　中山先生偉大的思想和主義。他的目的是在從思想上首先鞏固國民黨內部的信仰，同時更要從共產黨陣營中和廣大的青年知識份子中，爭取依附於共黨理論教條而有志革命之人，放棄他們的一切，集中在三民主義的大纛下來。戴先生認爲理論是革命行動的明燈，沒有理論的行動，如似盲人騎瞎馬，不辨東南西北。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便是對付共黨的最大的武器。所以他在十四年六月便完成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在同年七月又出版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這兩書的出版，不僅成爲當時三民主義的空前一項權威著作，也可以說是當時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共運動中有力的理論著作。迄今天，他的價值絲毫不曾被削滅，雖然今昔的情勢和事實已經發生了許多的不同了。

在民國十三、四年間國民黨聯俄容共這一時期，雖則在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我和方瑞麟幾位同志，曾經有不許跨黨案的提出，來對付共產份子，實則當時我們的著眼點僅在組織的排拒性上，表現出一種對共產份子的不安，至於理論思想上的對立不同，當時是很少有人顧慮到的。就是在組織的構成上感覺不安而排拒共黨的人，當時都是一種善意的出發，持著所謂「分則兩全，合則兩傷」的見解。因爲當日我們急於要對付的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兩大敵人，在這一前提之下，共產黨當時的處境是和我們相同的，至少可作我們短暫的朋及，而不是我們的敵人。猶如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初期，共產黨宣言放棄一切擁護政府共同抗日，雖然我們從經驗中已感到不無懷疑，然而在大敵當前，輿論放言舉國一致抗日之時，那能不予以爲善之機會呢？誰又能預計後期共黨之狼子野心肆毒大陸至於今日呢？所以在容共及共產黨的罪行尚未暴露的這一時期，自然不易產生反共的理論，迄至共產黨刼奪革命領導權陰謀暴露之後，季陶先生便是反共理論的第一人，當日共產黨目一切反共的國民黨同志爲戴季陶鬼，便是這個道理。

當十四年六月廣州沙基慘案發生的時候，廣州的情形顯現出一個反帝國主義的高潮。就形勢而言，最有利於共黨的發展，事實上此一運動的高潮已爲共產份子所掌握，共產黨的聲勢和對我們的威脅，此時眞是無比的嚴重。我於是年七月初，携着胡漢民先生的信件赴各地聯絡同志，集中到廣州去籌開第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次中全會，來決定限制共產黨的辦法。到了上海之後，第一個要會晤的便是季陶先生。那時他正在上海閉戶從事反共理論的寫作，這正是他著名的撕破臉來公開向共產黨進攻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將近完稿的時候。他聽了我關於廣州情形的報告後，憤怒得把屋裏的書一齊翻倒在地下，繼之以嚎啕大哭，他那時的激動的憤慨就可想而知了。

季陶先生在　總理逝世之後所從事的重要反共著作，一是十四年五月完成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三是七月起草的一屆三中全會的「接受總理遺囑宣言」，二是六月完成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三項重要著作發佈後，黨內外反共的視線開始集中，反共勢力也就逐漸形成，由組織的排拒進而爲主義思想爭鬥的開始。在國民黨同志方面，這無異有如在黑暗中看見了光明。而在共產黨和第三國際方面，則無異是一種無備中遭受的襲擊，完全出於他們意料之外。自此以後，他們對於一切的事物須得從新估計，進攻中國國民黨的策略必須要從新安排。

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對於此一事件感到手足無所措，在先他們想用沉默來代替正面的衝突，避免增加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其實他們內部的恐慌已達於極點。他們在沉默了三個月之後，繼由第三國際通令共產黨的宣傳機關，全面予以批評和漫罵。我爲什麼說共產黨對戴先生此一行動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呢？在共產黨的了解：第一他們認爲戴先生是中國研究勞工問題，提倡勞工運動最力的人，對於馬克斯主義的了解也是最深刻的一個，不僅第三國際和共產黨是如此的看法，就是連國民黨的老同志中對他也不免有些誤會，而這種誤會又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爲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思想界起了重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動盪，戴先生和沈玄廬在上海出版的星期評論，對於勞工問題的研究，餘力，我們只要看看民國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山先生和戴先生關於社會問題的談話，便可知其梗概。據周佛海告訴我，當民國九年陳獨秀、沈玄廬及俄國代表魏金斯基等在上海籌備發起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他們曾約請戴先生參加，戴先生推說他在　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參加任何政治團體而予以拒絕。雖然如此，因爲他當時是一個鼓吹勞工運動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最力者，所以在若干次籌商發起中國共產黨的集會中，戴先生大都在座，大家都不曾有所芥蒂而規避他。正因爲戴先生是一個鼓吹勞工運動研究近代社會主義思想最力的人，所以他後來反對共產黨的思想行動，便也愈積極而深刻，處處都搔到共產黨的癢處，處處都打擊到共產黨的要害，就難怪共產黨要爲之震驚了。國際共產黨是近代思潮、近代經濟制度所激發出來而無可否認的一種事實，要反對共產黨而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做基礎，盲目的反共，正如俗話所說「背起磨子跳加官」，費力而不討好，甚至於所得的結果，正是相反的一面。

關於戴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發起時的一段經過，我不曾當面問過他，我所知道的這些片段事實，也只是從周佛海口中聽來的。我記得戴先生在民國九年，曾經寫過一首白話詩，題目是「跪在一尊大佛的面前」，原文我已不能記憶，詩的大意是說：他跪在一尊大佛的面前，忽然夢遊到另外一個天國，他曾一時爲此一天國的美麗所吸引，拉牽盤桓不忍離去，終又厭棄而離開，等他醒悟時，發現他自己依然跪在這一尊大佛的面前。照這詩的寓意推測，大約與此段故事有若干關聯，詩中那尊大佛所指的當是　中山先生，所放棄的天國指的是共產主義思想，醒悟後依然跪在大佛前的則是他自己。這可以說是他對於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山先生的思想主義是經過若干磨煉後而得的最後體認。因爲他經過的磨煉工夫愈大，所以他對於　中山先生的思想之精微奧妙了。

季陶先生「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闡揚　中山先生的思想最爲重要，然而引起人們的批評指責的地方也最多。他的立論著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貫的中國正統思想，也卽是一般人所謂的道統思想，有人甚至以「戴道統」譏諷他。　中山先生曾經自己說過他的思想的源泉：一是中國所固有的，二是採自西洋的，三是他自己獨創的。戴先生既然在這一書中偏重在第一項，而不免忽略了其他兩項，自易引起人們的指責。共產黨爲了要利用青年人好奇好新的心理，與迎合指責戴先生一類人的心理起見，在共產與反共產的辯爭中，他們曾利用他們所支配的宣傳機關，把戴先生畫成一幅漫畫，背上背着　中山先生的遺像，彎着腰，滿頭大汗地向門前冷落古老破敗的孔子廟前進，他們說這就是落伍的戴季陶思想，而不是進步的　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其實共產黨在中國傳播，他們最感吃力的也在這一點，他們在佔據大陸之後最大的一項努力，便是不惜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摧毀中國固有的文化，也是基於這一點，他們未來的慘敗，將也會種因於這一因素，也可預爲斷言。

就我所知，戴先生對於　中山先生思想的闡揚，何以要特別加重在中國倫理和中國文化這一點上面著力，其原因不外：一是中國民族有她幾千年優良的傳統文化，自有其特點，故應加以保存；二是我們能夠鞏固我們固有的文化，便無異是排拒共產黨思想傳播的最大武器，使共產思想在中國無從生根。最重要亦影響最深，使戴先生不能不加重從中國倫理思想來闡揚　中山先生思想的，是日本犬養毅氏在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十三年致　中山先生的一封信。戴先生曾一再向我提起，他說犬養毅的信中，曾請教於　中山先生而深致懷疑於當日共產份子自我們國民黨中喊出的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犬養毅認爲中國經濟的基礎在農村，政治的基礎幾千來都是由一種紳權的政治在運行，今日一旦喊出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在新的基礎還沒有建穩固以前，必然會造成社會經濟政治基礎的全盤動搖，以致橫決到不可收拾。如此又將何以善其後呢？戴先生認爲犬養這一段話，實在是至理名言，這大約和他著重從中國倫理文化來闡揚　中山先生思想，至少在對付共產黨的策略上在當時有其必要。何以說有其必要呢？我在此願舉出兩段我們所親身經歷的史實作爲引證。

第一是民國十六年的清黨運動，那時的共產黨猖獗情形，不能說比對我們現在面臨的威脅更少，然而我們終於能夠把他一時制壓下來的原因，不一定完全是由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勢力對比之下，我們的組織力量比共產黨強。在我看來，那正是如犬養毅的看法，那時中國農村經濟和紳權政治的基礎還相當鞏固，共產黨要動搖這一基礎，自然會遭受很大的反抗，我們以新興的力量，憑藉中國社會固有的基礎而反對共產黨，所以共產黨大規模的暴動便終於被制止了。此其一。

第二個歷史事實是我們經過八年抗戰之後，打勝了日本，卻轉瞬失掉了整個大陸，造成共產黨一時的猖獗，這又是甚麼原因呢？在我看來，此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社會的基礎，由於八年抗戰的關係發生了動搖，已遠不如十六七年的鞏固，社會固有的基礎既然開始動搖，政府的力量也因八年抗戰而疲乏了，而共產黨卻利用了抗戰而成長起來，他們掌握了這一機運，所以大陸便淪陷了。這完全是由於先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社會基礎有了變化所造成的不同的後果。此其二。

歷史是我們最好的一面鏡子，而每一時代有他的特殊情形或不同的條件，因此我們處理問題的辦法，由於情況和條件的變遷，便也應隨之而變易。如果我們把民國十六年的清黨作爲反共的第一個時期，那時戴先生明智的看法是造成反共勝利的一個最大的武器。如果我們把抗戰勝利後作爲反共的第二個時期，由於中國社會政治的基礎已經不如民國十六年時代的鞏固，所以共產黨便又猖獗起來。如果我們把大陸淪陷，作爲今後反共的第三個時期，那麼自大陸淪陷之後，這十年來共產黨瘋狂的用了全力來摧殘中國固有的文化，破壞中國大陸的社會基礎，今日的情形當然與從前更是不同了。如果戴先生至今仍然健在，以他了解共產黨慣伎之深切，與乎信仰三民主義之誠篤，和他明澈的智慧，必能爲我們今後反共的工作，針對當前國際形勢和大陸的社會變化，從新予以估計，而提取他更有效的反共辦法出來。處此反共的大時代中，我們眞是萬分的追念他。

現在距離戴先生逝世已二十多年了，自他逝世之後，國家失掉一個明智的先覺，個人失掉一個責善的師友，言之殊多悲感。回想他在　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在思想和行動上那種反共的奮鬥精神，和他所處的境地，那時不僅是共產黨要對付他，傷害他，就是一批不識事理的國民黨同志對他也不能諒解。當他在十四年冬赴北京參加西山會議籌劃反共運動的時候，曾被一批暴徒把他和沈玄廬二人綁架到北京城內一個地方痛加毆辱，而這批人在當時也尚自稱是反共的健者。戴先生事後常常爲我提及古人一句話：「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今日來回味他這句話，我對於他當年的處境誠不勝其感慨！

——錄自「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七期，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按：本文有關「戴季陶先生與早期反共運動」部份，曾刊載於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十二、十三日，「臺灣新生報」，後並輯入「戴季陶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民革命歷史重心的重建

## ——總裁　蔣先生對中國國民黨組織的演進之偉大貢獻



### 引　言

在本年四月舉行的中央聯合紀念週中，爲了要紀念　總裁逝世一週年紀念，中央要我出席報告　總裁的勛業，我特以「總裁　蔣先生對本黨改造的偉績」爲題，作了一次報告。今年十月三十一日，適逢總裁九十冥誕，而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將於　總裁冥誕之後十一日揭幕。這兩件卽將來臨的大事，引起了我內心兩項極爲沉重的思慮，一是關於　總裁的勛業，一年多以來中外人士發表的論著已經很多，但是對於　總裁領導國民革命，致力於本黨組織的演進方面的偉大貢獻，則有待努力而光大之。二是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在　總裁逝世之後第一次壯舉，在這次大會中，我們對歷史應當有一項突破，來完成他未竟的志業以慰他在天之靈。因爲本黨是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總指揮部，是集合革命同志實現主義政綱而奮鬥的組織，沒有健全的組織，革命便無由進行，更無由產生集體有效的行動，來實現主義，建設國家。我們要研究和了解　總裁的勛業，第一要義便必須要了解他所領導的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國民黨的歷史和傳統，第二要義便必須了解他對黨的作爲和貢獻，離開這兩項要件，便失去主題的掌握。

因此，本文特以「總裁　蔣先生對本黨改造之偉績」爲題，以補前文「總裁　蔣先生對中國國民黨組織的演進之貢獻」之不足。

## 一、本黨歷次的改組到三十八年的改造，挽救了革命重大的危機

我在上次聯合紀念週報告特別指出：

當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大陸反共情勢惡化危急之際，　總裁以引退之身，爲挽救危亡，防止反共革命運動之中斷，飛至重慶，特於九月二十日發表「爲本黨改造告同志書」，針對當時情勢喚醒全黨同志，奮起爲反共革命重奠基礎，策劃此後成功的道路。

在這篇「爲本黨改造告同志書」發表以前，同年七月十八日　總裁已提出「本黨改造案」，經由中央常會二百零四次會議通過。

在作提案的說明時，他痛切的指出當時本黨必須改造的迫切和重要。他說：

「總理領導國民革命四十年間，每當國家存亡，革命成敗的關頭，必致力於黨的改造。在　總理的手上，黨的名稱有五次的更換，黨的組織亦經五次的改革，其中民國三年和民國十三年，這兩次改造的歷史教訓，是我們特別應該深切領受的。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解散國會，毀棄臨時約法，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後竟變國號，帝制自爲，一般國民黨員，投機取巧者，投降變節，賣黨求榮；而失望灰心者絕口不談革命，或相期二十年後再談革命。民國三年　總理乃組織中華革命黨，採取秘密的組織，施行嚴格的紀律，從事革命運動，於是有討袁之役，護法之師，卒能推倒帝制，保障共和。民國十二年討陳之役，　總理回到廣州，北有軍閥吳佩孚等的壓迫，東受叛逆陳炯明的牽制，外受帝國主義者的包圍，內有陳廉伯等商團的阻撓，但是他一方面致力於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注重於宣傳工作和民眾運動，使三民主義在廣大民眾中植立其深固的根底，一方面在黃埔創立軍官學校，訓練軍事幹部，開拓國民革命的基礎。此後二十五年間，北伐、抗戰大業，皆以本黨這次改組爲發軔。本黨這兩次徹底的改組，在我們中國現代史上都有其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有了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的組織，國民革命才沒有中斷，中華民國才有保障；有了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國民革命才能發揚光大，北伐、抗戰才能得到成功！」

我在此更可加重的說：沒有大陸淪陷後本黨的改造，我們便不能建設臺、澎、金、馬成爲堅強反共的基地，更不能迎接共黨形將崩潰時運的到來，進而光復大陸，解救同胞。而這一切都是　總裁於民國三十八年，爲挽救危亡，改造本黨，睿智的決策，賢明的領導，艱辛的創造，而爲我們奠定的穩固基礎。



　總裁在這篇「爲本黨改造告同志書」中，更爲我們指出當前革命第三期的對象是中共匪黨，革命的本質是每一個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會戰爭；是爲了保障我們悠久的歷史、崇高的倫理，和以仁愛爲中心的道德文化戰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總裁更指出：「反共戰爭雖然是民族、民權的戰爭，但其成敗得失，不決定於軍事與政治，而取決於歷史與社會文化的成敗，今日共匪的社會鬥爭，是要摧毀我們整個社會，而他的目的是要滅絕我們的歷史文化。」其後更痛切的訓示我們說：「我們革命建黨是爲了救亡，必須警悟一個民族，其軍事的失敗，還可以復興，而其文化淪亡，那就要萬刼不復了。」

## 二、民國十五年春處理中山艦事件的鐵腕

在本黨組織的演進上，有一件歷史的大事，那便是發生於民國十三年本黨改造之前二十三年，而由總裁以鐵腕處理的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及其後所提出的整理黨務案。這一整理黨務案的重大精神，是在制裁其時滲透到本黨組織內，而企圖奪取本黨領導權的共產份子。如果沒有這一斷然的措施，我們便不能於民國十六年實行清黨，把共產份子驅逐於國民革命陣營以外，而完成此後統一與抗戰兩大任務。否則，中國共產黨的猖獗肆毒，早已於五十年前便實現了。

容我在此一述十五年三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及同年四月整理黨務案提出的經過和重要。在說明之前，當時黨務政治環境必須先有所了解，才易於研究判斷的。其中有一重大史實若不先加以說明，便不能知道其發生的背景和發展。這一重大史實便是何以　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前後，要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因爲民國十五年四月的整理黨務案的主要目標是：一、制裁加入國民黨內共產份子猖獗；二、處置共產份子依以爲命的第三國際派來協助中國革命的蘇俄軍事顧問，因而影響到了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時正施行的所謂聯俄容共政策。實質上，亦卽是影響到　中山先生前已經決定的中蘇友好關係，必須加以審愼的考慮。明白這一背景，便可略知此一整理黨務案之發生及其後果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後，次殖民地的中國，已進入到帝國主義國家轉移其方向於對中國政治經濟之略取，以平衡其大戰中之損失。而中國面臨之危機不僅將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之境況，或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　中山先生特抒其偉見，發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企圖利用各國戰時之科學技術以及各國因戰後而廢置無用之各項戰時設備，轉以用於中國實業之開發與中國之現代化。此一計畫如獲實施，不僅足以消除各國對華侵略之角逐，而中國之危亡，亦必因是而舒其困境，且更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爲各國免除戰爭之災害與犧牲，以奠立世界和平之基礎。此一偉大計畫不僅爲中國打算，更是爲世界和平著想，惜當時各國政治家無此遠識，而其時中國之內正處於軍閥混戰中，無一統一負責之政府以推進此一計畫之進行，卒召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演成人類無比之空前屠殺！

中國革命的目的，第一在解除其在帝國主義角逐下次殖民地之地位。中國民族欲解除其帝國主義勢力之壓迫，一爲以和平方法抗衡之，一爲以武力抗拒之，迄至前者「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和平之途徑既不可行，則惟有出於武力抗拒之一途了。

中國革命當日面臨之問題，爲對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國內軍閥之鬥爭，在國際不能不尋求友邦以爲援助，在初　中山先生本寄希望於日本與美國，迨至民國十二年冬，因廣州關稅問題，而引起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主義國家集體出動兵艦二十餘艘，開至廣州白鵝潭，企圖以武力摧毀廣州革命政府，而美國與日本竟亦參與其行列。在此時期，足以爲中國反帝國主義革命之友的國家，除蘇俄外，實無其他例外。我曾在「國父艱危中的外交奮鬥」一文中，對此曾有剴切的說明，在此不擬多所費詞。其中有一文件足資借鑑的便是在各國兵艦嚴重威脅之下，中山先生寄望於美國對中國革命援助之殷切了。書曰：

「當吾人首創革命，推翻專制及腐敗政府之時，吾人實以美國爲模範，且深望得一美國的那斐葉特(Lafayette)來協助吾人，使得吾人成功，亦正如美國革命得到幫助一樣。吾人之力爭自由，於今已十二年矣，但今由美國來者，非那斐葉特，乃較多於他國之戰艦。

華盛頓、林肯之國，是否誓拒其對自由之信仰，轉而爲力爭自由之壓制者乎？吾人實不信此，並深望貴國艦隊人員詳思此一問題，然後向吾等轟擊。現彼等之礮，已向此無礮壘抵禦之廣州城矣！美艦因何欲礮轟吾人乎？實因吾人對全國關稅之收入有合理要求，除清償以關稅作抵押外債之後，得取得吾政府治下各處收得所餘之關稅。夫此項收入，實屬於吾人，故本政府定有此權。且此款爲敵人所得遂用以購軍械，轉殺吾等，故不得不阻止之。這與美國先代投英國茶於波士頓港口之事無異。設若貴國以海軍之艦向我所轄境內爭取關稅，而令北方不良之軍閥得獲勝利，實爲一種罪過，乃無窮恥辱也。」

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之後，以倡言世界革命與資本帝國主義各國爲敵，遭受了帝國主義國家之仇視、圍攻與封鎖，其時適值中國爲一帝國主義角逐下之次殖民地，而且是最鄰近蘇俄、日本等帝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主義鬥爭有利之戰場，故策劃迂迴向中國發展，以突破其困境，於是　中山先生所領導下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中國國民黨，自然成爲蘇俄選擇合作的目標了。所謂「聯俄政策」，實基於此相互需求形勢而決定，而「容共」則只是此一需求中的附帶產物。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勢力極微，是蘇俄支配下的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其本身本無自立能力，一切皆聽命於蘇俄。其在加入中國國民黨時曾聲明純係以個人資格加入，服從國民黨之紀律，其既加入之後，則借用國民黨爲其軀殼與掩護以發展其組織，更利用滲透與分化，以瓦解國民黨之統一團結，而坐收漁人之利。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共黨份子與蘇俄，相互爲用，以爲時機已至，更進而企圖篡竊國民黨之組織，以奪取中國革命之領導權，其進行之策略：一爲曲解國民黨之主義，以所謂「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爲幌子，以動搖三民主義之基本思想；二是分化離間，強分中國國民黨人爲左、右、中三派以瓦解其組織；三是利用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頓失領導重心，而破壞其重建。其最顯著之事實，爲民國十五年三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共產份子與蘇俄的陰謀，打算危害其時剛剛完成兩次東征，中正，以奪取國民革命新興建立的廣東革命基地。

所謂中山艦事件是指的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晚間，共產份子李之龍，以代理海軍局長名義，矯令　蔣先生座艦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裝足燃煤，準備遠航，不料其時　蔣先生已先期赴廣州，該艦忽又於十九日晚開回廣州，升火待發，企圖在　蔣先生從廣州乘艦回返黃埔軍校時，挾持　蔣先生離粵，直駛海參崴，送往俄國。所幸　蔣先生洞燭共黨份子陰謀，於三月二十日晨，以無比的勇氣決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採取斷然手段，將李之龍拘捕，將中山艦扣留，並包圍蘇俄顧問住宅及下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槍械，謀之最大暴露，亦是從　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政策，發展至此後民國十六年「清黨絕俄」之一大先鞭。在這一事變中，汪精衞是暗中牽涉到的人物之一，他是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他竟於事變之後而秘密離開廣州，足見共黨陰謀分化離間國民黨組織之奏效了。

蔣先生對事變的經過曾有如下的追述：

「當三月二十日前二日，即三月十八那一天夜晚，無緣無故，開兩艘軍艦到黃埔來。一艘是中山艦，另外還有一艘是寶璧艦，是在廣東最大的艦。當時我並不曉得他是已經開到黃埔來了，到了第二天即十九日，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起初見面時，就問我，你今天去不去黃埔，我說今天我要去的。後來離別了他之後，到九點至十點鐘模樣，那同志又打電話來問我，如此一連打了三次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去。當他打第二次電話，我還不覺得什麼，直到第三次來問我的時候，我覺得有點稀奇。爲什麼那同志，今天總是急急的來問我去不去呢？如果沒有緣故，他從來沒有這樣子來問的。我後來答覆他說：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他曉得我是不去黃埔了。後來不到一點鐘的時候，李之龍又打電話來問我說，他要調中山艦回省城，預備給參觀團參觀。我問他：中山艦什麼時候開去的，他答：昨晚上開去的。我說：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麼呢？因爲十九日十點鐘，曉得我不回黃埔。所以當日下午，就叫中山艦回省城。開到省城的時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已是天黑了，因爲李之龍上午的電話我很奇怪，爲什麼既沒有我的命令什麼又要來問我，因爲從來開船都沒有來問我的。後來問他，是那個要中山艦開去，而他要開回來爲又說是教育長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來看，他說沒有，是打電話來的。省城之後，應該沒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還不熄火，形同戒嚴。中山艦到了黃埔，因爲我不在黃埔，在省城，他就開回省城來。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艦去鎮懾，一面要喊李之龍來訊問。因爲他是代理海軍局長，不能不負責任。這就是當時的情形。」

## 三、制裁共黨份子的整理黨務案

爲處理中山艦事變的善後，及當時的黨政問題，蔣先生乃於四月正式向中央常會提出召集舉行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提案說：

「近來國內政治現狀瞬息變化，本黨對於時局問題亟應確定方針以資應付。雖中央本有政治委員會之設立，然茲事重大，不僅爲單純之應付問題。況自前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外間因誤會而發生種種謠言，所以對內對外均應有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必要。且查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正之總章，規定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至少每半年須召集一次，現距大會開幕已將四月，照章應從速預備召集第二次全體會議。」

中國國民黨中央二次全體會議是在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在廣州舉行，蔣先生在大會中提出四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整理黨務案，經大會略加修正而獲通過。

第一案所決定之內容要點爲：一、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間之關係。二、糾正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及言論。三、保障中國國民黨黨綱與黨章的統一權威。四、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地位與其意義。附帶於提案之第三決議則爲組織國民黨與共產黨之聯席會議。聯席會議之組織大綱共八條，其作用只在緩和共黨份子之猖獗而暫加以制止。全面清除共黨份子於革命陣營之外，實尚爲當時內外環境情勢所不許。

就對外關係而言，由於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反對帝國主義與打倒國內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已掀起了空前的高潮，帝國主義各國即已積極向革命基地進攻，廣東基地日陷於岌岌可危，商團事件與沙基慘案之發生，即已暴露其勢不兩立之猙獰面目。在此一情勢之下，對於蘇俄與中國共黨之關係雖亦構成了國民革命之新威脅，但在利害輕重關係上考慮，究遠勝於放任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之對我進攻爲急了。存在於黨內之共產份子與蘇俄之關係，本爲一體之兩面，故整理黨務案之第一決議案，除對共黨份子加以制裁，以希望其悔改外，在聯席會議組織大綱第五條則列有以「第三國際代表爲顧問」之規定。在如是嚴重內外情勢之下，當中山艦事件發生，共黨份子初度進行其危害陰謀篡竊本黨，迫於眉睫之際，蔣先生中正，竟以無比之決心，施其鐵腕以鎮懾共黨份子當時之叛亂，他的臨事不懼，掌握機先的斷然措施，至今思之，實屬非常。國際人士認他爲由聯俄而制裁共黨獲得成功之土爾其領袖凱末爾將軍，實非過譽。環觀世界各國，其由聯俄容共，而終未爲國際共黨所吞噬者，除土爾其凱末爾將軍與我們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總裁　蔣先生之外，實難找其他的例外！

中山艦事變的發生經過，治中國近代史的人，往往忽略其在國民革命的發展上之重要性。因爲此一事變的處理，不僅關係於對蘇俄與中國共黨的問題，其更重要而複雜的因素，則爲其時任國民政府主席之汪精衞，實爲此一事變之共謀者。自民國十四年　中山先生逝世之後，革命頓失領導重心，在廣東方面，雖能迅卽平定占據東江之陳炯明、南路的鄧本殷，而樹立基礎；但經過是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先生被刺案之發生，共黨份子與號稱左派領袖之汪精衞相互勾結，借廖案以清除黨內忠實而反共之同志，於是胡漢民先生被迫赴俄，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不能在廣東集會，執行黨權，不得已乃有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　總理中山先生陵前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決定排除黨內共黨份子，處分汪精衞之舉，世稱爲西山會議派，卽指是次會議而言。由聯俄容共而分共，內部份子間親共與反共之壁壘，至是而明白劃分，旗幟鮮明，其影響擴及於全國各地，革命基地之廣東，其感受尤爲急迫，分解之局既成，對抗鬥爭之事不斷發生於農民、學生、工人及軍中，革命陣容，一發而日現分裂不可收拾之勢！十五年三月之中山艦事變發生於西山會議舉行之後五個月，在國民黨同志間，內心上是一種共鳴，而共黨份子在這一反共情勢高漲之際，不得不急切而圖謀奪取廣州革命基地，實迫於情勢使然。假若，共黨此一陰謀得以遂行，中國革命史之寫法將又不同了。總裁　蔣先生，對於此一事變之斷然處理及其於事變後提出制裁共黨份子之整理黨務案，實挽救了國民革命當時所面臨之危機，而獲得喘息機會與出師北伐，使革命軍事政治力量擴及於全國之新形勢。否則，民國十六年春舉行之全面清黨，把共黨排斥於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命陣營之外，便失去其可能，而早爲共黨在廣東所吞噬了！

**整理黨務案的第二決議案**

原來自民國十五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央黨部各部長及各把持指揮，爲所欲爲，成爲共黨勢力，不可一世之勢。在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的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中，選出中央常務委員及秘書人選，半屬共黨份子的決定的各部長及秘書人選。常務委員當選者：汪精衞、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祖涵、楊匏安均爲共產份子。在下列表中可以略見其概要：

| | | | | | |
|---|---|---|---|---|---|
| 秘書處秘書 | 譚平山 | 林祖涵 | 甘乃光 | 書記長 | 劉芬 |
| 組織部部長 | 譚平山 | 秘書 | 楊匏安 | | |
| 宣傳部部長 | 汪兆銘 | 秘書 | 沈雁冰 | | |
| 工人部部長 | 胡漢民 | 秘書 | 馮菊坡 | | |
| 農民部部長 | 林祖涵 | 秘書 | 羅綺園 | | |
| 商民部部長 | 宋子文 | 秘書 | 未定 | | |
| 青年部部長 | 甘乃光 | 秘書 | 黃日葵 | | |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婦女部部長　宋慶齡　秘書　鄧穎超
海外部部長　彭澤民　秘書　許甦魂

就上項名單觀察：部長之中，譚平山、林祖涵爲共產份子，胡漢民遊俄未歸，宋慶齡不願就職，汪兆銘旋於二月五日推薦毛澤東自代，甘乃光、彭澤民爲左派，宋子文亦不願多負責任，是以各部部務，率由秘書主持，而秘書人選皆爲共產份子，是整個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機構，已悉落入共產份子之手。

整理黨務案第二案的精神是針對上項的實情，不得不把佔據各部的共產份子部長摒除於中央組織之外，並對共黨危害本黨之言論加以制止。此案係　蔣先生以個人地位於十五日提出的，當提出之時，全場爲之大驚，十七日經大會討論後，乃爲如下之決議：

一、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瞭國民黨之基礎爲　總理所創之三民主義，對於　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或批評。

二、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册，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三、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額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五、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會議。

六、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許可，不得另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出通過時，應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追認。

八、本黨黨員未受准予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

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 四、本黨組織歷史之重心的重建

總裁　蔣先生四個整理黨務案中，以第三提案之關鍵最爲重要，在決議文中之第一款「中央執行委員因革命之需要暫設常務委員會主席一人」，這一決定之精神關係於此後之北伐、清黨、抗戰者，至大且鉅。因爲中國國民黨自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創黨以來，有一不可移易之傳統，卽爲總理制之建立，正如戴季陶先生有言：「有　總理孫先生而後有三民主義，有三民主義而後有中國國民黨，有中國國民黨而後有中國革命。」戴先生並謂此一精神爲「主義的人格化」。當　總理孫先生於民國十四年在北京逝世後，惟一難以彌補之損失，卽爲此一領導歷史的重心之失去。自此以後，黨內之分化以及共黨份子之得以遂行其陰謀，無不由於此一原因所造成。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設置主席的決議第二款中，特別規定，常務委員主席之人選，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本會執行、監察委員中選任之。爲甚麼要特別提出中央監察委員爲主席人選作爲另一條件呢？其原因有二：

其一、當民國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　總理孫先生爲發展組織增進新血，在有意無意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對於中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之人選，似早有一安排。對於中央執行委員之人選比較着重在年輕新進，積極有爲，與現實之適應方面爲考慮，而對於監察委員會委員之人選，則着重在黨的歷史，德望純潔，與忠忱方面作選擇。在二十四位執行委員中，因容共關係，提名了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等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七人中，共產份子佔七人，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等，而共黨領袖陳獨秀不與焉。

在正式中央監察委員五人由　總理孫先生提名通過的爲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監察委員五人爲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就全部正式及候補監察委員十人加以分析，最特別的一點則爲無一個共產份子被提名參加，被提名的均屬本黨歷史悠久，老成碩望的同志。

我們就上項分析，可以確定的一點，即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人選，在黨的組織上可以說是黨的歷史重心所寄託，地位既極崇高，亦爲後期本黨處於危疑震撼之際的一個穩定的力量。

其二、依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總章，監察委員會在組織上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平行的權力機構，在職掌上分別獨立舉行會議，行使職權，在必要時則舉行聯席會議，達成共同的行動。所以中國國民黨的中央組織，是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而言。當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已進展至長江流域，克復南京及淞滬的時候，共產份子之勢燄已到了足以妨害本黨的生存，其時由於寧漢分裂，黨內左傾份子又復依附共黨份子爲惡，中央執行委員已不能照法定人數集會，行使職權，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負起護黨救國之任務的，實爲中央監察委員會檢舉共產份子，決議全面清黨，本黨的危機乃得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除！我所謂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本黨組織歷史重心所寄託，在十六年全面清黨，制止共黨份子叛亂之役，充分表現其重大作爲與組織的精神。民國十五年一月廣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央監察委員的人選已增加正式委員爲十二人，候補委員八人，其人選雖有共產份子與左傾親共份子在內，已不如第一次代表大會時　總理所定之純以歷史悠久、老成碩望之同志充任，不任共產份子參加的嚴格，但尚能保持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人選之精神，忠實純潔、資深望重之同志，則仍屬多數，故十六年清黨之役，乃得挽救黨的危亡於瞬息之間。此一歷史的教訓，實珍貴而值得予以重視。

在黨的組織上必須不斷更新，以適應各個時代的需要，故任何政黨，勿論其爲普通的政黨，或革命的政黨，黨的新陳代謝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否則這個黨便會衰老不能隨時代而進步。但任何政黨的組織，必須鞏固其傳統的歷史重心，否則一遇危難，便如浮萍一樣，將隨波逐流，不能保持其完整，而失去其本來面目與精神。

民國十五年五月總裁　蔣先生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的整理黨務案之第三案，特別主張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設置主席一人，其目的在補救　總理逝世後，本黨領導重心的缺失，而暫作安排。他特別主張主席的人選，不限於中央執行委員，而以監察委員亦作爲人選之一的用意，是由於　總理逝世以後，黨內同志，已因反共與親共而引起了大的分化，故關於主席的人選，特別主張規定中央監察委員亦得爲人選之一。這樣固可以防止倖進，亦可以免於黨的歷史重心的動搖。

二屆二中全會舉行選舉主席的結果，監察委員張人傑先生當選爲第一次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先生是　總理生前最倚重的資深同志，他因身體殘廢，早已不直接參加黨的實際工作。由於黨的危機四伏，他乃毅然由上海前赴廣州，輔弼　總裁，共濟危難。他的出任常務委員會主席，在全黨新舊同志中，獲得一種共鳴，而安定了當時紛歧複雜的局面，民國十六年的全面清黨運動，他是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同志。在十五年七月，北伐誓師以前所舉行的中央全會，爲配合軍事政治的發展，雖曾改選　蔣先生中正爲常務委員會的主席，但　蔣先生仍指定張先生代理主席的職務，他在此一時期的重要與貢獻可以想見了。

今年九月爲張先生九十冥誕，我對於這位身殘體弱，奮然從事當時的護黨救國的老同志，不勝致其懷念、追思與敬佩。

中國國民黨自甲午（一八九四）創立興中會，以迄民國十三年改組，乃改採委員制。在改組的初意，總理本擬由其個人的領導，改組爲集體領導，把革命的大責重任交付於全黨同志，使革命的大業，不因他個人的關係而蒙受影響。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討論總章時，仍增立總理一章，以持續本黨組織傳統上的總理制的精神，亦卽是黨的領袖制的保持，把黨的重心仍寄託在創立三民主義的　孫先生，共戴他爲本黨的總理。在總章中特設總理一章，以規定其崇高之地位與職權。其原文如後：

## 第四章　總理

第十九條　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　孫先生為總理。

第二十條　黨員須服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於主義進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二十一條　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

第二十二條　總理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

第二十三條　總理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

第二十四條　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

民國十五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的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時因總理已逝世，因此，本黨中央的組織，便自然形成爲一委員制的局面，但在總章中仍保留總理一章，以留作永久紀念！　蔣先生中正於十五年四月舉行的二屆二中全會中所提的整理黨務的第三案，主張於中央常務委員會增設主席一人的用意，實緣於自　總理逝世後，革命頓失領導重心，爲團結內部，齊一步驟，防止共產份子的分化離間，出師北伐，完成　總理未竟的志業的一項過渡的彌補辦法。黨的領袖制之再建立，一直到民國二十七年春，對日抗戰最艱苦的時代，在武漢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才特別在總章中規定另設總裁一章，並推定領導全民抗戰的　蔣先生爲本黨總裁，本黨領袖制的傳統，乃得再建立起來！八年艱苦的對日戰爭，最後亦終於獲得勝利。其所以不稱總理而稱總裁者，是由於在總章中仍保留有總理一章，以表示崇敬與追思，並藉以保持本黨創黨以來之組織的傳統精神，並於總章中增列總裁一章，以行使總理之職權。

整理黨務的第四提案的精神，是舉行全黨總登記。決議文共五款，其在第五款中特別規定「曾經加入本黨所否認之政治團體者，登記時須特別聲明與該政治團體脫離關係」。其目的在著手清理黨籍，限制共黨份子繼續作亂，爲害本黨。在此不必加以多說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五、結論

總結總裁　蔣先生對於本黨組織改進的貢獻，在民國三十八年九月，當大陸接近淪陷之前，爲挽救革命危機，本黨的重建，特提出本黨改造的偉見，本黨之能在臺、澎、金、馬重奠基礎，以謀光復大陸之完成，實爲改造時期　總裁領導全黨同志在艱苦中所完成的偉績。在此以前，亦卽十五年四月在二屆二中全會所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如果沒有整理黨務案的提出，給共產份子竊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的陰謀加以阻止，本黨的危亡將可立待，更不能於此後出師北伐，實行清黨完成統一，實行對日抗戰了。在民國十五年本黨在廣州所蒙受共黨襲擊的危險，在當時的情勢上，並不較於三十八年時所面臨的危險爲小，而卒能轉危爲安，轉弱爲強，使國民革命運動繼續發展而未中斷，　總裁的明智、鐵腕與堅毅，實在是值得本黨同志與全世界人士加以敬仰的。

我在「總裁　蔣先生對本黨改造之偉績」一文中，曾把　總裁生前我說：

自　總裁逝世後，我們在他所樹立的自由的基地上，我們做了兩件並足以告慰　總裁在天之靈：

一是在民主憲政的常軌上，我們遵照憲法在未及十二小時之內，總統的職位，由嚴家淦同志以副總統地位繼任總統，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總統　蔣公是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晚十一時五十分鐘逝世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嚴家淦副總統於翌日十一時，便正式就任總統職位。此其一。

二是我們在　總裁逝世之後二十三日——四月二十八日，本黨舉行臨時中央全會便通過了蔣經國同志爲中央委員會主席。因此我們更奠定了反共革命的領導中心。此其二。

反觀我們大陸敵人的情形，他們死了一個周恩來，便形成了政治的紊亂，發生北京天安門的人民抗暴運動。現在這個獨夫暴君毛匪澤東，亦已於九月九日凌晨零時十分，拖着一身對中國人民的血債，帶着一身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在北平結束了他醜惡的一生。共黨內部權力鬥爭愈演愈烈，其覆亡的命運可以想像而得知了。這說明我們的地位正在進步昇華，而敵人的地位已至窮途末路，其勢有如高山滾石，半途是不會停下來的。

歷史是人類不斷犧牲奮鬥而創造的紀錄，一個偉大領袖已經盡到他的一切，創造了歷史的光輝，他的逝世，固然是給予歷史的損失和影響，但是決定未來歷史的，不是死者，而是我們活着的人，而決定未來歷史的活人，則是能夠繼續努力，完成先知聖哲未竟志業的人，歷史是由人寫的，更是由人奮鬥創造出來的。我們紀念　總裁九秩誕辰，我們今後更要繼續奮鬥犧牲，來完成他未竟的志業。

——錄自「中央月刊」第九卷第一期，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獻言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自民國五十九年四月成立以來，先後出版年刊兩次。第一次出版於民國六十年十二月，第二次出版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現在第三次年刊定於本年（六十五年）十二月出版。本會年刊之發行，在報導學會工作情形，各省市地方文獻機構進行概況，與交換整理研究意見。以往兩期，甚受各方之重視，發行遍及海內外。茲當第三期發刊之時，願就本會年來致力之處與今後工作方向，略貢所懷，以就正於本會同仁暨讀者之前。

先談各省市地方文獻組織：除自由地區各省市縣有常設之文獻委員會外，大陸各省市，自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雲南、貴州、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熱河、東北九省及南京市等省市，均有文獻機構之組設，且均繼續出版定期刊物及各種叢書。餘如縣級文獻組織及文獻書刊，爲數尚多。此種盛況，足以充分表現國人懷鄉愛國之情懷。惟少數省區文獻刊物，有因故暫停者，三數省份原已一再擬議興辦，而至今尚未有成者。大陸淪陷，鄉邦文物，摧殘殆盡，吾人不及早加以蒐輯整理，勢將湮沒不彰。故甚望已有組織刊物而暫停者，能迅速恢復，共襄盛舉；尚未組織進行者，尤望奮起直追，使鄉邦文獻，先賢事蹟，得以保存不墜。反攻復國，文化應爲其前鋒，此願吾人共同努力者一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其次：地方志書之編印，為地方文獻工作重要之一環。我國方志之重要環節，是方志不僅記述一地一隅之故實，實為國史依據之一部份。年來國史館編輯「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取資於各省市方志及文獻書刊者甚多。自本會成立以還，即致力於方志之編印，自由地區各省市，因有常設文獻機構，省縣志之編印，成績斐然可觀。影印大陸各省市縣志，或由各省市文獻機關合作，出版已不下一二千種。在出版機關中，自行辦理，或與各出版機關合作，出版已有成績。而本會協助各出版機構向各藏書方面，如廣東「續修翁源縣志書之編印上，所願吾人共同努力者又一也。

又次：宗譜之學，素為我國所重。戴季陶先生於民國二十八年致函四川大學校長程天放先生，謂族譜「為研究社會文明者之玉寶」。今則研究宗譜，已為世界各國學術界所重視，美歐日本，均組專門學會以從事。本會於民國六十四年十月，有「中國海內外宗親文物展覽」之舉行，「以團結宗族，鞏固國族，堅定民族志節，奮發精神戰力，以加強討毛救國陣線，早日完成復國建國之神聖使命為宗旨」。展覽結果，引起各方極大之注意。是知宗譜之學，其目的固不僅在敦親睦族，而一以覘社會文明發展之歷程，一以促成復國建國之大業，其意義實至為重大。此在宗譜學之研究上，為我地方文獻工作者及社會各方所應共同努力者又一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上三點，謹於本會六十五年度年刊發行之日，略貢所懷，尚希讀者不吝賜教焉。

——錄自「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華民國的光輝正照耀大陸

不久以前，大陸共黨社會科學院中國史研究所副主任李新，在美國發表共黨編寫中華民國史消息後，自由地區海內外人士不覺大大的引起了注意與重視，甚而至於爲之震驚和警惕，震驚的原因認爲：共黨的此一措施，不知其中究竟藏有多大的陰謀和詭計。或許這又是共黨一項統戰，以達到其侵害我中華民國的目的。警惕的原因或許會感覺到我們自由祖國在臺灣對於中華民國史的編纂和研究還比不上共黨的重視和積極。在此讓我先從共黨編寫中華民國史的作用和影響先作一研判，以供大家的參考。

## 共匪妄想篡改歷史

當然，共黨編寫中華民國史的作用和陰謀是他運用的一項對我不利的統戰手法，要歪曲史實、改篡歷史、維護其地位，以欺騙大陸同胞，使其對中華民國失去其敬愛。共黨此一措施所藏的毒素是在要濫用中國過去一句「後朝人修前朝歷史」的傳統說法，妄以爲自大陸淪陷，共黨在大陸政權建立之後，中華民國便已消失。在政治的統緒上，我們成了前朝，而他們所謂的「人民共和國」，便是中國的正統。

第一：自民國三十八年共黨竊據大陸，政府播遷來臺，在地理上，政府不僅仍保有臺灣、澎湖，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大陸邊沿尚有福建省的金門、馬祖和接近廣東的東沙、南沙羣島的部分島嶼，屹立不動，而且日在進步強大之中，中華民國的正統並未中斷，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一日，大陸的共黨仍是一叛逆的政權，何況此一叛逆的政權，目前已在崩潰瓦解之中，中華民國政府要光復大陸，掃除叛亂，解救同胞，重建國家為期已不在遠。共黨何能認為中華民國已經消失，謂為「前朝」而自認為後朝呢？

第二：在政治的統緒上言之，今日的中華民國，是基於國民革命的創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經過北伐、統一、抗戰，軍事與訓政的程序，於民國三十六年制定偉大的中華民國憲法，依此憲法而正式產生的全民民主憲政的合法政府，大陸雖然一時為叛亂的共黨所竊據，但民主憲政在此一地區的實施，已為中國人民樹立了堅忍不拔的憲政楷模，一旦大陸光復，不難推及於全國，使此一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發揮其偉大的歷史光輝。中華民國的政治統緒，既未中斷，且在進步壯大，為掃除叛亂，統一全國而確立了無限的希望。

第三：今日共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為大陸人民所摒棄的意識形態，且正陷於四分五裂，崩潰瓦解而寄希望於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就。此時共黨要積極從事於中華民國史的編寫，其用意究竟在施行統戰以困我呢，或由於大陸人民潛在的意識，嚮往於我三十年來在臺、澎、金、馬，為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樹立了光輝的楷模，在不知不覺中，表露其歸心於中華民國，以謀解脫在大陸共黨暴虐殘酷的統治呢？這是深深值得尋味的一個問題。因為中華民國在地理上和政治的統緒上既未中斷，那麼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這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豈能不包含在所編寫的「中華民國史」在內，而棄之不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匪區落後三項因素

遠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爲紀念胡漢民先生百年誕辰，事前預定由我作專題報告，題目已擬定爲「總理孫先生撰寫孫文學說的經過」。這是一項當時初初發現多年前胡先生所述寫的文獻，彌覺珍貴。我預備在當天大會前，在赴會的途中，在車上閱讀當日臺北的各報，忽然發現，法新社由北平發出的一項驚人的消息說：北平天安門的大字報，共黨青年發出一項：「爲什麼大陸的國民經濟遠不如臺灣的進步？」的呼聲！使我驚喜若狂。這正是多年來我們在心靈上所期望的，要大陸同胞了解，中華民國在臺灣，艱苦奮鬥的成就，能獲得他們的認識和共鳴，進而推翻共黨暴政，光復大陸，重建中華。我認爲這是苦難中的大陸同胞心懷祖國爭取自由，所發出的一線曙光。於是我在途中便決定把原定的講題改變，而集中於答覆大陸同胞提出的爲什麼「大陸的國民經濟遠不如臺灣的進步？」這一問題。

我在大會致詞說：「要解答爲何大陸的國民經濟遠不如臺灣進步」的因素，有下列幾項要點：

第一：我們有顛撲不破的三民主義，在大陸時期，國民革命因受到了軍閥、帝國主義和共黨叛亂的阻擾，使政府無法從事建設以實現三民主義。自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政府播遷來臺，我們反而獲得了一安定喘息的機會，集中了多數的專家人才，全民團結在先總統　蔣先生領導之下，積極從事於建設臺灣成爲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進而以在臺灣建設的成果，匯爲一種力量，要以光復大陸，解救同胞。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反觀共黨統治大陸三十年來，在初期所標示的馬列主義及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爲大陸同胞所帶來的是殘酷、暴戾、清算、鬥爭，陷大陸同胞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衣不暖、吃不飽的水深火熱之中。談建設，甚鮮成就；談民生，更是日益危殆；凡此種種，何能與臺灣已建設成爲一繁榮進步、安和樂利的社會相比？這是大陸的國民經濟遠不如自由臺灣的進步，第一個答案。

第二：自由祖國在臺灣，在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兩大原則之下，我們酌量採用了自由經濟政策，使人民享有其勞心勞力增產所得的，建立了初步的均富的社會。所謂「均富」便是：「富者均之，貧者富之」，反觀大陸在共黨暴政之下，大陸同胞已成爲共黨的奴工，吃飯要飯票，行路要路票，是何等的可悲，這是我的第二個答案。

第三：我們在臺灣已奠立了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舉例言之，當四年前，先總統　蔣公不幸逝世，我們在痛悼之餘，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在不及十二小時之內，由嚴家淦先生以副總統地位繼任爲總統，因此我們憲政基礎的奠立獲得了一次健全的考驗。反觀大陸，自毛澤東死後，所造成的混亂，是何等的可笑？

更有一事值得我們欣慰的是，我們在先總統　蔣公逝世之後二十三天，即六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舉行臨時全體會議，選舉了蔣經國先生爲執政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因此，我們鞏固了政治的中心之外，更奠定了革命領導的中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大陸同胞普遍覺醒

在我講話的當時，大陸正高唱所謂的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因此我特別強調指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就，亦卽是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而獲得的建設成果。這一成果之獲得，是由於我們以顚撲不破的三民主義爲指針，酌量採納了自由經濟的均富政策和建立了民主憲政的穩固制度而來。所以我更特別指出大陸共黨要達到農業、工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必須要首先做到政治的現代化和根本改造其統治的型態不可，否則，便是空談。在此以後，大陸同胞風起雲湧的在發動爭取自由、民主、效法臺灣、實行三民主義等等運動。我認爲大陸要積極編寫中華民國史這一措施，或許是他們運用一種統戰以對我們不利的想法，而不知此一想法，將更普遍的增加大陸同胞對中華民國嚮往和懷念的感情，於共黨，或必將反蒙其不利，若此，共黨將是弄巧而反拙了。

當我正在撰寫今日紀念週報告，命題爲「中華民國的光輝正在大陸照耀」的時候，忽於昨、今兩日見臺北各報，刊載了合眾社傳自北平的消息，卽是：

「北平街頭出現大字報

籲請以我政府

代表全中國。」

電云：「我們要廢除共產制度，並實施自由民主制度，及接受在臺灣的政府爲全中國人的合法政府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從我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紀念胡漢民先生百年誕辰大會，所解答致辭時，我便深深感覺到，我們眼前雖然尚未光復大陸，重建中華，解的輝煌成就已喚起了大陸同胞的共鳴，最近共黨要積極編寫中華民國史發展而來的又一項啓示。因此，我說：

中華民國的光輝正在大陸照耀！

這一發展必將更有利於我們摧毀大陸共黨暴政，解救同胞的目標。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八日，「中央日報」第三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Sun Yat-senism and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ABSTRACT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carried out on Taiwa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successful, bloodless economic revolution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e present speaker, who took an active part in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now present a brief, three-part discussion of this renovative project.

I. The teachings of Dr. Sun Yat-sen on land reform in China.

Dr. Sun first revealed his plans for a land reform program specifically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China in a talk with Chang Ping-lin in 1907, and later with Yuan Shih-kai in 1912. His theories were definitely not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1917.

II. The main stage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 from 1949 to 1953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 In 1930, a new Land Law was enacted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hich fixed the maximum rental rate at 37.5% of the total annual harvest.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and farmer on Taiwan over the years.

C.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which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was begun in 1949 on Taiwan.

D. The Land-to-the Tiller Program which was begun on Taiwan in 1950.

E.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II. Personal reminiscences about Dr. Sun Yat-sen.

A. The speaker's first meeting with Dr. Sun in 1913 at age fourteen.

B. The speaker's second meeting with Dr. Sun in 1923.

C. Dr. Sun was a revolutionary leader who was for knowledge and against violence.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not only solved the chronic and ever-perplexing land proble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but also, as we shall see, laid a solid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 for o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s successful story has earned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it has often been called, appropriately and justifiably, a bloodless, glorious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Unlike many other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which are destructive in nature and devastating in consequence,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wa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with a goal no less than the economic emancipation and independence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enant-farmers and their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families. And all this was accomplished peacefully and equitably with absolutely no violence. In short, it was a revolution truly social in nature, and truly bloodless in action and truly glorious in its accomplishments.

In this paper, attempts will be made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 regard to Dr. Sun Yat-sen and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1) the teachings of Dr. Sun Yat-sen on land reform in China, (2)the main stages of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from 1949 to 1953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3)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about Dr. Sun Yat-sen as a great revolutionary leader, a great statesman and a great philosopher.

## (I)

Theoretically,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was inspired by and based upon the teachings of Dr. Sun Yat-sen on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r. Sun Yat-sen was deeply concerned with the land problem in the Chinese socity. One of the four main goals of the revolution as were promulgated by Dr. Sun and his followers in the declaration of T'ung Meng Huei (同盟會) in 1905 was to equalize the right to land properties in China, though, at that time, the emphasis was placed upon the increase of land value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progress in society. According to Dr. Sun Yat-sen, such an increase in land value not due to the efforts or improvements on the part of th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owner but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ic progress in society should belong to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e benefits accruing from the increase of land value, in other words, should be employed not by the owner himself but in such ways as to promote the general well-being of the entire society. In a certain sense, this policy was aimed at and limited to the land problem in the cities. The land problem in the country in general required a different solution. It wa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latter problem that in 1924 Dr. Sun Yat-sen advocated, clearly and unmistakably, a policy for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Dr. Sun Yat-sen's policy for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was a logical conclusion of hi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land problem in China.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rural China in the hands of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landowners was always a plaguing problem in the social fabr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solution had occupied the mind of many a philosopher and statesman in the past. And, as we have pointed out previously, land reform had been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Dr. Sun Yat-se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Yet, given the date of Dr. Sun's promulgation of this land reform program for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it has often been misinterpreted as a policy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In actuality, nothing is further from the truth. Since Dr.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Sun Yat-sen's land reform policy was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Soviet advocacy of violent seizure of land by the peasants and the confiscation of all private properties by a totalitarian Communist state, this misinterpretation requires clarification.

It is to be noted, first of all, that Dr. Sun Yat-sen's land reform program had been formulated long befor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17, though admittedly it was not publicly and systematically promulgated until 1924. Secondly,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records as well as the books Dr. Sun consulted on this subject will reveal much in regard to the nature and the origins of inspiration of his land reform policy. These points are historically of ultimate importance for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ought of Dr. Sun Yat-sen and, indeed, deserve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by historians.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which is available at the present time, we can be convinced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that Dr. Sun's ideas on land reform in China had been fully developed sometime before 1907 and that by 1912 his program for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had been clearly defined.

Two dialogues of Dr. Sun Yat-sen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on the land problems in China have been recorded—one with Chang Ping-lin (章炳麟) and the other with Yuan Shih-kai (袁世凱). Let us now have a close look at these sources.

The dialogue between Dr. Sun Yat-sen and Chang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Ping-lin took place in all probability sometime before 1907. Although Chang Ping-lin's version of the discussion as we find it in Chang's collected works is sketchy, it contains, it is significant to note, all the fundamental ideas in Dr. Sun Yat-sen's future policy on land reform. Chang Ping-lin himself was concerned with the land problem in China and in his discussion with Dr. Sun Yat-sen on the land issue Chang made three basic proposals for its solution: (1) reclassification of lan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quality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2) equitable land taxes to be levied on each of the various categories, and (3) reduction of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tenant-farmers. Apparently, these proposals of Chang Ping-lin were derived from the reforming tradition of China's past. To Dr. Sun Yat-sen, however, Chang's proposals dealt with only the ostensible evils of the land problem in China, not its ultimate cause. In his response to Chang's proposals, Dr. Sun made his own position on China's land issue unmistakably clear. As long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the hands of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owners was allowed to continue to exist, Dr. Sun pointed out unequivocally, any reform of the land tax structure, however thorough and impartial, could only mitigate the existing evils in rural China but not solve the land problem at its very source. The land tax to be levied on the owner would find its way, openly or covertly, to 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the tenant-farmer in the end. In any event, the concentr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ion of land in the hands of a few and the resulting poverty of the many was the origin of all social disturbances and tumults in Chinese history.

壹、專論

Furthermore, Dr. Sun Yat-sen mad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wealth derived from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e and that from land property. Manufacturers and artisans differ in their skills as well as in their trade; consequently, their income and profits cannot be the same in each individual case. The merchants, too, vary greatly in the nature of their business as well as in their ability. It would be a folly, therefore, to impose a policy for the levelling of profits and income among merchants and artisans. The case is quite different with the landlords, whose assets, that is, their land properties, are inherited.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a famil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s an injustice in society. The land property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natural land and man's improvements upon it. Whereas the value of the latter belongs to those who work upon the land for its improvements, that of the former does not belong to any private person. In principle, the ownership of natural land belongs to society. And Dr. Sun Yat-sen concluded his discussion with the logical and forceful argument that those who do not work on land should not own it.



From the preceding analysis of Chang Ping-lin's account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him and Dr. Sun Yat-sen,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basic essential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conceptions in Dr. Sun's thought on land reform in China had taken shape in or before 1907. Two points stand out distinc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in this dialogue. First, Dr. Sun Yat-sen was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the hands of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landowners wa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all social evils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called for its abolition. Second, Dr. Sun was equally unequivocal in his opposition to the ownership of land by those who do not work on it. In other words, the tenant-farmers who actually worked on land should legally own it.

The dialogue between Dr. Sun Yat-sen and Yuan Shih-kai on the land problem in China took place sometime in late August or September, 1912. After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presidency earlier in the year, Dr. Sun Yat-sen began an extensive tour throughout China, partly to know the country and partly to advocate his doctrines directly to the people. He was then invited by Yuan Shih-kai for consultation and advice on national affairs. On August 24, Dr. Sun Yat-sen arrived in Peking and was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oth by 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and by the people of the city. During the month when he was in Peking, Dr. Sun had thirteen lengthy conferences with Yuan Shih-kai. In all these meetings, only Dr. Sun, Yuan and Liang Shih-yi (梁士詒), one of Yuan's close advisers, participated. And according to Liang's biographer, every one of the meetings lasted from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four o'clock in ten afternoon to ten or twelve in the night. On three or four occasions, the meet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arly hours in the morning.



The subjects of these meetings varied,ranging from the training of a Chinese national army by Yuan Shih-kai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railroad system by Dr. Sun Yat-sen. Apparently, one of the main subjects in the discussions was China's land tenure question. Dr. Sun Yat-sen told Yuan Shih-kai that China w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 nation of farmers and that no other reforms would be possible until the land tenure problem was completely and successfully solved. And Dr. Sun insisted that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s to abolish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the hands of the landowners and instead to create and establish a society of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At that time, Dr. Sun Yat-sen thought Yuan Shih-kai would be strongly against such a policy, since Yuan was intellectually and politically a conservative and represented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in China. After one of the meetings, therefore, when Liang Shih-yi accompanied Dr. Sun Yat-sen to his residence, Dr. Sun said to Liang that while he could understand the agreement between him and Yuan Shih-kai on many other national issues, Yuan's acquiescence on the land problem was rather surprising to him.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Liang Shih-yi is both revealing and interesting. Dr. Sun, Liang, had traveled widely in the world and had see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easants by the great landlords in other countries. Dr. Sun also grew up in southern China and had known the sufferings of the tenant-farmer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Yuan, on the other hand, grew up in the north and had never been in the south or abroad. And in northern China farmers were mostly independent farmers with their own land and tenant-farmers were very rare in the north. To Yuan Shih-kai, according to Liang, Dr. Sun's land reform policy was something quite natural. Upon hearing this, Dr. Sun laughed.

This dialogue between Dr. Sun Yat-sen and Yuan Shih-kai is again highly significant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Dr. Sun's thought on land reform in China. While Yuan Shih-kai'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d tenure problem in China was limited to his native north, Dr. Sun had not only traveled widely in the world but also, as we know, studied the works on the land issue of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philosophers such as John Stuart Mill and Henry George. Moreover, unlike the discussion between Dr. Sun Yat-sen and Chang Ping-lin, the conference between Dr. Sun and Yuan Shih-kai was no longer merely an intellectual or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he new Republic had been just established and national reforms were expected to be carried out in near futur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Dr. Sun's advice to Yuan Shih-kai was meant to be a national policy. And, above all, the language Dr. Sun Yat-sen used in his conference with Yuan Shih-kai is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exactly the same language he was again to use in his official proclamations and lectures on land reform in China in 1924. This is clear and indisputable evidence for our present study. Although Dr. Sun Yat-sen's thought on land reform deserves further studies by historians and social reformers in regard to both its cont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we can say now without any doubt at all that the old view that Dr. Sun Yat-sen's land reform policy was inspir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is totally false. Dr. Sun's thought on land reform was neither influenced by nor an imitatio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t had been developed and formulated independently and differently long before the Soviet seizure of power in Russia.

## (II)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Dr. Sun Yat-sen's land reform policy as early as 1926, only two years after Dr. Sun had publicly and systematically advocated his doctrine on people's livelihood. The first measure adop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land reform policy was the 2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which required a reduction by 25 per cent of the farm rent then existing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his tenant either by written agreement or simply by convention. Traditionally, the farm rent paid by the tenant to the landlord was usually, in most parts of China, 50 per cent of the total annual crop yield of the land. I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addition, there were, of course, other financial and menial burdens on the part of the tenant farmer. The traditional rate of farm rent was undoubtedly too high and the other burdens oppressive. A reduction by 25 per cent, which would leave the rent at no more than 37.5% of the total annual crop yield, along with the abolition of all other menial and financial burdens, would make the conditions far more reasonable and endurable for the tenant farmer. Four years later, in 1930, a new Land Law was enac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fixed the maximum rental rate at 37.5 per cent of the total annual harvest. All farm rents traditionally fixed either by agreement or by convention in excess of this maximum rental rate were required by law to be reduced accordingly.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traditionally below this rate, wherever such cases existed,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Unfortunately, this policy was never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mainland. Partly due to the opposition of the unenlightened social forces but mostly due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they were put into effect only in isolated areas in a few provinces. In 1949,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determined to introduce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in the province of Taiwan.

Before we proceed to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in Taiwan between 1949 and 1953, a brief account of the land tenure system on th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island before 1949 may be in order. The traditional land tenure system in Taiwan before it was radically changed and improved by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had been the result of three centuri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Very little land had been cultivated in Taiwan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Dutch in 1624, and, therefore, there had been no question of land tenanc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Dutch intent on the exploit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the Far East, a systematic reclamation of land was introduced and encouraged. The ownership, however, of the land thus reclaimed--known as the "Crown Land" under the Dutch dominion--was all invested in the hands of the Dutch colonialists. The nature of tenancy under the Dutch reclamation system was probably close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fs and the royal domain in medieval Europe. In general, therefore, no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existed under the rule of the Dutch. Upon the expulsion of the Dutch by Cheng Ch'eng-kung (鄭成功), better known to the Westerners as Koxinga, in 1661,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began to appear, but the reclamation-tenancy system as had been developed by the Dutch in the previous decades remained. In any event, the actual amount of land under cultivation was still small.

It was during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Manchu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from 1683 to 1895, that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tremendously and 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complex land tenure system was evolved. When the Manchu administration began in Taiwan in 1683, there were only 18,454 *chia** (甲) of cultivated land, but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as an official survey conducted in 1886-88 under the governorship of Liu Ming-chuan (劉銘傳) indicated, 361,447 *chia* of land had been under cultivation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Manchu government had extended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in Taiwan by converting all cultivated land, including both the land under the reclamation-tenancy system of the Dutch and the "officiers' land" under Cheng Ch'eng-kung, into private property.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is was a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land tenure structure in Taiwan, but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the Manchu government had been merely to increase its revenue, little attention, if any at all, was given to the equalization of land proper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old reclamation-tenancy system to private landownership. As a result, therefore, th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l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land ownership into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Manchu administration all combined to produce a complex structure of land tenure system.

This traditional land tenure system in Taiwan, before it w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and improved by

---

* 1 Chia is equivalent to 0.97 hectar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between 1949 and 1953, had been marked by high rental rates, which were, in fact, higher than those prevailing elsewhere in China on the mainland. The general customary practice of land lease in Taiwan was on a 50–50 basis, but it was not unusual, especially in more fertile and more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such as Taichung and Hsinchu, to find the rental rate as high as 60% or 70% of the total annual harvest. In addition, the tenants were often required to perform menial duties without pay--to grow fruit trees, bamboo or lumber, or to raise chickens and ducks for the landlord. Moreover, the traditional land tenure system in Taiwan was infested with many other evil practices. The payment of rent deposit at the time of the lease, for example, was a heavy burden for the tenant, for he had to pay in advance of his possession and use of the land a deposit which was generally equal to one whole year's rent and sometimes twice the amount. Similarly, most landlords demanded and usually received advance payment for one season, one year and sometimes two years whenever they needed to meet their extraordinary expenses. And si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verbal contract was the general practice which did not fix a definite period of time for the lease, the landlord could always take advantage of the uncertain situation. In view of the tenant's inferior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the landlord could increase the rent and the rent deposit or terminate the lease and evict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he tenant as he pleased. In some cases, the great landlords had too much land to look after and found it more convenient to farm the land out to tenant-agents, who became a sort of "sub-landlords". In fact, these men were usually worse in their treatment of the tenant-farmers. They exploited and oppressed the tenants more ruthlessly than the true landlords themselves.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d tenure system in Taiwan was, therefore, in dire need of reform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irst initiated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in 1949.

1949 was perhaps the darkest hou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n the mainland, the rebell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d been engulfing the country like wildfire, and Taiwan, too, was militarily in a precarious situation. Indeed, it seemed that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was at a loss. Yet, as it has often happened in China's past, great deeds are accomplished by great statesmen at a time of great historic crisis. It was under thos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hat General Chen Ch'eng(陳誠), the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of Taiwan and afterwards Premier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determined to carry out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and eventually to fulfill the teachings of Dr. Sun Yat-sen on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darkest hour was thus transformed into the beginning of a glorious renovatio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he government proceed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careful planning. In April 1949,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and its operational agencies were promulgated. Following the promulgation of these regulations, Land Reform Commissions on all administrative levels,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local,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meantime, in each of the districts of the Province of Taiwan government land reform experts conducted conferences in which the magistrates and officials of the district who were to be involved in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were trained. And these district magistrates and officials, in turn, were to inform the local officials in every community and village on the same subject. In total, over 3,000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thus trained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s land reform experts to carry out the program. Furthermore,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is subject, a broad campaign was launched through the media, with special attention given to the tenant farmers, who were informed of their rights and privileges under the program.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gram was the change of the land lease contract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 farmer from the old form under the traditional land tenure system to the new one under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In order to achieve an equitable agreement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 in this new contract, a land lease com-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mittee was established in each community or village as an agency of arbitration. The committee was composed of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overnment,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strict and the community assembly, five tenant farmers, two independent farmers and two landlords, all of whom were public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for a term of three years. The function of this land lease committee was to evaluate the land in each lease contract,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the yearly yield of the main crops, and to recommend further deduction or exemption of rent if the harvest in any particular year is bad. And all cases of conflicts were to be referred to the committee for arbitration.

With such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26,642 trained officials and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lease contracts was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Ju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wo general inspections, one in July and another in November,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of Taiwan to find out any violation and ev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By the end of 1949, the survey of the second inspection demonstrated that 306,473 tenant-farmer households were under the new lease contracts, involving a total of 264,562.1022 *chia* of land.

The benefi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uccess of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were immediately felt by the people. In the very following year, there was a 30% increase of the harvest of rice i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aiwan. Consequently,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tenant-farmers was visibly improved, and the number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families of tenant-farmers also increased. More importantly, as a result of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there was an awakening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n the part of the tenant-farmers. In the early 1950's, therefore,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was such a success that it became a popular slogan in society. People often spoke of, for example, the"37.5% bride," meaning that a tenant-farmer, who had been unable to take a wife, now, with the benefits from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was able to win a bride and to support her. Yet, the government was unwilling to be satisfied by the apparent success. On November 22, 1950, it was resolved in a Cabinet meet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organize a high-level inspection commission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This high-level Inspection Commission was composed of two Ministers without Portfolio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ree legislato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Research on Land Policy,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Farmers' Bank, the Head and his Assistant of the Land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the Solicitor-General and a Judge of the Superior Court of the Province of Taiwan, the Head and two high-ranking officials of the Land Policy Di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 Minister of the Provi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cial Government of Taiwan, the Director of Land Bureau of Taiwan, and three newsmen from the leading newspapers in Taipei. This author, then a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in the Executive Yuan, was designated by the Premier as the Chairman of the Inspection Commission. For a whole month from the middle of January to the middle of February, 1951, the Commission toured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district to district, all over the entire Province of Taiwan. We interviewed tenant farmers and visited their families. It was truly an overwhelming experience. Story after story spoke of the far-reaching benefi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uccess of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It is to be remembered, however, that the 37.5% Farm Rent Reduction program was only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complete fulfillment of Dr. Sun Yat-sen's doctrine for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Its succes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proceed towards the final goal. 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as well as t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private landowners, the government decided first to transfer all public land into private ownership of tenant farmers.

The public land in Taiwan came from the land previously controll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Japanese military organizations, Japanese business societies and private Japanese landlords. During the fifty years of Japanese occup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ion of Taiwan, large amount of land had been seized by the Japanese. When Taiwan was restored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land, amounting to 181,490 *chia* or 21% of all cultivated land in Taiwan, was taken over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public land. Und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enant farmers of the public land had paid a lower rent, which was fixed first at one-third and later at one-fourth of the annual yield of the main crops.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transfer all this public land to the tenant farmers, who continued to pay for ten years the old 25% rent and to obtain their private ownership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1960, 71,666 *chia* of land was thus transferred into private ownership, and 165,433 tenant farmers benefited from this policy and became independent far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lso took action to transfer the land of private landlords to tenant farmers. Since this involved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had to work out an equitable policy to compensate the landlords but also had to prepare a sound legislation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legislato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It was indeed a difficult process. As then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this author participated in every stage of the legislation. With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many legislators, the legislation was eventually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January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20, 1953. On January 26, it was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Under the new legislation, the landlords were compensated with government Land Bond and stocks of public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nant farmers were to pay back the price of land in ten years at an interest of 4%. As a result, 143,568 *chia* of land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landlords to tenant farmers, and 194,823 tenant farmers were to become independent farmers each with his own land. With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program,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was completed. As we have pointed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aper, all this was achieved peacefully and equitably without violence. It was indeed a glorious and bloodless soci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are many and far-reaching. They have been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 and need not be elaborated here.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 Land Reform laid down the true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boli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the hands of the few removed the historic source of social unrest and disturbance in Chinese society. The farmers now with land of their own have stronger incentive and work harder every year to increase its products. Consequently,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the farmer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chi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urn, has led to the rise of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farmers in China. In fact, most of the children of the farmers now receive college education and many have received higher degrees in Taiwan or abroad. They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intellectual pow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alth of the former landlords has been channeled into modern industries and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s.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s for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aiwan. In the light of all these developments, the Land Reform in Taiwan can be used as a useful model for man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III)

Dr. Kindermann has asked me to conclude this paper with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 Dr. Sun Yat-sen. This is indeed a very difficult assignment. The doctrines of Dr. Sun Yat-sen can be studied and explained, but the greatness of his personality defies all characterization. What follows are merely a few episodes which can perhaps reveal, however inadequately, some glimpses of the character of Dr. Sun Yat-sen.



It has been my great personal fortune to have met Dr. Sun Yat-sen early in my life. My first visit to see Dr. Sun Yat-sen was in the spring of 1913, when I was only fourteen years of age. In the previous yea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I had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been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ailroads in Szechwan (四川). Dr. Sun smiled kindly when he learned that I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 at that early age. He patted my head gently but said to me that "From now on you must return to school and study hard. We'll welcome you back to devote yourself to the revolution after you have completed your education. Without profound learning, one can not contribute much to the revolution." Of course, I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Dr. Sun's words at that time. But we know now that one of the common features of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is their obscurantism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which always leads to their ignorant fanaticism and meaningless destructiveness of culture. Dr. Sun Yat-sen's high esteem of learning and its importance for the revolution has been an invaluable legacy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 wish to testify that Dr. Sun Yat-sen was always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new important publications of the world. I remember that in the winter of 1923, when I was leaving Toronto to return to China, a friend of mine in New York sent me two books which had been just published--one on the new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and the other on the problems of modern government.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airplane flight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and the voyage by an ordinary steamship would usually tak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more than twenty days. I was able, therefore, to finish reading the two books during the voyage. After I had arrived in Canton, I went to see Dr. Sun Yat-sen one afternoon. Since I had just returned from studying abroad, Dr. Sun asked me what new books I had read or I had learned of while I was in Canada. I was so glad to be given this opportunity and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e two books, their contents as well as my criticisms. Still a young man as I was then, I wanted to demonstrate my knowledge and kept talking for almost half an hour. Dr. Sun listened patiently. When I had finished, he rose up and took a book from his book shelf. He handed the book to me and asked whether it was one of the books I was talking about. It was the book on the problems of modern government. When I looked through the book, I found that Dr. Sun had read it very carefully, underlining important passages and making marginal remarks throughout the volume. You can imagine how embarrassed I was! Yet Dr. Sun praised me for reading such new books and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to do so. Afterwards, when I studied Dr. Sun's life, I discovered that Dr. Sun had a portion of his income set aside every month for the purchase of new books. It is no mere political slogan when Dr. Sun said that profound learning is the true foundation of a successful revolution.



Another aspect of Dr. Sun Yat-sen's personality which appealed to his followers, especially those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was the sincere simplicity of his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life style. During the long years of his tour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Dr. Sun always insisted that all contributions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must be used for the revolution, not for his own personal expenses. I have heard from many early followers of Dr. Sun Yat-sen in Canada that Dr. Sun's selfless dedication and personal sacrifice won their highest respect and devotion. The selfless personal sacrifice of Dr. Sun Yat-sen had left such an impression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that in 1923 when an old overseas Chinese in Honolulu sent a draft check for two thousand dollars in Hongkong to his son, who was then a high officer in Dr. Sun's army in Canton, the old gentleman specified in his letter that five hundred dollars were given to his wife, five hundred to children of the family, five hundred to his son, and five hundred to Dr. Sun Yat-sen for his personal expenses. And Dr. Sun was at that time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Canton.

The most cherished characteristic of Dr.Sun Yat-sen's personality is undoubtedly his kindness and deep compassion for all men. This quality was derived from the long and finest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Humanism, a distinction was always maintained between the benign rule of the king or *wang tao* (王道) and the brutal rule of the tyrant or *pa tao* (霸道). As Dr. Sun Yat-sen has pointed out in many of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his writings,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re based upon the *wang tao* of the sagely kings and philosophers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reforming tradition of Western Humanism. To political leaders and to common men, to his foes and to his friends. Dr. Sun was always full of love, compassion, mercy and forgiveness. All the people who knew Dr. Sun Yat-sen, from his biographers to his personal guards, emphasized this fact. And Dr. Sun was often criticized for it.

It is to be remembered, however, that Dr. Sun Yat-sen's revolution in China wa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the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entire world. Truly a statesman and philosopher, Dr. Sun did no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power politics, intrigues or secret assassinations. Such actions might bring temporary success to a political leader but would eventually ruin the nation. This is the reason why Dr. Sun Yat-sen told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 in 1921 that his revolution was based up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love of manki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Dr. Sun could forgive Chen Chung-ming（陳炯明） who had betrayed him. In his letter to a revolutionary follower who volunteered to carry out assassination missions for the revolution, Dr. Sun wrote that assassination was what he had always opposed even against the Manchu Dynasty, for evil men could not be all removed by assassinations. When a revolution had its right doctrines and whe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the doctrines were accomplished, evil men would disappear. Assassination had no role in a tru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his words to a local warlord on political intrigues may be quoted to conclude this study:

> The problems of a nation require proper solutions so that those problems can be properly resolved. Schemes for selfish personal interests and intrigues for personal power are contrary to true democracy, and they can never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country. They may bring some temporary victories but will end in failures eventually. Innumerable examples in the historie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can be cited to testify to this fact.

Please kindly allow me to reiterate my warning that all these glimpses of his life fall far short of the true character of Dr. Sun Yat-sen as a great revolutionary leader, a great statesman and a great philosoph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按：本文爲黃季陸先生於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赴歐出席「第一屆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所提之論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APPENDIX A

## COMPARISON OF RENTAL RATES BEFORE AND AFTER LAND RENT REDUCTION

| | PRESENT MAXIMUM RENT RATE (% OF CROP YIELD) | RENT RATE IN PAST (% OF CROP YIELD) |
|---|---|---|
| TAIPEI HSIEN | 37.5 | 55.0 |
| YILAN HSIEN | 37.5 | |
| TAOYUAN HSIEN | 37.5 | |
| HSINCHU HSIEN | 37.5 | 58.0 |
| MIAOLIHSIEN | 37.5 | |
| TAICHUNG HSIEN | 37.5 | 56.5 |
| CHANGHUA HSIEN | 37.5 | 62.0 |
| NANTOU HSIEN | 37.5 | |
| YUNLIN HSIEN | 37.5 | |
| CHIAYI HSIEN | 37.5 | 51.0 |
| TAINAN HSIEN | 37.5 | 51.0 |
| KAOHSIUNG HSIEN | 37.5 | 53.0 |
| PINGTUNG HSIEN | 37.5 | 53.6 |
| TAITUNG HSIEN | 37.5 | 50.0 |
| HUALIAN HSIEN | 37.5 | 51.0 |
| PENGHU HSIEN | 37.5 | 46.0 |
| TAIPEI CITY | 37.5 | 55.0 |
| KEELUNG CITY | 37.5 | 50.0 |
| TAICHUNG CITY | 37.5 | 62.5 |
| TAINAN CITY | 37.5 | 50.4 |
| KAOHSIUNG CITY | 37.5 | 54.7 |
| YANGMING SHAN ADMINISTRATION | 37.5 | |

FARM RENTAL RATES IN TAIWAN BEFORE 1949 REACHED AS HIGH AS 70% OF THE CROP YIELD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APPENDIX B

### COMPARISON ON AREAS OF SELF-OWNED CULTIVATED LAND BEFORE AND AFTER LAND REFORM

| |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HECTARE) | TOTAL AREA OF SELF-OWNED CULTIVATED LAND (HECTARE) | PERCENTAGE OF SELF-OWNED LAND TO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
|---|---|---|---|
| 1948 | 846,390.7166 | 484,235.4898 | 57.20% |
| 1964 | 849,394.1202 | 770,581.9048 | 90.72% |
| 1966 | 848,494.0683 | 774,220.0162 | 91.25% |
| 1968 | 858,231.4715 | 785,755.8949 | 91.56% |
| 1971 | 917,087.6901 | 841,413.8108 | 91.74% |
| 1975 | 914,762.7128 | 850,423.7550 | 92.97% |
| 1976 | 913,430.5043 | 850,627.6195 | 93.13% |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APPENDIX C

###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OWNER-FARMERS IN TAIWAN BEFORE AND AFTER LAND REFORM

| | NO. OF FARM FAMILIES | NO. OF OWNER-FARMER FAMILIES | NO. OF SEMI-OWNER FARMER-FAMILIES | NO. OF TENANT-FARMER FAMILIES | PERCENTAGE OF OWNER-FARMERS IN TOTAL NUMBER OF FARMERS |
|---|---|---|---|---|---|
| 1948 | 597,333 | 211,649 | 154,460 | 231,224 | 35.43% |
| 1951 | 661,125 | 249,850 | 167,962 | 243,313 | 37.79% |
| 1956 | 746,318 | 448,157 | 173,588 | 124,573 | 60.05% |
| 1961 | 800,835 | 517,182 | 170,460 | 113,193 | 64.58% |
| 1964 | 834,827 | 555,093 | 171,988 | 107,746 | 66.49% |
| 1966 | 854,203 | 573,082 | 176,025 | 105,096 | 67.09% |
| 1968 | 868,039 | 593,405 | 174,502 | 100,132 | 68.36% |
| 1971 | 870,948 | 672,410 | 105,966 | 92,572 | 77.20% |
| 1973 | 868,852 | 681,852 | 99,682 | 87,318 | 78.48% |
| 1976 | 863,610 | 708,875 | 79,906 | 74,829 | 82.08% |
| 1977 | 865,514 | 710,055 | 77,986 | 77,473 | 82.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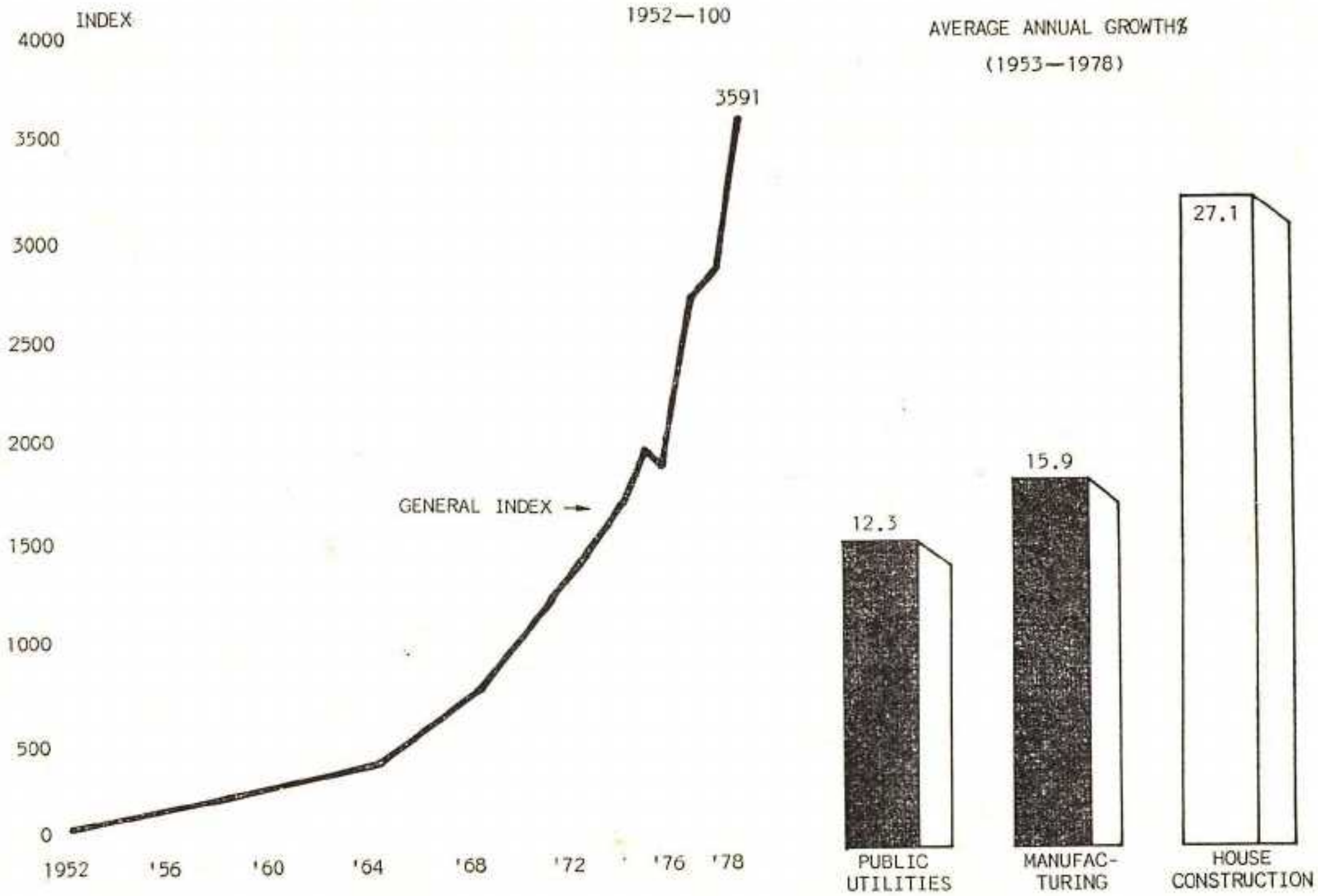
Academia Historica

## APPENDIX D

### COMPARISON OF THE INCOME OF FARMERS PURCHASING LAND UNDER THE LAND REFORM PROGRAM BEFORE AND AFTER LAND REFORM

| | PER-HECTARE YIELD | | INCOME OF FARMERS (kg/HECTARE) | |
|---|---|---|---|---|
| | YIELD (kg) | PERCENTAGE (%) | INCOME (kg) | PERCENTAGE (%) |
| 1948 | 4,649 | 100.00 | 2,092 | 100.00 |
| 1949 | 4,860 | 104.54 | 3,117 | 149.00 |
| 1953 | 5,717 | 122.97 | 4,555 | 217.73 |
| 1963 | 9,552 | 205.46 | 9,552 | 456.60 |
| 1966 | 10,125 | 217.79 | 10,125 | 483.99 |
| 1968 | 10,248 | 220.43 | 10,248 | 489.87 |
| 1971 | 10,260 | 220.69 | 10,260 | 490.44 |
| 1975 | 10,950 | 235.53 | 10,950 | 523.42 |
| 1976 | 11,211 | 241.15 | 11,211 | 535.9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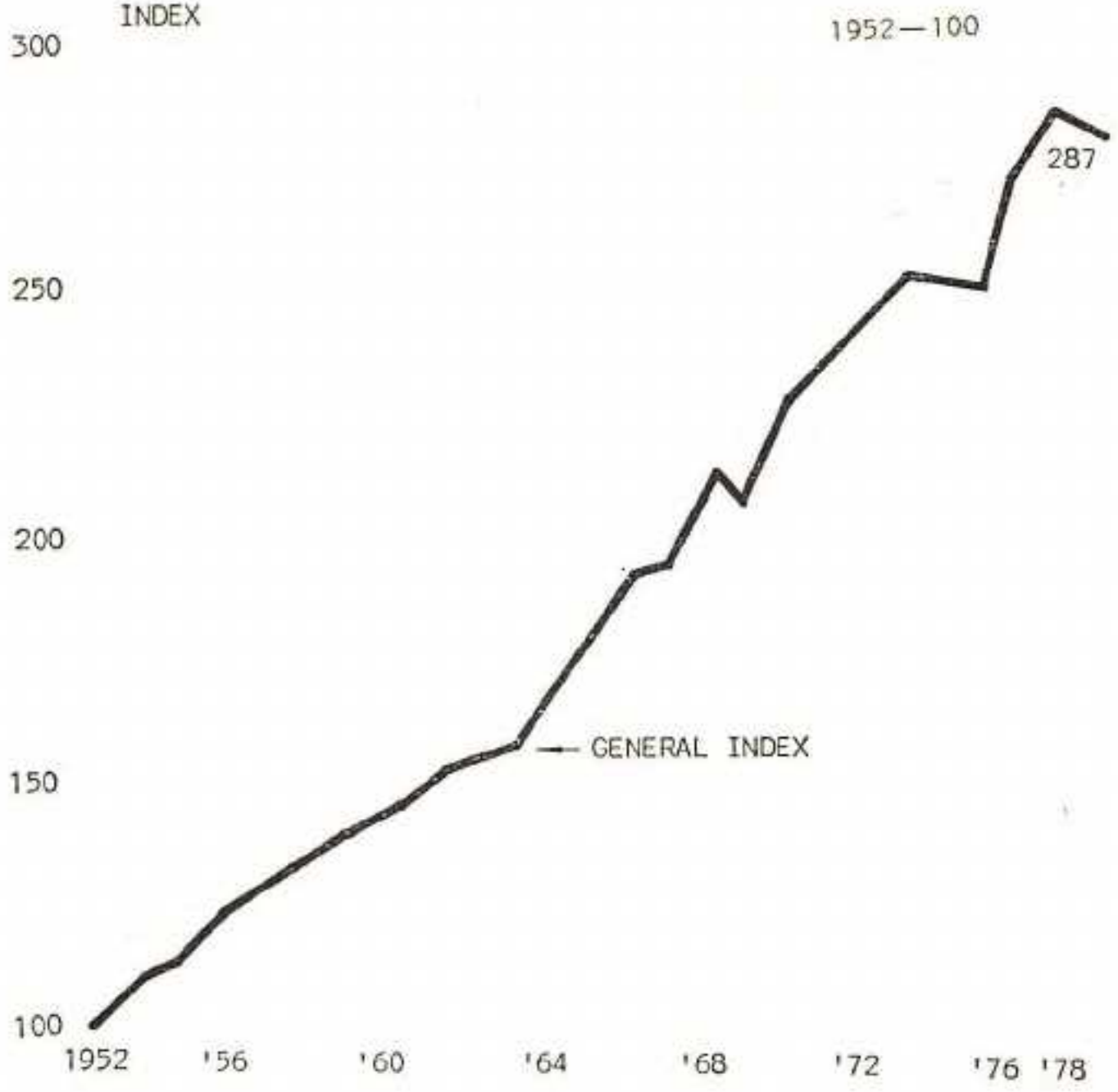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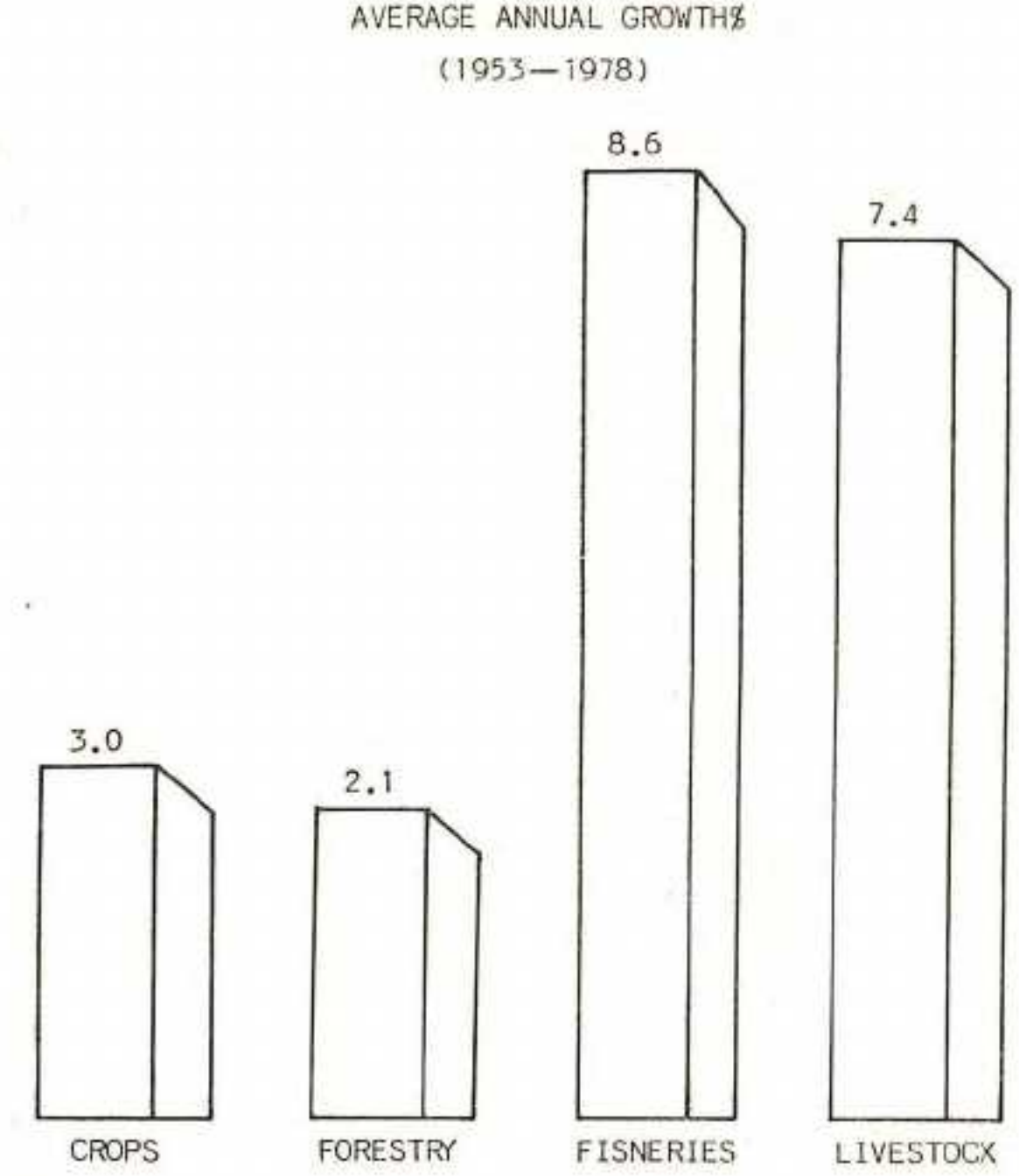



INDEX NUMBER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INDEX NUMB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ademia Historica

# 加速中華文化大國的建設

## ——代發刊詞

八、九年前，我曾不只一次的提出建設中華民國爲文化大國的呼籲。還記得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作報告時，曾提醒國人注意：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文化大國，自毛共竊據中國大陸之後，正在對此一偉大文化加以摧殘、毀棄，我們自由中國的任務，不僅是在維護此一文化大國於不墜，更要發揚此一文化大國的精神，以期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

時勢演變到今天，深感這一歷史任務，更爲迫切，亦更爲繁重。三十年來，民族復興基地的經濟發展與物質建設，創造了驚人的成就。但我們不應諱言，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維護與發揚，努力尚有未足。由於國際處境的日趨艱難，及中共僞政權文化統戰的變本加厲，都在我們國民心理與精神上形成一種看不見的影響，如果不作有效的對策，將會形成意想不到的危害。對策如何呢？最迫切有效的途徑，乃在加速推行發揚文化建設的工作。

目前，文化建設爲十二項國家建設之一。於此，我願進一步提醒國人注意：文化建設的基本目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於加強國民對民族歷史的認同與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的建立。更淺顯的說，此時此地推行文化建設，首要任務在使國民從歷史文化中認清他們的「根」，而以向此「根」認同爲榮。爲達到此一目的，歷史學者和歷史教育工作者的責任，自然格外重大！

大家也都曉得，大陸上的共黨政權正在處心積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來誣衊、曲解並竄改中華民國的歷史。其目的，一則欺騙大陸同胞，使其失去對中華民國的敬愛與熱望，一則破壞中華民國的成就與信譽，甚至根本上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的地位。這是一場爲國家存正義，爲民族爭千秋的思想戰、學術戰，亦卽是全面的文化戰，而且已經進入了短兵相接的階段。在這場以口伐筆誅爲武器的戰役中，歷史學者和歷史教育工作者是戰鬥的主力軍，其責任又是如何的重大！

環境雖險惡，我們決不會退縮。目前正是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盡匡扶責任的最佳時機，也是史學界同仁們奮勵無前，戮力作文化大國建設中華民國的歷史光輝照遍大陸，永耀塵寰！支柱的時機。發揮我們的偉大潛力吧，通過我們的努力，讓

——錄自「中國歷史學會會訊」第一期，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孫中山先生與德國

## 一、前言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人，但他的活動範圍和知識領域並不限於中國，他一生之中，有二分之一的時間活動於海外。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其目的首先在求得中國的自由平等，但他的理想並不僅限於謀求中國人民的福祉，他尚要對世界人類盡一份維持公理和平的責任，並與世界先進國家共同締造人類的文明，其最後的理想則爲世界大同。以是，他的一位傳記作者美籍林白樂博士(Dr. Paul M. A. Linebarger 1915-1966) 推崇 孫先生說：「他不再僅是中國人，而應該是位世界公民。」

誠然，在 孫先生一生的革命過程中，曾經不止一次的在歐洲和美洲居留，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等，也都曾與 孫先生的革命事業發生過或深或淺的關係。今天有機會來到德國的慕尼黑大學，讓我們談談中國革命歷史上， 孫先生與德國的關係，應當是非常有意義的事。當然，我所依據的史料是以中文資料爲主，而且我的報告也還是概略性的說明，非常希望在座的友人給予補充和批評，以便這一報告更爲正確，更爲充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二、孫先生首次來德

孫先生最早與德國發生關係，係在一九〇五年春天，這是他第二次訪問歐洲，其任務是要說服歐洲各國的中國留學生，結成團體，參加革命，他先到英國倫敦，再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其後又應中國留德學生之請，來到柏林。當時　孫先生下榻於柏林的羅蘭多爾福街（Nollendorf Strasse）三十九號，他成功的說服了留德中國學生朱和中、賓步程等二十餘人，組成革命團體——稱之爲歐洲同盟會，爲中國革命黨在德國建立組織之始。

孫先生在柏林居住了十二天，然後前往巴黎。　孫先生這次來德，是否曾與德國朝野有所接觸，尚無文獻可考，然就他後來對德國友善的評論和態度觀察，可推斷他這次的柏林之行，甚爲滿意。

## 三、孫先生反對對德宣戰

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繼之成立，　孫先生的革命目標初步實現。他從歐洲回到國內，立卽被各省代表選舉爲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在南京組成了第一個民主共和的政府。他當時的外交政策是：

「臨時政府成立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並將使世界漸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

顯然　孫先生抱持開闊的胸懷，與世界諸友邦和平相處，共謀人類文化的進步。可惜　孫先生在職僅三月，即將大總統職務讓與北洋軍人的首領袁世凱。一九一三年，　孫先生在維持國際和平方面，曾創議大陸同盟的區域性組織。他計劃以中國、俄國、德國、奧地利、土耳其、波蘭等六國爲核心，組成聯盟，以樹立國際上的新勢力。他於一九一三年訪問日本時，曾與日本首相桂太郎討論過此一計畫，並會計劃派戴季陶爲代表，赴歐聯絡，但以財政困難，未能實現。由於這一構想，足見　孫先生認爲德國乃歐洲大陸的重心所在，其地位正如中國之爲亞洲大陸重心者相等。倘中、德能夠締盟，則歐亞大陸的和平與秩序的維持，必可穩固。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局勢爲之改變。一九一七年春，中國的北京政府受協約國的要求，既宣佈對德絕交，又醞釀對德宣戰，　孫先生對北京政府此一舉措，堅決反對，他不僅致電中國北京的國會，呼籲切勿通過加入協約國的議案，且數度致電英國首相，盼勿慫恿中國加入反對德、奧的陣營。下面是　孫先生兩封電報的原文：

㈠**致北京參眾兩院主張勿加入協約電**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

北京參眾兩院鈞鑒：外交問題，關係至大，文亦國民一份子，於此商諸君，有以利害言者，謂加入之後，可以一躍進爲頭等國，外交從此順利，言之似能成理。有以人道公理言者，謂德恃強硬，必須懲創，義不能坐視公理淪亡，雖以國殉，亦所不辭，其精神尤可欽。但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爲一國之地位，能否上進，須視自力，加入之結果，於國中有紛亂之虞，無改善之效，則頭等國之想像，恐未可幾；且爲中國損者，同時又使協商諸國之弱點暴露，將致發生他種困難，則欲爲人道助者，恐反爲德人所利也。且歐戰本爲利害之爭，我國事與彼殊，不必以人道爲由，自驅笠入。文於中國加入一事，再三熟慮，審察南方情況，灼知加入以後，必起兩種危險：其一爲排外之盲動，他一爲回教徒之離叛。華人排外性根久伏，遇隙必發，一旦開戰，則必有國內敵人損傷及我之事，圖報復者，將不辨國籍，恣行殺戮，第二之團匪，彈指可見。回教徒在中國勢力不可侮，若與土戰，彼必循宗教之熱狂起而反抗，中國從此大亂，危亡指日而見，此豈徒中國之不利而已。協商諸國引入中國以圖強助，殊不可得，而團匪之禍先被之，更恐以中國內訌，將有一二國以他一二國之行動爲與己有妨，協商國之團結，將形危險，此實於中國與協商國兩無利益之事。但此兩危機，協商國人未能察及，誠使了悟，必不勸誘中國蹈此危機。文處南方，察之最審，昨已以此意電英國首相，勸其打消此議，英相賢明，於此必能曉悟。但恐彼國際行動，已經發表，不能等於兒戲，遽爾收回，轉圜之方，仍視我國。今者報稱政府已決加入，此或有迫而然，諸公代表國民，責無旁貸，務望審察堅持，轉圜樞紐，惟在諸公，勿以中國投之不測之淵，庶幾不負國民重託。孫文。茲並將致英相電文，電請公鑒。

## (二)致英相盼勿慫恿中國加入協約電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

以僕爲中國一愛國者，又爲英國感念再生之德之一友人，於此貴國駐本地各官吏，以其勸誘，將挽中國使入歐戰之中，其結果中、英兩國因之所受之害，僕義不能不抉以相告。前此英國名流曾勸僕究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中國加入協商之問題，僕經愼重研究之餘，終得中國如破棄中立，必爲兩國之大不幸之結論。中國今猶一幼稚之民國耳，譬之病人，今方入院，以立憲主義療彼痼疾，當此之時，自顧不瞻，常賴週到之看護養育以生，然則不可以一有組織之國例中國也。中國之所以保持統一者，賴其民有好平和之習慣與感情而已，一旦有分裂，則無政府之態將隨之矣。前乎此中國人於英國之強及其最後勝利，有無邊之信仰與確信，顧彼雖心迹無他，眼光不遠，自有此勸誘，益之以英存新聞，主張出兵數師於美梭拍打迷，其信念遂因之大爲搖動矣。使中國而參此戰，將見危及中國國運，亦復損及英國遠東之聲威。僅一求中國加入協商之一事，已令中國人想像，以爲協商諸國自表其無能力以克服德國矣。今聞段總理報告總統謂：協商強迫中國加入協商，此問題已惹我政治家之意見分歧矣，此種不和，乃將引起中國之力強而性險之兩原質，以召無政府之狀態，卽排外之狂迷者及回教徒是也。

我國自革命以來，排外之感情，久經吾人壓之，使就低減，然而排外精神固未嘗除也。倘值危迫之秋，機有可乘，將見第二義和團運動發起，而普行外國人之虐殺。故若向任一國宣戰時，無知之人，不能辨孰爲此國人，孰爲彼國人也，則在東方有最大之利益如英國者，其所被慘禍亦尤多。已且回教徒非可輕視者也，彼必將以向其所謂聖地而宣戰者，爲侮聖瀆教矣。吾恐中國無政府之最惡結果，更令協商團結因之分兩，此眞甚有礙於協商本旨者也。狀況如斯，危險之關鍵係於此，則中國惟有保持嚴正中立更無他事可爲明矣。僕之所以請閣下注意於斯有害之勸誘者，非徒爲保全中國，不任其馴至無政府與分裂，更以有他一國，其利益爲吾心所深篆，其公正與隆名，無論自何言之，皆爲吾所崇敬者，吾不能不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最溫之同情爲之謀也。

北京政府不顧　孫先生在上海，除與唐紹儀、岑春煊、章炳麟等屢次聯名通電堅決反對外，並遝行，期其必能通過。　孫先生致段電文如下：

致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痛陳參戰之利害，勸勿輕率。

**㈢爲對德參戰問題復段祺瑞書**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芝泉總理大鑒：敬覆者：王君亮疇到，得奉惠札，併由王君道達見邀赴京之意，款篤之情，感佩何極。文自歸國，遇共和底定，即專意開發實業，雖屢聞有引中國入戰團之說，而以爲總理富於識力，尤洞悉德國情形，必不輕與挑戰。及絕交議起，深恐有外力相迫逼，故曾以私人名義電英首相，告以迫中國入戰團之非利。爾時英人皆自辯謂無迫脅中國之舉，而日本人亦見告謂日本雖歡迎中國加入，決不負引誘中國之責任。私心揆度，終謂加入有害中國，無益協商諸軍，終信總理能以絕交爲止境也。此次王君來述尊意，謂加入事難中止；反覆思維，未敢贊同。美國戰德，首助協商國以軍餉軍需數十萬萬，然後以海陸兩軍繼之。我國無美國之實力，而強欲隨美行動，反須彼方借款助我，是則加入之後，適以累英、美之軍而已。中國積弱，無可諱言，既爲弱國，自有弱國應守之分，比之鄉鄰有鬥，豈可不自量力，強欲參加。今以中國參入戰團，即加協商諸國以重累。彼方急於財政，我乃分其借債，拒其賠款，使彼財政上加一苦痛。彼方以貿易求金融之緩和，我乃高其關稅，使受重苦；在彼實毫無所獲，而在我則反藉人道正義之名，以求小利，此於國家體面有傷，於政治道德有背，甚非所宜。我之加入，既以求利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歸，將來何能博人好感？即有侵損及我之事，人亦將目爲自取，不復持正義以相扶。且加入之後，我國不能盡如何之職責，將令人謂我之軍隊必須有特別訓練之人，我之財政必當處於特別監督之下，大局何堪復問？中國百無一能，惟有自犧牲其領土人民，則甚足以滿欲望，既不以此代之矣。側聞王君言及此次總理主張加入，殊非得已，欲以此拔出凡百困難之中，措國家於磐石之安，人誰不愛國家，聞此公忠體國之苦衷，寧不感動？但文以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天下困難之來，各有原因，避之不得其方，必且變本加厲。譬此中國向守中立，本未有困難可言，自從提出抗議，即覺困難，爲避此困難，遂曰非絕交不可。既絕交矣，而困難又較絕交之前爲甚，今日乃有非宣戰不可之言。宣戰之後，困難之劇，將又出於意想之外者，此時何以處之？萬一竟有一種困難發生，致非外人代我管理財權軍權不可，則將何如？使抗議不至絕交，則今日之困難自可免。今日絕交而未宣戰，則將來之困難，亦尚可不生。欲免今之困難，只有懸崖勒馬，徐求補救之途；否則揚湯止沸，畏影卻行，終無以善其後也。此時中國正類病夫，旁人方肆饕餮，彼獨向隅，於是有聳動之者，曰非與宴不可，既與宴矣，遂以停食自覺困苦。又見旁人食後運動，因又言曰非運動不可。元氣未充，運動之後，轉發他病，則又曰非服劇藥不可。至於藥發，展轉床席，求生不得，痛苦愈增，則惟有曰非死不可而已。今日中國尚未至非外人代管財權軍權不可之地位，若一不愼，則陷於彼非死不可之境，何痛如之？及今改圖，當前之困難決非無可解免者。文以公誼論，固有竭力以濟國家之責任；即以個人道德論，既勸政府勿宣戰，則必當盡其才智，使政府脫此抗議絕交後所生之困難。抑且歷考中外開明之主、立憲之國，苟有大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必詢芻蕘，不以執政之威，而謂人言爲不足恤，其在近代民主之國，尤尊重此精神。今者總理不棄遐遠，而樂聞反對者之意見，信有古人之風，爲當代政治家所尚。況當辛亥改革之際，文以南方人士倡立民國，而總理以北方軍人贊成之，孕育保持，竊謂兩俱有責。而今者爲危急存亡之會，尤不敢不掬誠相告。若蒙採納愚見，必當束裝北邁，敬獻其所懷；否則望有以釋其所疑，亦自當翕然。若兩有未能，貿然命駕，恐反形未臻融洽而已。知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悉告無隱，尚希採擇。卽頌臺綏，諸維鑒照不宣。

尤有進者，　孫先生爲使中國朝野明瞭中國對德、奧宣戰之不當，曾著成「中國存亡問題」一書，闡述其外交主張，極爲詳盡。分析列強諸國外交政策及戰後大勢，尤爲精闢。他認爲：依恃強權，蔑視公理，侵凌中國領土主權者，協約諸國較德、奧爲尤甚，中國實無對德、奧宣戰之理由，且無任何利益可圖。下面幾段話，是　孫先生就各國侵華史實，陳述反對對德、奧宣戰的主要理由：

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所以併蘭斯哇、併印度、併馬拉者，據何公理？所以奪我香港，奪我緬甸者，據何公理？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爲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州，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爲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此種議論奈何可輕信之？如使今日有人果爲護持公理而戰者，必先與英、法、俄戰，不先與德、奧戰也。然而吾人對於英、法、俄尚不主張宣戰，自無對德、奧宣戰之理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然而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厲害之辭，而段祺瑞卽首言非以謀利，則苟爲國家之害者，孰不樂除去之？但今者不能不先問：德之如何害我國，與我國開戰何以能免其害。

國家之生存要素，爲人民、土地、主權，故苟有害此三者，可以抗之也。抗之不足，至於宣戰，亦有理由。然不能不審其損害之重輕，而向其重者謀之。今自開戰以來，德國曾以損害加於我人民乎？無有也。有之，則自往法工人乘船沉沒始。而此諸工人者，皆被誘往法，爲其兵工廠作工者也。英、法自乘其船不免攻擊，故邇來一切婦孺例禁乘船，而獨募華工往，及其船沉，華人則任其溺死，豈非英、法人詐囚，引我國人入其術中而致之死地乎？且如今者日本報載德國假裝巡艦現在南洋，乘員三百餘人，中有華人苦力八十，他日又謂此艦已被擊沉，可知此八十華人同歸於盡。在德船下作苦力，與往法國兵工廠作苦力有何區別？何以我國不能向協商國提出抗議？無他，德艦華人自甘冒險，其死也由於自誤，與協商國無尤。惟能向德國之不稍寬容。反此而言，則往法華工遇害，只可怨法，不可怨德，已甚明矣。況英、法屬地年中寃死華人何可勝數！俄國年前招我國人往充工作，約定所給工值既不照給，華人集眾要求，則以排槍禦之，死者數百。吾友自西伯利亞歸，親見其殘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揮淚述其慘狀。此其視德國擊沉敵船以損及我華人者，罪惡奚啻百倍！何以對彼則安於緘默，對此則攻擊不留餘地。如謂開戰可免人民受害，則必吾國海軍力能掃盪德潛艇，建英、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海軍所不能建之奇功，然後可保華人之生命。否則開戰以後，國民不復許旅行歐土，亦曰可避其殃。今開戰之結果，首須多送工人往歐工作，即無異使德國攻擊商船，可以殺更多之華人，則何以言開戰爲防禦人民之損失耶？

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與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則中國已割黑龍江沿岸最豐饒之地於俄，割緬甸、香港於英，割安南於法，割臺灣於日，而德無有也。以租借言，則英佔九龍、威海衛，法佔廣州灣，俄佔旅順、大連，又轉讓之於日。論其前事，德佔膠州，罪無以加於他國。而今膠州已歸日占，更無德人危我領土之虞。以勢力範圍言之，英國佔西藏、四川及揚子江流域，約佔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二十八；俄國括外蒙、新疆、北滿，約佔百分之四十二；法國佔雲南、廣西；日本佔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至於德國，前雖樹勢力於山東，不過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一。以視英、俄曾不及其二、三十分之一，即法與日亦數倍之。同是有侵及中國土地，而有多寡之分，又有現在繼續與已經中斷(將來如何尚未可知)之別。而於已中斷者則追咎之，近日益加厲者不過問也。侵我較多者則助之，侵我較少則攻之，是與其謂爲防人侵我領土而戰，不若謂爲勸人侵我領土而戰也。如使欲人侵我領土，則無甯昌言賣國之爲愈也，又何必辛苦艱難以與德國戰也！

不幸，孫先生反對對德、奧宣戰的呼籲與努力，未能阻止北京政府在協約國誘迫之下的一意孤行，國會議員多數擁護孫先生之主張，拒絕通過宣戰案，國務總理段祺瑞竟不顧民意，將國會解散。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於因此造成毀法與護法之爭，使中國陷於南北分裂之局。

孫先生的呼籲，雖未能阻止中國北京政府之與德、奧爲敵，卻大多數國會議員與社會名流，均願贊助　孫先生於一九一七年秋在廣州號召之護法事業。德國方面，亦由於　孫先生之對德主持正義，轉而贊助　孫先生之護法行動。據李國祁教授依據德國外交檔案所作的研究，吾人已知　孫先生離上海赴廣州之前，卽曾獲得德國方面的支持，就中國革命立場而言，此殆爲德國對　孫先生對德友善表示的回報。

## 四、孫先生對俾斯麥的推崇

如世人所已熟知，　孫先生的革命理論爲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甚早，其體系的完成當在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脫險之後。然其最後之充實與公布，卻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本人爲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之一，曾親聆　孫先生關於三民主義的講演。他就講到民權主義時，對於十八世紀的德國首相俾斯麥(Karl 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建樹，有極高的評價。首先，　孫先生雖認爲俾斯麥阻礙了德國民權的發展，卻極稱贊俾氏統一德國之功，他說：

世界上經過了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人心，向來富於民權思想，所以國內的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在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爲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英國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甚麼手段呢？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許多學者研究，都說是由於俾斯麥。俾斯麥是德國很有名望、很有本領的大事業上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俾斯麥造成的。世界之所以強，全由俾斯麥一手造成。

孫先生贊揚俾斯麥有才智，有雄心，在外交上尤其有遠大的眼光。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的手段，和奧國打戰，一戰便打敗奧國。奧國；惟俾斯麥以爲奧國雖然反對德國，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將來不致爲德國的大患。俾斯麥的眼光很遠大，看到將來新敗之餘，復得德國的寬大議和，便很感激足爲德國大患的英國、法國，所以俾斯麥戰勝了奧國以後，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奧國在他。從此只有四年，到一八七〇年，德國便去打法國，打敗拿破倫第三，佔領巴黎，到講和的時候，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從這兩次大戰以後，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成立一個統一國家。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俾斯麥一手締造而成。

孫先生尤其稱頌俾斯麥採用的國家社會主義。他認爲俾斯麥以國家權力防止社會主義發展的流弊，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頗有先見的發明。這一點，俾斯麥的國家社會政策，與　孫先生民生主義所採行的「防患於未然」的措施，極爲相似，一九一二年前後，　孫先生甚至說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就是他的民生主義。他在民權主義講稿中，對俾斯麥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效用，作如下的分析：

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歐洲有了民權思想，便發生民權的革命。爲甚麼有了那樣發達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革命呢？因爲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方法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俾正是俾斯麥當權的時候，他是用甚麼方法去對付斯麥不用這種手段。他以爲果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徒勞無德國的民智很開通，工人的團體很鞏固，如央集權的獨裁政治，他是用甚麼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功。當時俾斯麥本是主張中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斯那般人，實行經濟革命。俾斯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銷的。他實行一種國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當俾斯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了作工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這些事業，本來都是人民私有，因爲基本實業歸富。但是俾斯麥的眼光遠大，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國家經營鐵路、銀行和各種大實業，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令全國工人都心滿意足。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到了俾斯麥經濟政策成功的時候，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做工，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俾斯麥用這樣方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對待社會主義，是用事先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衝打銷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

孫先生對俾斯麥政府的行政效率，也極欽佩，認爲：「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斯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民權主義第五講）此外，孫先生對德國民族的務實精神和國防設施，也認爲值得中國效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曾經計劃寫一本國防計畫的專書，預定的目次共爲六十一節，其第五十節的標題卽是「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魯伯礮廠之計畫」，其他論及國防軍備各節，精神上也多顯示以德國軍備爲一範例。

## 五、聯德計畫的進行

正如各位所熟知，孫先生於一九二二年秋季以後，採行了聯俄的政策。當代的歷史學者，研究這一聯俄政策的背景與效果的大有人在，貴校的金德曼教授就是很有成就的一位。但大家往往認爲　孫先生聯俄以後，就一切惟蘇俄的馬首是瞻，不再重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事實上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聯俄只是外交政策的運用，並非如中共早期的向蘇俄一面倒。　孫先生於聯俄同時，仍與德、英、美、日等國維持關係。尤其是聯德的交涉，一直到一九二四年都未停止。這一背景，林百克 (Paul M. W. Linebargir) 在所著"Sun Ye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書中，曾作如下的敍述：

> 聯德　中山先生之主張民族主義，並非狹義的帝國主義，而以大同世界爲最後之鵠的，前已註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先生反對者忘祇爲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以外之國家，則勇於聯合而無所畏。親與善鄰以得之助。故　先生以爲欲革命成功，非與帝國主義以外之國家聯絡不可。當　先生在粵組織護法政府以抗戰北方敵人時，以北京政府得帝國主義的助力，外交上處處均佔先着；　先生則反是，孤立無援，形勢日在風雨飄搖之中。其時歐戰告終，德國受制於列強，已無侵略中國之野心。，其與我國利害相同，毫無侵掠顧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進兩國利害者，德國是也。」　先生認爲德國是時亦爲被壓迫民族，主張中、俄、德聯盟。故欲聯德爲助且以制列強，遂命廖仲愷等赴德、奧與彼邦朝野人士往返，頗爲活動。既而陳炯明叛，　先生出走，南方政府中斷。聯德之舉，亦功敗垂成。陳入大元帥府，獲赴德之使歷次函電，悉將其披露，冀增列強對於　中山先生之惡感。此聯德之舉，雖無效果可言，而　先生反抗帝國主義之策略，亦於此可見一斑矣。

就中文資料顯示，　孫先生聯德的行動實始於民國十年七月，主其事者則爲朱和中。朱於抵達柏林後，卽與德國前駐華公使辛慈（Hintze）接頭，着手籌設一「公事所」，作爲促進聯合的機關。十一年三月，辛慈有意東來，　孫先生曾令曹亞伯赴港等候。及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後，公布　孫先生與俄、德交涉的三封密函，辛慈遂不復東來，德政府亦予否認。陳炯明公布這三封密函的目的，在激起當時中國朝野對　孫先生的反感，其用心甚爲陰險。曾爲多數國民黨人所不滿。但就這三封信件中，吾人可以窺知當時聯德的進行情形。現把這三封信附在後面：

㈠孫先生致廖仲愷、曹亞伯函：仲愷、亞伯兩兄同鑒：茲得朱和中來函，所圖各事已有頭緒，其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需兩兄協辦者，特將所閱之函附來，此函閱後付丙，共閱便知應付矣。一、百元分寄北京柏林。寄柏林者要買美金或英鎊，不可買馬克，因恐馬克有跌無起，美金英鎊則有起無跌故也，並付來支條一紙，交由會計司出帳可也。二、要亞伯兄在廣州等候辛慈（Hintze）到港，則親往直接帶他來大本營，此事要十分秘密，故接此信後，則要着電報處留心歐洲或歐亞沿途各埠所來電報，如有H字樣者，即如期往港候船便妥矣。朱和中處於未接他此信以前，已有信着他回國。然無論如何，此三千元當寄去，匯款時可加一函轉屬他回國之期，由他自定，如尚有重要事件須辦者，當可稍留；如無要事，當以早回爲佳，最好能與辛慈齊來，則諸事更融洽也。又亞伯兄在廣州等候時，由會計司每月支公費三百圓，到大本營時則由大本營支，廣州可停止，並付支令一紙。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萬不得已，則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此致並候大安。孫文，三月八日。

㈡朱和中上　孫先生函：大總統鈞鑒，謹稟者：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領得臺銀六千二百圓，內有半年安家費（即薪金）一千二百圓，當即匯寄京寓。當支票船票費千圓，置裝費千圓，尚存三千圓，由德華銀行匯兌馬克十萬二千（當時每元換馬克三十四枚）來德。抵德以後，頭一月以各處奔走，四處聯絡，用去一萬二千馬克，第二月用去七千馬克，第三月極力撙節用去六千馬克，以後不能再省，因德國工人每月亦需用三千馬克，至今尚存七萬五千馬克，惟自得辛慈之助，進行愈速，範圍愈廣，若設公事房則用費將三倍於前，需要所迫，幣制所關，除本人飲食日用之需以外，不能苟簡，即請三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飭發半年安家費（即薪金）一千二百圓，但飭秘書匯寄北京禮士胡同九十一號朱子英夫人朱陳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查收，以安家小。飭撥此間用費三千圓換成美金或英鎊，由廣州長興街德華銀行代辦處匯來，千萬飭勿再換成馬克，以免虧累。此間用費，若蒙惠撥，即可度支至年底矣。此間諸事方得門徑，進行方殷，半年期滿，決不能中止回國，因此請款飭撥，以後即請示知。肅此叩請勛安。朱和中叩，十一年一月一日。

㈢朱和中先生上　孫先生函：前駐華德使辛慈熟悉吾國情形，曾充駐俄陸軍特使八年，與俄人感情亦洽，精通英、俄、法語，且思想新穎手段敏活，其所主張亦合民治潮流，洵德國不可多得之人才。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慈即主張：華、德、俄三國聯合，與鈞旨暗合，近自與中接洽後，擬不問他政專辦此事，是以決定組一公事所，以資籌備，現總定兩月內籌備完竣，伊即請命於其國務總理來華。中愚見擬以辛爲總理員，其他各科選定主理員，除人員材料辦法由主理酌定，總理員專備鈞座諮詢，主理員籌商何項人員先行來華，何項人員陸續前來，何項材料即日需要，何項材料繼續運輸，何種辦法即日擬定，即日實行，何種辦法繼續擬定，隨後推行；均由　鈞座與總理員核奪，如此則東西聲氣互通，綱舉目張，進行自速。惟辛慈名望頗重，須用假名，雖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屆時當電報船名，即請於抵港時派輪密迎入幕爲禱。至來華以後，是否受聘，另是一事，茲不迭贅，來電辛以H代。肅請鈞裁。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亂，　孫先生於同年八月離奧赴滬，聯德的交涉暫時停頓。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　孫先生再返廣州，仍欲繼續聯德的交涉。六月二十三日，他曾與　蔣中正談及「俄德近狀」，八月十八日，他即致函旅居德國的鄧家彥氏，促其遊說德國志士及實業家，促成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德兩國間的技術合作。　孫先生在信中說：

「此間因須德專門技師，然零星延聘，無補於事，必也與德國資本實業如 Sirmnes者及其政府訂一大建設計畫；中國以物資人力，德國以機器科學，共同合作，發展中國之富源，改良中國之行政，整頓中國之武備。總而言之，即借德國人才學問，以最速時間，致中國於富強，此步達到，則以中國全國之力，助德國脫離華塞條約之束縛。如德國政府能視中國爲一線之生機，中國亦必視德國爲獨立之導師。以德國今日廢置之海陸軍人才及製造武器，組織軍隊各等計畫及經驗，悉移來中國，爲中國建樹一強固國家，互於資助，則彼前戰敗而失去種種權利，必可由助成中國富強而恢復之也。未知德國多數之政治家，有此眼光否？望兄乘留德之機，向其政府及實業家遊說之。如彼等有此見地，知兩國相需之殷，通濟之急，不以歐亞爲歧視，種族而區別，則人道之大幸也。倘德國志士能從此途用工成中德兩國之提携，其功業必比於俾斯麥者大也。而兄又爲成此事之中介，則功業亦當在四萬萬人之上矣。幸爲相機圖之。」

一九二二年夏，德國遠東協會總幹事林德過港，　孫先生派李其芳往商，有意繼續商論。據李其芳自述：

「民十二（一九二三）回國，途經香港，遇李烈鈞，因隨之入粵……入總理室，……余卽出陳德國前任內閣總理米舍愛力士致陳炯明函一道，總理大悅，問所言何事，余曰：按米氏游遠東路過廣州與陳詳說中德文化及實業合作事：①陳將派學生百名赴德專攻專門技術；②改組廣東大學仿同濟方式；③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克虜伯礮廠於廣州；④設容克飛機場於廣州。各種詳細計畫，總理大感興趣，謂必須促其實現。余謂遠東協會總幹事林德卽將來華，日間到港，此事當日他亦知情及參加討論，…囑余明晨起程，並代表歡迎林德，及談一切合作計畫：…余至港。二日，林德卽乘德國郵船沙蘭號到港，余卽與之赴申，舟中經再赴日本逗留數月，赴粵日期，未能決定。」

聯德的談判以後有無進行，缺乏文獻可徵。本人所欲特別指明者，卽對德國之合作抱如此熱望，則知所謂外交上之聯合，並非專以蘇俄爲限。界上以平等對待中國，且不事家放棄其侵略政策與行動，而能待中國以平等之地位，孫先生仍當樂與爲友。聯德之進行，卽認定德國已成爲不復侵略之新國家也。

## 六、一位難以忘懷的德籍友人

談到此地，使我想起了一位難以忘懷的德籍友人，那就是曾任德國駐青島總督，其後又擔任過孫先生的顧問的沙美博士（Dr. Schrameir）。沙美博士是一位卓越的土地問題專家。他在建設青島爲一現代化都市過程中，曾經非常成功的實施了市地改革的計畫。他把他的經驗，寫成了一册標題爲「膠州土地行政」的專書。內容非常有價值，一位國民黨的同志朱和中——就是前面提到在一九〇五年留學柏林參加同盟會的人。把這册書譯爲中文，交由上海的民智書局出版，頗獲好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土地問題的解決，也是中國革命最大課題之一，據我個人的研究，孫先生在他立志革命之初，即已注意到中國的農業與土地問題。一九〇五年，他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一九一二年，曾有過要做到「耕者有其田」的言論。一九二〇年代，他有意在廣州實施都市土地的改革。孫先生也是一位願意博採各方學理和經驗的人，他認爲沙美博士在青島的成功經驗，正好可以有助於廣州土地問題的解決，因此於一九二四—二五年間，邀請沙美博士到廣州，擔任孫先生的顧問，負責廣州市地運用的規劃工作。沙美博士恐怕是中國國民黨及其政府最早聘請的德籍顧問，後來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曾聘用數十位德籍軍事顧問，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事。

說到此處，我情不自禁的要順便一提我個人與沙美博士間的一段關係。時間是在一九二四年秋間，沙美博士在廣州擔任　孫先生的顧問，我則在廣東大學任教並擔任廣州市黨部的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沙美博士提出了一篇改革廣州市地的計畫，　孫先生要我和沙美博士共同討論，並代他將原計畫譯成中文。我對此一工作正在着手進行的時候，　孫先生已經應北方將領之邀，啓程北上，想不到他於次年三月十二日卽在北京逝世。　孫先生逝世後，我正想把此一翻譯工作完成的時候，忽然楊希閔和劉震寰所部滇桂軍，陰謀叛變，黃埔軍校校長兼東征軍總指揮　蔣中正遂由東江回師討伐始告敉平。軍事期間，我適因事要離開廣州。我還記得，當海軍在長堤一帶開始轟擊叛軍的時候，我被隔斷在廣州。河南與黃埔在廣州的對岸，是政府的根據地，沿河兩岸都在射擊，我無法走向大本營去，於萬分無奈之中，只好走到東山沙美先生家中躲避。最後還是靠他的掩護，我僞裝爲他的隨從，由他帶我經過沙面，安全渡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河南的我軍防地。

沙美博士具有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他對　孫先生的崇敬，眞非言語所能形容，那時沙美先生年事已經很高，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是戰敗國，他對我表示將以其餘年幫助　孫先生完成中國的革命。沒想到就在　孫先生逝世那年，他也就與世長辭了。我至今非常懷念他，他改革廣州市地的計畫，不幸也已經失落，這眞是無可彌補的遺憾。不曉得德國的文獻資料中，有沒有關於沙美先生的記載？盼各位指教。謝謝！

——錄自「第一屆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報告」附錄三，華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七十年三月出版。

按：本文曾刊載於「世界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發揚中華民國的歷史光輝

## ——中國歷史學會第十六屆會員大會獻詞

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胡漢民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作專題報告時，曾提到，由於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輝煌成就已喚起了大陸同胞的共鳴，所以大陸青年喊出了「爲什麼大陸的國民經濟遠不如臺灣的進步」的呼聲。六十八年十月十日國慶日前夕，我又以「中華民國的光輝正照耀大陸」爲題發表了一篇專文，認定我們在臺灣實施的三民主義建設就是走向現代化道路最成功的實證，這一實證促成了大陸同胞的醒覺，他們在欽羨、企盼著中華民國的光輝。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在中國歷史學會會訊創刊詞中，再度向史學界同仁們呼籲：「發揮我們的潛力，通過我們的努力，讓中華民國的歷史光輝照遍大陸，永耀塵寰！」

這是我近年來顚撲不破的信心，也是我樂觀奮鬥的動力，更是通向光復大陸，統一國家，重建幸福生活和安全社會的惟一的勝利之路。我們認清了這一條路，大陸同胞更日益渴望着這一道路，他們有日益眾多的人，更勇敢更公開的表達出這一意願和決心。據有關方面敵後消息，在北平的一份叫做「求知」的地下刊物，於今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之後，曾發表一篇題爲「三民主義、國民黨與中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文章，明白而殷切的表示大陸人民已經到了拋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接受三民主義這一理想的時候；期望國民黨能夠把三民主義的春天，帶回到中國大陸！

中國人——無論是在臺灣、大陸及海外，絕大多數已體認到這一歷史的趨勢：中國的統一，必須在三民主義的理想和制度下完成，才符合中國同胞的願望與中華民族的利益。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加速行動，促使這一理想的盡早實現。在這一任務和行動中，我們史學界人類的明鏡，讓大陸同胞與世界人類，更能認清邪與正、善與惡、仁與暴、成與敗的分野，從而選擇光明的道路和幸福的前程。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處境仍然艱困。但環境的艱困，正是最具實效的考驗和磨練，衝破黑暗的包圍而迎接到的光明，才更珍貴。歷史學者最具民族的責任心與時代的使命感，目前正是我們奮揚蹈厲，以嚴正史筆橫掃魅魑邪惡，發揚歷史正氣的最好時機。希望今年的會員大會，就是我們貫徹責任心與使命感的新行動的開始！

——錄自「中國歷史學會會訊」第二期，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迎民國七十年

七十年來，中華民國始終處於內憂外患的侵擾中，面臨的險惡環境，的確關係着民族的存亡絕續。遭逢如此動盪不安的時代，國家固然要接受考驗，克服不可避免的橫逆；個人亦無法樂以忘憂，任情隨意地安度太平歲月。但危疑震撼的時局，卻爲有志之士大展抱負的時機，在困頓晦暗的境遇裏，革命先烈先賢嚮往著黎明後的光輝燦爛，以血汗譜成現代的史實，轟轟烈烈，多采多姿。今人何其幸運，親身經歷這空前未有的變化，歷史工作者，又何其幸運，能以極其豐富的史材，鍛精用宏，盡情發揮，展現大時代的眞實意義。

近年來，中共爲達其政治目的，否定我中華民國的存在與貢獻，而玩弄狠毒的統戰伎倆，作有計劃地歪曲史實，揑造歷史，尤其是現代史部份，更爲其竄改的重心。中國歷史學會的同仁，本著治史的良知，有責任挺身而出，反駁其謬誤，揭發其用心，以昭正是非，而使正義永存。

開國七十年，可歌可泣的事蹟不勝枚舉，最近三十年，更值得大書特書。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實行三民主義，使人民享有空前的繁榮與福祉，安和樂利，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境界，已具體實現；反觀海峽對岸，貧窮落後，一片淒慘景象，兩相對照，不禁令人想起，何以會有這樣懸殊的差異？當前中共正在進行十惡大審，暴露的種種內幕，顯示大陸同胞身受的苦難，並非僅爲少數共酋的胡作非爲有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致之，極權體制的根本錯誤，所產生的惡劣後果，才是問題的癥結。大，政治學臺北」，中共報刊且公開招認，大陸青年懷疑共產主義，有着信念危機，這些現象，豈可說是無由而來，正是對海峽兩岸是非評價的自然反應。

三十年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別在中國進行實驗，一爲成功，一爲失敗，顯示出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才是統一的正確方向。這段並行發展的歷程，爲中國人民無比珍貴的經驗，我們耳聞目睹，身受冷暖，作爲當代的歷史工作者，有責任爲歷史作見證，以客觀公正的史筆，紀錄眞相，傳諸後世，並指明中國未來的遠景。

——錄自「中國歷史學會會訊」第四期，民國七十年一月三十一日。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 十二全大會所應面對的問題

自民國十三年元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後，迄今足足五十七年，快接近六十個年頭了！我認爲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啓後繼往開來的盛舉，而且是開拓一劃時代的革命主流。這正與最近經寫過一篇長文題名爲「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文中是對參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有其相同的使命和意義。我曾重在大會中關於宣言和政綱政策討論的經過，卻忽略了一項大會最重要的主題，那便是在大會開幕之後的第七天，十三年元月二十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對三民主義的精義開始講述「民族主義的第一講」，而未加以敍述。原定每週一次，嗣因要公頻有間斷，至八月二十四日後，因北伐督師赴韶關而停止，計講到第四講後，隨因北方政局變化，國民軍發動所謂首都革命後，歡迎　先生北上而中輟。照　先生的講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計畫，民生主義亦預定爲六講，當　先生北上時，曾以民生主義講演未完請問　先生，　先生曰：未完之講演當在到北京後再繼續。不幸於是年十一月離粵北上，到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竟病逝北京，迄至政府播遷來臺，乃由總裁　蔣先生增補育樂兩篇以完成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三民主義深入全國人心

在民國十三年前，國父關於三民主義之創立及精神曾作不少片段則加以綜合而作有系統之闡述。由於聽講者除黨政軍幹部之外，尚有青故講辭深入淺出，在使大眾易於了解，而收宣傳與教育之效，其影響之比的力量。國民革命之眞義與三民主義之傳播，普遍深入於全國人心，關一新的紀元。

在我的記憶中，自大會宣言政綱決議與主義之闡述刊佈之後，人心則爲：「三民主義一定成功！」

## 黨內同志信心更為堅強

在「三民主義一定成功」之呼聲所涵之意義：在黨內同志加強了信反對或懷疑革命方面的人士，雖了解了三民主義爲救國救世的良方，但主觀的成見，而不能完全改變，於是他們在無可如何中另外發出一種「三民主義一定成功，但不一定是中國國民黨的成功。」

他們把主義與奉行三民主義的黨分爲兩截，但其對國民革命的認識仍然是居於反對或懷疑的態度，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自掩其過去不贊成革命的看法。戴季陶先生曾有幾句名言說明中國革命的特質，他說：「有　孫先生而後有三民主義，有三民主義而後有中國國民黨，有中國國民黨而後有中國的革命。」焉有信仰三民主義，而反對國民革命的道理？焉有贊成國民革命而反對中國國民黨的道理？戴先生的這番話正是對這般人而發的啊！　國父孫先生曾經與岑春煊有一段談話，與戴先生的意見有相同接近之處，我順便在此一提。當民國七年護法大元帥的時代，少數政客與當時實力派的廣西陸榮廷等軍閥，爲了不服從　孫先生護法大元帥府的命令而迫使　孫先生離開廣東，將大元帥府改組爲七總裁制，　孫先生雖仍被推爲七總裁之一，而岑春煊便爲陸榮廷等所利用，成爲主要人物。當岑春煊由上海赴廣州之前，特僞作友善往訪孫先生，你的三民主義很好，我到廣州後將爲先生實行三民主義。」

## 主義與國民黨不可劃分

孫先生平時很少生氣，當他聽了岑的話之後很發怒的說道：「三民主義是我創造的，我在廣東都不能實行主義，那你又何能實行三民主義？」

這段話正說明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應當是不可分的。

國父孫先生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時，以很重的語氣強調本黨過去的失敗不是主義的失敗，而是我們沒有一片乾淨土，以黨的力量來實行三民主義，以證明三民主義爲救中國救世界之所必需，因此他總結此次大會改組的意義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第一、是把本黨改組成爲有主義、有組織、有紀律、有力量的革命黨。第二、要用本黨的主義去改建中國。他在大會講話中一再強調主義與組織和方法的重要，這是他在大會期中開始作更週密、更有系統的三民主義講演的原因吧！

## 三民主義顯示新的光芒

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在這五十七年的歷程之中，我們的黨和政府現在第十二次全代會的召開，在這五十七年的歷程之中，我們的黨和政府雖然由於內憂外患之相繼迭乘，有的方面是成功了，有的方面卻是困難重重，共黨叛亂竊據了大陸，爲國民革命造成空前慘痛之失敗，但革命的主義卻在艱危中顯示出新的光芒與希望，並未因失敗而停止前進。其最大之證明：一爲自大陸淪陷，政府播遷來臺，經過三十年的生聚教訓，從實踐中，使三民主義在臺灣得到了成功的驗證。二爲大陸經過了共黨三十年的暴力統治，證明所謂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爲大陸同胞帶來了無窮的災難痛苦，瀕於解體與崩潰的境地，三民主義的光輝正成爲大陸同胞嚮往得救的指針。

國父孫先生常說：「主義之益信其言之正確。他之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開始作三民主義更深入、更詳盡的闡述，其深意亦在此。任何革命運動，其涵義都是一項「文化運動、學術運動和思想運動」。當此三民主義的光輝正普照世界之際，本屆大會六項重大議題中之一，便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問題，我們能面對這一問題和掌握此一問題，以獲得結論，亦正是第一次代表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會時　國父孫先生特別要開始作更詳細的，更有系統的闡述三民主義的原意了。回想五十七年前，　先生在第一次全代會中，講述三民主義的概論時的聲音相貌，愈使人嚮往，愈使人崇信。他開始便說道：

「諸君：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甚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甚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爲三民主義是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既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的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應該要救的，那麼，便應該信仰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便能發生出極大勢力，這種極大勢力，便可以救中國。」

## 致力研究闡揚實踐主義

我所謂十二全代會所應面對的問題是：除了加強黨的組織和改進革命的方法外，更應從主義的研究、闡揚和實踐上作更大的努力。

——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父生辰的考證

## 上、國父生辰考證的回憶

### ——發生差異之原因和背景的一項推論——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三日聯合報新聞欄內，載有　國父孫先生的生辰所發現的一項珍貴的資料，是最近由盧夫人的遺物中這一資料的發現，頓引起我許多關於　孫先生誕生時日的爭議的回憶，我願就此機會加以敍述，以供研究　孫先生生平的人們一種參考。我的主旨只在尋求過去爭議發生的原因和背景，從而更深入的了解　孫先生行誼另一種偉大精神之所在。

## 一

關於　國父孫先生誕生的日子，在過去好似一個謎，成爲一個爭執難決的問題。爭執難決的原因：一是由於　先生在世時不曾與人談及過他的生日，他一生亦未曾舉行過盛大的祝壽紀念，因此他的誕生日期，確實是在何日，甚少人加以注意。一直到了他民國十四年在北京逝世之後，才急切的要查出他究竟生於何日，以便於記述他的生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是　國父於民國前十五年，應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翟爾斯氏之請所作的自述，說他誕生於一八六六年舊曆十月十六日，於是後人便以　先生的自述引爲依據了。就我記憶所及，在　先生逝世之後，爲了要查明他的生日，確曾由當日在廣東的中央黨部向居住澳門的盧夫人處查詢，由盧夫人從她和　孫先生訂婚時交換的八字中查出，遂據以確定陽曆十一月十二日。至於十一月十二日這個日子，是否卽是依據同治六年丙寅，舊曆十月初六那天合算爲是年陽曆十一月十二日，在當時卻無人加以注意則是事實。最近在盧夫人遺物中所發現的　孫先生的八字載明　先生誕生於同治五年丙寅舊曆十月初六日，照「近代中西史日對照表」所推算，亦正是是年陽曆的十一月十二日。這正證明民國十四年孫先生逝世後，執政黨在廣東的中央黨部確定陽曆十一月十二日爲　孫先生的誕生紀念日是同出於一個來源，卽最近所發現盧夫人遺物中　孫先生的八字所載。這一原始資料的發現，可以說明黨史會所編「國父年譜」所載　國父誕生於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初六日，仍是根據於民國十四年廣州中央黨部所確定的日子。我在很久以前爲暢流雜誌所寫的一篇「國父重信誓的精神」文裏，亦曾提及　孫先生的誕生日子的查明，是在盧夫人處得來的經過，因爲當時只注意到經過，而沒有注意到舊曆的日期的考證。

最近我在無意中，發現了盧夫人在民國十四年　孫先生逝世後，覆香山商會查詢　孫先生生平事蹟的信，其中有云：

「科父德明卽中山，六十歲，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時。配本邑外塾鄉盧耀顯女爲妻，名慕貞，生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九酉時。於光緒十年四月十三日結婚，生一子卽科；生女二，次女於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民國二年離世，現三女琬，配戴恩賽。」

從上面這一資料可以證明在　孫先生逝世以後，不僅當時在廣州的孫先生的生辰，卽其他方面亦爲此向盧夫人查詢眞相。盧夫人此一覆信最近所發現的　孫先生的八字相符合，而同治五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日。在此我似可以斷定：確定以陽曆十一月十二日爲孫先生之丙寅年十月初六爲根據的。因此，在此以後的各種推論，便須另作考證了。

自盧夫人遺物關於　孫先生的八字發現後，我發覺關於　孫先生的生日所以發生若干爭議之所在，可能是由於下列幾項原因：

第一、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初六日是是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日，大家忽略了這一日子的確定，仍是依據盧夫人在　孫先生八字中所得來的經過。

第二、在「國父年譜」中下面的兩項記載較容易發生誤會：

一、年譜說「十月初六（西曆十一月十二）　先生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又說：

二、據　先生自傳述其生日爲是年「華曆十月十六」；當爲西曆十一月二十二日，家庭風俗照舊曆稱慶。又說：

三、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適爲舊曆十月十六日，家屬慶於廣州寓所。翌年　先生逝世於北平，致祭時遂舉十一月十二爲誕辰，以後是日由政府頒爲國定紀念日，舉國遵守爲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就年譜上面一、二項的記載，對於　孫先生誕生的日子依違於舊曆斷定，而三項的記載則竟以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正爲舊曆十月初六與十六之間，未敢有所的自傳所述爲正確，而未加以其他之考訂。至於年譜說「翌年先生逝世爲誕辰，以後是日由政府頒布爲國定紀念日」。我對此一論證深致懷疑先生在北平逝世，其時的政府仍侷促於廣東，最初確定此日爲　先生的執行委員會；二、當時所依據以確定爲陽曆十一月十二日的原因，應當舊曆十月十二，而不是十三年的舊曆十六的陽曆十一月十二。爲什麼呢？

第一、就我的了解，當時大家對於　孫先生於民國紀元前十五年，誕生於舊曆十月十六的事甚少人知，至少我當時亦是不曾閱讀過此項自傳的一人。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應當是以盧夫人所提示的舊曆十月初六，合算爲是年陽曆十一月十二爲是。

第二、細考　孫先生民國十三年九月以後的行止有如下的記載：

九月十二日移大本營於韶關，親往督師。

十月三十日自韶關回抵廣州，集議北方時局。

十一月三日至黃埔軍官學校作告別之訓話。

十一月四日決定北上，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一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十一月十二日出席廣州各界歡送會，演講「北上之意義與希望」。

十一月十三日離粵北上，向午途經黃埔，至陸軍軍官學校，作最後之視察。六時，離黃埔，向香港航行。

就上面的幾項概要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　先生自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二日赴韶關督師至十月三十日回到廣州，到了十一月十三日便離粵北上，應付當日急變中的時局，在廣州停留的時間僅僅有十三天。在這十三天之內，一面要佈置後方的一切措施，一面又要籌劃北上後解決時局的諸多大計，而且那時北伐各軍已進入江西，更需要有妥善之佈置，他在這短短十三天內的忙碌情形可想而知了！最關重要者爲離粵前的一天，十一月十二，亦卽相傳是日爲他的生日「家屬慶於廣州寓所」的那一天。關於這一天的情形，今日尚可尋得文字記載資考證者有：出席廣州各界歡送會，演講「北上之意義」，晚間「廣州各團體、各機關及工界、學界聯合舉行提燈遊行大會，先生在永漢路財政廳前樓憑欄參觀，脫帽答禮」等。其他如：主持一連串的會議，接見黨政軍負責幹部，招待外賓之事，不知凡幾。在我的記憶中至今仍存留於腦中的一件有趣味的事，則是十二日的晚間，在　先生赴財政廳接受各界提燈遊行之前，在士敏土廠大本營內曾舉行過一次和軍政主要負責人員的聚餐會，一面敍別，一面談事。我雖然不曾參加這次的晚餐會，但當時參加晚餐會的有一位四川才子，文人而帶兵的，其時任討賊第三軍軍長的盧師諦兄。他於那晚的深夜，爲我敍述參加晚餐會時，　孫先生使他感覺十分尷尬的一段故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師諦兄說：「先生要我隨同北上，負責擔任聯絡北方舊社會的軍事和政治人物的工作。先生一時想起我是有吃食洋煙的嗜好的，與他同行有所不便，於是表示了一種遲疑。孫先生接着又說：雖然如此，你這種情形在北方舊社會裏去做聯絡工作，亦有方便的地方，用得你的地方很多。不過請你把嘴張開讓我看一看你的牙齒黑不黑？有無令人看出你是吸洋煙的樣子？你若與我同去，令人看出你吃洋煙，會給人對我們革命黨人發生一種不良印象。」錫卿兄（盧號錫卿）說：「我當時覺得很不好意思把口張開，我緊緊把口閉着面對着先生，由於先生一定要我張開給他看，我只得張開了。」錫卿兄最後還說：「先生簡直把我們當做小孩子看待，不過他老人家那種慈祥愷悌令人感動的態度，亦只好讓他擺佈了！」錫卿那晚根本沒有就寢，我們一直談到第二天早晨，送他上船，隨　孫先生北行。他原本是一位以夜代日的洋煙嗜好者，以他的聰明才智，本是一位大有作爲的人，畢竟終於被嗜好所誤，而甚少成就爲可歎！他那時雖名爲討賊第三軍長，卻是所帶的兵並不多，有無兵軍長之稱。在革命的艱苦奮鬥中，他不失爲一堅貞的同志，亦是追隨　孫先生久共患難的一位人物。他大約到了上海之後，便把牙齒請醫生洗得白白的，由上海直赴北京，　孫先生則繞道日本而至天津，到天津後卽病發，不幸竟於翌年三月十二逝世北平，距　先生離粵北上爲時僅四個月還差一天！

我所以要提出這一段回憶的原因，只是在說明十三年十一月十二這一天　先生忙碌的情形，年譜中所說：是日「家屬慶於廣州寓所」，在我的臆測，假定是日有家屬慶於寓所這段事，不會是其時在廣州的重要同志都一無所知的。因此我對據此以爲　先生生日的認定，是有足資懷疑的地方。因爲這一天用

舊曆推算起來是十月十六，而不是舊曆十月初六。這與年譜首段所載和我所回憶當　孫先生逝世後，由盧夫人處得知　孫先生生日的經過似有所出入。尤其是在　孫先生的八字發現之後，既已載明　先生出生於同治舊曆丙寅十月初六，而「初六」，用陽曆推算起來則正是一八六六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而不是十三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因爲若以十三年陽曆十一月十二爲先生的生日，則這一天亦正是　孫先生自傳所述「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的日子，又與八字所載有所不同了。年譜所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家屬慶於廣州寓所」，其所根據的資料如何不得而知，就我多方考尋有關的資料，仍不外下列兩項：一是根據　孫先生自傳所述爲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年，華曆十月十六；一是盧夫人提供的　孫先生的八字爲是年舊曆十月初六，相差共有十天。歷史資料的引用，當然以原始的第一手資料爲最可靠，但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困擾便是以上兩種資料都是最原始的依據。如果我們說　孫先生的八字所載的生日爲確實可信，然則　孫先生本人的自傳所述便不可信嗎？如果說　孫先生自述出於筆誤，那麼，八字又豈亦同樣能免於錯誤嗎？徬徨於兩種原始資料，眞使人難以選擇！如果我們略加分析，便知生於丙寅舊曆十月初六一說，乃出自　孫先生的家庭；生於丙寅舊曆十月十六一說則出於　孫先生自己。假設　孫先生不是出於筆誤，而是基於其他的原因，則這一原因是什麼？就更值得探尋了。容在本文第三節敍述之。

我在此可提出另一傍證：那便是有關　孫先生的傳記各項寫作，凡是在　先生去世後不久所出版的，大體都以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初六爲依據。如：美人林柏克所著「孫逸仙傳」，出版於民國十四年；因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公所著「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出版於民國十五年；王瑛琦所著「孫中山傳記」，出版於民國二十四年；似乎都是依據由盧夫人處所提供的　孫先生生於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初六，或推算爲是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尤堪注意的是：林柏克所著「孫逸仙傳」一書，原文本爲英文，亦說：「他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即清同治丙寅十月初六。」而林氏寫　孫先生的傳記所採用的資料，則多半是基於他本人和　孫先生的談話，由孫先生口述，而由他所筆記。此書在美國正當要出版的時候，忽然　孫先生逝世的消息到達美國，使他大爲震驚哀痛！　孫先生本人當然亦不及看到此書了！除此之外，凡是以　孫先生寫給英國翟爾斯教授的自傳所述爲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十六日（合算爲是年陽曆十一月二十二）爲依據的，則多半是最近若干年所出版的。如：唐祖培所著「孫中山傳」，出版於民國四十二年，吳相湘的「孫逸仙先生」第一册，出版於民國五十四年，足爲證明。其原因所在，即爲發現　孫先生自傳所述生於同治五年華曆十月十六，爲時較晚，故最近方得引用。此足以說明我所回憶的　孫先生生辰的最先查考資料，是出於盧夫人所提供的之無誤。至於　孫先生寫給翟爾斯的自傳究自何時起方普遍爲人所知，則尚有待查證。

## 二

在我看來，要對此得一明確的答案，只能在若干有力的「旁證」中去追尋，並在何以發生差誤中找尋其原因背景之所在。在我說明從原因與背景的追求所得的一些資料足資研究之前，下面各項有關　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先生生日之謎的資料，先爲一提，然後再提出我個人的意見，以供參考。

廖仲愷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在很久以前曾有一文述說她對　孫先生二十多年，向來沒有談過他做壽的事，他的。只是在一九二四年的深秋（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的鄉親——『明天就是你的生日』

生六十歲了。我們大家才知道中山先生的誕辰，原來是一位老太太遠道來看他，提起了都想爲中山先生祝壽，慶祝一番。但是中山先生沒有答應，他認爲他個人這樣鋪張祝壽，是不應該的。結果只是由仲愷等幾個比較熟悉的同志在他的公館叫厨子辦了兩桌簡單的酒菜，作爲做壽算了。」

何香凝這位老太太在　孫先生的生前，她和她的先生廖仲愷先生都是就她上面簡短的敍述亦可看出若干不太正確的地方。第一，民國十三年十一月那時　孫先生只有五十八歲，而她卻說：「那一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　孫先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應當只滿五十八足歲。　孫先生逝世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其時　先生尚未滿五十九足歲。第二，她說的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的深秋，究竟是十一月的那一天，她並未說明。所謂「明天就是你的生日」究竟指的是同治五十一月十二呢？還是民國十三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合算爲是年的舊曆十六呢？兩者似乎都可說得上，但究不知她指的是何日？如果說：所指的明天是同治五年的十月初六，則應當是民國十三年陽曆十一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日；如果說：所指的「明天」是十三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則這一天又應當是舊曆十月十六。我前面所提的回憶，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是　中山先生起程赴北平的頭一天，以我的推測和聞見，那天　孫先生忙碌得不得了，開會、演講、接見賓客、佈置後方、觀看提燈歡送他北上，似乎沒有時間參加仲愷先生爲他準備的兩席簡單祝壽的宴會。第三，既說尚有幾個比較接近的同志參加祝壽宴會，何以事後竟無一人提及此事？仲愷先生是當時廣州黨政負責人之一，爲何在　中山先生逝世後，爲了要知道　先生的生日，還要在盧夫人處探求呢？第四，　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後，我在廣州在幾次的紀念會中曾親自聽過仲愷先生講述　孫先生的生平和逸事，何以都未曾聽見他說及當日祝壽這件事呢？我以前發表過幾篇文章，曾轉述仲愷先生講說關於　孫先生的逸事，都未曾憶及他提出此點，所以我對於這位年邁的老太太的話，不免要發生一點懷疑。不過她所說：　中山先生到底誕生於何日，她都不知道，卻是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可能我們從大家都不知道　孫先生的生日這一線索中找尋出一項原因，使我們更能了解孫先生的偉大。關於此一推論，容我敍述如後。

## 三

據我們所知，當　孫先生在世，他的誕生日期很少有人知道。此中原因是不是由於革命時期居處無定，在流亡顛沛情形之下，無由顧及此類細事所致？抑是由於他平時不以其生日告人，致人也不加注意？勿論是否屬於上述兩種原因的那一種，有一事實足以值得我們研究的則是　孫先生在世時，同志中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道他的生期的人，的確是少之又少。在民國十四年　孫先生逝世以後，同志，大家事後追憶起來，都覺得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惟獨戴季陶先生，使大家對於此一問題的探討發生了很濃的興趣。戴先生說：「大約在民國五、六年之交，孫先生寓居上海，在某一個晚上，國父寓所備有酒菜兩席，約有少數同志參加，到了入席之後孫夫人乃順便向同志們提及此日乃爲先生的壽辰，於是大家才起立舉杯爲先生祝壽。」戴先生說這是他在　先生在世時，參加過的惟一壽宴。同時戴先生更說：「中山先生的酒量的宏大，很少有人能夠比得上。」我說：「你的酒量不也很大嗎？」戴先生的答話很富有哲學意味，他說：「凡能飲酒的人，都不『鬧酒』，鬧酒的人都算不得是能飲酒的人，我自己只能算得一個鬧酒的酒徒，總理才是眞正能飲酒的人。」他爲　孫先生計算當晚飲酒的數量，使他驚詫的是任何人都將不易支持時，　孫先生卻自始至終，從容寧靜，一如平時！

國父在世時的壽辰，至今想起來的確是不易爲人所了解的一個謎。我們要知道此中原因何在，我想廖仲愷先生當　孫先生逝世北平之後，在廣州幾次關於　先生生前逸事之報告，是值得參考的。回憶廖先生所述，　孫先生誕辰很少爲人知道的原因，是由於　孫先生不以其生年月日輕易告人的緣故。他不以其生年月日告人的原因，則是由於信守兒時對於他的父親達成公的一種諾言，也卽是表現　國父一生重信誓，重然諾那種偉大的精神所自來。以下便是仲愷先生報告　孫先生平逸事的大意：

孫先生兒時的小名爲「帝象」，帝象者，帝王之象也。在專制時代這樣的名字是不便取的，取了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人發覺便會發生災難，我們回想起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舊社會裏，竟然用了這樣遭忌的名字眞可謂大膽之極！現在的人，如果對當時的社會情形不加以了解，一定會忽視這一名字的取用在當時會發生如何的危險程度，或許還會認爲是一種思想陳舊，封建意識，後人牽強附會的陳腔濫調了。帝象這一小名是孫先生誕生後，他的父親達成公爲　先生取這樣一個名字，依照當時社會的情形是十分犯忌的，而且可能會召致煩惱，亦是意中的事。過去中國社會一般的習慣，大凡兒女誕生之後，便必須請教算命先生爲此一新生嬰兒算八字，以預知他未來的吉凶禍福，生在那一時代社會裏的　孫先生，他的家人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　先生的父親對於堪輿算命據說是十分相信，而且具有獨特的知識。是不是由於達成公爲　孫先生算命所得的結果，以爲此子不但大富大貴，名揚四海，且將位居九五，便爲他取了「帝象」這一小名呢？關於堪輿、算命和看相等等舊時習俗，現在實在找不出他有什麼科學根據可以使我們完全相信。我在此之所以要提出這一段關於　孫先生兒時的故事，不是在藉此提倡迷信，違反科學，而是要藉此一故事以說明他誕生時的中國社會情形，和他所誕生的家庭與一般舊時家庭並沒有多大區別。由此更可知道　先生一生的奮鬥和成就是如何的不容易了。如果有人因爲有了這一段故事而加深其對迷信的信仰而非議科學，那就不是我說話的原意了。

據仲愷先生說：　孫先生的父親對於帝象這一名字，後來心理上起了一個極大的矛盾和恐怖，那就是說，既然家庭裏誕生了這樣「大富大貴」的孩子，如果是祖宗積德不厚，此一麟兒未能長成便遭夭折，將如何辦呢？再則，家庭有這樣具有帝王之象的人誕生了，在當時專制的社會，如果被官府知道了，



国史馆 Academia Historica

不僅要危害帝象，而且將連累家庭同受禍災，又如何辦呢？達成公在這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不安心情之下，終於在　國父六、七歲時想出一個不脫舊社會俗套的辦法，以作補救。爲了補救恐怕祖先福澤不厚，不能保祐他鍾愛的兒子成長起來，於是他便把　孫先生帶到翠亨村的一座廟宇，把他寄拜給廟內所供奉的北帝菩薩爲子，靠菩薩的保祐使他長成。爲了恐怕官府知道，據說他命　孫先生說：「我要你在神的面前發誓，自此以後不得把你的生年月日告訴外人。你能做得到，便答應我如此做。做不到，也要對我明說。」「我一定能做得到」，　孫先生拍着胸膛毫不猶豫的答覆了他的父親。

## 四

假定我們以廖仲愷先生這一段關於　孫先生誕生的故事爲參考，我想便不難知道他爲什麼一生不曾公開舉行過祝壽的道理。世人之所以很少知道他的壽辰的日期，便是由於他爲了要實踐他兒時對父親所作的諾言，不以生年月日隨便告人的緣故。

重信誓的精神是　孫先生建國方略中心理建設的一個最重要環節。因此他在革命組黨的時期，規定入黨宣誓是取得革命黨員資格的重要條件。他在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位時，率先舉行宣誓，他當時更主張文武官吏，都要一律宣誓，以表示盡忠職守，歸順民國，永久不渝。可惜當時大家都不重視此一意義，認爲不急之務而漠然視之，未克普遍舉行。其後他讓臨時大總統職位於袁世凱，他對袁氏提出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項條件，便是要袁氏必須於就職時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制。當時大家以爲這種空洞的宣誓，何能約束野心奸詐的袁世凱，而未加重視，但因　孫先生十分堅持，且以自己就任的時候曾經宣誓爲例，終爲袁世凱所接受。袁氏是一奸雄，是一老官僚，他認爲此種細節於他取得實際政權並無多大影響，便也就欣然接受了。　孫先生一定要袁世凱宣誓服膺民國，永絕帝制的理由是：「袁世凱向爲君主的臣僕，而不主張共和者也，而民黨昧然讓總統於袁，已自甘於犧牲共和矣，既甘放棄於前，而又爭之於後，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則不然矣。」果然後來袁世凱背叛共和，帝制自爲，我們便以背誓的理由討伐他，他的部下也有理由不服從他，帝制終歸於失敗，這未始不是其中原因之一。

國父爲什麼如此重視宣誓呢？據他的自述，認爲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盤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爲一機體組織之法治國家，則必須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換句話說，宣誓是要每個人從他的內心自發的拿出他人格和榮譽對於他所願接受的事情提出擔保。這是人類一個「心靈的王國的建立」，這個王國建立不起來，一切都是虛僞的，無信念的和不可範圍的，那末這樣一個社會便會趨於崩潰橫決了。

孫先生對於西洋社會的看法，重信誓的精神是其一端，而我們中國，特別是上層社會的人，便缺乏這一種精神，所以他主張宣誓，作爲建設國家一個正心誠意的發端。不能做到正心誠意，便不能做到修、齊、治、平。他認爲革命的組織，是「先天的國家」，如果有志於革命的人，不能共立信誓，以實現他們的理想，必然是渙散而團結不固，團結不固，必定是歸於失敗的。所以建立重信誓的精神是革命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人第一個條件，也卽是他所謂：「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爲去舊更新之始，遠在興中會成立的時候，就訂定了會員宣誓的誓詞，民國紀元前七年同盟會爲中華革命黨，民國八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每次黨員入黨以及必須鄭重舉行宣誓，其中尤以民國三年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之際，孫的嚴格遵守，並規定宣誓人必須在誓約書上加打手印，當時確有不少先進同而表示反對，甚至爲此而未加入中華革命黨。革命前輩張溥泉先生在回憶錄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命余打手指拇，　總理以手強余打指拇，余婉拒之。」從這段話，足見　孫先生對信誓看得如何的重要了。從現在黨史史料中，我們尚可見到當日　國父親書的誓約，在這一誓約的簽名下所打指拇仍隱然可見，這種獻身革命的至誠表志對這一規定不以爲然，因現，實在令人仰慕！

## 五

在　孫先生的一生中，有一件事爲一般人所指責與不了解的，那便是他總統之後，在解職大總統之前不久，他率領文武百官恭祭南京的明太祖陵；「國民公僕」，並有一極美麗的祭文在陵前宣讀。這一舉動曾引起當時若干孫先生均一言不答，任人批評。這些人所持的理由是：在這一時期，滿清政，舉國的人都熱望着和平，過去革命排滿的熱情已轉變而爲五族共和的高調了。恭祭明太祖陵這一舉措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無疑的要被時人認爲是一個足以引起漢、滿、蒙、回、藏五族團結的障礙，是我們所想像得到的。但是　孫先生爲什麼要如此呢？那便是爲了實踐他曾經加入洪門致公堂，對反清復明的誓言有所交代。

要了解上述這一故事的原委，我們必須知道會黨在革命的初期與　孫先生倡導的革命運動的關係。在國內方面，從乙未（一八九五）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到庚子（一九〇〇）年三洲田之役，其中主幹人物鄭士良便是會黨一位傑出的英雄，鄭的力量則全賴廣東的會黨。其他如黃克強先生在兩湖一帶所發動的革命運動，也無不以會黨爲中心。因爲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的成立，國內可以爲革命之助的力量，會黨實居首要。那時的會黨是以反清復明爲宗旨，與　孫先生革命排滿的主張不謀而合，而會黨的成分又以下層階級爲多，歷史悠久，組織普遍，故其發爲行動，也較容易。而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一因滿清入主中國二百多年，民族大義已漸漸消失，二因知識份子生性渙散，漫無組織，以言論文章，作革命宣傳是其所長，一言行動，則又不如會黨之便於散集了。

國父是一九〇三年於檀香山才加入當地的會黨組織，名叫致公堂，致公堂是舊民族主義在海外的反清團體。爭取海外華僑參加革命是當日最必要的一着，要爭取華僑，先爭取海外的洪門是十分必要的，這是　孫先生加入致公堂的唯一原因。海內外反清復明的會黨組織相沿都是與官府作對，因此他的一切活動都十分秘密而嚴格。凡是加入的人必須宣誓做到兩件事：一是服從他的反清復明的宗旨，二是嚴守會內的秘密。　先生要加入致公堂，當然不能例外。他把一切手續都做到後，便被封爲洪棍，即大哥之意。　孫先生曾經作過一項努力，想把致公堂改組爲近代化的一個革命團體，但這一努力未能完全做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所做到的僅是獲得海外洪門對於他革命運動有力的支撐，擴大了他領導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後來他爲了適應中國革命進步的需要，在一九〇五年便把以會黨份子爲骨幹的興中會，改組爲以青年知識份子和各階層的進步份子爲中心的同盟會，革命的形勢便日益擴大起來，在七年之後便有辛亥之役，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

我們於明白了上面這一段經過之後，便可知道　孫先生於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爲什麼不計他人的攻擊，而要率領文武百官恭祭明太祖陵的原因所在。他唯一的目的在表示滿清既將宣布退位，民國卽可成立，他於加入洪門時的宣誓便已實踐。而他爲了適應革命新的進步的需要而要作的努力正多，恭祭明太祖陵後他的心靈的責任便已解除了。這是他辛亥時恭祭明太祖陵的動機，也是他對曾作過的誓言的精神又是何等的偉大呀！至於他後來何以認爲會黨的組織，已不能適合於革命的進步的需要，而必須改弦更張的理由，在他民國八年覆蔡元培先生，不主張把清代秘密會黨編入「國史前編」的信中說得甚爲明顯。　孫先生說：「清世秘密諸會黨，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其民族之主義，雖甚普及，而內部組織，仍爲專制，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爲秘密會黨史，而不雜廁於民國史中，庶界劃井然不紊。此亦希望注意及之也。」在此處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由於會黨的宗旨僅是舊的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與能適應革命進步的需要的第一個理由；因爲會黨內部的組織，不合於共和的原理和民權主義的思想，這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他認爲會黨不能適合於革命進步的需要的第二理由。因此他不贊成把復明的運動混爲一談。從他覆蔡元培先生這一信中，我們可以明白他祭實踐他加入會黨時的誓言，求心靈有一交代，以便適應新的革命形勢的太祖陵這段故事的意義，是在

對於一個偉大的人物誕生時日的考證，在治歷史的人爲了求眞求實，考證是一件事，而追求一項史實何以會發生爭議的原因和背景則大屬重要。從我上文所述的一些回憶和引證，我們不難推想發現　孫先生重然諾、重信誓的偉大精神，而這一偉大的精神，又往往是爲研究孫先生的思想、主義和生平的人所最易忽略的地方。孔子的門徒顏淵對於他的老師孔夫子的偉大曾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歎，我於引述出他的偉大，不禁與顏淵有同樣的心情！

## 下、國父生辰的再考證

### 一

自我所寫「國父生辰考證的回憶」一文在「傳記文學」上期發表後，承朋友同志們爲我提供了不少的線索，因而陸續又發現了不少其他有關的寶貴資料，作我前文的研究與推論一項更有力的補充，尤以最近和　國父哲嗣孫哲生先生的談話，所獲得的論證更爲寶貴。在最近一次的晤談中，我曾以前文所引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用發現的盧太夫人覆香山商會查詢　國父生平事蹟的信中所言，　國父於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初六，亦即是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以證實我回憶中此項生辰的獲得，是由於民國十四年　國父在北平逝世後，廣東黨政負責人從盧太夫人處查詢以爲依據的一項事實之無誤。哲生先生當即很快的說道：前去查詢的便是他自己。我聽了他的話之後，我一時引爲無比的高興，使我的回憶又增加了一項有力的證明！

大凡天下事只要有利於自己的話，最容易爲當事人所接受，而不易細密的加以思考，有時往往亦會與客觀事實相乖離的。當時我在高興之餘，忽然憶及哲生先生所說查詢自去問盧太夫人而後得來的話，與我對那段回憶所指的時間，似乎仍有出入的地方。因爲在我的記憶中，民國十三年的九月前後，哲生先生本人已因廣州市政府改組，卸任廣州市長的職務，奉　中山先生之命前去東北，會晤張作霖，代表　中山先生與張商談合作及解決時局的辦法。　中山先生在是年的十一月十三日，離粵北上，哲生先生亦未同行，一直待至　中山先生由上海繞道日本抵達天津之後，哲生先生才在天津與　中山先生會合的。　中山先生是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未幾即病；同月三十一日他由天津移往北京就醫，不幸竟於翌年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病逝北平。自抵達天津以至在北平逝世，哲生都隨侍在　中山先生左右，一直到了民國十四年四月二日，　中山先生的遺體安置在北京西山碧雲寺之後，大約在是年五六月之間他才回返到廣州。我對於這段經過尚能記得如是清楚的原因，是由於自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廣州特別市黨部是依據改組後新的黨的總章而成立的第一個正式黨部，孫哲生、馬超俊、吳鐵城諸先生和我都是市黨部的委員，哲生是組織部長，超俊是工人部長，我擔任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是常委而兼青年部長。當哲生先生於五六月間回到廣州時，我們曾在廣東大學的禮堂舉行過一次歡迎會，請他報告　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的經過。

從上面一段的回憶加以考證，關於　中山先生生辰向盧太夫人查詢，哲生先生所說是由他親自去問得來的，也許是以後的事，而不是我回憶中所說是在　中山先生逝世後，由廣州黨政負責同志向盧太夫人處獲知的。查詢　國父生辰的目的雖然是相同，而在時間上則有先後之差異。因爲我的回憶所指是在哲生先生未回廣州之前，而他之所指則在回廣州之後。我們在相互求證之後，彼此均感欣然！後來我再把盧太夫人答覆香山商會查詢　中山先生平的信，細讀一遍，不但發現在信的前段說明　中山先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寅時，與最近在她遺物中所發現的八字甚相符合，而且在此信的末段又有以下珍貴的發現：

「……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指哲生先生）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祈求，復賜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之至安慰者……」（註一）

就上述的一段資料看來，盧太夫人覆香山商會查詢　國父生平的信的時間，很顯明的，是在哲生先生尚未回到廣州之前的事，因爲信中所述　國父逝世前一日自證其爲基督徒的話，是接到哲生先生寫給她的信才知道的，所以乃有「此乃科兒手書所言」的話。由此可知哲生先生所說關於查詢　國父的生辰是由他親自向盧太夫人處得來，所指的應當是在此一覆信之後，而不是在我所指的同一時間的事。我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此所以要引用這一資料的目的：第一、在說明自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在關切急於要知道　國父的生辰，其時在廣州的黨政方面自然更爲關初　國父生辰資料的獲得，是由盧太夫人所供給的。第三、　國父生合算爲是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當時是據此以確定是日爲　國父誕生是在以後。

## 二

我在「國父生辰考證的回憶」一文裏，我曾經說過：關於　國父成爲一個爭執難決的問題。爭執難決的原因：第一是由於　先生在世生亦未曾舉行過祝壽的紀念，所以在他逝世以後便成了大家要明白的。關於這一點，我在本刊上期的回憶和推論那篇文章裏，我已經提出了我個人許多的論斷，再加以最近在盧太夫人的遺物中所發現的八字和盧太夫人覆香山商會查詢　先生平的信，在我看來這兩項原始資料的發現似乎可以大大的加以澄清了，假使我的看法沒有錯的話。第二，最引起發生爭議的另一原因，則是民國十五年前，一八九七年，　國父應英國劍橋大學翟爾斯教授之請所作的自傳，說他自己誕生於一八六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於是後人便以　先生的自傳爲根據，而隨之以來的種種附會和臆測便由此而發生了。在此，我必須補說一句，卽是：決定　國父誕生的年月日，在過去好似一個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年陽曆十一月十二，是最先得之於盧夫人所提供的資料，　國父寫給翟爾斯教授的自傳，他自述誕生於丙寅華曆十月十六之說，是發現在盧夫人提供的資料以後，兩者的相差時日爲十日。自傳所述　先生生於同年十月十六日，在當時甚少人知道，至少我是不知者中之一人，至於自傳在何時才發現？何時才普遍被人引以爲依據？則只留待下文加以考證和說明了。

我在本刊前一期的文章裏，我曾經大約作了一項統計，指出凡是在　國父逝世以後，在民國四十二年以前所出版的有關　國父的傳記和生平的書，都是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誕生爲依據，在民國四十二年以後出版的，則才以寫給翟爾斯教授的自傳　國父自述誕生於同年十月十六爲依據。我爲了避免上述的概略統計尚不足以求證，特請熱忱而細密的劉世昌先生爲我代查在歷次出版的中山先生全集中，找尋何時才發現有寫給翟爾斯教授這項重要　國父自傳文件。我很感謝劉世昌先生的細密，他爲我查考所得的結果如下：

一、中山書局，民國十五年出版的「中山全書」沒有致翟爾斯自傳文件。

二、新文化社，民國十六年出版的「中山叢書」沒有上項文件。

三、太平洋書店出版的「中山叢書」沒有上項文件。出版的年代不詳，內容與前書同。

四、吳拯寰編，民國十七年出版、十八年再版「孫中山全集」沒有上項文件。

五、胡漢民編，民國十九年版「總理全書」沒有上項文件。

六、陳虫吟編，民國二十五年出版「孫中山全集」沒有上項文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中央宣傳部編，民國三十一年出版的「國父遺教」沒有上項文件。

八、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二三十二年版沒有上項文件。

九、黃季陸編，民國三十三年版「總理全集」有上項文件。(註二)

十、張其昀編，「國父全書」，民國四十九年出版有上項文件。

上面所舉十種有關　國父的全集的統計，使我最感驚異的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我主編的「總理全集」裏尚無　國父致翟爾斯教授的自傳發現，一直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再版時才發現此一文件而將其編入！現在回想我當日發現此一文件時的情形，眞是快樂得無以形容，認爲是一項奇珍異寶，可以對於　國父的生辰有一基於他的自述誕生於一八六六年華曆十月十六爲可靠了！自最近發現了盧夫人遺物中　孫先生的生辰八字，和她在民國十三年答覆香山商會查詢　國父生平的信，再加以我自己的回憶，當　國父逝世後我們在廣東查詢他生辰時的情形，使我對於他的自傳所述誕生於一八六六年華曆十月十六之說，不免亦信心發生動搖(註三)。日前我曾以此事請教於孫哲生先生，據他的推想可能是由於　中山先生的父親達成公，因爲在一百年前中國的舊社會裏，對於一個家庭裏命運不凡的兒子，爲了避免當時容易引起官府和舊社會的誤會和不便，不願使　國父的生年月日被人知道，而惹出不幸的麻煩和災難，或許達成公竟連對　國父本人亦不曾告訴他正確的生年月日。在我的看法，十月十六的「十」字，可能是十月初六的「初」字的筆誤，亦未可知。總之，綜合了各項有關的經過事實和資料，確定　國父誕生的時間爲十一月十二，指的是同治五年舊曆十月初六，陽曆的十一月十二，而不是指的民國十三年「家人稱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十一月十二則大體可以作一確定，而毋庸置疑。因爲十三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是舊曆十月十六，這一假定雖與　國父的自述符合，但若與其他的資料來加以考證，此說的可靠性便不十分堅強，是出於一種附會所占的成分便較多了。

## 三

何以我認爲以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亦卽合算爲是年的舊曆十六，爲一種附會呢？我上期發表在本刊一文裏所引用的何香凝女士的一段回憶中，便已發生了這種推斷，在此以後，我更發現了汪精衞所述的一段回憶，使這一考證更趨於明朗，在我說來這眞是一項意外的收穫！爲了不厭求詳，便於考證起見，我特把這兩項資料都並列在下面，以便參考。

一、何香凝的一段回憶，她說：(註四)

「我追隨中山先生二十多年，向來沒有談過他做壽的事，他的誕辰到底是那一天，我都不知道。只是在一九二四年的深秋（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的鄉親——一位老太太遠道來看他，提起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我們大家才知道中山先生的誕辰，原來是十一月十二那一天，那年中山先生六十歲了。我們大家都想爲中山先生祝壽，慶祝一番。但是中山先生沒有答應，他認爲他個人這樣鋪張祝壽，是不應該的。結果只是由仲愷等幾個比較熟悉的同志在他的公館叫厨子辦兩桌簡單的酒菜，作爲做壽算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汪精衞在所著「孫先生軼事」一文中，他說：(註五)

「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先生將由廣州出發，經上海，去北京，沒有去吃，至深夜纔脫稿，進言，主張開國民會議，並約於十二日到先生處吃晚飯。我因稿未成等猶在坐，先生欣然命筆，將近代實業團體之於先生，其時廖仲愷等猶在坐，先生欣然命筆，將近代實業團體之近字改作現字，笑說：我只改此一字。我同仲愷出門，仲愷告我，今日是先生生日啊！我爲之恍然，頗以未能共吃晚飯爲憾。」

汪精衞又說：

「總理平時不以生日告人，惟此民國十三年，卽生前最後之生日舉行紀念，爲親信所知。」

從何香凝和汪精衞這兩段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兩人的回憶和所述的經過，都有類似或相同的地方，應當是確有其事，而不是出於虛構事實。正因其不是虛構事實，於是破綻立見，使我們對於此一疑難，得到澄清。我爲了便於研判起見，現在先把何、汪兩人相同的地方，歸納如下：

一、何、汪兩人都說：中山先生不曾舉行過生日紀念，平時不以生日告人，到了民國十三年才首次被他們知道的。

二、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這一日子便是他們所認定的是　中山先生的生日。

三、根據汪精衞所說，足以證明何香凝所稱是日曾由廖仲愷先生備辦兩席酒菜，爲　中山先生祝壽，亦確有其事。

對於何香凝老太太的說法，我上期在本刊發表的一文裏，已指出她可疑的地方約有幾點。我所持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理由是：第一、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這一天，據我的考證，以那天　中山先生忙碌的情形，不太可能有「家人稱慶」那回事。第二、我所舉證盧師諦兄的那段有趣的事，　國父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晚雖曾舉行過一次晚宴，而這一晚宴是爲了翌日起程北上，一面吃飯，一面談事而有的，其參加的人都是黨、政、軍重要負責的同志和隨行北上的重要人員，不像與何香凝老太太所說的榮，爲　國父稱壽的事相符合。第三、我在上文中已懷疑到何香凝所說的日期可能是陽曆十一月二日，而不是十一月的十二日。因爲何說：十三年的深秋　中山先生的鄉親，一位老太太遠道來看他，提起了「明天就是他的生日」。這位鄉下老太太可能是　國父的胞姐妙西。綜合我以前所考證的許多資料，應當是依據　先生家庭的生辰資料爲同治五年丙寅舊曆十月初六，合算爲是年陽曆十一月十二日這一日子。我在前面已經考證過，　國父寫給英國翟爾斯教授自傳所述他生於一八六六年華曆十月十六之說，普遍爲人知道是很晚的一回事，所以這位鄉下老太太所指的「明日」，應當是十三年的舊曆十月初六，合算爲是年十一月二日才是正理。如果她說的「明日」爲十三年陽曆的十一月十二，便又會是同治五年的舊曆十月十六了，徵諸史實，這種說法已經是不盡合理的。

我從汪精衞的回憶中，得到了對我上述的主張，一項很寶貴的證明，我現在說明如後：

第一、汪精衞所說：「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先生將由廣州出發經上海去北京。先二日，叫我起草對於時局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並約於十二日到先生處吃晚飯，我因稿未完成沒有去吃，至深夜纔脫稿，進之於先生！」這裏最堪注意的是汪所說　國父十三日由廣州出發北上前的「先二日」，所謂「先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日」應當是是年十一月十日了。我細查各種史料，證明汪的此說大有問題，我不是說　國父北上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電文是由他起草的事實不確，而是他所說的「先二日」這一日子是記憶上有了錯誤的。我持的理由是：

一、據國父年譜所記載：「先生此行，隨行人員二十餘人。九時五十分，先生偕夫人宋慶齡，乘電船出大元帥府，渡至永豐艦。登艦，天字碼頭一帶軍樂大作，鞭礮不絕，文武人員在天字碼頭立候。先生於艦上向歡送者脫帽還禮。十時二十分鐘，永豐艦起椗。是日艦上隨先生者，有邵元沖、李烈鈞、黃昌穀、朱和中等人。汪兆銘則先一日（十二日）赴港，由港會同下船。」（註六）起程的「先一日」當然是指的十一月十二，汪精衞在十二這一天既已經先期赴了香港，然後才於十四日在港會同　國父自那裏起程赴上海的，那末，他又何能在十二日深夜還在廣州，以北上宣言的起草文，請求　國父審訂呢？凡是在廣州香港居住較久的人，似乎尚可記憶得那時廣州到香港的交通情形，經常由廣州是每日上午有早船開赴香港，到達時已在中午以後；下午，四、五時左右，亦有船開赴香港，到達香港時已在夜間十時左右；由香港開船到廣州的船隻，則只有早、晚二班期，晚船大約是晚上十時由香港起航，於翌日清晨到達廣州。　國父在乙未年，一八九五年九月初九，在廣州發動的第一次革命運動，預定同志，一網成擒，著名的丘四、朱貴全這些革命黨人，便是被擒後而壯烈犧牲的。我在這裏敍述這些歷因爲消息走漏，當這天早晨船到達廣州，方才靠岸，便被滿清政府預先安排的軍警，把船上應援的革命同志，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史性的往跡，似乎與我所要談的問題沒有太多的關係，我之所以要如此說的理由，是在說明至少在民國十三年的時候，廣州與香港之間的交通情形，由香港有夜船開赴廣州，了上午下午班有航行的船開赴香港之外，在廣州是沒有固定的船開赴香港的。因此，汪精衞所說十一月十二的深夜，把起草的北上宣言請求　國父審定的回憶，在時日的計算上是不正確的。據年譜所載他既於　國父由粵起程的前一日，十一月十二日，先期去到香港，然後會合十一月十三日起程那一天早上，我曾親自到廣州呢？根據歷史的記載和當時港粵交通的情形，都屬不可能的事。

## 四

就我的記憶，　國父於十一月十三日起程北上，何能十二日的深夜尚在廣汪精衞那天是在同行人員之列，現在細查自廣州到香港隨行人員的記載，亦尋不出有汪精衞的名字。由此更可以證實年譜所載汪精衞已於起程前先一日，十一月十二日，前赴會說，在民國十三年的時候，廣州與香港之間的交通，除了船行之外，尚有廣州到九龍的火車可通，難道說汪精衞不能在十二日的深夜請示過　國父之後，搭乘火車前赴香港嗎？說這種話的人，初聽起來，似亦不無理由，然而從熟悉當時情形的人，則又更不合乎事實了。因爲當時由廣州到九龍的火車雖然是有，但是當時政府中人搭乘火車由粵赴港的人卻都有所顧慮而不搭乘，因爲其時陳炯明霸據東江，廣九鐵路所經過沿途的地方與陳的防地非常接近，他的勢力隨時有出動擾犯的危險，更加以軍運頻繁，管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又不妥善，而且就我的回憶，其時深夜並無有火車班期開赴香港，汪精衞自亦不能飛渡前去。

第二、如果上項的事實，都不足以說明汪精衞十一月十二這一天深夜不可能尚在廣州的話，那末，最具體而確定的一項證明，則是　國父北上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的發布日期了。據「國父年譜」、「中華民國大事記」各項有關記載，都載明：「十一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在時日計算上，北上宣言既發布於十一月十日，那末何能在此兩日之後，十一月十二深夜，尚未定稿？何能於十二日深夜尚須請求　國父修改呢？這不是由於汪精衞種的疏忽而有的附會。研究歷史的人，如果全憑個人的記憶，而不虛心考求事實以作根據，是難免不發生錯誤的。汪精衞、何香凝二人都是　國父生前親近而倚重的同志，他們的回憶當然有其權威性，他們所犯的記憶上的錯誤，便是出於某回憶的事實，可能都是由於事後的追憶附會了同時某一相類事件，而把他混爲一起了。我在前文已經提說過：　國父誕生的日子，是當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後，由其時的廣州負責同志在盧夫人處查詢得來的，那時因爲通用陽曆，故把日期合算爲陽曆十一月十二，以致大家都沒有重視到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這一日子。汪精衞、何香凝兩人的回憶，可能都因爲年代已久，腦子裏先有了　國父生日在「十一月十二」這一印像，於是便把他們民國十三年深秋得知　國父生日那段經過絞混在一起，以至發生出附會。我看到何香凝的回憶，是她在　國父九十誕辰時寫的，距　國父逝世已經在三十年之後了，她自己此時已年老力衰，當然不容易細心去考證，這種附會自亦在所難免的吧！

根據我以上的論證：可以看出所謂「家人稱慶」，把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二當作　國父的生辰，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是事後出於汪何二人的一種附會。如果我的論證沒有錯的話，何香凝所指出的，在民國十三年深秋，一位鄉下老太太遠道來看　國父提起了明天就是他的生日，由廖仲愷先生備兩桌簡單酒席，爲　國父做壽；汪精衞所說的　國父北上前兩日要他起草北上宣言的一些回憶，是屬於同一事件，同一來源，而並無虛假。只是在時間可能是十天前的十一月二日，而不是十一月十二，而二日這一天又恰是舊曆十月初六，與其他考證相符合。北上宣言發表的日期，是在十一月十日，汪精衞所說把宣言起草的初稿在十二日的深夜，送請　國父修改，當然不會與事實相符，而且他已經在十一月二日先期赴香港，然後與　國父相會合起程赴上海，自無十一月十二的深夜還在廣州之理。因此，我認爲汪、何二人的回憶所指的　國父生日「家人稱慶」的日期，應當是十一月二日才合於史實的考證。對這一疑難得到澄清以後，於是我上文所說　國父生辰決定爲十一月十二日是指的由盧太夫人處查詢得來的資料，是根據　孫先生的八字所記生於同治五年丙寅舊曆十月初六，合算爲是年的陽曆十一月十二，而不是根據民國十三年的十一月十二日爲決定的。十三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應是舊曆的十月十六，若此又會與　國父致翟爾斯教授的自述誕生於華曆十月十六之說相附會了。我在前文已經說明　國父逝世之後很久的一段時間，以十一月十二爲　國父誕辰紀念，則早在發現此一文以前，每年在是日都舉行過紀念會，這指的是同治五年十月初六誕生的陽曆十一月十二，而不是指的十三年的十一月十二，汪、何所說的那段回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在此特別要提起注意的一個事實，那便是在民國十五年北伐統一全國，關於　國父誕辰紀念的舉行，都是依照他誕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合算爲是年陽曆十一月十二日執政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次常務會議，才正式通過頒布爲在頒定前所舉行過的「國定紀念日」（註七）。　國父誕辰紀念講辭中，最動人而具有深厚意義的，要算是民國十五年北伐，國民革命軍進展到長江流域，剛剛平定了江西，在九江舉行的一次　國父誕在大會那篇講辭（註八）。其中所涉及到　國父生辰的話，足以證明我所推論的無誤。　蔣先生說道：「今天十一月十二是本黨　總理的誕辰，　總理的年齡至今天始六十週歲」一語，自是指的同治五年　中山先生誕生的陽曆十一月十二的日子，而十五年的十一月十二這一天辰紀念是難得的，九江各界同胞聯合起來舉行　總理的誕辰更是難得。在光復江西後來做　總理的誕，用舊曆推算起來，既不是舊曆的十月初六亦不是十月十六的日期了。」「　總理的年齡至今天始六十週頒布爲　國父誕辰之後，在民國二十七年的誕辰紀念講辭亦說：「　總理是生於一八六六年林主席森，就是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丙寅十月初六日，照陽曆計算便是十一月十二日。」（註九）就　蔣先生與林先生兩人的話，很顯然的都指的是同治五年十月初六，　國父那年誕生的年月日。

根據　國父自述，認定他的誕辰爲同治五年華曆十月十六的人，在民國四十年時有眭雲章先生所發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表的「關於總理生辰的研究」一文(註一〇)，繼之而作同樣主張的有唐祖培、吳相湘諸先生，他們治學都很謹嚴，而依據　國父的自述爲認定，在有關資料未經發現和考證之前，自然可以產生出他們那種堅定和鍥而不舍的立場，在我本人，在發現　國父自述的文件之後，一時亦不免被此說左右而發生迷惘。治歷史的人最難獲得的是原始資料，對於資料在沒有做到追本窮源的工作以前，在某一事實未明的階段，因而對自己的主張有所修正，自亦不失爲治歷史學的一項求眞、求實應有的態度。我想眭、吳、唐諸先生讀了我此文之後，當有同感，而予我以匡正。鄒海濱、羅香林二先生，他們兩人對於眭雲章先生「國父生辰的研究」一文曾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致函中央改造委員會，對眭先生的主張，有所補正(註一一)。後若干年來所發現的資料，和他們的原函，相互考證，是值得作爲參考的。

讀了鄒、羅兩先生的信，使我們知道關於　國父生辰的爭議，早已發生在民國四十年的時候，此中經過，兩先生信中已言之甚詳，不用由我再爲補述。在鄒先生的信中所言有兩點，使我最感興趣的：一是說明確定　國父生辰爲舊曆十月初六，「孫哲生先生亦有函證明爲初六不誤」。這與我前文所記載最近和哲生先生的談話，他自稱曾親自以此向盧夫人查詢的經過，以及我所指的時間與哲生先生所說的有所差異相印證，則事實的經過，雖然在時間上有先後的不同，但藉此似可對於此一史實加以澄清。二是鄒先生說：他於所著「中國民黨史稿」，民國三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版，第四篇列傳，　國父寫給翟爾斯教授自傳「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句下加注按語，如果他的原意是說在民國三十三年版黨史稿內才把此一自傳納入的話，那正與我所編的「總理全集」，一直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再版時才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此　國父自傳收入在全集之內的時間相同。究竟鄒先生此一資料係得之？還是我根據鄒先生「黨史稿」而編入在我編的「總理全集」內呢。事隔多年，目前亦不易查證，而且亦非必要，惟一可資重視的地方，則是　國父寫給翟爾斯教授的自傳，十三年時才被納入鄒先生所編的「黨史稿」和我所編的「總理全集」第二版之內，則係一項顯明而足資參考的事實。除了專治史學的人之外，恐怕很少人留意及此，其未普遍被人注意，自亦意中之事。細考關於　國父生辰的發生爭議，似乎都起源於此一自傳發現之後。何香凝、汪精衛的回憶中所生的附會則自亦易被此一自傳所述而相互連結起來。治歷史的人對於搜集資料固覺困難，而整理資料則亦頗不容易，說到有效的分析資料和處理，則又難之又難了！

## 六

我在此試舉出一件事以說明一項史料如不加整理、分析和處理，其流弊之大是不堪設想的。居正先生是追隨　中山先生久共患難重要同志之一，而且又是擔任過黨國重任的人物，他到了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二　國父誕辰七十五週年紀念，在重慶國民政府大禮堂，關於　國父的生辰曾作了一段的講話：「國父生於同治四年，如依中國舊習慣來計算年齡，今年應該是七十七歲細一看，凡是逢到「乙」，彷彿總有一種革命紀念的意義。乙丑　國父誕生（一八六五），同治四年就是乙丑年，我們仔偉大的革命人物；乙酉年（一八八五）　國父二十歲，就是他立志從事革命事業的一年；乙未（一八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是第一次革命起義的一年，到乙巳（一九〇五）同盟會成立，乙卯年才有成立的基礎。」（註一二）

命黨雖然是在民國三年開始組織，但是到了乙卯年才有成立的基礎。」

居覺生先生這段講話，不但把　國父的年齡提早了一歲，由同治五年丙寅，提高到同治四年乙丑年，而且還從「乙」字上，描述出後來革命發展許多生動的推算和經過。居一，我之在此要提出居先生這段講話的主旨，只是在說明自　中山先生逝在　國父誕辰紀念會上，在重慶國民政府大禮堂，以身負黨國重任的居先生，猶且把　中山先生的誕辰提早了一年，其他如　中山先生誕生的月、日在新舊曆的推算上，似乎亦很少人虛心加以重視和考證，以作成定論。歷史的價值是在求眞、求實，我們對於創造民國，領導革命，影響人類至重且大的　孫中山先生誕生的年月，尚且如是的粗疏，不能不引爲是一件最遺憾的往事！

註　一：這封信見於民國十五年五月上海三民公司出版的「孫中山先生軼事集」，其全文如下：「科父德明卽中山，生生平事蹟者。函中尙有不少資料，可供研究　中山先生生平的參考。六十歲，生於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時。配本邑外學鄉盧耀顯女爲妻，名慕貞。生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酉時。於光緒十年四月十三日結婚。生一子，卽科。生女二，次女於民國二年離世，現三女琬，配戴恩賽。盧氏自過門隨夫，或在澳或在港，設立藥局，施醫爲名，以革命救民爲實。於九月初九（光緒乙未）首次革命失敗後，家姑家兄偕氏攜同子女奔避檀香山伯父壽屏處度活。及聞夫在倫敦遇欽使之困囚，與歷年所經之危險，不知幾許，心傷膽裂，難以悉數。至光緒三十二年，回九龍先伯處度活。及歲晚新軍起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義，三月二十九日（宣統辛亥）黃花岡先烈舉義失敗後，先伯遞解出境，氏往南洋庇能。斯時中山大集同志於庇能會商進行，差遣同志往各省舉辦，特委張振武、方維二位得力同志回湖北，而有八月十九武昌起義。至成功，科父偕氏及二女回港，各同志催速往南京就臨時總統職，偕氏與子女回粵。及後袁世凱屢遣代表請科父往北京商國事，科父應命偕氏往北京謁袁總統。後偕氏遊歷各省名勝，及前清宮殿名園，復回滬就全國鐵路總辦職。至搜出袁氏陰謀帝制之種種確實證據，又進行倒袁之舉。斯時着氏回澳與先伯同居。及先伯離世，後電召氏往日之救世大道，十分感謝天父舍己獨生子賜世，令氏與凡人信耶穌爲救惜氏德才綿薄，無能多導人歸主，故盼宗主諸兄姊，常爲氏祈禱，能父，氏之日夕誠禱者也。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之至安慰者……」

註二：這一由筆者主編的「總理全集」，於民國三十三年七月，由成都近芬書屋發行。

註三：筆者於五十四年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時，在「學於眾人的聖人」，發有過同樣的說法，這與我遠在十多年以前爲「暢流」雜誌所寫的一篇國父誕生日子的查明，是在盧夫人處得來的經過前後亦有出入。足見過以前的觀點。

註四：可見　中山先生九十誕辰時何香凝所寫「對中山先生的片段回憶」一文中，亦曾表於中央日報紀念特刊一文中提及的

註五：引自「改造」第三十期（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眭雲章「國父年譜」，我亦爲　孫先生致翟氏的自述而動搖

註六：見「國父年譜」，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條。

註七：見民國三十年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編印之「革命紀念日史略」一書。關於總理生辰的研究」一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註　八：見「革命紀念日史略」一書，附錄之總統　蔣先生講演詞：「世界革命領導者總理的精神」一文。

註　九：見前書附錄之林故主席：「總理的偉大人格和精神」一文。

註一〇：見「改造」第三十期。

註一一：一、鄒魯先生致中央改造委員會函：

「敬啓者：總理誕辰，中央規定爲十一月十二日，係根據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舊曆十月初六日推算而定者，當制定時，即有引總理自傳生於十月十六日，應爲陽曆十一月二十二者。中央爲審愼確實計，曾派員至中山縣查閱孫氏族譜，確係舊曆十月初六日，又經孫哲生先生來函證明爲十月初六日不誤。故魯於『中國國民黨史稿』（民國三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版）第四篇列傳總理自傳：『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推算之，即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西曆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規定十一月十二日爲總理誕辰，比自傳早十日，此種矛盾，中央當時已經發覺，曾派員至中山縣查閱孫氏族譜，確爲十月初六日，孫哲生先生亦有函證明爲初六日不誤，則自傳所言十月十六日，當爲總理一時記錯。而十一月十二日爲總理誕辰，無可疑也。』近見『改造』第三十期畦雲章君著『關於總理生辰的研究』一文，謂總理生辰，應根據自傳，僅截取魯按語『當爲總理一時記錯』一語，不引按語全文；誠恐未見按語全文者，誤於鞭絲見屑以訛信訛，用特函敍當日中央制定情形，請予揭載，使本黨黨員及民衆，知總理誕辰，係十一月十二日，庶不致再滋疑竇也。」

二、羅香林先生致張其昀先生函：

「……頃見『改造』第三十期，載畦雲章同志所作『關於總理生辰的研究』一文，略謂總理生辰，當以總理在倫敦所作自傳所云『生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爲根據，依陰陽曆對照推算，則爲是年陽曆十一月二十二日，而於歷年中央所出書刊，及鄒先生所著黨史稿所謂總理誕辰爲十一月十二日者爲實屬武斷，云云。當此國家艱難之際，畦同志關心黨史，於總理誕辰，細加分析，自可敬佩。惟所云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央所出『總理年譜』及鄒先生所著黨史稿等，關於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未能目爲定論。弟昔年曾至總理故里，往復巡禮，蒐集各種資料，恭請總理胞姐妙西，即世所謂姑老太太者，獲見總理家藏『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自十二世祖連昌公，至十八世即總理，各世名諱，與生卒年月日時，皆有詳記，而於總理生卒年代一條，明書『十八世祖德明生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寅時，卒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巳時，壽六十歲。』此爲總理家中明確記載，每年即依此爲團聚紀念。當日粵中同志，知總理確實生日者，實不乏人，非徒依汪氏所記孫先生軼事而始爲推算也。故於中央歷年所出書刊，關於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之記載，未嘗有所致疑。至十一月十二日與總理自傳所云華曆十月十六日陰陽對照不符者，乃總理於旅居倫敦之際，未得書坊所出曆書對照表爲依據，由陽曆回推陰曆偶未符耳。不能於旅中所推日數，而疑及其家中歷年舉行之生辰紀念日也。竊謂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乃客觀史實，無可疑者。眭同志所云：『一定要照總理手書自傳之十月十六日而改正』之說，並可存備研究，然無需爲過早之提出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

註一二：見「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一冊），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出版，居覺生先生：「紀念國父誕辰的意義」一文。

按：本文原載於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二二二期，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由國史館印行出版。另有「學於眾人的聖人——從重信誓的精神認識　國父的偉大」一文，內容相近，不再重複收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如何做會議的主席

古代的社會，人們遇有不同的意見而發生爭執時，他們謀求解決的方法是用拳頭角力，進而用石頭木棍、戈矛劍戟、槍礮火力，以至於使用原子武器。到了近代，人類雖然仍是免不了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但在武力之外又發現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商談」（Negotiation），亦卽是會議。在會議中雙方或多方各自堅執已見時又如何辦呢？於是人類就發明了一個道理——多數決制。（Rule of the Majority）這就是「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基本精神。要尋求多數來決定問題並不簡單，一定要有一個議事的程序和法則，因此就產生提案、討論、修正、表決等一系列會議的辦法。多數決制是民主政治的原則，而提案、討論、修正、表決等程序則是民主政治的法則。不懂得會議的規範來談民主政治是十分危險的！

今天我先談「如何做會議中的主席」。會議中的主席有崇高的地位，青年們都願意爭取做主席，但爭取主席的觀念必須正確，亦卽是說必須先知道會議中主席的地位是甚麼？

一、主席應居於公正超然的地位，嚴格執行會議規則，維持會議和諧，使會議順利進行，尋求出多數，達成決議。

二、主席不能像個木偶樣呆坐主席檯上享受尊榮，他必須能切實執行主席的任務和權力；維持會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秩序，解決問題。

什麼是主席的任務和權力呢？

**一、承認發言的地位**：如英、美兩國議會成立之初，議員人數和議案數目都很少，議案提出後，各人都有發表意見的充分機會。最初美國國會規定：「如議員兩人，一同起立發言時，由議長（亦卽主席）承認首先起立的人發言。」但被拒者如不服，得訴請大會表決。三百多年以前，英國議會規定：「如有二人同時起立，對於某個議案表示意見時，二人中之反對討論案者，有優先的發言權。」後來人多事繁，遇有三數人同時起立之先後，於是又規定：「凡議員起立發言時，須先呼主席，得其許可後始能發言……。」後來美國國會的習慣是，當議員起立呼主席時，主席隨卽回問：「某席爲甚麼事起立發言？」起立者須申述其事由，如主席認可，則發言，否則，主席就說：「本主席不能承認某席發表所述事由的意見。」這項規定就更爲嚴格了。

記得民國十二年我在加拿大的時候，參加加拿大本黨總支部的一個會議，出席會議的華僑很多，有反陳樹人派，亦有擁陳樹人派，我的立場比較超然，被推爲會議的主席。

當討論正在熱烈進行，大家爭論不決，幾乎要動武的時候，我特向出席人員提出緊急的呼籲兩項：一是發言必須取得地位經主席承認。二是離會場必須得到主席的許可，以便維持會場的秩序和進行表決。在我宣布不久，便有一位坐得較遠的同志高呼「主席」，似在請求發言，我因爲尚有人正在發言未完，特對他說：「請你等一分鐘。」他亦便坐下了。少頃他又站起來高呼主席。我說：「請你再等一分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他亦便又坐下了。不久他又急迫的高呼：「主席！主席！主席！」不言未完，仍對他說：「請你再等一分鐘」。不料他表情至爲反常，緊張而不快的對我說：「再等一分鐘，再等一分鐘都會流完了……」原來他起立高叫主席並不是要取得發言地位，而是因爲「內急」，頓時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那天的會議發言的甚爲激烈，大有很難達成協議的趨勢，但因爲有這一笑話的發生，會場空氣轉爲輕鬆，我便趁此機會宣布休息五分鐘。當繼續再開會的時候，大家仍然笑個不止，激烈的會場空氣轉爲和諧，困難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二、維持會場的秩序和禮貌**：遇會場秩序紊亂的時候，主席以木錘（Gavel）擊案，大呼「秩序」、「秩序」以制止之。如果無效，主席可直呼爲首議員的姓名。如在美國的眾議院中，被呼的議員，即由委員會議處，照例由他向大會請罪了事。有時亦得由主席予以訓誡。

在英國的眾議院中就不這樣簡單，被呼名的議員，由主席交議會警衛長監視，必要時，並得由在場的議員動議停止其職務若干時或若干日。根據英國法程的規定，如某議員經大會議決，停止其若干時日而竟拒絕離開會場者，議長有權宣布停止其議員的全部任期。這是多麼嚴重的懲處！在一般的情形下，英國議會會場遇到秩序紊亂時，例由議長令議場警衛長持權標（Mace）周遊會場一次，如果無效，即宣告停會。歐洲各國議會，大都以停止會議爲制止搗亂的普通方法。法國議會遇秩序紊亂時，由議長緊按電鈴予以制止。如果無效，議長就將帽子戴上。如仍無效則宣言停止會議，如仍然無效，則實行停止會議，直至秩序恢復之後再開會議，如開會以後又陷入紊亂則宣告散會。法國議會對擾亂會場秩序的議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按其輕重予以罰金的規定，有罰半個月薪金的，亦有罰一個月薪金的，倒不失爲一個有效的辦法。

**三、主席的裁決權：**例如修正案與原案的主題性質必須相合，修正案才能成立。如果有人對於某一修正案，認爲與原案性質不合而提出疑問，則由主席裁決，例如張某動議，由政府設立大學或學院一所，以利新興科學的研究，但李某提出修正案於張某的原案，主張修改現行大學法。同時王某對於李某的修正案提出疑問，認李某的修正案與原案性質不相合，主席即須處決李某的修正案能否成立。

主席的決定，在會議中的效力，等於法律，有人曾問英國議會議長羅仇（Speaker Lowther）假使議長的決定有錯誤將如之何？羅氏的答覆是：「議會的主席，像羅馬的教皇一樣，是永遠沒有錯誤的。」羅氏以議會主席與羅馬教皇相比，乃指兩者權威的相似而言，主席的公允不偏，與會的人能夠服從主席的裁決，是民主政治成功的根本原因。

主席除了上述權力之外尚有以下其他各項的正當任務：

一、依時宣布開會及散會，或休息，暨按照程序，主持會議進行。

二、維持會場秩序，並確保議事規則之遵行。

三、承認發言人地位。

四、接述動議。

五、依序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

六、簽署會議紀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簽復一切有關會議之詢問，及決定權宜問題。

主席的地位的確崇高而具有威權，但主席在會議中發言受了很大的限制，毋寧說是一項犧牲，照規定主席對於討論事項，以不參與發言或討論爲原則，如必須參與發言，須聲明離開主席地位行之。主席如必須參與討論時，應指定一人暫代主席，退就會場席次，其地位與其他出席人同。但機關之幕僚會議，由首長擔任主席者，不在此限。主席之犧牲更有甚於發言者，即爲主席以不參與表決爲原則。主席於議案表決可否同數時，得加入可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而使其否決，但有特別規定之表決人數者，從其規定。主席於議案之表決，可否相差一票時，得參加少數方面，使成同數以否決之。主席於議案可決，有特別規定之額數者，如相差一票使其通過，或不參加，使其否決，例如：某一議案，會員出席人數爲三十人，依特別規定須三分之二人數通過，即爲二十人，經表決贊成者十九人，主席如參加一票，議案即爲通過，如不參加，即爲否決。

要之，主席必須具有超然、公正、寬容的美德，主席的確是不易爲的，我把做主席的人常犯的錯誤舉出來，供諸位的借鑑：

一、會議的主席，本來立於一個超然公正的地位，他的唯一任務，是在執行會議規則，維持會眾的和諧，使會議能順利解決問題。而在一般的習慣，都把主席的地位當作派系鬥爭，損人利己，操縱會場，便利私圖的工具，於是許多糾紛便由此而生。

二、主席的氣度應當恢宏，態度應當謙恭，服務精神應當充沛，而有些當主席的人，往往把主席的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地位，視爲特殊與優越，一意孤行，惟我獨尊，於是民主政治所需要之自由、尊嚴、和諧三大要素，便完全消失，如此焉能退無後言。

三、討論應有議題，無議題的發言，正如無的放矢。爭辯浪費很多時間，結果不知所謂。

四、同一時間不能討論二事。而我們許多會議不守此一原則，於是發言盈庭，莫衷一是，浪費了許多時間，討論一無結果。

五、動議不按其性質優先地位及次序，但由主席提付討論與表決。

六、發言者不遵守「討論秩序」發表意見，主席不加制止。違反會議紀律時，從未見有提付懲戒之事實。

七、主席不按照「討論秩序」付表決，而自作「歸納」與「結論」，許多重要會議，便如此草草結束。

八、何項動議，須經辯論才付表決，何項動議不須辯論卽作決定，主席從不分別處理，以致發言者爭先恐後，浪費了無數時間，仍是一無結果。

九、不使用正式表決以解決問題，往往亂用「無異議通過」以作了結。卽或提付正式表決，主席又不「兩面俱呈」，使正反兩方的人數得以明確的顯示出來。若只以贊成一面爲表決的可否，顯然違反民主必須承認差異的原則。

十、對少數或反對者，不予以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往往憑藉多數，任所欲爲。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上僅舉出十個顯著的現象爲例，其他的錯誤眞是舉不勝舉。實在說來上面所說的這些道理，在國父所著的「民權初步」一書中已有極其扼要的闡述。「民權初步」一書，原來就是西方所謂的議事法。　中山先生何以要以西方之議事法而以民權初步名之，很少有人加以注意。　中山先生在此書序言中曾說：「此書所取材者不過數種，尤以沙德氏之書爲最多，以其淺顯易明，便於初學，而適於吾國人也。」所謂「沙德之書」，據考證沙德，英文爲：Lucy Shattuck，其所寫之書原名爲：「Wome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出版於一八九一年，意譯出來便是：「婦女參政的議事手册」。沙德爲一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婦女參政運動者，那時美國婦女還沒有參政權，他之所以寫這本書的動機，很顯然的是爲了告訴美國婦女，如果沒有具備表達民主的知識和經驗，婦女雖然有了參政權，也是等於無用的。由此可知　中山先生命其書名爲「民權初步」，其意卽在告訴我們素無表達民主的方法和修養的中國人民，如果要實行民權主義，便非學習表達民主的程序與法則不可，所以他命其書名爲「民權初步」。

我們知道　中山先生「民權初步」一書，成書於民國六年，距今已四十八年了，我們到了今天還沒有普遍的把它弄清楚，還常常在會議進行中犯了許多的錯誤，不能不說是一項十分遺憾而可悲的事！

根據艾伯特（C.P. Ilbert）所著「英國議會」一書，他指出美國開國之初，因爲採用了英國議會的議事陳例、程序和法則而成功，法國國民大會因忽視英國的議事陳例、程序法則而如何紊亂失敗。這些陳例法則就是　國父中山先生手著「民權初步」所闡述的道理。艾氏說：一個到過美國的旅客，看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會的各種議事程序、法則和習慣，會使他想起倫敦西敏士英國議院的規制與陳例，彙編爲一「參議院議事手册」爲美國開國之初，傑佛孫在一七九七年，當選爲副總統，依美國憲法的規定，副總統要兼任參議院的議長，那時的美國參議院成立不久，議事尚無完備的規範作依據，情形的散漫紊亂，使他傷透了腦筋，於是他纔根據英國國會的習慣，編成 Jefferson's Manual 作爲議事的準則，美國兩院議事一直行，傑氏手册的重要是不可忽視的。不僅聯邦政府國會要以此爲準則，就是各邦、各地方民意機構和人民團體議事，也無不以此爲根據。研究美國民主政治的人，如果單單注意美國的憲法是不夠的，傑佛孫手册的影響在實質上對於美國民主政治的貢獻，實不亞於美國的憲法。譬如上次美國尼克遜與甘迺迪相競爭的總統選舉，投票的選民近七千萬人，爭辯之烈爲空前所未有，而秩序井然。如果這些選民平素沒有高度的民主素養，其易流於紊亂可以想像而知。美國人民這一高度民主素養的表現，可以說是由於平時集會議事和各項活動中所養成，而並不完全在於美國有了一部成文的憲法。

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知道，談民主政治而不學習民主的法則陳例，有如法國革命初期國民大會的「民」字，他說：民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而不是烏合之眾的情形。　國父解釋民權二字，是一烏合之眾，便是這個道理。有名的政治學家畢爾先生曾經說過：議會的典例，對於國家政治行爲之影響，常較憲法所發生者爲大。中國的古人也同樣說過：「爭辯聚訟，非禮莫決」，這裏所謂的「禮」，便是今日實行民主所必需的一些規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有了民主的程序與法則，才是有了民主的規律，有了規律的民主，才不致陷於法國大革命初期的紊亂與困擾，才可以循此規律的基礎，這應是　國父著述「民權初步」一書的本意所在！

按：原文時間未詳。

——錄自「進修通訊」第四、五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空中學制之建立及其有關問題

## 甲、觀念的澄清

一、空中學制不是代替現有學校制度，而是對不能升入現有各級學校的青年，予以深造及取得同等學歷之一項補救。

二、空中學制不是義務教育的延長，因爲義務教育是強迫教育，並免費供給教科書。依照我國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之實施爲六年，即限於六歲至十二歲之兒童，而空中學制則以國民學校畢業生不能考入初中，願完成初中學程者，以及初中畢業，不能進入高中，願意完成高中學程者，及高中畢業生，不能進入大專，而願意完成大專學程者爲對象。空中學制不開小學課程，除非由於國民學校因課室、設備及師資之不足，酌設小學講授課程以作補救。

三、凡不能利用空中傳播之課程，得在各地區指定同等學校及適當教師，利用星期休假日，或夜間，予以補修，並予以德育、體育、羣育之輔導，以期能具備同等學校應備之條件。

四、空中學校學生學歷之檢定，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及格，不粗製濫造低於同等學校之水準。

五、空中學校既不是強迫的，故凡自願深造之青年，必須註册接受教育、修滿課業、接受考試，方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能取得學歷。因爲它不是義務教育的延長，故得酌收少數學雜費及考試費。

六、空中學制最好的名稱之一應爲「自願的教育」或是「自發的教育」，而不是強迫的或義務的教育。澄清了此一觀念，則近代科學工具之進步，與大眾傳播工具之有效利用，可以將過去強迫教育爲提高國民智識技能水準爲唯一之途徑，加以改變或修正。目前世界之趨勢，義務教育有由六年延至九年或十二年者。以余觀之，財力不足之國家能將六年國民義務教育辦好，初中至高中六年之修業時間，可以不必以強迫或義務教育之形式爲之。只要一般學校能辦理完善、程度提高，另以空中學制以補救其不能進入初高級中學之青年，其效果自能相等，此乃一最經濟而最有效之辦法。因此，余有一見解以改正從前教育工作者對於教育之概念。

昔時以義務教育與人才教育二者並稱，余意在大眾傳播教育有效利用情形之下，今後教育可分爲下列三個階段：

1. 義務教育——國民小學六年。
2. 自願教育——初高級中學六年（包含職業技術教育在內）。
3. 人才教育——大學、研究所。

現在之專科教育列於自願教育或人才教育之列也無不可。

## 乙、目標與希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對空中學制，有如下之目標與希望：

一、使有志深造者，得有深造之機會。不願深造者，使其謀自立與就業之途徑。凡自願深造者，學校與空中教育二者均能滿足其學歷之要求。

二、補救設備及師資質與量之不足。

三、補救目前學校不能容納大批青年在學校受教之困難。

四、消除因升學狂熱而引起之惡性補習弊端。

五、使青年投入生產，一面就業，一面仍可深造完成學業。

六、使教育能配合社會文化經濟之發展。

七、使新的教育方針與課業標準在這一空中新學制之下能無阻碍而順利推行。

## 丙、必須注意的措施

爲使空中教育成爲一完整之學制，必須注意下列各項之措施：

一、應採學分制，考試及格予以學分，學分修完予以同等學校之學歷。學生必須註册，方能接受考試取得學歷。

二、註册入學之空中學校學生，其在兵役年齡者，不得緩役。

三、可考慮凡不能由空中傳播之學科，改以其他適用之科目代替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學生無年齡之限制，但如改入其他課程聽課之學校，應受該校年齡及其他必須之限制。由空中學校升入高一層級之空中學校則不在此限。

五、空中教育教學法必須有其特點及便利，故必須由專家妥愼計劃研究。

六、空中教學教材必須特別研究供應。

七、面授科目中心之指定，應從註册人數多寡爲適當之處理，地區之配合尤屬重要。

八、導師之人選除利用指定中心學校之現任優良教師外，似可在地方另行物色熱心教育、品學兼優之人士擔任。

九、學生作業除由各地區指定之教師擔任外，應於每週將示範之答案，廣播各地，以期一致。

十、空中學制開始不可偏在初中一年級之課程。各級學校之課程應同時開授，否則其在社會之影響不大。

十一、現時之空中教學，應一律調整爲空中正式課程，如是則事半而功倍。

十二、與各廣播電臺合作，不可專賴教育電臺及電視臺。當然課程教材必須由空中學校供應。

十三、有聲函授學校之唱機唱片大可利用爲空中教學之一項補助工具。換言之，凡空中播講之課程，可同樣許其錄爲留聲片，以補空中講授之不足，惟不能視爲空中學校註册接受教育之正式學生，除非係由已註册之學生予以利用。

十四、開始時儘先利用教育廣播及電視可及之地區，不必待至及於全省設備完成之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五、大體規劃完成後，應付專家討論並廣泛徵求意見，以期觀念之統一，便於推行。

十六、收費之標準，應低於同級之公立學校，課材則由各生自行購置。

十七、空中學校應有一校本部之組織，但不必以現時學校之組織爲藍本。

十八、人事之安排應抱定「行新政用新人」之原則。除非必要，不必遴用老弱陳舊之人員。

十九、迅卽搜集各國已行空中教學之資料作爲參考改造之依據。

二十、各國已有之教學資料，應卽設法借用，特別於有關科學方面高深之課程應全套利用，以補救我國大專學校未能設置講授之課程，或雖已設置，而教學內容貧乏之弊。

廿一、各課講授人員應聘請負有時望及學識皆優者爲之，在講授之先必須使其先有準備，並有教材講義，以便印發。

廿二、教育廣播與電視應置於空中學制統一組織之下，不可使本位主義之各項壞現象，存在於此一新措施進行之時，必如此，方期能順利進行。

廿三、對於商業電視，應以善意鼓勵其早日成功，不可作競爭的打算，因爲沒有商業電視，電視教學推廣之面不廣，其影響亦將隨之減低。

廿四、廣播與電視教育機關業務範圍職掌上應辦之事，工作之聯繫與經費之負擔均應共商合作之道所及之地區大部爲省市教育機關之責。本部之目的只在此一新制度之推行有效，不在成功屬於何人。至要、至要。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最後必須考慮之問題，則爲空中學制是否容許私營電臺招收學生自行辦理，有如公立學校之外尚有私立學校者然。

余意此一新制度尚係實驗階段，在五年之內暫不容許私人設立空中正式學校，俟實驗已有成效，自可容許私人辦理。當前教育改革，決不能徬徨期待，必以至大之決心赴之。

## 丁、應有的精神與認識

改革教育應有兩種精神，一是墾荒的精神，一是播種子的精神。在經驗上墾荒第一次所長出來的不一定是牡丹芍藥和佳種稻穀，而可能是些雜草和稗草子，但是持之以毅力，不斷做些拔草去蕪的工作，牡丹芍藥佳種稻穀必能產生，所以墾荒和改革一樣是不能期其速效與完美的。

所謂要有播種子的精神，是要認清一粒好的種子播下去之後，縱然是不能成長起來，就是爛了亦是肥料，有了肥料的土地，仍然會生長出奇花異菓、佳禾五穀出來的。因此談改革便不能計成敗；怕失敗便一切都遲疑不前，任歲月虛空的逝去了，妨礙進步，莫此爲甚！

按：原文時間未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國史館想作的是些甚麼？正要做的是些甚麼？

在我接長國史館館長職務不久，適逢圖書館學會年會在臺大舉行，邀我出席講話，我在年會中曾初度提出我對於國史館此後的工作方針一項構想。那便是：

公開資料便利研究。

我爲什麼要提出這一構想呢？一是鑑於近代學術文化的進步，是得力於近代研究環境的圖書館學成了一項專門的學問，圖書管理與服務和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公開，以及博物館、科學館等的設置，對於學術研究提供了空前無比的服務。由於大眾傳播工具如報章、雜誌、廣播、電影、電視及印刷出版事業的發達，使人類接受知識的範疇更加的擴大了。

更重要的是：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僅爲人類在思想上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上是一種突破，而且爲人類樹立了一項新的標竿，使我們更努力的去奮鬥，以滿足更美好的人生的追求。隨這一新的突破更帶來了一項對文化歷史的新觀念。這一新觀念便是：當革命之初，法國的革命人民，特別設置了一個首都巴黎的檔案庫，企圖保存革命前一些文獻檔案於永遠，使革命的精神和建樹，傳之於億萬斯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年。在我們中國革命的初期亦有同樣事例的發生，如在北伐統一之後，我們的執政黨在民國十九年便成立了中央黨史委員會，其目的亦在搜集保存革命時期歷史文獻資料，使革命精神和光輝垂之永遠。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之數年，法國的國民大會更通過了一項決議，把巴黎檔案庫，擴充爲法國全國的檔案庫。這一立案的主旨有一重要的認定是：

歷史文獻檔案是法國人精神和努力作爲所創造出來的活動紀錄。他是屬於法國全體人民共有的一項文化財產，應當不限於革命的，一黨的，甚至保守的，或反革命的和其他一切的活動紀錄文獻，都應包括在內。因爲檔案文獻是法國全體人民共有的文化財產，而財產是人權之一，不能任由人分割漠視的。因此，法國人對於各項的文化遺產，不僅可以有親近他，接近他和利用他的權利，而且在研究上和宏揚學術上更是一項不可缺少和侵犯的權利。當然，除了這些應享有的權利外，關於此一文化財產之增益、珍愛和保全更負有重大的責任和義務。權利和義務是兩項相互對待的名辭，沒有不盡義務責任而能單享權利的。　國父在民元開國之初，臨時政府時代，對於黃興、胡漢民及原爲君憲派的湯化龍、林長民等九十餘人呈請設立國史館的批示便已特別指出此一措施的重要爲「示天下好惡之公，昭是非之正」，其原批如下：

「呈悉。查中國歷代編纂國史之機關，均係獨立，不受他機關之干涉，所以示天下好惡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筆者據事直書，無拘牽顧忌之嫌，法至善也。民國開創，爲神州空前之偉業，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內，昭示方來。該員等所請立國史院之舉，本總統深表贊同，應候提交參議院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議決。至請先行派員籌辦一節，俟遴選得人，卽行委任可也。」

我所提出的國史館工作方針爲「公開資料便利研究」的主張：

第一是鑑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由巴黎檔案庫的設置，擴大而爲全國檔案庫的成立的精神，而獲得啓示。

第二是由民元臨時政府時代，國父孫先生對於上述批示設立國史院遺訓而得的啓示。

基於上述的方針，我們對於國史館的職責與任務，有一基本而崇高的認定。那便是：

第一，國史館不是單純的一個徵集史料、整理史料、保存史料的行政機構，他的目標與價值主要是在服務與發揚。

第二，國史館另一重要任務是在提供歷史背景與經驗以作決定國策，宏揚歷史文化。

第三，是在提高學術水準，應付時變之根據與參考。

故今後史料之處理與管理方法，應以是否達成上述目標爲衡量。

按：原文時間未詳。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第一册）

編印者：國史館

發行者：國史館

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九一二三八一一二

承印者：華岡印刷廠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五十五號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